拉康研讨班 · 第二期

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中的自我

Le moi dans la théorie et dans la technique psychanalytique

1954—1955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二期研讨班《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中的自我》（Le moi dans la théorie et dans la technique psychanalytique，1954—1955）共25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e moi dans la théorie et dans la technique psychanalytique；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54年11月17日 6
第2课 · 1954年11月24日 31
第3课 · 1954年12月1日 32
第4课 · 1954年12月8日 64
第5课 · 1954年12月15日 93
第6课 · 1955年1月12日 123
第7课 · 1955年1月19日 156
第8课 · 1955年1月26日 187
第9课 · 1955年2月2日 220
第10课 · 1955年2月9日 249
第11课 · 1955年2月16日 288
第12课 · 1955年3月2日 320
第13课 · 1955年3月9日 352
第14课 · 1955年3月16日 382
第15课 · 1955年3月23日 408
第16课 · 1955年3月30日 409
第17课 · 1955年4月26日 416
第18课 · 1955年5月11日 511
第19课 · 1955年5月18日 544
第20课 · 1955年5月25日 579

第21课 · 1955年6月1日 613
第22课 · 1955年6月8日 649
第23课 · 1955年6月15日 683
第24课 · 1955年6月22日 724
第25课 · 1955年6月29日 752

第1课 · 1954年11月17日

大家好，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

我认为没有理由人为地切断我们的谈话与对话，即使它们在不同的系列中继续展开。说到底，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不加造作地把昨晚在你们这里引入的内容同这里的教学放在一起理解：昨晚谈到的不只是对话的问题，还谈到一个问题——想必并非无缘无故——一个曾在柏拉图对话录中得到处理、因而可以看作嵌入这里这条教学链条的问题。

这样做并不牵强，因为正如你们中一些人昨晚所说——他们一直盼望举行这种讲座，尤其盼望把柏拉图式对话的功能说明得更确切——到了昨晚已经很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穷尽它的全部问题，乃至全部回响与回返。

我恰恰认为，这类被恰当地称为“特别讲座”的讲座，其功能就在于为每个人充当某种结晶点：让种种尚待展开之处、悬而未决的疑问，在我们这里作为中心线索持续探究之物的边缘和界限上凝聚起来；而这项探究关乎我们的技术从根本上是什么、应当是什么，以及正在变成什么。

因此，在开始我们今年的主题——弗洛伊德理论与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以前，在追问自我是什么、说“自我”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前，这个问题会把我们带到很远的地方。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就从这个很远的地方出发，然后再走向中心。

而且，它还会把我们重新带回这个远处，因为自我并非只在弗洛伊德理论和精神分析技术中才有意义。你们将会看到，问题之所以复杂，甚至就在这里：几个世纪以来，所谓“哲学家”的人以某种方式阐发了自我的概念——

我们在这里并不害怕谈论他们，也不怕同他们有所牵连；而且我相信，你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种不怕同他们有所牵连的立场完全可以得到辩护。

——一般意识也以某种方式阐发了它。简言之，在弗洛伊德的发现与革命以前，已经存在某些自我概念与自我功能；我会说，我们必须把它们考虑在内。

我们必须考虑它们，当然是因为它们并非无关紧要；但也因为它们会对某种东西产生吸引力——我希望能够向你们表明——而弗洛伊德理论关于自我的这项功能与运作，恰恰引入了某种全然崭新的东西。

如果人们曾把弗洛伊德理论称作一场哥白尼式革命，那么这就应当具有某种意义。我们在去年的谈话中已经隐约看见这种意义；去年的讨论当然被假定已经在这里，构成我们今年继续探究的出发点与基础。我们今年将从一个新阶段重新着手这套理论，而去年的内容当然也会几乎全部被重新取回并整合进来。

这套理论就是我们在这里所作讲述的引导线索。不要忘记，这里进行的是一个“文本研讨班”，因此，让涉及理论的文本充当中心线索完全合乎情理。不过，我们将不得不确认的，恰恰是这个前分析的概念所施加的一种冲突、一种吸引——

我们姑且约定这样称呼它，好让自己辨明方向，不是吗？

今天，我先向你们勾勒我们工作计划的大致轮廓——

——也就是这个前分析的自我概念，相对于弗洛伊德理论中所呈现的自我概念而施加的吸引。

说实话，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感到惊讶：既然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既如此具有革命性又如此令人震动——事实确实如此——这种吸引，乃至这种对概念的暗中牵引和颠覆，怎么还会趋于形成？

这些新视角本应废除旧有视角；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某种东西又怎会产生？我们在这里所做工作的第二部分、第二个侧面，将始终是向你们表明这种东西的现实性、有效性和在场：也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借助它——

经由理论讲述和术语运用中的各种中介与迂回，

同时也——因为理论与实践不可分割——经由实践的导向——

——精神分析技术目前的历史向我们显示出分析关系的一次偏转。

这件极其特别的事情造成双重结果：一方面，一种自我的理论概念重新出现，而它同弗洛伊德理论整体所包含的自我概念毫不相同——弗洛伊德理论毕竟为我们关于人的认识带来了某种新东西；另一方面，人们试图把分析知识重新吸收进所谓的——我十分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普通心理学”。在这里，这个名称严格说来没有别的意思，指的就是前分析的心理学。

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这件事仍然十分费解；但归根到底，如果我们不能同时亲手触及它所依托的背景，它也未必足以令我们震动。这个背景远远超出较为落后或较为先进的学派之间的概念冲突——也就是所谓托勒密派与哥白尼派之间的冲突。问题远比这更深，它发生在一个同我们关系更密切的背景上：分析本是一种使人解放、破除神秘化的人际关系操作；问题在于，对这种关系的某种处理，究竟是否同某种极为具体的东西结成了共谋。这个具体的东西，不妨称作人的生活体验中的一种根本幻觉；或者，至少把范围限定在我们经验中一个十分确切的领域：现代人、当代人相信自己是某种类型、某种结构的个体；他在半天真、半经阐发的层面上，通过某种文化中受到公认并弥散开来的概念媒介来理解自己。

问题确实涉及人对自身构成方式的某种信念。这种信念处在一种暧昧状态中：一方面，他可以相信它来自自己的一种自然倾向；另一方面，在文明的某种状态中，各处都在向他灌输它。问题就在于：一种在其——

开端、起源和源头上，在它作为弗洛伊德的发现而产生之时——

——明确超越了这种具体作用于个人主体性的幻觉和信念的技术，是否会任由自己缓缓滑落，放弃那个曾经向它稍稍开启、可用来超越这种共同幻觉的途径；还是相反，它会重新凸显这种超越，并使之焕然一新。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参照某种特定风格的作品有何用处、发挥何种功能。昨晚，柯瓦雷先生的讲座结束后，我说了几句话，特别强调了他以柏拉图式对话为例时凸显出来的东西，也就是《美诺篇》所

突出之物。我改写了美诺式的等式，并请你们注意：我们可以用某种可称作萌生状态中的真理功能来表达这一点，也就是在真理同某种知识连接并打结的那个确切时刻来表达它。这种知识本身出于某种原因，必定具有某种自身的惰性；这种惰性使它丧失了一部分最初沉淀为知识时所具有的力量，因为这种知识明显倾向于发生一种退化，即误认这项知识的意义。

这种情形在精神分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别处都无法相比——

而对我们这些当代人来说，它竟然在精神分析中最为明显，这件事本身就应当表明：在人的主体性本身的某种进展中，精神分析占据了一个真正具有选择性、享有特权的位置——

——这种独特的暧昧性，你们若愿意，可以说是在起源处看到的——

尽管人从来不曾完全处在起源，但我们把柏拉图当作起源，就像人们谈坐标原点那样——

——这种独特的暧昧性，正是我们昨晚在《美诺篇》中看到的——

我们本来也同样可以在没有谈到的《普罗泰戈拉篇》中看见它。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读《美诺篇》的同时读了它，但我要强调，你们值得这样做，会从中得到乐趣——

——这种暧昧性就在于：苏格拉底开始在人类主体性中引入某种风格，而知识的概念正由这种风格产生；就在这个确切的时刻——

这种知识同某些一致性要求相联系；无论怎样强调这种要求先于实验科学后来的一切进展，都不会过分。我们终究还得界定：科学连同实

验层面取得某种自主性这一过渡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过你们会看到，我们将由此抵达一些相当特别的事情——

——因此，恰恰是在苏格拉底开创人类世界中的这种新存在——我几乎要这样说——的同一时刻——

我在这里把这种新存在依定义称作一种主体性；我们将越来越需要确切说明我所说的主体性是什么。在我们的分析视角中，它也能以某种方式得到表达；当然，在苏格拉底当时还不可能这样表达，我只是要向你们指出若干术语之间的等价关系——

——苏格拉底恰恰在同一时刻察觉到某种东西：

- 归根到底，最为宝贵的东西——ἀρετή（aretè），即人的卓越及抵达它的道路——并不能由科学传递；
- 他推动人的理解力沿一条特定道路前进，而这条道路同人的卓越关系至深，因为它本身就是从这种卓越出发而开启和奠立的；但在二者之间已经出现了某种去中心化；
- 至于这种卓越本身，它的传递、传统与养成却仍然处在知识所开辟的领域之外。

请承认，这件事值得我们稍稍多作停留，而不是以为最后一切总会得到解决。因为说到底，如果人够机灵，就会察觉苏格拉底是在反讽地说话，于是无论如何也应当相信，科学总有一天会通过某种追溯性作用把它赶上。不过，事情尚未得到裁断或判决：直到现在，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东西向我们证明这一点。

自苏格拉底以来发生了什么？我们应当察觉，许多事情已经发生，尤其是自我的概念出现了。当某种东西出现、当某种东西——如人们所说——涌现出来时，我们的经验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极其特别的性质：当某种新事物到来，当结构中出现另一种秩序——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我们目前这样构成的想象，也迫使我们承认：这种秩序曾在某一时刻是崭新的，是从无中出现的——

——我们同时还会察觉：

- 从这一刻起，它仿佛自永恒以来便一直存在；
- 从它涌现的时刻起，它就在过去之中创造出自己的视角，仿佛它从来不可能不在那里。

如果你们思考语言的起源，我们当然必须设想，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个时刻，人们必定开始说话，因此我们承认语言曾经涌现。但从这种涌现以自身结构得到把握的时刻起，我们便绝不可能在语言中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思辨：我们所凭借的符号，始终已经能够应用于语言涌现以前的事物。

新出现的东西仿佛总会无限地延展到永恒，延伸到在它以前或将在它以后之物的彼岸。我们不可能通过思想废除一种新秩序。这一点适用于你们想举出的任何事物，包括世界的起源。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这项观察也应用于下面这件事呢？我们在历史过程中已经获得了自我这一层面，从此便不可能不借助它来思考人对自身进行思辨的种种表达痕迹与标记，哪怕它们来自远为古老的时代——在那些时代，自我的概念本身尚未得到提升，也没有在辩证法中被推到前台。

说到底，苏格拉底或他的对话者仿佛必定同我们一样，已经在暗中具有自我的这种中心功能；自我在他们那里发挥的功能，仿佛同它在我们的思想中、乃至在我们的这种“自发把握”中所占据的位置相似。我们自发把握的是：

- 我们的思想；
- 我们的倾向；
- 我们的欲望；
- 什么是属于我们的，什么又不属于我们；
- 哪些东西被我们承认属于自己、表达着我们的人格，哪些东西又被我们排斥为某种寄生之物。

归根到底，我们很难不认为这整套心理学也是一种永恒的心理学。然而，我们真能如此确信吗？至少值得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一旦问题被提出，它就促使我们更仔细地考察：是否确实存在某些时刻，让我们能够在自我概念的萌生状态中把握它的出现。到时我们将看到：

- 我们不必追溯得那么遥远；
- 文献仍然十分鲜活；
- 说到底，它的年代并不比这个依然十分晚近的时代早多少——我们的生活中有如此众多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时代发生。

我们读《普罗泰戈拉篇》时，会觉得非常有趣：清早有人来到苏格拉底家中——

- “喂！”
- “请进！出了什么事？”
- “普罗泰戈拉来了！”

这就是一个故事。而使我们觉得有趣的是，柏拉图仿佛碰巧告诉我们，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片漆黑之中。此前没有任何人指出这一点；它只会使像我们这样的人感兴趣——我们习惯于旋动电灯开关，这样还不到七十五年。有人在清早来到，并不等于他在黑暗中来到。不过，这属于同一类事情。

如果你们查看文学作品，当然会说：“这只是会思考之人的特点。”可是，那些不思考的人必定始终都对自己的自我多少有一点自发概念，也必定让它多少发挥着我们现在赋予它的功能。

我会说：“你们凭什么知道？”因为你们恰恰站在会思考的人这一边，或者至少是在那些曾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之后才来到的。因此，在如此轻易地裁断以前，让我们试着更仔细地观察，先把问题敞开。况且，这个问题确曾引起过十分严肃的关切。

有一位先生名叫笛卡尔，他让我们姑且用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所界定的那类人——牙医——获得了如此坚实的“问心无愧”。我们会说，牙医对世界秩序深信不疑，因为他们认为，笛卡尔先生在《方法谈》中

论述了清明理性的法则与进程。只须读一读它，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读完《方法谈》，你们就什么都懂了……

奇怪的是，只要稍加细看，便会发现解释笛卡尔思想的人彼此毫无一致意见。谜团原封未动。不过，牙医察觉不到这一点……总之，这位先生说过："我思，故我在。"奇怪的是，这一步对于思想的全部道路、对于一种新主体性都具有绝对奠基性的意义；然而，更精确地考察时，它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一些人看来，解决它只须承认这里发生了一次障眼法。因为说实话，即便意识确实对自身透明，并把自身把握为自身，经过充分考察以后仍会发现：意识中给出的这个"我"（je），几乎同一个对象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即使意识对自身透明，"我"却并不因此对意识更加透明。

换言之，意识向我们提供的关于这个"我"的信息，并不比它在任何对象被给予意识时向我们提供的对象信息更多。意识对自身的这种领会或把握，同对任何其他对象的把握一样，并没有把所涉之物的性质交付给我们。事实上，即使这个"我"通过某种直接给予在反思行动中交付给我们——而反思行动把意识对自身的透明性呈现出来——也没有任何东西表明，这一现实的总体便因此被穷尽；而说到这里已经是在作存在判断了。你们知道，在哲学家之后，这使人们越来越把意识中所给予的这个自我理解成纯粹形式的概念；说到底，人们开始批判这种自我功能，不再让它仿佛行使某种"自身机构"。这项批判本身恰恰就是一个标志：自我曾作为现实、作为"实体"出现。

思想及思想的进展至少暂时背离了这种东西，把它视为一种必须接受严格科学批判的神话，并开始试图把它当作纯粹幻象来考察。无论这样做正当与否，都不重要：思想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从洛克到

康德，后来甚至包括心理物理学家的整条道路；他们当然出于其他理由，怀着不同的出发点与前提，却只须承接这条路线。事实上，他们趋向于对“我”的功能抱有最强烈的怀疑。因为在把神话本身置于某种批判眼光下时，我们作为科学研究者显然必须极不信任所谓的自我：它总在或多或少暗中延续宗教的灵魂概念所蕴含的实体主义——至少延续了灵魂作为一种具有不朽属性的实体这一观念。

历史施展了一次非凡的障眼法，这一点难道不令人震惊吗？思想只不过一度彻底放弃了这项进展——

我们姑且称它为“这项进展”，不附加任何别的含义；这里只是说，在某种思想阐发传统中，这个过程被视为一项进展——

——思想只不过在弗洛伊德某一时刻带来的、彻底具有颠覆性的视角中一度放弃了它；而弗洛伊德视角的本质就在于——

我想自己可以简要地说，因为这毕竟是我们去年所展开的一切带来的结果，也是从中显露出来的东西——

——如果我们有充分理由把“哥白尼式革命”一词用于弗洛伊德的发现，那么恰恰是在下面这个意义上：在某个特定时刻——我再说一次，这个时刻本身并非自永恒以来就存在——发生了一次去中心化。

归根到底，非哥白尼式的东西也并非全然单一。人类并不总是相信大地是一块无限的平板；他们其实始终认为这块平板具有某些形状与界限，可以像一顶女帽，也可以像你们想象的任何东西——它有过多种形状。但人们相信有些东西处在下面，也就是处在中心，而世界的其余部分在它上方建立起来。

这里也一样。我们不很清楚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会怎样看待他的自我，但应当仍有某种东西位于中心；苏格拉底似乎也并不怀疑这一点。不过，它很可能不是一种……[注]至少要到十六世纪中叶、十七世纪初才形成的自我。总之，它当时就在中心和基础的位置上。

> [注] 此处底本写作 comme un moi du… depuis une date，省略号前后的句法不完整。译文保留中断，只据后文明示的年代，不补造缺失内容。

弗洛伊德的发现带来的去中心化，同哥白尼的发现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弗洛伊德发现的本质，就是一种断言；它最为耀眼的形式早已被写下——

因为诗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确实如此——但他们毕竟总是先于别人说出那些事情——

——也就是兰波在著名的《通灵者书信》中写下的公式：“我是一个他者。”（Je est un autre）

相关知识卡 我（je）、自我（moi）与“我是一个他者”

当然，不要被这句话唬住，也别跑到街上四处宣扬“我是一个他者”；相信我，那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而且，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这句话本身什么也没有说。它什么也没有说，因为首先还得知道“他者”是什么意思。不过，它确实具有一种印象性的价值，毕竟说出了某种东西。至于他者，你们也不要以为只要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反复念叨（直译：拿这个词漱口）——

我们有一位同事——一位从前的同事——曾把下面这件事当作真理带给我们：要使一个人能够接受分析——

这位从前的同事曾稍微接触过《现代》杂志，接触过所谓“存在主义”；他把这件事当作一种胆识带到我们这里，就像人们在分析圈子里献上一项大胆创见那样——

——分析关系的首要基础就是：主体必须能够把他者作为他者来把握。

这人可真够聪明！不过，我们本来可以问他：

- “这个他者是什么？”
- “您所谓‘他者’究竟是什么意思？”
- “以什么身份而言？他的相似者、他的邻人、他的‘我之理想’，还是一只水盆？这些全都是他者吗？”因此，还得知道这里涉及的是哪一个他者。

不过眼下，我谈的是兰波的公式，是为了沿着弗洛伊德的著作和理论，继续追踪它以极其精密而连贯的方式带来的东西。无意识所指的严格说来无非就是这一点，也就是说：

- 有某种东西彻底逃出了一个特定的确定性圆圈；无论人走得多远，正是在这个圆圈中把自己认作自我；
- 在这个领域之外，有某种东西完全有权用“我”（je）来表达自己；而它通过显现出来、以“我”的名义表达自己这一事实，证明了这项权利。

恰恰是这个被称为“自我领域”的领域，对它作出了最深的误认。也恰恰是它最有权——并且通过分析中的事实证明了这项权利——严格说来把自己表述为“我”。只有置于这样表达的层面上，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所教给我们的东西，才获得了它的分量和鲜明轮廓。

弗洛伊德把它称作“无意识”，这使他走向真正的“修饰语自相矛盾”（contradictiones in adjecto），也就是不得不谈论“无意识思想”。他自己还说：“sit venia verbo”——请原谅这个说法——而且不断为此致歉。所有这些表述之所以如此窘迫，是因为在他开始表达自己的时代，他被迫从当时关于语言、对话与交流的视角出发，也就被迫从这样一种观念出发：本质上属于自我秩序的东西，也属于意识秩序。然而，这并不确定！

正是由于哲学在那个时代达到了某种阐发阶段，才确立了“自我 = 意识”的等价关系。贯穿弗洛伊德著作所能读出的，无论是他的经验进展，还是他对自己所描述之物的阐发，都越来越走向这样一种看法：意识归根到底必定属于一个完全特殊的层面。然而，他始终无法抵达它：作品越向前推进，他就越不能定位意识，也越承认意识无从定位。一切都越来越组织在某种辩证法中；在这里，“我”（je）暗中作为不同于自我（moi）的东西构成理论的结构——我们也会看到这一点——但意识却越来越无法被写入任何位置。说到底，弗洛伊德最终放弃了这项尝试，说这里必定存在一些我们尚未掌握的条件；未来会告诉我们它是什么。

相关知识卡 我（je）、自我（moi）与“我是一个他者”

今年，我们会试着隐约看见：在弗洛伊德的功能化过程中，意识究竟可以被定位在哪里。你们会看到，这个问题会通过一些面向重新落下

来；我相信，对一些人来说它们会使问题变得清楚，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则会颇为出乎意料。

不过说到底，弗洛伊德关于个体主体性的研究带来了一些新的革命性视角；在这种突然闯入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视角恰恰表明，主体并不等同于个体。我要强调并再次回到这项区分：我最初在主体层面向你们呈现它，而它也可以——

归根到底，从弗洛伊德经验的科学视角看，这也许正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步——

——在客观层面得到把握。

弗洛伊德带给我们的东西——人们没有充分凸显这一点——就在这里：如果我们考察人的动物性，考察作为有机体的个体在客观上向我们呈现什么，我们将在其中发现：

- 若干性质——关于这一点，我请你们参照行为主义者；
- 若干位移；
- 某些运作与关系。

我们会从行为和举止的组织中推断：我们为自己设定的对象——也就是这个个体——为了达到一些依定义被我们当作其目标的东西，能够作出多大程度的迂回。由此，我们将设想——可以这样说——它同外部世界关系的高度。简言之，我们会大致衡量它的智力程度，考察其水准、最低线或重点，衡量它所属物种的完善程度或ἀρετή（aretè）。

弗洛伊德带给我们的正是这一点：这里所说的主体——也就是一个人——并不位于某条轴线上的任何地方；我们不能在这条轴线上的某一点，把主体的整体功能看成一个孤立的点，仿佛某种枢轴性、轴向性的东西贯穿其中，使主体的各种阐发越是高级，就越同我们所谓的智力、ἀρετή相重合；仿佛他的卓越、完善与个体性会在这条轴线上被单独划定。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事情不是这样！他的智力同作为一个发挥作用者的主体是两回事，它们不在同一条轴线上，而是彼此偏心的。主体本身在作为主体发挥作用时，是某种不同于进行适应的有机体之物，不同于那个能被把握为具有个体目的的个体有机体之物。主体是另一种东西，从下面这一点就能看见：对懂得倾听的人来说，他的全部举止都在说话；而它所说的话恰恰来自别处，并非来自那条把他作为个体中的一项功能来考察时能够把握的轴线——也就是根据一组以个体ἀρετή为尺度构想出来的利益而形成的轴线。它从“别处”说话，主体在别处；“我是一个他者”说的就是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我（je）、自我（moi）与“我是一个他者”

眼下，我们先停留在这个局部论的隐喻上：主体相对于个体发生了去中心化。不要以为：

- 除了诗人与兰波以外，没有人曾以其他方式预告过这一点；
- 它没有以某种方式早已处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根本直觉的边缘。

如果你们阅读笛卡尔时摘下牙医的眼镜，就能在辨认他向我们提出的谜团方面走得更远一点，并会发现某处涉及一个特定的欺骗之神。显

然，这里有某种东西曾被置于异位，恰恰遭到排斥，而我们必须重新把它整合进来。因为说到底，一旦着手讨论自我概念，就不可能不同时质疑：某处是否发生了一次错发牌。

也正是在同一时代，一些耽于沙龙游戏的轻浮头脑开始了某种活动——非常惊人的事情有时正是从这里开始，一整套现象有时也会从小小的消遣中显现。有一位先生，性情十分古怪，完全不符合某种视角对“古典主义者”典型形象的想象；他名叫拉罗什富科，忽然想要教给我们一件非常有趣、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事情，他把它称作自爱（amour-propre）。奇怪的是，它当时竟显得如此具有革命性——我并不是说“革命性”，但它不合那个时代的风格，甚至带有丑闻意味。因为说到底，他说了什么？

相关知识卡 拉罗什富科的 amour-propre：自爱与自我欺骗

他强调：即使我们表面上最无私的活动，也是出于对荣誉的关切；例如激情之爱，乃至最隐秘的德性实践。那可真是件大事！他确切说的是什么？让我们停一下，把它看清楚。他严格说来是在断言，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吗？

这个概念十分重要，因为你们会看到，弗洛伊德的一切都将围绕它转动。如果拉罗什富科说的是这个，他其实不过重复了各学派一直以来所说的话，尤其是——

也不是“一直以来”，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东西是“一直以来”的；

但另一方面，你们在这里也清楚看见了“一直以来”的功能——

——至少从苏格拉底起，下面这番话仿佛就一直有人在说：如果我们把快乐界定为对自身“善”的追求，如果停留在这种抽象层面，我们就只是把这两个概念当作彼此同质、相互结合的东西联系起来。无论我们做什么，所追求的总归都是自己的快乐，这一点当然成立。问题只在于：我们在哪个层面把握它？

是在我们刚才从行为上观察人的动物性的那个层面吗？

这样一来，问题就只是他的智力有多高、处在哪个等级：他理解自己的真正“善”在何处；一旦理解，便追随那种总会从追求真正之善中产生的快乐。

拉罗什富科说的是这个吗？如果他说的是这个，就没有说出任何不同于各学派哲学家一直以来所说的话。后来，这套说法也确实延续了下去。边沁先生以功利主义或“效用主义”的名义，把这套理论推进到它的最终后果。但拉罗什富科所强调的根本不是这个。他所强调的是：当我们投身若干无私行动时，会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某个被称作较低层次的快乐，也就是直接快乐。我们以为自己走得更远，确实在追求一种秩序和性质更高的快乐或善。然而，我们错了。

相关知识卡 拉罗什富科的 amour-propre：自爱与自我欺骗

新东西就在这里。拉罗什富科带来的，并不是一种把人的全部功能囊括在内的普遍利己主义理论。圣托马斯已经说过这个；圣托马斯具有一种——正如技术上确实这样称呼的——所谓“物理的”（physique）爱理论。用现代语言，也完全可以把它转述成一种利己主义概念。它无非是说：主体在爱中追求自身的善。在他的时代，圣阿穆尔的纪尧姆曾反对他，指出爱应当不同于对自身之善的追求。不过说到底，圣托

马斯所说的是几百年来一直有人说的话；照当时的阐发方式来看，其中没有任何丑闻意味。

真正具有丑闻意味的，完全不是一切都服从于自爱。从特定历史时期开始显现的这个自我层面，带来的新东西并不是自爱构成一切人类行为的基础，而是自爱具有欺骗性，并非本真。正是这一点首次引入了鲜明的层次差异和区分，并通过某种复视开始向我们敞开：这个ego本身确实存在层次分裂；它具有一种自身特有的享乐主义，而这恰恰是诱骗我们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既使我们失去直接快乐，也使我们失去那种超越直接快乐的优越满足。

相关知识卡 拉罗什富科的 amour-propre：自爱与自我欺骗

这条路线在一项同哲学家传统并行的传统中延续，也就是所谓道德观察家传统。这完全不是说他们是专门研究道德的人，而是说，他们在观察道德行为或风俗时，引入了一种所谓真理视角。这条路线一直抵达尼采的《道德谱系》，却始终停留在这种可以说是否定性的、严格说来属于道德观察家的视角中：人的行为本身就是受诱骗、受欺瞒的行为。

弗洛伊德向我们展示的真理，正倾注进这个凹处、这个碗中。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无疑受到了诱骗，但真理在别处。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它在哪里。至于在那个时刻随着雷鸣般的声响闯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眼下并不重要：它就是性本能、力比多。性本能是什么意思？力比多是什么？初级过程是什么？这一切你们当然都以为自己知道，我也一样。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真有那样确信。还需要仔细重新考察；今年我们会努力这样做。

不过，继这项发现而展开的经验中出现了一个时刻、一个转折点：人们发现，要触及这个应当与之对话的新“我”，并没有那么容易。说到底，经过一段时间，它拒绝回应。严格按字面说，精神分析经验中确实发生了某种被称作具体危机的事情。

人们曾隐约看见某种东西；有一段时间，它奏效了，随后却不再奏效。1910年至1920年间的历史见证者对此有所表述：主体对最初分析揭示的回应越来越弱。我说的是具体的主体，也就是当时接受分析的人。他们曾或多或少奇迹般地痊愈。如今我们阅读弗洛伊德的病例，看见那些闪电般的解释和没完没了的说明时，事情也向我们显露出来。可是，它越来越不奏效了！这毕竟很奇怪。它使人想到，我向你们说明的事情——主体性本身的存在，以及它因一种自身因果性而随时代发生的变化——确实具有某种现实性；而这种因果性也许逃出了个体本身的一切条件制约。

这同一种由主体性走向主体性的独特辩证法有关。但如果我们把这些约定俗成的单位看作由于所发生的事情、由于个体特性而被称为主体性的东西，人们便开始关注究竟发生了什么，什么东西重新闭合，什么东西产生阻抗。

人们怎样关注它？怎样恰当地关注它？又怎样错误地关注它？这正是我们希望今年看清楚的事情。而有趣之处，在于看看我们目前到了什么位置。

那么，我们目前之所以到了这个位置——

- 一方面，是由于一种奇特的位置翻转，它确实令人震动；
- 另一方面，是由于理论层面逐渐形成的一片嘈杂——其首要原因就在于今年我们将努力置于关切前景的事情：弗洛伊德1920年以后的全部元心理学著作，确实都被第一代和第二代弗洛伊德后继者组成的、可以说能力不足的队伍读歪了，甚至被读得近乎妄想。我相信自己会让你们感受到这一点，并相当清楚地向你们表明：他们完全没有看见这套元心理学意味着什么，也没有看见弗洛伊德为什么恰恰在1920年——也就是紧接着我刚才谈到的转折、分析技术的危机之后——认为必须引入一些新的元心理学概念，即自我、超我和本我。

如果仔细阅读——当然，一切都在那里——他所写的东西，就会发现这场技术危机、也就是当时必须克服的问题和问题呈现的新方式，同他对这些新的所谓局部论概念的发明与制造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为此必须阅读！而且最好按顺序阅读。当人们发现《超越快乐原则》写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和《自我与本我》（Das Ich und das Es）以前时，理应提出一些问题。可人们从来没有提出过！1920年发生的事情如下。

弗洛伊德当时重新引入的东西，远没有按照我们将会看到的那种应有方式得到理解：它们是当时为维持我从今天开场起一直谈到的主体去中心化原则而必须加入的补充概念；而主体的去中心化正是弗洛伊德发现的本质。可以说，当时发生了一场奔袭，一次狂奔，一场普遍的奔袭，简直像小学生获得了解放：“啊！这个好自我、这个亲爱的自

我、这个可爱的小自我终于回来了！”人们又找到了熟悉的方向。我们重新踏上普通心理学的道路；而当这种普通心理学不只是一种学派事务或思想便利，恰恰还是每个人的心理学时，人们又怎会不欢欣地回到其中？

也就是说，人们十分高兴自己又能相信自我是某种中心性的东西。眼下，我们从大洋彼岸一位名叫哈特曼的先生那里收到一些天才般的奇谈怪论，它们正是这种趋向的最新表现。哈特曼是精神分析的小天使，他向我们宣布了一个让我们终于可以安心入睡的重大消息：自主自我（autonomous ego）存在。

相关知识卡 自我心理学与适应概念

自弗洛伊德的发现及其实践开始以来，这个东西始终都是在一种冲突性参照中得到考察的。即使人们曾把ego视为一种同现实处在特定关系中的功能，它在弗洛伊德的阐发中也从来不可能被理解成别的东西：同现实一样，它是在一场戏剧中争取而来的。然而，它现在忽然又被还原成一种现成给予，仿佛只须到这一切的中心把它拾取出来。

人不免要问：从这个时刻起，本应成为关键的东西为何变得完全无法理解？宣称某处必定存在这个自主自我，这种需要回应了怎样的内在必然性？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也会努力看清这一点。当然，它必定同某种超出个体天真性的东西相连；这种天真性使主体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就是自己。说到底，这是一种颇为常见的疯狂，却又并非完全的疯狂，因为仔细看便会发现，它属于信念秩序。显然，我们都有一种倾向，相信自己就是自己；但我们并没有那么确信。请仔细观察：在许多情形下，我们都会

对此产生怀疑，而且并不因此出现任何人格解体；我们会在一些十分明确、十分特殊的领域中产生怀疑。

因此，问题不只是回到这种天真的信念。严格说来，这里涉及一种社会学的现象，也就是同分析在特定社会背景中的某种功能相连的东西；分析在其中作为——

- 一种或多或少孤立的技术；
- 或者，如果你们愿意，一套仪式；
- 又或者，一种受到特定社会背景规定的祭司职分而存在。

问题在于，我们为何重新引入自主自我这种“超越性现实”。当然，仔细看便会发现，这不只是重新引入一些自主自我：正如铁幕彼端某些工厂入口上方写着“这里的人比别处更加平等”，相信我，自主自我的意思就是，根据不同个体，这个ego本身也会或多或少更像一个ego——只是把前面的词换了一种拼法[注]。我们在这里重新回到了这种实体化，重新回到某种属性的神话：不仅必须相信这些个体作为个体而存在，而且还要相信，作为个体，其中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存在得更多。

> [注] 拉康借 égaux（平等的）与 ego 的近音延续前一句讽刺；中文无法同时保留这层语音关系，故在正文中点明“换了一种拼法”。

所谓“强自我”和“弱自我”的概念，都或多或少暗中受到这种看法污染；它们不过是回避问题的不同方式，不仅回避对神经症的理解问题，也回避技术的运用问题。

所有这些，我们都会在适当的时机与位置看到。这也向你们说明，我们为什么必须同时、相应地考察并批判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自我概念。经验会向我们表明，根据弗洛伊德的发现，它必定具有某种意义；另一方面，在精神分析技术中，它也会带来一些后果，而这些后果同分析中对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某种理解方式相连。好了，我想今天已经把问题开启了。

我希望有一位热心人——勒费弗尔-蓬塔利斯先生——对这一时期的第一部著作，即1920年的《超越快乐原则》，作一次初步阅读。

我会努力列出弗洛伊德著作中严格说来属于元心理学的内容坐标。元心理学并不是从1920年开始，而是从最初便已开始：

- 关于弗洛伊德思想开端的文集；
- 写给弗利斯的书信；
- 早期元心理学著作……并延续到《梦的解析》结尾。

在1910年至1920年间，元心理学已经充分在场，以至于你们去年应当已经察觉；而从1920年起，它抵达可以称作最后一个元心理学时期的阶段。《超越快乐原则》是枢纽性著作，也是最困难的一部。我们不会一开始就解开全部谜团，不过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的。

弗洛伊德首先提出了它，先于对其局部论的一切阐发。如果等到自己已经或多或少深入研究——或者自以为已经深入研究——阐发时期的著作以后，才着手这部作品，就只会犯下极其严重的错误。因为弗洛

伊德首先推出这部作品这一点十分醒目。人们若把它括起来，留到最后才读，结果就是：由于原本什么也没有理解，最后便读得更少。

因此，大多数分析家谈到著名的“死本能”时，只好认输（直译：把舌头交给猫）。我们必须扭转这种倾向，至少开始围绕《超越快乐原则》提出问题，至少把这些问题启动并明确提出，再沿弗洛伊德元心理学著作的不同方向向前推进。

今年这个周期结束时，我们会重新回到《超越快乐原则》上。

- 。

第2课 · 1954年11月24日

速记稿缺失。

（参见雅克-阿兰·米勒的转录本：《自我》……瑟伊出版社，1978年；或瑟伊“Points”丛书第243号，2001年。）**

第3课 · 1954年12月1日

今天我想请在座各位帮帮我，因为我有点感冒。我先就昨晚的会谈说几句话。相比第一次，这次显然有所进步；你们已经看到，我们把对话维持得更久了一些。

我收到了一些佐证——这里不透露是谁说的——表明这在每个人的主体性中引起了怎样的来回摆动：

- “我要不要发言？”
- “我没有发言。”等等。这似乎造成了许多问题。

不过，我还是想明确指出一件事。哪怕只看我主持这些会谈的方式，你们也应当已经发现：这些会谈不应当被视为类似所谓“科学报告会”的东西。

因此，请你们留意：在这些公开会谈中，你们绝不是上台表演。尽管我们有外来的客人、同情者以及其他来宾，这完全不应当给你们造成压力。也就是说，你们不必刻意说些漂亮雅致的话来抬高自己，也不必试图增加别人也许已经对你们抱有的敬意。

这确实没有任何重要性。没有什么迫使你们作出四平八稳的发言。你们来到这里，根本上是为了接触一些东西；当然，不可能只在一次聚会中就让这些东西抵达你们。人不会在一堂课里教会你们民族志同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你们来这里，恰恰是为了向自己尚未看见的东西开放；原则上，也就是向意料之外的东西开放。

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让这种开放——可以这样说——取得最大的回响？应当在问题能够抵达你们的最深处把它提出来，哪怕它表现为一个略显犹豫、模糊，甚至古怪的问题。换言之，如果容我说一句，我唯一可以责备你们的，就是你们都太想显得聪明。人人都知道你们很聪明，为什么还要刻意显得聪明？而且，无论真正聪明还是显得聪明，又有什么重要？

话说到这里，昨晚没能倾吐怨气——或相反感受——的人，请现在说出来；因为这类事情、这类相遇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们会有后续。

安齐厄先生已经在这里了，我很感谢他愿意把想说的话说出来。

迪迪埃·安齐厄

我先为自己解释一下：昨晚我没有发言，是因为您把讨论引向了一个特定方向，而我的问题走向另一个方向。

拉康——那就更有理由把它提出来。

迪迪埃·安齐厄

讨论的既定方向，是考察精神分析同列维-斯特劳斯先生所开启的视角之间能够建立怎样的关系；关注的是研究结果的内容、社会的深层结构等等。

相反，我原本想向列维-斯特劳斯先生提出的观察，涉及的是语言，涉及他使用的形式范畴。我想问他：这些范畴是有意选择的吗？还是他只是在使用一种通行语言？我也想请他说明理由。

接着，我原本想指出，这种语言仿佛正是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家已经习惯的语言。

列维-斯特劳斯先生确实有意向我们致意：他的发言从精神分析开始，也以精神分析结束；他表明，弗洛伊德早已发现了那些东西，而他自己在二三十年后又重新发现了它们——这种发现还受到个人深层动机的规定。

关于弗洛伊德，我认为这里有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性学三论》中的那条注释之所以参照《图腾与禁忌》，是因为它晚于《性学三论》的正文；《图腾与禁忌》写于1913至1914年。况且，当人们考察他关于家庭结构对个人产生何种影响的全部发现时，会察觉那些发现带有社会学化的倾向。

不过在我看来，列维-斯特劳斯先生有意强调精神分析与民族学相互接近之处时，最有意思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所采用的表述。他说，在盛行杀害女婴的国家，人们用一妻多夫制来解释这项习俗。他在这里诉诸一种我们十分熟悉的个体心理学机制，即补偿机制；这种机制可以从过度补偿一直走到反应形成。

随后他又表明，尽管杀害女婴的习俗已经在英国殖民影响下停止，所谓一妻多夫制的制度仍继续存在。这里出现了一种持续现象；我们也知道一些同它相近的东西，它们表现为重复自动症，也表现为那种著名的不适应行为的持续，而后者恰恰是神经症行为的特征。

最后，当他揭示自己发现的核心时〔参见《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他向我们表明：一切家庭结构都会穿过自身的偶然条件，向我们揭示一种根本的象征必然性，即社会为了生存，必须抵御家庭。

这样一来，他仿佛使一种目的性发生作用；推动这项目的性的个人本身以典型而鲜明的方式对它毫无意识，但它仍然产生了结果。

而当您后来亲自把这同无意识概念联系起来时，显然，我们在无意识表达自己时发现的正是同一机制：无意识赋予行为以意义，而主体在这些意义中辨认自身[注]。

> [注] 此处底本写作 des sens dont le sujet est que le sujet se reconnaisse，句法显然残缺。译文仅保留“意义—主体辨认自身”的可见关联，不补造缺失的关系词。

最后，当您本人沿着——或者自以为沿着——列维-斯特劳斯先生的方向继续时，您指出：近亲、近堂表亲之间的婚姻越有可能，乱伦的范围便越受限制，因而乱伦禁令也越得到强化。

拉康

关于这一点，我没有解释清楚，因为讨论未能充分展开，所以当时也无法说明。在我们通过分析所认识的个体中，严格说来属于幻想的要素、想象性的创造，正在或显或隐地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当然十分清楚，我们只在特定文化区域中认识这种东西。它的具体在场，正是迪朗丹提出下面这个问题时所暗示的东西：

“怎样解释我们所认识之物的暴烈程度？”

他没有把问题说得足够确切。他说“我们所认识的东西”时，仿佛认为这是自明的，仿佛乱伦禁令的暴烈程度是一种可以衡量的东西，会体现为若干公开而明显的社会行为。这不是真的。因为人们必须先发现它：首先在神经症中发现，随后又在一个远大于严格属于神经症范围的人群中发现。

因此，这里涉及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机构在想象层面的在场。关于它，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系统化工作，我曾说我们可以——而且很难以别的方式——这样理解：

- 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必须按照自己已经发现的那种强度、重要性，以及它在我们所面对的主体中的在场方式，来理解俄狄浦斯情结的各个机构；

- 说到底，相对于列维-斯特劳斯向我们谈论的东西，必须把它理解成一种晚近的、终端性的现象，而不是一种起源性现象。这就是我的解释所强调的地方。

迪迪埃·安齐厄

因此，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整束适用于社会机制的观察，而我们可以在别处找到同它们等价的机制——

除非我的联想本身也来自个人关系——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在症状形成的机制中找到它们的等价物：症状的转化、强化、位移、持续等等。

我原本想问列维-斯特劳斯先生：他是否会在我对其语言的这种解释中认出自己，是否接受这种解释。其次，假如他接受，他是否也接受由此产生的一项后果；因为他想站在集体心理学的视角，而他认为我们站在个体心理学的视角。

因此，如果他认为这些机制——既然我们不得不使用这个心理学术语——无论涉及集体心理学还是个体心理学，都是相同的，那么，他之

所以使用这个概念，是因为已经充分接触过精神分析吗？还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对一种心理学，它即使不算大众心理学，也至少已经在社会科学研究者中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

他的其他同事也使用类似的语言吗？还是这只在他身上偶然出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他确实认为，精神分析也许是一项享有特权的经验，可以在其中观察并分析心理动力，那么，这项经验是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充当建构集体心理学的模型？这就是我原本想向他提出的问题。

拉康

您读过《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吗？因为我谈这本书已经很久，却惊讶地发现，许多我原本以为至少翻开过它的人，竟然免去了这道功夫。您读过吗？

迪迪埃·安齐厄

我在它出版一年以后读过，但最近没有重温。

拉康

当时它给您带来了什么？那是在您的分析临近结束时吗？

迪迪埃·安齐厄——……

拉康

我认为，安齐厄的问题让我们看清了所有这些地方究竟需要重新确立什么。经验使我看见，要在这里对问题形成立体视觉，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亲爱的安齐厄，您怎么会如此看重列维-斯特劳斯先生在自己的语言中引入“补偿”之类词语这一事实？例如，在西藏或尼泊尔的一些部落中，人们确实开始杀害女婴，结果男人比女人多。说到底，您很清楚，“补偿”一词在这里其实只具有统计学价值。我们毕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一个共同体的构成中，数量因素会发生作用，我们不能不赋予它应有的重要性。这是始终必须考虑的一项基本因素。一位名叫布封的先生就此作过十分正确的观察。

麻烦在于，人登上猿类阶梯的一个台阶时，便会忘记下面还有台阶，或者任由它们腐烂。于是，人始终只能从整体构想中截取一个相当有限的领域。不过，我们不应忘记布封那些极为正确的观察；它们消解了种种伪目的论问题的分量。布封观察的是：统计因素作为统计因素，在一群个体、一个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这些事情会走得很远，并表明有许多问题根本不必提出，因为它们会随着数量在空间中的分布自行消散。这类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并在列维-斯特劳斯曾远远提及的某些人口学层面得到研究。布封曾问，蜜蜂为什么会造出如此漂亮的六边形。他注意到，如果要让整个表面都被占满，就没有另一种多面体能够让事情做得这样实用、这样漂亮。这是一种占据空间的压力：它们必须是六边形。没有必要提出“蜜蜂懂不懂几何学？”这类高深问题。

你们可以看到，“补偿”一词在这里能够具有什么意义：女人少了，男人当然就会相对更多。不过，当您谈到目的性一词时，问题便走得更远；在您的理解中，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语仿佛突然给社会赋予了某种灵魂：社会要让女人从一个家庭流通到另一个家庭，并把这种流通安排为从右向左或从左向右。

显然，我们不会在这里重新引出“目的性”一词的全部使用问题，以及它同因果性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可说的；能够稍作停留来思考它，几乎是一种思想纪律。

当然，目的性总会以不同程度的潜伏形式，被暗中包含在每一个因果概念本身之中；除非人们在所谓因果主义思想中，刻意强调某种明确反对目的性并断言它不存在的东西。人们必须反复强调这一点，恰恰证明这个概念很难处理。

不过说到底，问题是什么？列维-斯特劳斯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带来的思想，独创性在哪里？

他从头到尾都在强调：关于亲属关系与家庭，人们很早以前便观察、记录并收集了许多现象；但只要试图以任何方式从某种自然的或自然化的动力中推导它，就根本无法理解其中发生了什么，也无法从中得出任何东西，反而会放过其中全部根本之处。

也就是说——这本书对此说得极其明确，曼诺尼，您同意吧？——关于乱伦，并不存在任何一种自然的恐惧感。我不是说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论证建立在这里；我是在说，列维-斯特劳斯说的就是这个。

不存在任何一种生物学上的、尤其是遗传学上的理由，能够为外婚制提供根据。列维-斯特劳斯在极为精确地讨论我们拥有的相关科学资料以后指出，例如在一个社会中——我们也可以设想人类社会以外的社会——永久而持续的内婚制实践不仅不会造成不利影响，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反而会消除所谓的缺陷。

严格说来，在自然层面不可能推导出这种被称为“优先秩序”的基本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因为列维-斯特劳斯所强调的是事情积极的一面，是联姻导向的正面面向：每一种积极导向、每一种优先导向，都会同时包含一些消极重点，也就是最低限度的偏好，即绝对必须避开的事情。那么，他把这一点奠立在什么之上？

奠立在人类秩序中一种新功能的全面涌现之上；我说“全面”，是指它囊括整个人类秩序。这项功能作为功能并不新鲜。象征功能在人类秩序以外已经有所萌芽，但那些只是萌芽；人类秩序的特征在于：象征功能在其存在的每个时刻、每个层次都会介入。

换言之，一切都彼此相连。为了理解观察领域向我们呈现的人类秩序这个特有领域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从这样一种观念出发：这个秩序构成一个总体；而象征秩序中的总体被称作一个宇宙，它从一开始便以其普遍性质被给予。也就是说，并非某处逐渐形成了象征关系的萌芽，继而出现一个最初符号；符号一旦来到，就有一个符号宇宙把可以提出的整个问题囊括在内。你们若愿意，这个问题就是：

“从数量上说，要到多少个符号以后，符号宇宙才构成？”

这个问题不大可能如此轻易地得到解决。眼下，它仍是一个开放问题〔参见α、β、γ、δ以及《被窃的信》研讨班〕。不过，无论你们设想

象征功能本身在人类生活中起源和涌现时，符号的数量多么少，这些符号都蕴含着一切人类事物的总体。一切都会相对于已经涌现、已经出现的符号得到分类与排列。你们理解了吗?

这就是在人那里构成象征功能的东西。它构成一个宇宙，一切人类事物都必须在其中得到排列。下面一点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越向上追溯所谓“基本结构”……不要说“原始结构”；列维-斯特劳斯把它们称作基本的，并非没有理由：基本同复杂相反。奇怪的是，他还没有写出《亲属关系的复杂结构》。所谓复杂结构由我们自己来代表；它们的特征就在于，其形态远为模糊。

巴尔格先生——他谈过复杂结构。

拉康

当然，他开了头，也指出了复杂结构的嵌入点，但没有专门处理它们。他写出了言说之复杂结构的那一卷，当然也谈到了它们。它们的形态远比基本结构模糊。

基本结构所显示的，是一些看似奢侈的表现之间存在绝对紧密的联系。这些表现包括：极其丰富的相互关系、禁忌、禁令、命令和优先通道；它们预设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符号世界——

我在这里以技术意义使用这个词，指一种层次极高的命名方式——

——因此，你们所看见的是：亲属称谓调节着联姻，并用一整套偏好和禁忌为它划定节奏；在基本形式中，这套体系覆盖的领域比在复杂形式中远为宽广。

所有这些都表明，如果你们愿意，我们越是靠近的不是起源而是要素，严格属于符号命名系统的结构化程度、广度、丰富性与交织便越以其辽阔范围强行显现。换言之，现存事物的基本形式拥有更多亲属称谓，也拥有范围更广的亲属与联姻命名系统；而所谓“复杂”形式，也就是在远为广阔、扩展的文化周期中得到阐发的形式，反而没有这么多。

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这项观察的分量。它是一项根本观察，并在这本书中显示出自己的丰产性；因为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提出假设：这个符号世界——

既然它始终作为一个符号有机体建立起来，独自形成一个宇宙，

甚至把宇宙本身构成出来，使之不同于世界——

——这些宇宙中的每一个，既然是一个整体，就也必定作为一个整体得到结构化；也就是说，它形成一个自洽而完整的辩证结构。

这正是他在书中证明的东西。你们在那里看到，整套亲属关系系统按照一项根本假设排列起来：其中有些系统或多或少能够存续——

- 有些系统会陷入一些严格说来属于算术的小小死胡同，从而预设社会内部会不时因无出路的状态发生某种危机；它同时带来断裂，随后又重新开始；
- 另一些系统则可以或多或少长期地运作。

这一切都从一项真正的算术研究出发——

如果你们所谓算术，不只指操作一些对象集合，

还指理解这些组合运算的分量——

——并超出一切可能从主体同既定事物的生命关系中以实验方式推导出来的资料；严格说来，它同样处在符号世界本身涌现的层次上。

列维-斯特劳斯正是根据归根到底属于算术与组合的资料，开始整理、排列并证明：言说的基本结构[注]向我们呈现的东西，可以得到一种正确、恰当、与之相符的分类——这里不要说“自然分类”，因为所涉之物并不属于自然。

> [注] 底本此处确切写作 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ole，而前后均在讨论亲属关系。译文保留 parole“言说”，不静默改写为 parenté“亲属关系”。

因此，这预设了——你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而我向他提出的问题意义也在这里——某种运作——

而且是从起源便开始的运作；我所作的观察正是这个意思：

它同我们在分析中发现并处理的个体无意识具有相同意义——

——也就是这些象征机构在社会中的运作；从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出现的时刻起，它们便开始运作。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昨晚的回答有所游移。因为说实话，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毕竟——

引入新思想的人经常如此，

会有某种犹豫，不敢维持这项思想的全部锋芒——

——几乎又退回到了心理学层面。

当然，我向他提出的问题绝不是要把某种东西实体化成他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这里绝对不涉及集体性机构。恰恰相反，“集体”一词在这里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解答；集体与个体严格说来完全是同一回事。问题不在于从心理学上加以实体化，声称某处存在某种共同灵魂，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其中发生。为什么？

问题完全不是这个。象征功能本身同实体化、同任何一种把全人类总体想成大动物的拟动物式愿望或构形，都毫无关系。说到底，所谓集体无意识就是这种东西。但这里的问题同它绝无任何相似之处。

如果象征功能确实在运作，我们就不得不看见：我们身处其中。我还要说得更进一步：我们深深处在其中，以至于无法从中出来。

当我们试图把一些现象科学化，也就是在其中建立一种秩序时，会遇到大量问题；这些现象当然不是最容易触及的，而生命现象处在最前列。说到底，引导我们的始终更多是象征功能的道路，而不是任何一种直接把握。

尽管如此，我们始终会试图用机制来解释生命存在者。而对我们这些分析家来说，首先出现、居于前景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可以为眼看要卷入某种生命主义与机械主义之争的问题打开一条出路——

——就是：为什么我们恰恰会被引向以机制来思考生命？

也许正是这一点，会向我们揭示关于我们自身结构的某种远为深刻之物。换言之，我在这里为你们开启的问题是：作为人，我们实际上在哪一点上同机器具有亲缘关系？

让·伊波利特——数学家，对数学的激情？

拉康

当然！机械主义之所以使我们感到满足，是有理由的。你们甚至已经看到某种东西开始显现；当然，我要到很久以后才会向你们表明它，但仍要在这里借这项观察向你们指出。人们从一种通常被称作哲学的视角，对严格的机械主义研究作出大量批评，其中一种批评就是：机器显明自己没有自由。

要向你们证明机器比动物自由得多，其实十分容易。你们若愿意，可以说动物是一台被锁死的机器；在这个视角下，它是一台某些参数再也无法变化的机器。为什么？因为恰恰是外部环境规定了动物，并把它塑造成一个固定类型。

如果你们愿意，还可以说，相对于动物，我们作为人就是机器，也就是某种被分解开来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表现出更大的自由——如果我们把自由理解为可能选择的多样性。这是一个从未得到凸显的视角。

让·伊波利特

我想问，“机器”一词本身对应于整套象征作用，而它的意义是否已经从深层和社会学层面发生了变化。机器最初只是能量系统，在初始条

件下演化；如今外部条件也可以介入。从机器的开端直到控制论，机器这个概念本身是否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拉康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我同意您的说法。我正第一次努力向他们暗示——如人们所说——机器不是芸芸众生所以为的那种东西；机器的意义正在彻底改变。

我还想向你们指出——无论我向不向你们解释，这一点都同样成立；无论人们是否强调——对你们所有人来说，机器的意义、乃至你们使用机械主义术语的方式都正在改变，不论你们是否翻开过一本控制论书籍。你们若愿意，我会说，情况始终如此。你们以为十八世纪的人引入了机器的最初形式，也就是那种当然值得鄙弃、远离生命的小机器；的确是他们发明了它。拉·梅特里先生的《人是机器》，我无论怎样推荐你们阅读都不为过。他们引入了你们知道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又自以为已经超越的机械论。可是，你们想象不到，那些亲身经历并写下这一切、按照当时可能的构想方式引入“人是机器”这一概念的人，仍在多大程度上受阻并纠缠于真正支配其头脑的旧有范畴。

必须真正从头到尾读完那部体现时代风格的三十五卷《工艺百科全书》，才能发现：当时经院心理学的概念——尽管“心理学”一词还不在他们的词汇中——在多大程度上支配着他们，支配着他们的主体体验，也支配着他们竭力、费力引入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从机器出发，试图还原并功能化人类层面发生的一切，远远走在他们处理任何主题时仍在自己的思想运作中延续的关联之前。

只须看一看：翻开《百科全书》的“爱”条目、“自爱”条目，以及一切能够让你们看见这些问题当时怎样提出的内容；看看他们的感受同他们所推向前沿、试图提出和建构的那些关于人的知识相距多远。换言之，直到很久以后，在我们或我们父辈的头脑中，“机械论”一词才取得完整意义，成为一种彻底净化、剥除一切、排除其他所有解释系统的意义。

归根到底，所谓先驱就是这样的人：他并不是——这完全不可能——外推或提前抵达后来才会出现、尚未被创造的范畴。人根本没有能力作出这种超前；他们始终沉浸于自己所属的文化网络与背景中，不可能拥有不同于同时代人的概念。

成为先驱，不是走在同时代人前面，而是看清同时代人正在构成怎样的思想、意识、行动、技术与政治形式，并像一个世纪以后的人那样看待它们。这一点确实可能发生。

这是我关于“机器”概念与功能正在发生的变异，顺便向你们作的一点观察。无论如何，这场变异正在一种全然不同的形式和层面上发生，并预示着完全意想不到的丰产性。

至于那些仍在批判旧机械论的人——这里有两种看法：

- 一种是跟随这场运动去看它；这场运动目前仍处在混乱形态中，正是现在所谓的控制论。其中鱼龙混杂（直译：既有喝的也有吃的），但它正在朝某个方向前进。

- 稍微走在前面一点，则意味着察觉它真正指向什么：例如，把针对严格机械主义范畴的全部经典异议彻底翻转。问题会取得全然不同

> 的形式，也会通向完全不同的出路。我相信，今年我会有机会向你们表明这一点，把它作为我们正共同努力澄清之物的出路；而我们要澄清的，正是弗洛伊德理论与分析技术中的自我。

有人要提问题吗?

奥克塔夫·曼诺尼

我不谈机器，而谈使我感兴趣的东西。归根到底，我有一种印象：列维-斯特劳斯处理自然与文化问题的方式——他还说过，从一段时间以前开始，人们已经无法清楚看见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把这个概念作了细分。迪朗丹、佩里耶等人的发言仍在试探，想从某个地方找到自然。他们在情感、冲动以及某种明显构成存在本身之基础、存在之自然基础的东西一侧寻找它。

可是，促使列维-斯特劳斯提出自然与文化问题的，恰恰是他觉得某种乱伦形式同时既具有普遍性又是偶然的。这种矛盾把他引向某种约定论，使不少听众迷失方向；他们认为，约定论的起点必定有某种根本之物，于是便去寻找它。

我作了下面这项观察：偶然与普遍的问题确实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重新出现，因为我们并不只在制度世界中发现它。例如，惯用右手者同惯用左手者之间的对立也一样：惯用右手是一种普遍形式，却仍然是偶然的，因为人本来也可以惯用左手。人们从未能够证明这是社会因素还是生物因素造成的。我们面对一种深重的晦暗，它同列维-斯特劳斯那里遇到的晦暗性质相同。

如果再向前一步，表明这种晦暗确实十分严重：在蜗牛属软体动物那里——它们当然不属于制度——同样存在一种普遍而又偶然的螺旋方向，因为它本来可以朝另一个方向盘绕，某些个体也确实朝另一个方向盘绕。

因此，在我看来，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问题远远超出自然与制度的经典对立；如今他本人也开始试探，想要知道自己的自然一面和制度一面究竟在哪里，这同昨晚所有人所作的尝试一样，丝毫不令人惊讶。

这在我看来极其重要。我们在这里面对某种东西，它同时消解了旧有的自然观念和制度观念。

让·伊波利特——因为它是一种普遍偏好吗?

奥克塔夫·曼诺尼——我不知道。

让·伊波利特——那会是一种普遍偶然性。

拉康

不过我认为，您在这里引入了一些也许并未包含在列维-斯特劳斯提问时所引入的“偶然性”概念中的东西。在我看来，他所引入的偶然性同必然性概念相对立。况且他实际上说过：他以问题形式引入的——说到底，我们不如称它为一个天真的问题——是普遍与必然之间的区分。这也等于提出我刚才暗示过的问题：数学的必然性究竟是什么?它显然需要一种特殊界定；我刚才谈到宇宙，恰恰是为了这一点。

关于象征系统本身的引入，我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昨晚所提问题的答案如下：俄狄浦斯情结同时既是普遍的又是偶然的，因为它纯粹而且仅仅属于象征秩序。

让·伊波利特——我不这样认为。

拉康

曼诺尼现在引入的偶然性属于全然不同的秩序。列维-斯特劳斯通过他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所引入的区分，其价值恰恰在于使我们能够区分普遍的与类属的。我们刚才谈到的普遍之物完全不需要在表面上四处扩散，也不需要覆盖宇宙的整个表面；而且理由很充分：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东西形成这种统一。

为了让你们清楚理解我的意思，不妨说，人类的这种世界统一——也就是遍布整个地球表面的人类统一——尚未使任何东西在具体意义上真正实现为普遍之物。然而，任何一种象征系统一旦形成，本身就已经依其权利而具有普遍性。

因此，如果我们始终混淆普遍的与类属的，如果我们把随处可见之物称作普遍的——例如，除少数例外，人都有两条手臂、两条腿和一双眼睛；况且人与动物共有这些特征，乃至共有一些更确切的特征，就像那个人〔柏拉图〕所说："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拔光毛的鸡"——那么，所有这些都属于类属特征，绝不是普遍之物。您在这里引入朝一个或另一个方向盘绕的蜗牛属动物。我不是说这个问题不能提出，但它性质不同，是相对于自然类型而提出的问题；而类型问题十分重要。

奥克塔夫·曼诺尼

这并不完全确定，我质疑的就是这一点。我的意思是，直到现在，人类始终用一种伪自然同自然相对立。这种伪自然就是他们所遇到的人类制度。人遇到家庭，就像遇到橡树或白桦；随后，他们约定把这些伪自然视为人类自由，或者以某种方式视为人的偶然选择所造成的事实。

因此，他们赋予一个新范畴以最重大的意义，即同自然相对立的文化。列维-斯特劳斯研究这些问题，却最终不再知道自然和文化各在哪里，因为我们不只在命名宇宙中遇到选择问题，也在形式宇宙中遇到它。在命名的象征作用中，也在一切形式的象征作用中，自然都在说话：它以向右或向左盘绕、惯用右手或惯用左手的方式说话。这是自然像家庭或阿拉伯式花纹那样作出偶然选择的方式。到这个时刻，我确实站在一道分水岭上，却再也看不清水怎样分流。我只是想说出这种困惑；我没有带来解答，只带来一个困难。

让·伊波利特

在我看来，您刚才十分恰当地把普遍的同类属的对立起来，并说普遍性归根到底同象征作用本身相连，同人所创造的符号宇宙的样态相连。但这样一来，它就是一种纯形式。您的“普遍性”一词在深层上意味着：当人们考察一个人类宇宙时，它必然取得普遍性形式，并被吸引向一个使自身普遍化的总体。

拉康——这就是符号的功能。

让·伊波利特

这回答了问题吗？也就是说，它是否只是向我们表明了人类宇宙所取得的形式特征？

拉康

“形式”一词有两种意义：

- 一种意义存在于“数学形式化”这个术语及其用法中，也就是：从一组约定出发，你们可以展开一整个序列；正如你们知道的，这个序列通过一系列后果、通过彼此衔接的定理得到构造和阐发，而这些定理为一个集合内部建立的某类结构关系赋予严格说来的类型与法则；

- 还有一种是格式塔意义上的“形式”，即一种自洽并得到实现的总体，也就是所谓良好形式：某种形成总体、但形成孤立总体的东西。

让·伊波利特——您采用的是第二种意义，还是第一种？

拉康——毫无疑问，是第一种！

让·伊波利特

不过，您毕竟谈到了总体。那么，这个符号宇宙完全是约定性的；它取得了“普遍形式”中所谓的形式，却并不因此具有类属性，甚至也不具有一般性。我想知道，这是否只是对曼诺尼所提问题的一种形式解答。

拉康

曼诺尼提出的问题有两个面向。首先是他明白提出的那个问题：以万物的符记（signatura rerum）形式重新提出问题，也就是事物本身呈现出某种不对称特征。因为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他立刻碰到的是对称性问题，也就是某种不对称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说其中确有某种东西——这值得一次完全专门的讨论——也就是存在一种实在、一种既定之物，而且这个既定之物以某种方式得到了结构化。问题十分确切地在于：人们怎样阐发这个既定之物；至少在我们目前知识发展与进步的路线中，我们是否正在越来越逼近这些自然不对称的神秘意义——在这里，“神秘”正是恰当的词？

我要告诉他，我们人人都熟悉一种名叫“自然哲学”的人类传统，它极其确切地致力于这种解读。而我们知道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它从来走不了太远；说到底，它会抵达一些不可言说、却很快停滞的东西。除非人们怀着总不会缺少的那点善意——这样做起来倒很容易——准备张满全部风帆，驶入通常所谓的妄想层面。

曼诺尼当然并非如此；他的头脑太敏锐、太富有辩证性，只会以问题的形式提出这样的问题。第二件事，是要知道列维-斯特劳斯昨晚说自己最终来到自然的边缘，忽然感到眩晕，并追问是否真正应当在那里重新找到自己那棵符号之树的根时，所指向的是否正是这个问题。

问题就在这里。

不过，我同列维-斯特劳斯的私人对话使我能够向你们说明：不要这样以为；他所涉及的完全不是曼诺尼提出的那类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列维-斯特劳斯正在这项划分、这项极其鲜明的二分面前退却；而他十

分清楚，这项二分作为区分层面、从而区分事实秩序的方法，具有怎样的方法论价值与创造价值。

他正在它周围摇摆，原因也许会使你们惊讶，但他本人坦率承认这一点：他担心，在象征层面和象征功能可以说具有自主性的形式下，会有某种完整的超越性以掩蔽而潜伏的方式重新出现。就“亲和性”一词更严格的心理学意义而言，他的个人感受同这项超越性具有某些亲和关系，但他的个人感受又只对它抱有恐惧和反感。换言之，他担心我们刚从一扇门把上帝赶出去，又让上帝从另一扇门进来。

问题就在这里。

他不希望符号——哪怕是他本人向我们呈现的那种经过非凡净化的符号——只不过是上帝戴着面具重新出现。我认为，这正是列维-斯特劳斯提出那个问题时所表现的摇摆之源；那个问题质疑的是：应否把象征层面同自然层面作出鲜明的方法论分离。

让·伊波利特

尽管如此，用“符号宇宙”这个说法，并不能使符号宇宙解决人所作选择本身的问题。

拉康——当然不能。

让·伊波利特

我的意思是，所谓制度蕴含着若干偶然选择，而制度进入了一个符号宇宙；但我们诉诸这个符号宇宙，并不会因此得到对这些选择的解释。

拉康——这里不涉及解释。

让·伊波利特——可我们仍然面对一个问题。

拉康——正是如此！面对起源问题。

让·伊波利特

即使在象征功能本身内部也是如此。我不否认象征关系发挥了这种作用，并打上了系统性普遍的印记；但这层披覆本身仍然要求解释。这层披覆仍会把我们带回曼诺尼提出的问题。

奥克塔夫·曼诺尼——这太复杂了，我已经不太明白了。

巴尔格

我想知道，是否可以重新拾起这个问题，并在文化与自然之间以某种方式移动它，把它移到象征界与想象界的层面。我印象很深的是，您曾在某个时刻谈到我们当今社会中的法，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稍稍退化。

在这个时刻，当人靠近乱伦时，会有一种印象：从想象界的视角看，会出现一种极其强烈的构形与反应；而它归根到底正在人们可以说靠近自然时出现。

事情发生在想象界层面。我想到——我把讨论带回某种更临床的事情——您上次作的病例展示。您强调那个同性恋男孩，也强调他的家庭中存在关系极为亲近的姻亲；那里多少像一个封闭容器。

我认为，这时会发现——我在其他病例中也见过——一些神经症的易感因素；俄狄浦斯情结以其他形式出现，抵达一种十分暴烈的层面，就像迪朗丹昨晚所说的那样暴烈。这在某种意义上发生于人靠近自然之时。到这个时刻，想象界会在一个人格中发挥拆毁作用。

拉康

巴尔格的问题毕竟朝向我们正在提出的问题。您刚才在这里提出它时，确实把它放在形而上学层面；如果我不想让问题停留在这种形式上，终究就必须说明符号宇宙的功能。

让·伊波利特

请原谅，这是一项批评：使用这个词在哪一点上帮助了我们？它带来了什么？这就是问题。我不怀疑它有用；但它在哪一点上有所增加，又增加了什么？

拉康

在对分析经验本身的讲述中，它对我有用。你们去年应当已经看见这一点。例如，从我开始努力……我相信自己已经向你们表明：如果不从一种本质界定出发，不把这项界定置于某种金字塔的尖端，用它为转移的各种表现分类，就不可能正确排列转移的不同面向与功能。

这并不是说，转移的本质——

也就是那项构成消失点和透视点、使转移的不同功能全部汇聚于其中的功能；

严格说来，它是一项创造性、奠基性的功能，存在于某种类型的、

具有充实功能的言说之中——

——就等于我们在经验中看见转移发生的那些折射、不完善、倍增的层面。不过，正是这项本质使我们能够定位转移在这些层面上是什么；我们在那里从不同的心理、个人与人际面向把握它。而如果不对言说本身的功能采取某种根本立场，这一定位便不可能成立。

转移纯粹而简单地不可设想；我还要更进一步说，是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不可设想：并不存在“转移”这一概念，只有一大批由模糊而不连贯的纽带联系起来的事实。这是我相信自己今年能够向你们表明之物的一个例子。下次，我会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引入自我问题：自我的概念与功能同快乐原则之间的关系。

我想向你们表明：为了理解弗洛伊德的全部元心理学，也就是理解他用自我一词指称的这项功能，同样不可缺少的是运用这种图像，运用由象征界、想象界——巴尔格刚从我们最日常的经验出发引入了它——和实在这些术语表达的层面与关系区分。换言之，为了把我的灯点亮，也为了给你们一个例子——归根到底，你们问的不正是“它有什么用”吗?

让·伊波利特——况且，我并不怀疑它有用。

拉康

它的用处在于：分析无论如何是一项格外纯粹的象征经验。我要通过开启那个自己将不得不向你们说明的自我问题，举一个例子。自我在它最本质的面向上——

而这是一项经验中的发现，绝不是我几乎可以称作先验的范畴；不像我在单独抽取和剥离时所说的象征范畴——

——自我是一项想象功能。

我几乎要说，正是通过这一点，甚至只通过这一点，我们才在人类经验中找到一扇敞向类型要素的门。这种要素当然也在自然表面向我们显现，却始终采取一种令人失望的形式——我谈到各种自然哲学的失败时，想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就自我的想象功能而言，它同样令人失望；不过，我们作为自我，已经深陷其中（直译：一直没入到剑格）。

我们不仅具有这种经验，而且它——这项想象功能——引导我们经验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那些被称作“生活向导”的不同层面，也就是感觉。这里存在一种真正根本而居中的经验结构，它严格属于想象秩序。我相信，我们甚至还可以走得更远：尽可能严密地说明，这项想象功能在人那里同它在整个自然中的情形已经怎样有所不同。

因为我们会以千百种形式重新发现这项想象功能：一切同求偶展示相连的格式塔式捕获都属于它；这些捕获对于在类属——也就是种与物种——内部维持性吸引具有根本意义。你们同意吗？这种自我功能在人那里呈现出不同特征；分析的重大发现就在这里：即使在这种同物种生命相连的典型、类属、想象性关系层面，人也以不同方式运作。

这里已经出现了一道裂纹，某种本身就同我们可以视作根本生命调节的东西发生深刻扰乱的事物。弗洛伊德带来的死本能概念，其重要性就在这里；并不是因为死本能本身清楚或透明，而是因为这个概念表达了：在某个时刻，弗洛伊德被迫引入它。我会努力向你们说明并使

你们看见，他这样做是为了把我们重新带回自身经验中一项尖锐的既定之物；在那个时刻，这项既定之物已经开始淡去、开始丢失。

正如我刚才请你们注意的：每当某种对主体结构与宇宙结构的觉察走在前面时，总会出现一个衰退时刻，使人趋向于再次失去并放弃它。弗洛伊德圈子里发生的正是这种事情。

我会向你们表明：在某个时刻，无意识发现的意义退到次要位置，不再得到理解；人们重新回到一种混乱的、统一论的、自然主义的立场——既然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这个——来理解人，并因而理解自我，也因而理解各种本能。

《超越快乐原则》一文的意义，恰恰在于弗洛伊德以真正非凡的方式……正因如此，我才要求你们人人不只读它，而且反复读它；否则，你们无法理解我将努力说明的东西。我的说明会是一项逐字批评，我会努力向你们表明：弗洛伊德的思想出于怎样的必然性，才被引向这篇令人难以置信地暧昧、甚至混乱的文章；这篇文章又怎样显示，为了重新找到其经验的真正意义，他被引向《超越快乐原则》的最后几段。那些段落归根到底如此〔……〕[注]，以至于你们知道整个分析共同体怎样对待它们、赋予它们怎样的命运：人们说，谁也读不懂。

> [注] 底本在 si 之后以〔……〕标出缺文，缺失的是形容这些末段的成分。译文保留空缺，不以“晦涩”等推测补足。

即使人们愿意跟在弗洛伊德之后重复“死本能”，我也认为他们重复它时并没有真正理解；正如帕斯卡在《致外省人书》中以漂亮的尖刻语句反复讥刺的詹森派人士，对充分恩宠也没有更多理解。《超越快乐

原则》的最后几段，确实仍是“封缄的信与紧闭的嘴”，尚未得到阐明。只有看见弗洛伊德的经验想要带来什么，才可能理解它们。

一开始便十分清楚：他想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的是一种二元论；当时这种二元论正在他手中消融，而自我、力比多等一切汇成某种巨大的“大全”，把我们重新带入一套自然哲学。他执意要挽救一种二元论。我眼下不能透露更多，但我相信，看清这篇文章的导向和意义极为重要：这项二元论正是我所谈的象征秩序本身的自主性。文章并未一开始就把这一点明说出来，因为弗洛伊德从未这样表述它。

我也不是在断言事情必定如此。要让你们理解它是这样，显然需要一系列相互关联、比较与确证，还需要对弗洛伊德文本的批评和训诂。我不能把那项恰恰有待证明的东西现在就当作已经得到证明。不过，我相信自己会向你们证明它，并使你们对我在这里怎样使用象征作用形成一种全然不同的理解：它不是一个空洞范畴，也不是一套没有根据的装置。

让·伊波利特

我并不是这样说。如果我理解正确，象征功能对您而言就是超越的功能：它是一项超越功能。我不是说“超越性”，而是说一项超越功能，同时包含这样的意思：我们无法停留其中，也无法从中出来。我想知道它有什么用；我们离不开它，却也无法在其中安顿下来。

拉康——是的，当然如此。它是在缺席中的在场，也是在在场中的缺席。

让·伊波利特——我只是想理解其中可以理解的东西。

拉康

可是，请原谅！如果您想把刚才带给我的东西维持在现象学层面，我没有任何异议。但我认为这并不充分。

让·伊波利特——无疑，我也这样认为。

拉康——说到底，纯粹停留在现象学层面，并不能让我们前进多少。

让·伊波利特——我也这样想。

拉康

这种做法至多只会遮蔽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必须取得的进展，因为它以某种方式提前赋予问题一种最终应当保留下来的色彩。我在某种辩证法中使用象征界这一层面，而这套辩证法就是分析的具体涵义；这种使用究竟是否必然纯粹而简单地把问题导向一种定位——通过这种毕竟必须存在的超越性来定位它？

问题涉及这个吗？我不这样认为。我今天开头曾暗示，应当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使用机器的概念与术语；这也许已经在向你们表明这一点。

让·伊波利特

我的提问只是提问。我是在问，归根到底问题在哪里；凭什么可以不回答曼诺尼的问题，声称这个问题无须回答，或者至少回答它会使人误入歧途。

拉康

我说的是，我不认为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断言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先生正在回归自然。

让·伊波利特——他拒绝回归自然……

拉康

我还指出，说到底，我们当然必须考虑自然的这个形式面向——我们又怎么可能不这样做？我把它称作具有伪意指作用的不对称，因为人恰恰会抓住这类东西来制作自己的根本符号。

自然中确实存在一些东西。重要的是从这些形式出发，赋予它们象征价值与象征功能，也就是让它们彼此相对地发挥作用；因为正是人引入了不对称概念。这很清楚：自然既不对称，也不不对称；它就是它所是。也就是说，重要的是——你们会看到——我的所有课程都要顺延一次……

我原本想在下次为你们讲：自我作为功能与符号。暧昧性正是在这里发挥作用：自我是一项想象功能，却只作为符号介入精神生活。我们使用自我，就像博罗罗人使用鹦鹉一样；博罗罗人说“我是一只鹦鹉”，我们则说“我就是我”。

所有这些本身都毫无重要性，重要的是人怎样运用它们。就自我而言，这会更加重要，因为自我同一个离我们颇近的图像相连。

奥克塔夫·曼诺尼

听过列维-斯特劳斯以后，人会觉得再也无法使用自然与文化这些概念。无法再使用它们；他摧毁了它们。我们一直谈的适应概念也一样：得到适应就是活着。自然与文化的概念同样无法再使用。

拉康

这里有正确的地方，但我们还没有走到那里。当然，您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同我刚才所提的问题性质相似：我说，弗洛伊德曾在某个时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某种二元论。二者属于同一秩序。事实上，随着分析理论与技术迅速演变，弗洛伊德遇到了一次张力下降；它同您在列维-斯特劳斯思想中所发生的事情里察觉到的张力下降相似，不过列维-斯特劳斯这里的过程也许终究还没有彻底完成。

第4课 · 1954年12月8日

“Indem er alles schaft, was schaftet der höchste? — Sich.

Was schaft er aber vor er alles schaftet? — Mich.”

“当全能者创造万物时，他创造了什么？——Sich：他自己。

在他创造任何东西以前，先有的是什么？——Mich：我自己。”〔参见1955年6月15日〕

*丹尼尔·冯·切普科（Daniel von Czepko，1605—1660）

我们待会儿也许会遇到安格鲁斯·西莱修斯的这副对句*〔口误〕。至少我希望如此——如果今天能把你们带到我想去的地方。

这项教学的法则本身，以某种方式映照着它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努力做什么？如果你们潜心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我并不声称自己能比阅读本身做得更好；如果你们不这样读，我也不声称能够取代阅读。

请你们务必明白：只有参照原文，并把我提供的洞见同那些有时艰难的文本向你们提出的问题相互对照，才能真正赋予我在这里试图给予弗洛伊德教学的形式以意义和分量。这些文本有时带着一种问题性，由问题交织而成；希望你们已经充分读过弗洛伊德，并已经注意到：这项问题性会表现为一些矛盾——有组织的矛盾，但仍然是矛盾。

我说“矛盾”，不只是说二律背反。也就是说，弗洛伊德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时，有时确实会抵达连他本人都觉得彼此矛盾的立场；他会重新检讨某些立场，但这并不表示他认为它们在当时没有正当理由。简

言之，弗洛伊德思想的整个运动并未完成，最终也从未被表述成某种严格意义上具有教条性质的定本；你们必须学会亲自把握这场运动。

为了帮助你们作出这种把握，我努力在这里向你们传达自己阅读弗洛伊德著作并加以思考所得的东西；而为我的思考提供照明的，是一项至少在原则上由这些著作引导的经验。我说“至少在原则上”，因为你们知道，我在这里经常质疑的，归根到底就是：弗洛伊德思想是否始终在分析技术的发展中得到恰当理解，甚至得到严格遵循。

正因如此，说到底，我向你们提出的一切都指向实践应用，指向技术的精神。

不过，事情既然如此：如果我教给你们，弗洛伊德在人那里发现了一种主体性的分量与轴线，它超出了作为个体经验总和、甚至作为个体发展路线的个体组织，那么，我们在这里也会努力实现同样的东西——一种主体性。

如果按照我曾试图在你们面前表述的一种可能定义，把主体性理解成一套有组织的符号系统，它力图覆盖一项经验的总体，为它注入活力并赋予意义，那么，只有当你们从这里开启的方向和缺口中获得“启发”——这个词十分恰当——用以理解我们的经验与实践时，某种东西才会在具体行动中发展出来。这项行动不只受到引导；严格说来，它会延伸我努力使你们获得的那个视角。这并不总是一项简单操作，因为在这种教学中，正如在分析中一样，我们会遇到阻抗；而阻抗始终准确地处在它应当处在的位置。

分析教给我们，阻抗坐落在自我中，坐落在同自我相应之处；我有时把它称作一切知识都带有、我们每个人也分别带有的偏见总和。这里

所涉及的东西十分确切地把我们的知识也包含在内；也就是，说到底，把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包含在内，因为知道某种东西，总有一面是相信自己知道。

当一个相对于你们的经验发生去中心化的新视角从某一侧带给你们时，我们可以在经验中确认这种名叫阻抗的东西：已经只在那种总会发生的运动中显现出来——你们宁愿努力重新找到自己视角的惯常平衡与中心，也不愿向另一些经验所产生的、最富问题性的概念向你们带来的新东西、共同促进之物和补充之物敞开。这已经是我正在向你们解释、名叫阻抗之物的标志。

不妨说，你们中有一个人……我们举个例子。我遗憾他今天不在；我本来更希望由佩里耶本人表达或重新说明自己的发言。前几天，列维-斯特劳斯先生为我们带来了某种可以称作家庭现实的相对化——从他的视角看，是一种有效的根本相对化；佩里耶的发言正是针对这一点。希望这曾为我们开启一个缺口，给我们机会去重新审视：我们每天不得不处理的这个现实，对我们而言是否过于迷人、过于直接，也过于攫住一切。

这位同行提出问题说：归根到底，在向我们提出关于家庭系统的约定论和象征作用的全部问题以前，不要忘记一件事——家庭里不只有父母，还有某种人人都参与其中的根本之物：家庭里有孩子。

而从孩子的视角看，家庭现实在某个视角中重新得到确立；它使我们不至于每次都迷失在一种极其令人晕头转向的相对主义中，并向我们断言：我们所处理的是孩子同父母的这项关系。正由于这种关系，孩

子感到必须作出把握，也被迫以父亲—母亲群组为参照固定自身；而这两个位置中每一项经验的意义会带来全部相关问题。

为了让你们充分感受到，我们确实始终必须在分析经验中同这种被当场抓住的虚假显明性斗争，我只须说，一项我们不久前才开始跟进的经验带来了某种东西……

啊，正主来了！

佩里耶，我说的是您的发言：您把家庭重新带回孩子经验的坚实现实。我刚才说明，这项发言自有其全部分量。您曾凸显一个点，把我们可以称作分析经验核心的东西重新提了出来：每个个体都是孩子；而无论如何，家庭都源自奠立它的相对主义、约定论与象征作用，源自我们在那个非分析视角中强调的交换系统。

我原本想表明，这件事在多大程度上——

无论您当时作出那项发言的确切意图是什么——

——本身已经显示出头脑的一种倾向：把分析经验本身重新带回个体的、心理的某种经验中心。

我要通过一件刚才已经开始说的事情，向你们表明两种视角的差异。就在第二天，在所谓督导小组中，我们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主体恰恰梦见了一个孩子；孩子完全处在无助阶段，仰面躺着，像一只翻过来的小乌龟，挥动着四肢，处在婴儿最为原始的阶段。主体梦见了这个孩子。

出于某些理由，我立刻对向我报告这个梦的人说：

“这个孩子就是主体，毫无疑问。”

你们随后会看到，我这样说是有理由的；还有第二个梦——说到底，我们并非一开始就知道孩子是主体——它从每个方面把这个问题照得异常清楚。因此，一个主体梦见一个孩子，一个孤立的图像。我对报告梦的人说：“这个孩子就是主体。”随后，又有另一个梦被报告给我；它证实这个意象代表着主体。它怎样证实？在这个梦中，做梦者本人正在一片海里游泳，而这片海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

为了立刻给出想象和言语的联想背景，不妨说：这片海的构成使它同时是分析家的躺椅、分析家汽车里的坐垫，当然又仍然是海；海面上写着一些数字，十分明显地指向主体的出生日期和年龄。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

可是，这一切的背景是什么？在这个具体病例中，主体正卷入一种生命处境，仿佛在其中幻想自己具有一种想象的父亲身份。此前阐明病例时，我们已经注意到：主体如此关注自己可能具有的父亲身份，觉得自己对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负有责任；而他所处的这项生命处境以如此暧昧的方式呈现，实在不能不使人想到：主体必定对此怀有深层动机。

因为现实使事情处在极端不明朗的状态。主体围绕自己作为生父的责任，重演一种近乎妄想的焦虑；而在他那里，这重演的是一个绝对深刻的问题：他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婚生子？

因此，分析家已经对主体作出这个简单观察——“这个故事谈的是你”——主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讲出那个暗含着下面一句话的梦：“说到底，我难道不是您的孩子吗——您这位分析家的孩子？”

因此，你们看到，这里得到凸显的并不是人们总倾向于相信的那种具体的情感处境，即孩子依赖一些始终被假定多少具有父母或父亲性质的成年人。这里的问题是在二次方上提出的，也就是：

“我真正的家庭在哪里？我知道什么？问题不在于我是一个或多或少依赖别人的孩子，而在于我是得到承认还是未获承认的孩子，我究竟是否有权使用‘某某之子’这个名字？”

换言之，在这个提出我所谈问题的病例中，问题恰恰是在主体对自身命运作出象征性承担的层面提出；也就是，在一整套本身已经被提升到象征作用层次的关系中，承担自己的命运。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并不是说分析对话中的一切始终都在同一层次进行，但请记住，这才是本质上属于分析的层次。你们在这里亲手触及一种自传经验，也就是人生叙事。

许多孩子都会幻想自己另有一个家庭，自己是另一些人的孩子，而不是那些养育、照料自己的人之子。这极为常见；我要说，这是儿童发展的一个典型正常阶段。这里有某种东西会在经验中长出各式各样的衍生物；无论如何，即使在分析经验以外，也不能忽视它。

那么，说到底——这正是我要抵达的地方——阻抗分析是什么？人们与其说倾向于这样说、这样表述——尽管确实有人这样表述，我完全可以给你们许多例子——不如说更常在实践中这样做：把阻抗分析理

解成对主体进行干预，使他意识到自己的依恋、偏见和自我平衡怎样阻止自己看见事情。然而，阻抗分析并不是这样——

- 阻抗分析不是劝服；况且劝服很快便会通向暗示；
- 它不是所谓“强化主体的自我”，也不是所谓“把自我的健康部分变成自己的盟友”；
- 因此，它不是把对话引向必须使主体相信某种东西。

它要求我们知道：在所谓“文本”——或者被不恰当地称作“材料”的东西——每次被带给你们时，回答究竟应当被置于哪个确切层次；也就是，在分析关系的每一个时刻，回答应当被带到什么层次。在某些时刻，也许确实应当在自我层面回答。不过，你们清楚看见，在我刚才讲的病例中，关键是使主体理解：他提出的问题，同某次断奶、某次遗弃、某种可以说是生命层面的爱或情感缺失带给他的感受和后果，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时刻，他通过自己的全部举止违背自身意愿所表达的，本质上是他自己的历史：他误认这段历史，又晦暗地试图承认它；他的生活受到一种问题性的导向，而这项问题性与其说关乎他的生活体验，不如说关乎他的历史意味着什么，严格说来，关乎他的命运意味着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说到底：

- 如果分析症状正如我向你们所说，因为这一点以明文写在我们的经验中；

- 如果症状同言说的这个层次相连，而言说是主体中那个被误认部分的母体；这个层次不只是他的个体经验层次，还被纳入一整篇历史文本，因此所涉及的与其说是他本人，不如说是某种处在他同别人之间的东西——

而且它如此彻底地处在他同别人之间，以至于正是由于这种言说，才有了他，也才有了别人。

如果问题确实在这里，那么，只有干预被带到这个去中心化的层次，主体的症状才会消退；而不是把我们的知识和关于个体所谓正常、规范发展过程的理论观念，用来作出某种事先铸好、预制好的重建：他缺少过什么，他曾怎样回应某个阶段，或者他必须学会承受哪些挫折。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问题在于，一个症状究竟在一种层面上得到解决，还是在另一种层面上得到解决。

问题之所以更加复杂，是因为我们在这类自我间对话层面施加的行动，按照某些发展模型进行的正常化或规范化，当然不会毫无回响；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为什么不呢？——甚至会产生心理治疗作用。因为人们始终都在作心理治疗；而人们最初开始作心理治疗时，始终不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无疑都会使言说功能介入。

不过，关于言说功能，问题在于知道：

- 它究竟是否处在主体分析中；
- 也就是说，它发挥作用时，是否总是通过一种权威替代，即由分析家替代主体的自我；
- 弗洛伊德发现、建立并发明的秩序，是否证明主体的轴心现实恰恰不在他的自我中，而在别处？

通过干预来替代主体的自我——在某种阻抗分析实践中，人们始终正是这样做——是一种暗示，不是分析。这毕竟必然造成后果：无论何种症状，只要分析实践没有把分析家的行动置于前景，要求分析家知道下面这些问题，它就没有严格得到解决：

- 他的干预应当落在哪里；
- 分析干预的本质位置在哪里；
- 可以这样说，他应当瞄准主体的哪一点。

我一步一步来。我相信，在此前几个月、甚至几年中，自己已经充分强调了下面这句话的意思：无意识恰恰就是自我所不知道的、受到自我误认的主体，是主体的这一点，或者严格说来是他的人的存在；弗洛伊德曾在某处写道，der Kern unseres Wesen——“我们存在的核心”。在《梦的解析》论述梦的过程的那一章中——我已经请你们去了解并开始阅读——弗洛伊德谈到初级过程时，确实是在谈某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东西；他把它称作“我们存在的核心”。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我们存在的核心”**

那么，如果我们存在的核心不同自我重合，如果这就是分析经验的意义；如果我们一旦把握它，一整套经验就围绕它组织起来，沉积出目前得到教授的一层又一层知识：那么，它已经使我们看见、并且看得更好——这是一个关键点；它已经显示自己的丰产性，使我们能够理解事物发展中那些原本被彻底遮蔽的部分。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我们存在的核心”

你们以为只须停在这里，说“有一个特定的‘我’（Je），即无意识主体的‘我’，而‘这个“我”不是自我’”就够了吗？这远远不够，因为对可以说会自发思考的你们而言，说完这句话以后，没有任何东西蕴含着它的逆命题。事情实际是这样：哪怕你们已经理解，通常也只会想到一件事——

- 这个“我”才是真正的自我；
- 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自我不过是这个“我”的一种表象、一种不完整形式、一种错误形式。

也就是说，你们作出了这项对弗洛伊德发现而言至关重要的去中心化，但紧接着——

就像目光受到某种复视的捕获；眼科医生很熟悉人为制造复视的实验：把两个彼此非常接近、几乎重叠的图像放在一起，只须稍稍使眼睛斜视；如果二者足够靠近，最后就会合成一个图像——

——你们又把自我收回到新发现的这个“我”之中，也就是重新恢复统一。

分析中发生的恰恰是这种事情：有一天，人们察觉——

原因还有待日后作出阐明——

——分析发现最初的丰产性正在实践中耗尽，于是便回到所谓“自我分析”，声称可以在其中找到那个原本需要向主体证明之物的确切反面。

因为当时已经走到拼图、走到证明层面。人们以为，只须分析自我，就能以某种方式找到需要使主体理解之物的反面；然而，他们这样做恰好属于我所说的那种还原：把两个不同图像还原成一个，形成某种统一点。

现在需要凸显的重要之处，不只是说真正的“我”并非自我；还在于存在这个自我这一事实——

- 不只是这个“我”的一项错误；
- 也不是一种局部视角，仿佛只须有所意识，便足以把视野扩展到分析经验所要抵达的现实自行呈现、自行得到发现。

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证明逆命题，必须始终把逆命题保持在我们的头脑中，也就是：

- 这个自我并不是这个“我”；
- 它不是经典错误学说所说的错误——经典学说把错误视为局部真理；
- 它严格说来是另一种东西；
- 它是主体经验内部的一个特殊对象。

严格按字面说，自我就是一个对象，一个履行特定功能的对象；我们在这里把这项功能称作想象功能。你们必须把这一点牢牢保持在头脑中。为什么？有两个理由：

- 首先，它对你们的技术绝对关键；
- 其次，如果看不见问题正在这里，我敢说你们什么也理解不了；或者反过来说——其实是同一回事——我不相信你们读过被归入1920年以后“元心理学”组的弗洛伊德著作以后，会无法从中提取这一点；这里特别指他围绕自我及其局部论所说的一切。

弗洛伊德围绕自我及其局部论的研究，恰恰是为了把这个已经开始回到自己不应占据之位置的自我重新带回原位。首先，头脑通过这种调焦努力〔斜视〕，重新落入经典幻觉的核心——我不说“错误”，因为严格说来，这是一种幻觉。为了恢复视觉，恢复主体相对于自我的这项差异与偏心性的正确透视，弗洛伊德写下了所有这些东西。

今天，我把这一点交给你们，作为某种坐标系统的关键定位；你们的全部经验都可以相对于它敞开。请每个人开始阅读这些文本；如果愿意，把问题带给我。为什么我声称这才是关键，一切都必须围绕它排列？对话现在交给你们，取决于你们的主动性。

我先点亮自己的灯。我会从最初的字母、从入门基础出发点亮它，甚至重新拾起那个值得讨论的层面与层次：所谓显明性，或者人们误以为属于显明性的东西。因为无论我怎样向你们解释——事情究竟是不是这样？——在你们目前自身的心理经验状态中，毕竟仍有某种东西〔“我”〕，你们不可能不把它同另一种东西〔自我〕联系起来；仔细看便会发现，这是一种概念混淆。

只是你们并不知道，因为同人们能够相信的恰好相反，我们实际上生活在概念那个表面上最直接的层次，远多于自己所以为的程度。说到底，对分析经验所凸显之物进行这种还原，正是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的东西——

你们甚至会在弗洛伊德那里看到这一点；他面对它，就像鱼面对苹果一样不知所措——

——也就是意识的幻觉。它们来自某种特定的反思方式，而这种方式对于某个特定文化时代的存在者怎样体验自身、并因而理解自身，毕竟具有根本意义。

严格说来，这里涉及意识的幻觉。我确信，在座的我们人人都会认为：说到底，在意识本身中，人会体验、经历一种格外高级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

无论意识对自身、因而对那个叫作自我的东西作出的把握多么局部

——

——被称作我们存在的那种根本之物，毕竟正是在这里被给予。

即使自我本身尚未得到彻底探索，它至少也在意识事实本身中，以其统一得到把握。在1954年的今天，无论如何、无论人们说什么，我们所有人都把意识现象的高级与高度阐发性质当作一项公设。这个问题可以从多个面向着手。如果我们原则上把自己的主题视为文本批评，那么，通过我曾谈到的1895年第一时期理论草图与初稿，向你们表明下面这些事情会十分精彩：

- 在一个已经得到阐发的心理装置图式中，弗洛伊德仍然无法——事情本来很容易——确切定位意识现象；

- 很久以后，在《元心理学》中讨论不同病理形式——梦、妄想、精神错乱、幻觉——时，他用撤回投注和系统来解释这些现象；可一旦要使某个系统运作，他始终会面对一个悖论——

——也就是意识系统；于是他说：“这里必定存在一些特殊法则。”

他无法把意识系统纳入理论。

可以说，弗洛伊德围绕系统内部投注、用以解释个体中所发生之事的严格心理物理学理论极为精巧，确实制作得格外出色。在某种限度内，无论它多么具有理论性质，无论它在生物层面多么精确——毕竟仍有许多东西属于假设——此后我们关于神经冲动的扩散与分布所获得的经验，反而显示出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建构具有有效性。

但一到意识这里，它就从不奏效。你们会对我说："这什么也证明不了。"它只证明弗洛伊德把自己弄糊涂了。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希望哲学家们不会反驳我：某种东西在我们探究构成、结构化现实及其令人信服的形式时，赋予意识以某种首要性质；哲学家本人把握自身、试图把握自身时，仿佛正是从某种归根到底无可争议的既定之物出发，即"意识对自身的透明性"。

只要某种东西是有意识的，这个有意识的东西就不可能不把自己把握为意识。它在我们所谓清楚意识中最充分地发生，例如我眼下在面前看见的清晰领域：你们所有人聚在一起，形成一小块绘制出来的表面。我当然可以把它本身当作对象，例如用来询问自己的远视是否日益加重，并以某种方式把所谓意识领域本身作为一个对象来经历。

人们告诉我们：某种东西不可能被经历，除非主体在这项经验内部可以被置于一种直接的反思中。关于这一点，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毫无疑问，自笛卡尔勇敢迈出最初而决定性的一步以来，哲学家们又前进了几步；他迈出那一步时如此大胆，以至于可以说，他确实〔……〕[注]了所谓设定意识与非设定意识之间的区别。

> [注] 底本在谓语位置以〔……〕标出缺文。译文保留空缺，不推测笛卡尔在两种意识之间作出的具体动作。

一些问题已经被提出，甚至对哲学家本人而言仍然开放。问题在于，一个"我"是否在这项活动中直接得到把握。我要向你们提出某种东西。我不把它称作"工作假设"，因为我声称这里并不涉及假设。说实话，在对这个问题的形而上学探究中，它也不是必须被当作某种

〔……〕[注]的东西。它完全是另一回事，是解开戈尔迪之结的一种方式。

> [注] 底本在 comme un 之后缺文。译文不补造缺失名词。

我希望你们暂且接受这个假设，以便能够维持并支撑它。我并不声称在这里给你们一种思维类型，而更像给出某种决断。这里不仅有经验，还有整套思想传统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有些问题，人必须下定决心，在尚未解决时就放弃。我要向你们提出一种放弃它的方式。

你们会立刻看见它的问题性。我会取意识现象的一种形式；它毫无疑问是意识现象，而你们会看到它把我们引向哪里。我们再一次谈到镜中图像现象；这并非偶然，但你们也会看到，它并非关键。镜中图像是什么？它毕竟本质上是一种意识现象，不是实像。返回镜面的光线使我们把处在某处的对象定位到一个想象空间中；你们无疑会说，这里没有问题。然而，你们在镜子里看见的并不是对象。

相关知识卡 倒置花束实验与拉康的光学图式

因此，经验中有某种东西本身就是意识现象。关于这项意识现象，我要向你们提出一个小寓言；它并非必要，只是引导思考的一种方式。假设所有人都从地球上消失——我说所有人；既然你们赋予意识如此崇高的价值，我以为这已经足以使问题出现，足以提出问题——镜子里还会留下什么？

再假设一切生命存在者也都消失。只剩下瀑布与泉水，不过闪电与雷鸣仍然存在。镜中图像或湖中倒影还存在吗？十分清楚，它们仍然存在。理由非常简单：我们已经达到的高度文明远远超出自己关于意识的幻觉；我们制造出了设备，例如摄像机。如今，我们无须任何胆识

便能设想尽可能复杂的摄像机：它们自行冲洗胶片，再把胶片放进小盒，存入冰箱。说到底，摄像机会记录湖中山峰的图像，也会记录空无一人的孤寂中逐渐崩坏、却仍继续映照在自身镜子里的花神咖啡馆的图像。

我知道，哲学家们会就此向我提出各种巧妙异议。不过，请你们仍然继续留意我的寓言。现在，人类回来了。这是马勒伯朗士之神的一次任意行动；既然正是他在每一时刻支撑我们的存在，他当然可以先抹去我们，几百年后再把我们投入流通。我们不要作太多假设。不过，如果你们愿意作，我也可以一直跟下去，甚至同意人类必须从头重学一切，也就是重新学会怎样读懂图像。但这不重要！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他们一旦在胶片上看见山峰的图像，也会看见它在湖中的倒影。那是一部影片。他们还会看见种种事物，看见山中发生的运动，也看见图像发生的运动。

如果机器更加复杂，我们还可以把事情推得更远。它可以被安排成这样：一只对准湖中倒影的光电管，在那个时刻触发某种爆炸——说到底，为了让某种东西显得有效，总得有一场爆炸在某处爆发——而另一台机器则记录这场爆炸的回声，或者收集它释放的能量。

因此，我向你们提出某种归根到底本质上属于意识现象的东西；它从未被任何自我严格感知，也从未在任何自我层面的经验中得到反思，因为在那个时代，任何一种自我以及自我意识都不存在。

你们会对我说：“且慢！（直译：慢着，蝴蝶！）自我在某个地方，就在摄像机里。”

好吧，我会告诉你们：不，摄像机里连自我的影子都没有。不过，我倒愿意承认“我”同它有关——不是说“我”在摄像机里，而是说它参与其中。随后，我会向你们表明，说“‘我’参与其中”究竟是什么意思。

机器里也没有“我”的影子。不过，“我”的秩序所构造的东西——也就是人是我所谈的那个去中心化主体，是卷入符号游戏与符号世界的主体这一事实——同人能够制造极其复杂的机器确实是同一回事；机器是用言词制造的。而言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言说并不始终是……或者说，言说首先是这种交换对象，人们借它彼此辨认：预先向你走近的人究竟是不是敌人；而当你说出——

——口令以后，人们就不会互相打破脑袋，如此等等。

言说正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开启了这场特殊流通；它不断膨胀，直到构成这个符号特有的世界——

- 它使代数计算成为可能；
- 也使我们能够彼此认识，用词语和言说互相称呼——机器正是用这个同一的符号世界制造出来的；机器不是别的东西。

你们若愿意，机器就是从这种严格属于主体的活动中脱离出来的结构。我暂时把主体活动留在外面；你们会看到，这里仍有事情可说，甚至整个问题都在于：主体自身的存在怎样卷入这个符号世界，并恰恰在其中构成。不过，这个符号世界就是机器的世界。

据说，有些人看见我参照这个神圣世界——因为前几天我曾暗示过它——便十分不安。不过我要说，我们把握的是一位从机器中出现的神

（Deus ex machina）；除非我们是从上帝中抽出机器（machina ex Deo），眼下我们还不十分清楚。我们正处在这一点上。当然，正是这台机器形成了连续性；由于这种连续性，人类在某段时间缺席以后，不仅会得到对这段时间所发生之事的记录，严格说来还会得到对意识现象的记录。我在这里说“意识现象”时，你们会看到，我完全无须把任何宇宙灵魂或任何在自然中的在场实体化。

在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也许恰恰因为我们已经相当深入地投入机器的制造，我们不再混淆象征性的主体间性与宇宙主体性；我们已经完全同后者脱离。

这并没有解决那个开放问题，不过它同我们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我告诉你们，我展开的不是一种假设，只是一个例子；它表明，我们一开始可以——仅仅出于有益于健康的操作，以便真正开始提出自我是什么的问题——从自我实际所是出发。与那种把意识视为受造物顶峰、具有深刻宗教性质的看法相反，自我是现代人的制造物。这是一件绝对非凡的事情，因为现代人暗中相信，从起源以来，宇宙中发生的一切都旨在汇聚到这件“会思考的东西”：生命的创造物、珍贵的存在——人；在人类之中，又有那个作为他自己的唯一存在；而他内部还有一个名叫意识的特权点。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进入了一种如此妄想性的拟人论，必须首先擦亮眼睛、不再受它蒙蔽：

- 才能察觉自己正受怎样的幻觉支配；
- 才能看清这在人类历史中竟是多么新近的事物；
- 例如，也才能理解——这里只是我顺便作的插话——我所谓科学主义无神论的愚蠢。

它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抵御这样一种眩晕：在把意识视为存在之完成的传统经典视角中，人显然不得不同某种如此压倒性的东西斗争。因此，我们看见科学内部用来反对一切可能唤起最高存在之诉求的防御，完全来自一种极为原初、直接的防御：显然，最后只剩下一件事可做——俯伏膜拜。也就是说，再没有任何东西需要理解，一切都已经得到解释；因为意识——也就是现代当代人的这项奇迹，是你、是我，是跑过街道的我们——最后必然出现。

在这个视角中，一切都已经由人类个体的存在得到解释；这里发生了某种对人类个体的神化。它恰恰是这种真正不连贯的、情感性无神论的源头，而且是唯一源头。作为反作用，所谓科学与科学主义思想把一切又推回同一个意识：它一方面把意识当作现象的顶峰，另一方面却努力——正如人们把一个过于专制的国王变成立宪君主——尽量宣称：意识虽然是杰作中的杰作、一切的理由、表象的顶点与实现的完善——

——但这些所谓的副现象毫无用处；从现在起，我们着手研究现象时，始终会假装不去考虑它们。然而，正是这种不去考虑意识的用心，清楚表明：如果不摧毁意识的分量，人就会变成傻瓜，再也无法思考其他东西。我借此也提醒你们，所谓反感、偏见的这些完全矛盾而幼稚的形式，以及某些所谓引入力量或实体的倾向——人们称它们为生命主义倾向——恰恰反映着这一点。

例如，在胚胎学中，人们向你们谈到一种形成性形式、一个胚胎中的组织中心正在介入时，我们当然会立刻想到：既然有一个组织中心，就只能有一种意识，于是那里存在意识——这样想也很正常——而这

个组织中心还有眼睛和耳朵；所以，胚胎内部必定有一个小小的精灵。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尝试组织现象中能够被给予、显现和表明的东西。由于一切较高级的东西在我们这里都蕴含着意识，而我们知道意识同某种彻底偶然的东西相连——其偶然程度不亚于无人世界中的湖面——也就是同我们的眼睛或耳朵的存在相连。

当然，这里存在某种无法思考的东西，某种僵局；种种在头脑中以矛盾方式组织起来的构形都会在它面前停下并撞上去。常识确实通过一些禁忌作出了回应；这些禁忌又为临床研究等领域产生种种前提，例如所谓行为主义。它说："我们只观察完整行为，不去理会意识。"我们十分清楚，行为主义并没有从这种对意识的悬置中获得多少丰硕成果。

意识并不是人们所以为的怪物；排除它、把它锁起来，并没有带来任何真正收益。不过近来有人说，行为主义已经以"整体行为主义"的名义，暗中把意识夹带回来。因为追随弗洛伊德之后，他们学会了怎样处理"场"这个概念。除此以外，行为主义能够取得的那一点小小进步，恰恰来自它同意在现象自身的层次上观察一系列现象；例如，把行为作为总体来考察，把它视为一个在自身层次上如此构成的对象，而不再绞尽脑汁追问背后有哪些初级、低级或高级装置。

不过，"行为"概念本身仍然对人的现实实施了某种阉割。这完全不只是因为它没有考虑意识概念——实际上，意识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无论使用它的人还是不使用它的人——而是因为"行为"概念本身排除

了主体间关系；而主体间关系不只奠立人的行为，还奠立人的概念与激情。这同意识概念毫无关系。

请你们在一段时间内，按照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导论性意义来考察：每当某种表面被给予时，意识便会产生——

而这种事情会在最出乎意料、彼此相距最远的地方发生——

——我给出一个唯物主义定义：这种表面能够产生所谓图像。所谓图像，意思是从实在中某个既定点——无论哪一点——出发的全部能量效应——

不妨把它们设想成光，因为光最明显地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图像——

——由于这个表面而反射到表面的某一点，击中空间中与之相应的同一点。

你们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吗？在这里，湖面可以被枕叶的纹状区取代，理由很简单：由于把这个表面的整个空间连通起来的细纤维和纤维层，纹状区中发生了完全类似的事情。经验表明，我们会得到一个相当广阔视野的清晰图像；而纹状区同镜子如此相似，以至于：

- 正如你们不需要镜子的整个表面——如果这个说法确有意义——来察觉一个视野或房间的内容，只须移动一小块镜片便能得到同样结果；

- 纹状区中的任何一小块也具有同样用途，并且像镜子那样运作。

世界内部有各种事物像镜子那样运作；只要条件得到满足，使现实中的一个点——无论其能量效应击中表面的哪一点——通过某种中介，同另一个唯一点的效应相应，也就是在现实空间的两点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就足够了。我刚才说“现实空间”，说得太快，因为恰恰存在两种空间：

- 这些效应在现实空间中的一点产生〔实像〕；

相关知识卡 倒置花束实验与拉康的光学图式

- 或者在想象空间中的一点产生〔虚像〕。

相关知识卡 倒置花束实验与拉康的光学图式

因此，刚才要凸显想象空间中某一点发生的事情，对我而言更加容易；因为在那里，你们十分明显地看到某种真正使我们的惯常构想陷入困境的东西：一切想象性的、一切严格说来具有幻觉性质的东西，并不因此就是主观的；存在一种完全客观、可以被对象化的幻觉之物。要理解这一点，完全不再需要让尊贵的各位全部消失。

如果从类似视角出发，许多事情会以另一种透视向你们显现。例如，经验向你们呈现的是：这个自我号称是清楚意识领域的统一，却确确实实是一个对象。你们据称在意识领域内部感知为其统一的东西，恰恰是这样一种东西：直接感觉同它处于某种张力关系中；而这个统一同在中性领域表面发生的东西全然不同质。

我们把这种视角称作意识，视为某种物理现象；正是它产生了这种张力。我试图以镜像阶段为名，让你们把握的全部辩证法，就是某种直接之物同某一层次的倾向之间的关系——这个层次值得进一步说明；

事实上，一切都在这里。这些倾向在生命的某个时刻被经历为彼此脱节、不相协调而且支离破碎——它们始终会留下某些痕迹——而这个东西同某种统一相互混同并配合起来。主体正是在这个统一中第一次把自己认识为统一，却认识为异化的统一、虚拟的统一。不过，这项统一并不因此具有我们刚才称作原始形态的意识现象所具有的惰性特征；后者反过来同主体具有一种有利于生命或反生命的关系，并仿佛正是人借以拥有特权经验的东西。

说到底，也许其他动物物种中也有某种属于这个秩序的东西。这不是绝对关键的一点；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而言——

不要铸造假设，也不要追问这种原始宇宙同一个在独特而异化的经验中得到把握的统一之间的辩证法，

怎样把主体表现为已经异化、已经消散自身统一的主体，

或者这种辩证法在客观宇宙的秩序中可以被安置在哪里——

——经验中，这种辩证法以如此高的程度得到反映、回响和重现，并遍及所谓人的自我结构化的一切层次，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从这里出发。

为了使你们充分把握这项经验，我希望还有时间用一种此前没有给过你们的形式来呈现它。这种形式会使你们觉得主观，恰恰因为它新颖而不熟悉；你们还没有时间把它的图像磨损。任何图式在表达一项原初经验时，向来都会如此。例如，它就是盲人与瘫子的图像。自我本身层面的主体性，完全可以同这一对形象相比。十五世纪的图像艺术格外突出地引入了它们，这大概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镜子经验以前、在把自身统一作为提前到来的东西加以把握以前，主体那一半所给予的，十分确切地说就是瘫子：某种无法自行移动，只能以最不协调、最笨拙的方式活动的东西。与我们通常形成的图像相反——你们看到，在这项关系中，主人表面上是自我的图像；这恰恰构成辩证法的问题——事情并不像柏拉图所以为的那样，由主人骑着作为奴隶的马，正好相反：瘫子骑在那个知道怎样走路、自己却是盲人的存在者身上。

我称他为盲人，只是一种说法：从看得见的人这一视角看，他是盲人；但他自己看见的是另一种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

因为说到底，所涉的这项透视正是从瘫子出发构成的——

——当瘫子认同自己的统一时，他只能通过进入着迷的姿态、进入根本不动的状态来认同它。正由于这种不动，他才能以等价方式同凝视——同盲目的凝视相应，因为这是一幅图像的凝视；他正受到这道凝视的捕获。

另一个图像——因为每个图像都有用——会补足盲人与瘫子的图像，也就是蛇与鸟的图像：鸟受到某种凝视的迷住。在自我构成现象的最初经验中，这项反映关系同时也是着迷关系，绝对至关重要；它是一种锁死关系。原初支离破碎状态中全部不协调、不连贯的多样性，正是在受到迷住时取得统一。这种着迷、乃至恐惧的图像极为关键，因此我还会在弗洛伊德笔下、在这个确切层次——也就是自我本身的构成层次——再次向你们展示它。

我要给你们第三个图像。

既然我们谈过机器，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为我们体现这项辩证法所涉及的事情，我会提出下面这个模型：一只小乌龟或小狐狸，就像我们近来已经懂得制造的那些；它们是我们时代科学家的游戏和消遣。自动机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我们的时代，这种作用得到更新。不妨说，这类小机器通过各种中介器官，如今能够被我们赋予某种几乎像欲望的东西，也能够具有几乎像稳态、甚至完全就是稳态的东西。

假定一台机器以这种方式构成：它尚未完成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自己在某种机制中的最终锁定、也就是结构化，只能来自它通过任何一种手段——一只带继电器的光电管——感知某处产生的特定图像，而这幅图像使其机制固定下来。它只能在另一台与自身完全相似的机器的完善形态中取得自己的统一；后者相较于它的唯一优势，只是已经在所谓先前经验中取得了这项锁定。

机器可以积累经验。你们看见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吗？每台机器的运动，都受到一种感知的严格制约：感知那种可以称作结晶过程已经抵达、已经固定在某一点的阶段。

这同另一台机器那个令人着迷的要素相应。不过，你们也看见会建立怎样一种循环：我们从中出发的第一台机器能够朝向的一切，都会从根本上取决于另一台机器也在朝向什么；因为第一台机器的统一始终悬系于另一台机器的统一。由此必然产生一种僵局处境；人的对象正是在这项处境中构成，因为对象本身完全悬系于一种嫉妒—同情的辩证法。传统心理学用意识彼此不相容这一特征反映并表达的，恰恰就是它。

这并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意味着一个意识无法设想另一个意识；意识的特征恰恰相反，是设想一切意识，成为意识的意识。真正严格不相容的，是一个自我同作为自我的那个他者之间的关系：这个自我完全悬系于他者的统一，而那个他者正在朝一个作为对象、作为被欲望和被把握之物的东西前进。得到它的只能是他或我，必定二者选一。因为说到底，当得到它的是他者时，是由于它属于我；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我能从这个图式出发把握或欲望某种东西，那是因为他者已经开始朝它前进——正是他者给了我自身统一的模型与形式。

这种根本竞争的辩证法作为人的认识、纯粹状态中的认识的构成因素，显然只是一项潜在阶段。因为你们很清楚，并不存在纯粹状态中的认识；恰恰在自我与他者共同欲望对象的这种严格共通性中，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才可能萌生，也就是承认。

这显然预设着第三项。说到底，要继续我们的寓言，需要什么？第一台小机器被锁定在第二台机器的图像上；要使它仍能抵达某种一致，不被迫在两者欲望的汇聚点上毁掉自己——归根到底，那是同一个欲望，因为在这个层次二者只是同一个存在——这台小机器就必须能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把信息传给另一台，对它说：“我欲望这个。”

你们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承认这里有一个“我”，这句话也会立刻变成：“你欲望这个。”因为“我欲望这个”的意思是：你，那个作为我的统一的他者，“你欲望这个”。这并不使我们惊讶。我们在这里重新发现的，只是人的讯息那种特殊而根本的形式：人从他者那里以颠倒的形式接收自己的讯息。

不过，不要真以为事情如此。我刚才讲的纯粹是神话。第一台机器没有任何办法说“我欲望这个”，因为第一台机器恰恰处在统一以前，本质上就是直接欲望，并不具有言说。理由十分简单：它谁也不是。第一台机器并不比湖中山峰的倒影更像某个人；这个瘫子没有声音，绝对无话可说。要使某种东西建立起来，就必须有某种东西在某处出现：一个第三项，例如进入第一台机器内部，并且确实能够说出某个被称作“我”的东西。

不过，在这个经验层次上，这完全无法思考。可它确实存在，因为你们会看到，它恰恰就是我们在无意识中发现的东西——但它恰恰处在无意识中。

为了使所有小机器的舞蹈建立起来，我们能够设想它的位置，显然是在小机器之上；也就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先生前几天告诉你们交换系统得以建立的地方。在这些机器小组内部，人们可以把一台小机器让给另一组，因为整个芭蕾受到一个别处的调节。这就是我们在基本结构中发现的东西。象征系统必须介入，才能使某种交换在受自我图像制约的系统中建立起来。由此建立的不是认识，而是承认。

你们看见，我今天给出的这种操作性图像把我们引向怎样的推导。由此可见，自我在任何情形下都绝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只能是一项想象功能：它在某个层次上规定主体的结构化；但它同对象本身的构成一样暧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不只是对象构成的一个阶段，还是与它完全相同的相关项。

主体作为行动者、作为人的主体被建立起来的位置，是象征系统出现的时刻；从这里出发，主体才能把自己确立为“我”。这个时刻绝不能从任何属于个体结构化秩序的模型中推导出来。

换言之——我会以另一种形式向你们说明——为了使人的主体世界出现，机器在将要提供的信息中必须能够作出一件事，而这恰恰是它唯一无法作出的事：把自己当作其他单位中的一个单位计算进去。要把自己计算进去，它显然就必须不再恰恰是自己所是的那台机器，而必须成为另一种东西。因为一切都可以做到，唯独无法让一台机器把自身作为一项要素加进一次计算。

这就是我今天向你们呈现事情的角度。也许下次，你们会看到我从一个不那么枯燥的角度来呈现它；因为这个自我当然不只是一项功能：从符号世界得到奠立的时刻起，它本身也可以充当符号。

况且，我们所处理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我们今天所作的全部努力，是暂且剥去自我的这种迷人的象征功能——正由于这项功能，我们才相信自我。人们执意要让自我成为主体；而把作为功能和作为符号的自我统一起来的这项关系，会把我们带回根本立场。

我打算下次抵达这里，并向你们表明：这同我们的全部操作实践、同我们在分析技术中怎样着手处理主体，具有怎样的紧密关系——尤其当我们在自我层面着手处理主体时。

第5课 · 1954年12月15日

我想试着稍微定位一下昨晚的报告。如果要用一种形象化的方式表达我们在这里试图做的事，我首先会庆幸：弗洛伊德的著作就在我们手边，我无须——除非神意意外介入——到某座西奈山上去寻找它们；换句话说，我不必过早地把你们全都单独留下。

因为说实话，我们将会看到——而且会不断看到——即使在弗洛伊德文本最严密之处，仍会反复出现某种东西：虽说不完全是对金牛犊的崇拜，却毕竟多少是一种偶像崇拜。我在这里试图做的，就是一劳永逸地把你们从中拔出来。我希望终有一天，这一点能充分实现，使我不再感到那种倾向于过度形象化表述的危险。归根结底，偶像崇拜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亲爱的勒克莱尔或许并没有走向这样的匍匐膜拜，不过——你们其实也全都感觉到了——他那里仍有某些喷涌之处、某些点，正是我后来同他交谈时所说的那些“脚手架”：到了一定时候，必须把它们拆掉。他组织报告的某种方式，以及他保留某些参照术语的若干地方，都属于这一类。

这种诉诸形象的需要……

天知道这需要多么正当；“模型”（modèle）、“模式”（pattern）这些术语自有其价值和功能，而且以某种方式相当准确地表达了科学报告以及其他某些领域所采用的方法，

不过，它的重要性或许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大

……并非没有弊端。

没有哪个地方比我们所在的领域更容易遭受这种诱惑的暗中侵袭——我是说，没有哪个地方埋藏着更多陷阱。我们所在的恰恰是主体性的领域；而谈论主体性的困难，恰恰在于不要把主体实体化。

我认为，勒克莱尔为了让自己的构造站得住——正是这个让它站得住的意图，使他把它呈现成一座稳稳坐在底面上、而不是倒立在尖端上的坚固金字塔——出于这一需要，他在某个地方以虚线、若隐若现的形式，为我们造出了某种主体的偶像。

然而，我们几乎只能从背后的一侧把握它；等到有一天把它转到正面，它便消解、消逝，不再让人把握。尽管如此，他仍不得不把它呈现给我们。我认为，就我们昨晚所做的事情而言，这是一条从侧面插入那条链条、那个论证过程的意见。论证的中心问题恰恰是：“主体是什么？”这个问题同时从朴素的把握以及科学或哲学的表述出发。我曾向你们指出，它从根本上说是从自我那里被〔排斥出来的？〕。因此，借着这条意见、这个问题，我们又回到同一个十字路口，回到可以重新上路、也就是我上次停下来的那个点：主体把握其统一性的时刻。

这个碎裂的身体在他者的形象中找到统一性，而这个形象正是它自身被预先给出的形象。这是一个二元情境，其中开始勾勒出一种两极关系；这种关系当然并不对称，而这种不对称已经向我们表明：精神分析所给予我们的自我理论，绝不可能同所谓科学的或哲学的自我观念汇合。后一观念与某种朴素把握相接，而我曾告诉你们，这正是一种

在历史上可以断代的心理学所特有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将称作“现代人的心理学”的东西。

总之，我让你们停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向你们展示这个主体——上一次、而不只是昨晚，我也把它称作“无人”（personne）。当我们停留在勒克莱尔所提出的主体问题上时，我不只是在昨晚，也在我上次讲座的结尾，把它称作“无人”。我或许没有把重音落得很准、也没有充分强调，但昨晚我们谈论的确实就是这个“无人”。

这个作为“无人”的主体，本来是分解的、碎裂的，却被这个既欺骗又已然实现的形象所锁定，在预期中仿佛被它吸入；这个形象就是主体的某种统一性，它在他者的形象中被给予主体，也同样在主体自身的镜像中被给予。镜像在这里能够取代他者的形象而发挥作用，这清楚地显示出这一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想象性的。

于是，我借用了我们最现代的机器实践——它们不仅对科学的发展，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发展都如此重要——作为参照，把主体发展的这一阶段呈现为某种可以体现在模型中的东西；我给你们做了一个模型。

我做的这个模型有一个特点：它绝不会在任何地方把主体偶像化。我想你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在我让你们停下来的那个点上，主体根本无处可在，理由很简单——这里谈的是两只机械小龟，其中一只被另一只的形象锁住；被捕获的不是整个能量系统，而是这些机制中起调节作用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它以种种可能的方式受到攫取和俘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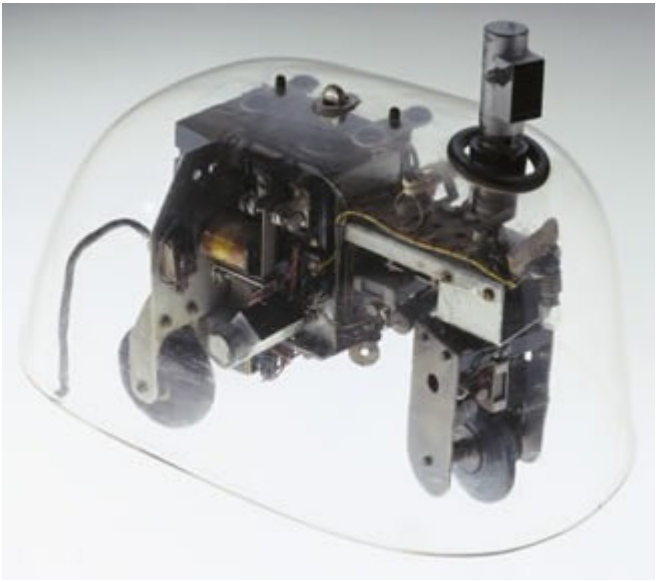
我不是来给你们讲控制论的，哪怕只是想象的控制论也不是。光电管以及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派上用场的一切，使我们得以制造出比其先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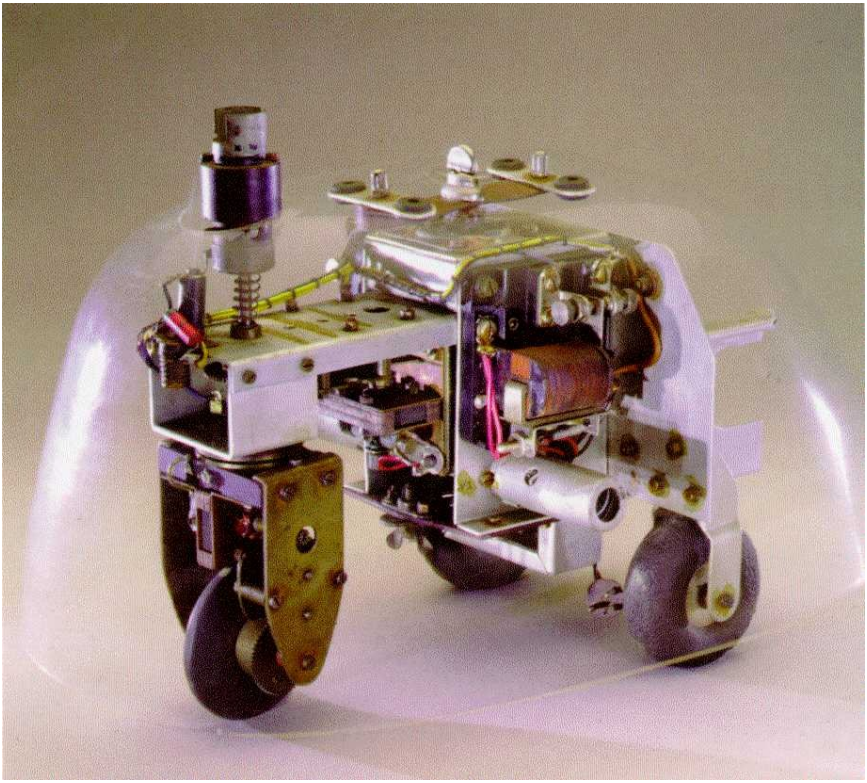
——自动机——更为精巧的机器。这台机器可以说完全悬系于另一台机器的整体运作，因而也被另一台机器的种种动作所俘获。

你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圆环并不因此只限于二者，但构成其本质联结的是“二”：两台机器通过形象各自被另一台拖着走。总之，这是一个巨大的环，其中每一方都被对方的总体形象所攫取。

你们可以想见，从所谓机器欲望的对象来看，这会造成多么严重的不便：对机器而言，除了重新汲取能量源，几乎没有别的可能欲望；机器实质上只能进食。我们不仅尚未实现，甚至还未构想出能够自我繁殖的机器；就连这种繁殖的象征性图式也尚未给出。因此，我们仍局限于这个作为欲望对象的东西，即重新供能的来源。

格雷·沃尔特先生那些乖巧的小机器，正是这样行动的——按照我们的设想，它们彼此受制于这种想象关系。





这会导致令人不快的相遇：只要另一台机器也朝那里去，它们便都在某种意义上被锁定在同一个点上，因此某处确实会发生碰撞。我们上次就讲到了这里。“我在这里停了下来。”现在假设它们带有某种录音装置，再假设那道伟大的声音……

我们当然可以设想，有某个人操纵着它们并监视其运作，也就是立法者

……想要介入，调节这场芭蕾。到目前为止，这芭蕾不过是一场圆舞，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立法者能够调节这场芭蕾并引入象征性

调节；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那些交换无意识的数学底层结构，恰好已给了你们这种调节的一个观念、一个模型、一幅图式。

如果这个模型有效，那么人类的调节中还应当有其他例子。列维-斯特劳斯先生在他上一期研讨班中提出的模型就是如此。显然，比较到这里就该停止，因为我们不会把立法者实体化——那只会又添一尊偶像——我们必须在这里打住。

塞尔日·勒克莱尔

抱歉，我想回应一下，因为我有一种感觉。我很清楚，在把主体实体化这件事上，我或许武断地强调了哪一点。不过，借用您自己的说法，如果我在这里把它偶像化了……

拉康——我说的是您“有这种倾向”。

塞尔日·勒克莱尔

……如果我有把它偶像化的倾向，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不可能有别的办法。

拉康——好吧，您就是个小小的偶像崇拜者。我从西奈山下来，把法版砸碎。

塞尔日·勒克莱尔

请让我说完。我觉得，一旦拒绝这种对主体的、十分自觉的实体化，我们——而且您也一样——便倾向于把这种偶像化转移到另一个点。

到那时，被偶像化的将不再是主体，而是他者、形象、镜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如此防范它，但偶像化确实被转移到别的东西上了。

拉康

我知道。您并非唯一如此的人。可以说，您的超验论关切更多地指向一种关于无意识的实体论观念。另一些人的关切则会更偏向所谓唯心论——取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也就是批判唯心论。我没有理由揭示在场某个人的身份；他在我们上次讲座之后对我说：

“您说的那个意识啊，我觉得，您总的来说把它粗暴地对待了一番之后……”

我还得说，这里的听众不止一位受过所谓传统哲学的训练：这种训练以批判唯心论为基础，而意识对自身的把握正是其支柱之一。这个东西不能如此轻率地处理。上次我已经提醒过你们：我之所以迈出这一步、如此“轻率”地对待它，是因为我完全意识到，这一做法带有武断而决绝的性质，纯粹是在斩断一个戈耳狄俄斯之结；它事实上预设了对整个观点的一种根本而彻底的搁置。

所以，有人对我说：

“……这个意识，您又让它回来了——用您自己的说法：您总得把那个主体偶像重新安置在某个地方——这个意识，您已经让它回来了。”

确实，当我在报告中谈到那道重新建立秩序、使机器的芭蕾得到调节的声音时，我们总得知道这道声音位于何处。瓦莱里先生也许正这样说过它：

“……那庄严的声音，

它鸣响时便知道自己，

已不再是任何人的声音，

只剩波涛与树林！”——保罗·瓦莱里：《魅力集·皮提亚》

他这样表达时，谈的正是语言。显然，我们需要……

直到最后，我们确实承认：这也许真是“无人”的声音

……在我们对主体的推演中，把它定位于人际游戏之中，并且总得给它一个位置！因此，它不只是立法者、芭蕾编排者的声音——那确实会是一种等级极高、而且颇具典型性的偶像化。

正因如此，上次我才开始告诉你们：我们不得不假设——更准确地说，不得不要求——接下这道进行编排的话语的，是机器本身。我有时会在发言结尾讲快一些，因为既得收束，又得为下次重启埋下引线。我当时说的是：假设机器能够把自己计算在内。归根结底，事情就在这里：要让那些数学组合——它们在我刚才界定的层次或意义上编排着对象交换——运作起来，每台机器都必须在这个组合系统中把自己计算在内。

正是在这里，我方才提到的那位匿名人士——他本人可以开口、显露身份了——说道：

“您就是从这里让意识回来的。您刚才还那么漫不经心地向我们呈现意识；

> 在我们的传统中，这个意识迄今确实一直是主体偶像化的一种形式，
>
> 是人们真正把握、触及主体之处；可您忽然又把它说成一片只需一口气
>
> 就会被扰乱的水面，更确切地说，是一小块碎玻璃——‘它不过如此’，有人这样对我说。
>
> 可反过来，要让主体把自己计算在内，您终究不得不在这里重新纳入意识。”

好吧，我得说，这让我颇感惊讶。毕竟，这位这样对我说话的人，怎么连如下事实都没有稍作停留呢？而这显然正是我所要抵达的地方：对方怎么会如此缺乏预感，看不出我恰恰是在这里等着传统哲学家？

因为，若说分析经验向我们展示过什么，而这又是其中最令人惊异的事情，那就是：主体这一现象——主体正是以这种方式被结构起来的，正如个体……

这个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容许自己把它构想、建造成一台纯粹机器的个体

……弗洛伊德正是从这里出发的。你们只需看看他的心理机制理论，看看他在《致弗利斯书信》以及那些草稿、Drafts、他所给出的那些极为机敏的心理结构纲要中是如何构想它的：那是一台机器，仅仅受到惯性原则以及若干稳态公式的要求所约束。

在这个个体身上，我们看到一些具有如下特征的表现：其关键标志不仅是它们极端地处于无意识之中，而且是一个被迫的无意识；若不经

特殊处理，它就无法重新纳入意识。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个体在其无意识活动中——这个为自己的自我而骄傲、相信自己能在完全透明的意识中把握存在的个体——正是在无意识中把自己计算在内。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和《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带给我们的一切，都在说这一点：个体把自己计算在内。

一旦梦这种占卜式试验开始运作，我们便会看到：主体完全无意识的活动突然释放出他自身的形象，以及所有其他人的形象。与此同时，在所有这些形象之间建立起一种真正的象征关系，也就是所有象征关系中最精密的一种：一整套计算。在这套计算中，主体本人以其想象性的存在、以那个作为相同者的复本被放入其中；这个复本占据着我们昨晚谈到的自我形象所在的位置，也就是我所说的镜像、他者的形象所在的位置——那也正是我们在两台机器的关系中已经抵达的点。所有这一切都被放进梦中。

《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也是如此；当我们投身于若干占卜式游戏时，所能探索的东西同样如此。弗洛伊德向我们表明，其结果令人惊异，值得反复琢磨，尽管这种用法后来多少已被弃置。我具体指的是《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结尾处那个十分奇特的游戏：让主体“随便说几个数字”。

他随便说出一些数字；主体还会努力选取真正随机的数字，甚至挑选很大的数。可是，经由对这些“完全随机说出”的数字进行联想，我们仍能从中提取出意义、回答和回响，并把它们连到主体的整个生活、回忆和命运上。从概率的角度来看，这确实远远超出纯粹偶然所能让人期待的范围。弗洛伊德经验给予我们的最显明现象之一，恰恰是：作为主体而发挥功能的个体，正是在无意识中把自己计算在内。

总而言之，为了多少构成一个形象，我会这样说：

- 在你们看来，这首先像不像一种活动，其中那个“在自身透明性中把握自己的意识”仍包含一部分直观？

- 再比如，我们试着设想那台已被我们稍稍赋予生气的机器：它瞄准某处的造物主，能够说出“am, stram, gram, bour et bour et ratatam”，并从中抽取出一个主体。你们是否觉得，这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引入同一种反身性？

在这里，我们已经置身于机器把自己计算在内的情形。

总而言之，如果哲学家告诫我，不要以某种方式把意识现象物质化，从而丢失一个宝贵支点——它能让我们把握主体本身的彻底独创性……

在一个按照康德乃至黑格尔方式组织起来的世界里——因为黑格尔虽然让我们得以摆脱意识的中心功能，却没有彻底放弃它

……那么，我也要告诫哲学家提防一种与我们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幻觉。归根结底，它或许与那个极富意味、颇为有趣而又带有时代印记的测验——比奈—西蒙测验——中的〔幻觉？〕并没有多大不同。

我们用它检测主体的心理年龄——说实话，这个心理年龄并不那么转瞬即逝，当然也颇具意义。我们在“荒谬句”这个题目下向主体给出下列句子，看这个年幼的主体是否同意：“我有三个兄弟：保罗、埃内斯特和我。”

人在某个年龄确实可能相信自己“有三个兄弟：保罗、埃内斯特和我”。同样，以为主体一旦把自己计算在内，就意味着这同时是一项意识操作——换言之，是一项同某种对象直观紧密相连的操作，而这种直观位于意识对自身的把握层面——其中无疑也有一类这样的幻觉。对这种把握的模型可以有不同评价；它并非单义的，各位哲学家也并没有以相同方式描述它。

例如，我并不打算批评笛卡尔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因为它恰恰受到一个特定目标的支配；这个目标完全可以被定位在一场最终抵达上帝存在证明的辩证运动之中。因此，只有把它武断地孤立出来，人们才会赋予它一种根本的、存在论的、决定性的价值。

反过来，对那些对此感兴趣、而且我想对此并不陌生的人来说，要看出如下事实并不困难：从所谓“存在主义”的观点看，只要足够深入地考察意识在其设定性与非设定性的位置，那么认为意识对自身的把握最终在极限处完全脱离了对自我的任何存在论把握的，绝不只有我一人。

而且，只要细看就会发现：在那种被认为仅仅是意识对自身反思的内省之中，自我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经验出现，并且同完全可以对象化的条件相联系；意识现象在这种把握中没有任何特权性质，虽说它确实具有若干你们以后会看到的优点。

如果把意识从主体对自身的这种本质把握所施加的一切抵押中解放出来，把它当作一种现象——相对于我们对主体的整个推演，我不会说它是偶然的，而是说它发生在极为不同的层次；正因如此，我才兴致勃勃地在物理世界本身为你们提供了一个模型——那么你们就会看

到：它总是以极大的不规则性出现在主体性现象的表现中，并且同无疑非常特殊的条件相联系。可是，在分析所带来的视角翻转中，经验表明这些条件总是更多地属于物理层面——我是说物质层面——而不是心理层面。

采取这一视角之后，许多不断被提出的问题——意识如何介入、意识现象有何歧义——便会换一种样貌。比如，我们能否说梦的现象涉及我们所谓的意识界域？它通过哪条途径、以什么方式涉及？梦发生在意识层面，它是有意识的：那片想象的流光、那些移动的形象，与我们在谈论自我形成时反复强调的形象之幻觉面，完全处在同一个平面、同一种秩序中。它们属于同一秩序。

事实上，梦中发生的事情很像对镜阅读。你们知道，这不仅是最古老的占卜方法之一，也可以用于催眠技术，并且在某种催眠技术中确实会产生效果。主体能够在镜中把握、看到……

最好还是人类自开端直到相对晚近的时代始终使用的那种镜子，也就是与其说明亮、不如说晦暗的东西：抛光金属镜

……主体会被这个表面迷住，从而向自己显露出其想象固着中的许多成分。

意识在哪里？我们应当朝哪个方向去发现、寻找它？它位于何处？这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用心理张力来表述——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不止一处正是这样尝试的，即考察意识系统如何、又通过哪些机制受到投注和撤回投注——那么弗洛伊德会得出一个奇特的想法，而这应当给我们指路：最好把……

如果你们愿意，我们甚至会走到这一步，正如弗洛伊德在思辨中也被引到了这里

……某件事看作连贯论述的一项必然要求，正如他明确说出的那样。

他早在《精神分析的起源》[注1]一书所收录的心理系统组织草图中，就遇到了这一点——我曾向你们提过这本书，它由伦敦及纽约的伊玛戈出版社出版；在《元心理学》中，他又不止一次回到这里。他不得不赋予意识系统本身一个不仅特殊、而且必须以某种方式视为被排除在三个心理系统的动力学之外的位置。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起源：致威廉·弗利斯书信、草稿与笔记》，1887—1902，Kessinger Publishing，2010；《致威廉·弗利斯书信》，1887—1904，法国大学出版社（PUF），2006。

这里有某种东西发挥着作用，但从动力学观点来看，其行为方式十分特殊。弗洛伊德始终把这个问题摆在面前，承认它尚未解决，把澄清这个问题的任务留给未来：他尚无法获得这种澄明，也尚不能解决自己显然撞上的僵局。

因此，我们来到第三极的必要性层面；我们的朋友勒克莱尔昨晚正试图在他的三角图式中维持这一极。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三角形。不过，对三角形可以有一千种操作方式。三角形绝不必然是一个依赖直观、无可争辩地就如此呈现出来的坚固图形。

首先——这也正是它何以如此醒目、富有表现力和标志性的原因——三角形同样是一个关系系统。即使在几何学和数学中，也只有到了比如它的任何一条边都不享有特权的时候，人们才真正开始运用三角形。这里所涉及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这个主体；既然它把自己计算在内，问题就在于它位于何处。至少对我们分析家而言，它显然位于无意识中；我想，我现在已经把你们带到了这一点。

让-贝特朗·蓬塔利斯

请允许我说一句，因为我似乎在那位匿名对话者身上认出了自己；他曾向您指出，也许您在开头把意识藏了起来，只是为了在结尾更好地找回它：

- 我从未说过“我思”是一条不可触碰的真理，也没有说可以用这项经验来定义主体，也就是用一项自我对自身完全透明的经验来定义主体。我从未说过意识穷尽了全部主体性；有了现象学和精神分析，要这样说其实也非常困难。我只说过，“我思”代表着主体性的一种模型，也就是说，它使这样一个观念变得极为可感：必须有某个人，“如同”这个词对他而言才有意义。

而您似乎漏掉了这一点。您曾讲过倒影以及人类消失的寓言，却只忘了一件事：人类必须回来，才能把握倒影与被映照之物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否则，如果只考察对象本身和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胶片，那不过又是一个对象，连见证都算不上，什么也不是。

同样，在您所举的“随便说出的数字”的例子中，要让主体发现自己随便说出的数字其实并没有那么随机，就必须发生某种现象——您愿意怎样称呼都行，但在我看来，它正是意识，而且不只是对他人所言的反映。我想说的仅此而已。我不太明白，为什么非得拆毁意识不可：如果到头来，您仍要像结尾所做的那样，以某种意向或对关系的设定把它带回来。

拉康

重要的并不是“拆毁意识”。天哪，先不说碎玻璃那种比喻，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打算让一大片窗玻璃轰然坠落——不过，为什么不呢？

这样做有一些理论理由，我刚才已经向你们指出：在分析经验中，要〔……〕[注]意识系统本身，并用弗洛伊德所谓“能量参照”的秩序来表述它，也就是把它表述为不同心理系统之间的游戏和相互作用，是极其困难的。以后我会向你们证明这一点，我们还会回到我刚才引过的弗洛伊德段落。

> [注] 此处法文底本在 le système de la conscience 之前有缺文，原句的动词结构不完整。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却仿佛被从侧面排斥了出去。我以后还会回来讨论。不过，我上次开始论证时所瞄准的，是我们今年研究的中心对象，也就是自我。关键恰恰是剥去自我的那项特权：尽管它得自某种不言自明性，我却一直以千百种方式向你们强调，这种不言自明性不过是一项历史偶然；它在哲学推演中占据的位置，只是这一偶然最清楚的表现之一——毕竟，我们身处哲学与启蒙的时代。

当然，我们可以在历史进程中做出这样的区分；但问题在于把握如下事实：自我这个概念的这种不言自明性，来自意识所获得的某种声望——意识被视为唯一的、个体的、不可还原的经验。正因为如此，相对于我们的主体观念，自我仍保有这种吸引力和诱惑性的幻象，使人不加批判地谈论它，并把它的“综合功能”赋予一些彼此非常不同的意义——我希望向你们证明这一点。今年我会试着向你们展示，“自我的综合功能”这个术语在分析家那里意义何其不同，甚至在弗洛伊德或某

位分析家作品中两个几乎相邻的段落里也会如此。简言之，这种以意识经验为中心的自我直观，确实有一种俘获人的性质。

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情、提醒你们，并沿着这一连串问题推进——其中有些问题确实显得像是在拆毁和破坏——正是为了把这种直观排除出去。因为在我看来，这是终于使人把握弗洛伊德那里主体之实在究竟位于何处的一道绝对不可或缺的阶段、一步。

最后，如果你们愿意，也许为了不让你们今天离开时仍看不到另一个目标，以及这个讨论究竟何以至关重要——它有时的确仿佛远离了我们具体的、经验的、临床的关切——我还是要向你们点明这一点。

我要把话题带回主体问题的症结。关键是要知道，自我……

当然，我们绝不是要把意识的特权还原成无意识

……对于我们在这里追究的东西究竟具有什么意义。我提醒你们注意如下事情。

我把你们引向主体中的第三极，并不只是为了提醒你们无意识的功能。我们在这里遇到了意识现象。我想你们应当已经猜到，关键在于：在这个无意识中……

如果可以这样说，在这个无意识的面向之下——它不仅是无意识的，而且被排除在自我系统之外

……主体在说话。

问题正是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要知道在这两个系统之间……

- 一个是自我系统——我们还无法在行进途中〔说太多〕应当如何构想它；那是自我的组织，弗洛伊德曾一度甚至说，它就是心理机制中一切有组织的东西；

- 另一个是无意识系统……二者是否甚至存在等价关系。因为归根结底，这正是我们今年的问题。

当我向你们谈“弗洛伊德理论和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时，问题在于：二者的对立是否仅仅属于如下秩序：

- 一个“是”或“否”；

- 一个“它是某物”或“它不是……”；

- 一次纯粹否定的翻转。

毫无疑问，自我通过否认（Verneinung）向我们说了许多东西。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索性把它讲述的一切都变换符号，以此直接读出无意识呢？人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因为经验〔……〕[注]得太容易了，但确实已经走到了某种类似的做法。请记住，我可以向你们展示一些文本——而且出自最优秀的分析家——其中，当弗洛伊德引入他的新局部论时，人们感到发生了某种真正的爆发和解放。就连十来年后安娜·弗洛伊德关于防御机制的论述，也带着这种痕迹：

> [注] 此处法文底本有缺文，原句的谓语结构不完整。

“啊！我们又找回那个熟悉的老自我了。现在可以重新关心它了！现在我们获准这样做了。”

仿佛以前被禁止了一样！颇为奇怪的是，分析家把对自我之外其他东西的关注体验成一种禁止他们关注自我的禁令——可见那是一种多么陌生的经验。安娜·弗洛伊德小姐在《自我与防御机制》开头的一段文字中正明确这样表达："现在，我们获准关注自我了。"当然，从来没有所谓无权关注的问题。弗洛伊德一直谈论自我，而且始终极为关注主体外在自我的功能。问题只在于：当我们用所谓阻抗分析，取代后来才被粗略称作"材料分析"的东西时，我们究竟在做什么。

在阻抗分析中，我们拥有的东西是否仅凭自身便等价于材料分析？也就是说，我们从反面去接近它：这不再只是符号的变换，而是某种可以称作模具的东西，它勾勒出那种妨碍无意识内容表现和显露之物的轮廓。显然，如果两个系统以某种方式互补，那么这便成为一条原则；从那一刻起，一位分析家——埃尔多拉多——甚至敢于把它称作"自我学"，称作"自我学的降临"。从此，自我学支配着分析技术，成为其秘密、动力与核心。

问题在于：他们沿着这条道路是否正确？以某种无疑经过更新的方式对自我的进程进行操作，是否等价于此前在所谓探索无意识的秩序中所追求的东西？换句话说，主体的这两个界域、两个层次是否属于同一秩序；无论说一个是另一个的反面、补充还是对称面，关键在于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秩序。

关于这种"自我学"，我这里指的是一篇具体文章，给你们一个参照：它刊于1938或1939年的《精神分析季刊》第八卷，读起来很有趣。你们会看到，应当把它置于最显要的位置，把它看作这种自我学的基础、动力和关键枢纽——《摆脱原则》（Rid Principle）。这是分析理论中的一项新原则，你们会看到它以千百种形式出现。它会一再回来；事

实上，当前大多数分析家的活动正是受它引导。To rid 意为摆脱某物，to rid of 意为避开。这就是我们开始视为完全客观的自我组织所派上的用场！

我向你们保证，这里对意识的参照也同样被彻底放弃了，因为我建议你们这样推进，归根结底只是出于启发性的目的。主体从最低到最高的表现之间，总之没有任何区别。同一原则既支配最基本的刺激—反应过程，也支配那只青蛙：你把一小滴酸放在它腿上，它就通过脊髓反射把腿缩开；只要砍掉它的脑袋，就很容易证明这种反射的确是脊髓性的。

在这项原则中，一切从最低到最高都照常运作，自我的功能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被推导出来。只要某一驱力尚未被整合，这个如今已经被还原的自我，便把它视为纯粹的激发、纯粹的内部刺激；而对这种刺激严谨、规律的观察——它会触发自我的反应——理应足以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辨认它、又如何整合它。这是一种极端立场。不过，只要有人把一向未被清楚表达的东西连贯地说出来，我们就总该心存感谢。正是这使种种误解无法再在这里维持下去：误解已经被彻底揭开。

然而，如果弗洛伊德在引入新局部论、引入一种以自我、超我、本我等来排列心理机构的新方式时想要表达什么，那么他想表达的恰好与此相反。他要提醒我们：不仅这里存在绝对的不对称，而且无意识主体与自我组织之间还有一种彻底的差异。为了进一步强调我的意思，我会说：二者不只是彼此不对称，而且属于不同的层级。

请你们读一读。你们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在崇拜金牛犊的同时，也请手里拿着一小册律法之书，读一读弗洛伊德写的《超越快乐原则》。

带着我给你们的这把小小钥匙、这段导言，从这个角度阅读它，看看：

- 要么它毫无任何意义；
- 要么试着看看，《超越快乐原则》的意义是否恰恰就在这里。

弗洛伊德说，迄今为止，我们无可争辩地从一项原则出发：我们以某种方式构想心理装置，认为它的组织方式使其处在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这样承认。

当然，弗洛伊德的思想并不狭隘，不会止步于偶像化。他从未以为现实原则中没有快乐原则。我们之所以遵循现实，是因为现实原则就是被延迟的快乐原则；反过来，如果快乐原则存在，也是依照某种现实而存在。这个现实就是心理现实。换句话说，这两个界域的设定，奠基于对经验的如下把握：如果心理机制有意义，如果存在一种叫作心理现实的现实，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存在生物，那么它们的表现就在于拥有某种内部组织；这种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抵抗力量与能量释放的自由而无限的通行，而在纯理论的设想中，这些力量与能量释放会在无生命现实中彼此交错。

这里有某种封闭的东西，内部会维持一定平衡；这就是一个有机体，人们认为它具备若干如今已被明确称作“稳态性”的能力。这些能力缓冲并调节可能来自有机体围界内部的效应，以及如弗洛伊德明确所说的、由外部世界而来的力量和能量数量未经调节的闯入。因此，其内部存在一种调节，而我们将把这种调节称作……

如果你们愿意，为了让事情获得意义，并引入一个能够澄清问题的词，从而开始回答勒费弗尔-蓬塔利斯在参与我们的对话时就这种“重复自动症”的歧义所巧妙提出的问题——他的参与远不只是一项简单反驳

……我们就把它称作“心理组织的恢复性功能”。也就是说，某种叫作刺激的东西发生了，它或者立即得到释放——我们知道这种短路的情形，也就是我方才提到的青蛙腿。它得到释放，但即使在如此原始的形式下，也已经含有相当程度的组织：这种释放具有某种避免作用的目的性；不仅要释放兴奋所造成的结果，灼烧本身也会引起缩回运动。这里有机器恢复和平衡的原则。

归根结底，无论我们依据分析经验，如何设想这两个系统由于其二重性而脱开啮合……

当然，它们不可能真的脱开啮合，因为这里恰恰是分析经验全部调查工作的对象

……我们很容易认识其中一个系统，却极难认识另一个；而单从客观、动力学的观点看，这个事实就证明：它们的接合点上存在某种特殊之处，使我们至少能在现象学和实验层面把它们视为两个系统。那么，什么调节着它们的关系？弗洛伊德正是以我所说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

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迄今对快乐原则的用法——把它看作一种稳态原则，不过他当时没有这个术语，而使用的是惯性原则——存在问题。我想，《超越快乐原则》也使用了“惯性”这个术语，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篇页一样，但我对此没有把握。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所瞄准的正是这一点，尽管“惯性原则”会同物理惯性产生令人不快的歧义。这里有某种费希纳主义的回声。我们将会看到他怎样运用费希纳，因为费希纳有两副面孔：

- 一副是心理物理学家的面孔：他断言，除了物理学原则之外，任何引入其他原则的表述，都不能用来指明、象征物理调节。

- 费希纳还有不太为人所知的另一副奇特面孔；在“普遍主体化”这一类事情上，他走得很远，甚至几乎会赋予我前些天那个小寓言以实在性——这当然远非我的本意。我当时并不是在告诉你们，湖中山峦的倒影是宇宙的一场梦；不过，你们确实可以在费希纳那里找到类似的东西。是不是，安齐厄？我的听众中到处散布着这样一些敏感点。

所以，惯性原则——我们就说稳态原则。弗洛伊德这样提出问题：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否仅仅是一个系统中的快乐就是另一个系统中的不快，反之亦然？因为直到这时，他只是把另一个系统的法则也写在这种释放定律、回归平衡位置的基础上，而没有进一步追问；这些法则虽然具有不同结构，他把它们称为初级过程，以区别于次级过程。

可是归根结底，同一项调节原则支配着二者。在这个转折点上，他意识到了这一点。请相信我，他指出这一点绝不只是为了玩弄抽象概念；他之所以强调它，正是为了试图把我们带得更远。接着，他停留在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动力学另一个阶段令人惊异的性质上。

为了让你们充分理解，我会用一种通俗的方式表述这另一个阶段：归根结底，如果这些系统只是以某种方式彼此耦合的系统——原文并不

完全这样说，但只要你们会读，就会从中读出这一点——那么弗洛伊德的展开在途中还包含了许多别的东西。他极其谨慎地一步一步推进，使我们能够从中提炼出的不是一般线索——这不是概括——而是一项关键铰接。

如果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系统中的快乐成为另一个系统中的不快，那么我们得到的终究是一种彼此铰接的东西，并且必然因此导向一条普遍平衡定律。你们不妨说，这是以一种理论的、抽象的方式，提出我方才所说的同一个问题：自我分析是否只不过是以相同方式、却从反面去做此前在另一个平面——无意识的界域——上开始进行的分析？

然而，弗洛伊德在这里发现，有某种东西不符合快乐原则迄今为止的表述。他发现，从其中一个系统——就说无意识系统——出来的东西具有一种特殊的坚持性。这当然不限于这一项指示。我这里只向你们说一些极其简单的事情。这种坚持性究竟是什么？

我说“坚持性”，是因为这个日常用语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表达了其含义。别忘了，这在法语中被译作“重复自动症”，德语则是 Wiederholungszwang。这非常醒目；我们的这位人物，就停留在今天谈话的边界上。我们在这里触及某种东西，它向我们表明为什么会有这种同名呼应：其中的 Zwang 在我们的译名中借用了“自动症”一词，从而与整个神经学谱系发生回响。

相关知识卡 重复强迫：恢复性倾向与能指链的坚持

德语这里有一个〔……〕[注]；并非偶然，它恰好属于现象学的界域：这是一种重复强迫。正因如此，我才用“坚持性”这个日常概念来落实

它。这个系统里有某种明显造成扰动的东西：它是不对称的，无法契合，并且提出了问题。于是，《超越快乐原则》整篇文章便成了一场沿着踪迹展开的追寻。

> [注] 此处法文底本有缺文，无法确定拉康所说的具体德语词项。

人们突然发现，有某种东西逃出了方程系统；这个系统之所以被当作适合，是依据一些我不会称作范畴、而会称作“不言自明之事”的东西。它们取自能量学界域的思想形式，而这些形式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确立的。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

昨晚，拉加什教授向你们搬出了孔狄亚克的雕像——有点太快，我们只瞥见了一瞬。如果《感觉论》偶然落到你们手边，我无论如何都要邀请你们重读它。

首先，因为它读起来绝对令人愉悦，具有无可模仿的时代文风。那尊化作玫瑰香气的雕像，是某种……

你们会看到，我所说的那个无处不在、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视觉形象的主体原初状态，原来还有一位先祖

……你们会看到，孔狄亚克的出发点显得何其稳固、明白，它同样“对自身透明”——这个说法用在这里恰到好处。看起来，他可以毫无困难地像从礼帽里掏出兔子那样，从中拿出随后全部的心理建构；而事实上，其中少不了若干令我们彻底愕然的跳跃。还得说，这些跳跃对他的同时代人并没有那么突兀，因为孔狄亚克并不是妄想者。

在这段间隔里发生了什么？其中有些地方让人感到，快乐原则本该在某处被引入。他却没有把它表述出来。为什么？就像拉帕利斯会说

的：只因他没有那个公式，因为当时还在蒸汽机时代之前。必须等到蒸汽机及其工业化利用出现，等到那些认真制定管理计划、核算账目的先生们开始追问："一台机器的产出率是多少？"

换言之，从机器里出来的东西是否比放进去的更多？这些人是形而上学家。兔子与礼帽自有其永恒价值。无论人们怎样想，而且尽管我向你们所作的论述通常并不带有进步主义色彩，我们仍得承认，在象征的秩序中会出现一些涌现：到了某个时刻，人们发现，要从礼帽里掏出兔子，总得先把兔子放进去。这也是能量学的原则；正因如此，能量学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

于是，弗洛伊德发现，稳态原则虽然被写入机器的平衡界域，而且预设了整个能量学背景——这个背景迫使他用投注、负荷、释放和不同系统间能量关系的术语来书写自己推演的一切，并最终把它们都归到平衡原则名下——其中却有某种东西无法运作。

《超越快乐原则》说的就是这个，不多也不少。他围绕一些此前对他本人而言尚未构成问题的现象提出这个问题。你们若以为，在创伤性神经症中反复出现梦这个众所周知的现象……

它仿佛仅凭自身便与快乐原则的规则构成某种矛盾，

因为在梦的层面，这项原则体现为欲望的想象性实现原则

……这只是一个完全局部的点，是一种表现。究竟为什么在这里会有一个例外？

可是，仅仅因为梦的功能或理论在这一层面出现一项例外，并不足以使快乐原则这样根本的东西受到质疑。何况，这项原则并不是从弗洛

伊德的发现中推演出来的，而正是他思想本身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弗洛伊德的时代，人们就是在这个界域中思考，仅此而已。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非常具体。归根结底，另一个系统中的那项原则，弗洛伊德已经具体说过，就是性快乐；这一点没有疑问。

不过，这里有两回事：这种具体回响同时也是作为调节原则的快乐原则，它使我们能够把“被视为一台机器的人”的整个具体能量运作，写入一套连贯的象征表述系统。因此，他提出问题的场域远比少数例外宽广。你们若读这篇文本，就会看到，他援引的各个点最终没有一个在他看来足以单独质疑一切；然而，它们的总体却相当准确地实现了你方才为回应自己预告给我的暗礁而说的事情——你说我最终总会撞碎在那上面，也就是人们终究会在某个地方发现偶像状态的主体。

我们是在玩“传雪貂”的游戏吗？你们会看到，弗洛伊德在这里正这样玩；因为在他看来，关键恰恰是分析赖以奠基的现象：我们虽然瞄准回忆，但无论最终能否得到它，实际找到的都是某种再现——它以转移的形式再现出显然属于另一个系统的东西。

塞尔日·勒克莱尔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总体回应一下，因为我到底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那么一点针对。我想，您很责怪我从那顶自己预先放进兔子的礼帽里把兔子掏了出来。不过，我并不那么确定是我把它放进去的。没错，我把它掏了出来！但不是我放进去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还没说完。

第二点是：我想我已经说过，关于您用来同无意识系统相对立的自我系统，我确实把它定位成一个三角结构，并且强调其中任何元素都不能被分离出来，也没有任何一个占据主导位置。

至于无意识主体的系统——您指责我把它偶像化——我的回答是：我是以这种方式呈现它的。我不知道这是否还能叫作偶像化；正因为人们知道它是什么，我才这样称呼它。换句话说，我说自己把它形象化了，而严格说来，它本应像耶和华一样，既不可被塑形，也不可被命名。尽管如此，我仍在明知自己所为的情况下把它形象化了，而且从未因此受到限制。我想到后来确实被我改成实线的那个圆。不过，我认为自己始终记得这种形象化是一项滥用。然而，就在这种偶像化的问题上，我的感觉并不是您把它推开了，也不是您在玩一场寻找主体的“传雪貂”游戏，而是您把这种偶像化转移到了大他者一侧。

拉康

亲爱的勒克莱尔，在这场谈话的结尾——许多人也许都觉得您受到了质疑，尽管这种感觉或许没有您自己那么强——我还是想说，我当然承认、甚至敬重这样一个事实：正如您所说，您是在明知自己所为的情况下做这些事的。您昨晚工作的最大优点显然就在这里：一切都受到很好掌控，您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如说，您绝不是无意间那样做的。话虽如此，现在您所提出的事情，我们将会看看是否属实，看看我是否确实把它放到了大他者一侧。也许今天因为不想让你们太疲惫，而且我就要离开，我讲得稍嫌缓慢，使您还没看到一点正在何处显露：您刚才向我预告的那块暗礁不只是可以避开，而是已经避开了。

塞尔日·勒克莱尔

我只是觉得，每当人们谈到主体，这种回避现象就会发生。每一次，当人们谈到主体时，它都像某种反应一样出现。

拉康——您说的这种“回避”现象，指什么？

塞尔日·勒克莱尔——Ridence，就是那个。

拉康

好吧，我请您别让我们走偏……这不是同一种回避。我只是想告诉你们——这也正是我把你们带到这里的原因——这种重复性功能与快乐原则的恢复性功能究竟有何区别。主体无限再现某种经验，究竟意味着什么？比如说，这项经验带有一些可以辨认的性质，而你们后来通过回忆发现它。天知道，要让这种回忆具备满足主体所需的一切特征，你们得费多大力气。我几年前已经向你们评述过《狼人》的整个故事。

主体如此坚持，究竟要再现什么？又怎样再现？是在他的行为中吗？在他的幻想中吗？在他的性格中吗？甚至是在他的自我中吗？我能够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表明：关于这种再现的本性究竟是什么，我们将不得不提出多少问题。它是什么？

从我向你们指明它的方式，你们已经看得出：我们很快就会极为接近某种可称作暂时性调制的东西。各种极为不同的事物、界域和层次都能充当它的材料和元素——只要我们采用了这套词汇，也就是在治疗内部通过转移发生的再现。它显然只是一种远为弥散的再现的特殊情

形；人们开始追踪的整个领域，以及所谓“性格分析”“总体人格分析”和其他胡扯，都属于这种再现。

弗洛伊德提出问题：这是什么意思？这种再现以其无穷无尽的性质，从快乐原则的观点看构成了一个问题。那么，是某种东西失调了，还是它属于另一项原则、属于一项更为根本的原则？

我要把问题开放地留在这里：调节如下东西的那项原则，其本性究竟是什么——这东西就是……

你们看得很清楚，整个讨论正是为此而组织、朝此处引导的

……主体。受到质疑的正是主体，而今天让它受到质疑是适宜的。今天，让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主体是否可以被同化、还原、象征化？它是不是某种东西？还是说，它恰恰是既无法命名、也无法把握，却可以被结构化的东西？

这将是我们下一个季度课程的主题。

第6课 · 1955年1月12日

我想，对于昨晚举行的本年度开幕活动，你们是满意的。你们受到了款待，得到了一份好东西。现在要看你们打算拿它来做什么。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们。一个涉及昨晚那件事之前的事情，另一个则与昨晚直接相关。先说前一件事：谁读过《超越快乐原则》？

上次谈话结束时，我让你们停在 Wiederholungszwang 上，也就是——正如我特意强调过的——我们宁可译作"重复强迫"、而不是"重复自动症"的东西。如果那些还留有一点记忆痕迹的人能回想起来，也许不无裨益。我曾向你们指出，弗洛伊德把它从自己自著述之初便界定的东西中分离、抽取了出来；即使那些最后才公之于世的早期著述也一样，比如我时常提到的《科学心理学纲要》。接下来几周必须有人来处理这篇文本，好让我们在这里分析并批判它。

从那时起，弗洛伊德所界定的快乐原则——我今天还得再次谈到它——完全是一项恒常原则。弗洛伊德在如下二者之间标出了关键差异：

- 恒常原则：他从一开始便称之为快乐原则，并在每次理论阐述涉及快乐原则时都坚持这一点；
- 另一种东西、另一项原则：我们的分析理论家面对它，几乎像鱼面对苹果一样茫然，却试着称它为涅槃原则。

相关知识卡 涅槃原则、熵与死亡驱力

比如，在哈特曼这样的作者笔下看到恒常原则、快乐原则、涅槃原则这三个术语凭借一种恒常关系被彻底等同起来，实在令人吃惊。仿佛弗洛伊德从未离开那个试图用来整理事实构造的心理范畴，仿佛他谈的始终是同一回事。那么，人们不免要问：

相关知识卡 涅槃原则、熵与死亡驱力

- 为什么他会突然把我们所谓的“涅槃原则”称作“超越快乐原则”的东西？
- 为什么他把它置于快乐原则之外？

上次我曾向你们解释，在快乐原则的讨论开头，他怎样向我们呈现自我的两个系统：一个系统中的快乐会在另一个系统中转化为痛苦，反之亦然。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恰恰是为了超越两个系统之间这种完美的对称性和互惠性，超越二者的完全耦合。因为，如果那只是一种纯粹的耦合，两个系统便会合而为一；如果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彼此嵌套、互为反面，那么正如如今人们常说的，只需对其中一个进行操作，就会同时作用于另一个；只需对自我与阻抗进行操作，便能一举触及问题的根底。

然而，弗洛伊德在1920年撰写《超越快乐原则》，正是为了说：显然不能停在这里，问题仍完整地摆在面前。因为初级过程以症状形式在自我层面显现时，会转化为不快和痛苦；但它仍不断返回。仅仅这个

事实，就足以让我们停下来片刻。只说“在一个系统中运作良好的东西，在另一个系统中运作不良”是不够的。

- 为什么这个被压抑的系统——其中某种东西沿着一定方向运作——仍带着我上次所谓的“坚持性”不断显现？
- 既然整个神经系统被设想为以抵达平衡状态为目的，为什么平衡始终没有实现？

这样一说，事情本身显而易见。然而，弗洛伊德著作的惊人价值恰恰在于：一旦他看见某个东西——他懂得如何看见，而且总是第一个看见——他便绝不放弃自己所分离出来的东西所具有的凸显度、独创性和锋芒。当然，就像一切被带入思想的新事物一样，任何思辨创新周围总会出现一种啮齿动物或昆虫般的工作，力图把它重新塞进思维习惯和常规；这种工作也立刻围绕着他、围绕他的每一个发现展开。

只需回到他在纯理论层面提出的第一个伟大而原创的概念——力比多——便会看到这种尝试；荣格在这里正是其代表。他立即试图淹没弗洛伊德所带来的凸显度和不可还原性，因为弗洛伊德说：“这个力比多是性的。”

今天，为了让人真正听懂，我们或许还得重新强调这一点，几乎得这样说：弗洛伊德所带来的，是人类进步本身那种东西的根本动力，是人类生活中冲突的凸显、悲怆、丰饶和创造。因为人们最终把力比多弄成了世界上最无定形的东西；它就是淫欲——弗洛伊德说的就是这个。可仅仅十年后，荣格已经出来解释：力比多就是心理兴趣。

力比多就是性的力比多。我说力比多时，说的就是性的力比多。正因如此，在1915至1920年以前便已开始的那次转折——所谓分析技术的转折——发生时，问题变得尖锐。所有人都承认，这一转折是把技术集中在阻抗上；它本身当然有根据，也显示出成效，但同时容易造成我方才强调的理论混淆：以为归根结底，只要对自我进行操作，就是在对心理装置的一半进行操作。

于是人们回到起点，并以为这就足够了。恰在此时，弗洛伊德提醒我们，弗洛伊德式发现就在于：无意识——

- 本身无法被直接触及；
- 却会让人听见，而且以一种悖谬的、痛苦的、不可还原的方式让人听见，恰恰以一种不满足快乐原则的方式……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发现的本质重新置于前景，而人们往往正在遗忘它。

上次我就停在这里，并对你们中的一些人说：假期里读一读《超越快乐原则》。若有谁愿意发言，说说自己在这篇文本中看见、把握或发现了什么——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我的说法——我都把话筒交给他。

奥克塔夫·曼诺尼

我想请您澄清一个让我有点困扰的问题。我也许错了：阅读弗洛伊德时，似乎可以看到他保留了重复强迫的两个面向：

- 一方面，它是重新开始一次失败的努力，以求这次成功，是通过重新处理一个问题来防范危险和创伤；
- 另一方面，它又仿佛是退回到一个更舒适的位置，因为从进化论视角看那个较晚的位置失败了。我没有看出这两个立场最终如何相合，或者至少是我没看出它们的相合之处，因此这个困难令我困惑。

拉康

我不知你们是否记得，我曾谈过自己认为存在于 Wiederholungszwang 用法中的这种区分——勒费弗尔-蓬塔利斯发言时所作的笔记我已经不在手边——也就是这个术语的歧义。这里有两种彼此交缠、交织的倾向：恢复性倾向和重复性倾向。〔转向让-贝特朗·勒费弗尔-蓬塔利斯〕您当时研究过这个问题。

相关知识卡 重复强迫：恢复性倾向与能指链的坚持

您清楚地指出这里有两个界域。我不会说弗洛伊德的思想在二者之间摇摆——没有哪种思想比他的更不摇摆——不过，确实有一系列段落随时可能使人觉得他的研究在原地兜圈。这里几乎存在一种校验过程：仿佛每当他要朝一个方向走得太远，某种警告就会回来，促使他说：“这难道不就只是恢复性倾向吗？”

接着又一次：

“不，这还不够；恢复性倾向显现以后，仍有某种东西留下，

那才是真正重复性的东西。”

在这个秩序中，重复性的东西在个体心理学层面悖谬地显得毫无缘由；问题和谜就在这里。我们在个体心理学层面看到的现象，不符合我们关于快乐原则的假设：整个系统理应回到出发时的状态，用今天的话说，应当以稳态方式运作。为什么无论从哪一端着手，总有某种东西无法被纳入？《超越快乐原则》的思想运动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一直试图重新确保，这个现象仍可纳入“恢复”的框架。但事实和经验又一次回来；很耐人寻味的是，在他看来，最富教益的似乎并不是最悖谬的现象。最终，正是在转移中发生再现这一大规模事实迫使他作出决断：必须承认重复强迫本身。

奥克塔夫·曼诺尼

我的问题是想澄清这一点：第二种意义上的重复强迫，是不是迫使他修改第一种构想？还是说，二者作为彼此有别的东西叠置在一起？我没看清，它是否使他放弃了纯粹恢复的观念；还是相反，他如今在纯粹恢复之上又加了一项强迫。

拉康——这是您读过文本之后的问题？

奥克塔夫·曼诺尼——我还没重读完。

拉康

恰恰是这一点径直把他引向死本能的功能；也就是说，他正是在这里越出了设计图的边界，因为此前的构图一直如此。

让·伊波利特

为什么他称它为“死本能”？重读这篇文章时，人会觉得这里有某种极其神秘的东西。仿佛他援引的是一组无法纳入设计图框架的异质现象，比如人们重复自己的失败；他还援引了其他异质现象，却把这一切统称为“死本能”。

“死本能”这个词与这些超越快乐原则的现象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称它为死本能？这个名字突然为他打开了一些视野，其中有些显得相当奇怪，比如“回归物质”——很有意思，却有些古怪；还有另一些……把它称作死本能，会引出一些与他原本所谈现象颇为异质的其他现象。

奥克塔夫·曼诺尼——他还不如称它为“反本能”。

让·伊波利特

一旦把它称为死本能，这个名称便突然引导他自己去发现其他现象，或开启一些视野；而最初促使他把它命名为“死本能”的东西，并不蕴含这些现象和视野。

拉康——完全正确。

让·伊波利特

“回归物质”是一个惊人的谜，在我看来也有些含混。可在这里，人仿佛面对一连串谜，而他给它们的名称——死本能——相对于他解释过的现象本身也是一次跳跃，一次惊人的跳跃；至于他对此给出的哲学解释……

拉康——还有谁要说别的吗？

贝哈拉诺先生

我也同样难以把握这次跳跃。他还举例说，这种本能会与生命本能、与自我保存本能相对立，所以便称它们为死本能。可是人会想到——至少我想到了——火的例子：难道可以说火以非火为目标吗？他似乎在说，就连生命的保存本能也走向死亡，只不过它要求走的是这条道路，而不是另一条。

总之，通过防范陷阱来保全自身，并且说死亡正是这些保存本能所欲求的东西；那么，换一种说法，我们是否也能说火——也就是热——就是冷？这样一来，这种二元性在我看来同样似是而非；它们似乎只是同一事物的两面。我仍不明白，他为什么称它为死本能？

让·伊波利特

在这种作为表达性哲学而显得有些泥泞的哲学中，难道不是这样吗？他最终说，力比多倾向于形成彼此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有机的群体；死本能则倾向于把它们带回各种成分、带回元素。作为哲学，这有些含混，但他最终确实这样说了。

拉康

读这篇文本，并不会给人含混之感。人会觉得他紧紧跟随着我所谓的那个“小念头”。有某种东西一直在他心中运作；到最后，当他本人意识到这一点时，也确实承认自己整个展开具有极其思辨性的特征。

更准确地说，我方才曾把他的思想运动说成一种绕圈的追问：他不断回到自己的起点，再绕一个新圈，又一次找到那个通道，最终终于跨了过去。跨过去以后，他承认、坦言：这里确实有某种东西——也就是我所说的完全越出设计图边界的东西——绝不可能只凭对经验的参照来为自身奠基。

他放手了；他断言，这个展开最后的必然性——在他看来，这个展开本质上值得重新传达——是在他的赞同中被给予的，也就是被这项研究、这套问题自身的生命所必然推动的事实。

让·伊波利特

阅读这篇文章时，人似乎还会觉得，在弗洛伊德看来，生命本能与死本能在无意识中合而为一。真正严重并引出整个问题的，是同一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彼此分离。这里还混杂着某种极美、极醒目的东西，就像一个孩子一面拥抱你，一面抓伤你。他其实明确说过：我们所谓的人类之爱中包含一部分攻击性；没有它，爱大概只会是无力，但它也可能走到杀死伴侣的地步。爱中还有一部分力比多；若没有攻击性，它也会导致实际的无能。如果二者共同运作，便构成人类之爱；但当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单独运作，整体便会分解，死本能也随之出现。

拉康

严格说来，这仍处在所谓直接性的层面，也就是把个体本身孤立起来考察时，心理经验中给出的东西。为了把我的想法尽量形象化，我们甚至可以说，这还只是木偶行为的层面。但当他谈死本能和生命本能时，他谈的是牵线。他感兴趣的是：木偶由哪根线操纵？

这使我回到两个问题的汇合点：一个是昨晚谈话以后提出的问题，另一个是我认为必须以如下形式向你们提出的问题："这是一种人文主义吗？"它也正是我这样发问时提出的同一个问题：

> "无论以什么名义谈论'自主自我'（autonomus ego），是否符合弗洛伊德发现的方向？"

换句话说，弗洛伊德是否真的对那个亘古不变的问题——处于最普通的人类生活体验、每个人共同关切的层面——带来了一项绝对根本的问题和回答？

这个被不断提出的、永恒的概念、幻象或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人身上有多少自主性？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带给我们什么？它真是一项根本发现、一场革命吗？

于是，我昨晚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随之再次出现：

> "如果把黑格尔和弗洛伊德放在同一个平面、同一个层次、同一个界域中，那么从黑格尔到弗洛伊德，究竟有什么新东西？"

让·伊波利特——有很多。

拉康

我今天当然不会给你们一个完整回答，因为我们还得沿着某条道路迈出一些步子，而这也许是一条漫长道路。当弗洛伊德摇摆、盘旋在死本能这个概念和功能周围时，我会尝试以自己的方式澄清、窥见并准确定位我方才所谓的那个"小念头"或"大观念"究竟有何意义。不过，我们恰好可以从这个根本问题出发，开始上路，因为它就在这里，正是

我们从分析实践和技术出发而置于前景的问题：分析家应当瞄准什么？

总而言之，分析家是否应当……

正如如今极其广泛的圈子正在做的那样——我甚至会说，它已经广泛到除少数例外外堪称普遍

……回到这个本质上属于个体主义主体观的概念和视角？这套视角令人惊讶地使某种东西保持完整；毕竟，今天的情形确实十分惊人……

我们可以把这种视角的两极称作进取的思想与倒退的思想，字面上也就是光明与蒙昧主义之间的两极

……总体而言，继续维持如下幻象的，竟是所谓实验室科学家：尽管思想的层层帷幕始终〔……〕[注]，以求削弱、质疑这个幻象，但他们仍相信，归根结底正是个体、人类主体——何以偏偏是他，而不是其他一切？——真正自主；在最终、最后的层次，总有一个转辙员位于某处——无论松果腺还是别的地方——也就是人里面的那个小人，操纵着整套装置。

> [注] 此处法文底本有缺文，无法确定“思想的帷幕”之后的谓语。

而分析思想目前正在以千百种形式回到这一点。比如有人向我们谈：

- 自主自我；
- 自我的健康部分；
- 必须加以强化的自我；
- 尚不够强大、无法作为分析支点的自我；
- 必须成为分析家盟友、成为分析家自我之盟友的自我……

你们仿佛看见两个“自我”挽着手臂，借助主体自我中残留的那一点东西前进；主体的自我就这样被置于从属位置，受制于某种所谓信任或联盟。可经验甚至没有给我们丝毫开端，足以支持这种说法，因为实际发生的恰好相反：所有阻抗都恰恰并且必然在自我层面产生。若不是从这个自我出发，人们还真不知道它们能从哪里出发。

关于这一点我先略过。今天没有时间从我的文稿里抽出几篇文字，但终有一天我会这样做。我会引用最近发表的几个段落，其中带着某种终于赢得安歇的自得与满足，铺陈如下观念：事情非常简单，像打招呼一样简单，事情就是如此——这个“乖巧的小主体”中有一些好东西；那里的力比多已经中性化、去力比多化，连攻击性也已经去攻击化，这就是“无冲突领域”。从这里出发，事情就像阿基米德所说：给它一个世界之外的小支点，它就能撬动世界……可惜，这个世界之外的小支点根本不存在。因此，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必须看清它延伸得多远——一直延伸到我昨晚所说的：

相关知识卡 自我心理学与适应概念

“这是一种人文主义吗？”

这还是提出同一问题的另一种方式，而且它远远超出那些蠢话和幼稚观念，走得更远。

“人的尺度就在他自身之中吗？”——问题恰恰走到了这里。

也就是说，这触及一个极其尖锐的点、一个绝对关键的侧面；当然，只要把握得当，它就会带走自希腊思想某个时期以来全部古典思想最根本的前提之一：

“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

可是，人自身的尺度又在哪里？

让·伊波利特

您是否认为——这几乎是对您问题的一个回答，我为此思考了半夜，而且它正好落入您刚才所说的话——弗洛伊德那里存在一场深刻冲突，以下二者之间的冲突：

- 一方面是理性主义；我所谓理性主义者，是相信人类可以被理性化的人，这条道路通向自我；
- 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人，他对治愈人类无限淡漠，内心真正渴求的是深度完全不同的知识，而且每时每刻都与那位理性主义者相对立？

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中，弗洛伊德问：所有幻觉都消失之后会发生什么？这时，自我——那个得到强化的、合乎人性的、行动着的自我——介入了：人们看见一个获得解放的人类，看见人……这里显露出一个人物。但还有一个更深的人物。死本能的发现是否同弗洛伊德在自己身上发现的这个深层人物相连，而理性主义者并未把它表达出来？您怎么看？

弗洛伊德身上有两个人：

- 我有时看到理性主义者，那是人文主义者的一面：“我们将摆脱一切幻觉，剩下什么？”
- 接着还有某种纯粹的思辨者。他内心并不那么执着于治愈人们——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而是在死本能一侧、在思辨一侧显露自身。

拉康

我认为，这恰恰属于弗洛伊德作为创造者的冒险。我完全不认为这对他构成了对立或冲突。只有把理性主义诉求当作某种理性化梦想的化身，才会说出这种话。然而，无论他在《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等文本中给予或仿佛给予了多少关注，无论他把某种对话推进了多远——为了刻画它，我会说，那是在爱因斯坦式乐观主义或乌托邦主义的层面；我是说，当爱因斯坦离开他天才的数学时，他给出的就是些陈词滥调。

让·伊波利特——弗洛伊德的唯物主义自有某种伟大。

拉康

陈词滥调也自有其伟大，有些陈词滥调甚至一望无际。我不认为弗洛伊德处在这个层面。

让·伊波利特——正因他不在这个层面，我才喜欢他：这里有某种真正神秘的东西。

拉康

在《文明及其不满》中，人们仍可以看到他多么懂得去看阻抗究竟出现在哪里。仿佛他永远都预见到：无论把理性化——我不是说理性主义——引入得多么深入，它终究会在某个地方炸开。

让·伊波利特——这是弗洛伊德最深刻的部分，可他身上也有理性主义者。

拉康

但恰恰如此：若要为他的思想定性，就必须在这个词的完整意义上、从头到尾、最坚定地把它称作传统主义的。归根结底，这篇我们即将奋力对付、又围着它兜圈、觉得如此难以进入的文本，无非是一种决不向任何东西退让的理性的最鲜活、最切近、最醒目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理性甚至不会说：“从这里开始，就是晦暗而不可言说的东西。”

他走进去；即使看起来就要迷失在彻底黑暗中，他仍继续运用理性。我绝不认为他那里有任何这种退让，或最终匍匐在某种不再运用理性

的东西面前。这种情形本来会包含在您方才的暗示中：仿佛他最终退到山上某处，觉得事情就这样也挺好。

让·伊波利特

他一直走向光明，即便这最彻底的光明必定是反题性的。我说“理性主义”，并不是说他会投身于一种新宗教。恰恰相反，Ausführung〔实现〕是一种反宗教的宗教。

拉康

它的含义——不妨称作它的反题——恰恰就在这里：死本能是理性操作本身在抓住、把握现实方面绝对决定性的一步，而这个现实远远超出我们在现实原则中所谓的“现实”。它是一个概念，不是对无能为力的承认，不是在某种不可还原之物、最终不可言说之物面前停步；它是一个概念。

现在，我们试着迈出几步，去接近这个概念。既然话已说到这里，我认为最终必须从您昨晚向我们提出的东西出发，也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注1]，而那无疑确实符合黑格尔向我们阐明的东西。黑格尔整个体系都关乎意识。不过很清楚，在黑格尔那里，Bewusstsein 与其说接近意识，不如说更接近知识。问题在于知识的进展。我认为，分界确实就在这里。

> [注1] 参见让·伊波利特：《黑格尔的现象学与精神分析》，载《精神分析》第3期，法国大学出版社（PUF），1957年，第17—32页。

尽管如此，我昨晚还说，如果我们没有全都守在界限以内——当时整个会场十分守规矩——一旦有人越出去，我就会提出一个问题：

“非知识在黑格尔那里具有什么功能？”

我们需要您下学期再作一场报告，专门向我们谈谈这个问题。不过，按照您看待事情的方式、按照您昨晚向我们讲述的方式，这里无疑关乎知识的进展。方才我们谈到未来前景、人类的未来、历史的目的，以及我们治疗的终点——这丝毫没有让我们离开弗洛伊德的关切。我昨晚已经强调，有若干文章告诉我们应当预见什么。

当人们排干本我的圩田以后，对无意识这片心理须德海——弗洛伊德曾在某处这样写过[注2]——的重新征服最终会带来什么？就人类产能而言，会有什么结果？正如我们方才已经充分指出的，这幅前景在他看来并不那么振奋人心。他觉得，堤坝恐怕还会发生几次决口。所有这些都写在弗洛伊德那里；我再次提起，只是为了表明我们仍在评述弗洛伊德的思想。

> [注2] 参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人格的不同机构》一讲末句，载《精神分析新论》；弗洛伊德以荷兰围海造田比喻“自我应当在本我所在之处出现”。

眼下的问题是要知道——我很高兴伊波利特先生在场，可以向他提问，看我是否沿这个方向走得太远——黑格尔视角向我们展示的所谓“实现”“历史终结”，以及人类共同体中某种显现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无论那是否叫作进步。依我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全部进展就是在座诸位；你们正为此而在这里。它的意思无非是：即使你们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始终也是木偶的牵线。若我说《精神现象学》的全部进展，总的来说是一种愈益精细的支配，伊波利特先生是否赞同？您接受这种说法吗？

让·伊波利特——这取决于您赋予“支配”什么含义。

拉康

我早料到了！好吧，我会试着加以说明。当然，我不会试图磨平棱角，也就是让我的术语轻松过关；恰恰相反，我会展示它在哪种意义上可能发生碰撞。让我来说明。

让·伊波利特

请别把我当成对手，我不是黑格尔主义者，我大概还反对它。别把我当成黑格尔的代表；我反对那种平庸的黑格尔式结论。

拉康

这会让事情容易得多。我只是请您告诉我，自己是否走得过远，以至于某些极为重要的文本可能反驳我；毕竟，您比我更专精黑格尔。那么，一种愈益精细的支配。我想说明它，好让刀锋究竟落在哪里变得清楚。其实，它是不是黑格尔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我知道它确实是黑格尔，因为黑格尔毕竟就是黑格尔。正如我常说的，我不太喜欢人们声称“已经超越黑格尔”，就像他们说“超越笛卡尔”等等，“超越一切而且总在超越”；这样做的人只是原地不动。那么，让我们说明这种精细的支配。“历史的终结”就是绝对知识，无法绕开。如果意识就是知识，那么意识辩证法的终点就是绝对知识；黑格尔正是这样写的。

相关知识卡 黑格尔的主奴关系、劳动与密涅瓦的猫头鹰

让·伊波利特

是的，不过黑格尔可以被解释。即使在《现象学》中，人们也可以追问：“绝对知识”这一章是在告诉我们，经验的连续进程中有一个时刻

会作为绝对知识出现；还是说，绝对知识存在于经验的整体呈现之中？也就是说：

- 绝对知识是否始终伴随现象学意识的每一种状态？我们是否无论何时都始终处在绝对知识中？
- 还是说，绝对知识是一个时刻？换句话说，我们能否把现象学想成卡夫卡笔下那个一直走到门前的人物，门上写着“绝对知识”？《现象学》中是否有一连串先于绝对知识的阶段，接着拿破仑或任何人最终抵达一个叫作绝对知识的阶段？

黑格尔多少这样说过；不过幸好，我们也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黑格尔。特别是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解释，虽带有倾向性，却是可能的。幸好如此；正因如此，人们无法超越黑格尔。

绝对知识这个概念完全可能在每一次都内在于《现象学》的每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绝对知识，只是意识错过了它：意识把本来会是绝对知识的这项真理，变成另一个并非绝对知识的自然现象。因此，绝对知识从来不会是历史的一个时刻，而始终会是……绝对知识就是经验本身，而不是经验的某个时刻；是带着诸种在场与缺席的经验本身。也就是说，一旦封闭在场与缺席的场，身处场中的意识便看不见这个场。看见这个场，就是绝对知识。

拉康——尽管如此，黑格尔那里的绝对知识本身还是体现为一套话语。

相关知识卡 黑格尔的主奴关系、劳动与密涅瓦的猫头鹰

让·伊波利特——是的，是的！

拉康

昨晚，您特别强调了我们总的来说可称作“意识的第三阶段”的东西。首先是无意识的意识——如果可以这样说——然后是话语的意识。也就是说，主体通过让自身得到承认而承认自身的时刻，并不是纯粹而简单的东西——您的报告在某个时刻似乎回避了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无论我本可从中取得多少荣耀——如果你们认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整个关系竟会如此镜像化……

我仍然认为，这里引入了某种东西；例如，您一度称它为意识为自身辩护、为自身行动给出理由。正如您所说，在黑格尔理论中，从原则上没有理由不让一切不仅可以被证明为正当，而且已经得到证明。不过，无论我们怎样看待这里表现出的某种恒常性——我想，我回答您时已经强调过这一点——一切始终都在那里：全部历史总是当下在场，在垂直意义上在场。事情不可能不是这样，否则它只会变成一种幼稚故事。

然而，仍有一点：尽管绝对知识从最早的尼安德特“白痴”起便已在那里，它终究体现于一套话语之中。我认为，黑格尔的文本本身甚至会给出十分技术性的精确说明：关键在于话语闭合到自身之上，也就是说，它与自身完全一致，一切都连贯并得到证明；一切能够在话语中表达的东西都是如此。就这个意义而言，在话语表述的意义上，终究有某种东西必须到来。

我就在这里打断您并提出问题。我们缓慢地、一步一步前进；为了走得稳，宁可走得慢。今天，我原本想说的东西连四分之一都说不到。不过，这会把我们带到所寻找的东西那里，也就是弗洛伊德相对于黑

格尔带来的意义和原创性。你们会看到，这绝对至关重要；它是同一维度的现象。

让我们回到黑格尔。我一步一步来。伊波利特先生，既然这一点得到承认，我来阐明自己的想法。我谈过“精细的支配”，你们会看到它与我们的技术问题何其相关。只要我们承认如下说法——即便它或许不见于某些文本，我觉得也并不陌生于黑格尔……

不必介意黑格尔的文本极其多样，

甚至他思想、生命和政治行动的不同阶段也朝着彼此分歧的方向说话

……那么，用如下说法来阐明“精细的支配”，我是否说得过头了？归根结底，如果我们把绝对知识看作终于抵达完成的话语……

先把这一点放在一边：一旦话语抵达完成，

人们便不再需要说话——这就是所谓革命后阶段；让我们先不谈它

……那么，我所谓的“精细的支配”就是：当话语抵达完成时——我是说，仅仅从黑格尔式视角看……

稍后或下次你们会看到，我所谓的超黑格尔视角是什么，

以及它们为什么可以从黑格尔视角内部被构想

……这套作为绝对知识之化身的完成话语，正如它在尖端、在透视中、在理想里显现的那样，是知者的权力工具、权杖与所有物。没有任何东西意味着所有人都会分享它。

当我昨晚谈到的那些学者……

这里谈的是某种不止是神话的东西，它确实就是符号进展本身的意义

……终于封闭人类话语时，他们便拥有了它；那些没有话语的人只好去玩爵士、跳舞、如此取乐——这些乖巧的、可爱的、力比多旺盛的人。

这就是我所谓的“精细的支配”：无论支配被推进得多么精细，主人的功能仍然体现在知识之中。因此，最终仍有一道分割、一道可以说是人内部的本体论分离。这十分奇怪！因为它把我们带到黑格尔超越某种宗教个体主义的核心之处：个体不再从自身同上帝独一无二的面对面中取得存在，而是被展示为——可以说——每一个人之半的现实都存在于另一个人的存在之中。

相关知识卡 黑格尔的主奴关系、劳动与密涅瓦的猫头鹰

可是，归根结底，这里仍有一种相互异化；正如您昨晚完美展示的，它仍不可还原，而且——我要强调——可怕地没有出路。就每个时刻来看：在主人与奴隶的最初分割中，还有什么比原始主人更愚蠢？那才是真正的主人。

相关知识卡 黑格尔的主奴关系、劳动与密涅瓦的猫头鹰

我们终究活得够久，足以看见人类一旦重新被支配欲攫住会发生什么！战争期间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那些意识形态上自以为是主人的人犯下政治错误，以为只要伸手便能取得、抓住某件东西。德国人向土伦进发、试图夺取舰队的故事，正是一个真正属于主人的故事；然而全部支配其实都在奴隶一侧，因为奴隶正是在对抗主人的过程中精细地建构自己的支配。

我们把这种相互异化一路看到尽头，甚至看到终局。试想，在终局处，那套精心建构的话语在街角咖啡馆里玩爵士取乐的人面前会多么微不足道；主人会多么渴望前去加入他们。与此同时，反过来，那些人却会把自己看成不值一提、受到蔑视的可怜奴隶，并以为主人在主人的享乐中何其幸福——而主人当然会受到充分而彻底的挫败。我认为，无论如何，黑格尔最终把我们带到的极限就是这里；这确实非常奇怪！

其中的理由，会在我指出此后已经迈出的那一步时变得越发明显——即使只在对人的研究层面也一样：当人们真正懂得如何询问人时，他能给出什么？这就是弗洛伊德带给我们的东西。弗洛伊德是否由此走出了人类学？还是扩展了它？或者，我们还能否纯粹而简单地谈论人类学？问题的意义就在这里。弗洛伊德是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文主义者？对黑格尔而言，这显然已经处在极限。

至于弗洛伊德，我认为他已经走了出去；弗洛伊德的发现恰恰是：人并不完全在人之中。接下来我会试着向你们解释原因。让我们从一些十分简单、基础，却仍值得提醒的事情出发：你们会说，弗洛伊德是一名医生。

然而，他出生于1856年，比黑格尔——生于1770年——晚了将近一个世纪。其间发生了许多事情。我想请你们注意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并且注意：弗洛伊德在这里能够赋予“医生”一词的含义，与其间发生的历史事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换言之，弗洛伊德并不是埃斯库拉庇俄斯、希波克拉底或圣路加那样的医生。他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医生，多少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总的

来说，他是一名已经不再是医生的医生。今天，我们所接受的医学训练越来越多，而我们也同样属于一种完全脱离医生在人类那里一贯传统的医生类型。

事实上，只要笨拙而愚蠢地指出如下根本命题……

这个命题本身带着一种真正奇怪的不连贯性，只是人们没有留意；

只需留意一下，就会知道自己说的话何其滑稽

……“人有一个身体”——他有一个身体——便很清楚，对我们而言，这立刻就有意义。

它大概一直都有意义，只是对我们比对任何人都更有意义。因为借着黑格尔、而且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因为人人都是不自知的黑格尔主义者——我们已经把人与其知识的等同推进得极远，而这里的知识当然是某种积累起来的知识。被定位在一个身体里，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这种奇异性绝不能被轻描淡写，尽管人们总是扑扇着翅膀[如此]宣称：

> “我们重新发明了人的统一性；从前人们把一切都分开了，那个笨蛋笛卡尔把它彻底切碎了……”

很清楚，我们仍面对这项功能。这里有人，有那些属于人的东西，尤其有全部积累起来的知识；而人还得解释自己所面对的这台奇怪机器，却尚未弄明白该从哪一头着手。

发表“回归人的统一性”之类的宏大声明毫无用处，无论是托马斯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还是〔……〕[注]身体形式以及其他胡扯，都无

济于事。分割已经一劳永逸地完成，问题正是在这里。正因如此，今天的医生不再是古往今来的医生——除了那些总在设想气质、体质和其他此类东西的人。

> [注] 此处法文底本有缺文，“身体形式”之前的连接内容不可见。

尽管如此，医生面对身体时，采取的仍是一个人拆卸机器并把身体本身当作机器的态度。无论作出多少原则声明，这种态度都是彻底的；问题就在这里。弗洛伊德正从这里出发。这正是他的理想：做病理解剖学和解剖生理学，发现这套小装置、这个构造、这个摆在那里的复杂东西究竟有什么用；而它尤其体现于神经系统。

这里有某种令人不安、令人震惊的性质。某整条思想路线试图借助各种善意的理论构造——如格式塔主义和其他此类东西——退回去，作出种种小小的回返，仿佛要回到自然的善意和预定和谐。然而，这绝不应蒙蔽我们；只要仔细观察，这件事根本不会在那个意义上显得震惊。

这个视角分解了生物的统一性，并不是它必须震动我们、令我们惊恐，促使我们加以补偿、纠正和重新考虑的理由。问题不在这里。当然，没有任何东西证明身体是一台机器；不仅没有证据，而且它极有可能根本不是机器。重要的是，人们确实以这种方式着手处理这个问题。

我说的是“人们”；方才我已经点出其名：这里的“人们”大致就是笛卡尔。当然，他不是孤身一人，我甚至会向你们证明原因。必须有许多事情先行发生，事情才会成为可能；尤其是，要让他开始把身体思考成一台机器，就必须先有一台足够醒目的机器，不仅能自行运转，还

体现了某种格外引人注目而且属于人的东西。当然，在这一切发生时，没有人意识到正在发生的正是这种现象；但如今稍稍拉开距离，我们便能看清它。

因此，这个现象发生在黑格尔以前很久。就此而言，甚至可以说，黑格尔对此参与甚少；他也许真是某种古典人类学最后的代表，而且相对于笛卡尔，归根结底几乎落在后面。

我说的机器就是时钟。在我们的时代，很少有人仍会对时钟究竟是什么感到足够惊叹。依我记忆，路易·阿拉贡在《巴黎的乡下人》中谈过它；只有诗人才能以那样的语言，向一件事物全部的奇迹性质致意。他说，那种东西无论人在场还是不在场，都在追随一个属于人的假设——他谈起它时用了何等语调！我得重读原文才能展示给你们。当然，问题不在这里。

当时已经有时钟。它们还没有那么神奇，因为《方法谈》以后还等了很久，才出现一台真正优良、带摆锤的时钟；惠更斯先生还得亲自插手——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提过。人们已有靠重锤运行的钟；不管走得准不准，它们总算体现了某种东西。显然，我们必须在历史中走过一段距离，才能意识到知道时间对我们所谓的“此在”何其关键。因为无论人们怎样说这个时间或许并非真正的时间，时钟里的时间终究就这样独自从容地展开。

从这里出发，只需翻开一本叫作《论人》[注3]的书——我再怎样推荐你们阅读都不为过，而且必须读带插图的版本。价钱应该不贵，你们可以便宜地买到《论人》；它并不是最受推崇的著作，比牙医们钟爱

的《方法谈》还便宜。它值得翻阅，也值得仔细核验：笛卡尔在人身上寻找的，正是时钟。

> [注3] 勒内·笛卡尔：《论人》，载《著作与书信》，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53年，第805页。

可以说，问题从这里开始发展；孔狄亚克以及我上次顺带提过的雕像也沿着这条线索——以后我或许会证明它何其脆弱。不过，这台机器并不像空泛的众人所想的那样，纯粹是生物的反面、生命的仿制品，或经过虚假赋活的惰性悖论。它被造来体现名为时间的东西——也就是奥秘中的奥秘——仅仅这一事实，就应稍稍给我们指路。

简言之，同一时代还有一位名叫帕斯卡尔的人，开始制造一台机器——一台十分朴素、用来做加法的机器。人们同样没有多么重视这位心灵的关切，而这个心灵通常可不是只受情绪和任性穿行！这同样有其意义，因为它进一步向我们表明这些机器代表什么：它们同本质上、彻底地、根本地——达到一切可能程度——属于人的功能，有着比任何其他现存事物更加内在的联系。

换言之，人的机器并不纯粹是一件人工制品，不像椅子、桌子或我们生活其间的其他多少带有象征性的物品——我们甚至没意识到它们正是自己的画像。机器恰恰是另一回事；它比建造者本人所猜想的还要更深入地走向我们真正所是的东西。

我所要抵达的是：这里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 如果黑格尔把自己看作某种大写的精神，看作精神在其时代的化身；
- 如果他还幻想拿破仑就是 Weltseele、世界灵魂，是另一个更女性、更肉身的极点，是……

力量的极点

……那么，拿破仑与黑格尔两人却都以如下事实出众——人们已经指出过：他们彻底误认、忽略了当时正开始显露，而且已经显眼到足以引人注意的一个现象——蒸汽机。瓦特毕竟很快就会到来。当时还有其他东西：矿井里的小型泵，以及各种自动运转的装置。这十分重要……

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机器的重要性。我要说的是：人最彻底的象征活动正体现于机器之中。只需再迈一步，我们的问题就会在真正的层面上被提出——也许你们身处这一切之中，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弗洛伊德那里有一种人们谈论的东西，却从来没有在黑格尔那里被谈论。它是一项主要关切、一项支配性的关切；从思辨观点看，它比昨晚那种纯粹由同名异义引起的混乱更加决定性、更加重要——昨晚我们谈的是黑格尔时代的“意识”与弗洛伊德时代的“无意识”之间的对立。

这就像谈论帕特农神庙与水力发电之间的矛盾，二者根本没有关系。真正的差异在于，人们开始谈论能量。正如我上次向你们指出的，只

有机器出现以后，这个概念才可能出现。并不是说能量此前不存在；开垦空间时，涉及的当然也是能量。

只是这里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人们从来看不见最直接的东西。拥有奴隶的人从未真正意识到，可以在奴隶食物的价格与他们在大庄园中的产出之间建立等式。利用奴隶时，没有任何能量计算的例子。你们可以读加图，也可以读那些极其严肃地讨论经济的人；他们从未做过这类计算。人们无法就奴隶的产能建立哪怕一个等式。

人们必须等到拥有机器以后，才意识到机器也必须被喂养。同时，人们还发现了一件事，而它正是为何必须意识到机器需要喂养的关键：机器还有另一项特征——必须加以维护，因为它们趋于劣化。奴隶也一样；但对奴隶，人们恰恰不会想到这一点，而只把他们衰老、死去当作自然之事：人们从未思考过。

这还把事情引得更远：人们开始注意到此前从未想过的事情——生物会自行维持。换句话说，它们代表着稳态器。从这里开始，你们可以看到我所谓的现代生物学概念开始显露；其特征是从不引入任何关乎生命本身的概念。

这里有两件事：

- 关于生命的活力论思想时期：人们谈生命，在维持生命原创性的前提下思考它；
- 另一个叫作“生物学”的时期：谈论生命时，恰好按照现代生物学奠基者最清楚的表达来思考。这位英年早逝、雕像装点着旧医学院的人——比沙——说：

“生命是抵抗死亡的全部力量。”

尽管此人仍保留着对上帝的某种模糊信仰，他却极其清醒，知道人们已进入一个新时代，生命即将开始相对于死亡得到定义。这与我正在向你们解释的内容汇合：对机器的参照在奠定生物学方面具有决定性。

所有生物学家都相信自己献身于生命研究，而且天知道我们在生物学观点上已经取得多么巨大的成果。但人们并不总能明白原因，因为直到另有通告为止，他们的基本概念无论多么富有成效，本质上都源自一种与生命现象毫无关系的东西。生命在其本质上仍完全是从外部被把握的，无法穿透；种种表现已经充分说明，那些所谓生物学概念始终彻底不适切。

这并不妨碍它们保有巨大价值。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会试着向你们展示这种价值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它不是相对于生命现象的价值——无论人们做什么，尽管一再断言自己越来越接近它，这个现象仍不断逃脱——而是这些概念在照亮理解人这个秩序中的某种进展时取得的价值；不妨说，是它们在别处的价值。

正因如此，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对我昨晚表示赞同感到惊讶。当时我们正在寻找这个“超越”、这个第三项或第三个术语，试图理解人际辩证法的关键发生在何处；弗朗索瓦丝〔多尔多〕却给我们带来了生物学。我们可以说，真理从一个天真说出它的人口中出来；她所想的生物学也许与我将要向你们解释的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必须到那里去寻找，确立下一个点，才能充分理解问题所在。

我们将以反语来理解“生物学”：它与生物学毫无关系。它被写进这样一章：其中进行某种符号操弄，并援引若干尤其属于能量学的要素；对稳态参照的强调显然使人不仅能够刻画生物本身，还能刻画其主要装置的运作。

你们看得很清楚，弗洛伊德的全部讨论都围绕这一点旋转：“从能量角度看，它是什么？它怎样运作？”他所谓生物学思想的原创性就在这里。他并不是生物学家，我们之中也无人是；但在他的全部著作中，他始终把这种能量功能置于前景。他正是围绕这一点，想到要提出《超越快乐原则》的问题：

- 如果我们懂得理解弗洛伊德那里关于心理内部运作的所谓半能量学表述中含有什么；

- 如果我们懂得揭示其意义，也就是说，能够看见在弗洛伊德问题上、在他笔下显露出来的东西——它从一开始便已蕴含在把人体当作机器的隐喻之中，却未被人理解。

我们便会看到，这里显现出某种超越人际参照的东西；你们将会看到，它确切说来就是象征的超越。到那时，我们就会理解——一定能够理解——弗洛伊德经验所代表的那种曙光。

因为他正是从这里出发：神经系统总是倾向于回到某个平衡点的构想。他从这里出发，是因为当时每一位抵达那个科学时代的医生在面对人体时，心中都会被迫接受这种必然性。

当他试图构造这套神经系统运作理论时，却在如下东西上绊住了……

我请安齐厄阅读我所说的那些草稿（drafts），也就是《科学心理学纲要》，

并向我们作一份报告。他会向我们展示这个大规模事实：一切最终都汇入梦

……他完成了整个构造，试图展示大脑如何作为人与现实之间的缓冲器官、作为稳态器官运作，却最终在梦上撞住、绊倒。

他发现，大脑是一台做梦机器。正是在做梦机器中，他重新发现了某种当然本来就一直在那里、却始终未被察觉的东西：在最具机体性、最简单、最无意识、最直接、最无法操纵的层面，意义与言说会完整地显露并展开。

于是，一场彻底革命发生了：他转向《梦的解析》（Traumdeutung），从此前所谓“生理学化”的视角，转向一种被极不恰当地称作“心理学化”的视角。问题根本不在这里：他发现的是符号本身的运作。转折从这一刻发生。

他必须就这项发现究竟是什么作出抉择：接受它，或者像身边所有同样接近它的人那样误认它。这里发现的是符号的显现——以辩证状态、语义状态，以及置换、双关、文字游戏、种种玩笑的状态显现；这一切独自在做梦机器深处自发运作。这个转折如此巨大，以至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作出这项发现时，他的人生已经相当晚；此后还必须再走过二十年，才能试着返回自己的前提，也就是重新找出它在能量层面意味着什么。正是这迫使他围绕《超越快乐原则》和死本能完成全部重新建

构。在这次重新建构中，可以看出我们昨晚所需要的东西究竟有何意义：除了人对相似者的参照之外，还必须构成第三项；自弗洛伊德以来，人的存在实现之真正轴线正位于这里。

当然，今天讲到这里，我还不能为它命名。你们会看到，在凸显、澄清、命名并准确定位这个第三项的意义方面，我们将迈出关键一步。

不过，为了不让你们完全面对一个谜，我立刻指出：它位于今天所谓的沟通辩证法的建构之中。它正在现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层面显露、揭示自身，同时带着一片混乱——每当事物显得完整而完美时，都会如此。不过，我们会试着凭借自己的罗盘、尤其是弗洛伊德罗盘，在其中确定方位。

第7课 · 1955年1月19日

先作一个小小的回顾：我们要追问昨晚那场非凡的报告。你们有什么感受？你们是否在其中多少找到了自己？

总体而言，报告保持了很高水准。讨论中的不和谐与分歧出奇地少，不像这类场合的讨论通常那样。我非常满意。不过，你们是否看清了问题的核心？我甚至要问：梅洛-庞蒂仍不可还原地与我们保持着怎样的距离？而我试图向你们展示的，正是分析领域、分析经验真正原创的分界点。我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仍鲜明地记得《知觉现象学》——我原以为大家不仅知道，而且已经把它纳入自己的思考；那本书本身就是一整套纲领。对谁来说，它仍然很鲜活？

让·伊波利特

在我看来，《行为的结构》比《知觉现象学》原创得多。

拉康

有一个术语可以标出技术上本可展开讨论的焦点——倘若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圣安娜医院一晚聚会的短暂时间——那就是格式塔主义。不知你们是否在途中注意到它。它一度浮现为梅洛-庞蒂衡量同他者、同现实相遇的真正尺度和标准；“意识”一词也是如此。很明显，那套论述在那里被组织进一项经验，而这项经验最终又通向另一个术语；这个术语确实位于梅洛-庞蒂全部教导的底部，尤其是他眼下所关心、所陈述的东西底部——归根结底，就是“理解”。

尽管他试图同自己所谓传统的自由主义立场拉开全部距离，可正如有人恰当地向他指出的，他其实并未远离多少。因为归根结底，他唯一向前迈出的一步，就是确认有些东西难以下咽、难以理解。你们知道我在暗指什么。他以当代政治经验为参照，绝非偶然。你们知道，同共产主义的对话破裂令他极为烦恼，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心思；在他看来，这正是人类经验的关键例子，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场历史危机。

他一方面确认人们无法彼此理解，另一方面又重申必须理解；他最近在一份周刊发表的文章——一种多少有些文学性、甚至新闻性的文字表现——标题就叫《必须理解共产主义》，这颇为悖谬。同时，他又确认自己的观点无法被理解。昨晚也是一样；他向你们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奇怪的是，他在作出并确立这组平行关系时，竟没有看到其中有什么。

也许因为对分析领域不够熟悉，他没有把我们本来希望看到的研究推进得足够远：这里究竟能否适用“理解”这个词？换句话说，分析这个领域最终即使一开始并不同质，是否也能抵达同质状态，也就是一切都可以被理解？这正是让·伊波利特先生提出的问题；很遗憾，他昨晚没能把自己在梅洛-庞蒂报告后立即说出的话当场讲出来：

“我们究竟能否说，弗洛伊德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

梅洛-庞蒂的立场本质上属于人文主义，我想伊波利特先生方才说的就是这一点。人们也看得出这把他引到哪里，更准确地说，他诉诸甚至几乎攀附在哪条道路上：那就是“总体”这个概念，以及统一运作的全

部概念；所有这些都倾向于借助同一参照，解决问题、区分、解释和机制建构。

我们找到一种既成的统一性，它可以被一套正在建立的言说触及，也可以被一种最终还原成瞬间的、理论的、观照式的把握所触及。心理格式塔这种极为含混的经验——我是说，它在这套理论化中的含混性——为这种把握提供了某种表面上的实验支点。我说“表面上”，当然不是说它不对应可测量事实和丰富的实验成果；“良好形式”这个概念无疑是我们构想活生生现象学的关键枢纽。困难始于：它是否真是一种理论动力，而不是仅仅依靠玩弄一种根本歧义来维持？这些歧义已被指出得足够多，我无须在这里重复。

相关知识卡 格式塔心理学的“良好形式”与拉康的批评

这种歧义全部存在于物理学与现象学彼此混淆之处：水滴形成球状，与我们总倾向于把自己看到的近似形状拉向圆形，这两件事被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这里当然有某种形象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能够构想二者的对应及其形成方式。

可正是这一点含混不清，使根本问题在那里遭到某种省略。比如，若确实有某种东西倾向于在视网膜底部产生这个“良好形式”，那么我们可以把握它同物理世界中某种倾向于实现类似形式之物的关系。但若想把二者彼此联系起来，我认为这绝不是一种能够充分解决丰富经验的方式。

然而，人们便不能再把意识维持为生存论意义、生活体验意义上的现象学核心，正如梅洛-庞蒂向我们许诺的那样——也就是维持意识的优先地位。归根结底，意识本身会变成一种机制。梅洛-庞蒂没有意识

到，它在这里发挥着我所提出的那项功能：这是自我辩证法奠基的第一个时间，却也正是为了同它分离。只不过，对梅洛-庞蒂而言，一切都在意识之中，都在观照意识通过一系列综合和交换构成世界的事实中；它在每个时刻把世界组织并定位于一个更具包容性、不断更新的总体中，而这个总体始终起源于主体、起源于人、起源于观看自身的人。〔转向让·伊波利特〕您不同意吗?

让·伊波利特——我正在听您从格式塔出发所展开的思想运动。

拉康

归根结底，你们稍后会看到，我们还会再谈：这是一种想象界的现象学，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谓想象界的现象学。

奥克塔夫·曼诺尼

不过，它仍可能超出想象界的平面。我认为，思想中的格式塔之起源、格式塔思想的萌芽，存在于达尔文失败这一事实中。当他以突变取代变异时，便发现了一个会给出良好形式的自然。问题由此产生。格式塔似乎是一场重新收回这些形式之存在的运动；这些形式并非纯粹机械性的，恰恰超出了机械性。

拉康

当然。您刚才说的又向前迈了一步，而我没有这样说，因为我不愿把它强加到梅洛-庞蒂所处的平面之外。这样一来，我们便会回到神秘的创造力，归根结底回到某种活力论；全部问题正在这里。

弗洛伊德所作的整项人类学发现——我眼下正沿这个方向带领你们——难道不是按照一种极为严格的历史进展，彻底朝着任何活力论的反方向展开吗？所谓活力论，就是某种定向论；弗洛伊德在作品中每次提到它，都是为了明确摒弃它。它从根本上认为，生命有一种进步趋势，会创造越来越高级的形式；认为有机体会实现越来越大的和谐，变得越来越精细；认为自然会产生越来越完美、越来越整合、越来越朝向和谐而得到良好"建构"的东西——正如昨晚人们所说。

弗洛伊德的精神在作出选择时，极少从哲学立场或原则立场出发……

不妨假定——我完全愿意承认——引导并指引他的是他对人的经验

……那么，他出发时所依据的人的经验，恰恰就是他的医学经验。从他的精神开始形成时起，他所做的这件独一无二的事，就是理解如下东西的意义……

他突然把它定位在人的某一类痛苦与疾病的界域中

……也就是这场根本冲突的意义。

任何内在于生命运动的进步思想、任何创造进化论，以及这种实现形式的倾向，都不能〔……〕[注]这场根本冲突……

> [注] 此处法文底本有缺文，无法确定 apporter 的完整否定结构。

我们在这里甚至重新遇到格式塔，不过恰好是在其歧义之中，

也就是"格式塔"一词与最广意义上的"形式"一词相接之处

……把任何创造更高级形式的倾向视为对世界的某种解释方式，对弗洛伊德而言都必须彻底摒弃，因为这与人的经验给予他的根本冲突截然相反。

而他眼中这场在人类存在中发挥作用的根本冲突，把他引向了一个无疑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我不知道这些范畴是否属于哲学，但它们必然是形而上学的，并且把他引向一种根本二元论——严格说来，一种把自身表达为冲突的二元论。

恰恰因为这场冲突不只扎根于发出它的人类存在，它才把弗洛伊德引向某种超出人的东西；正是在这里，他在《超越快乐原则》的层面被真正抛向某种东西……

- 它必然属于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范畴和章节标题；
- 严格说来，它越出了从机体意义上讲专属于人的领域界限。

人类存在在这里通向一场超出自身的冲突。弗洛伊德带给我们的不是一种世界观，而是一种秩序、一组思想范畴；具体主体的全部经验都不得不以其为参照。

让·伊波利特

我完全不否认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危机。不过，他谈到死本能时，把力比多与之对立，并把力比多界定为一个有机体同其他有机体结成群体的倾向，仿佛那是一种进步和整合。至于无生命物质，他反倒感到遗憾，并且说那里会有一种回返、某种解离和返回。尽管其中有〔……〕[注]柏拉图式的东西，我们却不能对生命作同样的说法。人们

很愿意承认，那更像是回到某个已在其总体性中被给予的东西；可是这说不通，它只是神话。

> [注] 此处法文底本在 platonicien 前有缺文，无法确定被修饰的具体成分。

所以，不论您所说的、使他在生命和人的观点上并不乐观的那场不可否认的冲突如何，他那里终究还有某种力比多观念——相对于死本能的发现，这个观念其实界定得很糟。他确实肯定有机体越来越高度整合，而且说得很明确。我谈的是弗洛伊德的文本本身，而不是他精神中的冲突；对于后者，我完全同意您刚才所说的。

拉康

我明白……请仔细注意，这种“结合倾向”——他确实说，爱欲（ἔρως）倾向于结合——始终只能在同“分割倾向”、同破裂以及尤其是无生命物质重新弥散的关系中得到把握。二者严格地不可分离。因此，没有哪个概念比它更不统一。他恰恰只依据这种回归多重分散的倾向来思考爱欲（ἔρως）。

让我们一步一步重来，之后会更清楚应当赋予它什么意义。上次，我让你们停在能量概念的引入所产生的问题上；这种引入与一个我们可以掌握的历史事实相关，而这个事实插在黑格尔与弗洛伊德之间：机器世界的降临。它开始用极具特征、象征精度非凡的术语提出能量概念。

我曾向你们指出……

今天我不想让你们留得太晚，所以会尽量给出几条总线索；此后对文本的评述必须在这些线索内部找到位置，而第一篇就是我今天交给安齐厄的文本

……我会立刻试着把自己的灯照得比上次再亮一些，虽不能照亮全部，却会照得足够清楚。

我们抵达的僵局位于快乐原则之外，可它却向所有人显现为与快乐原则同在的一种奇特歧义，甚至混淆。

如果快乐原则就是恢复已被精确构想为一台机器的有机体平衡的倾向，那么这种回到某个平衡状态的恢复性倾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初看弗洛伊德文本时，很难同无疑构成新事物的重复性倾向区别开来。他的文本所带来的原创之处、我们抵达的僵局，就是：重复性倾向与恢复性倾向究竟有何区别？

相关知识卡 重复强迫：恢复性倾向与能指链的坚持

这篇文本采用的手段十分奇特，因为它遵循一种循环辩证法。他不断回到一个仿佛总在逃脱的概念；这个概念唯一的阻抗，就表现为他不停步，而是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尝试维持重复性倾向的原创性。它是否只是基本快乐原则的又一次延续和外推？这里涉及的显然是别的东西。无疑，他缺少某种属于范畴秩序、或也许仅仅属于形象秩序的东西，因而无法让我们充分感到重复性倾向与恢复性倾向之间的凸显、原创性和区别。

相关知识卡 重复强迫：恢复性倾向与能指链的坚持

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被我带到伊波利特先生在报告后愿意说出的形式。我们当时讲到了这里。现在立刻注意快乐原则应用中的一项歧

义。从弗洛伊德作品开端直到末尾，每次考察它都会显出如下意思：一项刺激被带给这个生命装置；神经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台稳态器的主要代理者，是专门化的关键调节器；生物借助这台稳态器持续存在，而相应的倾向就是把兴奋降至最低。

你们若阅读分析作者，就会看到他们极端困窘：他们不断滑下那个斜坡，而弗洛伊德对问题的辩证处理方式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这个斜坡。弗洛伊德在这里又给了一次误解的机会；他们走到这个平面时惊慌失措，齐声扑了上去。必须降至最低的兴奋究竟是什么？

因为“最低”可以有两种含义，所有生物学家都会同意：

- 在给定一套系统平衡定义的条件下，把张力降到最低；
- 或者，纯粹而简单地把张力降到最低；就生物而言，这意味着：

没有比死亡更低的张力；从生物的观点看，

一切张力都会被降到零。

其实，这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如果我们不在这里作出一道明确切分和区分，也可以认为死亡之后的分解过程会直接延续我们刚才界定的过程。这样一来，快乐原则只有在生物彻底而最终的溶解中才会抵达终极完成，也就是还得穿过从尸体状态到尸体具体溶解之间的整个场域和空间。

这种说法显然有所滥用，只是一时不容易看出。若把“把张力降至最低”本身设定为生物的调节原则，它就不能被视为快乐原则作为运作调

节原则时所指的东西。然而，你们会看到，我立刻就可以引用好几篇文章，它们的基本原则把“把张力降至最低”直接当作生物之死：

- 这等于假定问题已经解决；
- 这等于把快乐原则同人们以为弗洛伊德用“死本能”这个标题所指的东西混为一谈。

我说的是“人们以为”。只要阅读弗洛伊德，就会看到他谈死本能时，所指的幸好没有那么荒谬，不是反对一切、反生物学、反科学和连贯性的反面。人们从快乐原则中推出的东西，不同于弗洛伊德所瞄准的东西：后者独立于快乐原则，倾向于把一切有生命之物带回无生命状态。他正是这样表达，也正试图把握这一点。更准确地说，这意味着：

- 他被迫思考这个东西；
- 迫使他的那些事情，与生物之死毫无关系；
- 迫使他想到它的是在人身上发生的表现。

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寻找的是：为什么在人身上的那些表现、人的生活体验、人际交换和主体间性，会迫使他无法逃避越出生命边界的必然性。

必须把一项把力比多带回死亡的原则本身纳入考察；但它并不以任意方式把力比多带回死亡，因为如果它通过最短路径抵达死亡，问题就解决了。它恰恰只会经由生命的道路抵达死亡。生物必须沿生命之路

通过，而且只能经由这条道路；正是在这一事实背后，那项把它带回死亡的原则才得到定位和辨认。它不能沿任意道路走向死亡。

换言之，机器自身会维持下去，画出一条特定曲线、一种特定的持续性；而另一个东西正经由这种存续显现。它在某种意义上受到这个既存存在形式的支撑，而这个形式为它指明通道。那么，再问一次：它是什么？

有一个问题必须立刻提出。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与弗洛伊德之间发生了某种事情，就不能不承认其中一个动力、一项首要而明显的关键铰接；可以用这个幽默公式来说："若有人从礼帽里掏出一只兔子，那是因为他事先把兔子放了进去。"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公式就是形而上学的最终结论。物理学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热力学第一定律"，也就是能量守恒。换句话说，要让最终有某种东西，开端时就必须至少已有同等多的东西。

不过还有第二定律：也就是说，在能量显现中——我会试着以形象化方式让你们感到——有高贵的方式，也有不那么高贵的方式。

换言之，有些事情一旦发生，就无法逆流而上。比如完成一项功时，在过程之中，一部分功会以热的形式耗散——这是那些实验的核心例证。人们无法再把这些热量转回等量的功；它停留在自身层次。这里有降落和损失，这就叫作熵。

相关知识卡 涅槃原则、熵与死亡驱力

弗洛伊德本人在著作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一点：我们面对的现象可以是物理逻辑中极其准确而具体的现象。他在《狼人》末尾谈过；我讲授

《狼人》时，已经指出弗洛伊德在这次引入中的意义。也许有一天我会重新讲到。

他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又回到这里。当然，他进行着第二次召唤，继续那场无法停步的循环追寻；由于未能彻底洞穿隐藏着的奥秘——我们正在这里正是为了这个——他无法停在那里。奥秘并不藏在熵中；熵毫无奥秘，它只是一个符号，是写在黑板上的东西，你们若以为它存在，那就大错特错了。

相关知识卡 涅槃原则、熵与死亡驱力

熵是一个大写的E，我们的思想绝对少不了它。你们即便根本不在乎这个大写E，也不能忽略它，因为一位名叫尤利乌斯·罗伯特·冯·迈尔的海军医生曾思考过这些事情，而它们正是如今一切的原则：无论管理一个国家还是一座工厂，不论是否原子能工厂，都不能不把它考虑在内。冯·迈尔先生是在给病人放血时，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思想的道路有时很晦暗，上帝的道路高深莫测

……这位先生奠立了这项原则；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改天再谈。

尽管如此，颇为醒目的是：在产下这项无疑属于思想伟大涌现之一的成果以后，他却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枯竭”了，变成一个能力大为受损的人。这很奇怪，仿佛我方才提到、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大写E的分娩，能够以某种方式铭写进神经系统。这一点绝非与我们的主题无关。你们若以为，我采取那些通常被看作反机体主义的立场，是因为——借用一位我很喜欢的人曾说过的话——神经系统令我厌烦，那就错了。引导我的绝不是这种情绪理由。

我认为通常的机体主义十分愚蠢，但还有另一种机体主义，它绝不忽略物质现象。眼下我特别瞄准的正是这种东西，它使我完全诚实地向你们说……

即便未必是在全部真理中这样说，因为真理恰恰要求人们在经验中寻找其踪迹，并作出一定反思

……就冯·迈尔先生的遭遇而言，我认为这绝非对那个不幸个体毫无影响：不知什么东西——瓦莱里先生所谓的"神圣语言"〔参见保罗·瓦莱里：《魅力集·皮提亚》末节〕——委任他，使大写E得以存活；这件事也许不可能毫无损害地发生。

顺带提醒你们，冯·迈尔先生的一生显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发生在这件事以前，另一部分在它以后，而以后便再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用通常的话说，他已经说完自己该说的。好吧，这个熵，也就是能量退化原则，被弗洛伊德遇到了；他清楚地感觉到，它同死本能有某种关系，但当然也无法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座位——我是说，一个可以稍坐休息的地方。于是，在《超越快乐原则》整篇文章中，他继续自己的地狱小圆舞，就像第欧根尼提灯寻找一个人。

相关知识卡 涅槃原则、熵与死亡驱力

这意味着，他正在告诉我们：在那个本可把它接上的地方，他缺少某种东西。他缺少的当然不可能像我马上会告诉你们的那么简单——在大写E后面加一个大写F或大写I；事情肯定并非如此，因为其中还有某种东西尚未得到完全澄清。

不过，现代思想正试图沿着经常含混甚至混乱的道路抓住它……

但你们不能否认自己正与它的分娩同时代；我还要进一步说，只要你们正在这里听我的研讨班，你们就全都正在翻入这场分娩本身，翻入这个同思想试图组织自身的维度本质相连的东西

……正试图找到其正确的符号，以及继大写E之后的大写F。

在事情的当前状态下，这个东西就是信息量。

- 有些人对此并不惊讶；
- 另一些人看起来像被吹懵了。今天我不会再沿这个方向走远。

我只提醒你们：根据最新消息，一切范畴和恒定量的建构、围绕沟通研究积累起来的实验总和及具体事实——虽然表面上与我们的关切相隔一定距离——都卷入了一场大冒险。没人知道它从何处开始；不妨说，它在电话工程师那里找到了一个重要时刻。迄今的建构看起来几乎正确，尽管仍不尽如人意。

问题是要在贝尔电话公司节省成本，也就是尽可能让最多通信通过同一根线路。在美国这么大的国家，少用几根线十分重要；必须尽量用最少线路传送通常经由这类传输设备流通的那些废话。人们正是从这里开始量化沟通；你们看得很清楚，它的出发点表面上与我们这里所谓的言说相隔得再远不过。

问题根本不是人们彼此讲述的东西是否有意义。你们凭经验已经注意到，电话里说的话从来严格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沟通确实发生了；也就是说，关键是能够辨认人声的调制，并且由于从中认出已知词语而获得那种理解的表象。

问题是要找到这种现象发生的最经济条件，也就是使人们认出词语；至于意义，当然无人关心。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它凸显了我所强调的要点：语言——这个作为言说之工具的语言——恰恰是某种物质的东西，而人们总会忘记这一点。

处理这个问题时，人们发现，根本不需要某种多少经过改进——后来已变成电子式——的装置在小纸片上记录的一切。归根结底，那始终是一台马雷装置，通过振荡来呈现声音的调制。只需截取其中一小片，大幅压缩整个振荡——我想，比例大约是十取一，甚至可以取得更少——设备就能完美运作。人们不仅能听见，还能认出线路另一端亲爱的他或亲爱的她；那颗心，以及个体对个体产生实际确信的东西，表面上都完整地传递了过去。

于是，人们开始编码信息量。信息量完全不意味着人类之间发生了什么根本事件；问题只是线路中流动、可以被测量的东西。

不过，仅凭这个事实，人们便迈出了关键一步：开始在信息层面提出整套辩证法，也就是一种二元论——通过〔1〕，或不通过〔0〕。也就是说，在什么时刻……

……它开始退化，在什么时刻不再是沟通。

心理学用一个美国词“jam”来称呼它。我请你们记住这个词，因为现实第一次作为根本之物，以这种方式出现：它是从混乱本身涌现出的概念，也就是沟通中那种不再成为沟通、不再传达任何东西的倾向。

于是，一个新符号被加了进来。这个新符号的引入，使一群叫作数学家的人得以进行某种工作……在数学的秩序中，我们确实知道，是否

进入某个象征系统，会决定人们能否接近现实的整个层次；而这个现实与我们贴得最近，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实际发生的事情。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如何正确运用这些大写E和大写F，便可能有资格、也可能没有资格谈论人际关系。

这本可成为我们昨晚对梅洛-庞蒂先生提出的一项反驳：象征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同每个人说话。当有人向他谈到封闭的主体性时，他说：

> “如果无法同他们说话，语言的根基便消逝了；而语言的根基在于它是普遍的。”

当然！只是人还必须进入这条语言回路，而且在谈论沟通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们将会看到，当我们谈论那个仿佛与之相反的死本能时，这一点至关重要。

问题沿着这个方向展开——我刚才正要告诉你们：数学家之所以有资格运用这些符号，是因为他们会使用它们；对他们而言，这些符号构成了一系列实验的中心——不是把实验协调起来，而是把它们组织起来。正是这些实验，使信息成为我们现实中目前最可信、而且恰好朝熵的相反方向前进的东西。

换言之，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提醒你们一个小例子——当然还有千百种说明方式——任何信息量的传递……

- 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
- 或从系统的一种状态到后继状态……恰恰朝相反方向运作：它抵消那种被称作能量退化的普遍倾向；在不承认信息能发挥作用时，人们正是这样构想能量退化的。

换句话说，人们开始研究热力学、也就是计算自己的机器究竟值多少钱时，把自己遗漏了。也就是说，他们像主人看待奴隶那样看待机器：机器就在那里，同他们保持距离，并且工作。他们只忘了一件事：签署订购单的人正是自己。可仅仅签署订购单这一事实，便在能量领域中显示出巨大重要性。谈到信息时，所谓〔信息？〕率涉及的正是这一点。

为了让人理解，我们讲一个小寓言，也就是“麦克斯韦妖”。它无非形象地说明了如下事实：如果信息被引入能量退化回路，就能创造奇迹。倘若麦克斯韦妖拦住所有运动太慢的原子，只留下那些多少带着疯狂趋向的原子，它便会使能量重新爬上总体斜坡；也就是说，它可以把原本退化成热的东西，完整地重新变成与退化前同等的功。这似乎离我们的主题很远，但我仍必须标出这个参照点；你们会看到我们怎样再次遇到它。现在，让我们重新从快乐原则出发；立刻恢复一颗天真的心，再次跳入那些歧义之中。

正如安齐厄下次会告诉你们，弗洛伊德谈神经系统层面的事情时，快乐原则就是：一项刺激出现，一切都开始运作、投入活动——传出〔离心〕与传入〔向心〕通路全部启动，好让生物重获安歇。我不知

道你们是否看出，从直观上说，这样定义的快乐原则，同“快乐原则”这个名称仍唤起的某种欢快气息之间颇不协调：每个男人都追逐自己的女人。到目前为止，人们一直这样看待它；在卢克莱修先生那里，这一点很清楚。总之，它相当愉快、相当振奋人心！

甚至分析家有时也会因不得不纳入在他们看来如此相反的范畴而绝望，于是提醒我们：归根结底，必定存在、确实存在……

只要看看事情如何发生：一只小动物在那里，看起来多么享受生命

……一种活动的快乐，一种对刺激的喜好。归根结底，尽管理论给予我们的东西朝着相反方向，人仍会追求消遣，会沉浸在游戏之中。

这里仿佛有某种既成的主体性之物，不仅原初，而且不能说它的语调同某种朴素感受毫不契合：比如，弗洛伊德在人的行为中引入力比多这个绝对关键的基本功能以后，人们很自然地会以为，力比多总归是某种颇为淫欲的东西——人们在追求快乐……那么！

然而，颇为醒目也颇为奇怪的是，这在理论上却被表达成快乐原则，而它总的来说断言：人所追求的最终是快乐的停止。当然，每个人多少都猜到了这一点，因为谁都知道这毕竟是快乐的终点、快乐曲线的终点。不过你们看，理论的侧面在这里同主体直观严格朝着相反方向：按照快乐原则的定义，快乐就是一种趋向自身终止的东西。快乐原则就是让快乐停止。你们同意吗？沿这个视角看看现实原则变成什么。现实原则恰恰通过这个简单意见被引入：过度追逐快乐会导致种种事故——手指被烫伤，染上淋病，摔得鼻青脸肿……

人们通常正以这种方式向我们讲述所谓人的学习的发生。接着有人说：“快乐原则同现实原则对立。”在这个视角中，它显然获得另一种含义。现实原则——这个术语最终颇为醒目而奇特——就是让游戏持续下去；也就是说，让快乐重新发生，让战斗不至于因为没有战士而结束。现实原则在于为我们节省、安排自己的快乐，而这些快乐的倾向与终点恰恰就是抵达停止。

问题就这样被提出。还必须引入另一点：人们也试图……当然，别以为分析家对这种思考快乐原则的方式完全满意，尽管它从头到尾都是整套理论绝对关键的基础。如果不在这个界域中思考快乐原则，就没有必要把它引入弗洛伊德；这一点绝对具有决定性。只要开始引入活动本身也有某种快乐这个概念，比如游戏的快乐，就会把我们全部的指引、立场，乃至分析思想的范畴本身统统推倒。

从这时起，我们甚至还要这种技术做什么？如果问题只是教人们体操、音乐和随便什么，那么塑形、教学、教育的方式便完全属于另一个界域，而不是分析经验。我并不是说它们没有功能和价值，也不是说它们不能在《理想国》中发挥关键作用。只需回到柏拉图的范畴，就知道它们何其重要。

其中的任务是：

- 让人进入某种幸福的自然运作；
- 让人重新汇入自身发展的各个阶段；
- 让有机体在每个阶段到来的东西自由绽放；

在适当的时机、达到一定成熟度时，让每个阶段拥有游戏的时间，

接着再拥有适应和稳定的时间，直到新的生命涌现。

这些范畴完全可以被构想，一整套人类学都能围绕它们组织起来。问题是：为精神分析提供根据的，是否正是这种人类学？也就是说，是否应当把人扔到躺椅上，给我们讲一堆蠢话。问题是这个与那个究竟有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柏拉图谈体操和音乐时，是否会理解精神分析是什么。

尽管表面如此，他也不会理解，因为二者之间有一道深渊、一条裂隙。我们正在借助《超越快乐原则》寻找的正是它。若要在我们的精神分析与心理学之间搭桥，仍有人试图引入某种东西：让人理解我们的分析家经验同学习之类概念的关系。人们以颇具吸引力、当然是隐喻性的方式，把这些概念重新带给我们。问题是：这个隐喻是否恰当？

人们怎么说？比如说，分析是对自由的学习。请承认，“学习自由”听起来十分奇怪。到了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用莫里斯·梅洛-庞蒂昨晚的话说——人们总该提高警惕。不过，让我们简单想一想：分析经验暗含着什么样的学习概念？最初的分析发现——创伤、固着、再现、转移——首先给了我们什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我说的是这个领域，因为我并不是说受分析者没有学习能力。在有限领域中，人们可以把学习现象的表象提升到更高程度。不过，就像机器还得先有订购单一样，一个人要决定学习钢琴，钢琴就必须先存在。

人们把受试者隔在四面墙内，教他们一点小曲，随后发现种种性质：比如，他们在钢琴上弹奏；甚至在学会弹宽键钢琴以后，也能弹窄键钢琴、羽管键琴等等。

这里始终涉及人的行为中一些确定的片段，而不像弗洛伊德那样涉及整个的人，涉及他的命运和行为。钢琴课结束以后，他去见自己的女朋友；而我们在分析经验中看到的学习，恰好几乎就是格里布耶式的学习。

你们知道格里布耶的故事：他去参加葬礼，却说“节日快乐”。人们把他骂了一顿，他倒了霉，被人揪着头发回家。有人告诉他：“参加葬礼可不能说‘节日快乐’，得说‘愿上帝安息他的灵魂’。”他再次出门，遇见一场婚礼，便说：“愿上帝安息他的灵魂。”于是又惹上麻烦。好吧，这就是分析所展示的学习。它就是如此。我们所面对的固着、再现、转移概念，正是我们以这种方式观察到的东西。

在分析经验中，我们寻找所谓过去在当下的这种临现与闯入，它就属于这一类。这始终是某个下次会做得更好的人的学习；而我说他下次会做得更好，意思是他将不得不去做完全不同的事情。

分析中的揭示，是揭示人的根本行为与其全部生活体验之间那种基础而彻底的不协调。分析发现的维度，恰恰与通过适应、逐渐接近和完善而进步的东西相反。它通过跳跃和飞跃前进；某些总体性的象征关系——我是说，其中包含多种调性，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处在彼此关系之中——总是被严格不适切地应用，而这些关系恰恰不再包含那种〔……〕[注]

> [注] 此处法文底本在句末有缺文，所指的关系特征不可确定。

比如，想象界混入象征界，或反过来。你跟得上吗，安齐厄？这让你很烦恼，对吧？

我只是想请你们注意一项差异：一边是对人类存在中发生之事的任何稍微深入的调查和发现——我甚至会在学习研究这个界域中，从实验室层面给你们证据；另一边则是动物层面发生的事情。我无法给你们大规模回顾动物心理学和实验室学习试验，只想提醒一点：在动物一侧，只要人们尝试严密考察事实——如今科学上确实取得了很大进展——便会始终在本能与学习之间的一种根本歧义中移动。动物的本能预成绝不排斥学习。

此外，人们不断发现动物在本能框架内部具有学习可能。更进一步，本能不可能在没有所谓“环境召唤”的情况下涌现；环境召唤在某种意义上刺激并促成形式、行为与行动的结晶。当人们观察实验者在不同范畴之间航行时，会感到这里存在一种汇合、一种结晶，仿佛某种东西——无论我们对这些术语多么怀疑——给人以预定和谐的完整感觉。当然，像一切预定和谐一样，它也会遭遇种种阻碍和迷失。

这一切并不妨碍什么，却也没有改变什么。学习概念完全无法同本能成熟区分开来。我们看到，确实有某种东西适用于这里，自然而然地使格式塔范畴作为参照和指导范畴涌现。动物认出兄弟、相似者和性伴侣；在本能发展的某个阶段，它会在乐园、在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也塑造环境，并把自身印在其中。刺鱼会挖出若干看似毫无缘由的小洞；人们清楚地感觉到，这是它的跳跃在环境上留下标记，而整个身体都承载着这次跳跃；它嵌入环境。这里有某种适应，而这种适应恰恰有自己的目的、终点和界限。你们看出我要说什么了：动物的这种学习具有有限而有组织的完善性质。

你们看得出，这同被人以为是同类研究所发现的另一件事之间有何差异、隔着怎样的一步。人的学习事实揭示了如下东西，你们其实知道，因为有人甚至提醒过你们，却没有真正凸显其意义：从内部张力和返回欲望来看，主体占据特权地位的，恰恰同我们在动物那里看到的相反——也就是未完成任务。人们还援引一位蔡加尼克先生；我不是说援引得不对，而是说人们并不清楚他的发现究竟回答什么。他告诉我们：在特定条件下，一项任务越是失败，就越能被清楚记住。

相关知识卡 蔡格尼克效应与未完成任务

你们难道没有把握到，这不仅与我们在动物心理学中发现的东西完全相反，甚至与我们对记忆的构想——把它当作印迹、印象的记录或堆叠，存在借此形成——完全相反？可以说，在这里占优势的恰恰是不良形式。正如我方才所说，一项任务越没有完成，主体就越会回到那里；一次失败越惨痛，主体就记得越清楚。

相关知识卡 蔡格尼克效应与未完成任务

当然，我们暂且不把它放到存在与命运的层面；这项结果是在实验室界限内测得的。不过，测量还不够，还得试着理解。人们在这里谈两类学习、两种沿严格相反道路进行的适应。我很清楚，心智总能丰饶地制造各种“理解”方式。我常对自己督导的人说：

相关知识卡 蔡格尼克效应与未完成任务

“尤其要小心，别去理解病人；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让你迷失。”

病人对你说了一句不知所云的话，你再转述给我；可转述时却说：

“好吧，我明白了——有人这样告诉我——他想说的是这个。”

也就是说，以人们通常所谓的聪明为名，人只是把本该使我们停下、不可理解的东西轻轻省略了。当然，人们也这样“理解”蔡加尼克效应。每个人都理解惨痛失败或未完成任务，每个人都理解它。

人们想起莫扎特；你们记得那杯巧克力：他喝下巧克力，又回来按响最后一个和弦。人们没有理解，这并不是一种解释；或者，如果它算解释，那恰恰意味着我们不是动物，而作为音乐家并不是像我的小狗那样——播放某些唱片时，它也会变得若有所思。音乐家始终是自身音乐的音乐家；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如此。如果他是莫扎特，那么正是他创作自己的音乐。除了自己创作音乐、也就是同这音乐保持距离的人以外，很少有人会回来按响最后一个和弦。

所以，蔡加尼克效应关乎的正是这一点。今天结束前，我会试着再给你们最后一个参照，让你们理解重复需要处在什么层次。

好吧，我们仍要在一定距离之外找到它的参照……

顺带指出，这与一位名叫克尔凯郭尔的先生关系极为密切；

你们知道，他是一位幽默家

……也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谓异教世界与恩典世界的区别，亦即基督教从自身视角引入的戏剧。

你们看得出问题在哪里：学习的这种汇合、对自然对象的这种认出，既在动物中被给予，也同样在人的某个界域中被给予；那里有同一种界域，也就是被形式捕获、被游戏抓住、被生命的幻象攫取。

这一切恰恰对应着理论的、观照的、沉思的或柏拉图式的思想。柏拉图把回忆置于全部认识的中心，绝非偶然。如果自然对象、与生物和谐对应之物能够这样被认出，如果条条大路通罗马——容我这样说——那是因为人们已经知道罗马在那里，其轮廓已然勾勒。要让它被勾勒出来，它就必须早已存在于那个将同它结合的人之中。这是二元体的关系。柏拉图的全部认识论——伊波利特先生不会反驳我——都是二元的。

不过，有一位先生注意到，出于某些理由，发生了某种反转和翻转。在属于人走向人的那种三元范畴中、在人自身的根本罪过中，回忆之路永远可能迷失；而人只有在重复中才找到道路。正因如此，他的思考把他置于我们弗洛伊德式直观的道路上。这不是纯粹的同名巧合。

克尔凯郭尔的这本小书叫《重复》。我建议那些已经略有进阶的人阅读；他们会从中获得极大乐趣。要在其中找到方向，必须对克尔凯郭尔知道不少。时间不多的人至少读第一部分吧；克尔凯郭尔先生以幽默形式前往柏林寻找“重复”。当时他想逃离一些问题，而这些恰恰是他自己的根本问题：怎样进入一种新秩序？他在门前遇到自己全部回忆筑起的阻拦，遇到自己以为所是的东西，也遇到自己知道永远无法成为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克尔凯郭尔《重复》

他试图进行“重复”的实验，重返柏林。上次停留时，他曾获得无穷快乐；如今他沿着自己的足迹重走一遍。你们会看到，当他在自己快乐的阴影中寻找幸福时，会遭遇什么！你们会看到，这项实验彻底失败。

不过，他接着指出这件事的后续时，箭头仍清楚地指着方向，并在这本非常有趣的小书中彻底阐明了重复的意义。他把我们引向自己的问题：人的存在中一切根本进展，怎样以及为什么必须通过顽固重复这条道路？这种重复总是在一个异位的时刻和文本中重复某种东西；被重新带回来的起初之物已不再适切，不再有任何意义，并且必须在那个时刻意指别的东西。

好吧，我回到今天结束时想留给你们的形象和模型，用它指出这些彼此汇合的线索把我们引向哪个方向；更准确地说，这个小形象会让你们窥见人的重复需要意味着什么。我想你们已经看到——上次我也曾指出——一切恰恰都在象征界域的闯入之中；只是我现在会以一种格外形象的方式展示它。

沟通科学正在进展，而它只有等机器领域达到一定完善程度、甚至发生一场蜕变以后，才能开始建构。这里出现了某种新事物。模型非常重要；当然不是因为它们意味着什么——它们毫无意义——而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动物性弱点：我们需要形象。

缺少形象时，有些符号便无法出现。通常，更为严重和关键的反而是象征缺陷。这个形象来自一项本质上属于象征的创造，也就是最现代的机器——在座每个人都知道，它对人比原子弹危险得多：计算机。人们告诉你们、你们也听见了，当然却不相信：“计算机有记忆。”谁也无法让你们相信一台机器会有记忆。

说这句话会让你们觉得有趣，但你们并不相信它有记忆。别弄错：它终究有记忆。至少，它有一种记忆模式和方式，注定会迫使我们认真思考，并彻底质疑自己迄今为止赋予记忆的全部形象。

因为你们知道，迄今为止人们能找到的、用来设想记忆现象的最佳形象，根本不是昨天才有的东西：那就是巴比伦滚筒印章——带着一些小小凸纹和线条的玩意儿，把它滚过蜡板，留下所谓记忆痕迹。

印章也是一台机器，只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关于记忆，我们仍停留在巴比伦滚筒印章的阶段。为了让机器在每次提问时——某些情况下这很必要——记住此前向它提出的问题……

否则，这些机器就会完全不符合新近机器的精神

……人们找到了一种更聪明、更机敏的办法：与机器第一次经验或第一个问题相关的东西，以讯息状态在机器中循环。

换句话说，假设我从这里向勒芒发一封电报，要求勒芒把它转发到图尔，再从图尔发往桑斯，从桑斯发往枫丹白露，再从那里发往巴黎，如此无限循环。唯一的问题是：当我抵达讯息尾部时，讯息头还没有追上来；必须给讯息足够时间转完一圈。它以极快速度转动，从不停下，周而复始。

你们心里是否开始稍稍亮起来，明白发生了什么？这个玩意儿这样返回自身，十分有趣；至少在某个方向上，它总该让你们说：“这个我们已经有点熟悉。”这就是所谓反馈，它大概同稳态器有关。

你们知道，蒸汽机的进汽正是这样调节的。如果机器转得太快，一个调速器会把它记录下来；两个部件在离心力作用下分开，于是进汽量得到调节，蒸汽机的稳态运行也随之得到控制。不过，这里的情形不完全一样，要复杂一些。你们把它称作讯息，也必须意识到这同样极为含混。

“机器内部的一条讯息”究竟是什么？不妨先说两种调节之间的差异。一种是我刚才谈过的定量阈值式调节，但阈值是连续的；这里没有切断，而是围绕一个平衡点振荡。另一种则是某种略有不同的东西，即作为讯息在机器内部循环之物；它依靠“开启”或“不开启”进行操作，就像所谓电子管。

关键在于它通过“是”或“否”运作，对不对？

某人——我不这么认为。

拉康

您下次再告诉我。关键在于，这条讯息是某种经过铰接的东西，使我们感觉它与象征界域的根本对立属于同一秩序。这个不断转动的东西必须——或不必——在某个给定时刻进入游戏。你们同意吗？

某人——是的，是的。

拉康

也就是说，总而言之，它始终准备着给出一个回答，并在回答的行动本身中完成自己；这恰恰意味着停止作为一条孤立、旋转的回路运作，并进入一场总体游戏。至于那只小继电器的“是”或“否”究竟采用什么特殊模式，下次请您再回来讲讲。这里才是重要因素。

你们看到，关于所谓记忆，这里出现了属于完全不同秩序、彻底不同的模型；它十分接近我们可以设想的那种机制——更准确地说，那个Zwang、那种重复强迫。

可是，这意味着什么？一旦拥有这个小模型，人们便发现许多事情。在内部——我是说，就大脑装置的解剖构造本身而言——有许多这样返回自身的东西。人们不断看到类似模型，在某些动物那里也一样，比如我非常感兴趣的某种章鱼。我要感谢里凯；根据他的提示，我读了一位英国神经学家的著作。章鱼的神经系统似乎足够简化，因而有些东西可以被漂亮地孤立出来：一条神经支配所谓喷射或液体推进，使章鱼以那种漂亮方式前进；其中有非常粗大的神经。我们也可以相信，它的记忆装置大致被还原成类似的东西：一条循环的讯息，就像我方才让它从巴黎回到巴黎，只不过被缩小到神经系统的极小区域。

但关键在这里：回到上次、甚至前几年我们所说的东西，回到弗洛伊德某些文本中的那些醒目汇合，也就是所谓……

此后人们不再这样称呼它，因为已经踏上一条最终会导向荒谬的道路

……他自己所谓的“心灵感应”……

在其中，两位患者的转移彼此相关地发生极为重要的事情——无论一人在分析中而另一人只是稍受触及，还是两人都在分析中；至少对当时参加那些文本评述的人而言，我已经展示过这一点

……一场与梦有关的“心灵感应”。我曾向你们表明，当主体在同一个话语圆环中同样作为整合的行动者、链节、支撑和圆环时，他们会同时出现某个症状性行动，甚至同时显露某段记忆；这恰恰证明了他们身处同一圆环。

换句话说，在我们的阐述抵达这里时，我今天从远景上向你们提出：重复需要具体显现在主体身上——比如在分析中显现为某些看似再现

既往所装配行为的行动，而这种行为在此刻与任何生命适应都如此不符——其关键正在这里；弗洛伊德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我们在这里重新遇到我已经指出的东西，也就是“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你们可以看到，大他者的话语正是在这里组织起来。这不是抽象他者的话语，不是二元体中我的对应者的话语，甚至也不只是我的奴隶的话语；它是我被整合进去的整个特定回路的话语，因为我是其中一个链节。比如，它是我父亲的话语；只要父亲犯过一些错误，人人都知道，我便绝对注定要重复它们。这就是所谓超我。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

我注定要重复这些错误，因为我必须重新接续他遗留给我的话语；不只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子，而是因为话语链条无法停下，并且我恰恰负责把它全部畸变、错误设定的形式传给另一个人，也就是向另一个人提出一项生命情境的问题，而他同样极有可能在那里绊倒。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

也就是说，这套话语最终会形成一种小小回路，把整个家庭、整个小圈子，甚至整个阵营、整个民族或半个地球卷入其中；这就是某种言说的循环形式。它恰好位于意义与无意义的边界上，因此成为一种问题性的言说：某种问题被提出，而它又是对一项已被提出的象征问题的解决。

我们在重复需要中发现的——当它显现在快乐原则之外时——正是那个在生物层面全部平衡、和谐化与协调机制之外摇曳的东西。它由语言的界域、符号的功能，以及人的秩序中“问题”的问题性所引入。

弗洛伊德怎样把它从字面上投射到一个表面属于生物学秩序的平面？

接下来几次课程，我们恰恰必须回到这一点。

届时我会向你们表明，这里确实有某种东西触及生命的一个问题，但只以碎裂、分解、卷入整个象征辩证法的方式把握它。正是只在人的存在自身体验生命界域的存在秩序中——也就是说，只要生命被打碎、碎裂、患病，只要人部分地置身生命之外并参与死本能——人类存在才能触及生命的这个界域。

第8课 · 1955年1月26日

安齐厄

拉康

我完全不认为，佩里耶在报告结尾强调身心性障碍和对象关系，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对象关系”已经变成一块万金油，人们借此回避许多问题。这里所涉及的恰恰不是我们在当前建构阶段能够赋予其精确技术意义的“对象”——主体关系是在不同界域中建立的。

要有对象关系，首先必须已有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自恋关系。可以说，这是一切严格意义上的外部世界对象化的原初条件，因此既与朴素、自发的对象化相关，也与一切科学对象化相关。

换句话说，他作出的近似区分，把器官功能分成两类：一些代表关系要素，另一些则代表某种他不太知道怎样表达的东西；他把二者像内部与外部一样对立起来，以为由此可以轻易重新落回某种东西，而你们知道，它在弗洛伊德的心理经济理论中不断被置于前景。

我认为，他在那里呈现了某种正确的东西，只是没能作出恰当表达。就器官的身心反应而言，真正的区分位于完全不同的平面。换句话说，问题是哪些器官能够进入自恋关系，也就是同他者的这种想象关系；我在这里不断强调，正是在这个点上，自我得到形成（bilden）。

我来举几个例子。凝视、观看与被观看的功能。这种关系涉及一个器官——直说就是眼睛——而且有一个优选对象。镜像、他者的形象在

这里发挥完全属于结构化的作用；在这种特殊而优选的关系中，它就是自身身体的形象，整个自我的想象结构都围绕它形成。

好吧，这里可能发生十分惊人的事情。昨晚我不愿谈它，因为这些身心性主题上弥漫着极大混乱。正因如此，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概念建构工作才很重要；拉加什教授已经非常准确地指出这一点，而且他的说法足以令人警觉：经验主义的愿望与另一个绝对关键的愿望严格相关——没有后者，经验主义便不可能存在——也就是把概念化推进到难以置信的程度。

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准确刻画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的著作延续着这场彼此联结的运动：只有概念化在每个时刻都得到维持、重拾和丰富，人们才能在经验领域传播和前进。有些文本就是如此。打开我们即将开始阅读的《驱力及其命运》[注1]吧。我责怪自己没有向你们读过原文；今天我要读一段：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驱力及其命运》（Triebe und Triebschicksale，1915），载《元心理学》，伽利玛出版社，1968年。

“人们常说，一门科学应当奠基于清楚而定义明确的基本概念。

事实上，没有任何科学——即使最精确的科学也一样——以这样的定义开端。科学活动真正的开端，毋宁是描述现象，随后再把它们归组、分类并纳入某些集合。不过，即使还只是在描述时，也无法避免把一些取自别处的抽象观念应用于材料；这些观念当然不可能只从新经验中取得。随着对同一材料的研究继续进行，这些观念——后来成为科学的基本概念——会变得更加不可或缺。起初，它们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绝不能奢谈清楚划定其内容。只要它们仍处于这种状态，人们便通过反复援引那

> 些看来像是它们来源的经验材料来就其意义取得一致；然而实际上，材料反倒被置于这些观念之下。因此严格说来，它们具有约定的性质；不过，关键在于对它们的选择并非武断，
>
> 而是由它们同经验材料之间的重要关系所决定；即使尚未辨认并证明这种关系，人们也可以先假定其存在。只有更深入地研究相关现象的整体，才有可能
>
> 更准确地把握科学的基本概念，并逐步修改它们，使其能够在广泛范围内使用，进而彻底消除其中的矛盾。”〔文章开头〕

〔以上引文的德文原文，内容同上。〕

你们看，这里要求的是连贯话语的必然性。人们说弗洛伊德不是哲学家；我当然愿意听听，但我不知道还有哪一篇关于科学建构的文字比它更深刻地具有哲学性。

> “到那时，才适合把它们封入定义。然而，认识的进展也不容许这些定义保持任何僵硬。
>
> 正如物理学的例子出色地表明……”

这写于1915年。

奥克塔夫·曼诺尼——不过，毕竟已经在伽利略之后了。

拉康

但仍在爱因斯坦以前。

所以，这里已经有这种科学精神：比如，帕斯卡尔那本漂亮著作的建构向我们展示，概念如何在经验中不断重铸并取得自身价值，甚至能够一度撑破所谓“理性框架”。所有这一切已经在那里。

> “……物理学的例子表明，就连被定义固定下来的基本概念，其内容也不断改变。
>
> 我们现在要谈的，正是这样一个约定性的基本概念；它目前仍相当晦暗，
>
> 但心理学无法缺少它——不是本能，而是驱力。”

那么，亲爱的佩里耶，您刚才坐上了被告席。我正要说，我们缺少一个根本区分；如果您援引它、点出它，您的报告大概就不会受到瓦拉布雷加的某些批评。在弗洛伊德这段话中，“本能”纯粹是安娜・贝尔曼夫人的发明。弗洛伊德原文只谈驱力。佩里耶，您缺少的正是这一点，我刚才正要说。

您试图就严格意义上的身心过程所涉及的器官，找到一道区分和界限；而您的定义远不能包住人们带给我们的全部例子——比如，把癫痫患者安置在管理更好的地方，有时他的发作会减少；这与身心性毫无关系。您确实试图在器官中寻找标准，于是谈到同外界发生关系的器官，以及其他器官。您认为后者更接近那个可以被视为内部兴奋巨大储备的东西；弗洛伊德谈内部驱力时，正为此给了我们一幅图式和形象。

然而，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区分。重要的是，某些器官被卷入自恋关系，而这种关系同时结构化：

- 自我同他者的关系——正如我方才所说——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对象世界的构成；
- 以及另一个领域，它是弗洛伊德著作中期全部力比多经济考察的背景。在那里，构成一切的是力比多——去年评述《论自恋：一篇导论》时，我已经充分指出：恰在弗洛伊德引入自恋的关键功能，并意识到自恋直接涉及性力比多的经济时……

……他的力比多理论进入了一个得到充分建构的时期。

顺带提醒你们，《性学三论》中关于力比多的段落是晚期增补的。若我记得没错，大约在1920年代。你们或许以为力比多理论同本能阶段一起被建构；这是后来再版《性学三论》所造成的幻觉。

自恋背后准确地说是自体性欲，也就是有机体内部那团受到力比多投注的东西。我会说，我们所能理解的内部关系同样处在边界地带，同样从我们手中逃脱。我要作一个比较；它的全部重量和意义或许不会立刻向你们显露，但它沿着我上次谈到的所谓“熵”展开。我必须回到那里，让你们感到它的全部范围、分析和理解。

《超越快乐原则》显然正把我们带到熵这里。我们能在生物身上把握的能量等价关系，归根结底始终只限于代谢，也就是账簿：进入什么，出去什么。有机体通过一切途径吸收多少能量；最后，考虑到肌肉消耗、努力、排泄等全部因素，又有多少从机制中出去。当然，热

力学定律在这里得到遵守；能量会退化，但我们只在入口与出口处看见它。

内部发生的一切，我们根本一无所知。理由很简单：我们绝对无法像测量物理世界那样，逐点测量内部相互作用；有机体的特点就是任一点发生的事情都会在其他所有点产生回响。因此，我们所处的条件使人根本无法知道热力学平面上发生了什么。

力比多经济——也就是分析中所谓自体性欲的投注，这只是一项理论指示——面临的不是同等、却是类似的问题。这里涉及严格意义上的机体内投注，它们在身心现象中显然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人们谈论某个器官的“性欲化”，正是最常出现的隐喻；我们对相关现象所属秩序有所感受，便用它表达自己谈“身心现象”时想说什么。而您对神经症与身心现象的区分，恰好由自恋构成的这条分界线标出。

神经症中显然总有防御机制，因为它们与自我对他者的严格自恋关系相连；这是神经症的一项根本结构，神经症从这里开始。谈到这些防御机制时，不能含混地把它们说成与某种疾病经济观中所谓的防御机制——比如作为反应的机制——彼此同质而连续。当然，人们可以这样引入我们所说的防御机制，但我们终究知道得更多一些。

这里涉及的机制总是或多或少同自我的自恋关系相连；这套关系严格依照同他者的关系、同他者认同的可能性以及自我与他者的严格互惠而结构化。因为在任何自恋关系中，自我就是他者，他者就是自我。正因如此，我们谈论的那些防御机制——分析中较重要的机制，安娜·弗洛伊德在著作中把它们逐一列出，并最初构成自我的防御——对我们十分重要。

神经症虽然越出这些自恋结构，却始终被自恋结构框定。

但有些事情发生在此前或另一个平面上。这个平面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是对象关系的平面；也不像帕什先生那样，以非常令人遗憾的方式放弃全部概念严谨性而说……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人过去曾给人更多希望

……如果这里确实要谈某种关系，那也绝不是对象关系。身心反应本身所提示的东西，位于神经症构造的界域之外。

它不是同对象的关系，而是某种始终处在我们概念建构边界上的东西：人们总会想到它，偶尔也会谈它，可严格说来，我们无法把握它；但它毕竟在那里。不要忘记，我向你们谈象征界、想象界，但还有实在。它不在对象的层面，而在实在的层面。

弗朗索瓦·佩里耶——我想说的正是这一点。

拉康

但您没有这样说，因为您引用了谈“对象关系”的帕什。然而，结核病患者的力比多经济根本不涉及对象关系。如果把事情放在对象关系平面上，你们就会迷失在同原初母亲对象的关系中，也就是说抵达一种临床上的“和棋”——借用国际象棋说法——再也走不出来，也得不出任何东西。相反，对“实在”这个术语的参照，可能在这里显示出丰饶性。今天我无法多说，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

弗朗索瓦·佩里耶

引用帕什以后，我想自己强调过：身心性患者同实在、同世界发生直接关系，而不是同对象发生关系；他与医生建立的治疗关系——无论这种关系多么未分化——会在他身上重新引入自恋界域。正是在这个程度上，这种关系把他从身心循环中治愈，因为这层缓冲使他得以回到一个更具人性的维度。

拉康

我不是说您讲了蠢话。我是说，从词汇的严谨性来看，如果您引入“实在”而不是“对象”这个术语，就不会招来瓦拉布雷加的那些批评。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对自恋的参照是根本性的，不过自恋会导向一种对象关系，也就是自身身体。

拉康——我没有这样说。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对象关系”的参照见于一篇重要文本。在《论自恋：一篇导论》中，弗洛伊德研究过身心问题，并在文中考察身体疾病的情形；此后他还在其他文本中回到这一点。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他不只考察性病，甚至还谈结核病。他说，身体疾病中会出现对某个器官或系统的自恋投注。从这篇文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总的来说完全不受我对佩里耶那项批评的影响。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没有为内部与外部的二元论设下任何公设。他大量谈内部与外部，但思想中并无这种公设。

拉康

我只作一个简单说明，让你们能够区分。我方才谈到窥视癖—暴露癖，以及一种总的来说以某个器官为来源的驱力；我提醒过你们，这个器官是眼睛，但对象不是眼睛。虐待狂—受虐狂界域也一样：其来源是一整套机体组织——肌肉系统——但一切都表明，其对象虽然与骨骼肌肉结构并非毫无关系，却是别的东西。反过来，当我们谈到那些更适合称作自体性欲的投注时，并没有机体内部这项区分——来源与对象彼此对立、彼此区分。可以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我们似乎能够设想：投注恰好落在器官本身。你们看到差异了。这就是自体性欲与其他东西之间的分裂平面；自体性欲仍极为神秘，近乎无法穿透。这并不意味着以后我们无法前进几步。今天先停在这里，只请你们注意这项区分的重要性。我还要补充：佩里耶付出这些努力以后，若愿意不立刻陷入睡眠和休息的反应——那当然正是快乐原则所希望的——而是本周继续努力，就请为我们准备下次讨论的《驱力及其命运》这一小章。

弗朗索瓦·佩里耶

我想就内部性与外部性这些概念提出一个问题。他〔瓦拉布雷加〕觉得我使用过它们。我会试着把话说清楚。一方面，我把主体看作在某种意义上被封闭在自身自恋内部。我直到最后才使用“自恋”这个词，这是错误；本该更早使用。实在作为实在，也就是作为某种形式的外部性，但它并不等于主体的一切外部性形式。实在只有经过主体自恋的折射才向他显现；我把这一点同神经症者接触实在的方式相对照——后者是一种间接接触。而身心性患者接触的这个外部、这个实在，不是神经症者的实在，而是处于纯粹状态的实在。

我谈过身心性患者对实在敞开的一道令人不安的裂口，却并不是要把神经症者的一切都说成内部之物。神经症者有自己的内部性与外部性，不过是通过第三个维度或第三种介质——也就是自恋——来拥有。我的感觉则是，身心性患者没有自恋的维度；由于缺少自恋、因而缺少自体性欲化，也缺少以自体性欲方式使用力比多，他面对的是与真正内部相对的真正外部。这大致就是我认为自己本想表达的意思。我想知道〔转向瓦拉布雷加〕，您刚才的批评是否仍然成立；如果成立，那就是我没有听懂。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我明白您的意思。如果我们考察神经症中从创伤性神经症到现实神经症、再到精神神经症的序列，这项区分似乎很难维持。弗洛伊德本人也十分困窘。他说，创伤性神经症对他仍是一个谜，并说：

“非常遗憾，人们没有分析过这种神经症，我们手中没有分析材料。”

创伤性神经症迫使人引入外部危险概念，它以一种肯定方式涵盖各种假设。人们会在创伤性神经症中发现与现实神经症完全类似的特征。弗洛伊德就停在这里。

把创伤性神经症靠近具有解释力的外部危险概念，这本身无可争议；而他关于现实神经症的发现——他曾经向我们谈过——提供了更多确定性，并表明这个区分很难维持。

拉康——什么区分？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外部性与内部性之间的区分。

拉康

但在实在层面，这个区分无法维持；亲爱的，实在没有裂缝。我在这里教给你们、也是弗洛伊德与所谓科学哲学汇合之处的东西，就是：在全部平面上——不只在认识平面——除了以象征界为中介，我们没有任何其他方式把握实在。

实在本身绝对没有裂缝。我们不要掩盖某些迂回，更不要掩盖其中的缺陷；比如在多少带有活力论色彩的生物学中……

无论是冯·弗里施的理论这类眼下令人欣赏、甚至富有成效的东西，

还是各种相互整体论，以及 Umwelt〔周围世界〕与 Innenwelt〔内部世界〕之间原则上彼此对应的立场

……它们实际上是在生物学研究的起点置入预设结论的论证。这些预设作为讨论的一个时刻、一次试验或一项假设，也许很有意义；但它们本身庞大得惊人。

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这样思考，哪怕生物同其环境彼此映照这种看似简单的关系也一样。这种适应概念、这种预先设定的适应假设，即便被赋予总体平面上的全部丰饶性——我是说，赋予最宽泛的含义——仍是一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效的前提。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反倒是另一条道路。其他研究——尽管我们可以从解剖主义、联想主义等角度批评它们——之所以更富有成效，正是因为它们不是这样，因为它们远离了这项假设：

- 它们不自知地把象征作用置于人的研究前景；
- 把它投射进实在；
- 并想象真正进入考量的是实在的各种要素。

其实，它们只是让象征作用在这个实在中运作并介入，不是把它当作投射或思想框架，而是当作研究工具。在这个平面上，不必为内部性和外部性感到惊慌：实在没有裂缝。弗洛伊德理论最初假设主体处在这种自我封闭状态；若说此时主体就是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说是正确的。你们跟得上吗？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问题不是围绕实在提出的，而是围绕如下区分：

- 同实在发生关系的装置；
- 与不发生关系的装置。

拉康

区分不在于它们是什么装置，而在于它们是否被纳入自恋关系。分化位于想象界与实在的接合处。总体而言，对于我所说的东西，有一种反应恰恰是回到文本——程度比你们中某些人看到的更大。我的挚友

让·伊波利特今天不在，因为他去了德国；上次听完我的话以后，他告诉我自己重读了《超越快乐原则》。我想，他至少和你们中大多数人一样忙。

所以，现在该想想读这篇文章了；我希望下次以前你们全都会读完。为自己设一个期限，对你们有好处。十五天后，我们拿着文本讨论。我先想给你们一个初步概览：

- 问题从哪个方向开始被设定？
- 它意味着什么？
- 快乐原则之外发生了什么？

上次我告诉你们：有一种象征作用构成了分析领域全部最根本表现的本质，尤其构成其中这一项——重复。我说过，这里涉及的重复必须被构想为与如下东西相连：

- 言说交换的循环过程；
- 主体之外的象征回路。

我们必须从字面上把它想成与某个群体相连——比如人的支撑者、人的行动者、其话语的支撑者。所谓主体命运所包含的那个小圈子，会以回路形式延续这套话语，主体则被无限地纳入其中，直到最终主体理解为止。我在这里把自己的思想稍稍扭弯了；你们当然感觉得到，不能完全这样理解。但你们看得出，我是在把自己的思想形象化。

某种关系回路、某种关系交换持续进行——我把它说得具体一些——它恰恰既涉及外部又涉及内部，同时又……

必须把它想成一套不断背诵的话语：仿佛我们到处都带着录音装置，就能把它孤立、收集起来；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出于最充分的理由逃脱主体，因为主体没有这些录音装置

……这个东西不断延续、返回，找到返回之路，坚持、再度回来，并始终宣告自己已经准备进入内部话语的舞蹈。

如果你们愿意，这也是主体的一种隐喻——直到它通过为止。当然，主体可能一生都听不见这里涉及的东西；这甚至是最常见的情形。分析正是为此而作：让他听见，也就是让他理解自己被卷入哪一圈话语，同时又受到推动，要进入哪一个别的圈。你们明白吗?

我们现在要大幅回溯，重新从起点出发，讨论《纲要》。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份手稿——后来被重新发现，他从未发表——写于1895年9月。它向我们展示，在撰写《梦的解析》以前，而且在他正进行的不是自我分析而是纯粹的分析——也就是正在走向自己发现的道路时——弗洛伊德已经怎样设想心理装置。这一点很重要：当时的构想同弗洛伊德思想史不可分离。你们将会看到，从这里出发，并借助我们即将作出的断句照明，他后来的全部建构会显出意义。换句话说，在建构《梦的解析》的理论以前，他先提出了什么？做梦机器怎样汇入我方才借他者——更准确地说，是许多他者——的话语而向你们唤起其图式的另一台机器？他又怎样被迫重塑自己的原初构想？这一切会在第二个时间中显示出意义。

今天我们做准备工作：安齐厄会为我们分析，弗洛伊德这份心理学《纲要》中有哪些要点必须凸显。

迪迪埃·安齐厄：《纲要》

《纲要》是一份附在《致弗利斯书信》中的手稿；它也是由一次同弗利斯的会面触发的，弗洛伊德在返回维也纳的火车上开始撰写。他分三次写成。手稿显然没有标题，在《致弗利斯书信》发表以前也从未出版。

它包含三部分：

- 我只谈第一部分，也就是总图式；
- 第二部分把图式应用于心理现象，尤其是癔症现象；
- 第三部分回到正常心理过程，并试着加以深入。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手稿没有任何标题。德文版称它为《神经学家的心理学计划》，英文版称《科学心理学计划》。我想还必须稍微详细地讲讲这篇文字的写作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它。

我们知道，贝恩费尔德的研究、缪勒的德国灵魂生理学，以及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生理学老师布吕克——所有这些生理学家都同意一项公设，并毕生捍卫它：

“把一切生理和心理现象还原成物理力，或至少还原成物理上可测量之物。”

因此，我们可以把弗洛伊德的工作置于布吕克学派和这个总体视角中，看作一项试图用物理力解释一切、把一切还原成可测量之物的努力——他自己在开头便这样说。

第二项更特殊的背景是：在早于这份手稿的《癔症研究》中，布洛伊尔撰写了属于一般理论的总论一章；他试着用物理上可测量之物作出解释，主要借助——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电学和磁学隐喻，把神经系统视为电磁场，因此刺激会引起场的改变，继而引发反应。

布洛伊尔提出了一套脑内兴奋理论。我认为贝恩费尔德那项假设有点离奇：他说，这篇署名布洛伊尔的文章其实由弗洛伊德撰写。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三个月后弗洛伊德又会重写一套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反倒认为，正是由于弗洛伊德不满意布洛伊尔这次概念化努力，而二人的合作也恰好开始动摇，他才写作《纲要》。

拉康——贝恩费尔德是否甚至意识到二者完全不同？

迪迪埃·安齐厄——看起来没有！在文章中，他系统地把一个还原成另一个。

拉康——当然！所以他才把文章归给弗洛伊德。

迪迪埃·安齐厄

我花了很久才摆脱这种说法。因此，弗洛伊德想把自己刚同布洛伊尔发现的现象重写成一套一般理论，并使之符合我刚才描述的物理主义和量化主义灵感。要正确引入这篇文本，本来还应完成另一项工作；

可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和兴趣去做：定位1895年的神经元理论发展到了哪里。

拉康

它既不算遥远，也根本无处可在。弗洛伊德站在神经元理论最前沿。他关于突触的观念完全新颖，就一个远未有定论的问题明确选了边。

迪迪埃·安齐厄

我同意。不过，整个神经元理论正在这个德国生理学学派中被建构。弗洛伊德曾特别参与研究，在鱼类、螯虾神经系统分析方面有过工作……他率先在此前无人看见神经元之处证明其存在，并在文章末尾提出假设：神经冲动以类似电传导的方式传导。

拉康——他就突触本身选定立场，也就是承认一个神经细胞到下一个神经细胞之间存在连续性的中断。

迪迪埃·安齐厄

弗洛伊德的这项发现很有意思。直到如今的1950年代，人们才意识到神经元是弗洛伊德发现的。弗洛伊德发现了精神分析以后，人们才发现他有一种发现事物的癖好；当时没人意识到这一点。不过，各地还有其他人在工作；况且，一项发现总是在多个地点同时发生。本来应该梳理一下神经元问题当时的状态。正如译者的一条注释所指出，谢灵顿直到1897年——也就是弗洛伊德这篇文字两年以后——才提出突触理论。

现在来看文本本身。编者所作的分节——它与德文版的分节也不一样——可以商榷。我建议采用如下分法：

- 第一部分，弗洛伊德描述神经元装置的结构。重看德文很有意思：它说的不是神经装置，而是神经元装置。描述完结构和原则以后，他解释它怎样运作。他给出某种即便算不上“历史”、至少也属于“发生”的东西：随着神经元装置运行，我们会看到通常所谓的心理功能依次出现。阅读这篇文本时，我不由得想起孔狄亚克的雕像：雕像的结构一经界定，一系列香气的呈现便使感觉、知觉表象、形象、记忆、判断和推理以令人赞叹的逻辑方式依次产生。因此，人会觉得，弗洛伊德有意从某个属于最优美原子论传统的模型出发，重新构造心理现象。

- 接着，在这场发生中，起初只是神经元装置本身的运作，但这种运作又会反过来影响自身。装置运行过一次这个事实，会像那尊雕像一样，留下若干即使算不上痕迹、至少也是后果的东西。尽管弗洛伊德从未使用“经验”这个词，一定的知识却会由这些经验构成。那些不直接源自神经元装置运作的心理功能，会间接地源自这个系统经历的经验；由此产生某种学习。

- 这种学习继而会造出某种极其特殊的东西，也就是自我。接着，这个始终依照经验主义传统出现的自我，最终会反过来作用于此前的整个系统，并对它行使若干功能。

- 描述这些功能以后，弗洛伊德便能回到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的根本区分。整份手稿总的来说都在讲从初级过程到次级过程的过渡，尤

其详述次级过程；所以，他用最后一章回到初级过程，并以睡眠和梦为例。

这就是总体结构。

神经元装置。

“心理学被构想为一门自然科学。心理过程——我引用弗洛伊德——是特定物质粒子的量上得到规定的状态。”

〔以上引文的德文原文，内容同上。〕

这里的粒子就是神经元，因而也就是这些过程。我指出从这里开始便浮现在我心中的想法，弗洛伊德的另一些意见又进一步强化了它们。因此，弗洛伊德同把心理现象视为意识现象的传统观念决裂；他随后会在文本中明确说，有些心理现象根本不是有意识的。

所以我认为，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它在精神分析中的意义当然不同于生理唯物主义视角——仍大大得益于他在工作环境中形成的习惯：否认意识的实在性。

让我们回到这个一切将从中产生的神经元。神经元的根本原则就是一切物质粒子的原则，也就是被应用于神经元的惯性原则：神经元怎样倾向于摆脱量。它们倾向于摆脱量，而办法正是把这个量传导到肌肉系统。

因此，尽管弗洛伊德没有明说、只作了暗示，一种穿过神经元循环的神经流假设仍从惯性原则中被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他明确说，这种

惯性倾向就是把张力水平降至零的倾向。它后来会以涅槃原则之名重新出现。这就是神经元的初级功能，即释放功能。

不过，次级功能出现了：神经元承受量时，与其释放它，也可以通过逃避而摆脱它。怎样逃避？神经元系统可以启动若干行动，以减少那些恰好会增加系统内部之量的外部刺激。

因此，若说初级过程是量的释放，那么次级过程则通过减少外部或内部刺激来逃避量。在次级功能层面，惯性原则由此被修改为一项新原则——恒常原则。它不再寻求把张力水平降至零，而是试图保持恒定，也就是尽可能低。这一点后来不会被重述为涅槃原则，而会被重述为快乐原则。

恒常原则预设能量可以在神经元系统内积累，因为如果它一出现便随即释放，就会什么都没有，不会有心理机制。恰恰由于不是只有一个神经元，而是有多个神经元，并且神经元彼此连接，能量才会在系统中积累。这是弗洛伊德的一项假设：两个神经元之间的接触构成一道阻碍量通过的屏障。

更准确地说，弗洛伊德认为有两种神经元：

- 可渗透神经元：让兴奋通过，随后回到原初状态；他称之为 φ 系统；
- 不可渗透神经元：只让量部分通过，其接触屏障阻止完全流出。因此，这些神经元会因量的通过而改变。这里显然构成了记忆一类现象的基础，也构成全部心理现象的基础。因此，弗洛伊德把这些神经元称作 Ψ 神经元，以区别于 φ 神经元。

这些神经元之间是否存在性质差异？这将预设组织学能够找到一种不同的神经纤维。

弗洛伊德认为并非如此。差异只取决于通过神经元之量的大小。当大量通过一个神经元时，接触屏障所造成的阻抗可以忽略；但如果通过的是少量，而它与突触接触屏障的阻抗属于同一量级，我们就面对第二类现象。

所以，φ 神经元专门释放大量，Ψ 神经元则让少量通过，同时产生量的残余积累，并由此带来记忆的可能。φ 神经元总的来说就是与外部世界接触的神经元。

至于 Ψ 神经元，它们大概更为内部。或许应当把它们一方面定位在大脑皮层一侧，另一方面定位为同 φ 神经元接触，因此通过第一个系统间接接触外部世界；其次，它们还同身体内部细胞以及源自内部的量发生接触。后者对应需要的经验——饥饿、呼吸、性欲——并且直接接触内部来源的量。正因如此，其中的神经元更多专门承担次级功能。

拉康

从局部论看，这整个最初图式中的现实原则——向我们呈现为一套活力论系统、按照最简单的刺激—反应图式运作的反射弧——仿佛只服从释放定律。这里甚至谈不上任何建构，只是一种纯粹的一般惯性。

回路必须经由最短路径闭合。弗洛伊德在此接上自己的系统；它一方面同内部需要发生关系，由此引入自我系统的来源和起点；另一方面又作为缓冲器、缓冲功能，也就是内部的某种东西、一套系统内部的

系统。这里彼此交错的东西，后来会被他分别提出：现实原则通过对 Ψ 系统——朝向内部的系统——的参照而被引入。

迪迪埃·安齐厄

这就是总体图式。那么，这个总体图式怎样运作？我们会首先遇到哪些心理功能？

首先是疼痛。神经元系统运行时，如果量太大，φ 系统不足以将其释放；由于它同 Ψ 系统相连，一定的量、某种过量便进入 Ψ 系统。一个高于通常水平的量闯入 Ψ 系统，就是疼痛。弗洛伊德在这里遵循一项关于疼痛问题的经典看法：任何感觉一旦强烈到一定程度，都会失去自身特异性，变成疼痛。

同样很有意思的是，我认为弗洛伊德在这里完成了与柏格森相同、方向却相反的工作。在《论意识的直接材料》中，柏格森从同一种疼痛感觉出发，努力表明任何可感之物都不能被还原成量，因为它从根本上是质。弗洛伊德也从同一项疼痛经验出发，却表明一切向我们显得是质的东西，归根结底从根本上都是量。

于是，一切感性性质出现，而神经元系统的结构使量能够转化成质。他虽未明说，却暗指费希纳定律；这些定律表明，差别阈限与刺激强度变化的数学结构关系密切。

然而，这些感性性质会在神经元系统中造成分化。弗洛伊德不得不设定第三套神经元系统；他带着恶作剧的意味把它称作 ω，却又用看起来像 ω 的 W 来标记，结果谁也弄不懂，评述者们为此伤透脑筋。

第三套神经元系统就是知觉神经元，它们会在 Ψ 内部专门处理质。但它们与 Ψ 有何不同？Ψ 的特征是有少量通过；这里却不再是量的问题，而是周期的问题，因为神经元冲动具有周期性。即使量相同，周期也可能不同；W 系统接收到的，正是从 φ 经 Ψ 传来的刺激强度周期。

拉康

请让大家充分把握，在这个层面上，究竟是什么迫使弗洛伊德发明这套已经预示本我系统的系统。因为归根结底，尽管他完全误认意识，到这里为止一切仍运作得非常好——一点意识都没有！可他终究必须重新引入意识；他以一套系统的悖谬形式重新引入它，并且不得不承认这套系统有极其例外的法则。其特征就在于内部发生的一切——他为此绞尽脑汁——都必须让周期以最小能量消耗通过，也就是几乎为零的能量。他不能说完全为零。

迪迪埃·安齐厄

他迟疑不决，没有下定论。不过他说，那里没有量，只有刚好足以承载周期的一点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不留下痕迹、不能被再现；质的传递从本质上是质性的。

拉康

好！总而言之，我们第一次遇到此后在弗洛伊德作品中不断重现的意见：这套意识系统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安置。

必须赋予它极其特殊的法则，把它置于支配全部定量调节的能量等价定律之外。这使它彻底处于例外状态，并使它始终成为一个问题、一件弗洛伊德不知如何处理的东西。然而，他当然又不能不让“我（je）”介入。

我要问你们的正是：

- 他会怎样处理它？
- 它有什么用？

迪迪埃·安齐厄

我想，他事先已经提醒过我们，其中有一点能回答您的问题：初级功能也许足以应付单细胞生物，却不足以应付拥有复杂神经元系统的有机体；这里必须诉诸次级功能。这些感性性质为什么存在？

因为它们有用。弗洛伊德明确说，这是一条略显简单、带有达尔文式色彩的论证：一种东西若为有机体的保存所必需，最终便会存在；否则有机体早已不复存在。因此，这是一种完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观点，它借助感觉和感性性质说明意识的出现：感觉会向我们报告外部世界，从而使我们能够防范过量的量渗入有机体，以免系统遭到毁坏。

不过，疼痛之后，意识可以以纯粹定量的形式被引入心理学。弗洛伊德明确说，意识是神经元系统中一部分物理过程的主体面向；他在这里具体指出是哪一部分——W，也就是知觉过程。

这确实是后来全部著作中会不断出现的知觉—意识系统的开端。不过，弗洛伊德把意识作为纯粹附带现象、毫无重要性的纯粹反映这一构想推得很远。像附带现象论一样，他也给意识指定了同一种量的起源；但除此之外，他还赋予意识一项功能：意识会反过来作用于系统。

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没谈到快乐；出于同疼痛保持对称的需要，弗洛伊德终于来到这里。单纯伴随释放的感觉就是初级原则。反过来，正是为了避免疼痛，全部次级过程、感性性质和意识才会构成。我略过对快乐感觉的详细分析。

拉康

有一点非常重要，我相信你们一定注意到了，必须凸显出来：重新找到对象的必要性。这才是最原创的地方。

迪迪埃·安齐厄

第三，在已经根据装置自身结构看过它怎样运作、重构基本心理过程以后，其自身运作会留下痕迹——弗洛伊德称之为“经验”。这些经验会进一步把我们引向自我概念。

既然神经元系统具有意识，它必须经历两项根本经验：满足经验与疼痛经验。二者服从同一机制，只是方向相反。满足经验会引出一个我一直很难翻译的词：καθεξής（cathéxès），即“连接”或“投注”；不过，“投注”只有在后来的理论中才真正适用，因为那时它指相对于自由能量而言的束缚能量。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纲要》中的满足经验与身旁之人

因此，满足经验会在中心的、弗洛伊德所谓核部神经元——大脑皮层一侧——形成两项投注、两条连接；它们分别连接：

- 一方面是对欲望对象的知觉；
- 另一方面是使释放成为可能、从而带来快乐感觉的反射运动之形象。

因此，体验快乐的事实、神经元装置自身的运作，也就是它的初级功能，即便从量的观点看不留下痕迹，至少由于我们拥有意识，它仍会从联想观点留下痕迹。这些神经元由此连接到：

- 一方面是使满足成为可能的对象；
- 另一方面是实现满足的行动之形象。

这就是一种概念模型，它把记忆的所在指定为某个发生改变的神经细胞，也就是记忆痕迹。弗洛伊德明确说，这属于联想主义视角，并援引著名的同时性联想定律，把它视为不言自明。因此，当需要状态——性需要、饥饿、呼吸需要、口渴——再次穿过神经元系统时，它会重新激活中央神经元系统。

这套系统的激活会伴随对象的激活，也就是曾经带来满足、如今将再次满足需要的对象形象，以及满足借以实现的行动。

如果没有任何东西介入，便会引起幻觉。若有机体依照这个幻觉行动，幻觉可能致命；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核验外部现实中确有那个正在想象、以为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对象，经验便会闭合在幻觉之上。

疼痛经验形成同样两条连接，只是极性相反：同威胁性对象连接，同痛苦行动连接。幸运的是，疼痛经验会教我们把外部现实考虑在内。

因此，神经元系统自身运作的经验会留下某些残余，也就是情感与欲望状态的存在。情感是心理机制中量的张力突然增加；欲望状态则是同一种神经元之量缓慢增加。

拉康

在我看来，与我们的问题相关而且值得强调的是：谈到这些欲望状态时，被置入运作的是呈现出来的对象中某种对应，以及自我中已经构成的结构；也就是被给予之物与被期待之物部分重叠。他强调可能出现两类情况：

- 呈现的恰好就是期待的，这毫无趣味，只是正好对上；
- 真正有趣的是没有对上。

换句话说，对象世界的任何构成都始终在努力做我写在黑板上的事情：Wiederzufinden，重新找到对象。可以说，这借助一种奇特而机械的游戏进行，仿佛在建造一台把握外部世界的机器。

他的构造、他的小机器、模型和雕像所面向的侧面，正通向我上次向你们指出的东西，也就是人的经验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化：

- 一种是我借克尔凯郭尔称作“古代”的结构；甚至可以像他那样称作“异教”的结构，而异教即柏拉图式。它就是回忆，也就是人与其对

象世界之间的一致与和谐；人之所以认出对象，是因为他仿佛从来就认识它们。

- 与之相反的是，通过一项劳动努力征服并结构化这个世界；它经由一系列相继出现的重复推进。这是“重复”意义的第一份草图。

呈现在主体面前的东西，只同曾经带给他满足之物部分重合；正因如此，主体会开始无限地重复寻找，直到重新找到那个对象。对象在重复的道路上被遇见、被结构化——重新找到对象，重复对象——可主体在这项努力中遇见的从来不是同一个对象。换句话说，他不断产生替代对象。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纲要》中的满足经验与身旁之人

如果你们愿意，这只是一份草图，但却是一份富有成效之物的草图。它将奠定这种冲突心理学，并以令人瞩目的方式，在力比多经验本身与人的认识世界之间搭起桥梁；这个认识世界的特征是：

- 很大一部分逃出了欲望的力场；
- 人的世界绝不能被结构成一个同需要的 Innenwelt〔内部世界〕彼此嵌合的纯粹 Umwelt〔周围世界〕；
- 它并不封闭，而是向大量极其多样的中性对象敞开；最终，甚至向那些从根本的符号功能看已与对象毫无关系的“对象”敞开。

重要的是，在这套看似仍停留于过程唯物主义层面的理论中，我们已经找到一个开端：重复这项绝对根本的功能被引入，并且作为结构化对象世界本身的东西发挥作用。

迪迪埃・安齐厄

我用这一点收尾：欲望状态。

满足经验会带来新心理机制的出现，也就是对作为张力来源的这个欲望作出充分抽象[注]。

> [注] 此处法文底本写作 l'abstraction pleine de ce désir，语义和可能的底本词形均不明确。

疼痛经验则带来“第一次防御”，英文文本称作“压抑”。我想知道德文原文是否也是同一个词：“一次压抑”。再往后，弗洛伊德会区分防御与压抑。

最后，报告的第四点：自我的出现。自我就是 Ψ 神经元投注的总体。我们已经看到，有些 Ψ 神经元根据疼痛经验受到投注；某个给定时刻 Ψ 神经元的投注，就是自我。

由于它们具有接触屏障和积累，一组特定神经元会保持一种 καθεξής（cathéxès）、一种恒定投注，并构成次级功能运作所要求的量之积累的支撑。如果有机体没有储备一定能量，就无法使用次级功能来排除危险刺激、寻找带来满足的对象。因此，这里第一次确立了如下观念：自我拥有一定能量，由恒定的能量数量构成。

第二，自我的关键功能是抑制功能。自我一经构成，便介入整个系统、介入重复。这是自我第一次出现在弗洛伊德手稿中。重复已经显示出疼痛与满足经验的性质。自我会通过修改接触屏障自身阻抗的分布，在量的流动中引入某种分流；也就是说，它通过增加或降低某道

接触屏障的阻抗，阻止量沿最小阻抗线路流动——而这本来符合惯性原则。

所以，在一个由自我特别投注的神经元中，经由侧向 καθεξής（cathéxès）的作用，流动会偏离最易通过的路径。抑制以及自我对系统的根本介入正在这里；也正是它使认识和适应现实的次级功能成为可能。

自我的第二项功能：现实检验功能。

自我能够利用我们刚才描述的全部次级过程，从外部现实取得正确信息，并在释放时把它考虑在内：肌肉释放不再是纯粹的运动性释放，而会成为一种有导向而有用的释放。正是自我带来的抑制，使区分知觉与记忆的标准成为可能。因此，把幻觉当作充分满足的最初视角在这里被超越；自我的功能就是检验现实。

拉康

也就是说，它检验现实，不只因为它体验现实，也因为它尽可能把现实中性化。这是在分流系统发挥作用的范围内发生的。您没有充分强调：弗洛伊德把分流过程定位在神经元的分枝之中；能量冲动因分散并个别化而不能通过。正是由于它不通过，才有可能同系统在周期层面给予我们的信息进行比较。也就是说，能量即使未必在潜能上减少，至少可以说在强度上降低。

迪迪埃·安齐厄

也就是说，发生满足或疼痛时，每次都有量的过剩——一种情况下被释放，另一种情况下被承受。只有当这种过剩不存在时，才有构成认识基础的感性性质。不过这些现象仍存在：感性性质中的量很少，但会把握某种周期。

自我能够构成认知与再认过程。如果初级过程主要同满足和疼痛经验相连——那里会发生神经元投注——那么认知过程则主要同中性行动、同中性化的感性性质相连。这种中性状态例外地存在，却会由于自我的介入而成为常态；自我保护系统免受量的过剩。弗洛伊德以纯粹联想主义术语详细描述记忆和判断的构成，也就是神经元投注之间的联想，并且说明，对各种投注作神经元层面的分析怎样严格构成第一个判断。从这一刻起，把生活经验的记忆同实在知觉作比较都变得不可能[注]，而行动本身却由此成为可能。

> [注] 法文底本此处写作 toutes les comparaisons deviennent impossibles，与上下文对“现实检验”的论述存在张力；译文保留可见否定。

拉康

我认为，您在这里带来的建构，甚至推演，十分接近您方才提到的孔狄亚克雕像；二者同样缺乏对层次差异的感觉。也就是说，归根结底，知觉根本没有同任何得到表象的东西相连。

我们如今不得不把它插入自我与他者的辩证法；你们会看到，这项参照的意义正在这里。在这份最初的自我草图中，已经开始显露人的对象世界构成之结构条件——这正是我方才指出的、极为原创的东西。

反过来，自我在对他者的参照中运作——而这项参照对对象的结构化同样关键——却被彻底省略。换句话说，像孔狄亚克的雕像一样，只

要谈感觉，世界的对象化组织似乎就自然而然、不言自明。那个完全没有被看见、却非常醒目的问题，是弗洛伊德最终通过哪条道路给出一些公式，让它仿佛物质化、具体化？正因为自恋的发现此时完全尚未被看见，它后来才会取得全部价值。

全部工作都会在其间发生，也就是建构他所谓“梦的心理初级过程”。有趣的是，整场报告最终会抵达梦。这颇为奇怪，因为他已经重建一切；像当时所有人一样，他听从十八世纪哲学家的指引，从感觉出发重建记忆和判断，只在寻找对象本身这个问题上短暂停留。

但他不会停在那里。可以看到，有某种未出现在文本中的东西把他带回初级过程，因为它涉及睡眠与梦。这份《纲要》从未发表，但弗洛伊德需要借它整理自己的思想；它从一个机械上可以构想的世界出发重建现实，结果仍然抵达了梦。

迪迪埃·安齐厄

弗洛伊德从次级功能返回这些初级过程，是为了解释那些通常被人忽略的心理现象。他本人却已经开始通过观察癔症患者、分析自己的梦而体验到它们；“伊尔玛打针之梦”比这份手稿的写作早三个月。我想，他发现新现象时产生了一种警报反射，试图把它们纳入自己熟悉的理论框架，以确认一切仍能运作。

至于梦，他证明它是一个初级过程，因为梦中不可能发生纯粹的外部运动释放，因此具有幻觉性质：主体的全部生物经验和学习都被悬置。观念具有幻觉性质，会唤起意识和信念。这才是分析自己和患者的梦所得出的真正新东西。梦的功能是实现欲望。

他说，这是一个继满足期待而发生的初级过程。最初的欲望投注具有幻觉性质。因此，我们又回到这里：满足经验会产生第一套纯粹幻觉性的联想系统，毫无现实参照点。

如果停在这里，它会把有机体引向〔……〕[注]。人在梦中被带回这套系统；这解释了梦为何几乎不留下记忆。梦的特征是量极易发生置换。梦中得到“满足”的欲望一般并未进入意识。他以自己的“伊尔玛之梦”为例，说明其中有两个元素是有意识的：有人命令注射丙基制剂，以及那条化学式。

> [注] 此处法文底本在 conduirait l'organisme à 之后有缺文，结果项不可见。

分析使他重新找到仍处于无意识的两个链节，并解释这些著名神经元投注的联想：一个是性化学的观念，他上次会面时恰好同弗利斯谈过；这次会面发生在促使他撰写手稿的那次会面以前：

- 第一次会面触发伊尔玛之梦及其分析；
- 第二次会面触发手稿写作。

第二个观念是伊尔玛疾病的性性质。

拉康

今天就到这里。这意味着我们接下来必须从《梦的解析》的过程出发，需要有人承担。比如瓦拉布雷加？您能否在十五天后，把梦的意识这一最后一章同《梦的解析》的理论连接起来？他在后者中给出了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的完整理论。

第9课 · 1955年2月2日

瓦拉布雷加

拉康

我还是想就昨晚的聚会说几句。勒费弗尔-蓬塔利斯提醒大家应当在“镜像阶段”的使用上有所节制，我赞同这一点：不应滥用。“镜像阶段”不是魔法词，而且已经开始挠动那种追求新奇的需要；从进展角度看，这种需要并不总是最好。人必须懂得返回事物。真正令人厌烦的并不是重复它，而是用错它。

不过，可以给朗一个好评；他对镜像阶段用得一点不差。他用得不太好的，是一种全新的理解铰接的形式——凹面镜。镜像阶段已经有些年头，约有二十年了〔1936〕；它的严格形式如今很可能已不完全对应我们应当理解的东西。

〔转向勒费弗尔-蓬塔利斯〕啊，造反者来了！

我向您保证，在精神病、尤其儿童精神病的问题上，仅仅问题的提出方式中，就有某种您——勒费弗尔-蓬塔利斯——可能毫无概念的东西：这项诊断受到何等程度的争论，又何等值得商榷。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知道把儿童精神病与成人精神病用同一个词称呼，是否恰当。

我们如今已经开始使用同一个词；但几十年来，人们始终拒绝认为儿童会有真正的精神病。他们觉得那是别的东西，试图把它联系到某些

机体条件。成人精神病本身有一套结构，可我们在儿童那里发现的结构完全不同。

我们若能合理地谈精神病，是以分析家的身份，因为我们能够在精神病构想上比别人再前进一步。我必须说，我们对这一点还根本没有学说；我甚至会说，我们小组内部也没有，不过这也许很有意义。

安德里厄有一套学说，但肯定不是我们的。朗处在困难境地，因为归根结底，别以为我们在精神病分析中已有某种现成学说或扶手。就连成人精神病上仍弥漫着极大混乱，儿童精神病更不必说。

所以，我认为朗的工作定位得很好。他试图完成一项在分析理解上完全不可或缺的工作，尤其当人向边界推进时：后退一步，保持一定距离。把握我们的临床领域有两种危险。第一种显然受整个教育制约：人们教孩子说，好奇是很坏的行为，而这会妨碍某种训练。

总体而言，我们并不好奇。自动引发这种感觉并不容易。防范另一件事则容易一些——那就是“理解”。我们总是理解得太多，尤其在分析中，总以为自己理解。少数情况下确实如此，但多数时候我们错了。

换言之，我想说什么？一个人若有直观、有天赋，懂得沟通和接触，并拥有那团弥散的技巧总和——所有帮助我们、或更准确地说遮盖每个人在人际关系中能够施展的天才的东西，尤其是与儿童相处时——就可能做出不错的分析治疗。

可一旦采取这种近似的诉诸方式……况且，只要不要求自己保持极端概念严谨性，换一件工具就行，总能找到理解的办法。危险在于，这

会让我们彻底没有罗盘：既不知道从哪里出发，也不知道试图走向哪里。眼下的工作仍只是建立方位的最初咿呀学语。

我们在精神病中面对什么？儿童精神病非常有趣，甚至能反过来照亮我们应当怎样思考成人精神病，至少提供一个要素。朗试图做的正是这一点，而且做得非常好。

他极有分寸地标出了梅兰妮·克莱因与安娜·弗洛伊德体系中的不连贯、偏差和裂口；归根结底更有利于梅兰妮·克莱因，因为说实话，安娜·弗洛伊德的体系从分析角度看严格处在僵局。

他作出了一些极为准确的意见。我尤其喜欢他谈退行的部分。他指出，退行是一个符号。把“退行”当作一种机制、仿佛真实中真的发生了某种回退，是一种彻底的幻觉。你们知道，我不喜欢随意使用“魔法思维”这个词；可这里确实有一种与其说是魔法思维、不如说是魔术师思维的东西。我们何曾看见一个成人真正退行，回到小婴儿状态，开始啼哭？

人们仿佛相信退行是某种实际存在。正如朗指出，它是一个必须作为症状来解释的东西。退行只发生在意义平面，除此以外什么都不是！在儿童那里，一项简单意见已足以证明：儿童没有多少路可退。因此，我们必须把它解释为现实层面之外的某种东西。

我想引出一条意见。最近我正重读《梦的解析》中的一条注释[注1]，它涉及我们近期将要研究的梦心理学过程和机制，并引用杰克逊的一

句话；这对精神病障碍尤其重要。这句话也属于我正在批评的那种不精确：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法国大学出版社（PUF），1967年，第七章，第484页；或2003年新译本，第624页。约翰·休林斯·杰克逊（1835—1911）原话为："找出梦的一切，你便找出了关于疯狂可以知道的一切。"该注于1914年加入。

"找到梦的本性，你便找到了关于精神错乱与疯狂（about insanity）所能知道的一切。"

好吧，这是错的！二者毫无关系。先把这一点装进脑子！

当然，二者会运用同一些要素，都能找到符号，并且相对于意识层面会有类比。可我们恰恰不采取这个视角。因为整个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梦不是疯狂？"反过来，若说定义疯狂时有什么重要之处，那恰恰是因为疯狂的整套重大决定机制，根本不是每晚发生在梦中的那套机制。

不要以为这完全应当记在弗洛伊德名下。法文版并不完整，没有注明这其实是在给欧内斯特·琼斯先生记一笔优点[注2]；有一天，他觉得适合提出这种类比，大概认为这样能把分析传统同英国已经受到认可的东西接起来。

> [注2] 欧内斯特·C. 琼斯：《梦与精神神经症症状之间的关系》，载《美国精神错乱杂志》，1911年7月，第68期，第57页。

属于琼斯的归琼斯，属于弗洛伊德的归弗洛伊德。你们务必从如下观念出发：绝不能沿这个方向看事情；梦的问题完全没有解决精神病的任何经济问题。今天我无法多说，但强调这一点在我看来十分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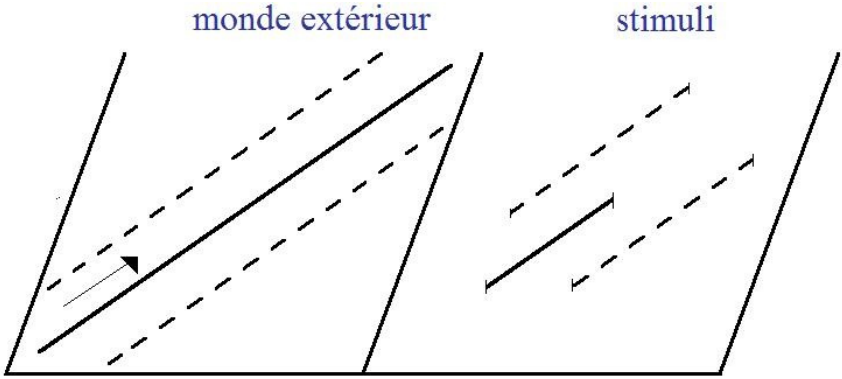
这是向未来抛出的一枚引线，指向我们今年也许会开始谈论的精神病问题。明年，我们必须专门处理它。

我们回到上次的主题，也就是我们与安齐厄一起开始处理的弗洛伊德文本。我请瓦拉布雷加先生从上次停下来的地方接续，为我们引入弗洛伊德关于心理机制、关于心理装置本身的经济图式。我们要穿过他的作品考察后续阶段，也就是《致弗利斯书信》之后附载、安齐厄上次开始阐明的那份普通心理学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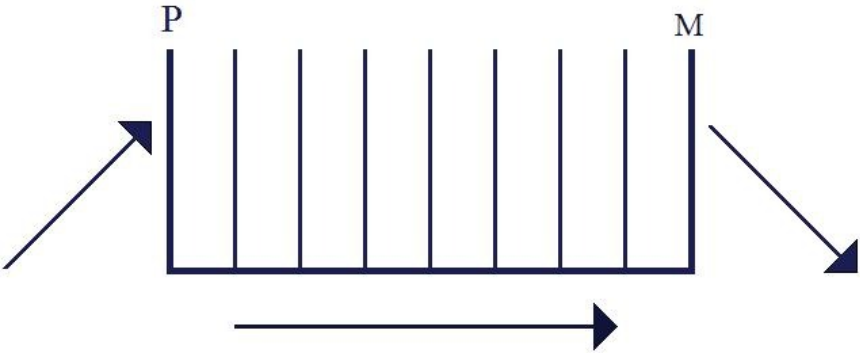
我会在黑板上画一幅图式，好让你们记住一项必要的东西，可以回来参照并把握这里所探索的运动。在当前情形中，这样做很恰当，因为你们会看到它能给我们什么。我每次都会尽量画同一幅图式：它们可以相互比较，结构彼此相似，却又恰好因其中标出的进展而有所不同。

因此，我会为你们画出弗洛伊德心理装置的四幅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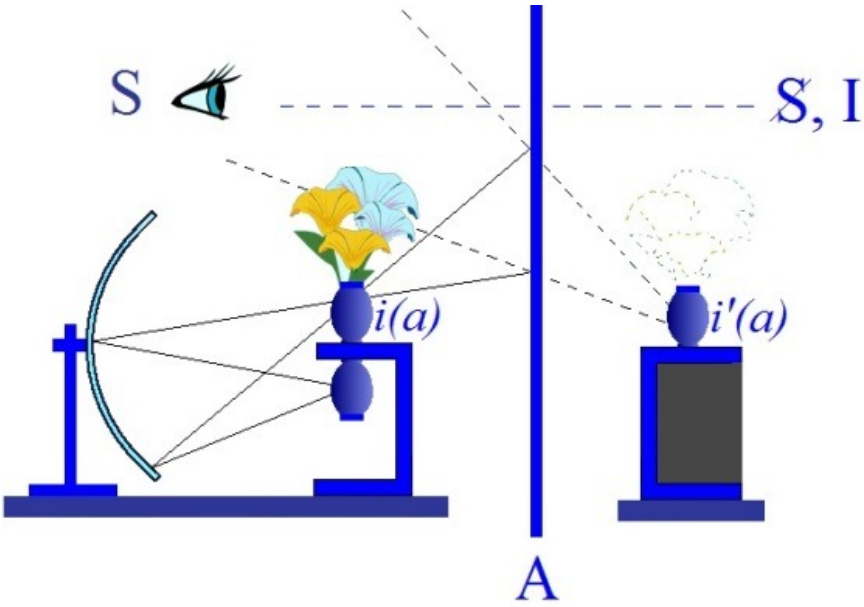
- 第一幅对应他最早的《普通心理学》中勾勒的东西；它从未发表，只供自己参照，却充满富有成效的洞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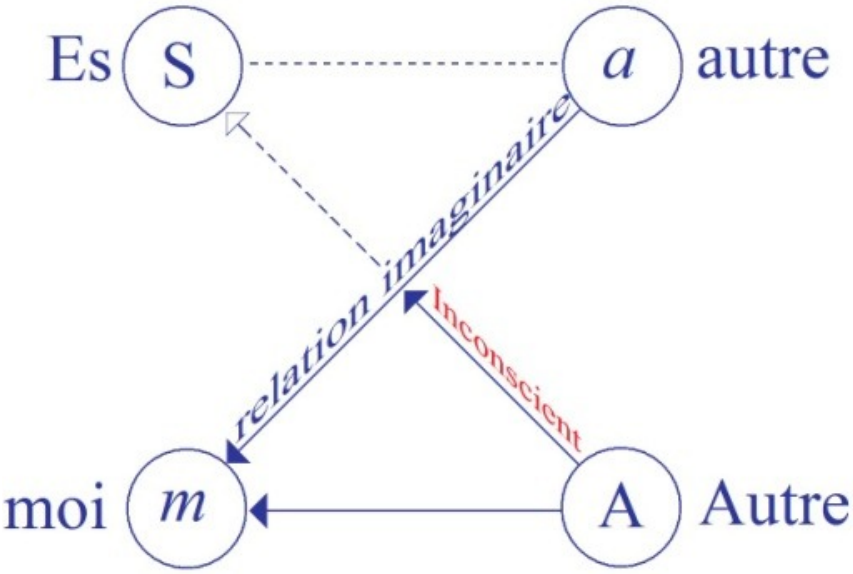
- 第二幅位于《梦的解析》所带来的层面，也就是他为解释梦而给出的心理装置理论。请注意：给出梦解释的全部要素以后，他还必须把梦定位成一种心理功能。这是《梦的解析》的第二阶段。



- 第三幅位于力比多理论出现的层面，它晚得多。人们想象不到，它甚至不与《性学三论》同时，而是同自恋功能的降临相关。我本来安排佩里耶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他会在下次或再下一次完成。



• 最后是第四幅：《超越快乐原则》。



在这四幅图式中，你们会看到问题所在：归根结底，它们始终都在给分析领域画图。最初，他称它为心理装置；你们会看到他怎样进展。图式的形式中始终有某种相似之处，尽管它们针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功能。

我想，我们可以从这种进展中得出一些关于弗洛伊德怎样逐步思考所谓人类存在的可靠结论。归根结底，这正是全部问题的根底，也是你们在理论层面可能提出的全部要求。

尽管如此，人们仍有这样一种观念：

- 你们面前的是一个对象，是某种个别的、即使未必独一无二的东西；
- 一切都集中在你们面前这个形式周围；
- 精神分析——即便心理学未必如此——的对象单位，恰恰就是这个个体面向，是被投射在面前、你们自以为能够同时认识其法则与界限的东西。

勒费弗尔-蓬塔利斯昨晚的“呼吁”底部就有这种观念：你们全都相信自己始终处在心理学领域，仿佛心理是眼前这个东西的某种属性或复本。十分奇怪的是，你们没有看出，与人之关系领域中的全部科学进展很可能沿着——而且沿着更为恰当——我现在将告诉你们的方向展开：总是让对象本身消逝。

物理学越是前进，就越少把握、越不重视可感之物；直说吧，它会退到第三十六层背景。物理学家对这只玻璃杯毫无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能量、原子、分子的交换层面；这些东西只是以完全短暂、偶然的方式实现眼前这个表象，从物理学观点看，这个表象没有任何重要性。

请牢牢记住，人的情形也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存在因此从我们眼前消逝。作为哲学家，你们恰恰应当知道：存在与对象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有一种经验从远景上向我们展示，这个从科学观点无法把握、也不属于科学秩序的存在可以定位在哪个方向，那么它仍能标示其消失点——可以说，标示出遇见存在的方向——并强调人根本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正在实现自身的存在，是某种属于另一种形而上

学秩序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着它因此就成了我们作为科学对象的对象；不过，我们的对象肯定不是那个表面体现它的个体。

比如，弗洛伊德指出，梦中始终有一个绝对无法把握、属于未知领域的点；他称之为“梦的脐点”。人们不强调文本中的这些东西，以为那大概只是诗意。并非如此！这意味着某处有一个无法抵达、在现象中没有任何可把握之处的点；在分析中作为我们伙伴的这个特殊对象，其同象征界的关系正从这里涌现。是的！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弗洛伊德那个点的参照，而我称之为“存在”——科学立场绝对无法抵达这个最终词。重要的是，我们在现象中已经看到其方向得到标示。

相关知识卡 梦的脐点：不可穷尽的未知点

因此，对我们始终重要的是：面对所谓伙伴时，我们必须看到自己应定位在哪一点。而且，有一点已被清楚凸显——我想你们也开始窥见：我们必须把自己定位在两个不同维度中，尽管它们不断黏合在同一个人际关系现象里：

- 一个是想象界；
- 另一个是象征界。

二者以某种方式彼此交错；我们必须始终知道自己在其中占据什么功能，也就是在哪一个维度、哪个方向上面对主体：要么以严格意义上构成对立的方式，要么以实现中介的方式。

当然，这只是一种概括。人们可以作出这种区分；如果因为二者在现象中混杂便以为它们彼此重合，那就错了。这样只会抵达某种“魔法沟通”、某种普遍类比的平面；许多人据此把自己的经验理论化。它在具

体个案中也许往往丰饶、丰富而富有沟通性，却不仅绝对无法被建构，而且实际上会招致一切技术错误。

你们也许会在我提到的第四幅图式中，看到它被更精确地形象化；那幅图对应弗洛伊德思想的最后阶段——《超越快乐原则》。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我从前些天安齐厄停下来的地方，接着讨论那些草稿（Drafts）。问题是研究 Ψ 系统在睡眠与梦中的初级过程。不过，我想应当先概括弗洛伊德关于 Ψ 系统初级与次级过程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会回到这篇文本第386页及以后。

弗洛伊德说，自我在两种情境中会体验不快并受到创伤。他其实没有使用“创伤”这个词，至少英译本用的是 damage〔损害〕。我仍把它称作创伤，因为稍后接下来的段落谈到生物性的损害（biological damage）。

因此，自我可能在两种情境中受到创伤。

- 第一种：欲望状态无法继以满足，因为对象并未真实在场，只是被想象出来。弗洛伊德说，在早期阶段，Ψ 系统无法作出这种区分；所以必须到别处——也就是 Ψ 系统以外——寻找一项区分标准，使知觉能够同观念分离。

- 第二种情境：Ψ 系统需要一项指示，不再是为了满足……

……而是为了避免不快。正如安齐厄前些天所说，它借助侧向投注做到这一点。如果 Ψ 系统能够执行这种抑制，不快的避免与防御便成为可能。

否则，就会发生某种泛滥，也就是强烈、巨大的不快，以及初级防御。

在这两种情境——不可能满足，以及避免不快——中，我们已经看到第一种预示快乐，第二种预示不快。两种情况下都可能发生创伤；弗洛伊德在这里使用“生物性损害”（biological damage）一词。因此，两种情况下都必须有能力区分，获得一项指示，以区分知觉与记忆或观念；也可以说——尽管原文没有这样写——区分现实与形象。

我在这里不会使用“实在”和“想象界”这两个词，因为必须看清，知觉不是现实，而是现实的一项指示。最好忠实于弗洛伊德使用的词：现实与形象。弗洛伊德将在两个根本要素中找到我们必须寻找的这项区分标准：

- 一方面是信息；
- 另一方面是抑制。

现在必须解释这一点。

拉康

如果您担心谈“现实”是在超前，那么谈“信息”更是大大超前了，尽管它确实在主体之中。不过既然如此，也不必顾虑！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我把 report 译作“信息”。这是弗洛伊德使用的“报告”意义，不是连接关系，而是信息。

拉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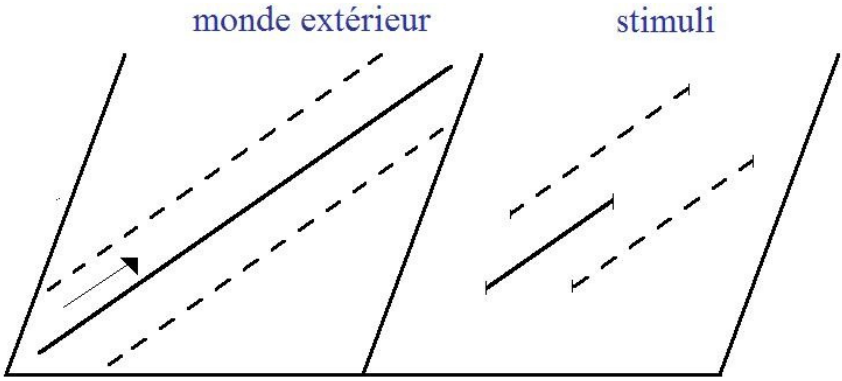
您说得对。不过，“信息”概念此时根本尚未被建构，弗洛伊德心中也一样。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它存在于他一贯使用的 report 语境中。因此，我们在寻找如下东西：弗洛伊德以后会一方面在信息中、另一方面在抑制中找到它。我会用斜体引用相关段落，并保留 report 一词，因为意思很清楚。他会提出这两项“标准”——“标准”也是他本人的词。我们必须回到 ω 系统。

拉康

我在黑板上画了这幅小图，好让你们跟上。



总而言之，这就是他所谓的 φ 系统，对应反射弧。因为他正是从这里出发：反射弧图式曾给人极大希望，可以借它建构生物及其同环境的关系；这里采用的是最简单的反射弧形式。

这两条线不是界限，而是图中的断开；它既与中间你们将看到的一切相距甚远，又仍可彼此接近，因为它可能直接从这块板走到那块板。这里就是回答：反射的短路；人们借此给出生物关系系统属性的第一幅根本图式。

它接收某种东西。那是信息吗？肯定不是！但它仍对兴奋作出某种回应。不要忘记，这种回应的背景始终暗含某种适应之物；也别忘记，反射弧图式出自对青蛙的最早实验，并同电学一道出现。你们会看到，电不是凭自身、而是作为模型教给我们如此多的东西。

电学当时刚开始在世界上出现。青蛙对刺激作出反应，而且刺激不只可以是电刺激：在它腿上滴一滴酸，它会用另一条腿去抓挠。这被看作一个回应。你们在这里看到无处不在的结构！其中有两件事：传入与传出这一对，以及如下事实所暗含的某种东西——如果生物是适应的，这种回应终究必须有点用。因此，全部任务就是撤去“回应”这个词中的暗含，并尽可能把这条回路中性化。

弗洛伊德在自己构造的起点重拾这一点，似乎已经把平衡概念，也就是惯性原则放了进去。但你们会看到，这完全没有根据。从能量观点看，在某种可以称为刺激——而他已经称为信息，我认为这为时过早——的东西与输入（input）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可以说，从这里出发，就是从一种前科学状态来处理问题，也就是能量概念本身被引入以前。我曾告诉你们，这远早于孔狄亚克的雕

像。从观念演变看，这里没有任何能量考察，只是一种出发点、一幅基础图式；真正必须寻找能量要素的地方完全在别处。

弗洛伊德的构造正凸显这一点。他必须把在另一套系统中起效的东西插入回路，也就是插入 Ψ 系统。只有在那里，能量的加入才会介入，甚至只有在那里才真正开始进入考量：这套系统会处理内部指示，也就是需要。需要是什么？它确实与有机体相关；在那里，我们能够取得需要（need）这个概念，并把它与欲望区分。

昨晚，朗遗憾地指出，人们总把需要与欲望混淆。二者完全不同。需要（need）表达的是：这套有机体内部的特殊系统怎样进入有机体整体稳态的运作，也就是进入确实包含能量恒常概念的东西。

换言之，能量概念一出现在弗洛伊德作品中，就沿横向出现。在这里，它支配着 Ψ 作为感受有机体内部之物的系统，与 Ψ 作为产生同其需要相关之物的系统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也就是说，从这里出发，他确实可以认为二者存在能量等价。

不过，沿这个方向仍有某种东西变得彻底神秘，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相对于能量概念，与有机体平衡相关的某种内部压力同其出口之间的等价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完全看不出这是否必要，甚至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这是一个 x；其特征恰恰是：在理解问题时，它最初曾充当近似和思想出发点，随后却被彻底放弃，因为你们会看到，它最终只显得完全无法使用。

就连这里可能有的输入（input）——也就是外部世界带来的东西——也不仅无法令他满足；他还必须临时发明、引入一套额外装置，也就是 ω 装置。上次已经有人告诉你们，这是书写上的游戏；它很可能指知觉系统。

他从能量概念出发——也就是必须向系统投入某种东西的观念——构造出如此漂亮的关系系统理论以后，我已经告诉你们第一项近似归结为什么：要从礼帽里掏出兔子，必须先把它放进去。刺激—反应这一对所暗含的无非是：必须先有东西进入，才会有东西出来。我们将从这里建构一切。

有了这样漂亮的开端，弗洛伊德最终定位知觉系统的方式却很奇怪。不要过早称它为“意识”；你们会看到，他后来会把它同意识系统混在一起。他必须把它作为一项额外假设引入。为什么？因为他不仅需要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还需要一套反映世界的内部东西；更准确地说，需要一套内部装置，不只以某种方式反映外部世界的激发，还反映其结构。弗洛伊德不是格式塔主义者——不能把全部优点都归给他——但他仍不得不感到后来促成格式塔建构的那些需要。

事实上，要让这个生物不至于每次都死掉，它就必须拥有外部世界的某种适切映像。这向你们同时表明，这幅图式暗含什么要求。全部理论要求都对应后来以“稳态”一词被孤立出来的东西；它已经以必须维持的平衡和缓冲区概念存在于弗洛伊德图式中。因为归根结底，它始终要把全部兴奋、刺激维持在同一水平。因此，它既要防止不记录，也要防止记录错误：必须记录，却以过滤后的方式记录。这是一道滤器或缓冲器。稳态概念就在这里，而且同时暗含入口和出口处某种叫作能量的东西。

可是，这幅图式显得不充分，恰恰因为它是一幅神经系统图式：系统原本属于过滤秩序，其功能和用途是一种有组织、渐进的过滤，其中包含通路易化。然而，图式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相信，这些易化终有一天会沿功能上可用的方向发展；若硬要这样归结，那么这项首次尝试其实是一次可悲的失败。

这些易化会经由个体发展中发生的全部事件和偶发事件而不断构成；它们被拿去同一个模型、一项比较标准对照，后者为我们给出实在结构的尺度。也就是说——正如瓦拉布雷加先生方才说得很准确，虽然他忍住没把它说出来——我们完全不能把它称作想象界，原因你们都明白：想象界确实必须在那里，却根本没有得到标示。想象界包含格式塔的某种介入，包含一种让生物主体预先倾向于同某种典型形式发生特定关系的东西；这种形式以生物耦合的方式特殊回应主体，比如本物种的形象，或特定环境中对它具有根本生物用途之物的形象。这里没有这一切的丝毫痕迹，只有经验区与易化区。

这是把记忆构想成一连串系列和记忆痕迹的第一种观念，换言之，是建立起来的一组易化系列。当我们引入“形象”概念，它便显得完全不充分。也就是说，当一组被设想为能唤起某种形象的易化受到新兴奋而再次激活时，按照这幅最初图式，这个形象会倾向于再现。

换言之，Ψ　装置运作的基础、根基和原则始终是幻觉。若把这里设想成一块能产生形象的感光板，而形象纯粹由一系列经验带入，最终必然得到这个结论。如果形象在那里，只因经验的记录起了作用。

如果假设每当激发、压力、需要、输入、能量刺激再次出现时，这个形象就会再现，那么很清楚，面对任何激发时，后来所谓的初级过程

——他在这里也许已经这样称呼，但我没有把握——倾向于再现的始终或多或少是一个幻觉。于是，问题立刻被带到幻觉同现实的关系上：必须假定还有另一种信息模式——借瓦拉布雷加先生的话说。我们不得不以一套相对于占主导地位的能量观点具有悖谬自主性的系统形式，恢复意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拥有某种消耗尽可能少的能量之物。

否则，我们看不出怎样能够建立世界的正确结构，从而纠正一连串被设想为具有幻觉效果的经验所造成的事情。必须始终有一个校正机构、一套现实检验装置。在弗洛伊德理论的这个阶段，现实检验只能通过比较进行——与经验中接收并保存在心理装置记忆里的东西比较。起初，他本想彻底排除意识系统；现在，为了获得这个参照，他却被迫以某种得到强化的自主形式重新建立意识。结果就是如此。

我不是在批评，也不是说这合理或不合理。你们只需看它会把他引向哪里。都跟上了吗？

那么，他要经由哪条弯路构想这套系统、这项可以说是作为参照的比较？Ψ　系统作为缓冲系统、稳态系统，调节激发并记录它们；经验在其中给出某种东西。为了在二者之间进行比较，他被引向什么额外假设？我们正是根据额外假设，衡量他面对的困难以及解决方案的有效性。

他被迫提出哪些彼此相关的假设？它们归在您方才所说的两个标题下：一方面是抑制，另一方面是信息。这项信息会有什么特征？它是什么信息？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正如拉康刚才所说，中心问题确实是现实指示。弗洛伊德说，外部知觉中的现实指示由知觉神经元提供。事实上，ω 系统或 W 系统会产生一种质的兴奋，但这种兴奋无法抵达 Ψ 系统。因此——拉康先生已经预告——ω 系统中产生的质的兴奋对 Ψ 系统没有任何用处。

拉康——不是它“不能”有用，而是它“不应当”……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他说的是“不能”，把它陈述成一个事实。现实指示十有八九由知觉神经元提供。在一切外部知觉中，W 系统会产生一种质的兴奋，但它本身对 Ψ 系统毫无用处。

总之，来自 ω 系统的质的兴奋无法传递。这里的问题是现实指示如何传递；我们会看到，它怎样被安排成三个不同过程。既然这种质的兴奋不能传入 Ψ 系统，就必须承认知觉兴奋之后会发生知觉释放，而知觉释放只是中间阶段。

因为抵达 Ψ 系统的也不是知觉释放本身，而是这次释放的一份“报告”（report）。正因如此，我使用“信息”一词。抵达 Ψ 系统的既不是兴奋—知觉，也不是兴奋之后的知觉释放，而是关于这次释放的信息，也就是这次释放的 report。

因此：

1. 兴奋—知觉；

1. 知觉释放——全部事实都促使弗洛伊德假定它；

1. 传递给 Ψ 系统的关于这次释放的信息或 report。

因此，来自 ω 系统的释放构成被传递给 Ψ 系统的现实指示。

幻觉的情况又如何？所传递的指示是释放的报告，与知觉情形相同。正因如此，在幻觉中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区分知觉与观念或记忆。

反过来，如果抑制介入——自我受到投注以后，这才可能——欲望投注便会在量上减少，同时出现质或现实的指示。只有这时，区分标准才有效。因此，弗洛伊德补充说，最终正是来自自我的抑制构成知觉与记忆的区分标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抑制只有在自我受到投注后才可能发生。

最后，在作出接下来这段概括以前还必须补充：第二种情境——避免不快——中，ω 过程将充当一种生物信号，其功能是通过产生注意——一种 Ψ 过程——来保护 Ψ 系统。我稍稍展开了弗洛伊德在接下来的概括末尾简短说出的东西，然后再转向其他考察。

为了这项保护功能，Ψ 系统的注意会被吸引，ω 过程于是发挥保护作用。Ψ 系统的注意被什么吸引？被知觉的在场或缺席吸引。这样一来，区分标准便能发挥作用。不知这样说是否足够清楚？

拉康

您的阐述中也许存在一种失衡，原因如下。我方才说过，能量概念在Ψ 系统层面发挥作用，也就是在我们的横向图式中发挥作用，因为弗洛伊德在那里引入了“量”。不能把这个词靠近热量——后者早在热力学史初期便已使用。沿这个方向出现的是一切真正重要而巨大的能量投注；它们同生物的存在本身、存续本身相关，也就是需要。这些需要被说成决定生物的一切主动行为，为其寻找与行动提供真正能量。在这里，我们拥有这些巨大而同样属于量的能量位移；因为在弗洛伊德理论中，两件事混在一起。

真正重要、也真正构成问题的是：质……

也就是外部世界的这片知觉区域——其中大部分没有生物意义，不直接推动任何需要，也不回应生物的任何需要——被视为 Qη、神经元之量的来源

……怎样才能进入运作？

他借助一个巧办法做到这一点，而这也许正是您漏掉的部分。ω 系统面向外部世界，由一些分化器官构成；其构造使它记录的不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能量。我们确实可以设想巨大能量——温度变化或强大压力——被推到严重威胁生物持续存续的界限。遇到这类情况，生物若无法缓冲，几乎只能逃走。但这完全不属于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问题是心理同外部世界精细规定相关的那些关系功能。这些专门装置的构造方式，使外部世界某个现象所含的能量——比如太阳能——只会让它保留该现象的一种周期。比如，从太阳到达我们的东西中，它只保留光能的周期：从太阳辐射中选出光能、选出一定频段；在这些

频率中，它甚至不与光能本身的能量区域相调谐——否则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变压器和光电管——而只与周期调谐。

因此，他不得不把质本身实体化在一套专门装置中；这意味着几乎彻底抹去一切能量输入。不妨这样说：眼睛接收光线时，保留的能量比一片绿叶少得多；绿叶利用同一束光可以进行种种事情，比如叶绿素转化……弗洛伊德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换言之，问题会涉及如下东西——也正因如此，你们当然会有 perceptuale〔被接收之物、感觉〕、perceptuale excitation〔知觉兴奋〕以及知觉释放等概念。不过你们也感觉得到，仅仅为了知觉而存在的释放——也就是发生在这套装置本身层面的释放——只是一种对称需要。

他终究必须承认，这里同样存在一定的能量恒常性，也就是被带入的东西必须在某处重新出现。但真正得到强调的是，兴奋与释放之间只有最小能量发生位移。为什么？正因为这套系统的属性，它必须尽可能独立于严格意义上的能量位移。它必须从中抽离、区分出纯粹的质，也就是把外部世界当作单纯映像。明白了吗？

证明在这里：内部层面发生的东西——形象在那里只依赖记忆，因此在本质和性质上都是幻觉性的——要同外部层面进行比较，自我作为第二级强化缓冲调节功能的东西，就必须最大限度抑制这套系统中的能量通过，使它尽可能降到最低水平；这样，两个层面之间才可能比较、权衡，并建立共同尺度。

唯一条件是：作为激发或 report 到来的东西必须受到过滤——你们感觉得到，这个 report 已经暗含一项额外假设。外部世界本已被这套系

统大幅过滤，如今还必须再度过滤，才能与根据需要而涌现的特殊兴奋相比较，比如饥饿时对一顿美餐的形象。问题在于需要的压力处在哪个水平，从而决定：

- 它是否会不顾一切证据强行占据上风，并且由于外部什么都没有而维持很久；
- 还是位移的能量能否被自我充分缓冲、筛滤到足够低的水平，使人发现形象并未实现。归根结底，事情就是如此。换言之，完成这项最初建构以后，弗洛伊德相信：既然已经认识反射，便能逐渐从中推导并建构出从知觉、记忆、思想到观念的全部层级——这是传统立场。

〔……〕[注]弗洛伊德将会给出一幅令人满意的图式。他由此被引向如下构造：最终把知觉—意识实体化在一套系统中。这并非彻底荒谬，因为这种分化系统确实存在；我们对它有所认识，甚至大致可以定位。它并不完全等于感觉器官，而是大脑皮层，或至少是发挥这一作用的皮层区域。他不得不在心理装置中区分两个区域：一个属于想象、记忆，更准确地说属于记忆性幻觉；另一个则是作为专门系统的知觉系统。这里看到的只能是意识作为现实的映像。

> [注] 此处法文底本在段首有缺文，无法确定与前段的连接成分。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的确应当这样看。不过，这要到很晚以后才显现，不在1895年的文本中。总而言之，他多少以此为基础；只是此时还没有后来以知觉—意识系统提出的清晰心理装置概念。这里已有一些要素，但它们以后才会显现。

拉康——这些要素就是 ω。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它尚未被构想成他后来所谓的心理装置。

拉康

我反倒认为，这些装置本身已经在那里。如果他没有把它们区分成装置，为什么会称它们为 Ψ、φ 和 ω?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接下来，他会在 Ψ 系统本身区分两个根本要素；这才会形成心理装置。

拉康

但我下次想向你们展示的，恰恰是“心理装置”这个词完全不足以指称《梦的解析》中的东西。你们会看到，《梦的解析》引入的维度绝非孤立维度，而是刚开始涌现的时间维度。另一项与它完全相关的维度也已经存在，那就是“信息”。事实上，信息并不是在他使用 report 一词时才得到个体化；是我们从中推导出必须存在一份 report。请继续，瓦拉布雷加先生……抑制意味着，自我必须把神经元之量平息到一定水平，使其可以被使用。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这里谈的是自我（ego）与现实指示。必须区分三种情况：

1. 若现实指示出现时自我正处于欲望状态，能量便在弗洛伊德所谓“特殊行动”中释放。这第一种情况就是欲望得到满足：自我处在欲望状态，现实指示出现，随后出现实现欲望的特殊指示。

1. 现实指示与不快增加同时发生。Ψ 系统通过侧向投注产生防御，以此作出反应。

拉康

这意味着，能量的量穿过多个神经元滤器以后，以较低强度抵达突触——这是电学图式。若让一股电流通过三四根导线，而不是只通过一根，那么每根导线所需的阻抗会按导线数量成比例降低；也就是说，突触可以更容易拦住它。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第二种情况是针对不快增加的正常防御。

1. 最后，如果前两种情形都未发生，投注可以按照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不受阻碍地发展。

这就是抑制的三种情况。随后，他会根据这些意见，转向界定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初级过程指从幻觉点、幻觉表象出发的欲望投注；次级过程则指对初级过程的调节。这种调节以正确使用现实指示为条件；要让它实现，就必须有自我产生的抑制介入。最后，他会回到睡眠与梦中的初级过程。在此以前，他从刚才界定的两个特征——调节与抑制——推导出次级过程的两项重要后果。

第一，次级过程会表现为初级过程的减弱重复；记忆就是这种情况。第二，抑制或侧向投注会束缚一定能量，而这股能量出现在另外一些过程——判断与注意——之中。请注意：记忆恰恰是再现的次级过程，而初级过程是联想。思想痕迹与现实痕迹的持续存在，使再现成为可能。

拉康

这是什么意思？判断和思想，就是受到抑制的能量释放。这个构造会始终属于弗洛伊德；后来他说，思想是一项被维持在最低投注水平的行动。它是某种模拟行动，在通常会走过的回路内部进行。现实则始终是他不得不承认的东西，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映像。我们当然也必须承认它，因为一些实验观念表明，我们必须经过这种中性知觉的观念。我说“中性”，是从投注角度而言，也就是拥有最低投注。

别忘记动物心理学揭示的事情。动物心理学之所以进展，是因为它凸显动物世界、动物 Umwelt〔周围世界〕中各种构形的力线；这些力线构成预成的召唤点，对应动物的需要，也就是所谓 Innenwelt〔内部世界〕，亦即同维持自身形式相关的某种结构。说实话，仅从能量观点谈稳态还不够；螃蟹的需要与兔子的需要不同，原因很多，这正对应 Innenwelt。同样很清楚，螃蟹与兔子感兴趣的东西不同。这仿佛不言自明。

其实，这根本不言自明。假设你们研究一只兔子、螃蟹或鸟，把它置于实验中，探索其知觉领域……再换一种动物，比如向老鼠或母鸡提供某种极具欲望价值、能喂饱和满足它的东西——谷粒——同时借助

选择装置，把这种食物或满足需要的对象，系统地同一个三角形、绿色或红色的形式关联起来。

这类实验会使你们发现——容我这样说——一只母鸡乃至一只螃蟹能够感知的东西数量多得惊人。它们可以通过与我们同源的感官——比如视觉和听觉——也可以在某些情况下通过看起来完全像感觉装置、我们却无法赋予任何拟人对应的器官——比如蚱蜢腿上的器官——来感知。无论如何，你们会发现，与优选性地介入并结构化其 Umwelt 的东西相比，每种动物可用的感觉区域和领域都极为广阔。

换言之，我们远非只面对 Innenwelt 与 Umwelt 彼此适配、外部世界按照动物需要预先结构化的情形。我们看到，每种动物都有一片“意识区域”——按照这个视角下所见，不妨这样称呼。我并不是说动物拥有意识；我要说的是，只要每个物种的感觉系统都会接收外部世界，它所接收的范围就远远大于我们能把它结构成多少预成的、对应关键需要的回应。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对应某种东西：这幅图式所概括的一层感受表面说明，人获得的关于现实的信息，比仅靠自身经验脉动取得的多得多。

这里缺少两样东西。一是我所谓动物的预成道路：仿佛人从一无所有出发，必须学习木头会燃烧、不能跳进虚空。其实，人并不需要学习全部这些事情，但他生来知道什么又很含混。更可能的是，有人通过弗洛伊德在动物身上没有纳入的其他道路教给了他。

很清楚，我们已经看到他拥有某种方位、某种克洛岱尔意义上的“认识”（co-naissance de la réalité，与现实共同诞生）：那无非是这些格式

塔、这些预成形象。我们必须同时承认，它们不仅是弗洛伊德理论的必然要求，也已经在动物心理学中找到回应：存在一套中性记录装置，构成这个“世界的映像”。无论称它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不妨说弗洛伊德称它为有意识。

你们已经看到，为什么它在人那里会呈现出我们所谓意识这种特殊凸显：恰恰因为自我的想象功能进入运作，也就是因为人：

- 看到这片映像领域；
- 从他者的观点观看……人对自己而言是一个他者；这便给你们造成意识对自身透明的幻觉。因为归根结底，我们并不在那里，而是在他者的意识中看见映像现象。

不过，所有这些都尚未被建构。今天这场论述令人吃力之处，在于要向你们展示弗洛伊德第一次振翅、试图给出一幅心理装置的理性图式时，面对哪些困难。

你们看到，这一切在某些方面既粗糙、含混又多余。反思以粗糙形式把我们引入等价概念时，人们完全不知道这个公式何其驳杂，又已包含多少问题。因为弗洛伊德在那里引入的，只是一项能量概念：存在需要，而需要推动人类存在作出若干旨在满足需要的反应。

如果你们愿意，初看之下，人们可以批评这项概念带有活力论色彩，被强行塞进一幅伪机械论图式；但它实际上富有成效，因为它是一项能量概念。起点处就有神经元能量之量的概念。只因引入了这一点，你们就会看到：当它同弗洛伊德的梦经验结合以后，图式将发生醒目的演变。

很抱歉我们今天坚持讨论了这么久；这也许令你们觉得贫瘠而极端陈旧。不过，重要的是看清，这幅图式中的哪些问题、哪些朝向未来的萌芽迫使构想演变。事情绝不是克里斯先生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仿佛弗洛伊德思想经历了一场从机械论思想到心理学思想的演变。那只是毫无意义的粗糙对立。

弗洛伊德没有放弃自己的图式；而且就在同一时期，他还提出了梦中那幅更精细的图式，却既未标出也未感到二者的差异。你们会看到，这些差异何其醒目，并且标志着把我们引入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分析领域的决定性一步。不过，这绝不是弗洛伊德转而皈依某种器官—生理学思想、某种〔……〕[注]。延续的始终是同一种思想。可以说，他的形而上学并没有改变；他只是建构并补全图式，并会让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进入其中——正是我们正被引向的“信息”概念。

> [注] 此处法文底本在 une sorte de 之后有缺文，被否定的具体思想类型不可见。

我一开始已经指出，我们正在重新构造自己，使之能够一方面澄清“信息”这个在当代思想中极其切近的概念，另一方面表明它是怎样回答弗洛伊德以《超越快乐原则》提出的最后问题。为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不要只是来这里找到所谈论的东西，并因它们迎合自己的习惯而感到满足；你们应当懂得，在那些令人吃力的时刻把思想悬置起来。它们之所以有趣，是因为那是一种创造性思想的时刻；它后来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这次最初处理。

第10课 · 1955年2月9日

瓦拉布雷加

拉康

有一条根本法则：一切健全批评——也就是要批评一部作品并理解它——都应当把作品为自身构造和制作明确给出的原则应用于作品本身。比如，试图用斯宾诺莎本人认为对思想运行、对《知性改进论》和对世界的新把握最为有效的思想线索，来理解斯宾诺莎。这样做富有成效，而且不会离开作者本人设定为有效、有用的原则。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这是一条完全普遍的法则。

另一个例子是迈蒙尼德。他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理解世界的钥匙；他的作品内部明确警告人们应当怎样进行研究。把这些警告应用于迈蒙尼德的作品本身，会把我们带到某个地方，使我们理解他想说什么。

因此，这是一条具有完全普遍适用性的法则。它推动我们这样阅读弗洛伊德：试着理解，仔细阅读他的思想，辨认其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把这部作品本身明确阐述的理解与知性规则再应用于作品本身，也就是理解是什么引导了他的思想。

我想以此作为今天重新开始论述的引言、开篇和提醒。比如，三个研讨班以前，你们看到我开始就《超越快乐原则》的可能理解给出某些指示，谈到那个视情况被我们称作“重复自动症”“涅槃原则”或纯粹“死本能”的 x。你们也听见我在论述的某些时刻谈到熵。

这并非武断。弗洛伊德本人指出，它应当属于这个方向。当然，绝不能按字面理解，否则会十分荒谬。然而，分析家——而且包括最优秀的分析家——并没有避免这种荒谬。

为了赋予死本能某种意义，我们看到一位优秀分析家贝恩费尔德，曾在匿名面纱下重新找到弗洛伊德的童年记忆；弗洛伊德以“屏幕记忆”为题传达了它……

他把一切彻底伪装起来，归在一位患者名下

……但正是文本本身使贝恩费尔德能够证明：这不可能是真实患者的一场真实对话。不是靠传记比对——弗洛伊德的生平仍被遮蔽得很深——而是靠文本结构：弗洛伊德的叙述方式本身显示，这是一场移置，只可能取材于他自己的生活。

他把它同《梦的解析》中的两三个梦联系起来。参加过我对《鼠人》评述的人知道这段内容；如今它也已广为人知，其准确性无可争辩。

1931年——也就是我们正在评述的这篇关键文本问世几十年以后——贝恩费尔德[注1]……

> [注1]　西格弗里德·贝恩费尔德、谢尔盖·费特尔贝格：《熵原则与死本能》（1931），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12卷，第61—81页。

……与费特尔贝格一起给出一份不知该称作什么的“报告”——没有任何语言能为它命名——也就是一项“研究”……

精神分析家一旦开始做实验，那可真不赖，我向你们保证

……他们在那里寻找熵的机体内部悖论——我是说熵的悖谬脉动——在一个生物内部、更准确地说在人的神经系统层面如何发生。

由于熵涉及能量退化、温度下降，以及实验报告所给出的热势性质，他们便比较脑温和直肠温度，声称由此捕捉到悖谬变化的证据；也就是说，这些变化不符合熵原则在物理学中的运作，也不符合我们对无生命系统的预期。

他们认真考虑一个物理学家从系统隔离观点所能提供的东西，严肃比较脑温与所谓体温之间的关系——至于这种测量方式可能引发的全部保留意见，我先略过——并考察生命与死亡的不同阶段，也就是生物转为尸体状态后立即发生的事情。

这读起来十分奇特，至少足以示范：把一个理论隐喻、一个其实更多指向严格意义上的象征结构之问题按字面理解，会把我们带向何等偏差。这些结构就是一些因物理学而必然被引入的范畴；我们甚至可能在处理某类关系时，必然找到一个类比范畴。此类关系不能被纯粹而简单地称作心理学的，而应像他那样称作一种“心理状态”：它意味着把握人的行为，不只把握其意义并引入〔心理？〕[注]本身的维度，还要把握这种意义怎样在分析情境这项原创沟通行动中实现。

> [注] 此处法文底本标为疑读 psyché ?，所指维度并不确定。

必须保留全部这些维度，才能理解弗洛伊德在确认主体行为中某种时间调制、某种意义发生再现时所说的话：

- out，在治疗之外；
- in，在分析治疗之中。

你们已经看到，生命的再现这一事实从根本上把此类问题放到弗洛伊德面前。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它预设了我刚才所说的全部维度：不只是心理层面可对象化的生物，还包括其行为的意义本身得到承认；此外，这种意义还会进入一种特殊关系——分析关系——并在其中运作，而这种关系无论属于何种性质，都只能被设想并理解为沟通。弗洛伊德将要提出的问题，必须在这一切内部得到理解。

谈到死本能时，他不得不把熵用作一种类比和比较。若按字面理解，并把它翻译成其物理学用法中完全精确的术语，便会预设某种东西。

比如，该关系从根本上被写成一个公式，也就是如下二者之间的商：

- 在确定条件下，一定热势下降中能够发生位移的热量；
- 再除以发生该现象之处的温度本身。仅仅运用这条公式便会表明，在系统沿某个方向不可逆地演变时，所得结果、这个商只能增加。所谓熵的持续增加正是如此。这来自一些完全精确的定义；一旦把它们抽离数学表述，甚至就不再是隐喻，而会彻底落入荒谬。

因此，一切直接使用和类比——甚至不能只说是“勉强”的——都纯粹属于误读秩序，同博雷尔那则著名的打字猴隐喻所作的想象操作一样荒谬。我们在这里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把它揭露出来。

分析内部对如此多概念的持续误读中，我们会过于频繁地辨认出这种打字猴操作；尤其是熵这个概念。

我们要寻找的是：弗洛伊德思想在我所说的四个阶段中如何进展——

- 从我们即将评述完的未刊手稿〔Entwurf，《纲要》〕；
- 接着到《梦的解析》的层面；
- 再到自恋理论构成的时刻；
- 最后是《超越快乐原则》。

我们找到的、也就是我们感兴趣的那一连串困难、矛盾、二律背反和僵局，究竟意味着什么？弗洛伊德思想在每个阶段都被引向这些地方。它们的存在本身、运动与进展，以及某些二律背反不断延续、维持、持续并改变形式所暗含的这种否定辩证法，意味着什么？

因为穿过这四个阶段，你们会看到困难、僵局和二律背反每次都以改变后的排列重新出现。我们将追踪这一点；它本身可以给我们一项新指示，使我们看见弗洛伊德所面对、不得不形式化之物的自主性和自身秩序涌现出来。

形式化努力本身的进展和相对失败，会同时向我们标示、揭露被瞄准的秩序、以某种方式被孤立出来的秩序，以及随着分析理论和技术推进而在界定这个秩序方面迈出的步子。这个秩序……

你们已经大致知道；在这里听了一年半研讨班以后，不可能还不知道我在谈什么

……就是象征秩序：它有自身结构和自主动力，并以特殊方式介入，把自身的连贯性、动力和自主经济强加给人的生活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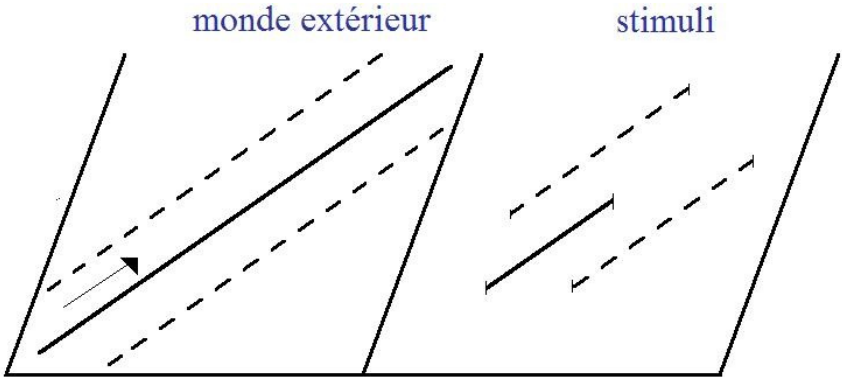
这正是我用来标示弗洛伊德发现之原创性的东西：决定人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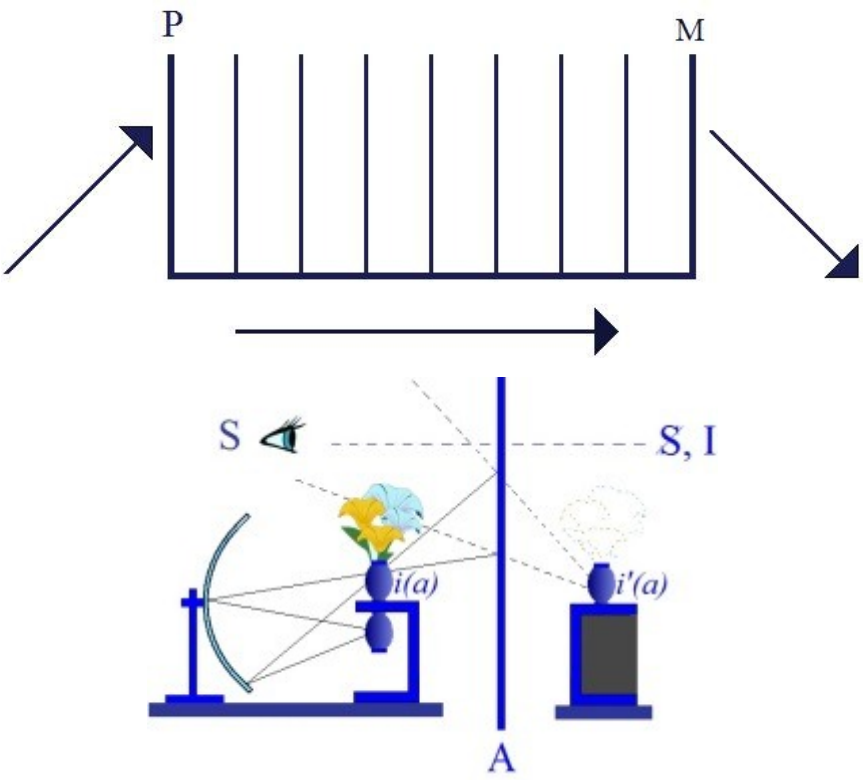
先这样粗略地说，尽管这里的语言会造成某种层次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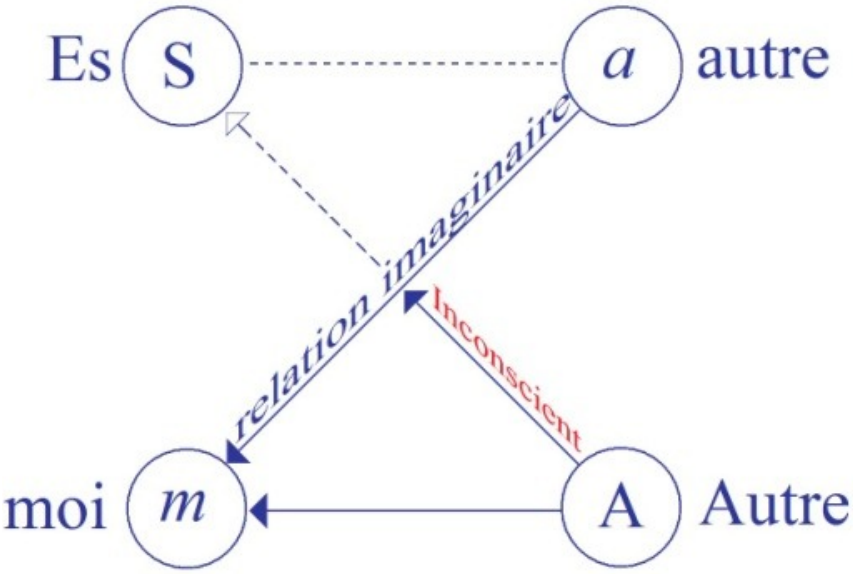
这是给那些完全不理解的人看的形象

……人身上最高的东西，恰恰并不只在人之中，而在别处；它就是象征秩序。

随着综合不断推进，弗洛伊德总被迫恢复、重建这个外在而偏心的点；这就是这些差异和四幅图式之进展的意义。现在，我们会试着在文本中重新找到各个阶段。




P
M
S
S, I
i(a)
i'(a)
A



先看我前些天向你们指出的东西……

当然，如果你们不读文本，就看不到整幅图式

……前些天我说，φ 系统粗略代表反射弧，也就是只以量与释放概念为基础、内容最低限度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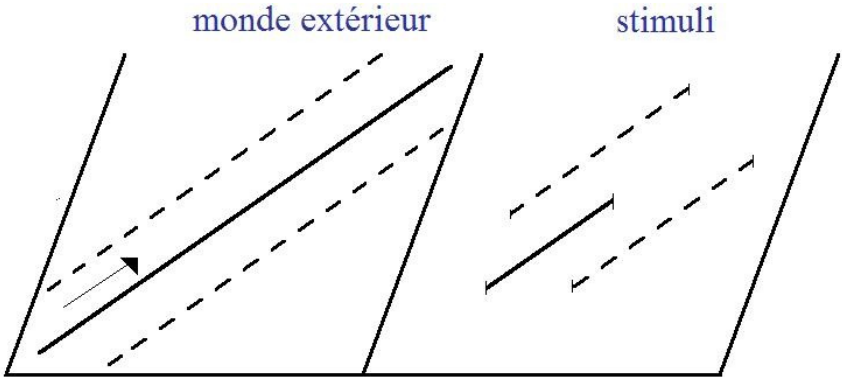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在当时同时受过神经学、解剖生理学和临床学科训练；值得注意的是，他必须建构一幅图式，不能满足于反射弧，更不能满足于当时实证主义生理学提供的图式：一种由反射、高级反射、反射的反射等等层层组成的建筑，直到更高功能层面的那个统一反射，并且从一项高度建构的刺激出发。

在最高层面，人们终究还得放点什么；我们的朋友勒克莱尔状态好时，也许会称它为主体。我希望有一天他也能摆脱这个东西。绝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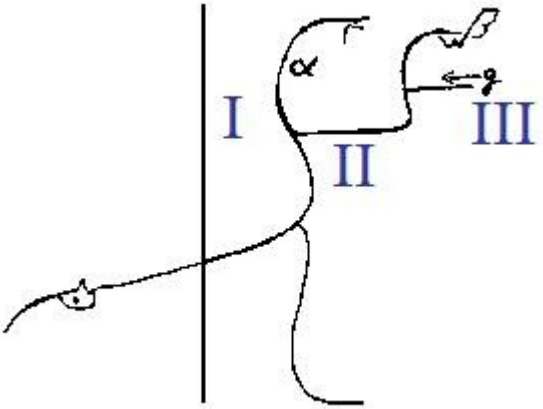
在任何地方把主体表象出来。弗洛伊德必须做别的事。他确实必须给我们构造某种极其精细、却不是建筑而是“缓冲器”的东西。它首先是一套缓冲系统；而且他在福斯特和谢灵顿两年前就已远远走在神经元理论前面。

这篇文本在许多方面都很有意思。弗洛伊德的天才表现在：他以深入细节的敏锐程度，看出了传导的某些性质。他大致猜到了我们今天知道的东西；从这个观点看，人们并没有取得太大进展。当然，在实验方面确实取得了进展，实际确认突触作为接触屏障如何运作；但他当时已经这样表述。

这值得思考：人怎样能够猜到？结果必须被记录在输出表上，这意味着内部必须存在某些条件。尽管如此，他本来也可能犯错，却没有犯什么大错。因此，他完全处在假设之中。



重要的是，在图式中，他必须在释放行动内部插入某种东西，也就是文本所谓的缓冲系统。这套系统首先是平衡、过滤和减震的缓冲系统。



他把它比作什么？比作已经出现在这幅图式[注2]上的东西。你们看到，脊髓弧内部有一个球状物，那就是神经节。心理机制的图式就是一枚神经节。此时他对大脑的构想，是分化的神经节，类似交感神经节或昆虫的神经链。

> [注2] 该图取自《纲要 / Entwurf》的工作译本，苏珊娜・霍梅尔翻译，安德烈・阿尔贝、埃里克・洛朗、居伊・勒戈菲与埃里克・波尔热参与，节选自 Palea 第6、7、8期。

可是，真正醒目的事情——我上次正是强调这一点——是我们的对话曾出现一点小小摇摆。〔转向让-保罗・瓦拉布雷加〕我不希望您走得太快。您谈 ω 系统时说了一些并没有错的事情；必须在这里把它标出来，因为这显示弗洛伊德最初的困难：一个人已经得到特别适应、尤其不那么图式化的一幅图式。

没有 ω 系统——也就是作为现实参照的意识系统——介入，他就无法脱身。无论怎样做，若没有某种东西作为增补进入图式，就永远不能从礼帽里掏出兔子。

因为这里并不是要把事情剥得赤裸，再让人相信，只要堆得够多，“上面”的东西就会比“下面”的漂亮得多。他必须把意识系统孤立出来，也就必须提出其运作条件。后来的发展会沿另一条道路，把人引向一个格外醒目而明显的把握：弗洛伊德经验以后、而且在弗洛伊德经验内部，必须重铸人的主体结构。它不仅使主体相对于自我去中心化，还把意识从字面上抛到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在人的存在结构辩证法中无疑极为关键，却又绝对悖谬、充满问题。我要说，对意识本身相对于生物运作而言不可把握、不可还原的性质作出深入考察，在弗洛伊德作品中与他关于“意识”〔原文如此〕带给我们的东西同样重要。

这里可以看到，运用意识系统本身这个参照所揭示的困窘和二律背反；它们在弗洛伊德理论化的每个层面重新出现、发生反应，仅凭自身便构成一个问题。这不是如何参照无意识的存在，而是怎样构成意识本身的一套模型、模式和连贯构想。

看来，在弗洛伊德经验所置身的这一论域、这一整套概念中，他虽然能够对心理装置的大多数其他部分给出一种连贯而均衡的构想，可一旦涉及意识，他总会碰上彼此不相容的条件。

我马上举一个例子。在他一篇题为《元心理学》的文本中，也就是收入法文论文集《元心理学》的《梦的理论之元心理学补篇》，他可以借助投注或撤回投注来解释早发性痴呆、偏执狂和梦中发生的几乎一切。我们还会遇到这些概念，并将看到它们在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意义范围。

奇怪的是，这里仿佛存在某种任意性：毕竟，按顺序阅读这一理论建构时，人们似乎总能设法使它运转起来、彼此吻合。然而并非如此。

当必须让意识装置本身介入，也就是引入清晰反映的构想时，这个装置相对于其他装置仿佛具有全然特殊的性质。

他的体系自身的连贯性，使他在一个困难面前绊住了。他说，有一件事他无法理解：这个装置与其他装置相反，竟具有即便在撤回投注时仍能运作的性质。推演的必要性把他引向这样一个命题。你们只要阅读我刚才提到的文本，就会看见这一点。事实上，他对此十分为难。他无法以别的方式把事情理论化。

就其他装置而言，一切都很顺利：一旦撤回投注，它们便不再运作，投注与撤回投注的游戏以一种合乎规则的方式进行。但当意识系统进入时，我们就进入了悖论。为什么？这肯定反映了某种东西。并不只是因为构造假设的弗洛伊德不懂得怎样处理——他有的是时间。倘若他没有成功，那是某种东西造成的。

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见 ω 系统的悖论出现，也就是意识系统的悖论：正如我们上次所说，它必须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假如你们把它纳入 Ψ 层面所构成的能量系统，它就只会成为该系统的一部分，因而无法发挥其参照现实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某种方式设想：无论多么微小，总有某些能量从中通过；同时，这种能量绝不能直接连接于外部世界输入中那个特别庞大的方面——它在第一个所谓放电系统中已经被预设，也就是刺激—反应的基本反射。

恰恰相反，它必须与之完全分离，只能接受微弱的能量投注，才得以开始振动；于是，流通始终从 ϕ 通向 Ψ。只有从 Ψ 那里，ω 才会获得使它自身得以开始振动的最小能量。

另一方面，Ψ 系统从 ω 层面发生的事情出发，需要——正如瓦拉布雷加上次所说；我当时觉得他说得有些仓促，但本身并没有错——获得信息。它只能从这个知觉系统本身的放电过程中取得信息。这意味着，在弗洛伊德当时构造的理论中，为了实施现实检验，心理层面发生的过程如下。

例如，让我们以〔运动要素？〕为例。它承担一种严格说来属于知觉的运动放电，也就是眼睛仅仅由于视觉调节、由于把目光固定在某个对象上而发生的运动。从理论上说，正是在这里，我们才可以设想一种效果：面对心理中正在形成的某种东西——即欲望的幻觉——它带来某种使事情得到核实的东西，正如人们所说：

“我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我看见的真是这个吗？”

归根到底，这就是它的意思。但颇为奇怪的是，恰恰在这一运动放电的时刻，也就是知觉器官运作中严格说来属于运动的那个部分，是全然无意识的；换言之，正如人人都知道的，无意识〔原文如此〕在这里仅仅实现于传入层面。

事实上，我们意识到自己看见若干东西。甚至没有什么比“我们看见自己所看见的东西”这一事实更与意识的透明性同构，而看这一事实本身便向自身设定了它自己的透明性。相反，对于我们为了定位、居中，也就是为了眼睛在实行观看时所做的这种远距离触摸，而实际有效地、主动地、运动性地做了什么，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至多只有一种极其边缘、极其临界的意识。

因此，这一系列开始在此勾勒出来的悖论、ω　系统这一全然独特的位置，以及要把ω　系统归约清楚、安排妥当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它们已经在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份著名手稿中开始显现——正是我想要突出的东西，因为阅读时已经可以看见、辨认它们，而它们的意义来自后来将会变成的东西。

当然，这并不只是从历史好奇心出发，去看一位多少带点哲学家气质的理论家遭遇了哪些困难。弗洛伊德当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整理自己的观念。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位先生个人特有的困难。

但这里已经出现某种东西的端倪，我们将在各个层面重新遇见它；我可以向你们指出……

为了向你们指明总的运动，使你们不至于在接下来这些研讨班中迷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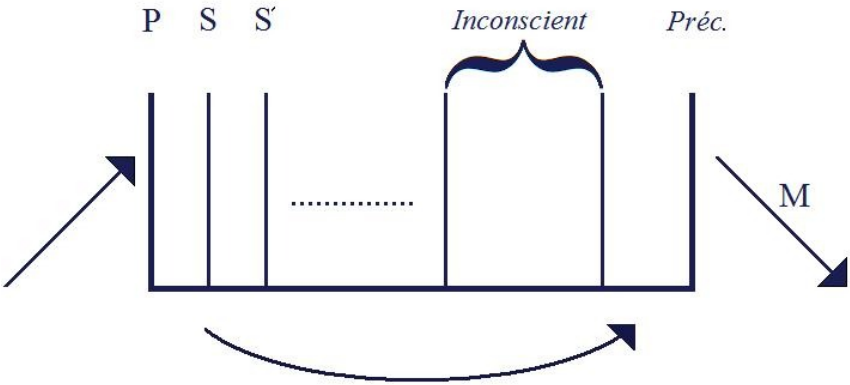
它们即将展开，或许还会有些原地踏步

……我可以向你们指出其中所涉及的是什么。

此后，我们将看到今天要在《梦的解析》中考察的图式，也就是一个在我看来同样……的图式。

请翻到法文版《梦的科学》末尾第七章《梦的过程》。

你们在那里看到的是另一种东西，它会被表达成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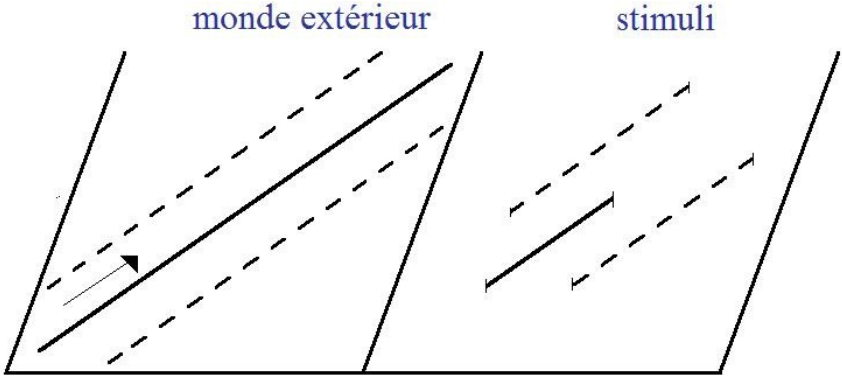
- 这里有一项输入；这里也有某种东西，将在你们接下来会看到的某物之间获得支撑，我们把它称为 P 系统，即知觉，德文为 W。
- 这里是他不得不假设的、构成无意识层面的各个层次。
- 接着是前意识，
- 再接着是意识；你们已经看见它那种悖论式的分布：如今它出现在两端。

这个图式中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努力考察的。我先立刻向你们指出一点：在这里，你们拥有的确实是一个装置的结构，是某种试图表象一个装置的东西。随后，人们尝试让这个装置运作，描述它、谈论它，并根据意识空间中存在的某个东西来定位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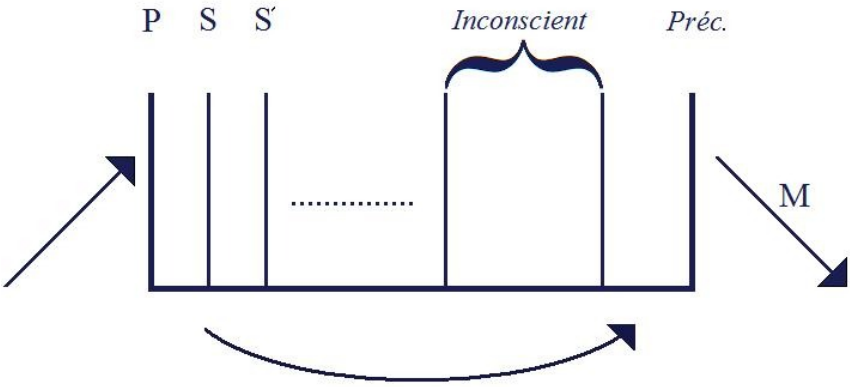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存在于某处的装置。它由知觉器官、心理，也就是大脑与脑下结构组成；它们像某种自主神经节那样运作，调节机体内部的本能、驱力与朝向外部的探寻活动之间的搏动。因为这里涉及的是本能

经济学。它会使生命体开始寻找自己所需之物，也就是 need 与一种多少显得无序或有序的活动之间的关系。

这里，这些是装置：



而在这里，它已经不再是装置了。这不是我说的，文本就是这样写的：



这里的图式开始指向某种远为非物质性的东西。他本人从一开始、从源头处便强调：不要试图把我们将要谈论的东西定位在某个地方。文本告诉我们，它应当近似于某种东西。请回想去年关于转移的几次课上我曾向你们指出的内容：光学装置中的那些像，尤其是虚像，不能说位于装置中的某处或某个特定位置。当人们身处另一个观看位置时，它们才被看作位于那里。这里涉及的正是这一点。

所以，这里出现了强化，譬如引入一个已经置于图式中的想象维度。必须把它放进去，这一点已经表明图式的意义发生了变化。文本向我们指出：这个图式的关键，在于它意指时间维度本身，在黑板上呈示时间维度本身。文本同样强调了这一点。

你们看到，这个图式保留了同样的总体布局；但它证明，弗洛伊德已经被迫在图式中，同时也在他依逻辑安排的范畴中，引入彼此不同的维度。这些维度已经不再是一个心理装置的建构，而是在引入某种逻辑维度本身。

我们已经从机械模型过渡到逻辑模型。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尽管逻辑模型也可以体现于机械模型之中。我已经略微向你们指出，我们还会谈到控制论，因为它将使我们能够阐明：人们谈论控制论时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及这些机械机器相对于从前的机器而言，在哪一点上具有独创性。也许我们会沿两条道路平行前进，也就是说，通过考察弗洛伊德所遇到的困难……

总之，就是我们正试图就人类语言的在场及其现实化

加以展示并把握的东西

……我们也许还能理解，为什么人们归根到底会如此惊讶。

因为控制论同样源于一种惊讶的运动：人们竟在那里重新发现了人类语言——归根到底，所涉及的正是它——它突然近乎自行运作，在某些机器中仿佛略微胜过我们、超越我们；然而它显然是从某个地方进入这些机器的。

我认为，唯一的错误在于：人们提出这种批评，说语言是从某个地方进入机器的，继而以为只要说是那个人把它放进去的，就已经解决了一切。列维-斯特劳斯面对新事物一向充满智慧，又仿佛总想把它们还原为旧事物；他正是这样提醒我们的。

我们这里有吕耶先生那本书。最近不知是谁说它写得不坏；我觉得他平常写的东西确实不坏，然而他关于控制论所写的东西[注3]……

> [注3] 雷蒙・吕耶：《控制论与信息的起源》，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54 年。

全部问题都在于意识到：语言确实以某种形式存在于这些机器中，在那里振动；它已经来到那里。我们突然凭一支小曲认出它，绝不是没有缘故的；至于我们从中感到的快乐，我很快就会告诉你们。

前些天，我在哲学学会发现了这件事。当时谈的不是控制论。法韦-布托尼耶夫人刚刚就精神分析做了一场十分出色的报告……

她希望在场的哲学界听众能够理解的那些东西——

她对自己的期望过于谦逊了，他们本来可以再多理解一点

……不过，她所说的已经远远高于许多人此前所能听懂的水平。

其中有一些非常好的内容。况且，我并不是特别针对哲学家。

接着，有人站了起来——就直呼其名吧：明科夫斯基先生——他针对精神分析所说的话，与三十年来我听见他针对同一主题的任何发言所作的回答完全一样；我说的主题就是精神分析。然而，法韦-布托尼耶夫人刚刚带来的东西，与他三十年前可能就同一主题听到的内容——譬如达尔比耶先生所讲的——确实极为不同。两者之间简直隔着一个世界！可明科夫斯基先生的回答却一模一样；就在那时，我明白了！当然，我并不是要针对他个人。

我只是说一个科学学会中通常会发生什么……

为什么会冒出“思维机器”这种悖论式表达？

连我都说，人只是极少思考，我可不会去谈什么“思维机器”

……但即便如此，一台“思维机器”中发生的事情，其平均水平还是比一个“科学学会”中发生的事情高出无穷！

给“思维机器”不同的要素，它就会给出另一种回答！这与那些无论别人对他们说什么，都总是重复同一件事的人之间，简直隔着一个世界——我说的是一种回答。

这仍然使我们可以认为：从语言的观点看，必定发生了某种事情，而这些小机器确实在向我们咕噜着某种东西——也许是一种回声，姑且说是一种近似——问题在于弄清那是什么。真正的奥秘恰恰在于：我们不能只说是制造者把它放进去的，就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制造者。

由此出发，你们开始明白：语言当然来自它原来所在的地方。它当然不在机器里面。因此，语言来自外部，这是确定的。

但恰恰不能只说是那个人把它放进去的。如果有谁能在这个问题上补充一句，那正是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家：我们随时都知道、都亲手触及，这件事不能通过认定是那个人、那个小天才完成了一切来解决。

人与语言之间存在一种关系，某种特定的关系。这里涉及的就是它。这是当今人文科学和人类学的重大问题，是一种发现。语言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像这样知道它从哪里来，还不够。地质年代中发生了什么？他们是怎样开始咿呀作声的？是否像某些人所说，他们一边做爱一边发出叫喊，由此开始？他们是在那里找到语言的吗？不，问题在于考察它如今怎样运作。一切始终都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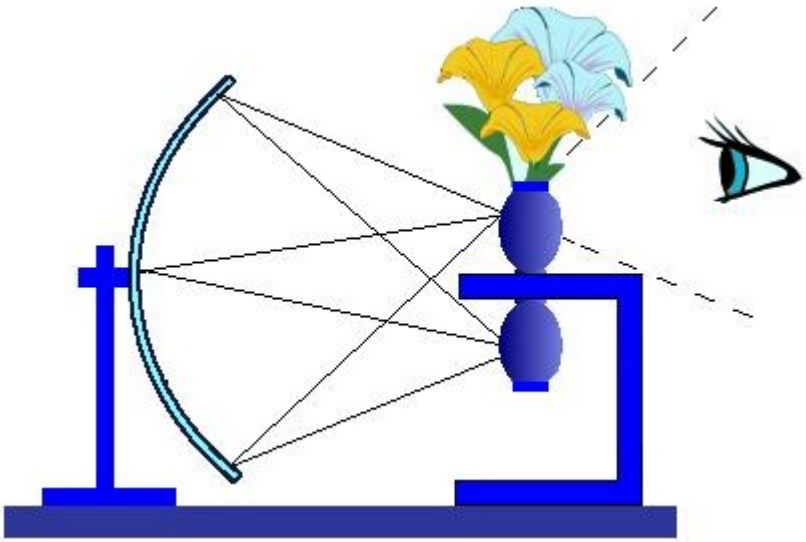
问题在于从最具体、最日常的层面把握我们与语言的关系——至少是在对我们而言最为日常的分析经验中把握它。

这就是你们将看到在这个图式层面重现的东西。图式沿着一个方向展开系统，并以极其鲜明的方式引入想象界本身。因为我想自己已经让你们感到它多么便利：光学装置乃是想象界本身之表象的隐喻；我去年已经向你们说明，它在心理学层面如何作为想象界本身而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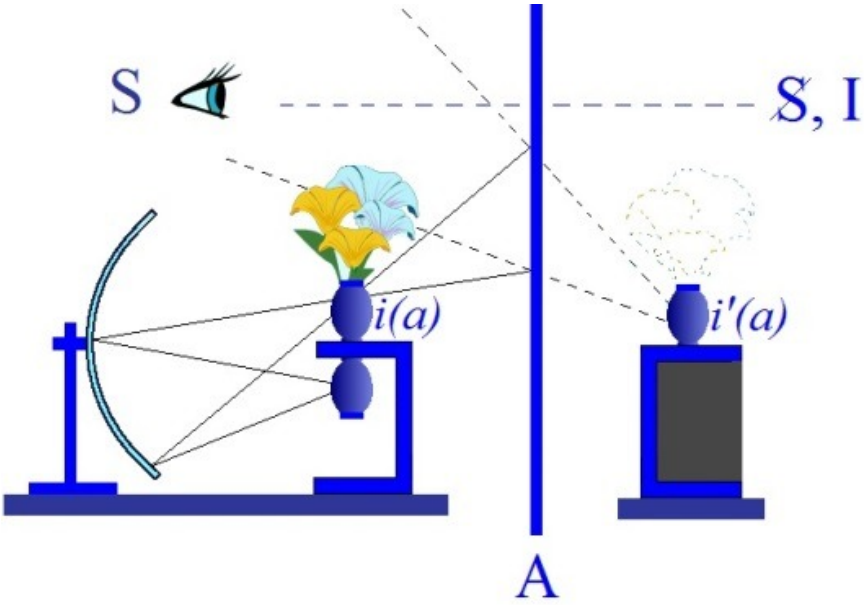
借助这个由朗格在镜像阶段旁边多少有些准确地唤起的小图式

……我已经向你们说明，我们能从中获得怎样的用途。

我们将在图式的第三阶段，也就是自恋理论层面重新找到的，正是这个东西。我们会重新见到去年的图式：



把它旋转 180°：



那两面镜子——平面镜与凹面镜——就是朗格曾提到而我们还须回头讨论的镜子；其中的平面镜在这个层面把具有自身动力功能的 Ψ 知觉—意识系统放回它应在的位置。

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像今天将同瓦拉布雷加一起看到的那样，在 O 系统彼此分离的两个端点及其僵局中把握它，而应当在这个自我于他者之中得到承接的核心处把握它。那是关键的想象性参照，它以同类的形象为中心，组织起人类全部的想象性参照。我们将在那里重新找到去年的图式，其中有理想自我的形象，而自我理想则与它在想象系统内部相互对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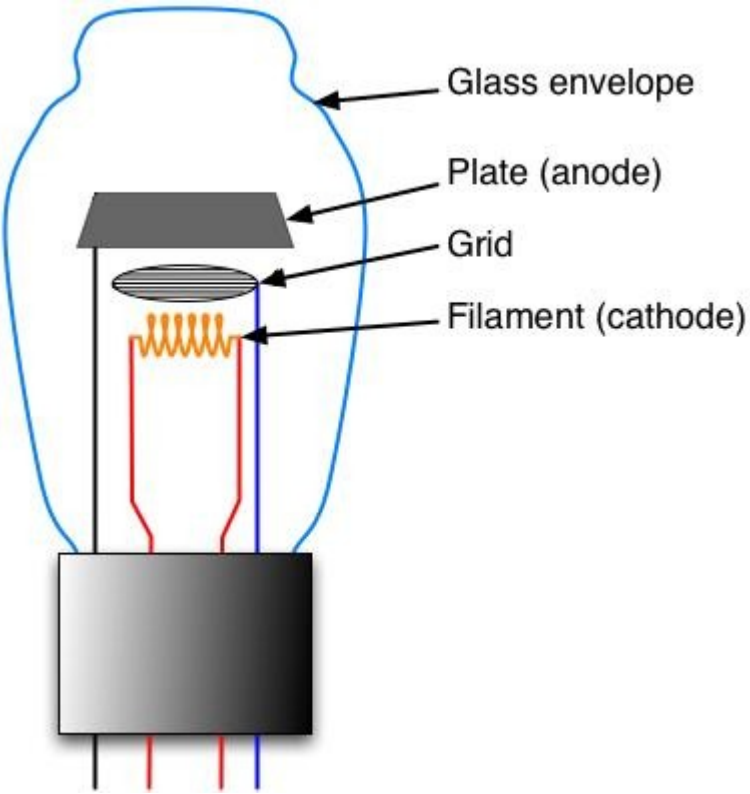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Idealich 与 Ichideal：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

随后，我们还会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找到最后一个图式。分析技术发生转折和迂回时，有一件事使弗洛伊德有必要提出某种东西，而这个图式将使我们能够赋予那件事以意义。关键在这里：当时人们可能以为，归根到底，阻抗与无意识意义就像正面与反面那样彼此对应；在其中一个所谓初级系统中依照快乐原则运作的东西，会在另一个系统中显现为现实；反过来，我们也只需以否定形式重新找到所寻找的东西，也就是无意识意义。

这样一来，所需的就只是经典的自我研究，只需用它的综合能够包含的一切这个概念稍加充实。然而，弗洛伊德必须说出、维持并坚持的是：

- 事情并非如此，
- 它不可被归约，
- 整个意义系统并不在那个人里面，
- 他的结构不是由这些意义综合而成的，恰恰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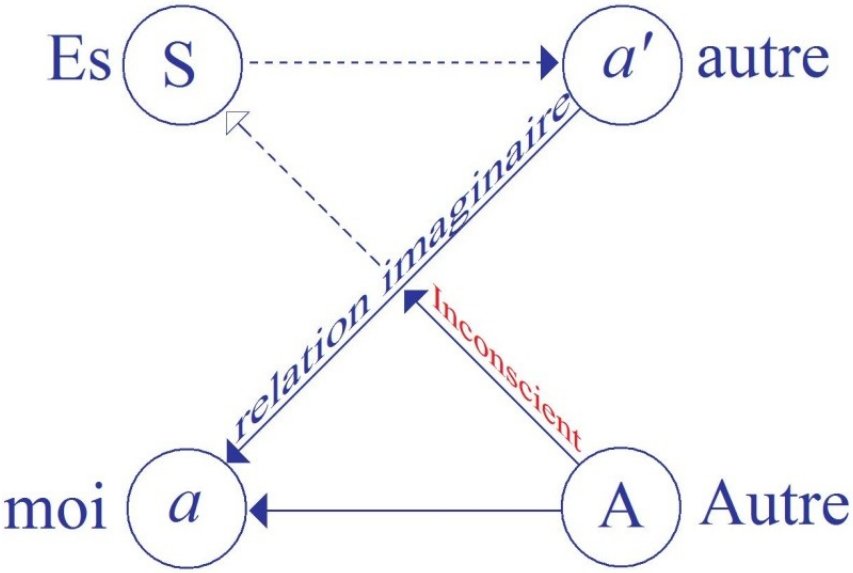
我把这最后一个图式交给你们，是为了让你们踏上通往我们将会发现之物的道路，也就是弗洛伊德通过《超越快乐原则》能够带来的东西。为构造这个图式，我要取用一种与我们近来的机器互通或传输方式大有关系的东西：所谓电子管，换句话说，就是所有摆弄过无线电的人都知道的三极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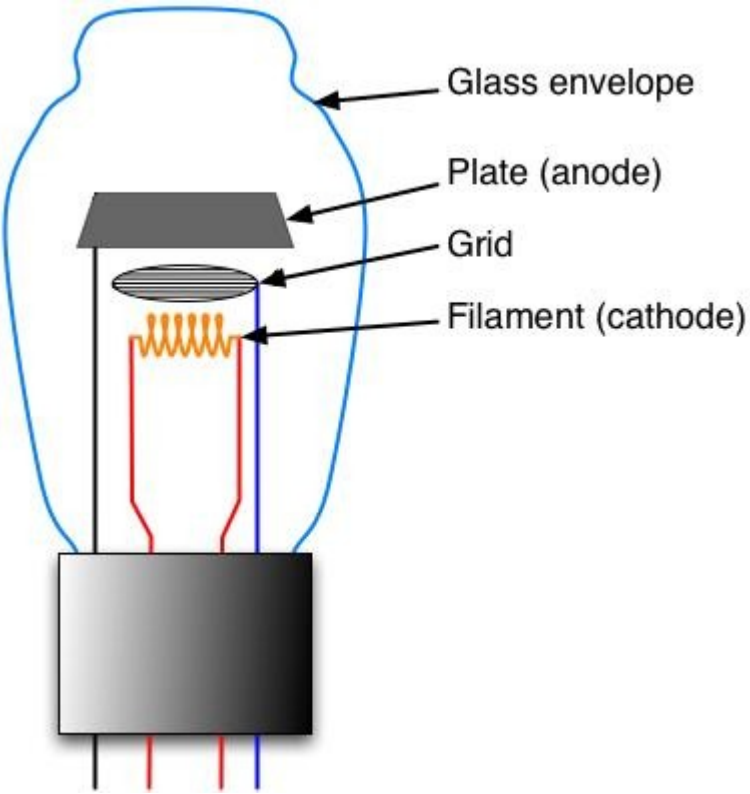


这里有三个极：一个阳极，一个阴极。当阴极这里的〔灯丝〕发热时，小电子便来轰击阳极。阳极为正，阴极为负。如果两者之间存在某种东西，电流就会通过。根据它带正电还是负电，我们可以随意调制电流的通过，也可以更简单地实现一个全或无的系统：要么通过，要么不通过。人们会让它发挥这两种功能。

我们将要谈到的东西——我先把它作为一个形象向你们指出，用来标识阻抗、即自我的想象性功能意味着什么——是这样的：严格说来，

在分析行动中有某种东西必须作为它本身被传递，并按照它的沟通能力来衡量；而这个东西能否通过，服从于自我的想象性功能。





你们很清楚，这个图式的好处在于，它维持并凸显了……

当然，任何显现之物都与自我层面的一种摩擦，或与发光、发热之类的效果——随你们怎样说——相联系；这些效果发生在自我居间的位置。还应看到，假如没有这种居间以及随之而来的阻抗，无意识层面的这些沟通效果，既无法被把握，也无法按照它们对个体、对自我本身产生的效果来衡量

……然而你们也很清楚，这个图式同样向你们表达：这个自我与我在另一些时候所谓的无意识话语之间，不存在任何负极与正极式的关

系。那是某种具体话语，自我浸没其中，并在其中发挥障碍、居间者、滤器或任何你们愿意说的功能。

但无意识层面所涉及的东西，其本质、数量、运动、重量及其居间作用，绝不与自我构成平行关系。它拥有自身的动力、自身的流入和自身的路径；我们可以探究它自身的节奏、调制和讯息，完全无须依赖那个用来中断它、过滤它并记录其自身动力的东西。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想说的，正是这一点：为自我的想象性功能确定位置。我今天只向你们给出一条总的进展线索；我们还须在细节中继续追踪它，并从理论和临床两方面理解它的含义。

我请瓦拉布雷加今天处理的第二阶段，就位于这四个阶段之中。请自由谈谈，在对《梦的解析》第七部分中这些梦的过程本身的分析里，哪些要点在你看来值得注意、值得突出。既然你已经略微看见我为这次报告给出的总体指引，也请谈谈其中哪些地方符合、哪些地方在你看来或许有悖于我今天刚才指出的这一总体运动。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我很难立即在拉康先生刚才所说的内容与我原以为自己今天应当讲的内容之间建立衔接。我还是回到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吧。我从这些文本中提取出来的东西，远不如拉康先生以如此深刻的措辞表达出来的那么多。

这里确实要研究的是心理装置理论的建构如何发生过渡：从我们已经谈过的 1895 年文本，一直到《梦的解析》。为此，必须回头讨论初级过程。现在得简略一些；我不能逐行追随这篇文本，而必须直奔要点，大步跨过那些关于睡眠的考察。

不过，仍有一点必须记住。在我看来，弗洛伊德在 1895 年文本中解释睡眠时，仍然停留于“撤回注意”这一解释。这就是我会从关于睡眠的考察中保留下来的唯一内容。接着，在转向可以称作演变的东西之前，我们要回到 1895 年的文本。这篇文本的结尾将充当过渡，我稍后会说明自己如何看待它。我们之所以回到那里，首先是因为文本谈到了梦的分析，其次是因为它包含了对梦中意识的考察。这些考察包括对第一个梦，即“给伊尔玛注射”之梦的首次分析。

我们将看到，1895 年文本怎样以图式方式呈现了睡眠的主要特征：

1）运动麻痹。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运动促动无法越过屏障。弗洛伊德说，这一特征虽然重要，却并非梦形成的关键。不过可以注意到，他将在《梦的解析》第 251 页重新考察运动抑制问题，并把它视为一个非特异却根本的条件。

2）梦中各要素之间的连接具有荒谬且无意义的性质。这可能是联想强迫的结果。联想的强迫占据支配地位。但他在这篇文本中已经观察到，自我的放电并不完整；否则便会是无梦睡眠。

3）第三个特征：梦的观念具有幻觉性。弗洛伊德所寻找的最重要的特异性特征，便是这第三个特征。

我们还记得——上周已经说过——这种幻觉性同样属于初级过程。因此，弗洛伊德曾指出，对某一知觉的初级记忆——英文文本写作 primary recollection——始终是一种幻觉。他还告诉我们，幻觉的鲜活度与强度，同相关观念的投注数量成正比。也就是说，是数量规定了幻觉。它与知觉恰好相反，因为在来自 ϕ 系统的知觉中，注意会使知觉变得更清晰或更不清晰。

拉康——它来自 ω 系统。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不，来自 ϕ 系统。

拉康

必须区分来自外部世界、由 ϕ 系统输入的数量。文本的整体平衡表明，凡属知觉的东西，只要它是知觉而非兴奋，其本身便是在 ω 系统中发生的。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但它源自 ϕ。

拉康

因为它来自外部世界。我在另一处段落里给你们看过：它只有通过 Ψ 的中介才来自 ϕ。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当然。这不过是一段插话。因为他目前研究的中心，是区分幻觉与知觉。他想要确立、并且已经确立的是：知觉中没有数量变化，促成幻觉的却是数量。

4）梦是欲望的实现。意识并不把它们认作欲望的实现，但弗洛伊德紧接着提到了伊尔玛之梦。随后，弗洛伊德提出假设：欲望的初级投注同样具有幻觉性。

5）梦中的记忆很差。这一点将在《梦的解析》专论梦的遗忘的一章中再次取得关键意义；我以为自己看见，它就像两者之间的铰链。第五

个特征或可说明：由于运动麻痹——此前的特征之一——梦不会留下放电痕迹。我快速略过第五个特征，因为它会取得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在关于梦的遗忘的考察之后重新谈到它。

6）最后一个特征：意识的作用。在这些过程中，无论是梦还是清醒过程，意识都提供质。因此，意识可以伴随任何 Ψ 过程。另一方面，这个意识并不可归约为自我；所以也不可能把初级过程等同于无意识过程。

弗洛伊德强调这两点观察是关键的：

- 意识不可归约为自我；
- 不能把初级过程等同于无意识过程。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论述进行到这里时，提出了一个平行关系，并在文本中两度加以强调：一边是作为欲望实现的梦的意义，另一边是神经症症状。这篇文本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顺便可以快速提到，他的编注者在评注中提出了一项假设：这种类比其实甚至达到同一性；不过早在 1895 年——别忘了，这也是《癔症研究》的年代——这个观念尚未成熟，因为弗洛伊德的分析还没有推进得足够远。

我不这样认为。我们无法从这篇文本得出那种结论。他们说，自己知道弗洛伊德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弗洛伊德确实对给伊尔玛注射之梦作了一番相当形式化的分析，但他仍然说，神经症症状与梦的意义之间的这种类比是根本性的。他稍后还会回到这里；他已经知道这点很重要，所以暂时把它保留下来，并说“这是最重要的”——

“The most momentous conclusions flowed from this comparison…”

“最为重大的结论正是从这一比较中产生的……”

英文文本第 398、402 页，他作了两次这种比较。这是事实：他没有坚持详加阐述。但由于他稍后会重新谈到它，我们可以认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赋予它极大的重要性。这个比较将在《梦的科学》中得到深化，后来又出现在 1901 年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和 1905 年的《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这里将形成一种综合，并在《梦的解析》中清楚显现。

拉康

阅读《书信集》时，他自身分析进展的日期十分引人注目。1897 年，他对自己的分析还没有走得很远。我摘录了几段有关 self-analyse（自我分析）之限度的评论，供安齐厄参考；它们非常有意思。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梦的意识，必须在这个层面、在《科学心理学纲要》最后这些考察中重新讨论。我们面对的是伊尔玛之梦；以下就是首次分析保留下来的四个要素构成的图式。

拉康〔对安齐厄说〕

你知道〔……〕的序言吗?

“我只能以客观知识为基础来分析自己，就像我可以分析一个陌生人那样。

严格说来，自我分析是不可能的。否则便不会有疾病——这句话见于第 75 封信——

只要我在自己的病例中遇到某个谜，分析就必须停下来。”

正是在 1897 年，他界定了自身分析的限度。他严格说来只能理解那些已在其病例中辨认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份非同寻常的见证：在他以天才般的方式发现一条道路的时刻，他亲自指出——而且由于如此早熟，这份见证具有非同寻常的精确价值——这并不是一个直觉过程，可以说，并不是在自己内部作占卜式的辨认。它与内省毫无关系；严格说来，他只有在从其他病例中辨认出它的限度内，才进行了自我分析。

迪迪埃·安齐厄

弗洛伊德在做伊尔玛之梦以前，就知道梦具有意义。正因为他的患者带来了具有欲望实现意义的梦，他才想把这一点应用到自己身上。这就是他的验证标准。

拉康——正是如此。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问题当然不在梦的意义；他已经知道它，也已经分析过梦。问题在于梦与神经症需要〔症状〕的同一性理论。他对此已有预感。他在《梦的解析》中说：

“我从神经症心理学出发；现在我想反过来，从梦出发解释心理学。”

这里存在一种运动。他总是说自己遇到了很多困难。他甚至说：

“我本可以分析患者的梦，并从自己针对癔症症状发现的一切出发，但我不愿这样做，因为我为自己设定了相反的目标。”

他那里始终存在这两种运动。在发现某种东西，并在神经症症状中发现其意义之后，他想在梦的症状中重新找到它。

这里有一种极度的谨慎，也有建立正常心理学、分析正常人的梦的意愿；这一意愿在《梦的过程》最后一章再次出现。他仿佛想要这样做，而且是刻意这样做。

拉康

而且，他将在《梦的解析》中坚持梦与神经症症状之间的亲缘关系。但他也会——为了切实强调差异所在——指出梦的过程对于理解神经症症状是一个示范性过程，恰恰因为它为神经症症状提供了某种……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他不想马上把两者等同起来。

拉康

他从未把两者等同起来。归根到底，他维持了症状与梦之间完全根本的经济学差异。两者之所以具有共同之处，只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语法。但这是一种隐喻。

不要逐字面理解这一点。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像一首史诗与一部热力学著作之间的差异一样大。唯一的共同点是某种语法。

梦的重要性在于，它使人能够把握象征性功能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它对于理解症状至关重要。但一个症状始终是被嵌入主体总体经济状态之中的症状。

这不同于梦所构成的状态：梦被定位在时间中，处于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梦是主体活动的一部分；症状却铺展于多个场域。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也就是说，他从未确立两者在性质上的同一性，却还是确立了过程、机制上的同一性。

拉康

你将看到，他在《梦的解析》的好几处都强制维持了两者之间极为严格的区分。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从过程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这一点可疑。

拉康

他发现了共同的过程。但严格说来，它们与其说是同一的，不如说更是相似的，彼此依照对方塑造。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我们回到伊尔玛之梦。他给出 A、B、C、D 四个要素。

A　是已经成为意识的梦观念。黑点是有意识或已经成为意识的点，白点则是无意识的点。它们之间将会出现连接。这个已经成为意识的梦

观念通向 B，但出现在意识中的不是 B，而是 C。在通往 B 的途中，另有一项投注同时发生，于是出现了移置，由 C 取代其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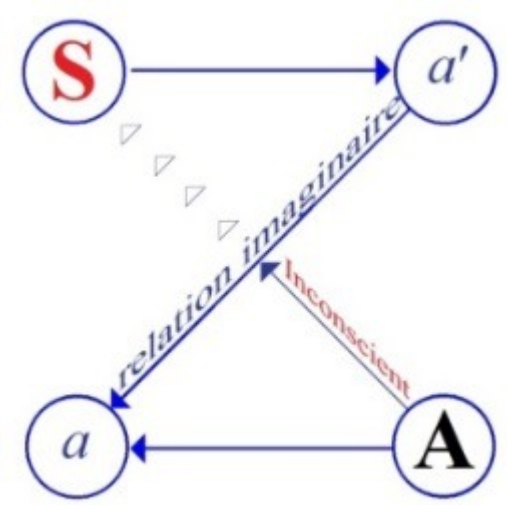
根据这些梦观念，我们可以这样说：

- A，梦观念；
- C 给伊尔玛注射丙烯；
- C，三甲胺的分子式；它在梦中以幻觉方式出现，他看见它以粗体印出；
- D，伊尔玛那具有性性质的疾病；
- B，同时在场的思想。B 是处于背景中的东西，即与弗利斯的谈话；弗利斯在谈论性腺时，向弗洛伊德提到了三甲胺。

因此，C 在来自 B 与 D 的双重投注推动下进入了意识。至于 B 与 D，则是仍然无意识的链节。三甲胺的分子式在这里作为 D 与 A 的派生物出现，而 D 与 A 具有同等强度。这是一种幻觉。

拉康

你从文本中抽取出来的内容，与那个保留下来的小图式，也就是图式 4，两者之间存在平行关系。无意识的东西，也就是当时正在弗洛伊德思想中持续进行的东西——对他而言，组织并极化其整个生存的话语——正是与弗利斯的谈话。



这场谈话作为根本谈话，在他的整个生存中以水印般的方式持续进行，因为归根到底，自我分析正是在这里实现的：在这场对话中，弗洛伊德集中了他最大的兴趣。弗洛伊德正是通过它才成为弗洛伊德，而我们今天才仍在这里谈论这一切。其余一切则是沿途被照亮的东西：整个学术话语、日常话语、三甲胺的分子式、人们知道的东西、人们不知道的东西，所有真正印在那里的杂物，随时准备被撤回投注；它们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

所有处在自我层面的东西……

它既可以构成障碍，也可以成为通过的信号，也就是在通过的时刻被照亮〔参见三极管〕；

正在形成的东西，也就是这场通向弗利斯的宏大话语，后来将成为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

……这番在自我层面被照亮的东西——这里说的是自我与无意识的关系，而且还在《梦的解析》以远为清晰的方式解释这一切以前——我们已经能在这个最初的小图式里看到它。无意识的，是那个最根本的东西：与弗利斯持续进行的谈话。

这一点完全独立于我们通常以图式方式作出的表象。由于误认了弗洛伊德的运动，人们总把它表象成无意识中的某种冲动，这种冲动被概括为某种定向事件，而你们可以通过退行重新到达那里。当你们看到退行如何构成时，就会明白它远为微妙，也远为难以操作。在《梦的解析》中，当退行被引入时，它不是人们所以为的东西，也不是今天人们使用它的方式。

无论如何，当时持续进行的与弗利斯的谈话、根本话语具有无意识性质。这并非梦中全部内容的真正动力，而恰恰是某些东西——特别是那些被强调的、偶然的要素——得以显现的真正动力；所指正是由此发生改变，使粗体印出的三甲胺成为梦的一个要素。

也就是说，意识就在我们最后那个三极管图式——第四个图式——的核心。我今天先把它留在这里。它处在那里非常重要。下次我会向你们说明，我们怎样把它引入这一辩证法。图式必须有四个。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在《梦的解析》第 80 页及其后对伊尔玛之梦的第二次分析中，他说：

> “我猜到为什么三甲胺的分子式取得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使人想起性所具有的支配作用，

> 还使我想起那位朋友：当我感到自己的意见孤立无援时，我会愉快地想到他。
>
> 这位在我的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朋友，我会在梦的联想序列中遇见他吗？”

不错，他确实再次遇见了这位朋友。他还说明自己会沿着怎样的观念联想次序遇见他，因为事实上，弗洛伊德从未给出这个梦的完整解释。在第二次分析中，他只限于从中得出：这是一个欲望的实现；正如他从这个奠基性的梦出发所确立的那样，弗利斯处在背景中。由于他只是打算不再继续深入，出于一些个人原因……

拉康——我们去年已经看到，这些个人原因是婚姻困难。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或许在植物学专著之梦中，分析得更为深入。这里，他的解释兴趣将集中在 O 这个人物身上。归根到底，他想证明自己对伊尔玛的疾病没有责任，责任在 O 身上。他只分析到这里。对这个梦作另一种更深入的分析，或许会以他在此指出的东西为中心：这使他想起自己与弗利斯的关系，而且他在其他联想链中再次找到这种关系。它甚至会一直走到对弗利斯的研究提出质疑。他对女患者作出的观察，正是弗利斯关于鼻腔与女性性器官之关系的论述。一段奇特的内容。

拉康

他在梦的层面和梦的症状学中表明，无意识层面的根本动力要素，是弗洛伊德借以进入他那个时代的科学话语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置身个体层面，它处在约定俗成所谓最高的层面，而这一切是

他做出来的。恰恰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位于无意识本身那根本性的经纬之中。

无意识的结构就是这个：与弗利斯的谈话。当时，这场谈话是无意识的。为什么？因为你们清楚看到，它极大地、无限地溢出了他们两人作为个体当时能够有意识地把握和领会的东西。毕竟，他们当时只是两个与其他人没什么不同的小学者，交换着颇为古怪的观念。

无意识本身的发现已经向我们表明这一点……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它历史性涌现的时刻，它以自身完整的维度显现出来

……意义的作用范围无限溢出了个体层面所操弄、所推出的那些符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因为个体受到这些符号的超越，他所推出的符号总比自己所以为的多得多；后来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里，在开端处，我们发现一种话语轰然涌现的现象，也就是一个新维度：由弗洛伊德、由弗洛伊德式发现带来的维度，一种对人的崭新感受。这正是问题所在。弗洛伊德之后的人，就是这样。无意识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也就是严格处在通常寻找无意识的那个层面的对面。

第11课 · 1955年2月16日

瓦拉布雷加

拉康

《梦的解析》在这里不只是某种特殊的梦理论，而是一项工作成果，或是心理装置图式在第二次建构中给出的证明。第一个图式，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说对应于弗洛伊德神经学研究的一个终点；同时，他正越来越深入地进入神经症这个特殊领域。

这第二阶段所对应的，是他更加深入地进入后来成为分析自身领域的东西。那就是梦——你们知道——而在梦的背后，也是神经症症状本身，因为他正接近于在症状中发现与梦相同的结构化方式。

我们在这里用来重新审视、重新理解弗洛伊德著作的语言，正是为了把握这一点；归根到底，我的评注应当向你们作证的是：这套语言何等贴切，又如何已经包含在弗洛伊德的著作自身之中。梦的现象与症状一样，都显露出某种关系：它不只与一般语言结构有关，也与人同语言的这种关系有关。我们现在就走到了这里。

我们还会走到远为精确的事情上：人同语言的这种关系，就叫作言说。言说对于人是什么？这种言说是什么？它位于分析使我们习惯于把无意识理解〔纳入〕其中的那个区域。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点会使我们在理解无意识是什么的问题上迈出决定性一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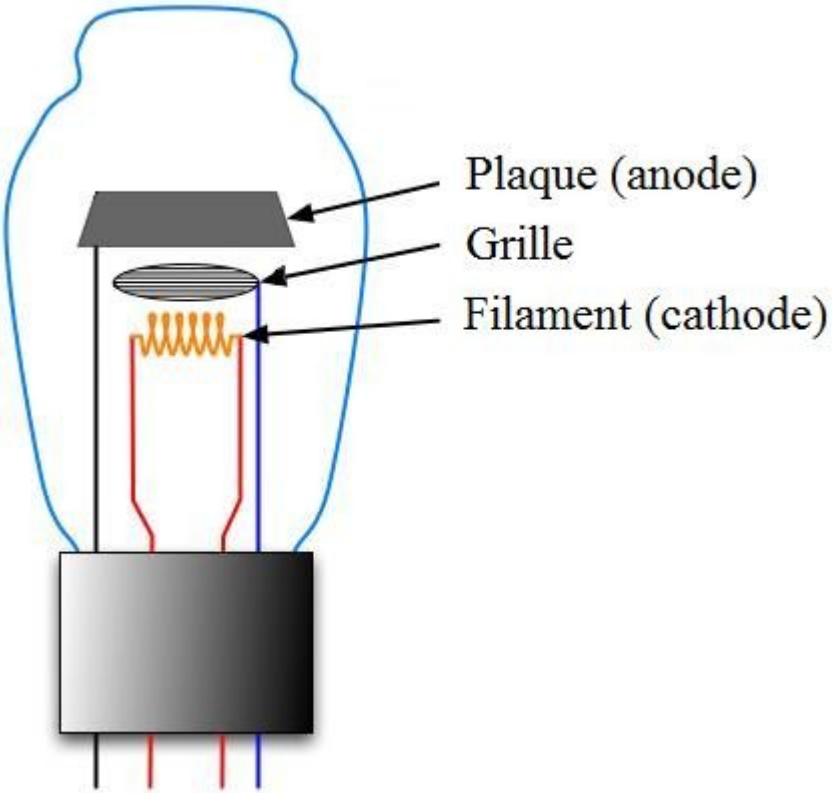
所以，今天我们把它视为一个阶段，视为弗洛伊德思想建构中的一个必要时刻。我们将把同一种理解和解释心理秩序中所发生之事的方式——也就是弗洛伊德式解释——应用于他的思想本身。我们想考察，在《梦的科学》第七章《梦的过程之心理学》所勾勒的心理装置第二阶段中，各种修改、进展、犹疑，以及正在我们眼前完成的建构，究竟揭示并显现了什么。

你们将会看到，相对于我们——瓦拉布雷加和我——共同强调过其特征、僵局和悖论的 ϕ、Ψ 与 ω 系统，它们在另一个图式中会变成什么。无论这个新图式表面上何等粗略地近似旧图式，它都逐渐在自身的运作和内部引入某种东西；最终，相对于弗洛伊德最初关于心理装置的构想，这个东西已经明显发生了移置和错位。

〔对让-保罗·瓦拉布雷加〕开始吧，老伙计，我们今天进入《梦的解析》。我提醒你们，上次我们谈到了伊尔玛之梦——当然也谈到《致弗利斯书信》，因为他做完伊尔玛之梦后马上把它告诉了弗利斯——这是第一个可以视作由他本人分析过的梦。这个梦还没有穷尽。也许我们会以它结束今天这次课。我请你们重读伊尔玛之梦。去年，为了说明我们当时对转移的心理学所作的探讨，我已经让你们阅读和解释过其中一些阶段。如今请围绕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重读它，因为我们始终在努力理解：

- “超越快乐原则”是什么意思；
- “重复自动症”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了赋予它意义，我们在这里被引向象征界与想象界关系中的哪种双重性。

上次图式中的某些端倪、指示和视角，已经可以帮助我们：



譬如三极管图式。那里存在某种居间之物，具有〔栅极〕开关的功能；它从根本上调节着另一股电流，而某个讯息正是通过这股电流得以通过或不通过、被传达或不被传达。由此，你们已经可以重读伊尔玛之梦，并在全然不同的光线下看见它。

上次我们已经指出一个极其独特的事实：弗洛伊德在手稿中点明这个梦时，把它的主题和张力概括为四个要素——两个有意识，两个无意识。我们上次也已经指出，应当怎样理解这两个无意识要素：

- 其中一个对他至关重要：创造性言说在与弗利斯的对话中得到沟通、形成和揭示；
- 另一个则可以说是横向要素〔栅极，或 $a' \rightarrow a$〕，真正被那股通过的电流照亮：

也就是上次已经注意到、并以近乎无意识的方式铺展在梦中的东西；

归根到底，就是他同一系列女性性形象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形象全都与他婚姻关系中的某种张力性东西结合在一起；梦已把它充分指出，足以引起我们的兴趣。

但更进一步、也更引人注目的是——只要你们认真阅读这个梦，就会以一种弗洛伊德当时本人不可能看见的方式发现——所有这些女性形象都具有根本上的自恋性质。也就是说，它们既是令人着迷的形象，又全都从某个侧面得到含示和明示：相对于弗洛伊德，它们被置于某种自恋或映照关系之中。

我只需提到一件事：医生叩诊伊尔玛时，她疼的是肩膀，而弗洛伊德则指出自己肩部患有风湿病。这一切总是以那种令我们惊叹的方式说出来。我不断强调自己阅读弗洛伊德文本时的惊叹。

在这些文本中，我们总能发现超出弗洛伊德本人当时所看见、所能够看见的东西。因为弗洛伊德是一位非凡而真正天才的观察者。为迅速起见，姑且把他提供给我们的东西称作“材料”：这些材料总比他在当

时作为概念分析提取出来的东西更加丰富，足以引导我们。这使他成为科学文献史上的一个特殊案例。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我们现在讨论《梦的解析》第七章《梦的过程之心理学》。它由六部分组成：1）梦的遗忘；2）退行；3）欲望的实现；4）由梦而醒。梦的功能。梦魇；5）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压抑；6）无意识与意识。现实。

这些段落的重要性并不相同。要逐一详细讨论会很困难。我会谈谈其中最重要部分的几个关键点，并从其余部分抽取核心观念。

就我们出发时所关注的问题而言，看来最重要的首先是第一段和最后一段。通过梦的遗忘〔第一段〕的考察，以及关于意识与无意识之关系的最终问题〔最后一段〕，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我们已经评述过的 1895 年文本《科学心理学纲要》〔Entwurf〕，是怎样同《梦的解析》中建构的理论连接起来的。

其次，依次最重要的两个段落是：

- 退行，因为这一章首次以清晰的图式方式引入了心理装置理论；
- 第二是对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的研究，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从 1895 年文本〔《纲要》〕到《梦的解析》，对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的研究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刚才说过，一方面对梦的遗忘的考察，另一方面对无意识与意识关系的最终考察及关于现实的观念，在 1895 年文本《科学心理学纲要》

〔Entwurf〕的结尾与《梦的解析》之间，构成了一道极其清晰的过渡。

事实上，拉康先生已经多次强调并清楚说明：我们可以看见意识问题在弗洛伊德思想的建构过程中被提出。1895 年文本的结尾考察的是梦的意识，显然他当时已经谈到遗忘。正是梦的遗忘把他带到梦的意识问题上：归根到底，梦处在摆动之中，我们可能把握它，也可能无法把握它。意识问题由此得到提出。考察第一段时，我们会回到这里。最后，在《梦的解析》末尾的《无意识与意识》一段，他再次提出这个意识问题。

所以，在第一段《梦的遗忘》中，弗洛伊德说，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解释的那个梦；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面临着研究对象消失的危险。这是人们可能提出的一项反对意见。他就是这样陈述它的，把它作为可以针对《梦的解析》前面各部分全部工作而提出的一项严肃反对意见。

拉康——请重复你刚才说的话。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解释的那个梦。我们已经忘了它；或者说，我们在梦的分析中面临着研究对象消散的危险。

拉康——请把他这样说的含义解释清楚。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他指的是一些已遭他反驳的作者的研究。

拉康——说出来！这很有意思。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这些作者认为，当我们尝试解释梦时，留在手里的东西可能出自清醒思想后来进行的加工，而这些加工与梦本身毫无共同之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弗洛伊德已经阐明其技术和方法、旨在重新找到无意识来源的梦解释，归根到底便会失效，因为人们处理的不是梦过程本身，而是一系列事后介入的加工；它们反而会使梦本身消散。人们处理的不是梦，而是属于清醒思想的次级加工。

弗洛伊德通过给出一些例子反驳了这种观念。而且他在此重新讨论了自己的伊尔玛之梦。他还说，人们可能向他提出的这项反对意见站不住脚，因为这里不存在任意性，根本没有任意性。他重新采用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他后来关于《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中还会扮演远为重要的角色："任意选择一个数字"。拉康先生对此已经谈过很多，我想没有必要再讲。他甚至说：

> "假如我在清醒时想要任意说出某种东西、找出一个任意数字，
>
> 分析将会发现，那并不是偶然；所以偶然并不存在。"

但还有另一点：他将用一种新理论——精神分析的遗忘理论——取代经典的心理学遗忘理论；它在心理学中具有根本的创新性。

弗洛伊德在这里使用一种自己熟悉并将继续使用的方法来研究遗忘。这种方法会把他带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它将成为——我认为可以说到这一步——精神分析方法的试金石和奠基石。也就是说，他不直接研究自己打算研究的对象——这里就是梦——而是去研究障碍。

他将研究阻碍这项研究的障碍。在这里，他将发现，对梦作出解释的障碍来自心理阻抗。他还会说明，人们所遇到的障碍——哪怕它采取他即将在此反驳的反对意见形式——同梦的遗忘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

两者是同一件事。这一点在他的思想中扮演了重大角色，也是阻抗分析的源头。

例如，实行压抑的力量始终是同一种力量；人在解释工作中遇到的力量，与在一个过程的展开和加工中显现的力量完全相同。因此，恰恰通过迂回研究所遇到的障碍，他才仿佛能够以最深入的方式反驳向他提出的反对意见。

拉康

有两点、两句短语，从我们在这里展开的观点来看，值得抽取出来。他对前面各章的全部建构重新提出疑问，例如关于梦的加工，也就是《梦的解析》的整个主体工程；这时他突然说：

“可是归根到底，我们所作的全部加工——严格说来，就是解释的结构，因为这里讨论的是《梦的解析》——都是围绕梦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围绕某种可以遭到一切反对的东西来进行，甚至可以有人说：这个梦归根到底或许只是梦中之梦，是我们梦见自己做过的梦；某些作者确实这样说。简言之，我们仿佛把某些东西当作神圣文本来处理，而据所引作者说，它不过是一场任意的即兴编造，是在慌乱时刻匆忙搭建起来的东西。人们确实这样说。”

我们顺便把这个隐喻记录下来，因为弗洛伊德的隐喻十分珍贵。事实上，他确实把梦当作“神圣文本”来处理。神圣文本需要依照完全特殊的法则和形式来解释。大家都知道，这类解释有时令人惊讶。

他不只把梦当作神圣文本，而且必须赋予他所用的“文本”一词以全部重要性。我们在这里确实接近了亲爱的瓦拉布雷加试图向你们说明的东西，也就是这篇引导性章节中极其特殊的辩证法：就在弗洛伊德将要谈论梦的过程之时，他转向了遗忘问题。

重要的是看清这种遗忘、梦文本中的这种退化究竟能走多远。

>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件事如此无关紧要；哪怕只剩下一个要素，而且是一个人们心存怀疑的要素，
>
> 只剩下一丁点碎片、梦之影的一点影子，我们仍然可以继续赋予它意义。”

他想说什么，已经由他给出的例子证明：这里涉及的意义，恰好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讯息”。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主题和概念：一则讯息必须还剩下多少，才仍然具有它的效力。

无论讯息退化到何种程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就在它的退化本身之中，我们仍能读到痕迹和印记；它们来自某种审查，来自一次蓄意而有意的中断。因为这种中断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讯息逐渐衰减、消退，也不是今天所谓讯息淹没在背景噪声中的效果。不，讯息不是以随便哪种方式被遗忘的；瓦拉布雷加想告诉我们的正是这一点。

不过，他在这里围绕这个问题使用“阻抗”之类的术语；对你们而言，它已经带有其他回响，已经进入成千上万个其他语境，以至于无法显

出全部轮廓。我们先把阻抗放在一边。倒不如重新拾起那个著名的审查，人们太容易忘记它；尤其要恢复它的全部新鲜性和新颖性，也就是审查所包含的性质：审查是一种意图。面对针对他提出的一切反对，弗洛伊德论证的特点在于：可以说，他倒转了举证责任，并说：

“恰恰在具体符号中、在你的反对意见带来的新要素中，也就是在梦的这些退化中，我仍然看见一种意义；我甚至看见了更多意义。梦中这些遗忘现象的介入，恰恰令我对它更感兴趣，因为我同样在其中发现讯息的一部分。”“我把遗忘以及那些可以说属于退化的否定性现象加入对意义的阅读，也承认它们具有讯息的性质和功能；严格说来，这正是梦赋予我的维度。”

我还要更进一步说：从弗洛伊德梦解释的其他章节和段落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个维度不只是加以发现，而且还通过某种明确取舍把它分离出来。

我还要更进一步说：他不只是满足于这个维度，他只愿意认识这一个维度。我们会考察这种方式是否贴切。有人对他提出一些反对意见，例如：

“你谈的是欲望之梦，可还有焦虑梦、自我惩罚之梦。”

他的回答中有一句话这样说：

“是的，确实有焦虑梦；但为了使焦虑出现而必须发挥作用的东西，无非就是清醒生活中会引发焦虑的东西。”

也就是说，他感兴趣的不是梦中有什么，而只是那个语义要素：一种意义的传递，一段得到分节的言说。

他所谓的梦之思想——Gedanken 究竟是什么，或许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呈现得更加鲜明、更加明显。我们无法在这里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它也贯穿《梦的解析》全篇对无意识的论述。但没有任何地方比第七章第一部分更明显地让我们看到：他所瞄准的，恰恰是作为一则讯息的有组织话语性质。那则讯息在这个时刻被当作它本身、就其自身来把握。正如我告诉你们的，它是一则讯息；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说，它是一则坚持不息的讯息。这一点再次使我们紧贴着目前正在质问的问题：

- 这个超越快乐原则是什么；
- 重复自动症是什么？

归根到底，它是一种调制，是一段坚持不息的中断话语。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能让人感到这一点，因为在这里，你们不能赋予 Gedanken 一词以心理学意义。他已经清楚告诉我们，并在三四处反复申明：

> “对于我们眼下谈论的一切，不要以为自己是在从心理学观点解释它；
>
> 对于我们给出的全部解释，不要以为自己正在把它们还原为心理中已经知道的东西；
>
> 这些现象属于另一种秩序，不同于此前从心理学观点处理过的一切。
>
> 我们眼下就停在这里。我们暂时悬置自己的思想。”

他本人承认，相对于此前所有关于个体的心理学建构，他正在另一个维度中移动。他所进入的是沟通和讯息的领域，是我在这里所谓的“中断话语”。正是按照这段中断话语与一段更宽广、更庞大话语之间的关系，他得以加强自己对梦解释的立场。在这一章中尤其如此；他特别向我们讲述一个梦的故事——他就在本章安置了它——一位女士梦见某种叫作“海峡”的东西。她的梦只剩下这一点。

在这里——也就是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弗洛伊德向我们展示了他怎样理解梦的解释。这个例子虽然极端，却也因此更具意义：尽管这位女士的记忆中已经不剩别的东西，他仍会毫不犹豫地寻找；然而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归根到底，最不值得关注的恰恰是这个表象本身。

某种东西被抹除到如此程度，最终只剩对记忆的记忆；它的记忆还可能是什么？而且我们可以发问：当我们记得一个梦时，我们是否真的记得某种可以称作思想的东西？毕竟，我们并不知道这会不会正是记忆错觉的典型。

这并不困扰弗洛伊德。他不在意，因为问题不在这种心理学现象的秩序中。我们记住一个梦时，是否像记住一个曾经存在、可以定位于某处的事件那样？这个问题根本无解。当然，它始终令哲学家感兴趣。如果这样看问题，为什么睡眠中的体验就不能同等重要、同样真实？而且，如果他每夜都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参见庄子〕，凭什么可以说是他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

弗洛伊德对此不感兴趣。心理现实主义、某种本质性主体性的维度，并不是他感兴趣的东西。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那个人梦见自己成为

蝴蝶，而是这个梦意指什么。当我们说“意指什么”时，指的是它朝某个特定方向意指什么，朝那个我们想要对其说出某种东西的对象所处方向——也就是梦中的某个人。这个人是谁？全部问题恰恰都在这里。

而当梦属于某个已经同弗洛伊德开始过一段话语的人时，梦便只是这段中断话语的延续。他毫不犹豫地从这一点出发完整解释这位女士的梦。因为他恰好曾同她讨论梦的性质；表面看来，这位女士接受了弗洛伊德及其建构中的不少东西，而她想在梦中告诉他的内容，则由她的联想证明：“使劲，使劲，夫人。”她使劲联想，讲出一个有关加来海峡的小笑话：那是一个用巧妙方式让英国人登场的故事，说崇高与可笑之间只有一步——是的，就是加来“海峡”这一步。既然人们发现这个 channel 正是加来海峡，那么她想说的显然就是：

“你的所有这些故事都有一点可笑；它们很崇高，却又有一点可笑。只差那么一点，一切就会令人发笑。”

就是这样。我们现在不是在说这种解释是否合法，而是在评注弗洛伊德，考察梦作为一种无意识功能意味着什么，考察弗洛伊德的欲望理论意味着什么，以及这里涉及的欲望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中，我们总会或多或少地重新找到这一点，把它作为诸维度之一。

还有其他维度，你们会看到。在展开得更充分的梦里，这一点要清楚得多；但只要一场梦传递了某段特定的言说，弗洛伊德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的理论得到了证实。无需一直追溯到童年记忆，也无需想到退行。

什么会把你们带到那里？下一章将向你们证明这一点。你们会看到，这一章之所以在第二层面重要，也同样在第一层面重要，并非没有理由，因为我们必须回到起点。是什么迫使弗洛伊德提出这种退行理论？我们从第一阶段、第一章得到的就是这一点，毫无疑问：只有当弗洛伊德向我们表明，梦中的主要欲望是传递一则讯息时，他才会感到满意，才会重新找到自己的道路，感到从容，并声称已经向我们证明了他想要证明的东西。

瓦拉布雷加——所以，梦的遗忘就是障碍。

拉康——它甚至不是障碍；它是文本的一部分。

瓦拉布雷加——但他说过，有一句重要的话……

拉康

例如，从他的视角看，在这个层面，怀疑几乎就是一种 ἔμφασις〔emphasis〕。法文中没有对等词，可以说是一种强调。他说，怀疑作为心理学现象并不令他感兴趣；但在梦中，或围绕梦，我们是否应把它解释成心理学现象？有意思的是这个吗？毕竟，我们不断信任自己的记忆，而且往往是在面对并不比梦更确定的事情时。一个记忆经过相应核对后，又能多出多少根据和确定性？他说，必须把怀疑现象解释为讯息的一部分。他总是把问题带回这里。

假如主体怀疑，你们会说——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已经完成或自称已经完成的视角来理解它的——我们谈的是阻抗。但眼下不要谈阻抗；这个词也许出现在本章，却未必出现在这一部分。怀疑是讯息的一部分。你们应当想到，主体告诉你自己怀疑，正是在借此把你的注意力

引向一点：它是梦中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要素；它在那篇著名“神圣文本”中起到标示作用，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含示。

这正是他在第七章这个层面感兴趣的东西，也是他告诉我们的新东西，是一项轮廓鲜明的观察：怀疑本身在讯息中具有价值。同意吗?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是……不过，我还是记住了——要自动转换视角并不容易——弗洛伊德强调了阻抗一词。他说：“解释所遇到的一切障碍都来自心理阻抗——Widerstand。”这句话就在这段里。它确实被命名了。

拉康

不完全如此。你是否也读过那则小注？他在那里举例说，患者的父亲在分析过程中去世。我们毕竟必须考虑到：总不能认为患者只是为了中断自己的分析，才让父亲死去。但他说：

“这无关紧要。我们把一切妨碍解释的东西都归为阻抗；这是定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同样会按照它是否有利于我们的进展、是否有利于讯息通过来解释它。”

你得承认，对阻抗主题作这样的泛化，也使我们可以认为他没有把阻抗纳入心理过程。阻抗在这个层面只相对于工作才取得价值。它完全不是从主体的心理属性角度加以考察的东西。当然，这种阻抗确实存在，我们知道。你们如果愿意，可以说存在想象性摩擦；我们由此可以对解释工作所面对的阻抗形成某种观念。

当然，我们会极其重视这些想象性或心理性摩擦的特征；它们阻碍他本人所谓“无意识思想的流动”，也就是位于无意识中的话语。但你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个层面，那则小注也支持我刚才所说的东西：阻抗本身不是在其心理学层面被考察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主体内部的某种东西；阻抗只相对于解释工作，也就是这里的梦解释或分析工作，才得到考察。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它也是审查，是 Widerstand。

拉康——但它恰恰不是审查，不是！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就是，先生。

拉康

不，它不是审查。我们将在本章末尾看见这一点。审查与阻抗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它属于——我曾把它叫作“中断话语”——话语的中断性质。我感觉我们在这里有一项根本分歧，必须用某种形象化的东西举例说明。主体的阻抗与我们所谓的“想象性固着”这一整个秩序和论域有关，也与其他东西有关，例如“嵌入”“自恋性锚定”……总之，阻抗与自我的论域有关。

我将设法用形象说明，应当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定位审查；这种定位是阅读《梦的解析》的文本后显现出来的，也涉及一个必须用来定位我们很大一部分经验的观点。譬如，它牵动我们所谓超我的整个

问题。这会把我们带到很远，因为我刚才立刻以一种迫切方式，把自己的主张——某种误解——带到了最尖锐的一点。

但既然他们〔拉康指听众〕不知道，也无法在我们之间作出裁决，我就必须说明自己这句话的含义：本章中的审查与严格、技术意义上作为自我效果的阻抗毫无关系；它也不同于另一种阻抗——不过与后者的关系要大得多——也就是我认为在本章中只是作为一种标示方式而设立的阻抗：在一切造成停止的东西——无论它是否属于心理，无论来自现实还是偶然——所处的层面标上一个 x，或 x 的函数；这些东西会介入分析工作。

那么，相对于这一切，审查是什么？我们必须对超我或审查形成某种观念。这里涉及什么？我经常向你们谈到“中断话语”——我们刚才只走到这里——但在根本人类话语所处的这个层面，还有一个远为关键的相关项，那就是法则。中断话语最引人注目的形式之一，就是未被理解的法则。

按照定义，任何人都不得以不知法则为借口；然而法则始终未被理解，因为没有人能从整体上把握它。原始人被卷入亲属关系、联盟关系、流通节奏和女人交换的法则之中；即便他非常博学，也不可能对这套法则整体中把他攫住的东西获得总体视野。凡属审查的东西，总是与话语中某种指向未被理解之法则的东西有关。这番话也许显得有些高深。我会设法举例说明。

有一本极其色情的小书，出自一位文坛名家、现任龚古尔学院成员之手。作者是雷蒙·格诺[注1]。我记不清他以什么借用的名字出版了这本迷人的小书。在这本堪称最令人愉悦的读物之一的书中，有一个极

漂亮的说法。一名年轻女打字员被卷入爱尔兰革命，将遭遇各种十分香艳的倒霉事；她被关在厕所里时，作出了一个与伊万·卡拉马佐夫完全相同的发现。

[注1] 雷蒙·格诺：《我们总是对女人太好》，伽利玛“Folio”文库，1981 年。

你们知道，伊万·卡拉马佐夫让自己的思想沿着一个有教养之人的大胆路径前进，尤其提出“如果上帝不存在……”时，他的父亲便登场了。于是：

“如果上帝不存在，”父亲说，“那么一切都被允许。”

这显然是一个天真的观念，因为我们分析家很清楚：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任何事情都不再被允许。神经症患者每天都在向我们证明这一点。但那位被关在厕所里的女打字员，作出了一个对英王陛下臣民而言远为震撼的发现。都柏林的秩序维持刚刚遭遇一场扰乱事件，这使她产生了某种怀疑。这种怀疑最终形成如下公式：

“如果英格兰国王是个蠢货，那么一切都被允许。”

从这一刻起，女打字员的全部冒险——事件也助了她一臂之力——表明她不再拒绝给予自己任何东西。书名应该是《我们总是对女人太好》。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书名是《怜悯女人》[注2]。

[注2] 亨利·德·蒙泰朗：《怜悯女人》，伽利玛“Folio”文库，1972 年。

拉康

说完这段引言，我们继续。事实上，对英王陛下的臣民来说，显然……

这只是假设，别以为我正在说我们的英国盟友坏话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说“英格兰国王是个蠢货”。这可以表达为如下法则：“任何说英格兰国王是个蠢货的人，都将被砍头。”譬如这样。请紧跟我的思路。

它会造成什么结果？这样的制裁毕竟十分重大。当然，人们将永远不必实施它。当然，这可能预设没有人相信它。但我希望你们作为假设承认一点：既然这条法则与一切原初法则一样，都可能必须包含死刑的规定，那么这完全不是不可置信的。

这就是我想用形象向你们说明的东西：法则的制裁在某些作用下可能取得的悖论性质。换句话说，这听起来非常可笑；但我想说的是，你们也要感到这种法则可能存在是悲剧性的、荒谬的。我想向你们说明，一切类似法则都会由于自身的局部性质，而始终具有从根本上不被理解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面对法则，人始终处在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它的位置上。原因恰恰在于：没有任何人能够总体支配话语的法则；这条法则以某种谜一般的载体实现于文本、实现于经纬，而人在法则的游戏中无法理解这种经纬。

所以，假如说英格兰国王是个蠢货遭到禁止，并可能因此被砍头，那么显然人们不会这样说。仅仅由于这个事实，人们还会被迫无法说出许多其他东西，也就是一切能够证明如下绝对确定而且显而易见的现

实之物：英格兰国王是个蠢货；因为英格兰国王是个蠢货显然确凿无疑，一切都证明这一点。

我们已经见过例子。一位并不愚蠢的英格兰国王，很快便被迫退位、辞职并放弃权力。他与其他国王的不同之处——这显然表明他并不愚蠢——在于他会从马上摔下来，而且还妄想迎娶自己所爱的女人。

这位突然表现出自己不只是一个蠢货的英格兰国王，被迫到别处安置他的私人考虑。这是什么意思？我是不是想借此告诉你们，只要不愚蠢就能得救？这是错误的；不愚蠢也不够。我不是在这里说，英格兰国王因为不愚蠢，所以服从退位是对的。不过这只是插话。

由此产生如下结果：话语的整个另一部分，与“英格兰国王不得被说成蠢货、可他确实是个蠢货”这一现实保持一致；而这项现实本身，会使话语的整个部分陷入悬置——恰恰就是与英格兰国王是个蠢货这一现实事实保持一致的部分。发生了什么？

每当话语必须恢复时，主体都被卷入一种必要性：他必须从话语中消除、拿走、抽取一切与法则禁止说出的东西有关的内容；而这种禁止以完全不被理解的方式发生。

因为在现实层面，假如没有人能够把握这项禁止本身位于何处，就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说出并承认这一真相便会遭到砍头。人们忘记了我们的根本假设：说出这句话的人可能同时产生“一切都被允许”的观念，也就是彻底取消法则本身。

我想通过这个有趣的小假设瞄准并让你们感觉到的，是法则的存在所攀附的那道最后支点：某种完全没有得到解释、无法得到解释，却又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东西；那是我们在分析经验中遇到的硬物——确实有一条法则。而法则话语永远无法彻底完成的，正是这个说明“为何有一条法则”的最后项。

在我们这位英格兰国王臣民的假设中，会发生什么？这位臣民有许多理由看见某些东西得到表达——因为这也是他话语中极其重要的要素——而那些东西与英格兰国王是个蠢货这一事实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就我们当前所处的层面和位置而言，它们尤其会在梦中通过并得到表达。

当所涉及的东西难以表达时，这位臣民会梦见什么？因为问题不是英格兰国王是个蠢货这个事实本身，而是与它相连的一切，以及一切使国王只能成为一个蠢货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这个制度的结构中，每当主体越过不应进入的界限时，凭借英格兰王国愚蠢性的普遍共谋，他就会梦见自己被砍头。在这个层面，我们无需追问什么原初受虐狂；这里不存在自我惩罚或惩罚欲望的问题。他被砍头这一事实意味着：英格兰国王是个蠢货。

审查就是这个！它就是未被理解的法则。当然，在梦的层面，这只提出一个完全幼稚的小问题：为什么人会梦见自己被砍头？为什么这件事让你们觉得如此有趣？但在症状层面，它具有极大重要性：由愚蠢统治的王国中，没有任何臣民能让脑袋牢牢待在肩膀上。在这个层面，它通过症状得到表达。

我在这里向你们讲的东西，看起来像一则小寓言。我认识一个患书写痉挛的主体。分析揭示，他的症状只与一件事有关：在他成长于其中

的伊斯兰法中，小偷恰恰应当被砍手。他始终无法咽下这件事。为什么？

因为他的父亲曾被控为小偷。他的整个童年都处在一种深刻悬置中，这种悬置标记了他同《古兰经》法则的全部关系。同时，他同自己原初环境之间根本性的核心关系——也就是在他那里构成世界的支柱、基础、秩序和根本坐标的伊斯兰法——也因此遭到某种根本屏障的阻隔，因为有一件事是他拒绝理解的：为什么一个小偷应当被砍手。

也正因为如此，恰恰因为他不理解，他自己的手便被砍掉了。审查就是这个。它最初发生在梦的层面；我们在无意识话语中看到的，正是它的作用。超我就是这个：它确实使主体恐惧，在主体身上构造出有效、被体验、持续存在并得到加工的症状；这些症状负责表象法则未被理解的那个点，为它赋予神秘的形象，负责把它本身体现出来；法则中未被理解、未被把握的东西，由主体演出来。

这就是超我。你们看，它全然不同于主体同其同类的自恋关系；它是主体同法则整体的关系，而且恰恰由于主体永远不可能同法则整体发生关系，恰恰由于法则永远无法得到完全承担，甚至可能少有承担到主体会与法则陷入冲突的程度。他所谓“审查”和“超我”指的正是这一点：两者属于法则本身的根本沟通所处的同一秩序、同一论域。

这是具体话语。我们不只在各种形象中看到它；它支配人，并在人所处的层面激起各种闪现，也就是随便什么东西、一切发生之事、一切属于话语的东西。但更进一步，它在总体中、在自身存在中作为具体话语，却又是支配整个人类生活的话语；它赋予人自己特有的世界，

也就是我们多少有些不准确地称作“文化”的世界。严格说来，审查就位于这个维度。

你们看到，它不同于阻抗。姑且也把它叫作阻抗，但它严格说来位于话语世界的这个内部层面。它不在主体或个体的层面，而在话语的层面；话语本身既是一个整体，已经单凭自身形成一个完整宇宙，同时在自身各个部分中又具有某种不可还原的不谐。

只要你们把握其中一个部分，只差一丁点、几乎什么都不差——譬如你有一个曾被诬告犯了某项罪行的父亲，或者你是否恰好被关在厕所里——法则便会突然以绝对撕裂人的形式向你显现。就是这样。你们跟上了吗?

这就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因为他从来不混淆 Widerstand 与审查。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最后，他在这一段的末尾确立：梦的遗忘是有意图的。精神分析的遗忘理论就在这里。他用睡眠会减弱审查、还使人能够绕过阻抗这一观念，取代了《纲要》中仍然援引的、以张力释放来解释梦形成的方式。假如我可能混淆了这两个概念，我很抱歉。但当我做这项工作时……

拉康

不过，在这里这确实是对的，因为他被引向睡眠心理学。他必须同样说明睡眠具有自身独特的维度。到这时为止，他还没有关注睡眠，但

现在必须把它引入。问题在于弄清睡眠是什么——相对于什么而言？它具有什么意义？

他没有穷尽这个问题。但他大体上把睡眠定位在一个确实可以用来定位它的关系中；无论如何，这种解释站得住脚，是正当的。弗洛伊德以外、处在其他论域的人也曾研究这个问题，并得到大致类似的解答。

我们所谓的自我——无论人们是否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与睡眠之间存在一种根本关系，确实存在某种关系。大体而言，首个近似说法是：睡眠中的自我处于某种可以表述出来的态度。这里还没有说出它，因为理论尚未建构完成；这涉及力比多的撤回。它提出的全部问题，我们已经略有了解，至少知道必须区分力比多理论提出的不同问题。譬如，可以假设力比多完全向内卷回自我。无论如何，自我已不再处于清醒时的同一状态。

正是在弗洛伊德理论这一被蕴含又受到修正的层面，并且只在这个限度内，这些阻抗才可能被绕开、穿过或滤除。自我的阻抗本身——作为阻抗的一小部分，也就是同自我相连的阻抗——已经不再相同。这改变了我们所假定的常恒现象得以发生的条件，也就是话语的延续、人类已经沟通的东西得以发生的条件。

因为这两章意味着：无论如何，梦的话语都与清醒话语绝对相连、彼此连贯；弗洛伊德始终把前者置于与后者的关系中。他持续追问的是：既然主体当时在清醒时说了某些东西，那么他在梦中说了什么？

本章的全部辩证法，只在他清醒时说过的东西与他睡眠中要说的东西之间得到维持。此前未被看见、未被认识、未被解释的这些过程，其

关系、差异和全部论域都由此建立。他强调了十万遍：这些过程正是《梦的解析》自身的对象。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因此，他从动力学角度把阻抗与伪装联系起来。例如他写道，在审查压力下——他也使用了“审查的阻抗”这个说法……

拉康

这恰好证明两者不是同一回事，否则他就无需说“审查的阻抗”。你们不必为此惊讶。你们都知道阻抗和转移问题给我们造成了多少困难；这表明审查与转移处在同一层面。你们会发现同样的公式和同样的歧义：一切作为分析工作的对立面而介入阻抗的东西。

当然，有审查的阻抗，正如有转移的阻抗；它们就是被我们视作同分析工作相对立的审查与转移。这证实了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东西。因为假如两者是同一回事，彼此等价得就像“颜色”一词等同于“颜色”一词，我们便无需说“一种颜色的颜色”。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那么，这种审查的阻抗会使一项深层联想移置为一项表面上荒谬的浅层联想，就像上面谈过的海峡例子。

因此，在《梦的遗忘》这项研究的末尾，他从动力学角度把审查与伪装两个概念联系起来：睡眠一方面被理解为审查在数量上的减弱，另一方面又被理解为绕过这种审查的手段——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还把它写进脚注。稍后他还会回到这里。他的意思是，只靠“审查减弱”

这个观念，不足以解释梦的加工。还必须加入伪装的观念，也就是从深层联想向浅层联想的移置。

现在必须转向退行。

拉康——好。继续。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梦的加工过程具有若干特征：

1）首先，梦把思想置于现在时。他说，这个现在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材料，稍后还会重新讨论。因此，在伊尔玛之梦中，他承认自己希望梦的基础是："我希望 O. 有罪。"

而在梦中，是 O. 当下有罪。

2）梦把思想转化为形象和话语。

拉康

这里有现在时，也有 vielleicht〔"或许"〕消失的概念。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或许，是的……这发生在现实化之中。他确实说，犹疑已经不存在。我们可以把它同他围绕怀疑所说的东西作平行比较：怀疑存在于某个地方，但不在这里；这里没有 vielleicht。这里是现在时，梦的时态就是现在时；而且并非偶然，它同样是最近将来时的时态，是"我马上就

来”这种现在时——欲望已经如此接近实现，以至于它已然实现。梦文本中的这段内容被置于现在时。

3）接着，他专注于费希纳带给他的一个观念，即心理场所的概念。它在后文会很重要，也会介入心理装置图式的构成。费希纳曾在心理物理学中观察到，梦的场所或许并不是清醒生活思想的场所。弗洛伊德认为这项观察有价值。他特意说：

> “我们并不把场所设想成一个实在地点，但它仍会使我们能够进行建构。”
>
> 他随即从这里转向心理装置的建构。这一装置以三项观察为基础，最后一项就是心理场所的概念。他通过双重类比建构自己的装置：一方面是反射类比，即反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光学类比。所有听过拉康先生课程的人都熟悉后一种类比，因为他经常谈到它。
>
> 在这篇关于退行的文本中，心理场所将通过显微镜、望远镜或照相机的光学类比，被视为像形成的场所。譬如焦平面：它不存在，没有实在存在，却仍然是一项性质、一个位置、一个场所。

拉康

请注意这一点，我现在无法展开。读到文本这个层面时，你们应当意识到：费希纳在心理物理学中提出的概念，曾真正震撼弗洛伊德。安齐厄前几天是否表现出自己对费希纳有些了解？

迪迪埃·安齐厄——不，没有。我只读过一些评述。

拉康

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完全不属于其通俗化版本所呈现的那种极其初级的心理主义维度。费希纳被迫采取的立场十分严谨：既然意识与物理学中可以测量的领域之间存在平行关系，那么这便同时意味着，意识现象的可能性必须被潜在地——至少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扩展到远远超出有生命存在者的范围。我这样说是为了向你们表明：当观念以有效假设的性质得到引入时，它们仍会把作者带到远离惯例的地方。

费希纳在自己的心理物理学中说了另一件事，凭它使梦的领域逸出了这种相似性或平行关系。他的指出极为鲜明，我们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种文风措辞，仿佛只是弗洛伊德在当时允许自己放进文本、相互连接的巧妙类比。弗洛伊德从不这样做——弗洛伊德不是荣格——他不会以寻找四处可见的回声为乐，只要那些回声足够响亮就行。当弗洛伊德把某种东西写进文本，我们知道它总具有极大重要性。他在一封信中告诉弗利斯，费希纳这段话给他带来真正的震撼和启示：梦只能被设想为位于另一个心理场所。所以，我们必须赋予这句话以完整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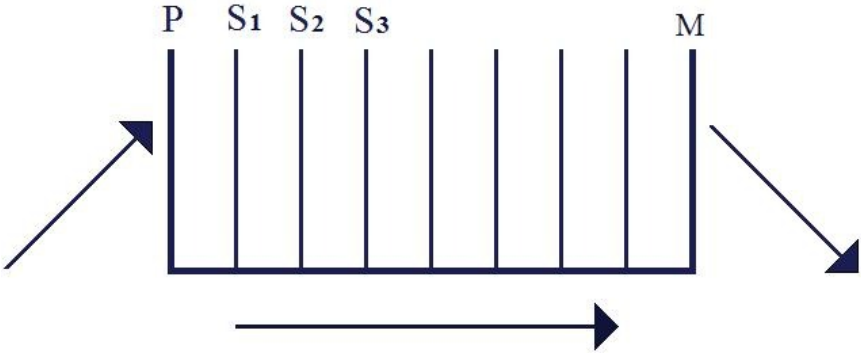
而假如有一个地方能让你们以稍多一些意义辨认这句话，那恰恰就在这里。实际上，只有一种意义能够使我们理解费希纳赋予它的特殊强调，尤其理解弗洛伊德为何强调费希纳文本中的这项观察：正是我正在告诉你们的东西——这里涉及的心理场所并不是心理场所，而纯粹就是象征维度。梦之所以位于另一个心理场所，并不只因为它位于睡眠这对括号之中。它在另一个心理场所中得到定位和界定，而且受其

他局部法则支配：这是另一种秩序。安格鲁斯·西莱修斯曾用 Ort（场所）与 Wort（词语）作双关，我们还会回到那里。

这里涉及的心理场所，就是我刚才试图向你们解释的东西。就梦包含弗洛伊德所发现并感兴趣的那个部分而言，它是一种铭写于另一场所的现象；这个另一场所，就是象征交换本身的场所。它虽然体现于时空维度，却不与我们可以用来定位一切人类行为的时空维度混同。梦的这些结构法则与语言一样，铭写在另一个场所；无论我们是否把它叫作心理的，这句话的意思都是：它位于别处。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我们转向图式。



这个心理装置按照双重类比模型来设想。它最关键的特征在于：《梦的科学》第七章的图式〔法国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457 页〕中，P、S_1、S_2、S_3……、M 是定向的，像反射装置一样具有方向。弗洛伊德说，这种最初极为重要的定向，来自一项众所周知的要求：按照反射过程模型来解释心理过程。反射应当是一切心理产出的模型。

拉康

等一下……这个装置应归入 Ψ 系统。兴奋必须遵循某种时间序列。显然，可以说，它以追溯方式重新连接到他的反射装置。他这样说明引入该要素的理由：

> “毕竟别忘了，这是反射装置的一项性质：事物只朝一个方向前进。”

但他在这里引入的是关键要素。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此前 ϕ、Ψ 与 ω 三个装置的平衡关系中，这一点从未需要得到突出；那里首要涉及平衡现象，而这些现象可以被视为可逆的，因为即便人们从不谈论平衡，却总会重新回到平衡，无论向前还是向后。

然而，他突然向我们引入一个概念——必须懂得沿途把它辨认出来——事物按照一种确定序列发生。将会发生某种我们首先恰恰界定为不可逆的东西。这就是接下来迈出的一步。“不可逆”一词没有出现，但在我看来——也希望在你们看来——Zeitlichfolge（时间序列）和 Richtung（方向）已经充分指出了它。我向你们提示两处：德文版第 542 页；不过本章还有许多其他地方。他反复回到这一点，因为它对论证至关重要。

正是在这里，如果你们愿意，我要开始今天或许会暂时悬置的论述。他提出这一点以后，我们看到他被引向一种做法：他恰恰要考察某种会朝相反方向产生效果的东西，而他本人刚刚才说，这件事从不朝那个方向发生……

至少在我们把这个图式视为反射弧基本图式的情况下

……他却将被迫考察它如何朝反方向产生效果。

正因如此，我们才来到了退行这一章：就在他引入时间序列概念的同一时刻——而且也是出于概念内部连贯性的理由——他将被迫向我们谈论完全相反的东西，谈论这个将被称作退行的悖论之物；后来，它会对精神分析思想的全部发展施加如此支配性的影响。

你们昨晚围绕施韦希讲演已经看见这一点。当我们进入精神病这类仍属未知的领域时，如今正在怎样努力使退行概念获得某种精确性，怎样考察、设想并理解它。你们已经清楚感到，讨论始终围绕这一点：一个主体退行至口腔阶段，这个事实应当被赋予什么意义？

在后面各章中，我们将辨认出真正一系列二律背反和矛盾。最不容忽视的一项是：全部欲望理论都把欲望说成最贴近自身生物学根基的东西；越接近生物冲动，欲望就越倾向于以幻觉形式显现。你们得承认，这是一个悖论。后文还会出现一个公式：梦向我们揭示了人类某种原始状态。那么，假如原始人赖以生存的手段确实比我们更少，他岂不是一个靠做梦在世界上维持生计的人？

你们得承认，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作现款收下了，可人们还曾让我们吞下许多别的东西，也曾信誓旦旦地说原始人具有前逻辑思维，等等；这些说法已经无法保持全部信誉。简言之，为了用退行解释梦现象，弗洛伊德被迫提出这个概念，而它所卷入的矛盾——你们将会看到——会在各个层面遭遇根本反对意见；几乎有多少种他所谓局部论退行的形式，就有多少项反对意见。

问题是解释这个过程怎样发生：促动如何穿越心理装置，直到它们重新出现在表达或运动放电中；而这一解释要求重新找到某种原始的知

觉平面，于是要求局部论退行，进而要求欲望在某些条件下采取所谓的幻觉形式。所有这些都会遭遇大量困难。仅举根本假设来说：回路只能朝一个方向；而我们从经验中知道，神经元回路不会逆行，从来不会逆行——神经兴奋只沿一个方向传播。仅仅局部论退行本身，就在这个图式中引发了各种困难。

至于时间退行和形式退行，你们将看到，正是在它们的层面，我们会看到弗洛伊德思想在这个阶段产生的最大二律背反。它也会使我们理解：为什么他的思想后来必须取得某些进展，以及这种进展朝什么方向发生。譬如，1915 年已经在自恋力比多理论层面奠定的自我理论，使我们能够以决定性、根本性并具有解决力的方式，处理这个图式层面当时建构出来的各种退行形式所提出的问题。

我在这里只是向你们指出十五天后下次研讨班的主题。你们可以看到它有什么意义，因为它既会质疑……

正如我努力限制“阻抗”或“审查”之类术语的使用

……我们必须使用“退行”一词的有限条件，也会促使我们理解它意味着什么，并弄清——正如我昨晚所说——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必须暂时放弃人们对它作出的各种滥用。

第12课 · 1955年3月2日

瓦拉布雷加

拉康

我们先读几小段弗洛伊德的文本；人们读它们时总是太快。

今天，我们重新接续对《梦的科学》第七部分《梦的过程之心理学》的评注，目的是把它整合到我们一直追踪的总路线中：努力理解弗洛伊德思想的进展意味着什么——相对于分析关系中逐渐显露的、可以称作人之存在的首要基础而言——并以此解释弗洛伊德思想的最后状态，也就是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得到表达的状态。

上次，我们在《梦的过程之心理学》的文本中已经谈到第一段《梦的遗忘》，并加以解释。围绕瓦拉布雷加关于阻抗性质的评论，我曾作过一些修正，因而出现一项分歧；它促使我们以一则小寓言的方式，说明审查与阻抗、审查与审查的阻抗之间的差异：

- 阻抗在一般意义上，是一切妨碍分析工作的东西；
- 审查则是这种阻抗的一项特殊限定。

无需再提醒一次，我们的工作始终沿着同一条路线展开：弄清分析关系中可以称作主体的东西位于何处。在“谁是分析关系的主体”这个问题上，必须避免天真的态度：“主体嘛，就是他呀！”仿佛患者是某种

单义的东西，仿佛我们分析家自身也毫无疑问可以被概括为若干个体特征的总和。

“他是谁？”或“我是谁？”这一概念中所介入的分裂，正是我们在这里以其全部表现来处理的问题。这个“谁是主体？”的问题，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具体相遇；我们追随它在所有发生反射、折射并明显迸裂的点上显现出来的二律背反和问题，追随它在我们回答时遭遇的困难中显现。我们希望以这种方式使人感到它究竟位于何处。当然，我们无法直接进攻它，因为进攻这个问题，也就是进攻语言自身的根部。

这意味着什么？沿着这条路线，我们要去看那些人们通常不会停下来看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整座砖石结构、整个弗洛伊德大厦中夹着的一则小注〔法国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493 页；2003 年版第 636 页〕。

我们今天也许追不上瓦拉布雷加，不是因为他讲得快，而是因为他讲得足够准确，使我们不必强迫他停下来。这则注位于第四部分《由梦而醒》《无意识与前意识的关系》。

“另有一种复杂情况——它不同于‘前意识为什么拒绝并扼杀属于无意识的欲望’这个问题——远为重要、深刻，却没有得到门外汉注意，具体如下。一项欲望实现当然应当成为快乐的原因。但对谁而言？”〔第 493 页〕

你们看到，这个“对谁而言？”的问题并不是第一次在我们的学会中被提出。“谁是主体？”并不是我的学生勒克莱尔发明的。

“当然是对拥有这项欲望的人而言。然而我们知道，做梦者对自己欲望的态度完全特殊。他排斥它们、审查它们；简言之，他对此一无所

知。因此，欲望的实现不可能给他带来快乐，恰恰相反。经验表明，这个尚待解释的反面以焦虑形式显现。在做梦者对其梦中欲望的态度里，他因此显得由两个人组成；然而这两个人又因一种亲密的共同性而结合。”

我把这小段文本作为你们思考的引言，因为它以全然清晰的方式表达了我始终强调的主体离心观念，而且这里的表述极其明确。当然，这只是思想的一个阶段，并不是解答。

把这个问题诉诸语言表述，可能会赋予它某种物化形式，也就是说：“还有另一个人格。”不过人们并没有等到弗洛伊德才这样说。

有一位名叫雅内的先生……

他并不是一个毫无可取之处的研究者，尽管被弗洛伊德的发现彻底遮蔽

……他以为自己确实已经注意到：在某些情况下，主体那里存在双重人格现象。他也就停在了那里，因为他是心理学家。归根到底，那只是一桩心理学奇闻；或者随你们怎样说，是一项心理观察事实——两者是一回事——用斯宾诺莎先生的话说，被“故事化”成一个个小故事。

而对我们来说，问题恰恰在于：

- 弗洛伊德没有以小故事形式向我们呈现这些事情；
- 弗洛伊德在问题最关键的点上提出了它，也就是：

可以称作意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同样，当他说“思想”时，所指的就是这个，绝无其他：我们同近人处在一种完全特殊的关系中时，其行为所具有的意义。这种关系由弗洛伊德开创，用来处理一类特定疾病，也就是神经症。这个意义究竟是什么？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不会只在我们异常、反常、病理性行为中寻找若干需要凸显的特征，而是首先谈论自己。也就是说，为了让关于主体意义的真理显现出来，他首先只在主体能够提出这个问题的地方，也就是自己本身的层面，向自己提出它。

正因为弗洛伊德分析自己的梦，他才提取出我们刚才所说的东西：在他的梦中说话的，表面上是某个不同于他本人之人。他在这样一则小注中向我们透露的，就是这个某个他人，这个表面上的第二人物。

这是什么意思？它与主体的存在有什么关系？

从头到尾，问题始终都在这里。它从我们已经见过的那份小 draft 开始；我们已经看到，它虽然每时每刻都维持原子论语言，却又不断从中滑向某种别的东西，因为它用极具独创性的措辞提出了主体与对象关系的整个问题。

你们应该已经注意到，我今天刚刚重新接起了我们的工作线索。

弗洛伊德交给我们的这份最初草图之所以独特……

这次试图勾画人类心理装置的尝试，之所以重要而引人注目，

并区别于一切写过同一主题的作者，

甚至区别于他不断援引的伟大费希纳

……就在于这样一个观念：人类寻找的对象从来不是一个重逢的对象，它每次都是一个〔新的〕对象……

这里的重逢，是回忆意义上的重逢；主体在其中重新找到自己与外部世界之自然关系的预成轨道

……但是，如果人的对象得以构成，它总要通过一次最初丧失的中介。凡是对人具有生产性的事情，都只能通过对象丧失这一中介发生；问题始终在于对象的重构。

这是我们沿途指出的一项特征。我想，在我们对第一段考察过的诸多东西中，你们应该没有忽略它。但它也许在你们看来只是一个细节。我沿途再次把它点出来，因为我们稍后还会重新遇见它。

归根到底，对象分解的全部辩证法、人的对象始终是某种主体试图重新找到其总体性的东西——从某种最初失去的统一性出发——这一点十分引人注目。它已经在弗洛伊德所探求的那种象征性理论建构内部开始勾勒；神经系统结构的最初发现启发了这种建构，只要这些发现可以应用于他的临床经验。

在其著作必须称作“形而上学意义范围”的层面，他已经抵达这一深刻现实。《梦的科学》中某个偶然而甚至已经失效的点，我们大可略过；但也可以在那里看见一个陈述，它使我们触及：当我们始终在这个层面提出弗洛伊德的问题——“主体是什么？”——时，确实走在正确的路线上。“主体是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主体所

做之事具有意义；归根到底，他通过行为、症状说话，也通过我们所知其心理活动中那项边缘功能说话——当时人们把它叫作“意识”……

当时的心理学仍把这个术语维持为心理的同义词

……而弗洛伊德每时每刻都表明，问题恰恰在这里：

- 最不可理解的东西，当然不是我们从主体行为中读出的内容；
- 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种在意识中的显象和呈现会以某种方式

如此不规则。

这一点每时每刻都在这份小小的心理装置草图中被呈现；我们对它的讨论已经接近结束。而当弗洛伊德着手提出梦过程的心理学概念时，他所说的是：

“不能混淆初级过程与无意识。”

初级过程中有各种东西在意识层面显现。问题恰恰在于弄清为什么显现的是这些东西，也就是向我们显现为梦的观念、梦的思想的某种东西。当然，我们意识到了它；否则，我们便不会知道梦有任何东西存在。无意识的东西则是这样一种东西：理论的必要性迫使我们认为，有一定数量、某种定量的兴趣因素已经投注于它。

然而，促成并规定这一数量的东西位于别处，位于一个我们并未意识到的别处。我们也必须重构这个对象。它已经出现在给伊尔玛注射之梦的第一个小图式中，也就是弗洛伊德在那份心理装置草图层面给出的图表。他向我们表明，当我们研究梦中显现之物的结构和联想规定

时，它显然是数量负载最高的东西；在所指与能指的表达关系层面，最多有待意指之物汇聚于此。

它之所以浮现，确实因为它仿佛是最多心理兴趣汇聚的十字路口和会合点。但那些在此显现的要素，也就是动机本身，却仍然完全留在阴影里。我们已经在这个图表层面指出过这些动机。它们有双重形式：

- 一方面是持续的话语，是与弗利斯延续下去的对话之言说；
- 另一方面，则是以双重形式出现的性基础；它赋予梦中一切显象以另一项规定。

性基础具有双重形式：

- 它同时卷入这段言说，因为正是“它作为这样的东西存在”这个概念来规定梦，并表明这是一个正在寻找某种梦之对象本身的人所作的梦；
- 另一面是，弗洛伊德本人实际上不仅与自己的女患者发生特殊关系，而且与在她身后开始显现的整个女性序列发生特殊关系；这是一个复杂而彼此对照的序列。仍待规定的，恰恰是无意识中的东西；作为对象，它只能通过重构得到把握。

这就是弗洛伊德思想发展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点时，把我们带向的意义。

这就是我们今天将通过第二部分“退行”来处理的东西：应当怎样理解合并，理解它在一切症状形成中具有的根本必要性特征——至少两组动机合并，其中一组必须是性的；另一组恰恰是这里受到质问的东

西，因为它在弗洛伊德全部著作中都受到质问，却从未被严格地用我们在此赋予它的名称加以命名，也就是言说的因素、由主体承担的象征功能。

但问题始终相同：由谁承担，由哪个主体承担？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有一点很重要，应当记住：他第一次引入心理装置的构想，是在研究退行时。因此，要重新找到对退行的第一次解释，必须回到《梦的解析》；后来，这个概念会在全部后续理论中取得重大意义。

接着——为了追随弗洛伊德在这段话中的论证——他首先回顾梦的研究向他提供的三个最重要特征。也就是说，在进入这项关于三个过程的研究以前，他概括并压缩了前面的全部内容，可以说压缩了整卷著作：

1）梦在欲望的实现中，把思想置于现在时。所以，这是一种现实化。欲望或欲望思想在梦中最常被对象化、被搬上舞台，总之被实际体验。

2）弗洛伊德说，这是一个几乎独立于前一特征、而且同样重要的特征：把梦的思想转化为视觉形象与话语，即 Bildermutrede。

拉康

Rede 的意思是话语。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并不是我发明了这句话。Bilder 的意思是想象性的，与那个在德文中意指形象的词尤其相宜。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3）第三个概念已经得到强调，来自费希纳：梦的心理场所不同于

清醒生活中表象的场所。

这就是他在论证开头强调的三个最重要结果，也就是他将要着手进行的心理装置建构尝试。这会成为可能的装置模型的第一个图式。这项重构紧接着对费希纳《心理物理学》的援引。

不过，这里已经指出一件重要的事情，后文还会重新谈到。心理装置由不同的 ϕ、Ψ、ω 系统构成，而他说，我们不必在不同系统之间设想某种空间秩序，而要设想一种时间相继秩序。因此，必须把这个装置想象成一个空间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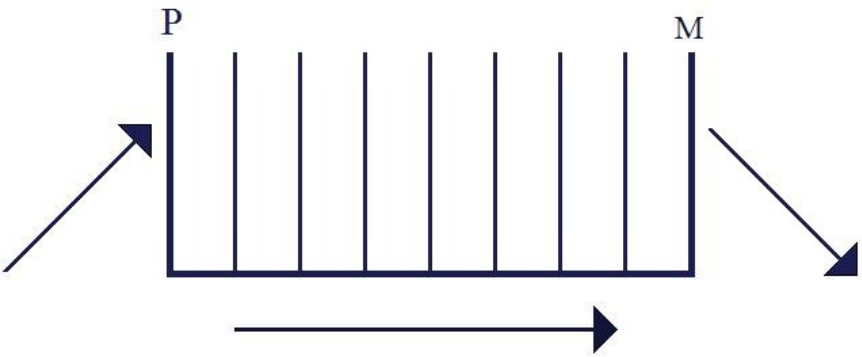
- 但不能相信它具有空间性；
- 而要相信，它表示的是兴奋穿越所涉及的不同系统时的时间相继秩序。所以，这是一种时间局部论。

稍后，在陈述各个图式以后，他还会回到这个观念，说梦是一种回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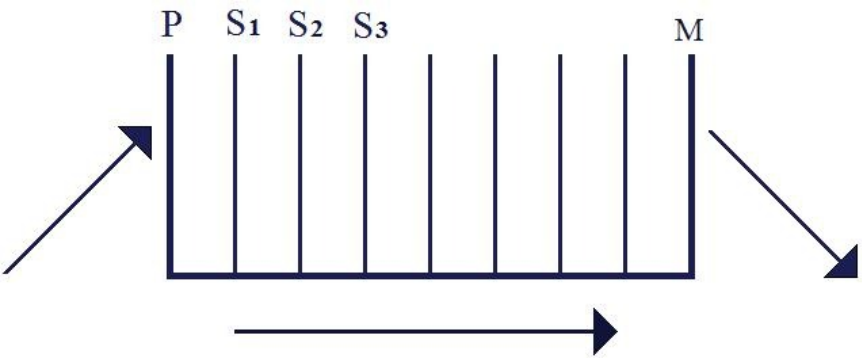
这是他在构想装置以后所作的综合

……回返到最遥远的过去；这个过去越过童年，一直上溯到种系发生的过去，也就是说，它的意义范围甚至比主体的历史性过去更加宽广。

先放下这项综合，以下是装置的第一号图式〔法国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456 页；2003 年版第 590 页〕。它具有一个方向；这是根本所在：箭头的方向。



心理过程始终从知觉端 P 走向运动端 M。然而，紧接着便出现第一次分化：抵达主体的知觉兴奋会在那里留下痕迹，也就是记忆痕迹。必须解释记忆。可是，知觉的 P 系统不具有任何记忆，所以必须从 P 系统中分化出一个 S 系统。



因为首先，各项知觉会按照它们出现的顺序在记忆中结合。当知觉同时发生时，其痕迹也会按同样的同时性秩序发生连接；这就是联想这一重要现象。另一方面，在 S 系统中发生的连接除了联想连接以外还有其他连接，所以必须承认存在多个 S 系统：S_1、S_2、S_3……它们会有很多。弗洛伊德说，试图确定其数量是徒劳的，甚至不值得尝试。

拉康

这几乎有些好笑。伊波利特先生，您记得这段文本吧，它确实非常有趣：

“这些 S 系统中的第一个会按照同时性固定联想。在更远处的系统中，同一份兴奋材料会依照不同的相遇方式得到安排；例如，这些相继系统会表象相似关系或其他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显然在这里进入了确立同一、他异、一、多等等一切东西的辩证论域。你们可以把整个巴门尼德都塞进来。

而他说：

“显然，试图用话语指出这样一个系统的心理意义，将是徒劳的。”

“试图用话语指出”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我们用语言作出的论证中，以一个图式来勾画现实中那些多少按照原子论设想的要素，如何在不同平面上获得组织和重新组合；我们必须在这些平面考察它们，才能重新创造语言的全部范畴。

在“将是徒劳的”这句话背后，弗洛伊德意识到了这种过度操作的徒劳性。另一方面，一个图式又必须使我们能够在空间中展开概念与范畴层面需要重新找到的一切连接——因为这里涉及的是一个空间装置的图式。

这样一来，做这件事当然会完全徒劳。因为我们的空间图式届时只会成为思想游戏在最深刻、最普遍意义上对这个位置所提出要求的复本。

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放弃了；他的图式不再有其他用处，只能向我们表明：凡有语言关系之处，就必须存在连接。这一点从我们试图在某个给定神经元装置内部，确定这些语言关系的相互关系、载体和某种底层基础时开始。

他意识到，除了指出必须有一系列系统以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而试图逐一精确规定这些系统，将会是徒劳的。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抛弃了神经学图式的整个范畴，直接把整个所谓精神学图式纳入其中、预设于其中。他以某种从容放弃了这项任务；一些更天真的人却会投身其中。这一点很有代表性。

相反，下一句话说：

“它的特征在于同记忆的原材料具有紧密关系；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想唤起一种更深层的理论，就是朝这些要素方向发生的阻抗退化。”

“阻抗退化”并不是准确译法。这里有某种完全具体的东西使我们停下来。在这个层面，阻抗概念意味着什么？它会位于这个图式内部的什么地方？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正如从拉康先生刚才评注的段落可以看到，这里包含对联想主义的批判。因为教条式联想主义把联想规律理解为无论记忆之间存在何种关系——邻近、相似或差异——都把它们连接起来的规律。

但在这里，联想得到特殊限定，只是诸连接中的一种。还有其他连接，正因如此才存在多个系统。这里表达了一项与联想主义学说不一致的批判。

拉康

完全正确。在这个意义上，他隐含地承认：既然必须在不同系统层面预设所有这些层级，那么一旦到达严格涉及相似关系的层面，他便从联想主义过渡到无法被联想主义归约的东西，也就是整个辩证法；相似范畴正是第一个辩证范畴。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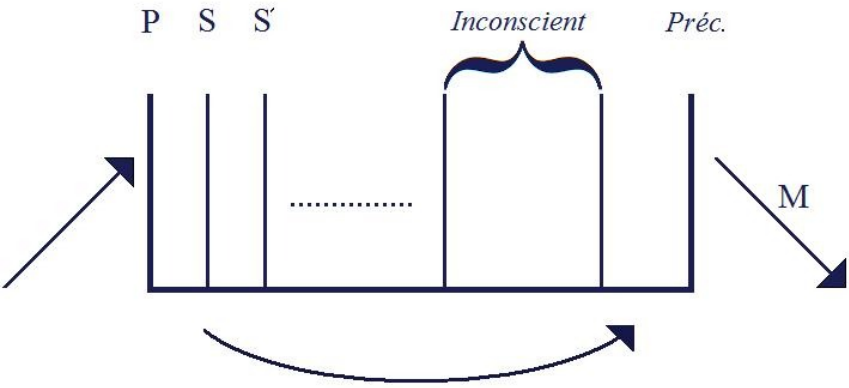
那么，这些记忆 S_1、S_2、S_3……在性质上是无意识的。它们可以成为意识。但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注意到：它们不具有任何可比性质，不具有任何与知觉性质相似的感性性质——必须强调感性性质这一点。

而假如我们现在把……

因为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图式中考虑梦及其心理学

……梦引入图式，我们会记得：梦的形成只能由两个根本审级解释，即批判审级与受批判审级——实行批判者和受到批判者。批判审级禁止通向意识；也正因如此，它与意识处在最紧密的关系中。

他把这两个审级——批判的与受批判的——放入图式，从而得到下方的图式；其中始终有知觉端与运动端。他把前意识置于 M 运动端附近；前意识应当被视作位于运动端的最后一个系统。前意识现象可以抵达意识。



稍后我们会在图式的线性展开中被迫作出某种等同，因为某些前意识现象可以成为意识。我也许错了，但在我看来，如果不把它画成平行六面体式图式，而画成圆形图式，以便同样能够从 M 到达 P，使前意识现象成为意识，图式会更容易理解。

另一种情况则会涉及我们将要强调的另一过程。前意识现象的定义在于它们能够成为意识，而它们所遵循的过程，通常朝向与下方箭头相反的方向。

拉康

你在这里突出了我想每一位诚实的弗洛伊德读者早已视作问题的东西。这个系统从那时起显然就被承认为预设着一种统一性，也就是知觉—意识系统，Wahrnehmung-Bewusstsein。我们在最后局部论层面重新找到它；在弗洛伊德论述的某些时刻，它还被说成应当构成自我的核心。

但这并不意味着，既然事情以这种方式得到表达，我们就必须止步于此。恰恰当人们走到弗洛伊德思想的这个最终状态时，总会说它已经得到普遍接受。我顺便指出：这确实得到普遍接受，但我们不会以此为满足！

我们回到前面。知觉—意识系统早已在《梦的科学》层面得到肯定。引人注目的是，出于内部并合的绝对必要性，它必须包含并承认那个被称作表象的连接。

瓦拉布雷加的观察本身就成立，与他提出的解决尝试无关：另一方面，他把局部论要素表象为一个单一系统……

我提醒你们，这个图式并非纯粹空间性的，而是相继性的

……而这个作为局部论统一体的某种东西，恰恰在两个端点、系统的两个尽头被分解开来。

这个困难必定表象着某种东西。我会说，眼下只需把问题保持开放。

归根到底，为了解释图式自身的运作，他必须在某个时刻提醒我们：意识位于从无意识走向前意识的加工过程之出口；既然这些系统的名称本身就包含这种定向，那么这些过程通常必定以意识为终点：无意识中的东西与意识分离，却可以经过前意识这个先行阶段抵达意识。

可是，出于其图式的必要性，他必须把这个意识系统放在行动可能性之前、运动出口之前，也就是右侧 M 的位置。事实上，他也确实把它放在那里。然而，决定其神经学图式制造方式的全部前提，又迫使他承认：知觉恰恰必须在一切无意识以前发生，也就是在主体获得并接触外部世界、接触 Umwelt 的层面发生；这正位于图式的另一端，也就是 Wahrnehmung 的 W 系统或知觉的 P 系统所在之处。

因此，这个图式在弗洛伊德思想的这个阶段，其构造方式具有如下后果、性质和独特性：它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何把仿佛属于同一功能正反面的知觉与意识，表象为在心理加工流通方向这一序列的两个终点、两个尽头彼此分离的东西。

这绝不能归因于某种偶然性质，仿佛只是因为我们在把整个图式空间化时受到某种错觉影响。诚然，完全可以设想，既然归根到底这些现象远非纯粹空间性的，那么在某个平面上，或许只是图形表象的困难导致这项表面困难。但这个困难确实内在于图式的建构、运动和辩证

加工。知觉必须得到辅助，才具有某种感光层的特征——这里的“感”取自“感光”一词的含义。

弗洛伊德在另一篇文本中重新谈到这点，并强调一种小装置：人们仿佛在一块具有特殊黏附性质的石板上作笔记，石板上覆盖着一张透明纸〔“神奇写字板”〕。笔只是一根尖头；它每次在透明纸上画出线条或符号，都会使纸与下方石板发生短暂而局部的黏合。于是，写出的词会在表面显现，或暗底亮字，或亮底暗字；只要你不再次把纸从底板上揭开，它就一直留在表面。揭开透明纸会使词消失；每当黏合解除，纸张便重新变得空白。

相关知识卡 神奇写字板：知觉表面与记忆痕迹

弗洛伊德要求自己的第一知觉层近似于这个装置。必须假设，作为感性材料的知觉神经元始终能够截取某种知觉。不过，曾经写下的东西即使不再可见，仍会在石板上留下某种痕迹。上层负责保存一度被知觉的东西，但表层必须重新变得空白。这是一个连贯而合乎逻辑的图式；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它在心理装置的具体运作中没有根据。正因如此，知觉系统必须被放在起点。

相关知识卡 神奇写字板：知觉表面与记忆痕迹

这样，我们便走到这种独特的分离：知觉与记忆在系统定位上彼此排斥。从神经装置的观点看，必须区分：

相关知识卡 神奇写字板：知觉表面与记忆痕迹

- 记忆装置的积累层面；
- 知觉获取的层面。……从想象一台“机器”的观点来看，这完全正确；但我们又面对第二个困难，也就是瓦拉布雷加和我请你们注意的悖论。

假如我们这样看待事情，经验中的一切都表明，意识系统必须位于这套加工层次和系统性互联序列最远的相反端；为了思考心理装置在经验中的具体、实际运作，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套序列。

我们必须假定，意识层面恰好位于上述层次序列的相反端。这形成一个困难。我们再次怀疑这里有某种东西不对劲；同一个问题曾在第一图式中得到如下表达：他会假设它们处于两个不同平面——

- 一方面是 ϕ 系统的运作，作为刺激—反应回路的补充；
- 另一方面是 Ψ 系统，即心理运作的能量运作。

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独特悖论：必须承认我们称作 ω 的系统依照不同的能量学原则运作。它表象知觉系统；在第一图式中，知觉系统就是觉察功能，这种功能同它在质的层面特有的运作性质相连，而第一图式中构成 ω 系统自主性的一切也都位于这个层面。主体首先从中取得质性信息；它不同于其他东西，所以图式被迫把它分离出来，因为完

全无法在 Ψ 系统所构成的能量平衡系统层面表象它——Ψ 作为神经装置中各项投注的调节者。

因此，我们面对的是：

- 第一图式在装置同一端表象知觉与意识，并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像它们在经验中彼此结合一样；
- 但第二图式又给第一图式的困难增添了一个新困难，也就是知觉系统位置与意识位置的分离。你们会看到这一切将把我们带向何处。眼下，我只把问题暂时悬置。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所以，看来应当能以某种方式建立一道连接；我不知道怎样建立，弗洛伊德没有强调这一点。

拉康——你已经提出一种解答。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不，那不是解答。我来说明原因。如果可以设想这个圆形图式，我不明白弗洛伊德为何不这样画。他同我们大家一样都会画圆。他以这种方式设想并谈论……

只在一则极短的注中〔参见法国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460 页注 1；2003 年版第 594 页〕，他在那里把 P 与 C 等同起来

……自己图式的线性展开；如果他想把它画成圆形展开，他本来就会这样做。然而他没有。

所以，必须找到一条假设性路径。但弗洛伊德将要研究的不是这一点。我想到最后一个假设。必须等待另一种局部论——这是我们稍后还会强调的另一点——才能看清楚。我们先放下这个问题，转向位于更后面的无意识。它“若不经过前意识”，就无法抵达意识。因此，梦的动机应当被定位在无意识系统中。

法文最新版本第 444 页的小注〔法国大学出版社 1950 年版；另参见 1967 年版第 460 页注 1、2003 年版第 594 页〕说，意识是“继前意识之后的系统”。这是一个继前意识之后的相继秩序，但又朝另一个方向：它是最表层的系统，是 P-C 系统。我们在这里再次遇到悖论：意识系统同时向两边开放——

- 向知觉一侧开放，即图表左边，兴奋从那里抵达；
- 向右侧的运动端开放，与它最邻近的系统是前意识系统。

同一个悖论再次出现在这则注中。在梦的情况下，内部兴奋倾向于通过前意识的中继而成为意识，但它做不到，因为审查在白天、在清醒时禁止它走这条道路。那么，怎样解释幻觉、解释幻觉性梦？弗洛伊德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脱身：承认兴奋没有正常地传向运动端，而是沿着一条逆向路径前进。这就是退行。

拉康

我看到，今天面对这些完全简单的事情，你们的注意力多少有些起伏。换句话说，我们面对这样一种独特矛盾——我不知道是否应当称它为辩证的——你们越不理解，听得就越专注。因为我向你们讲很困难的东西时，看见你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嘴；后来却得知有些人没有听懂！另一方面，当我们说很简单、几乎过于熟悉的事情时，你们肯定就没有那么专注。

我只是顺便作这项观察，因为它同一切具体观察一样富有意义，并提出一个有关其来源的问题。我把它交给你们思考。不过，虽然我们进展缓慢，仍然必须仔细考察这一点。请注意它意味着什么：退行概念第一次介入时，严格地同这个图式的一项特征相连，而我刚才已经向你们说明了该特征的悖论。

换句话说，假如我们只需以一种连贯方式重新构造你们眼前的图式，使知觉—意识系统相对于装置不再处于这种悖论性位置——这个装置代表弗洛伊德在当前阶段对心理本身作出的单向运作表象——那么只要图式有所不同，我们在这个层面就完全无需退行概念。只是因为图式如此构造，他才必须解释梦经验的幻觉性性质。

在这个层面，真正需要承认的与其说是退行，不如说是以兴奋—放电过程表达的数量流通具有一种退行方向。此刻所谓“退行方向”与心理装置正常清醒运作的“前行方向”相对立。它完全依赖图式的这一特殊性质；而我们理当略感怀疑，这种性质也许已经失效，因为它本身已经呈现为悖论性的。

我只请你们顺便记下这一点，因为它也许能帮助我们阐明“退行”一词后来怎样以多种意义被使用，而这些意义不免带来某种歧义。

它出现时的第一种意义可以称作局部论退行：电流——神经装置中的运作——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而且必须朝相反方向行进；它不是走向放电，而是相对于系统而言，走向构成无意识系统的记忆系统之动员。

在某个特定图式中，我们必须解释梦、梦的形象化为何具有幻觉性质；必须解释为什么某种东西会呈现一些面貌——况且这些面貌只在隐喻意义上才属于感觉面貌——也就是梦中形象化的质性方面，尤其是梦中视觉形象化的性质。这是必须在这个层面解释的东西。

所以，退行一词首次被引入弗洛伊德体系时，便由此显得格外成问题；它从根本上连接于第一图式中恰好最无法解释的特征之一。这是必须在这个层面注意的地方。我们还会考察，是否有一种远为有效的东西，能使我们以另一种方式解释这一切，以至于“退行”一词在这里变得完全多余。

让·伊波利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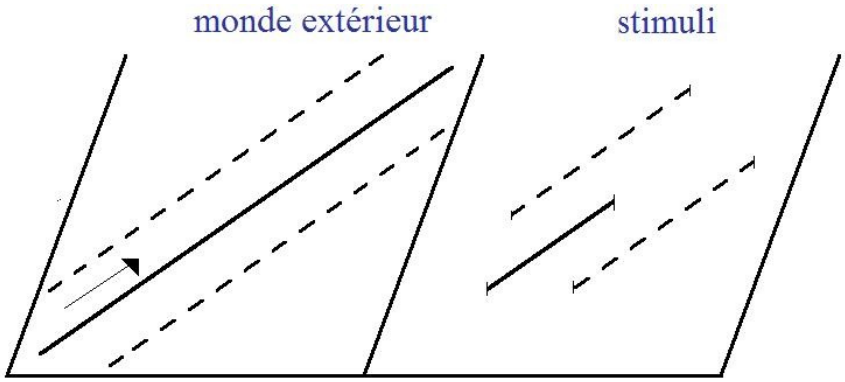
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弗洛伊德的退行、退行图式和退行观念，相对于图式而言具有优先性？不是图式造成退行，而是弗洛伊德心中退行的潜在想法造成了图式——这只是一个假设——造成了图式的特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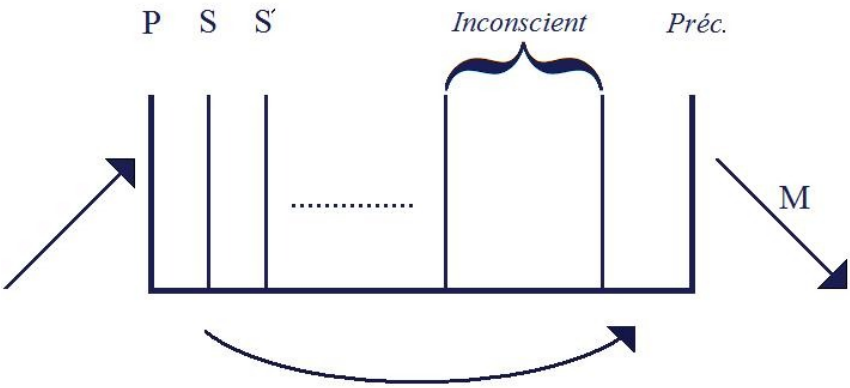
拉康

这恰恰是我们这种处理方式的重要性。我们依次研究四个阶段，我认为它们在图式层面很好地对应着弗洛伊德对心理装置的表象。这个图式之前还有另一个图式，而前一个图式同样是在他的特殊经验——即

神经症经验——层面构造出来的。从一开始，正是这种经验推动了他的全部理论努力。

在那个层面，丝毫没有引入退行这类概念的痕迹。更准确地说，眼下这个看似最初的图式其实延续着另一个图式；它与前一个图式保持连续，而它之所以采取这种形式，正因为第一图式采取了我已经在黑板上多次画过的另一种形式。





正因为这个图式采取这种形式，他才必须承认：在局部论平面上存在向后回返，存在神经电流的回溯。在这个层面，要解释梦的幻觉性质，除了图式本身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要求使用“退行”一词；这里并不涉及欲望的性质，例如：

- 支撑梦的欲望；
- 它可以在其他平面发挥作用；
- 可以以另一种形式引入另一种必要性；
- 它也可以落在同一个退行图式之下。

这就是我们现在将要考察的东西。但在局部论平面上，记忆回到原始形象在知觉中形成时的鲜活性质；它之所以具有退行性质、甚至被称作退行，只能通过各种困难得到成立。

弗洛伊德被迫作出额外建构，才能承认在通常始终前行的过程中，可能产生某种退行的东西。这一点在文本中随处可见：他必须说明并同时承认，梦中发生的事情正是前行电流的悬置。

因为假如前行电流始终以同样速度通过，退行就不可能发生。

鉴于图式的构造方式，退行概念会提出大量难以接受的困难；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被迫承认它，是因为必须在这个图式内部解释：为何确实会发生相对于图式朝退行方向运动的事情。

而且，他绝不是从退行这一事实出发。只有因为他被迫以这种方式构造图式，事情才会被设想成退行。不只图式如此；从整体上说，他也

被自己设想知觉功能在全部心理经济中所处位置的方式所迫。知觉在他那里是初级的、非复合的、基本的东西；机体首先被表象为一种能够接受印象的机体。这个可受印象性要素在这里以其基本功能得到表象，也正是在这种基本功能中，它被迫介入症状层面所发生之事的经济。全部问题当然都在于：意识现象层面发生的事情，是否能够以任何方式被纯粹而简单地等同于知觉的基本现象。

但有一点可以为弗洛伊德辩护：在这种可以说很天真的层面——别忘了，这套神经系统运作表象建构于五十年前——弗洛伊德并没有避开意识本身的存在所造成的困难。

不要忘记，对我们来说，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切仿佛已经失去吸引力；这恰好是行为主义思想传播的结果。我想顺便请你们注意，相对于弗洛伊德试图做的事情而言，行为主义思想纯粹是一场变戏法式的回避。

行为主义思想说：

> “意识当然会提出一些问题。我们行为主义者解决问题的办法，
>
> 就是描述现象并对它们进行操作，却从不考虑意识本身的存在。
>
> 在它明显发挥作用的地方，它也只是一个阶段、一个环节；我们不谈它！”

这确实是一种相当出色的回避困难的方式。我们之所以面对这些困难，是因为弗洛伊德从未想过消除一个困难：必须把意识作为一个特殊审级纳入全部过程。由此，他走向某种令人惊讶的东西：他处理意

识时竟如此谨慎。因为归根到底，他处理意识而没有把它实体化，没有把它物化。后面的整个发展会使你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而且，围绕退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他心中是否还有其他例子。不过，在 1895 年的文本〔《纲要》〕中——这项观察或许能回答伊波利特先生——弗洛伊德对幻觉给出的是纯粹数量解释。他说，唯一涉及的是投注数量，正是它说明一种表象为何能够具有幻觉性。所以，他当时并不是要证明另一种观念。在这里，介入的是一种形式秩序的过程，即另一股电流、心理电流的另一种流通方式。第一种情况只涉及经济学材料……

拉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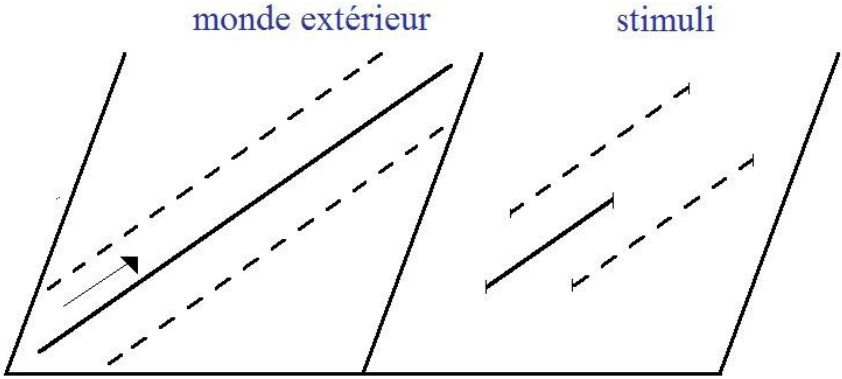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如果你们愿意，按照他对第一图式给出的最初构想，这种网络就是 Ψ 装置；在神经症中，它的整体表象了我们可以称作“联想纤维”的一切。弗洛伊德在第一图式中只关注其中流通的东西，也就是神经元数量。这个能量学概念受一项条件调节：整个系统必须保持在一定水平，事物才会以某种方式建立流通，而这种流通确实表象了其经验总和。某物通过或不通过、能否穿过突触屏障，取决于这一投注水平的改变。事实上，这就是他获得的材料：一个以某种方式构成的、由相互连接的神经元组成的神经系统。

问题在于弄清：

- 什么通过，什么不通过；
- 通路易化怎样形成。
- 这种通路易化怎样改变；
- 它怎样能够在某些阈值以上运作，而在阈值以下不再流通。

一切都在总体层面得到调节，其中包括他引入的全部稳态，以及由于存在多个可能阈值而作为变化发生的东西：清醒与睡眠。它们代表不同稳态的不同规则，而这些稳态都围绕一个共同观念、一个共同的稳态调节主题组织起来。

那么，他当时所谓的幻觉，只是对应于来自整个机体的某些内部促动，也就是神经系统从机体内部接收的兴奋，换言之就是需要。在这些条件下会发生若干经验，最初的经验决定后来的经验。这个概念严格属于学习、learning 的秩序：最初经验将决定其他经验，并导致某些对应于特定本能驱力的回路在这个系统内部得到记录和结构化；每当驱力再次出现时，这些回路就会启动。



这同样是图式结构的后果。将被唤醒的东西，就是已经与最初经验相联结的东西；也就是说，神经元会重新——姑且这样说——亮起来〔参见三极管〕。

它们是某种内部信号，与第一次经验中亮起的信号完全相同；那次经验由需要所迫，是机体在这种需要压力下第一次开始运动。

这会导致什么？

它导致一种严格说来以幻觉理解需要启动的构想；初级过程观念由此产生。换句话说，在这种把机体界定为心理机体的构想中，既然机体最初混沌的经验同其首个需要相连，并曾以某种方式得到满足，那么它幻觉出第二次满足就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同一些东西重新亮起。这发生在哪个层面？你们看得很清楚：它意味着把神经元中发生的物理现象，与真正作为其现象性反面的某种东西等同起来；后者严格属于心理—物理平行论的秩序，也就是主体所知觉的东西。

必须直呼其名。他把它称作“幻觉”，是因为必须把真实、有效、现实的知觉放在别处。这种幻觉只是一种错误知觉，正如在同一时代，人们曾把知觉定义为一种真实幻觉。

换句话说，一切重新出现的需要，只要曾经得到满足，都会带来对其满足的幻觉。第一图式的全部建构都立足于此：作为生命体而被假设具有神经装置、并以这种方式构成的生命存在者，怎么仍能不掉进具有严重生物后果的陷阱？因为显然，如果每一种满足一开始都以幻觉形式向生命体呈现，它几乎不可能最终真正到达〔……〕

所以，必须理解怎样调节其中发生的东西。弗洛伊德当时把负责调节的某种东西置于 Ψ 系统内部，也就是他已经称作 ego（自我）的东西。它在当时是什么？弗洛伊德明言：相对于 Ψ 系统的这种初级运作，我们必须假定它是次级组织。

同一个系统中必定发生了某种变化，使这个机体每时每刻都能把自发涌现的幻觉，同这些知觉装置层面发生的另一种东西相互参照；也就是实行比较和对照，以形成对实在的适应类型。这预设我们必须承认——作为经验的后果——随着经验使其得以形成，某种东西逐渐构成。它会降低需要在这个装置中的敏感点所发生的数量投注。弗洛伊德在首次建构中通过分流过程解释这种降低：在一个如此构造的装置中，数量性的东西始终可以被分流、扩散；最初只有一条已经勾出的路径。

但如果某种东西介入，使刺激、兴奋、神经元数量、能量表象不再沿一条路径，而是同时沿三条、四条或五条路径通过，弗洛伊德便在这个图式中找到一种令他满意的解释。它使他能够认为：在数量层面，

沿第一条路径——已经得到易化的路径——通过的东西会被充分降低，从而成功接受比较检验，同严格知觉层面平行发生的东西进行对照。

你们看到，这在某些点上预设了不少假设，在另一些点上则没有。它需要如此多的假设，而其中许多根本无法得到证实。这类建构始终带有某种令人失望的性质。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评判弗洛伊德建构的质量。它们的价值来自它们把弗洛伊德引向的发展。重要的是指出，当时的结构就是这样。

我顺便请你们注意：在这个层面，ego 位于 Ψ 系统自身之中，而不是位于被设想成幻觉与真实知觉之间参照系统的知觉装置层面。ego 是调节以下两者间全部比较经验的装置：

- Ψ 系统层面发生的幻觉性东西；
- ω 系统层面发生的适应现实的东西。

重要的是从能量层面解释这类事情何以可能，因为 ω 层面的能量负载非常微弱。ego 必须始终把已经得到易化的神经元在这里的亮起降低到极低的能量水平，才可能借助 ω 系统实行转向和区分。

换句话说，在这个图式中——它正处于我们试图表明的路线上——ego 位于心理装置核心；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在局部论上通过同一些地方。在第一图式中，ego 与 Ψ 装置是同一个东西。ego 是 nucleus，他就是这样表达的，是这个装置的核心。值得关注的正是这种演变与差异。

这也反对你刚才的观察和假设。弗洛伊德把 ego 系统分解为在图式中位置如此悖论性的知觉与意识两部分，远不是因为某种预成观念强迫他如此；这对他绝不是便利之举，在第一图式中要方便得多。

我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第二图式中，事情仿佛必须如此？

因为第二图式根本、完全没有覆盖第一图式。第二图式的支配性特征是：它是一个时间图式。问题在于弄清，事情按何种秩序、何种序列发生。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他引入时间维度的时刻，他遭遇了这个困难。他在这里碰到一个悖论，而这个悖论在他的第一次图式表述中并不存在。这就是我保持开放的问题。

〔对让-保罗·瓦拉布雷加〕把你要说的内容尽量作个结论吧。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必须区分退行的三种形式。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说：退行对他而言仍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并会在童年场景的再度鲜活中寻找阐明，但不会从局部论观点解释它。我们可以在这里作结。

拉康

可以。我们今天只做了一件事：向你们展示弗洛伊德笔下的情况——因为这不只是我们在强调，而是在他的文本中——归根到底，退行真的像一条鱼面对一只苹果那样令他无所适从。它确实非常成问题。

它在图式层面的出现既是悖论性的，又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必要。因为即使在这个层面，他也根本无需引入退行来解释某种东西的根本幻觉

性特征；当时他已经把这种东西提取为初级过程，而且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早在第一图式层面就已经被区分为根本且关键的过程。

这里无需引入退行概念。他从开始强调时间因素的那一刻起，才引入它。于是，第一项后果是：他也被迫在局部论平面，也就是空间平面，承认这个著名的退行；它以一种缺乏支撑的方式登场。你们跟上了吗？我们在这项进展中需要突出的，正是退行那种悖论性，以及它甚至对弗洛伊德本人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未获解释、充满二律背反、无法说明的性质。

接下来你们会看到事情将怎样呈现，以及当他在其他论域——尤其是发生论论域——突出退行概念时，我们应当怎样引入它；发生论把机体的进展置于其生成、相继时期和发展维度中来考察。

这留到下次。

第13课 · 1955年3月9日

尽管我很疲倦，今天我们还是试着做些工作。流感让我有点吃不消。我们仍在思考弗洛伊德关于心理装置的不同构想具有怎样的具体意义；这些构想贯穿他的著作，作为必要解释出现……

对他来说，它们始终回应着极其艰难的内部连贯性要求

……是对临床事实若干阶段的必要解释：

- 首先是在他独自一人、最先尝试找出方向的时候；
- 随后则贯穿围绕在他身边的追随者、也就是分析共同体，对构想和技术作出的各种修改。

归根到底，《梦的解析》是对心理装置的解释，正如你们上次同瓦拉布雷加一起看到的那样，虽然它当时或许显得枯燥。我们面对退行这个困难问题；它最初由图式本身的必要性产生。必须阅读《致弗利斯书信》，才能知道弗洛伊德生成这个图式时经历了多么艰难的工作；正如我刚才所说，其中充满深入他思想最深处的内在要求。他必须得到严格的图式，也就是能够排除荒谬或过大内部矛盾的图式。在这一点上，他要求很高。

我不认为，他因为处于假设领域，就允许事情保持模糊。当人们围绕量作出假设时，必须考察它对质概念造成的回响。我也不认为，一旦人们为了表述方便而在两者中偏爱其一，它们还能完全兼容。这就产

生了最初那项复杂建构；它完全有根据，也就是我们已经充分强调、但还须返回的第一图式——《纲要》的图式。

第二图式的困难，来自对第一图式的相对简化。也就是知觉与意识的分离；围绕梦中所发生之物具有的形象化性质——用我们的话说，即想象性性质——这种分离迫使人们引入退行假设。显然，如果当时已经能够使用“想象性”一词，许多困难和矛盾就会消除。

然而，这种形象化性质被理解为参与知觉；尤其是视觉性质这一特征，被提升为同知觉术语相等的东西。显然，《梦的解析》这一章提出、加工并建构图式的方式，使人不得不从局部论层面开始就提出如下假设：梦的状态不允许过程的正常时间序列，也就是不允许过程一直走到运动放电；所以，必须在意向性冲动过程的某种向后回返中寻找解释，而它的向后回返又造成形象性质的出现。

归根到底，这就是该假设的支点。退行之所以如此重要，还因为我们在那里看到了某种东西的第一个坚实理论表述；后来，人们以平行、相似的方式，在形式平面和发生论、历史平面承认了它，也就是退行到个体发展的第一阶段。你们知道，这个概念支配着我们对神经症以及治疗所产生之物的许多构想。

那么，从一开始就质问为什么必须借助这个概念脱身，并考察它何以能够进入理论——尽管如今它看起来如此熟悉——绝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事情能够这样倒着进行，这就是“退行”一词的含义。我们现在就走到了这里。

为了使你们踏上从这个我称作简化图式或第二图式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在黑板上看到、化约为一系列阶段和层次的《梦的解析》著名图

式——通向弗洛伊德后来心理装置理论发展所蕴含的图式，尤其通向围绕自恋构想组织起来的图式，我今天要围绕梦的工作，向你们提出一个小小的检验。

最初的梦、梦中之梦——给伊尔玛注射之梦——弗洛伊德始终认为它值得一项尽可能穷尽的分析。每当他想重新获得一个支点，就会在书中频繁回到这个梦，而且某一次还特别详尽……

相关知识卡 伊尔玛注射之梦

我提醒你们，这发生在他解释并引入“凝缩”概念的地方

……那么，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就从当前的观点来考察这个梦。

这样做当然完全是我们的权利，前提是不能误用；换句话说，不能让弗洛伊德思想的第一阶段重新说出最后阶段才有的东西，更不能按我们的方式强行使各个阶段彼此一致。

我顺便提醒你们，有一些作者恰恰沉溺于这种做法，而且颇为坦率地承认。尤其可以在哈特曼笔下找到如下观念：归根到底，弗洛伊德的不同构想彼此并不那么一致，所以需要——这个词从他笔下溜了出来；我替他遗憾，可不是我硬塞给他的，我没料到他竟会作出这种见证——得到“同步化”。

弗洛伊德思想被这样“同步化”所造成的效果，恰恰使我们必须返回文本。因为事实上，在这里，“同步化”本身在我听来不幸地回响着“整齐划一”。问题不在于同步化弗洛伊德思想的不同阶段，甚至也不在于使它们彼此一致。

问题在于考察：弗洛伊德思想各个阶段由矛盾构成的进展，始终回应着哪一个独一而恒常的困难；并通过这些阶段内部及相互之间不断呈现的二律背反序列，使我们直面严格说来属于我们经验的对象。换句话说，你们马上就会看到：在那些负责教授分析、把你们培养成分析家的人中，我不是唯一想到重新讨论给伊尔玛注射之梦的人。

有一个名叫埃里克森的人，自称是文化主义学派的支持者——但愿这让他过得好！——这种取向以某种方式在分析中强调文化材料，引导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一种此前当然未被忽视的东西……

据我所知，弗洛伊德从未忽略它，那些可以特别称作弗洛伊德派的人也没有

……也就是每个病例中属于主体所沉浸之文化语境的东西。问题在于，在主体构成中是否应当赋予这个要素首要而全然支配性的地位。

我们眼下先放下它可能引发的争论，看看它会得出什么。围绕给伊尔玛注射之梦，它得出了一些评论；只要我今天尝试重新分析时遇到它们，就会逐一指出。这些评论确有见地，但我认为，它们并不来自这种文化主义。

另一方面，令我惊讶的是，这种文化主义竟以相当独特的方式同另一种我会称作心理主义的东西汇合。后者试图——你们会看到，我们的研究围绕整个问题旋转——按照一项已成为分析家的核心研究和主要关切的探索，重新理解全部分析文本，无论那是什么文本……

我提到哈特曼并非没有理由，也不只是想讥讽他的“同步化”

……也就是“ego（自我）的不同阶段”。

给伊尔玛注射之梦向我们交出了如此多的东西。譬如，人们会试图把它理解为弗洛伊德 ego 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 ego 显然有权得到格外尊重，因为它是一位伟大创造者的 ego；我们将试图把这个梦定位在其创造能力达到杰出高度的时刻。当然，这具有一切可能的意义；而且说实话，也不能说它是一种错误理想。创造者当然应当有一门自身的心理学。

但这是我们应当从弗洛伊德经验中吸取的教训吗？更具体地说，当我们用放大镜观察给伊尔玛注射之梦层面发生的事情时，得到的教训是这个吗？我们将努力考察。你们很清楚，假如这一观点为真，那么我告诉你们的一切、弗洛伊德发现的全部本质——也就是主体相对于这个 ego 的根本离心——都是错的；我们最终可以返回这样一种观念：一切都相对于某种“ego 的理想类型发展”得到定位和居中。假如分析发现的是这个，那么我告诉你们的一切都是错的。反过来，如果我说的是错的，那么要读懂弗洛伊德的任何一小段文本都会变得极其困难。

我们将在给伊尔玛注射之梦上作这项检验。鉴于弗洛伊德赋予这个梦的重要性，我认为我们有权这样做。乍看之下，人们也许会感到惊讶：弗洛伊德究竟从这个梦的分析中得出了什么？他得出了如下结论，也就是他作为首要真理提出的东西：梦始终是一个欲望、一个愿望的实现。

我会迅速提醒你们这个梦的内容。我希望对你们许多人来说，重新唤起内容也会同时重新唤起分析。你们已经读过足够多遍，应该能立刻

联想到围绕它的整个分析。我将不得不持续援引它。瓦拉布雷加会为你们朗读梦的文本。

“一座大厅，许多客人，我们正在招待他们。伊尔玛也在这些客人中。我立刻把她拉到一旁，针对她的来信责备她仍未接受我的‘解答’。我对她说：‘如果你还有疼痛，那确实只是你自己的错。’她回答：‘要是你知道我现在喉咙、胃和腹部有多么痛，这让我透不过气。’我害怕起来，仔细看她。她面色苍白而浮肿；我心想：难道我终究漏掉了某种器质性症状？我把她带到窗边，检查她的喉咙。她表现出某种抗拒，就像戴着假牙的女人。我心想：可她根本不需要假牙。接着她把嘴张得很大；我发现右边有一大片白斑，又在别处看见一些奇异的卷曲构造，显然形似鼻甲，上面覆着大片灰白色痂皮。我立刻叫来 M. 医生；他再次检查患者并予以确认……M. 医生看起来与平常全然不同：他十分苍白，跛着脚，下巴没有胡须……我的朋友奥托现在也站在她身边，朋友利奥波德隔着紧身胸衣为她叩诊；他说：‘她的左下部有浊音’，又指出左肩处有一块皮肤浸润〔尽管隔着衣服，我也像他一样触知这一点〕……M. 说：‘毫无疑问，这是感染，不过没关系；接下来会出现痢疾，毒素会排出去。’我们也立刻知道感染来自哪里。我的朋友奥托不久前在她感到不适时，给她注射了一种丙基制剂：丙烯……丙酸……三甲胺〔我看见它的分子式以粗体印在眼前〕……这种注射不能如此轻率地进行……很可能注射器也不干净。”〔法国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99 页；2003 年版第 142 页〕

〔德文原文：Eine große Halle – viele Gäste, dia wir empfangen. – Unter ihnen Irma, die ich sofort bei Seite nehme, um gleichsam ihren Brief zu beantworten, ihr Vorwürfe zu machen, daß sie die „Lösung“

noch nicht akzeptiert. Ich sage ihr: Wenn du noch Schmerzen hast, so ist es wirklich nur deine Schuld. – Sie antwortet: Wenn du wüßtest, was ich für Schmerzen jetzt habe im Halse, Magen und Leib, es schnürt mich zusammen. – Ich erschrecke und sehe sie an. Sie sieht bleich und gedunsen aus; ich denke, am Ende übersehe ich da doch etwas Organisches. Ich nehme sie zum Fenster und schaue ihr in den Hals. Dabei zeigt sie etwas Sträuben, wie die Frauen, die ein künstliches Gebiß tragen. Ich denke mir, sie hat es doch nicht nötig. – Der Mund geht dann auch gut auf und ich finde rechts einen großen weißen Fleck und anderwärts sehe ich an merkwürdigen krausen Gebilden, die offenbar den Nasenmuscheln nachgebildet sind, ansgedehnte weißgraue Schorfe. – Ich rufe schnell Dr. M. hinzu, der die Untersuchung wiederholt und bestätigt.... Dr. M. sieht ganz anders aus als sonst; er ist sehr bleich, hinkt, ist am Kinn bartlos.... Mein Freund Otto steht jetzt auch neben ihr und Freund Leopold perkutiert sie über dem Leibchen und sagt: Sie hat eine Dämpfung links unten, weist auch auf eine infiltrierte Hautpartie an der linken Schulter hin (was ich trotz des Kleides wie er spüre). M. sagt: Kein Zweifel, es ist eine Infektion, aber es macht nichts; es wird noch Dysenterie hinzukommen und das Gift sich ausscheiden.... Wir wissen auch unmittelbar, woher die Infektion rührt. Freund Otto hat ihr unlängst, als sie sich unwohl fühlte, eine Injektion gegeben mit einem Propylpräparat, Propylen... Propionsäure... Trimethylamin (dessen Formel ich fett gedruckt vor mir sehe). Man macht solche Injektionen nicht so leichtfertig. Wahrscheinlich war auch die Spritze nicht rein.〕

〔《梦的解析》，Deuticke 出版社，1911 年第 3 版〕

我提醒你们这个梦的前情，以及伊尔玛意味着什么。伊尔玛是一位患者，也是弗洛伊德的家庭朋友。因此，他面对她时，处在分析家为自己熟人圈内的人治疗时特有的棘手处境中；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本身始终应当避免。我们今天对这种情况下所谓反转移的困难，比分析的史前阶段要警觉得多。事实也确实如此。弗洛伊德与伊尔玛之间遇到了很大困难。

正如他当时在梦的联想中告诉我们的，他仍然认为，只要发现神经症根本冲突的无意识意义，就只需把它交给主体；主体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如果不接受，那就是他的错，他是个讨厌、恶劣、糟糕的患者。分析中只涉及这一点。我没有夸大：确实有好患者与坏患者。好患者会接受，于是一切顺利。弗洛伊德以近乎我刚才这番粗略讽刺的幽默方式，向我们讲述这个观念。他还说，自己只能感谢上天让他当时拥有这种构想，因为它使他得以活下去。

所以，他面对伊尔玛时十分为难。伊尔玛的情况确实有所改善，却仍保留着一些症状，尤其是呕吐倾向——如果我没记错——这肯定非常难受。他当时刚刚中断治疗，又从朋友奥托那里得到她的消息。我们从前谈另一个问题时，我曾在这里强调：奥托与弗洛伊德很亲近，但不是那种熟悉这位已经成为大师之人的思想的亲密朋友。

他是个老好人奥托；全家人感冒或有些不舒服时，他都会略加照料。他也经常出入这个家庭；你们会看到，他在这个家里扮演着讨人喜欢、乐于助人、常送礼物的单身汉角色。这一切不免引起弗洛伊德略带揶揄的有趣讽刺。弗洛伊德对这个奥托怀有恰当却平平的尊重；奥托把那个名叫伊尔玛的人的消息带给他，说总的来说还行，却没有那么好。

透过奥托的语调，弗洛伊德以为自己感觉到：亲爱的朋友奥托多少有些不赞成他；更确切地说，奥托想必略微参与了周围人的嘲讽，甚至参与了他因这场轻率开展的治疗而遭遇的反对，因为他在这个场域上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操作。问题确实就在这里，因为弗洛伊德觉得自己已经向伊尔玛提出了正确的解答——Lösung。这个词在德文中具有与法文相同的歧义：注射的溶液与冲突的解答用的是同一个词，彼此重叠。给伊尔玛注射之梦的象征意义已经由此形成。围绕这个 Lösung——我们将看到，它尤其在结尾越来越接近一次注射——问题正是这样，我们也从这里出发。

一开始，弗洛伊德对朋友非常不满。但他之所以对朋友不满，是因为对自己更加不满。他不只不满治疗结果，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所给解答是否有根据、这个所谓解答是否确实有效，乃至怀疑治疗原则本身，因为对他来说，这种神经症治疗的有效性仍然完全成问题。

他处于 1895 年的实验阶段，正在作出若干重大新发现，其中就有这个梦的分析。这个梦在他看来始终如此重要，以至于后来在 1900 年，他会在记载该梦的著作出版后不久，给弗利斯写信称它是一项“决定性经验”。他还开玩笑地设想——不过他的玩笑并不那么随意——

“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在这个梦发生的贝尔维尤乡间住宅门口立一块牌子：‘1895 年 7 月 24 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第一次在这里揭开梦之谜。’”[注1]

[注1] 1900 年 6 月 12 日第 137（248）封信，载《致威廉·弗利斯书信》，法国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526—528 页。

因此，他既充满信心，又正处在 1897 年危机以前。我们在《致弗利斯书信》中找到这场危机的痕迹：他一度认为自己误解了神经症的所有问题，以诱惑形式处于其理论生成核心的创伤理论必须抛弃，而整座大厦也就随之坍塌。

所以，弗洛伊德正处在一个创造时期，同时又极度敞开于不确定与怀疑；这甚至构成他全部发现进展的特征。从奥托声音中听出的那一点不赞成所造成的小小冲击，正是使整个梦启动并触发它的动力。

早在 1882 年——我提醒你们——弗洛伊德就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指出，进入梦中的，与其说是当天重大的关切，不如说是已经开头却又被中断的主题，是言说中那种“哨声突然被切断”的方面。

这是很早就最令弗洛伊德震撼的事情之一，我们在他的分析中不断重新遇见它：凡在所谓“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的秩序中发生的事情——你们无疑记得，我曾向你们讲过忘记奥尔维耶托壁画作者姓名的故事——同样都源于某种当天没有完全说出来的东西；我们会一再遇到它。

这里远非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晚饭后，弗洛伊德开始工作，围绕伊尔玛病例写出整份摘要，以便理清事情，必要时为治疗的总体处理方式辩护。随后夜晚降临，我们见证了这个梦。

我直接谈结果。弗洛伊德看来认为——而且是以一种会令我们惊讶的方式；你们很快会明白原因——自己能够用摆脱伊尔玛治疗失败责任的欲望，解释这个梦的全部细节，是一项巨大成功。

作为梦的制作者，他在梦中通过多条路径来做这件事；路径如此之多，以至于正如他用一贯的幽默所指出的，这很像一个人被指责归还了一只破锅时所讲的故事。那个人回答：

相关知识卡 伊尔玛注射之梦

- 第一，他归还时锅是完好的；
- 第二，他借锅时锅已经破了；
- 第三，他根本没有借过锅。每项解释单独看来都完全有效，但整体绝不可能令我们满意。弗洛伊德说，这个梦就是这样构成的。当然，显然有一条共同线索贯穿梦中出现的一切。

问题倒是：弗洛伊德为何会以此为满足……

考虑到梦理论在他那里后来的发展：梦中有若干彼此连续的要素，有前意识文本，而这些要素在梦中从根本上由无意识欲望赋予动力

……归根到底，在《梦的解析》论证的第一步中，他为何满足于向我们展示一个完全由一项只能称作前意识的欲望得到满足而解释的梦？

因为，为自己摆脱伊尔玛治疗失败责任而辩护的欲望，不只是前意识的，而且完全是有意识的：前一天晚上，他一直在整理伊尔玛的全部治疗，也就是恰恰在为其中顺利之处与可能不顺利之处辩护，把看来曾推动自己全部处理方式的东西白纸黑字写下来。

所以乍看起来，弗洛伊德为了确立“梦在一切情况下都是一项欲望的满足”这个公式，只要求最一般意义上的欲望概念；他并未进一步追问这项欲望位于何处，也没有追问——正如我在上次会面开头告诉你们的

——这项欲望是什么；甚至仅仅停留在更熟悉的问题上，它又来自哪里：来自无意识还是前意识？

请记住，弗洛伊德在我上次读过的一则小注中这样提出问题：

- 这个无意识欲望是谁？
- 那个遭主体排斥、令主体厌恶的它是谁？
- 所以，当我们谈论一项无意识欲望时，究竟是什么意思？
- 这项欲望对谁而言存在？归根到底，恰恰在这个层面，弗洛伊德交给梦的解答为何给他带来如此巨大满足，将为我们得到阐明。

因为，为了使这个首个得到解释的梦在弗洛伊德论述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获得完整意义，我们必须加入一项特殊说明：弗洛伊德赋予它的这种重要性——而且我会说，它在我们看来越是悖论，就越有意义。乍看起来，几乎可以说，他撞开的那扇门本来就接近于〔……〕本来就是敞开的，因为归根到底这里涉及一项前意识欲望。表面上他并未迈出决定性一步，但他觉得自己已经迈出，因为他把它视为梦中之梦、最初而典型的梦。

重要的，是他感觉自己已经迈出了这一步；而后面的论述已充分证明他确实迈出了。如果他感觉自己已经迈出，那是因为他实际上已经迈出。请听清楚，我并不是要在弗洛伊德本人以后重新分析弗洛伊德的梦。那将完全荒谬。我们不应分析已经去世的作者，同样也不应自称比弗洛伊德更能分析他自己的梦。

弗洛伊德中断联想时，自有他的理由。他告诉我们：

“这里我不想再告诉你们更多，因为我毕竟已经讲得够多；

我不能把床笫和夜壶的所有故事都讲给你们听……”

或者他明确地说：

“这里我不想再继续联想了。”

这一切都写在文本内部。所以，问题不是在弗洛伊德本人停下来的地方作训诂或外推，而是要从我们不同于弗洛伊德的位置，把梦与解释这个整体纳入考察。因为归根到底，别忘了这里有两件事：第一，做梦；第二，解释梦。我们介入了第二项操作。但不要忘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介入第一项；因为我们在分析中所做的，并不只是解释主体的梦——如果我们确实解释它——而且作为分析家，我们已经进入主体的生活，因而已经在他的梦里。

假如你们还记得，我在本学会的创会讲演[注2]中围绕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提出的“小”符号系统——后来我从未重新谈到那些内容——它使用小写字母与大写字母：

> [注2] 雅克·拉康：《法国精神分析学会创会讲演》，1953 年 7 月 8 日，载“不全的拉康”（E.L.P）。

- i（S）：把符号置于形象形式，使符号形象化，把象征话语置于形象化形式——梦；
- s（I）：使形象符号化，对梦作出解释。

但为此，必须发生一次反转，必须使这个符号再次符号化；也就是说，中间必须有一个位置，使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双重转换中发生了什

么。我们要尝试的只有这一点：把整个梦连同弗洛伊德给出的解释纳入考察，看看它在象征界与想象界的秩序中意味着什么。

幸运的是，我们始终谈论的这个著名梦——你们会充分看到，我们只以最大敬意来处理它，因为它是一个梦——不在时间之中。这一点很容易注意到，也恰好构成梦的独创性：梦不在时间之中。

这里有一项十分引人注目的东西；相关作者没有一位纯粹地注意到它，尽管并非没有接近。埃里克森先生已经接近，可惜他的文化主义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是一种有效工具。这种文化主义推动他提出所谓研究梦的显现内容的问题。他告诉我们，应当把梦的显现内容重新置于首位。

由此产生一场极其混乱的讨论，立足于“表层”与“深层”概念；我始终恳请你们摆脱这些概念，不要再想它们。那里还有一番关于“表层的深度”的思考。就我而言，如果以幽默眼光看待事情，正如纪德在《伪币制造者》中所说：“没有什么比表层更加深刻。”因为根本就没有深层。

事实上，我们会看到这一点。问题并不在那里。问题是：必须首先从文本出发，并按照弗洛伊德本人建议和示范的方式，把它当作一篇神圣文本来出发。作者、书记员不过是一个潦草抄写者，位居其次。人们开始向我们讲耶利米、以赛亚乃至耶稣基督的心理学之日，便是《圣经》评注无可挽回地失落之时。

这与我正在告诉你们的东西属于同一种秩序。面对我们的患者时，我请你们更多关注文本，而不是作者的心理学。这就是我的教学的全部

意义和方向。那么，我们恰恰来考察这篇文本；它将把我们带向分析中的关键之物。考察这篇文本：其中有两个阶段。

它有一个高峰，具体如下：首先，弗洛伊德在那里。埃里克森先生十分重视他开头说“我们正在招待”。于是，一开始他似乎是一个双重人物：他招待客人，并非独自一人，而是与妻子一同招待。事实上，他在那里被看见；这里涉及的是一场生日聚会，是一场为某事而预定的小聚会，家庭朋友伊尔玛应当前来。我可以接受：开头的“我们正在招待”把弗洛伊德置于一家之主的身份中；不过这个“我们”看来并未使他的社会功能带有多么严重的双重性，因为亲爱的博士夫人一分钟也没有出现。

弗洛伊德一出现，便进入对话，视野随之缩窄。他把伊尔玛拉到一旁，开始责备、斥责她，对她说：

“这确实是你的错；如果你听我的，情况就会更好。”

反过来，伊尔玛告诉他：

“你不知道这里、那里有多么痛：喉咙、腹部、胃。”

随后她说，这使她 zusammenschnüren，即紧勒、捆缚。这个 Zusammenschnüren 在我看来极具表现力；我赋予它某种表达……

X 夫人——从前，人们要三四个人一起拉紧束腹的带子，才能把它勒住。

拉康

于是，这一切毕竟给弗洛伊德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他开始表现出担忧。他把伊尔玛拉到窗边，让她张嘴。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讨论与阻抗的背景上；但这种阻抗不只是对弗洛伊德提议的阻抗，也是对检查的阻抗。

这些词都值得用德文说出。人们把它们译成英文和法文时，竟译作“异端”……这里实际上涉及“女性阻抗”类型的阻抗。作者们也从这里一带而过，调动了所谓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心理学的整个问题。因为女人当然已经不再阻抗我们，发生阻抗的女人不再令我们兴奋。每当涉及女性阻抗，总是那些可怜的维多利亚时代女人被拉来集中承受责备；这颇为好笑。这同样是文化主义的后果；在这里，它显然没能帮助埃里克森先生睁开眼睛。不过，我们感觉到这里有某种重要的东西，事实上也确实重要。弗洛伊德的全部联想都会围绕它旋转，并突出：伊尔玛远不是唯一受到牵涉的人。

处于 sich streichen〔抗拒〕状态的人还有很多。尤其有两个人在那里；她们彼此对称，却仍颇有问题。一位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妻子；当时——文本没有说，但其他地方提到——她正在怀孕。另一位则是另一名女患者；可以说，她是理想患者，因为首先她不是弗洛伊德的患者，其次她相当漂亮，而且肯定比伊尔玛更聪明——人们倒更倾向于把伊尔玛的理解能力说得很差。

她还有一项吸引力：她并不向弗洛伊德求助。也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希望她有一天能够来求助；不过说实话，他对此不抱太大希望。简言之，在这个论域中，女人显然从最纯粹而定向明确的专业兴趣，一直延伸到可以通过一个女人建立起来的各种想象性转向。

我们看到这三个女人呈扇形插入，其中包含一个对弗洛伊德这个人物所处情境显然极其重要的人——他自己的妻子。我们知道，她在弗洛伊德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种依恋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性质，不只是家庭依恋，也是婚姻依恋：我们知道，他对妻子的依恋被高度理想化。

然而，从人们发现的某些细微差别来看，她似乎也在若干本能层面给他带来过一些失望。弗洛伊德与伊尔玛的关系就位于这把扇子中。伊尔玛作为一个具有展开性想象价值的人物出现。

必须注意，所有这些只有借助伊尔玛形象发生修改的细小标志，以及第二部分——梦的“解释”部分——中的联想，才被重新找到。在“梦”的部分，只有伊尔玛。弗洛伊德就是他自己，作为心理治疗师直接同伊尔玛谈话；他们所谈的对象，相对于他们实际、现实争论的对象，显然发生了轻微扭曲。

症状无疑略有改变。这一切提出若干谜题，使人瞥见这里涉及的深层意义。但在梦中发生之事的结构里，这里的弗洛伊德 ego 完全处于其清醒 ego 的层面。这里涉及的对象伊尔玛几乎没有变形；只要人在清醒状态下仔细观察，她同样会显现梦中展示的东西。

假如弗洛伊德在同伊尔玛的对话中，每时每刻都分析自己的行为、回答、情绪和人们所谓的转移，他同样会清楚看到，伊尔玛身后还有：

- 他的妻子，也是伊尔玛相当亲密的朋友；
- 还有近在咫尺的那个迷人年轻女人；她会成为远比伊尔玛更好的患者。我们在这里处于第一层面：对话仿佛完全服从于现实关系的条

件，而现实关系自身又完全陷在限制它的想象性条件中；对弗洛伊德来说，目前的困难正由此产生。

这一直走得很远，直到他打开患者的嘴，让她张开嘴……

现实中所涉及的恰恰是这一点：她不开口

……他在深处看见的某种东西，必须通过联想考察其性质。那是一幅可怕、恐怖、骇人的景象。那张嘴拥有你们愿意赋予的一切等价意义；所有东西仿佛都在这个形象中混合并连接：惯常的关切，那张嘴里可以看见覆着白色膜层的鼻甲。

你们看见这里包含的各种凝缩！它从女性性器官出发，经过嘴，一直走到鼻子；鼻子本身具有极其精确的意义——弗洛伊德正遭受一种鼻部疾病；就在此前或此后不久，他本人曾由弗利斯或另一人对鼻甲实施手术。

这里发生了一项发现，一项可怕的发现！患者的真实症状中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最纯粹的恐怖景象！那是人们从不看见的肉：

- 事物的底部，面孔与脸面的背面，最纯粹的分泌物；
- 肉，一切从中出来的东西正从那里出来，位于神秘的最深处；
- 肉，因为它正在受苦、没有形状，因为它自身的形式就是会引发焦虑的东西。

这幅焦虑景象所涉及的正是它，其中还包含焦虑认同的一切：“你就是这个”“你就是离自己最远的东西，你就是最无形、最不可能被揭示的

东西”——这是最终揭示。正是在这场 Mené, tecel, fares 式的揭示[注3]面前，弗洛伊德达到了其观看、认识和在对话中寻找之需要的顶点；这里严格处于 ego 与对象之间的对话层面。这就是我们到达的位置。

> [注3] 参见《旧约 · 但以理书》第 5 章《伯沙撒的宴会》：מְנֵא מְנֵא תְקֵל וּפַרְסִין，Mené, Mené, Tekel et Parsîn：“量过，称过，审判过。”

埃里克森先生在这里作了一项评论，我得说非常出色：

> “通常，一个走到这里的梦应该让人醒来。他为什么没有醒？
>
> 因为他是弗洛伊德！他是个硬汉。”

我可以接受，他是个硬汉。他的 ego 被这幅景象死死逼住，于是这个 ego 发生退行；后面的整个论述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个 ego 退行了。接着出现一整套关于 ego 不同阶段的理论，我会让你们了解它。它始终很有趣。有一个 ego 从信任——以不信任为基础——一路前进，经历各种演变。到了青春期一侧，问题在于一种对立。

X——主动性……

拉康——人在小时候竟有如此多的主动性，真是疯了。

X——然后是某种整合。

拉康

整合与角色扩散相对立，据说这就是青春期的特征。我并不是说它是错的。

X……

接着是自我同一性，从成人通过意识获得它的时刻开始；另一方面，还要达到足以成功的完整性。他想避开两个归根到底同生育相连的术语。

拉康

这里发明了“繁衍性”一词，用来表示成人圆满的最高点，也就是人产生生育孩子愿望的时刻。随后，便走到衰退年龄的完整性；其对立极据说是一种我颇为欣赏的 disgust（厌恶）。两者之间仿佛存在某种对立。

我很愿意反驳亲爱的埃里克森先生：完整性感受完全可以同它那同时代的相关项相安无事，而且不会因此过得更糟。这些心理学小玩意当然很有启发，但说实话，在我看来，它们违背弗洛伊德理论的精神本身。

因为归根到底，如果 ego 确实是这种形式涌现的相继序列，其两面性——好与坏、实现与未实现方式——构成其类型，那么人们很难明白，主体历史的发现如何进入这里。容我用形象来讲，并刻意强调相反的一面：弗洛伊德著作中一千、两千处地方恰恰迫使我们把自我视为主体全部认同的总和，连同其中可能包含的最根本偶然性。直截了当地说，自我其实就是从我所谓“道具店的杂物堆”中借来的不同外套相互叠加。

经验向我们展示什么？你们这些分析家真的能够完全真诚、真实地向我作证，主体的 ego 会经历这些辉煌的典型发展吗？这都是讲给〔孩子？〕听的故事。人们向我们讲述人这棵大树怎样壮丽成长，怎样在生存中战胜相继到来的考验，并因此达到美妙平衡！人的生命完全是

另一回事。我从前曾在关于心理发生的演说中围绕完全不同的问题写过这点，但值得再说一遍。

我们看见什么？弗洛伊德避开这次醒来时，问题真的在于 ego 的退行吗？我们看见什么？

从这一刻起，不再有弗洛伊德。他本人已经叫 M. 教授来救场，因为他束手无策。但不会因此就有人给他一套更好的说辞。因为从这一刻起，我们看到的是：那里的三个小丑——

- M. 医生，正如弗洛伊德所称，是圈子里的主导人物。我没有确认他究竟是谁；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完全值得尊敬的人。他肯定从未对弗洛伊德造成太多伤害，只是有时不同意弗洛伊德，而弗洛伊德绝不是很容易接受这种事情的人；

- 接着是奥托；

- 还有同事利奥波德。在弗洛伊德眼中，他的主要优点是能够胜过同事奥托。

在弗洛伊德眼中，这给利奥波德增添了很大功劳。他把利奥波德与布雷西希督察[注4]及其朋友卡尔相比。布雷西希督察精明而机灵，却总会犯错，因为他没有认真查看事情。站在旁边的同事卡尔会指出：“不是这样！”布雷西希督察便只好跟随。围绕小伊尔玛，这三个人建立起

一种断断续续的对话，更像一场不断中断的交谈游戏，甚至几乎接近那种众所周知的聋人对话。我只能概括，因为所有这些极其丰富。

> [注4]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写道："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完全类似于布雷西希督察与其朋友卡尔之间的差异。"布雷西希督察是弗里茨·罗伊特著名小说《Ut mine Stromlid》中的人物。

围绕这一切出现的全部联想，向我们展示了真正意义。弗洛伊德将能从中看出，经过这一切，他可以免除全部责任。

- 第一，他们报告随便什么、各种事情；如果这些是真的，就会以我们刚才所说的归还破桶的方式为弗洛伊德脱罪；

- 第二，他们这样做的方式如此可笑，以至于任何人站在这些制造荒谬的机器旁边，显然都会像一位神；

- 第三，我们看到，这里涉及的全是具有意义的人物；准确地说，是我刚才所谓主持 ego 形成的认同人物。

M. 医生对应于弗洛伊德生命中一个全然关键的人物——他的同父异母兄弟菲利普。我曾在另一个语境告诉你们，要理解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个人物至关重要。弗洛伊德之所以以一种对人类历史如此具有决定性的方式进入俄狄浦斯，显然是因为他有一位父亲；这位父亲在第一次婚姻中已经生下两个儿子埃马纽埃尔与菲利普。他们年龄相近，只差三岁，却都已经足以成为小西格蒙德的父亲；而生下西格蒙德的母亲，恰好与埃马纽埃尔同岁。

这个埃马纽埃尔曾是弗洛伊德最纯粹的恐怖对象。人们以为一切恐怖都集中在他身上，其实不对，因为菲利普也分担了一部分。正是菲利

普让弗洛伊德那位年老的好保姆被关进监狱；人们赋予这位保姆过度的重要性，文化主义者还试图通过她把弗洛伊德归入天主教——这真是个古怪观念。

不过，中间一代人物确实扮演了重大角色；这是一种格外高明的形式，使攻击父亲的侵略性能够集中到他们身上，而不至于过多触碰象征父亲。象征父亲确实待在某个天空里，当然不是圣洁的天空；但从象征功能观点看，他具有极大重要性。通过这种功能分割，象征父亲得以保持完整。

所以，我们确实看到如下情况发生：

- M. 医生表象一个由这道伪父亲形象构成的理想人物，即想象父亲；
- 奥托则完全对应于那个既熟悉又亲近的人物，他既是朋友也是敌人，随时会从朋友变成敌人，并在弗洛伊德生命中始终扮演某种角色；
- 利奥波德则在其中扮演有用人物的角色，始终用来对抗这个如此为他所熟悉的亦友亦敌者、这个亲爱的敌人。

于是，我们在那里看见另一组三元组，而它就在梦中。弗洛伊德的解释帮助我们理解其意义。但它在梦中有什么作用？它的作用是同言说一起游戏；在这里，言说具有全部决定性和裁判性价值，同法则一起游戏，同那个折磨弗洛伊德的问题一起游戏：

> “我是错还是对？真理在哪里？问题的命运如何？我处在什么位置？”

弗洛伊德这样解释完全正确。但我们同样看到：从这一刻起，只有象征性地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才能把握它。第一次，我们看见伊尔玛的 ego 与三个女性人物；弗洛伊德说，围绕这三个女人发生的一切存在极其丰富的交叠，最终事情纠结起来，抵达某种不知名的神秘。

分析这篇文本时，必须考虑文本整体中的一切，包括脚注中的内容。在这里，他将谈到：正是在联想的这个点上，梦嵌入未知；这就是他所谓梦的脐点。第一阶段结束时，我们正停在这里。我们已经抵达那个位于神秘三元组背后的某种东西。我说“神秘的”，因为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意义：

相关知识卡 伊尔玛注射之梦 · 梦的脐点：不可穷尽的未知点

- 三个女人；
- 三姐妹；
- 三只匣子。

弗洛伊德早已向我们证明了它的意义。最后一项及其意义就是死亡，如此简单。这里涉及的确实是它，因为我们甚至看见它出现在第二部分喧嚣的话语之中。白喉膜的故事直接联系于两年前弗洛伊德一名女儿遭遇的威胁。面对这场发展得极其严重的可怕威胁，弗洛伊德感觉它像是对自己一次治疗失误的惩罚：他曾给一位女患者使用过量的舒眠酮，却不知道持续使用舒眠酮并非没有有害作用。他以为自己从女儿的病中看见了职业过失付出的代价。

那么，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第二部分中，三个角色彼此进行着一场围绕根本问题来回传球的可笑游戏；而这个根本问题对弗洛伊德来说，又同“神经症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紧密相连。它就是：

- “治疗的意义是什么？”
- “我的神经症疗法有何根据？”……在这一切背后，做梦的弗洛伊德同时也是寻找梦之钥匙的弗洛伊德：为什么梦的钥匙必须与神经症的钥匙、治疗的钥匙是同一个东西？

我们看见什么发生？正如第一阶段中出现一种顶点，在那里突然出现一个高峰、一项关于当时在场之物的末世性揭示；在第二部分，同样出现一个时刻，它在两个不同平面上具有非常奇特的特征。首先是“我们立刻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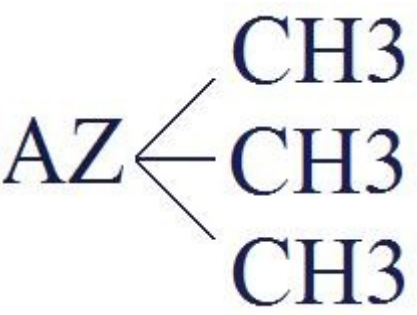
unmittelbar（直接、立即）指向某种构成妄想确信特征的东西：

你突然知道，就是那个人对你怀有恶意

……他们突然知道奥托就是罪犯；他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他作了注射。接着人们搜寻：丙基……丙烯……

与此相联的是那场无限滑稽的菠萝汁故事；前一天，奥托把它作为礼物送给这个家庭。人们打开瓶子，闻起来有一种所谓“廉价小酒的气味”。有人说：“把它给佣人吧。”但弗洛伊德毕竟“更有人性”——他就是这样说的——便温和地回答：“不，他们喝了也可能受伤。”

从这一切中，在话语的喧嚣之外，以粗体写出的东西出现了——那就是《圣经》的 Mené, thecel, Phares——三甲胺分子式。我把这个式子写给你们：



它照亮了一切，因为在弗利斯那里，三甲胺围绕性代谢问题活动得十分频繁；最近人们谈了大量相关事情。

我无需重读瓦拉布雷加刚才读过的段落。这个梦不只在弗洛伊德“梦的意义是什么？”的探索中取得意义；他之所以能够继续提出这个问题，还因为他在追问：所有这些是否通过三甲胺与弗利斯发生沟通。在弗利斯的那些推想中，它一度围绕性产物的分解产物扮演某种角色。

事实上，我已经查过：三甲胺是精液的一种分解产物；精液暴露在空气中分解时，氨味便由此产生。只需知道弗利斯曾赋予它某种作用。

重要的是：当 ego 仍在那里时，这个梦曾在恐怖形象上达到第一次顶点；第二次则在……之时达到顶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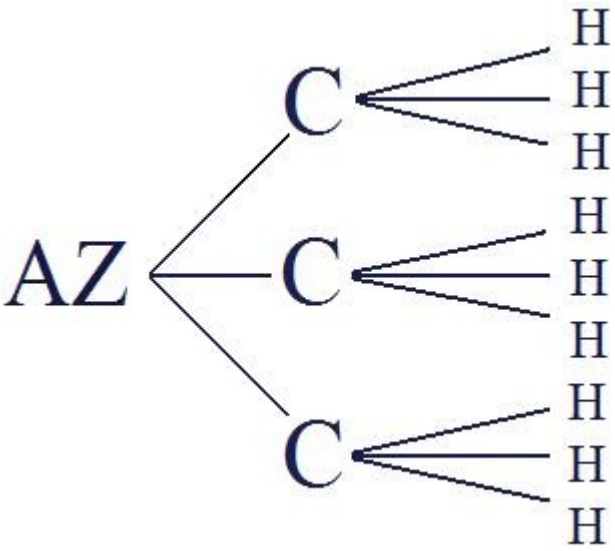
那里出现了某种我们只能认作言说本身的东西，也就是人们说出所被说出的东西，是普遍流言凝结成一条书写公式，带着那种写在墙上的“Mené, thecel, Phares”意味

……它出现在梦的结尾；我会说，我们无法从中读出任何别的东西。

像神谕一样，它当然没有对任何东西作出回答，没有回答那个使弗洛伊德把这个梦选作杰出范例、用来给出梦意义之解答的根本问题；而那个问题确实就是梦的意义问题。我们不能说它给出了回答，但它给出回答的谜样方式——以一条带有全部密封性质的公式——本身就是对梦之意义问题的回答。我会说，我们可以仿照伊斯兰沙里亚法的公式：“除真主外，别无神明。”

“作为你问题的解答，除词语外，别无其他词语。”

而问题的这个词语，恰恰受该结构引导。我们甚至可以俯身考察这个词语的结构；它以一种高度象征性的形式呈现，因为它由神圣符号构成。我们可以重新找到并观看它们。我们始终重新遇见的这三个，正是梦中的无意识所在。



那个“处在一切主体之外”的东西——姑且说就是梦的结构——已经充分向我们表明：它不是做梦者纯粹简单的 ego，不是仍在同伊尔玛谈话的弗洛伊德本人，而是处于如下时刻的弗洛伊德：

- 他已经穿过最大焦虑的时刻；
- 自我以最未构成、最恐怖的形式认同于总体；
- 他真的逃了出去；
- 正如他本人所写，他突然向“所有知者的大会”求助。

他突然在这些人身后消散、被吸收、被取消；某种别的东西、另一个声音开始说话。随你们怎样称呼它；我们很容易拿这里的 alpha 与 omega 开玩笑——但即使我们把氮称作 N，“NEMO（无人）”仍会为我们提供同一套双关，用来指称这个“主体之外的主体”。然而，它确实在那里，指示着梦的整个结构。这个梦向我们表明：梦功能中发挥作用的，是某种超越 ego 的东西；它在主体中既属于主体，又不属于主体——换句话说，就是无意识。

此刻，我们是否还记得那是奥托所作的注射，而且使用了一支肮脏的注射器，已经无关紧要。人们可以围绕这支日常使用的注射器尽情玩笑；在德文中，它伴随着各种在法文中由 gicler（喷射）传达的回响。我们从弗洛伊德生活的各种细小迹象中，已经充分知道所谓尿道情色的重要性。哪天我心情不错，会向你们说明：直到高龄，弗洛伊德在这方面还保留着某种东西，清楚回应着他在父母卧室小便的记忆。埃里克森极其重视这一点，还请我们注意，那里无疑放着一个小夜壶，

所以他不可能尿在地上。弗洛伊德没有说明究竟是尿进母亲的夜壶、地毯还是普通木地板，但这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这个梦向我们展示：在某段言说必须以任何方式通过的象征沟通论域中，严格说来，我们所谓分析性症状层面发生之事的根本电流就在其中产生。在这里，我们始终遇见双重障碍，某种必须穿过之物的阻抗；因为时间已晚，今天暂时把它们称作主体的 ego 及其形象。只要这两重居间之物提供足够阻抗，它们就在这股电流中亮起——容我这样说——它们发出“磷光”，迸射闪电。

梦最初整个阶段的原则就在这里：弗洛伊德处于阻抗平面，正在同患者周旋；因为他必须走得足够远，最终抵达某个这一切停止的时刻。埃里克森先生确实没有完全说错：正因为弗洛伊德当时被一种激情攫住，想知道这个梦的真正无意识价值是什么——无论其中含有何种原初和童年回响——

- 这种对词语的寻找；
- 这种对梦那秘密而有意义的现实的直接面对；
- 这种对意义本身的寻找……使得在某个时刻，而且是以弗洛伊德能够在自己学说诞生的这个原初时刻看见它显现的形式——当时一切仍在混沌中——他让某种既矛盾又令人安心的法则通过，并在梦中以符号形式显现；它就在所有同事的混沌中，在知者共和国的全部共识中间。

因为如果没有人正确，所有人也就都正确；梦的意义正是在这中间得到揭示。其根本内容是：梦除了这个属于象征界性质的词语以外，没

有其他词语；而这种象征界性质只在我想于本文末尾提出的某种东西中得到揭示，我也想把它引入，作为你们的路标。符号始终只具有符号的价值；我们可以把它指定为梦的第二部分在跨越之词中所发生之事的特征。你们已经看到第一部分发生了什么；它因为一种想象性东西而负载最重，整个都在那里。梦的末尾则进入了某种乍看之下可称作人群的东西。那是一个结构化人群，如同弗洛伊德式群体。但我更愿意向你们引入另一个术语，并把它连同可能包含的全部双重意义交给你们思考："主体的混入"。

显然，主体们进入其中、插手事情，这是第一种含义。另一层意思是：每当涉及无意识现象时，我们都必须认为，既然它发生在象征平面本身——而且作为象征平面，我们必须把它视作相对于主体的心理学本质而离心的平面，如果那种本质确实存在——那么它总发生在一个只能被定位于两名主体之间的点上；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言说始终位于两名主体之间。

然而，从真实言说涌现并使两名主体成为相对于言说以前的他们如此不同的两名主体那一刻起——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尽管这其实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只有从言说存在的时刻才开始构成为言说的主体，并不存在"以前"——言说始终是两名主体之间的中介。

第14课 · 1955年3月16日

昨晚那次课给你们带来了什么？你们怎样看？它同我们惯常的对象有什么关系？你们从中开始沉淀出什么要义？有什么印象？它给了你们什么？

勒福尔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种文明。看来有如此多的东西来自埃及，可从表达角度看，他们为什么仍停留在现在的位置？这是我问自己的问题。不过，格里奥尔先生带给我们的东西确实为我打开了认识这些族群的视野：他们有一种此前无人料想的形而上学和〔文化？〕。尤其是言说的振动，它使种子裂开，再落到潜在的事物上。

拉康

请注意，他并没有充分凸显苏丹文明。那里毕竟有一段十分复杂的婚配、影响、入侵和帝国史。况且，我们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所有这些得到更好的勾连；这是当前一项调查的结果，而这项调查处在相当系统的平面上。

他迅速提到的事情——譬如，这些人群中很大一部分已经伊斯兰化；尽管以不可忽视的方式归属一种明显同该系统不谐的宗教信条风格，却仍继续在象征论域运作——其在这个平面的要求会以极其精确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他们要求别人教他们阿拉伯语，因为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语言。

这一切同其他已经展示出来的东西一道继续存在；那是一种源远流长而极具生命力的传统，仿佛通过各种节奏程序得到维持。它让我们意犹未尽。但不能以为这种苏丹文明没有〔文化？〕。你们看见了它的外部表现……

勒福尔——譬如建筑，那些小房子……

拉康

我们曾在殖民地博览会上见过尼日尔河沿岸的风格。不过，这确实相当令人不安。它就是为了撼动我们的范畴，尤其是那种被我们误以为具有唯一性的尺度；我们总用它衡量一种文明的品质。

谁读过列维-斯特劳斯最新的文章？你们觉得怎样？文章恰好指向这一点：我们的某些视角错误，来自我们用一把唯一尺度衡量所谓文明的品质、特殊性质与独一性。

显然，这里有某种东西使人感到，它的使用既异常广泛又十分深入，而且具有示范性；因为它仿佛几乎不依赖文化中其他物质支撑，也能够给生活于其中、熟知这种颇为震撼的沟通方式的人以巨大帮助。具有示范性的就是这一点：象征功能的这种分离状态。

当人们看到这些时——当然，通过一位以特定角度观察事物的报告人来判断它们始终很困难——这些东西仿佛带来巨大满足，使人们能够在乍看之下就福祉和文明而言颇为艰苦、颇为不稳定的条件下生活，却又仿佛从这种能够长久保持隐藏的东西中，找到极其有力的支撑。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同他们建立沟通。这同我们自己面对人类主体的位置存在类比。你们不认为可以大致这样概括吗？

至于我上次围绕给伊尔玛注射之梦所讲的内容，有谁产生了问题吗？我想有必要确认一下，弄清我告诉你们的东西是否得到了正确理解。归根到底，我以那种方式重新讨论伊尔玛之梦，究竟想说什么、向你们展示什么？

谁愿意谈谈？勒克莱尔？

塞尔日·勒克莱尔——我坚持不就这个主题发言。

拉康——格拉诺夫？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拉康——曼诺尼？

奥克塔夫·曼诺尼——我生病了，前几次课都没来。

拉康——瓦拉布雷加？

瓦拉布雷加——我没什么可说的。

拉康

那么，我上次重新讨论的给伊尔玛注射之梦，今天还想略加回顾。我认为，自己向你们突出过的两个关键要素之一，是弗洛伊德在 1895 至 1900 年间，也就是建构《梦的解析》期间，发现梦的意义时所具有的

戏剧性质。为支持这种“戏剧性质”，我想向你们读一段《致弗利斯书信》第 138 封信；它对应于这个时刻。它紧接著名的第 137 封信；弗洛伊德在后一封信中围绕这个梦，半开玩笑半认真——甚至认真得可怕——地为我们设想未来：

> “1895 年 7 月 24 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在这里发现了梦的奥秘。”[注1]

[注1] 1900 年 6 月 12 日第 137（248）封信，载《致威廉·弗利斯书信》，法国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526—528 页。

下一段，下一封信：

“围绕重大问题，仍有许多事情有待决定，一切都在搏动……这是一幅双重图像：波浪、摆动，仿佛整个世界都被一种令人不安的想象性脉动赋予生命；同时又是一幅火焰和微光的图像……”[注2]

[注2] 1900 年 7 月 10 日第 138（251）封信，载《致威廉·弗利斯书信》，法国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532—533 页。

后文清楚指出了弗洛伊德继续追逐的思想和形象：

“一个知性的地狱，一层接一层，一直走到最幽暗的核心……umriss Von Luzifer……”

路西法的轮廓、图样和剪影开始显现；这种格外令人不安的性质，仿佛反映了弗洛伊德生命中那个时刻极具冲击力、甚至令人焦虑的体验。我们不能忘记这个维度：在四十岁上下的那些年里，弗洛伊德确实这样体验了由无意识功能概念的发现所代表的关键、决定性时刻。

我曾试图在这个论域和视角中向你们说明，〔……〕相对于其他东西具有怎样独一而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们当时开始向弗洛伊德揭示某些东西，而揭示发生在一种亲身质疑世界本身、人类领会本身之基础的氛围中。无意识发现的全部经验都在这里得到体验。

我们无需对严格说来属于他的自我分析的东西获得更多指示，因为他在《致弗利斯书信》中对它的暗示远多于揭露。当时显现的一切，都发生在一种危险而焦虑的发现氛围中。

我正是想这样强调给伊尔玛注射之梦，表明梦自身的意义联系于弗洛伊德当时体验的深度。梦本身被纳入这种经验，仿佛是其中一个时刻、一个阶段。就在他质问梦的同时，梦在两个点上作出回答，而不是只回答他向梦提出的问题。

这个梦本身是弗洛伊德所作的梦；作为梦，它被整合到其发现的进展中。这个梦由此取得双重意义。在第二层意义上，它不只是由弗洛伊德破译的对象，而且是他本人做出的梦；也就是说，既然梦是一种行动，是言说的行动，那么它就是弗洛伊德的一段言说，而弗洛伊德当时就生活在自己的探索中。这赋予梦以示范价值；否则，与其他或许更有证明力的梦相比，这一点会显得颇为费解。

假如我们不能准确读出这层意义——正是它使这个梦特别回应了弗洛伊德的问题，而且远远超出弗洛伊德本人当时能够在书写中进行辩证分析的范围——那么弗洛伊德赋予它作为首个被破译之梦的价值，就会显得十分费解。弗洛伊德在这个梦中权衡的东西，以及他对其意义作出的总结，实际上远远被梦取得的这种历史价值所超越。弗洛伊德

把梦放在《梦的解析》的这个位置，实际上也考虑并承认了这种历史价值，以这种方式赋予它在自己著作中的功能与位置。

这对于理解这个梦至关重要。我认为，这已经使我们能够……

我本想从你们的回答中得到确认，却也不知道该怎样解释

大家都不作回答这件事〔参见上文：勒克莱尔、格拉诺夫、曼诺尼、瓦拉布雷加……〕

……我认为，我们上次能够看到的东西已经足够令人信服，因此不必再谈。不过，我会在另一个平面回到这里。

事实上，我想强调的是自己上次重新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不只考察梦本身，也就是重新考察弗洛伊德给出的解释，而且把这个梦连同弗洛伊德给出的解释作为整体来考察；更进一步，我还考察对这个梦的解释在某种归根到底构成弗洛伊德同我们对话的东西中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因为关键就在这里：梦的解释不能同弗洛伊德把它交给我们作为梦之钥匙的第一步这个事实分开。弗洛伊德通过作出这项解释，正在向我们讲话。

仔细考察这个梦能够帮助阐明的问题之一，正是我们倒数第二次研讨班停留的那个微妙而棘手的退行问题。我们越来越惯常地使用它，但每时每刻都可能看出，我们把极其不同的功能叠加在“退行”概念上。因为退行中的一切不一定属于同一论域；这一点已经在最初那一章向我们显现，其中对局部论退行、时间退行与形式退行的区分肯定站得住脚。那么，这个梦中有什么使我们对它获得的新领会联系于退行问题？譬如，弗洛伊德从局部论退行层面，通过梦的幻觉性特征提出这

个问题；按照其图式，它仿佛迫使他要求一种退行过程，而不是前行过程。

所谓退行过程，指的是梦把心理链条某个特定时刻所包含的一切、把归根到底必须在某些心理要求层面表达的一切，带回其最原始的表达方式；后者应当位于知觉、被知觉之物的层面。这个观点的一部分可以作如下解释：梦的表达方式会……

通过这里受到质疑、而且远非恒常发挥作用的机制——

弗洛伊德在其梦理论中本人也指出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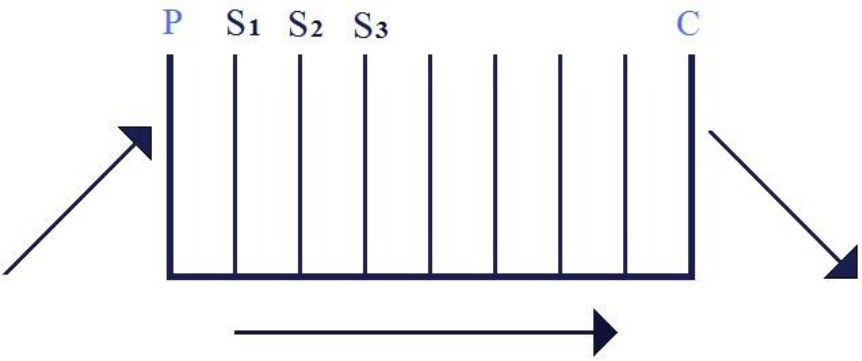
……部分服从于如下要求：它必须经过形象要素；这些要素越来越纯粹，越来越接近知觉层面。由此提出一个独特问题：如果我们沿着过程通常发生的前行路线追踪它，为什么它反而必须抵达由形象构成的这些记忆边界？

不过，这些形象却越来越远离质的平面：

- 知觉发生的平面；
- 在那里，形象可以说越来越贫乏、越来越被剥除；
- 并且按照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东西，取得越来越强的联想性质，也就是瓦拉布雷加前几天在黑板上向我们呈现的不同系统。它们越来越接近相似、同一、差异构成的象征纽结；简言之，越来越接近某种远远超出严格联想主义层面的东西。

按照我们上次作出的分析，《伊尔玛之梦》中严格属于形象化的东西，会迫使我们作出这种解释吗？也就是说，是否有某种东西迫使我们认为，不同联想系统 S_1、S_2、S_3……在 Ψ 系统——记忆的记录——层面彼此靠近，又返回到最接近来自感官之物的原始入口、即知觉层面？它是否迫使我们维持这个图式，连同瓦拉布雷加所指出的悖论？

当我们想谈论无意识过程通向意识的出口时，不得不把意识〔C〕放在出口；然而与它连为一体的知觉〔P〕却位于入口。这就是我们注意到的事实。



在我们作为例子考察的给伊尔玛注射之梦的现象学中，我们观察到了什么？我们谈过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走向那个恐怖、焦虑形象的揭示，也就是我所谓的“美杜莎之头”：严格说来，那个不可命名之物的

深渊式揭示。它位于喉咙底部，具有一种复杂而无法定位的形式；无论从哪个论域考察，这同样使它成为最纯粹的原初对象：

- 女性器官的深渊，一切生命从中出来；

相关知识卡 伊尔玛注射之梦

- 嘴的深坑与裂口，一切都被吞入其中；

- 死亡的形象，一切都在其中抵达终点。因为它联系于那场可能致命、曾威胁其女儿的疾病，也联系于他在临近女儿发病的时段失去的一名女患者。弗洛伊德甚至认为，女儿遭受的威胁，是命运针对其职业疏忽作出的某种 retaliation〔报复〕：“用一个玛蒂尔德换另一个玛蒂尔德”，他这样写道。

所以，在某种格外令人焦虑之物的显现层面，它本身概括了我们可以从某种意义上称作实在之揭示的东西：它最不可穿透，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中介；那是最终的实在，是一个已经不再是对象的本质性对象，是一切词语都会在它面前停下、一切范畴都会失败的某种东西，严格说来，正是最纯粹的焦虑对象。

此刻发生了什么？在梦抵达高峰的这个时刻，为解释做梦者体验中发生的深刻解构，我们能否谈论一种退行过程？这里发生了从第一论域的过渡；第一论域中的弗洛伊德正在追索、追捕伊尔玛，甚至进行主动追捕：

- 他责备伊尔玛没有听懂自己想让她理解的东西；

- 他严格延续着现实生活中的关系风格。

正是在这种激情投入的追寻中——我们会说，投入得过于激情；而梦的一层意义正是明确说出这一点，因为结尾涉及的就是它：

- 注射器很脏；
- 分析家的激情、成功的野心过于迫切地在场；
- 分析家的反转移——用我们的话说——就是障碍本身。

这个梦抵达第一个顶点时，主体关系发生了彻底变化。主体成为完全不同的东西：

- 不再有弗洛伊德；
- 不再有任何能够说“我”的人。说实话，我上次向你们提到、曾试图更深入理解给伊尔玛注射之梦的作者埃里克·埃里克森，已经作出这项观察；他在那里谈到一个〔……〕。

我试图向你们表明，问题也许是另一种东西。此刻出现的这种主体，就是我所谓“小丑登场”，因为弗洛伊德求助的那些主体将扮演的角色大致如此……

这就在文本里：“appel（呼吁、上诉）”一词的拉丁语词根，在这里显出法律意义

……他向同类、平辈、同事和上级的这项共识发出呼吁，这就是决定性的一点。

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能谈论退行乃至 ego 的退行吗？后者是一个必须加以区分的概念，完全不同于本能退行。ego 退行概念由弗洛伊德在法文以《精神分析引论》为题编排的《讲演》中引入。

它提出各种问题：围绕 ego，我们能否直接引入典型阶段概念，把它们构成一种发展、若干时期、主体发展的规范性进展？你们知道，这个问题今天无法得到解决；反倒有一部这方面的著作可以视作根本著作，即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与防御机制》。

必须承认，按照目前情况，我们绝不能围绕 ego 发展概念引入一种典型、程式化的发展，仿佛单凭某种防御机制的性质，只要一项症状与它相连，就能指出应把 ego 的心理发展归入哪个阶段。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教条化、制成表格，不像人们在本能关系发展秩序中已经做过、而且或许做得过多的那样。远非如此。安娜·弗洛伊德为我们列举了不同的防御机制，但我们如今完全无法为它们给出一种发生论图式，使之平行于本能关系的发展，甚至无法给出任何初步等价关系。许多作者正试图填补这一点。

我上次谈到的作者埃里克森也没有放过这项尝试。他给出 ego 发展阶段的那种谱系，我上次已经提到；所涉及的就是它。当然，我不会赋予它太大价值。我已经说过，我完全不认为为了理解梦在这个转折处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诉诸它。

这里涉及的不是 ego 的某个先前状态，而严格说来，是梦的这个阶段中 ego 功能的“光谱分解”——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接着出现一系列“自我”与认同；弗洛伊德在著作后来的阶段严格告诉我们，自我正

是由它们构成：在主体生命历程中，这一系列认同依赖其历史处境，在每个历史时刻都曾表象着主体的某种位置。

这里涉及的就是这些相继认同。如果我们想理解主体的 ego 是什么，就必须理解它们。这一点见于《自我与本我》；它紧接作为我们正在走向的枢轴点的《超越快乐原则》。为了抵达那里，我们绕了一大圈，正在经过弗洛伊德思想的最初阶段。

我所谓的这种"光谱分解"，显然是一种想象性分解。

现在我想请你们注意的正是这一点。相对于《梦的解析》，弗洛伊德思想后来是否进入了一个阶段？去年研究《技术论文》时，我们曾多次援引它，也就是集中在 1907 至 1913 年之间的论文；与此相关，自恋理论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建构。它是弗洛伊德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根本阶段。正因如此，去年如果不同时援引以《论自恋：一项导论》为中心的这种自恋理论，我们就无法对这个时代在《技术论文》平面继续展开的一切作出哪怕最基本的可理解分析。

如果弗洛伊德的理论……

正如它当时被交给我们的那样，向我们展示自恋具有全然根本的功能，

结构化人与外部世界的一切关系

……如果这套理论具有意义，如果我们必须从中合乎逻辑地推出后果，那么它肯定同近年关于一般生命体如何领会世界的全部建构相互汇合。这种建构沿着所谓格式塔主义思想路线发展；譬如，在动物世

界的结构化中，若干根本形象占据支配地位，赋予这个世界以主要力线，形成一个使记忆需要以某种方式遍布其中的世界。

而人那里发生的是全然不同的事情；相对于他把世界对象化的需要而言，人的世界显得异常松脱，这就是核心问题。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畴，使我们能够理解以下两者之间为何仍然存在关系：

- 人的世界这种表面上高度中性化的结构化；
- 动物心理学围绕动物世界这种结构化同人类需要世界之间的关系，交给我们的观察。

自恋概念如果给我们带来了某种东西，那显然正是这一点。

我曾试图在镜像阶段概念中突出、表达并使人理解的也是这一点：某种关系支配着人的整个知觉世界，因为人自身恰好具有某种松脱的、破碎的——为表达我们的思想，姑且说无政府的——东西；它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完全独特的张力平面上。也就是说，统一性首先并始终位于外部，并以一种预先映照人后来将放入其中之统一性的方式存在，只要：

- 人会在那里带入严格属于人的印记，即他自己的映像；
- 人会在那里带入其身体形象，作为对象中一切被知觉统一性的原则。

正是这种同自身的双重关系，使得一切对象归根到底始终围绕自身自我的某种游荡阴影而得到结构化。他世界中的全部对象都具有这种根

本上的拟人——甚至可以说 ego 形态——性质；在这种知觉本身中，人每时每刻都会使某种统一性涌现并得到唤起。它既是属于人的理想统一性，又是永远无法达到的统一性；它每时每刻都从人那里逃逸，因为那个对象从来不会对他而言真正成为最后对象。

除非它确实在某些特殊经验中显现；但那时它作为如下东西显现：

- 一个他与之无可挽回地分离的对象；
- 一个向他展示自己在世界内部裂开之形象的对象；
- 一个本质上摧毁他、令他焦虑而永远无法抵达的对象；他永远不能在其中真正找到自己同世界的和解与黏合，也不能在欲望平面找到完美的互补性。

人类欲望这种根本上的撕裂性质，以及人的形象本身在其中带来如下东西的根本关系世界：

- 一种始终想象性的中介；
- 因此，也是一种始终成问题的中介；
- 因而从来不会完全实现；
- 它依靠一系列瞬间经验来维持，而那些经验始终要么使人同自身异化，要么导致对象遭到摧毁或否定。

从外部被知觉的统一性具有它自己的统一性：

- 作为人在世界中看到的“欲望”；
- 某种一旦被知觉，便会使人自身进入张力状态的东西；
- 人由此在此刻从根本上把自己知觉为欲望和未满足的欲望。

反过来，当人把握自身统一性时，世界却会为他分解、失去意义，以格外异化而不谐的面貌向他显现。正是在这种想象性摆动中，我们发现一切真正牵动一个人的人类知觉赖以被体验的戏剧性底层。

所以，我们无需在退行中寻找梦所特有的想象性涌现之原因。正因为某种逼近最终实在的东西被体验，正因为一个梦在焦虑秩序中走到自己能够抵达的最远处，我们才会看到这种想象性分解。它不过揭示了知觉中最正常的组成部分，因为知觉完全联系于一幅给定画面：

- 人总会在其中某处认出自己；
- 总会在其中看见自己，有时甚至在多个点上看见；
- 人同世界关系画面中的附着点，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稳定点与惯性点，使这个画面不会以未实现和非现实化的方式得到体验；而这幅画面始终负载着若干经过分化的、主体自我的形象代表。

我们恰好习惯以这种方式解释梦。梦中始终必须——至少在督导某些梦时，我一直这样教你们——学会认出主体的自我在哪里。我们在《梦的解析》中已经看到这一点：弗洛伊德多次懂得指出和认出自己由这个或那个人物代表。譬如，在我们已经开始研究的那一章，有一

个城堡之梦，一座“西班牙空中楼阁”，或更确切地说，是美西战争中的城堡。弗洛伊德与城堡指挥官待在那里，后者在某个时刻死去。弗洛伊德说〔法国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395—398 页；2003 年版第 513—516 页〕：

> “我在梦中的位置并不是人们所以为的那里。刚刚死去的人物就是我；以下就是原因。”

梦的第二部分所做的，严格说来正是：在某种最为深渊性的实在得到触及时，凸显由自恋关系构成的知觉世界之根本组成。对象始终或多或少被结构化为主体身体形象、主体映像之类的东西；在每一幅知觉画面中，或多或少都可以重新找到镜像。正是镜像赋予画面特殊惯性、特殊重量和特殊性质。

它遭到遮蔽，有时甚至遮蔽得很深；但在梦中，恰恰因为梦的想象性平面上的关系受到特殊减负，它很容易每时每刻显露。一旦焦虑点被触及，它便显露得更加清楚；主体在那里遭遇：

- 自身撕裂的经验；
- 自身相对于世界被孤立的经验；
- 某种使人同其世界的关系从根本上、最初便遭到损害的经验。

这正是弗洛伊德交给我们的全部自恋理论所显示的东西。它的框架引入某种“无出路”性质，标记主体的全部关系，尤其是力比多关系；Verliebtheit（迷恋）、对象之爱的根本自恋性质，使对象在力比多平面上只能借助并穿过自恋关系的栅格得到把握和领会，连同一种充分

实在的关系中最初包含的一切。如果我们想理解弗洛伊德经验和发现的学说使我们能够视为建立并结构化人的想象关系的最关键维度之一，就必须始终记住这一点。

那么，在这个层面实际发生了什么……

当我们看到这个多头主体取代主体时——也就是我上次谈到的人群，是《自我心理学》或《群体心理学》所讨论的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群体；它恰恰由主体根本的这种想象性复多构成，由 ego 不同认同的铺展和绽放构成

……发生的还能是什么？当然，乍看之下，它向我们显现为主体本身的取消和摧毁。

因为毕竟，转化为这幅多头形象的主体，来自一个无头者。如果有什么东西表象弗洛伊德交给我们的无意识概念，我们就应当这样表象无意识：

- 一个无头主体；
- 一个不再有 ego 的主体；
- 一个处在 ego 外部极端的主体；
- 一个相对于 ego 离心的主体；
- 一个不属于 ego 的主体。

然而，说话的正是这个主体。因为正是它让给伊尔玛注射之梦中的全部人物说出这些无意义话语；而那些话语恰恰因其无意义性质取得意义。实际上，这里涉及什么？当多个 ego 的话语以最嘈杂的方式登场时，这个梦的时刻显现出什么？答案是：真正令弗洛伊德在意的反对意见，是他本人在伊尔玛事件中的罪责。

可以说，对象被摧毁了，而这里涉及的罪责也随它一起被摧毁。我曾围绕弗洛伊德所作的破锅故事之比较向你们强调：

相关知识卡 伊尔玛注射之梦

- 第一，归还时锅是完好的；
- 第二，根本没有收到锅；
- 第三，锅原来就是破的。

这里发生的是同一种事情。根本没有犯罪，因为：

- 第一，受害者——梦以无数方式这样说——早已死去；也就是说，她早已患病，而且恰好患有弗洛伊德无法治疗的疾病，因为梦中一切都表明她患的是器质性疾病。所以，犯罪发生时，受害者早已死去。
- 第二，凶手，也就是罪犯弗洛伊德，完全没有作恶的意图，因为……
- 第三，这里涉及的犯罪归根到底是一场治病的犯罪。梦中另一处以悖论方式指出了这一点，而且是最荒谬的地方之一：疾病——这里在痢疾与白喉之间作了双关——恰恰是痢疾将把患者解救出来。三

位杰出人物中的一个说：所有恶物、所有坏体液都会随着痢疾排出去。

在弗洛伊德的联想中，这回应了他在做梦前几天听说的一件滑稽轶事；人们有时会看到医生……

他们在时代变迁中始终保留喜剧人物的性质，

尤其是履行会诊职责时

……心不在焉，却同时对一桩病例发表意见。有人提醒那位医生，患者的尿液中毕竟有白蛋白；他随口答道："很好，白蛋白会排出去。"

梦实际上抵达了这里：可以说，正是象征系统开始发挥作用，而且是以它最彻底的方式；它所表象的那个绝对的不知什么，彻底消除并取消个体的行动，甚至同时消除个体同世界的全部悲剧性关系。这是"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的一种悖论而荒谬的等价物[注3]。

> [注3]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 序言》："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最终，它把事情变成一种严格的世界哲学考察；这会把我们置于某种非常特殊的失调状态。归根到底，每个个体的行动都根据推动其行动的动机而得到辩护；这些动机被设想为完全规定个体，因而再也无法从主体本人会感到自身哪怕一瞬间受到牵涉的视角加以权衡。

既然一切行动都是"理性的狡计"，归根到底便具有同等价值。只要把一切真理的根本象征性质使用到某种极端，这整个真理关系也会失去尖锐性；在事物的行进、理性的运作及其开始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主体实际上只剩下一个点、某种被动之物。它在这个系统内部受到推

动，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主体本人则真正被排除在一切严格说来具有戏剧性、因而具有悲剧性的参与之外，不再参与这种真理的实现。

这种极端之物恰恰发生在梦的边界上，发生在这种彻底脱罪之中；弗洛伊德最终在梦的揭示性经验中被带到这里。他本人也承认，它实际上是梦的秘密动力，是他所谓赋予梦以结构并把它推向终点的结构性欲望所追求的目标。我们在这里确实面对某种迫使我们提出想象界与象征界接合问题的东西，并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发现象征界的第三项功能、其中介功能。我曾在试图重新找到一种人际关系的机械表象时，让你们略微看见它……

我曾从现代机械建构、最新实验以及控制论为我们提供范例的研究中借用一个形象

……用来向你们表明：可以给出的人际关系模型，是若干人工主体通过其同类形象彼此捕获。

为了使系统能够运转，而不归结为一种越来越使人瘫痪的庞大同心幻觉，它显然预设一个调节性的第三项介入，也就是某种别的东西，以某种受命令支配的秩序在它们之间建立距离。我们如今从另一个角度和面貌重新找到这种东西：正如我刚才向你们指出，一切想象关系都发生——或者说得到理解——在主体与对象之间某种“你或我”的关系中。也就是说：如果是你，我就不存在；如果是我，不存在的就是你。

象征要素恰恰在这里介入。在想象平面上，对象向人显现时，始终只处在某种转瞬即逝的关系中；人在那里认出自己的统一性，但只在外部认出。而且，只要人认出自身的统一性，相对于表象这种统一性的

对象，他便感到自己陷入某种困顿；这就是我们所谓本能和驱力的状态。这种根本破碎性质表象着根本不谐、关键性不适应和本质上的无政府性质；对本我本身的研究以及分析经验本身都向我们表明，人的本能生活恰恰以此为特征。也就是说，这种移置的可能性——换言之，附着于一切严格本能关系的根本错误。

假如对象始终只能作为幻影、作为一种永远无法在想象平面重新把握的统一性幻影得到把握，那么整个对象关系必然会受到根本不确定性的标记。人们已经在大量经验中重新发现这一点；仅仅把它们称作精神病理性经验，并没有说出什么，因为它们同许多被称作正常的经验彼此相邻。

那么，象征关系、命名对象的权力在这里作为某种绝对关键的东西介入，用以结构化我所谓的知觉本身。人的 percipi（被知觉）本身[注4]，只有在命名区域内部才能得到维持：

> [注4] 参见著名命题 Esse est percipi，“存在就是被知觉”；贝克莱从雅各布·伯麦那里重新采用了它。

- 人通过命名使这些对象以某种一致性继续存在；
- 这些被知觉的对象始终只在同主体的自恋关系中被瞬间知觉，而且只能被瞬间知觉；只有词语的中介，只有命名之词，尤其是命名对象之中那一瞬间被瞥见之物的词，才使它们得以维持。这个词：
- 是这种令人震撼、随时会消散的差异中的同一者；
- 它所回应的不是对象的空间区别，因为那种区别随时会消解于对象与主体的认同中；
- 它回应的是对象的时间维度：这些对象一瞬间被构成为人类主体的相似形象、他自身的复本，却仍然在时间中呈现某种面貌的持存。这种持存并非无限长久，因为一切对象都会消逝、都会死亡。

然而，正是这种持存、这种时间维度，以及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把同一名称应用于对象这个事实——名称在本质上就是这个：对象的时间。

名称是一种维持一段时间的显象，是持久延续的辨认；但严格说来，它只能通过如下中介被辨认：

- 命名的中介；
- 命名所构成的契约之中介；
- 这项命名是一种两名主体同时同意辨认同一对象的命名。

假如人类主体不命名——正如《创世记》所说，这件事在伊甸园发生：首先命名各大物种——假如他没有围绕这种辨认达成一致，那么人类主体哪怕纯粹知觉性的世界也无法维持超过一瞬。这就是象征界相对于想象界的特征、接合与涌现。它同样向我们展示了话语本身登场的深刻连贯性。

我只把它当作话语来考察，完全不顾及其意义，因为这里涉及的是无意义话语：在给伊尔玛注射之梦中，当做梦者的世界在形象化平面陷入最严重的想象性混沌，也就是陷入不断加剧并最终彻底的分解、陷入主体本身的消失时，话语本身开始发挥作用。

那么，我曾向你们指出梦中存在的东西：越过某条界限以后，主体在根本上无头。这个点以一种自身几乎构成象征游戏的方式得到指示：三甲胺分子式的 N 点，标示出我们应当在何处看到、设想并指称主体此刻的“我”。我这样做并非不谨慎、不幽默，也并非没有犹疑，因为它几乎带有 Witz、机智语的性质：归根到底，在这个点上看见梦的最后一词——在那里，一具已经无头的身体长出这条九头蛇的全部头颅；在那里出现“一个已经不再属于任何人的声音”[注5]；在那里，三

甲胺分子式涌现出来，作为所涉及、所寻找之物的最后一词，作为给出一切谜底的词。

> [注5] 参见保罗·瓦莱里：《魅力集·皮提亚》末节：“……那庄严的声音 / 鸣响时自知 / 不再是任何人的声音 / 只剩波涛与树林！”

归根到底，这个词没有任何意思，只不过它毕竟是一个词。这就是我上次告诉你们的。当然，这确实具有近乎妄想的性质；如果只有主体自己，如果弗洛伊德独自分析自己的梦，并试图像神秘主义思想那样，从中找到秘密指示——词语实际所在之点，主体与世界全部奥秘之解答所在之点——那它确实就是妄想。

但不要忘记：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呈现的。弗洛伊德并不孤单。用我在本次谈话开头从他书信中摘出的措辞来说，弗洛伊德把这个路西法式奥秘的秘密传达给我们。面对这个梦时，弗洛伊德并不是孤身一人。

我告诉过你们，正如在分析中整个梦都向分析家说话，可以说弗洛伊德已经在这个梦中向我们说话。他已经是为我们——也就是为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共同体……为所有被假设构成他对话世界的人——而梦。当他解释这个梦时，他正向我们说话。因此，把梦的荒谬最后一词视作那个词，并不意味着看见某种参与妄想的东西；因为弗洛伊德通过这个梦使我们听见他，确实把我们带上通往其对象——即理解梦——的道路。

他并不只是为自己找到 Nemo（无人）或无头主体的 alpha 与 omega，作为其无意识的代表。恰恰相反，是他本人通过这个梦说话；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告诉我们某种东西，却不是有意为之，最初也没有认出，只在分析梦时——也就是在他向我们讲话时——认出它。他告诉我们

的某种东西既是他又不是他；它曾在梦的最后部分说话，并向我们说：

> “我就是那个希望得到宽恕的人，因为我竟敢开始治疗这些患者；此前，人们不愿理解他们，
>
> 所以也禁止自己治疗他们。我希望因此得到宽恕。我希望自己对此无罪，
>
> 因为越过此前为人类活动设下的界限，始终就意味着有罪。我不愿成为这个罪人。
>
> 所有其他人都来取代我。我在这里，只是那场相当模糊而庞大的运动的代表；它就是对真理的探索，而我在其中消隐。
>
> 我不再是什么。我的野心超过了我。注射器无疑是脏的。恰恰因为我过度渴望它，因为我参与了这项行动，因为我希望自己成为创造者。
>
> 我不是创造者。创造者是某个比我更伟大的东西。它是我的无意识，是这段在我之中、超越我而说话的言说。”

这就是梦的意义。我认为，它会使我们接下来走得更远，使我们在后续课程中理解应当怎样设想死本能——不要忘记，这正是问题所在——理解死本能同符号世界、言说世界、那种位于主体中却不是主体之言说的言说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在必要的时间内维持这个问题，使它先在我们心中成形；随后才能尝试依次为它给出一种符号化和图式化，使我们理解死本能的功能是什么。

当然，我们已经十分自然地开始瞥见：为什么在超越快乐原则之处，死本能必须是某种存在的东西，为什么这个维度必须存在。因为我们看到，事情确实发生在诸自我的稳态与快乐原则之外——在那里，它们的自我总会重新找到自身——而当无意识介入时，另一种东西、另一股电流、另一种必要性也在介入，必须在自身平面将它区分出来。弗洛伊德引入快乐原则，用它调节自我的尺度，并建立这种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使自我恰好能在那里重新找到自身；但由于这种说明不足以解释那种强迫——某种被排除在主体之外、或从未进入主体的东西，即 Verdrängt，被压抑者，会在这种 Zwang，强迫中表达自身——他才被迫走得更远。

问题在于解释这个 Zwang，意识到我们不能把它纯粹简单地纳入快乐原则。也就是说，假如自我能够重新找到并认出自身，那是因为存在无意识，存在一个超越 ego 的、会说话却不为主体所知的主体；我们必须假设另一条原则。

为什么弗洛伊德把它叫作死本能？

这恰恰是我们将沿其他道路加以澄清的东西。首先，我们会在精神病理和正常经验的其他侧面、其他时刻突出它，就像弗洛伊德教我们发现的那样。

这就是我们以后几次会面要做的事情。

第15课 · 1955年3月23日

速记稿缺失

（参见雅克-阿兰·米勒的整理本：《自我……》，瑟伊出版社，1978年；或 Points Seuil 丛书第 243 号，2001 年。）

第16课 · 1955年3月30日

今天假期将近，天气很好，我们讲得短一些。我倒希望它足够长，好让我们填满一项计划。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听懂了我上次围绕奇偶游戏所讲的东西。它似乎对某些人结出了果实，照亮了一些事情。我简要提醒你们这里涉及什么。这个例子和模型要帮助你们标出一个分裂平面，也就是我们所谓"二元主体间性及其幻象"。它并非全是幻象，而是绝对根本的。但与此同时，看着邻人并相信他正在想我们所想的东西，是一种粗糙错误。然而，如果没有这种粗糙错误，我们就完全无法思考有关他的任何事情。

也就是说，必须从这里出发。我还向你们说明了，可以立足于这种二元主体间性的东西具有怎样的限度。至少在某些极限情形中，这种限度根本不太来自我们无法领会他者是什么、无法领会其某些心理性质——譬如他愚蠢还是聪明；这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容易看出。不过，它毕竟具有意义；如果一个人有天赋，有时也能意识到。聪明的人很少看见别人愚蠢；愚蠢的人有时会看出他人聪明，只是很少承认。这是另一个问题。所以，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把握他者的限度——我曾沿途向你们展示、指出并标出——不太来自上述不可能性或困难；我请你们注意的是：他者这些心理含示属性，取决于某些情况下裁决被限制为一种本身也是二元的选择；它可以说不可翻译，更准确地说，并不会得到翻译。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我们所面对的他者与另一名可能被纳入考虑的人区分开来的个体差异，有效地翻译出来。换句话说，就是他的个体性。我曾通过著名的奇偶游戏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其中的推理不是我

发明的，而是从爱伦·坡那里找来的。我告诉过你们，爱伦·坡怎样转述、描述这段推理；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是从那个总在奇偶游戏中获胜的孩子口中听来的。它其实相当简单。我们已经看过其限度。假如第一步是最自然的一步，正在游戏的人改变〔……〕，那么最简单的动作就是从偶数换到奇数。更聪明的人会说："对方会认为我要做最简单的事情，因为这是人首先想到的；那么我偏要做另一件事。"

相关知识卡 拉康文本中的三类符号游戏

但我请你们注意，到了第三步，最聪明的做法是像蠢人那样做，或者像被假定为蠢人者那样做；于是，一切都完全失去意义。相反，我曾向你们展示如下假设：考虑到再下一步，也就是为了合理地玩这场游戏，人应当设法取消对手可能形成的任何把握——当然，我们刚才谈的那种把握绝对什么也不是，不过这并不排除它通过另一条路径发生，而仍处在其所翻译之物完全二价的框架内——真正的玩法是完全随机地玩，也就是归根到底取消对手的机会。再下一步就是弗洛伊德式假设：凡是我们怀着制造偶然的意图而做的事情，其中都没有偶然。

我曾在黑板上用纯属假设、重新构造的方式，演示今天所谓的机器。它会从一串完全随机的出招中，提取某种代表如下公式的东西：主体随机给出的东西中，总能或多或少提取这个公式，而它与我们试图界定的东西具有最密切的关系——重复自动症，只要它位于超越快乐原则之处；转移，只要它是一种意义，支撑主体那里显得通过各种我们能够把握的连接和动机得到联结的一切。可是，无论这些动机、理性理由、情感以及我们能够触及的一切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它们之外还有一个东西；这个之外就是它。

在精神分析的起点，这个之外就是无意识，只要我们无法直接触及它；它就是转移，只要转移真正调制着我们不准确地称作转移的一切——爱、恨的情感等等都不是转移，转移是使我们能够解释这一切的意义。我们只能解释它，而且把它解释为一种语言的意义；这门语言由主体能够向我们呈现的一切构成，在精神分析以外，它原则上和最初都是不完整、未被理解、无法触及的。这就是超越快乐原则。它也在意义之外。两者彼此混同。〔曼诺尼要求发言〕

拉康——怎么了，曼诺尼？你怎么了？被圣灵攫住了吗？说吧，亲爱的。

奥克塔夫·曼诺尼

您试图排除主体间性，但在我看来，返回某种辩证法以后，它毕竟仍被保留下来。因为我觉得，事实上，如果没有偶然……

拉康

我顺便提醒你：我并没有排除它。我只是选取一种可以抽去它的情况。当然，主体间性无法被排除。

奥克塔夫·曼诺尼

它或许并未被抽去，理由如下。在我们不知情地服从的重复法则中，必须考虑两件事。一是这条法则也许无法在被重复的东西本身中被探测。譬如，我们可以从算术角度无限研究这些数字，却仍找不到重复法则；如果我们考虑的是节奏，就可能如此。如果我们重复数字，也

许是因为某些数字同无意识思想押韵。这样一来，任何数学家都不可能找到数字序列的理由；它或许位于机器的场域之外。

拉康——你说得非常好。

奥克塔夫·曼诺尼

另一方面，如果法则被发现，那么发现这一事实本身会以如下方式产生不平等：一名对手发现了它，另一名却没有。因为一条已经被发现的法则，就不再是法则。

拉康

是的，当然，亲爱的朋友。况且你上次已经看到了：为了简化，我让主体同一台机器玩。

奥克塔夫·曼诺尼——这引入两名主体之间的斗争。

拉康

当然。但我们从基本要素出发。仅仅让主体能够同机器游戏，这种可能性已经足够有启发。当然，这完全不意味着机器能够找到我上次所谓我们那些“异象”的理由；我们的异象同任何人的异象一样，始终处于若干回响之中。即便我告诉你们，我们的个人公式会像《埃涅阿斯纪》的一支长歌一样漫长，机器仍可以被设想成最终重新找到它。我把你刚才谈到的押韵要素和位于材料中的诗歌构成要素引入，绝不是没有理由。当然，即便如此，也完全不能说《埃涅阿斯纪》的长歌会向我们交出它的全部意义。

但问题恰好就在这里。假如我们已经找到押韵，那作为公式就非常出色；我们仿佛会直接面对效力。这里出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曾使用过的一个术语的新用法：象征效力。如今我围绕一台机器来使用它。根据机器是否能够把主体在其面前进行的游戏记录并沉淀出来，它会具有不同的象征效力。机器的这种象征效力来自我们这些机器建造者；作为它自身个别拥有的特殊效力，可以说同样来自其建造者。

但我们在这里的全部论述提出一个整体问题：一般而言，象征效力可以被视作来自人吗？这个问题从未得到裁决，也永远要等到我们知道语言怎样起源时才能裁决；而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必须放弃知道这件事。面对这种象征效力，我们只需……

这就是我今天想让你们做的；现在我们要迅速工作

……在这个极其简单的东西中凸显应当凸显的内容：这次要面对象征效力，凸显主体的某种象征惰性。换句话说，我会让你们以有秩序、经过思考的方式玩奇偶游戏。我们将记录结果。你们也要投入一点自己的东西。

假期里，我会加工这些结果。我们会看看能从中提取什么。

问题在于面对这种象征效力，标记并考察我们能否凸显某种主体本身、无意识主体本身所特有的象征惰性。

我们或许会在这项实验中发现这种象征惰性；可以借如下方式探测它与别的序列之间的差异：用基于一份随机数清单的序列，取代我们将在奇偶游戏中记录的序列。不过这属于数学家的工作；在场的里盖先生会向我们解释什么是随机选出的数字序列。

你们想不到这有多么困难。数学家花了好几代人的时间，才学会从各个方向妥善防范，使数字真正得到随机选择。借助我即将在黑板上写出的一台小机器，我们会看到在某个加工层面得到的差异——这个层面具有意义，因为这正是这里的机器所表示的东西——也就是随机选择的数字与有意选择的数字之间的差异。我会请你们所有人参与这场游戏，但要按照我今天为你们设计的特定秩序和方式。我们将这样进行：

第一张纸先对折，再对折，再对折一次，也就是沿纵向折成八份；横向折成四份。这样就有 32 格。另外两张纸沿纵向折成三份，在顶部多留一道小边，用来写姓名和地址；横向像前一张一样折成四份。我这样做是为了让操作简单。你们要记录奇偶游戏的序列。出于以后会明白的理由，游戏进行 85 回合。在第一张纸上，沿折出的横线标点，每行 12 个，重复 6 行，所以不会一直标到底。最后一行只标 9 个。这样一共是 81 个。再在左上角标 4 个。

眼下你们不要马上使用这些纸，而要注意你们当中两个人之间会发生什么，由此准备好担任记录者。我只请你们关注游戏，看看其中一人怎样出招、谁赢、谁输等等。你们要投入注意。

里盖，你负责记录第一部分。至于另外几张纸：在剩下两张中的第一张上标 45 个点，另一张标 40 个。达维德，你同曼诺尼玩奇偶游戏。

奥克塔夫·曼诺尼——我玩这个会作弊。

拉康——我根本不在乎。

〔达维德与曼诺尼进行 85 回合游戏〕

奥克塔夫·曼诺尼

非常简单：每次我随意猜，都赢了。没有法则时，我反而经常输。法则会变化。有一阵，我采用马拉美诗句的顺序；接着用一个电话号码或车牌号码；后来用黑板上写的东西，每天早上九点打卡……让元音与辅音交替变化。

拉康——你用第一条法则玩了多少回合？

奥克塔夫·曼诺尼——就是我真正获胜的那一段。

拉康

这只为了让你们对交替节奏产生兴趣。前些天，我也曾向你们展示许多无用的东西，再把你们带回中心：问题在于输或赢。刚才只是为了让你们对这件事感兴趣。现在，第一项任务是请你们每个人在第一张纸上随意书写——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做；我认为越是大张旗鼓越好——让它近乎自动发生。想象自己正在同机器玩奇偶游戏，你会任由自己写出怎样的序列？

你可以怀着随机进行的感觉来写。所以，在第一张纸上写一串（+）与（−）。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回合都涉及主体间性。但我请你们不要像曼诺尼那样操作。随机去做。展示你们自身的象征惰性。每三人一组，依次担任提问者、回答者和记录者：共十二组。

第17课 · 1955年4月26日

速记稿缺失

（参见雅克-阿兰·米勒整理本：《自我……》，瑟伊出版社，1978年；或 Points Seuil 丛书第 243 号，2001 年。

以下转录取自《精神分析》第 2 期，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 年，第 1—44 页。）

关于《被窃之信》的研讨班

引言

我们在这里以整理稿形式刊出的这堂研讨班课，讲于 1955 年 4 月 26 日。它是我们整个学年围绕《超越快乐原则》所作评注的一个环节。

众所周知，许多自称精神分析家的人，毫不犹豫地把弗洛伊德这部著作斥为多余甚至冒险的思辨。它最终落实于死本能概念这一最典型的二律背反；从中可以衡量，这部著作对多数人而言何等不可思——请容我们这样造词。

然而，这部著作恰恰为新局部论作了铺垫；由自我、本我与超我三个术语表象的新局部论，无论在理论使用还是大众传播中都已占据支配地位。因此，很难把这部著作视作弗洛伊德学说的一次离题，更遑论失足。只要深入考察把上述思辨同那场以它为构成要素的理论修订连在一起的动机，这项简单认识就会得到确认。

这一过程毫无疑问地表明，上述术语的当前用法遭到庸俗化，甚至发生误读；最明显的证据在于，理论家与俗人的用法完全等同。某些后继者公开宣称，要在这些术语中找到一种中介，把精神分析经验重新纳入他们所谓的一般心理学；这无疑正为他们的计划提供了理由。

我们在这里只设下几个路标。重复自动症，Wiederholungszwang……

尽管这个概念在这里所讨论的著作中，表现为旨在回应某些临床悖论，譬如创伤性神经症的梦或负性治疗反应

……却不能被设想成对理论大厦的一项附加物，哪怕是为它加冕的附加物。

弗洛伊德在这里重新肯定的是他的奠基性发现：其"无意识"所蕴含的记忆构想。新事实给他机会以更严格的方式重构这一构想，使其获得一般化形式；同时也使他重新开启其问题性，以对抗当时已经显露的退化倾向——把它的效果当作简单给定之物。这里得到更新的内容，早已在《纲要》[注1]中获得分节；弗洛伊德的洞见在那里勾出研究必将走过的大道：作为无意识先驱的 Ψ 系统，显露其独创性，因为它只有重新找到那个从根本上失去的对象才能得到满足。

> [注1] 这里指 1895 年的《心理学计划》（Entwurf einer Psychologie）。它同著名的弗利斯书信附在一起，也原本寄给弗利斯，却不像那些书信那样受到编者删改。德文版对手稿的某些误读甚至表明，编者很少留意其意义。显然，我们在这段话里只是为研讨班已经提取出来的一个立场加上标点。

于是，弗洛伊德从一开始便置身于克尔凯郭尔教给我们的那组对立中：存在概念究竟奠基于回忆，还是奠基于重复。克尔凯郭尔在其中精彩辨明了古代人与现代人构想的差异；而弗洛伊德看来使后一种构

想迈出了决定性一步，因为他从那个与意识认同的人类行动者手中，夺走了重复所包含的必然性。这种重复是象征性重复；由此可见，符号秩序不能再被设想为由人构成，而应被设想为构成人的秩序。

相关知识卡 克尔凯郭尔《重复》

因此，我们感到自己受到迫切要求：必须真正训练听众理解弗洛伊德著作所蕴含的记起概念。经验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只要让这个概念保持隐含，分析的材料本身就会悬在空中。正因为弗洛伊德没有放弃其经验的原创性，我们才看见他被迫在那里唤起一个从生命之外支配经验的要素，并把它称作死本能。

弗洛伊德在这里交给那些自称追随者之人的指示，只会让这样一些人感到震惊：用戈雅的警句来说，理性的沉睡由它所产生的怪物维持。因为弗洛伊德从不降低自己一贯的标准；他只在附带一个例子的情况下交出概念，而这里的例子将以耀眼方式裸露它所指示的根本形式化。

在这场游戏中，孩子练习让某个对象从视野中消失，再把它带回来，然后又一次抹去；对象的性质本身并不重要，而孩子同时用彼此区别的音节调制这种交替。我们会说，这场游戏以最根本的特征显露了人这种动物从象征秩序接受的规定。

人实际上把自己的时间奉献给结构性二择的展开；在其中，在场与缺席彼此发出召唤。恰恰在两者发生根本结合的时刻，也可以说在欲望的零点，人类对象落入一种捕获之下；这种捕获取消其自然属性，从此使它服从符号的条件。

说实话，这只是一道富有启示的瞥见：个体进入一种由群体承托并以语言形式接纳他的秩序；这种秩序在历时与共时中，都把能指的规定叠加到所指的规定之上。人们可以在其涌现本身把握这种过度规定；弗洛伊德对象征功能的领会所涉及的，只有这种过度规定。

只需用（+）与（−）含示一个只围绕在场与缺席这组根本二择运作的序列，就能证明：最严格的象征规定，如何能够容纳一串其现实严格按照“偶然”分布的出招。

相关知识卡 拉康文本中的三类符号游戏

事实上，只需在这种序列的历时中，把以每个符号为终点的三元组符号化；譬如在共时层面按照对称性来界定它们：

- 恒常的对称（+++、− − −）记为（1）；
- 交替的对称（+ − +、− + −）记为（3）；
- 而把记号（2）留给“奇数”[注2]所揭示的不对称，即两个相同符号组成一组，前面或后面任意出现一个相反符号（+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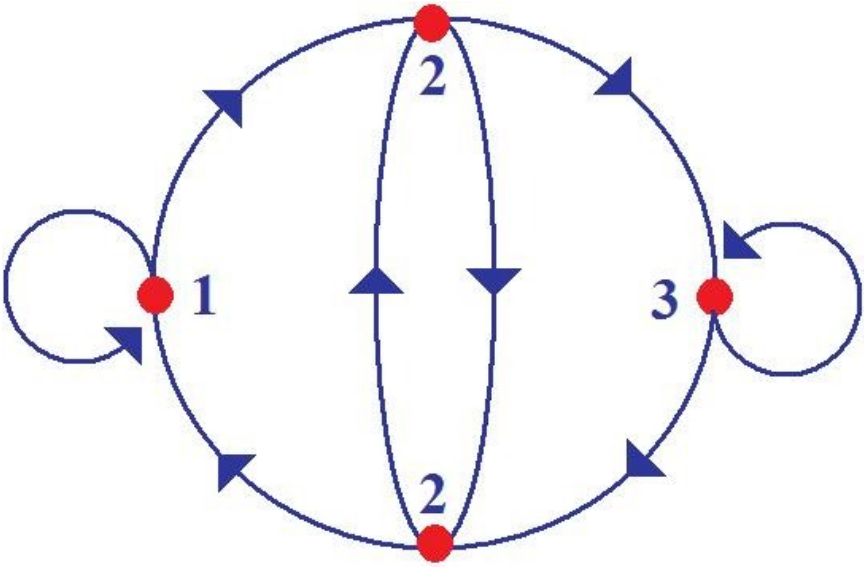
> [注2] 严格说来，这种可能性把英语词 odd 的各种用法结合起来；据我们所知，其他语言里没有对等词。法语用 impair 指称行为上的失检，已经显出这种意味的萌芽，但 disparate（不相称、悬殊）一词本身仍嫌不足。

……这样，在由此构成的新序列中就会出现相继的可能与不可能。下面这张网络既概括它们，又显露三元组孕育的同心对称；请注意，它正是人类学家不断重新提出的问题所必须参照的结构：象征组织的二

元论究竟具有根本性质，还是仅具表面性质[注3]。以下就是该网络[注4]：

> [注3]　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这一问题的更新性重述：《二元组织存在吗？》，载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第 112 卷第 2 辑，海牙，1956 年，第 99—128 页。（参见本课末尾的 PDF 文档。）

> [注4]　参见阿涅斯·索菲亚娜：《切割与法律——〈失窃的信〉研讨班导论》；以下增补取自该文。



Réseau 1-3

譬如，在符号（1）、（2）、（3）组成的序列中，可以发现：只要一串在（1）之后开始的、连续相同的（2）仍在持续，这个序列就会记住每个（2）所处位次为偶数还是奇数。因为该序列只能在偶数个

（2）之后由一个（1）打断，或在奇数个（2）之后由一个（3）打断。

+	+	+	−	−	+	+	+	
.	.	1	2	2	2	2	1	
−	−	−	+	+	−	−	−	
.	.	1	2	2	2	2	1	
+	+	+	−	−	+	+	−	+
.	.	1	2	2	2	2	2	3
−	−	−	+	+	−	−	+	−
.	.	1	2	2	2	2	2	3

因此，原初符号第一次与自身进行组合时——我们还会指出，以这种方式提出它绝非任意——便出现了一种结构。尽管它对自身材料仍然完全透明，却已经显示记忆与法则之间的根本联系。不过，只需再次把三元分组应用于这个三项序列，以便在其中界定一种四项关系，我们就会同时看到象征规定如何变得不透明，能指的性质又如何得到揭示。

相关知识卡 拉康文本中的三类符号游戏

事实上，只需考察上面的 1—3 网络，就足以表明：如果根据该网络所固定的相继项，给定一个三元组的两个极端项，中间项就会得到单义规定。换句话说，这个三元组可以由两端得到充分界定。那么，让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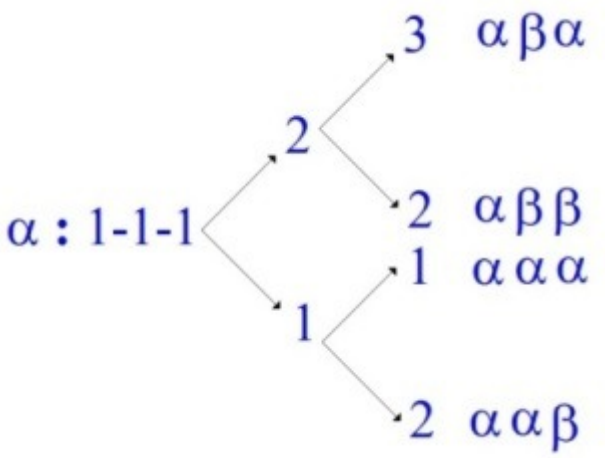
们规定这些极端项——譬如三元组〔（1）（2）（3）〕中的（1）与（3）——如果通过自身符号结合：

- 一个对称与另一个对称〔（1）—（1）〔1,1,1〕、（3）—（3）〔3,3,3〕、（1）—（3）〔1,2,3〕、（3）—（1）〔3,2,1〕〕，那么由它们界定的三元组记作 α；
- 一个不对称与另一个不对称〔（2）—（2）〔（2,3,2）、（2,1,2），以及图形顶部和底部的两种（2,2,2）情况〕〕，那么由它们界定的三元组记作 γ；
- 但与第一次符号化不同，交叉结合将使用 β 与 δ 两个符号：譬如，β 标记对称到不对称的结合〔（1）—（2）〔（1,1,2）与（1,2,2）〕、（3）—（2）〔（3,3,2）与（3,2,2）〕〕；δ 则标记不对称到对称的结合〔（2）—（1）〔（2,3,3）、（2,2,2）〕、（2）—（3）〔（2,1,1）、（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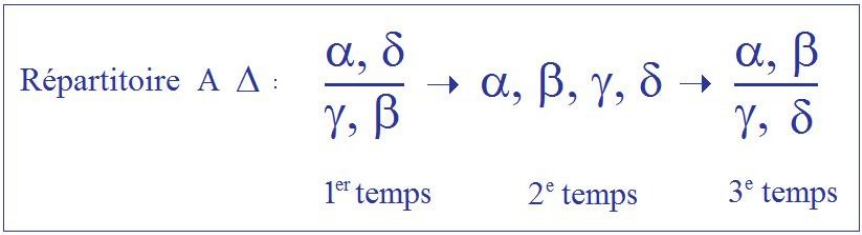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3	2	2	3	3	2	2	2	1	2	3	2	1	1
.	.	.	.	α	δ	β	β	δ	δ	β	β	γ	δ	γ	α	γ	α	δ

于是可以发现：尽管这种约定在 α、β、γ、δ 四个符号之间恢复了严格相等的组合机会——这不同于上一项约定中累积性的歧义；在那里，符号（2）的机会等同于另两个符号的机会之和——但 α、β、γ、δ 之间已经可以严格称作句法性的连接，仍会规定绝对不对称的分布可能：一边是 α 与 γ，另一边是 β 与 δ。

事实上，人们已经承认：这些项中的任意一项都可以直接接在任意另一项之后，并且也可以在从其中任意一项开始计数的第四时刻到达。相反，第三时刻——换言之，每隔一个符号的结合——则服从一条排除法则：从 α 或 δ 出发只能得到 α 或 β，从 β 或 γ 出发只能得到 γ 或 δ。



这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其中，从第一到第三时刻彼此相容的符号，会按照分布图中划分它们的横向层级相互对应；而在第二时刻，选择哪一个符号则无关紧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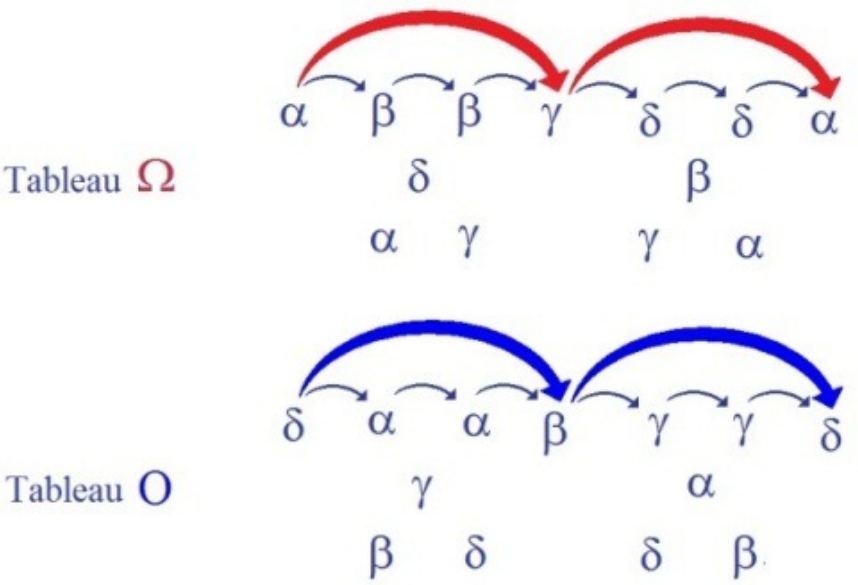
4e temps → / 1er temps ↓	α	exclues	β	exclues	γ	exclues	δ	exclues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β		α γ α γ		α γ α δ	
	α α β α	γ (2,3)	α α β β	γ (2,3)	α γ β γ	δ (2,3)	α γ β δ	δ (2,3)
	α δ α α	β(2),α(3)	α δ α β	β(2), δ(3)	α β α γ	α(2), γ(3)	α β α δ	α(2), γ(3)
	α δ β α		α δ β β		α β β γ		α β β δ	
β	β α δ α		β α δ β		β γ δ γ		β γ δ δ	
	β α γ α	β(2,3)	β α γ β	β (2,3)	β γ γ γ	α (2,3)	β γ γ δ	α (2,3)
	β δ δ α	γ(2), δ(3)	β δ δ β	γ(2), α(3)	β β δ γ	δ(2), β(3)	β β δ δ	δ(2), β(3)
	β δ γ α		β δ γ β		β β γ γ		β β γ δ	
γ	γ α δ α		γ α δ β		γ γ δ γ		γ γ δ δ	
	γ α γ α	β(2,3)	γ α γ β	β (2,3)	γ γ γ γ	α (2,3)	γ γ γ δ	α (2,3)
	γ δ δ α	γ(2), α(3)	γ δ δ β	γ(2), α(3)	γ β δ γ	δ(2), β(3)	γ β δ δ	δ(2), β(3)
	γ δ γ α		γ δ γ β		γ β γ γ		γ β γ δ	
δ	δ α α α		δ α α β		δ γ α γ		δ γ α δ	
	δ α β α	γ(2,3)	δ α β β	γ (2,3)	δ γ β γ	δ (2,3)	δ γ β δ	δ (2,3)
	δ δ α α	β(2), δ(3)	δ δ α β	β(2), δ(3)	δ β α γ	α(2), γ(3)	δ β α δ	α(2), γ(3)
	δ δ β α		δ δ β β		δ β β γ		δ β β δ	

这里出现的联结，正是交换最简单的形式化；这一点印证了它在人类学上的重要性。关于它对于某种原初主体性的构成功能，我们在这里只作提示，稍后再确定这一概念。事实上，考虑到联结的方向，它是互反的；换言之，它不可逆，却具有追溯作用。因此，一旦固定第四时刻的项，第二时刻的项便不再无关紧要。可以证明：只要知道一个序列的第一项和第四项，两个中间项中总会有一个项的可能性遭到排除。

这个项在 Ω 与 O 两张表中得到标示[注5]：

> [注5] 这两个字母分别对应另一种表示被排除项的图示方式中的右旋与左旋。

两张表的第一行可以定位从第一时刻到第四时刻所要寻找的组合；第二行中与该组合对应的字母，则标示这一组合在第二和第三时刻所排除的项。



这可以表述为：我的未来有一部分已经得到规定，它插入以下两者之间：

- 在它这一侧的近期未来，
- 以及在它另一侧的遥远未来……两者看似都未确定；然而，只要我的计划规定了这个遥远未来，我的近期未来便会成为先将来时，并同我的过去即将获得的规定结合起来，由此便从我与计划实现之间的间隔中，排除这个计划所处的四分之一能指可能性。

能指的这个死头（caput mortuum）[注6]，可以视为一切主体历程的特征。然而，正是能指规定的秩序，才使我们能够恰当地确定主体性的

秩序；人们通常把后者同主体与实在的关系混为一谈，而这是错误的。

> [注6] 上表给出 64 种可能组合（4^3）。若加上不可能组合，总数将是 256（4^4）；所以“不可能者”（caput mortuum）占总数的四分之三。Caput mortuum 是炼金术用语，指无法再从中提取任何东西的残渣。

为此，不妨稍稍停留于若干可以轻易从我们最初的公式中推出的后果。例如，在一条由 α、β、γ、δ 构成的链中，可能遇到两个相继出现的 β：它们要么直接相继（ββ），要么隔着任意数目的 αγ 对（βαγα……γβ）。但在第二个 β 之后，链中必须先出现一个 δ，才可能再出现新的 β。

不过，上述两个 β 的相继出现若要再次发生，就必须在第一个 δ 之外再添上第二个 δ，并形成一种与两个 β 所必需的联结等价的联结（只是 αγ 对倒转为 γα）。由此立刻产生了我们先前所说的、链中不同符号出现概率的不对称。

事实上，α 和 γ 若碰巧形成有利的随机序列，可以不断重复，直至覆盖整条链；而 β 和 δ 即使遇上最有利的机会，其比例也只能以彼此严格等量、至多相差一项的方式增加，因此它们可能达到的最高频率被限制在 50%。

β、δ 所预设的掷次组合，其概率与 α、γ 所预设的组合等同；另一方面，实际掷次又被严格交给偶然。由此可见，一种符号规定从实在中脱离出来：任何实在的偏向都可以铭刻在它之中，然而就其独特的不均等而言，它又先于实在而存在。

只需考察 Ω 与 O 两张表的结构对比，这种不均等就能以不止一种方式显现出来；也就是说，端点之间的联结属于哪张表，排除关系便相应呈现为直接或交叉的形式。

因此可以看到：如果最后一个对子落在 O 表中，中间对子和端点对子可以相同（例如 ββββ、ββαα、ααββ、ββγγ、ββββ、γγγγ、γγββ，乃至αααα，都是可能的）；但如果最后一个对子落在

Ω 的方向中，它们便不可能相同（ααγγ、ααββ、ββγγ、ββββ、ββαα、γγββ、γγαα，都是不可能的；当然还有 ββββ，参见上文）。

这是符号规定的另一个例子；它带有游戏性质，却不应令我们偏离要点。因为，弗洛伊德带给我们的能指过度决定概念，只能被置于这种符号规定的联结中。对于像他那样的思想者来说，它绝不可能被设想为实在的过度决定；他的一切都反对屈从于那种概念上的谬误，而哲学家和医生却太容易借它来平息自己的宗教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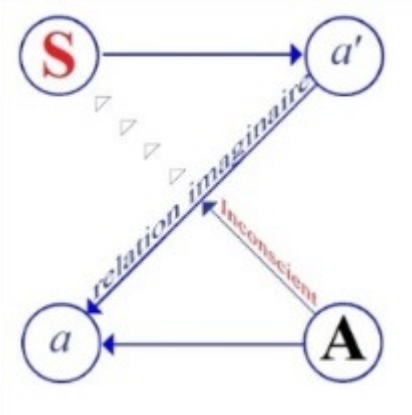
只有坚持象征界的自主地位，才能澄清精神分析中自由联想理论与实践的种种歧义。把自由联想的动力归于符号规定及其法则，与把它归于某种想象惰性的经院式预设，完全是两回事；后者先在哲学的或冒充哲学的联想主义中支撑自由联想，继而又自称具有实验性。由于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考察，精神分析家便在这里又找到一个召唤点，重新落入他们不断陷入的心理学化混乱，其中一些人甚至是有意为之。

事实上，只有像我们刚才给出的例子那样，符号链的要求在悬置中得到无限保存，才使我们能够理解无意识欲望在何处以其不可摧毁的持存而存在。尽管这一点在弗洛伊德学说中看似悖论，它却是其中最受强调的特征之一。

无论如何，这一特征同真正实验心理学中已知的任何效应都不可通约；后者无论遭受怎样的延期或迟滞，最终都会像一切生命反应那样衰减并消失。弗洛伊德正是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再次回到这个问题，并指出：我们在重复自动症诸现象中所发现的那种坚持——也就是它们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只能获得一种前生命的、跨生物学的动因。

这个结论或许令人惊讶，但它出自弗洛伊德之口，而他正是第一个谈论这些事情的人。若听不出来，就只能说是充耳不闻。不要以为他在这里诉诸唯灵论：这里涉及的是规定的结构。规定通过其效应而移置的物质，在范围上远远超出脑组织；它的一些效应固然托付给脑组织的变迁，另一些效应却通过以别的方式物质化，同样保持活跃，并被结构化为符号。因此，如果人能够思考象征秩序，那是因为他首先在其存在中被这一秩序捕获。他之所以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凭意识塑造了这一秩序，是因为他只能经由自己同相似者的想象关系中的一个特殊裂口，才得以作为主体进入这个秩序。

然而，他只有通过言说的根本隘道，才能完成这种进入。我们曾在儿童的游戏中认出这一隘道的一个发生学时刻；而在其完整形式中，每当主体向作为绝对者的大他者言说时，它都会重演——也就是说，主体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大他者：它能够取消主体本人，正如主体也能以同样方式对待它，即把自己变成一个对象来欺骗它。过去三年，我们在圣安娜研讨班中，从转移理论一直到偏执狂结构，都已证明这种主体间性辩证法的必要用途。它很适合借助下面这张我们的学生已经熟悉的图式来说明；其中两个中间项，代表我们在镜像阶段中辨析出来的、想象性互反客体化的对子。



与小他者的镜像关系……

我们最初正是借此，试图把支配性地位重新赋予

自恋理论——这一在弗洛伊德那里至关重要的理论——在自我功能中的作用

……只有像图式所表示的那样，插入主体的这一侧与大他者的那一边之间，才能通过其实际的从属地位来统摄分析经验所揭示的全部幻想活动。言说事实上把主体置入这两者之间，因为那些以言说为根基的存在，完全受制于人们对言说的信赖。

正因为混淆了这两个对子，一种实践与教诲的继承人才得以把所谓“生殖器之爱”的幻象神化，甚至赋予它献身性的德性，由此造成了如此之多的治疗误入歧途；而对于一切恋爱迷狂（Verliebtheit）在根本上的自恋性质，这种实践与教诲原本已作出了决断性的区分——这一点在弗洛伊德那里读得清清楚楚。

但是，如果干脆删除一切对主体间性符号两极的参照，把治疗缩减为对想象对子进行乌托邦式的矫正，我们如今就会走到这样一种实践：在“对象关系”的旗号下，完成的是一种必然令每个诚实者感到卑下的事情。这正说明了我们研讨班有时看似久久停留于某些练习的理由：这些练习其实构成了对主体间性层面的真正体操。

只要把 L 图式各项之间的关系，同前面在定向序列中区分出来的四个时刻之间的关系并置，两者的亲缘性便不可能不引人注意；我们在这一序列中看到了符号链最初的完整形式。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更为鲜明的类比：在《失窃的信》这封信本身中，重新见到我们所谓能指之“死头”的决定性特征。

不过，此刻我们才刚刚拱起一道桥券，只有经年累月才能把桥砌成。为了向听众说明真正的主体间性何以不同于投射概念所包含的二元关系，我们先前已经引用过一段推理。坡本人在本次研讨班所讨论的故事中颇为赞许地叙述了它：据说，一个神童正是凭借这种推理，在猜单双的游戏中赢得远超通常轮到他的次数。沿着这套推理——说它孩子气，恰如其分，可它在别处也迷住了不少人——我们必须抓住它暴露自身骗局的那个点。

在这里，主体是被问的一方：他要猜对手藏在手中的物件数目是单数还是双数。这个男孩的大意是说，在我赢或输过一局之后，我知道：如果对手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的计谋至多是下一局换一边押；但如果他更精明一层，他就会想到我会料到这一点，于是应该仍旧押在原来那一边。

因此，这个孩子把自己的成功寄托于把对手脑回皱褶程度的高低客体化。这种观点同想象认同的联系立刻显露出来，因为他声称，自己是通过在内心模仿对手的姿态与表情，才对这个对象作出准确判断。

然而，再往下一层又会怎样？对手已经看出我足够聪明，能跟上他的这一步，于是他会通过意识到装傻才有机会骗过我，来表现自己的聪明。从这一刻起，推理便不再有另一个有效时刻，恰恰因为此后它只能在无限振荡中反复自身。

除了纯粹愚钝、推理似乎可以客观立足的情形之外，这个孩子只能设想对手会走到第三时刻的止点，因为他已经让对手拥有第二时刻。由此，他本人也被对手视为一个把对手客体化的主体——他的确就是这个主体；于是，他便同对手一道陷入一切纯二元主体间性都包含的僵局：面对绝对的大他者，他们无处求援。

顺便指出，在构成第二时刻时，智力扮演着一种随即消隐的角色：辩证法正是在这个时刻脱离既定事实的偶然性；然而，只要我把智力归于对手，它的功能便变得无用，因为从此它又重新落回这些偶然性之中。

不过，我们不会说，在每一局的瞬间沿着想象认同去认同对手，是一条预先注定失败的道路；我们只会说，它排除了严格意义上的符号过程。只要这种认同所认同的不是对手本人，而是它所表述的对手的推理，这一符号过程便会出现（这一差异在原文中也已明说）。况且，事实证明，这种纯粹想象的认同从总体上会失败。

因此，每个进行推理的玩家都只能到二元关系之外去寻求凭借，也就是诉诸某种支配着对方给我各局之先后次序的法则。事实的确如此：

如果是我出题让对方猜，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主动主体，那么我每一刻的努力，都会是向对手暗示存在一条支配我若干次出手规律的法则，然后尽可能多地打破这条法则，使他无法把握它。

这种做法越能摆脱那种不由自主开始勾勒出来的实际规律，它就越能真正奏效。因此，参加过这个游戏某次试验的人之一——奥克塔夫·曼诺尼——承认说，有一阵子，他感到自己太常被对手看穿，不论这种感觉是否有根据；为了摆脱困境，他把马拉美一行诗的字母按约定方式转置后的次序，作为此后向对手出题的顺序。

然而，如果游戏持续得像整首诗那么长，而对手又奇迹般地认出了这首诗，那么对手此后便会每局必胜。正因如此，我们才说：如果无意识以弗洛伊德的意义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听懂了他从《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等经验中引出的教诲所蕴含的东西——那么，一台现代计算机若能提取出那句在主体不知情的情况下长期调节其选择的话，就并非不可设想它会在猜单双游戏中取得远超通常比例的胜利。

这无疑是一个纯粹的悖论；但它所表达的是：我们拒绝把能够作出如此神奇表现的机器称为思维机器，并不是因为它缺少某种人类意识所特有的德性，而只是因为它并不比处在普通状态中的人思考得更多，然而也同人一样丝毫不能免于能指的召唤。

这样提出的可能性还有一项益处：它让我们听见，有些人因此产生了迷惘、甚至焦虑，并愿意把这种感受告诉我们。对于这样的反应，我们本可加以讥讽，因为它出自精神分析家：他们的整套技术都建立在所谓自由联想被赋予的无意识规定之上，而且他们可以在我们刚才引

用的弗洛伊德著作中白纸黑字地读到，一个数字从来不是随机选取的。然而，若想到没有任何东西教会他们脱离常识，去辨别常识所不知道的东西——即弗洛伊德式过度决定的性质，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倡导的符号规定——那么这种反应又有其根据。

如果这种过度决定应当被当作实在的规定——我的例子似乎向他们暗示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同所有人一样，把机器的计算同它的机械装置混为一谈[注7]——那么他们的焦虑确有理由。因为我们对“偶然律”挥下的这一击，会比伸手拿斧头更加阴森；而这些深受震动的人实际上都是坚定的决定论者，他们感觉到，一旦碰触这些法则，任何法则都将再也无法设想——这一点也确实没错。然而，这些法则恰恰就是符号规定的法则。

> [注7]　为了消除这种幻觉，我们在那一学年结束时作了《精神分析与控制论》讲座。它令许多人失望，因为我们几乎只谈了二进制计数、算术三角形，乃至一扇简单的门——门被界定为必须不是开着就是关着；总之，我们似乎并未把问题提升到远高于帕斯卡阶段的位置。

很显然，这些法则先于对偶然所作的任何实际观察。我们判断一个物件是否适合用来取得一系列偶然结果——在这里，这一系列总是符号的——依据的正是它是否服从这些法则。例如，一枚硬币或那个被绝妙地命名为“骰子”的物件，便有资格承担这一功能。

越过这一阶段，我们就必须以具体方式说明我们所主张的能指对主体的支配。如果这是真理，它就无处不在；我们应当能够从钻头够得着的任何一点，让它像奥尔巴赫地窖里的葡萄酒一样喷涌出来。[注8]

> [注8]　参见歌德《浮士德》中的“奥尔巴赫地窖”：梅菲斯托费勒斯让各种葡萄酒（香槟、托卡伊等）从桌子的木料中涌出。

因此，我们选取了那个故事本身；我们最初只是从中摘出关于猜单双游戏的争议性推理，并未看得更远。我们在故事中发现了一种助力：即使后来的考察没有表明坡——作为正在更新科学秩序的组合策略研究的优秀先驱——在创作小说时受到同我们相似的意图引导，我们的符号规定概念也已经不容我们把这种助力当作纯粹偶然。

至少可以说，我们在讲述中让听众感受到的东西深深触动了他们，以至于正是应他们的请求，我们才在这里发表一个版本。按照书写有别于言说的要求重加改写时，我们不免稍稍提前运用了此后才对当时引入的那些概念所作的阐发。

因此，我们后来不断加强的重音——突出符号之中的能指概念——在这里追溯性地发生了作用。若以一种历史伪装来淡化这些特征，我们相信，在一路跟随我们的读者看来反而会显得矫饰。但愿我们省却这种伪装，不会辜负他们的记忆。

Und wenn es uns glückt,
Und wenn es sich schickt,
So sind es Gedanken!
倘若我们走运，倘若时机适宜，它们便是思想！
——歌德：《浮士德》，“女巫的厨房”

我们的研究已经把我们带到这一认识：重复自动症（Wiederholungszwang）的原则，来自我们所谓能指链的坚持。而这一概念本身，是我们作为外存在（即离心的位置）的相关项提取出来

的；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弗洛伊德的发现，就必须把无意识主体置于这个位置。

相关知识卡 **重复强迫：恢复性倾向与能指链的坚持**

众所周知，正是在精神分析所开创的经验中，我们才能把握：象征界对人的把持，如何经由想象界的种种迂回，一直作用到人体最内在之处。本研讨班的教诲旨在坚持：这些想象性作用远非我们经验的本质；如果不把它们关联到把它们联结并定向的符号链，它们所交付的便只有某种不一致之物。

诚然，我们知道想象性印刻（Prägung）在符号替代项的这些偏置中何等重要，能指链正由此取得自己的样态。然而我们提出：支配那些对主体具有决定意义的精神分析效应的，是这条链自身的法则，例如：

- 拒斥，Verwerfung，
- 压抑，Verdrängung，
- 乃至否认本身，Verneinung，……并以应有的重音明确指出：这些效应如此忠实地追随能指的移置（Entstellung），以至于想象性因素尽管具有惰性，在其中也不过呈现为阴影与反光。

不过，如果这种强调在你们眼中只会抽象出一类现象的一般形式，那么它仍将被白白耗费：这些现象在我们经验中的特殊性，对你们来说依旧是本质；而若要拆开它们原初的复合体，便不免显得人为。

因此，我们今天想为你们说明我们正在研究的弗洛伊德思想时刻所揭示的真理，即：对主体而言，象征秩序具有构成功能。我们将通过一

个故事向你们证明，一个能指的行程如何赋予主体重大的规定。应当指出，正是这一真理使虚构本身的存在成为可能。因此，一则寓言同任何其他故事一样适合照亮这一真理，只须检验它是否连贯。除去这项保留，寓言甚至还有一个优点：人们越以为它受任意性支配，它就越能纯粹地显出符号的必然性。

所以，我们没有远求，而是从那个包含“猜单双游戏”辩证法的故事本身取例；不久前，我们刚刚利用过这段辩证法。这个故事既已为一条先前曾在其中找到支撑的研究道路提供后续助力，那恐怕并非偶然。你们知道，故事就是波德莱尔以《失窃的信》为题翻译的那篇小说。一开始，我们就会把其中的戏剧、对戏剧的叙述以及叙述的条件区分开来。

相关知识卡 坡的《失窃的信》

人们很快就能看出这些组成部分何以必不可少，也能看出它们不可能逃过作者的意图。事实上，叙述以一篇评论复写了戏剧；没有这篇评论，任何舞台呈现都不可能。严格说来，行动将始终不为观众席所见；而且，出于戏剧自身的要求，对话也会明确地缺少任何能让听众把握相关行动的意义。换言之，如果没有叙述从每个行动者演出该场景时的视点，为每一场投下可以说是“擦光照明”的光，戏剧中的任何东西都无法被摄影或录音捕捉。

这样的场景有两个：

- 我们立刻把第一个称作原初场景，这并非疏忽；
- 因为第二个可以视为它的重复，而且正是此刻所讨论的那种意义上的重复。

于是，原初场景——据我们所知——发生在“王室内室”。因此我们猜想，信送到时独自在场的最高贵人物、又被称为“显赫人物”的那个人，就是王后。另一个“显赫人物”走进来时，她陷入窘境，这证实了我们的感觉；故事叙述之前，我们已经得知，如果此人知道这封信，对这位女士而言，受到威胁的将不啻她的荣誉与安全。随着大臣 D. 走进来、场景展开，我们很快便不再怀疑此人正是国王。

此时，王后所能做的最好选择，便是利用国王的漫不经心，把信留在桌上，“翻转过来，收件地址朝上”。然而，它没有逃过大臣鹰隼般锐利的眼睛；他也没有错过王后的慌乱，并由此识破了她的秘密。从此，一切都像钟表一样运行起来。

大臣以其惯常的速度与机智处理过日常事务之后，从口袋里取出一封外观与眼前这封相似的信。他佯装读信，随后把它放在原信旁边。又用几句话逗乐了王室地毯上的人之后，他便僵直地拿走那封令人窘迫的信，旋即离开。王后丝毫没有错过他的把戏，却因害怕引起此刻与她并肩而坐的王室配偶注意，无法出手干预。

于是，对一个理想观众来说，这场运算完全可能未被察觉：没有任何人动一下声色。它的商是，大臣从王后那里偷走了她的信；而比这第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王后知道信如今在他手中，并且知道他不是无意拿走的。还有一个任何分析家都不会忽略的余项——分析家已受过训练，会留意一切属于能指的东西，尽管未必总知道拿它们怎么办——那就是大臣留下、不再入账的那封信，如今王后可以用手把它揉成一团。

第二个场景：大臣的办公室。地点在他的宅邸。按照警察局长对杜宾的叙述——坡在这里第二次引入杜宾那善于破解谜案的独特天才——十八个月来，警方趁大臣惯常夜间外出之际，尽可能频繁地重返此处，把宅邸及其周边彻底搜了个遍，却一无所获；而任何人都能从情势中推断，大臣把这封信放在自己触手可及之处。

杜宾让人向大臣通报来访。大臣接待他时刻意显得漫不经心，言谈间故作浪漫式的倦怠。不过，这番佯装骗不过杜宾；他透过绿色眼镜遮护的双眼，审视房间各处。当他的目光落到一张磨损得很厉害的纸条上时——它仿佛被随手遗弃在一个劣质硬纸板名片夹的格子里，名片夹上挂着某种亮晶晶的饰物，正处于壁炉台中央——他已经知道，自己面对的正是所寻找的东西。

恰恰是那些看似有意违背失窃之信特征描述的细节——尺寸除外，尺寸相符——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确信。于是，他只须告辞，把自己的鼻烟盒“忘”在桌上，以便第二天回来取；届时，他带来一个仿制品，模拟这封信现在的模样。

街上一桩为恰当时刻预先安排的意外把大臣吸引到窗口，杜宾乘机也拿走了这封信，以仿制品替换它；随后只须在大臣面前维持正常告辞的表象。这里发生的一切即便并非无声，也至少没有喧嚣。这场运算的商是，大臣已不再拥有那封信，可他自己并不知道，更远未怀疑是杜宾夺走了它。此外，他手中剩下的东西对于后续发展绝非无关紧要。我们还会回到这样一个问题：杜宾为何要在假信上写下一段文字。不管怎样，当大臣想要使用这封信时，他将读到以下字句；字迹特意写得让他认出杜宾的笔迹：

“……如此致命的图谋，若配不上阿特柔斯，倒配得上梯厄斯忒斯。”

杜宾告诉我们，这句话出自克雷比永的《阿特柔斯》。我们是否有必要强调，这两个行动是相似的？有必要，因为我们所着眼的相似，并不是单纯把若干仅为配对差异而挑出的特征拼到一起。若以牺牲其他特征为代价，只保留这些相似特征，也不会由此产生任何真理。我们想要凸显的，是两个行动获得其动因的主体间性，以及把它们结构化的三个项。这些项的优先地位，可以从它们同时对应以下两者来判断：

- 使决定骤然形成的三个逻辑时间，
- 以及决定为它所划分的主体指派的三个位置。

这个决定在一次凝视的时刻中完成。[注9] 因为，随后那些悄然延续这一时刻的操作并未增加任何东西；在第二个场景中，为等待时机而将操作延后，也没有打破这一时刻的统一性。这次凝视以另外两次凝视为前提，并把它们聚合在一瞥之中：它看见两者虚假互补所留下的开口，并由此预先扑向这个暴露之处所提供的掠夺机会。

> [注9] 必要的参照见我们的论文《逻辑时间或预期确定性的断言》，载 Cahiers d’art，1945—1946 年，第 32—42 页。

因此，是三个时间安排着三次凝视，由三个主体支撑，而每次又由不同人物体现：

- 第一次凝视什么也看不见：这是国王［与王后相对］，也是警察［与大臣相对］。

- 第二次凝视看见第一次凝视什么也没看见，并误以为第一次凝视为自己所隐藏的东西提供了遮蔽：这是王后［与国王相对］，继而是大臣［与警察相对］。

- 第三次凝视从前两次凝视中看出，它们把本应隐藏的东西暴露给任何想要攫取它的人：

这是大臣［与王后相对］，最后则是杜宾［与大臣相对］。

为了让人们从统一性上把握我们如此描述的主体间复合体，我们很愿意请传说中鸵鸟用来躲避危险的技巧作范本。事实上，当这种技巧在这里分配给三个伙伴时，它终于值得被称作一种政治：

- 第二个伙伴以为自己披上了隐身衣，

- 因为第一个伙伴把头埋进了沙里，

- 与此同时，他却任由第三个伙伴从容地拔光自己屁股上的羽毛。

只须给它那句俗语式名称添上一个字母，把它叫作“autruiche 政策”（鸵鸟政策），它便终于能够在自身之中[注10] 永远获得一个新意义。由此，我们已经给出了这一重复行动的主体间性模块；剩下的，

就是在其中辨认出弗洛伊德文本里我们所关心的那种意义上的重复自动症。

> [注10] 参见马拉美《埃德加·坡之墓》："永恒终于把他变成他自身的模样，／诗人遂挥舞裸剑，唤起／那个惊恐的世纪：它竟不曾知晓，／死亡正在这奇异声音中凯旋！"

当然，对于早已熟悉由我们的公式——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所概括的视野的人而言，主体的复数性并不能构成反对意见。我们此刻也不再重述主体的混入这一概念在其中增添了什么；不久前，我们在重新分析"伊尔玛注射之梦"时引入了这个概念。

相关知识卡 坡的《失窃的信》 · 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

今天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主体间性的重复过程中，主体如何在各自的位移中轮番接替。我们会看到，他们的位移取决于作为纯粹能指的失窃之信在三人组中占据的位置。正是这一点将在我们看来，证实它就是重复自动症。

相关知识卡 坡的《失窃的信》

不过，在踏上这条道路之前，似乎仍有必要追问：小说的目标同我们对它的兴趣——就两者重合而言——会不会落在别处？用我们粗硬的语言来说，故事以警探谜案的形式讲述，难道可以把这个事实视为单纯的合理化吗？事实上，我们完全有权认为这个事实并不牢靠。因为，此类谜案从罪行或违法行为中取得动因的一切要素——它的性质与动机、工具与实施、发现作案者的方法和使其伏法的途径——在这里，从每段情节一开始就被仔细排除了。事实上，犯罪意图一开始就像罪犯的操作及其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一样清楚。

问题在呈现给我们时，只限于为了归还而去寻找犯罪意图所系的那个对象；而它的解答似乎有意在向我们说明之时就已经完成。故事是靠这个让我们屏息以待吗？诚然，一种文类惯例足以在读者那里激起特定兴趣，我们可以对此给予一定信任；但不要忘记，“杜宾系列”在这里才第二次出现，它本身就是一个原型。既然它只从第一篇作品那里取得自己的文类，现在便让作者利用文类惯例，未免太早了些。

然而，把整个故事缩减成一则道德寓言，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仿佛它的教训是，为了把某类通信藏在目光之外——它们的秘密有时是夫妻和睦所必需的——只须任由信件摊在桌上，哪怕把它们翻到能指的一面朝上即可。就我们而言，我们不会建议任何人试验这种诱饵，免得他们因信赖它而失望。

那么，这里难道没有别的谜吗？就警察局长而言，谜在于一种构成失败之根源的无能；而就杜宾而言，谜或许在于一种我们不太愿意承认的不协调：一边是他为引入自己的方法而提出的那些无疑极具洞察力、尽管在一般性上未必始终完全切题的评论，另一边则是他实际介入的方式。

如果把这种障眼法的感觉再推进一点，我们很快便会追问，是否……

- 从那个若非主人公身份高贵便只能沦为闹剧的开场，
- 到结尾似乎许诺给大臣的滑稽下场……真正令我们愉快的，难道不是所有人都被捉弄了吗？我们会更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我们可以

同此刻阅读我们的读者一道，在这里重新找到我们曾顺便给出的“现代英雄”定义：“在迷失处境中以可笑功绩著称的英雄”。[注11]

[注11] 参见《言说与语言的功能和场域……》，载 La Psychanalyse，法国大学出版社，第 1 卷。

然而，我们自己不也被这位业余侦探的威风所吸引吗？他是新式吹牛武士的原型，尚未沾染当代超人的乏味。这句打趣反而足以让我们在故事中注意到一种如此完美的逼真性，以至于可以说：真理在这里揭示了自己的虚构安排。因为，使它逼真的理由，确实把我们引上了这条道路。

首先进入故事的程序，我们实际上会察觉到一出新戏剧。我们称它为第一出戏剧的补充：第一出是所谓“无言戏剧”，而第二出的趣味却围绕话语的属性展开[注12]［从 φ 到 Φ］。实际戏剧的两个场景显然各自在一段不同的对话中向我们叙述；但只要具备我们在教学中所强调的概念，就能认出这种安排并非只是为了叙事便利。对话本身以相反方式运用言说的效力，并由此获得一种张力，构成另一出戏剧；我们的术语会把它同第一出区分开来，因为它以象征秩序为支撑。

[注12] 要完整理解下文，当然必须重读这篇法语和英语都流传甚广、而且篇幅很短的《失窃的信》。

警察局长与杜宾之间的第一段对话，就像一个聋子同一个听得见的人之间的对话。也就是说，它呈现了人们通常以“沟通”概念加以简化、却因此造成最混乱结果的东西的真正复杂性。这个例子让我们把握：“沟通”为何能够造成一种印象——理论往往就停在这里——仿佛它在传递中只包含一个意义方向；似乎听得见的人赋予沟通的那篇充满意义的评论，只因没有被听不见的人察觉，就可以视为已经中和。然

而，如果只保留对话作为情况报告的意义，就会发现它的逼真性以准确性为保证。不过，一旦我们展示它的程序，它便比表面上更为丰饶；只须把讨论限于我们第一个场景的叙述，这一点就会显现。

因为，这个场景在抵达我们之前经过了双重、甚至三重的主体滤镜——杜宾的朋友兼熟人［1］（此后我们称他为故事的总叙述者）叙述警察局长［2］对杜宾所作的讲述，而局长讲述的又是王后［3］向他作的报告——这并不只是偶然安排的结果。

原始叙述者被逼到的极端处境，固然排除了她篡改事件的可能；但若以为警察局长之所以有资格在这里借给她自己的声音，仅仅因为他可以说已经取得了缺乏想象力的专利证书，那就错了。讯息以这种方式被转述，向我们保证了一件并非完全不言自明的事情：它确实属于语言的维度。

在场的人知道我们对此作过的评论，尤其是我们借所谓蜜蜂语言这一反例加以说明的评论：一位语言学家[注13]在其中只能看到对对象位置的简单发信号，换言之，一种比其他想象功能分化得更精细的想象性功能。

> [注13] 参见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动物沟通与人类语言》，载 Diogène 第 1 期；另参见我们的《罗马报告》，载 La Psychanalyse 第 1 卷，第 141—142 页。

我们在这里强调，这种形式的沟通在人类那里并不缺席，尽管由于符号的使用使对象遭到解体，对象作为自然给定之物对人来说变得如此飘忽。事实上，在两个人因憎恨同一个对象而建立的共同感中，可以把握这种沟通的等价物；但须注意，他们只能在一个对象上相遇，而

这个对象只由两人共同拒绝成为的那种存在的特征来界定。不过，这种沟通无法以符号形式传递。

它只能由同这个对象的关系支撑。它由此可以把数量不定的主体聚集在同一个“理想”之下；然而，在如此构成的群体[注14]内部，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的沟通，仍然不可还原地以一种不可言说的关系为中介。

> [注14] 参见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1921），法译本Psychologie collective et analyse du moi。

这段岔论并不只是向那些远远指责我们忽视非言语沟通的人重申原则。通过界定话语所重复之物的范围，它也在为症状所重复之物的问题作准备。因此，间接的转述［relater］沉淀出语言的维度；总叙述者把它再重复一遍，也“依假设”没有添加任何东西。然而，他在第二段对话中的职能则完全不同。因为，第二段对话将以我们在语言中别处区分出来的两个极点那样同第一段对立：词与言说[注15]的对立。也就是说，人们在这里从准确性的场域转入了真理的层面。

> [注15] 参见《罗马报告》，载 La Psychanalyse 第 1 卷。

我们敢想，不必再回头说明，这个层面位于完全不同之处，严格说来位于主体间性的奠基处。主体在那里除了把握那种把一个大他者构成为绝对者的主体性本身之外，什么也把握不到。为了在这里标示它的位置，我们只须唤起一段似乎当得起“犹太故事”之名的对话；能指同言说的关系以最赤裸的形式在其中显现，并在这样一句质问中达到顶点：

“你为什么骗我——有人气喘吁吁地叫道——对，你为什么对我说你要去克拉科夫，好让我以为你要去伦贝格，而实际上你去的正是克拉科夫？”

作为杜宾方法的导言，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股疑难、诡辩谜题、悖论、乃至俏皮话的洪流。如果这些东西不是由一个自居弟子的人以私下倾诉的方式交给我们，并由这种委托增添了某种效力，那么它就会迫使我们的心智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

这正是遗嘱必然具有的威望：见证人的忠实是一顶罩帽，它蒙住人们的眼睛，使人们对证词的批判沉睡。另一方面，还有什么能比把纸牌翻到桌面上的手势更令人信服？它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有那么一刻，我们相信魔术师确实如其所宣称的那样，展示了戏法的操作方法；而实际上，他只是以更纯粹的形式重新施演了这套戏法。正是这一刻，让我们衡量出能指在主体中的至高地位。

杜宾正是如此行事。他从那个小神童的故事讲起：孩子凭借认同对手这一窍门，在猜单双游戏中骗过所有伙伴。然而我们已经指出，这一窍门无法抵达其心智阐发的第一个层面，即主体间交替的概念，而不立刻在自身回返的止点上绊倒。[注16]

> [注16] 参见我们的导论。

尽管如此，为了让我们眼花缭乱，拉罗什富科、拉布吕耶尔、马基雅维利和康帕内拉的名字还是被抛到我们面前；同孩子的壮举相比，他们的声名似乎都只剩下空洞。接着又引出尚福尔这句话：“可以打赌，一切公共观念、一切公认惯例都是蠢事，因为它们适合最大多数的人。”它必然会令所有自以为逃脱这条法则的人满意，也就是恰恰令最

大多数的人满意。杜宾斥责法国人把“分析”一词用于代数是欺诈，这几乎不可能伤及我们的骄傲；何况，当这个词被解放出来另作他用时，没有什么会妨碍一位精神分析家觉得自己有资格主张权利。

于是，他又提出足以令拉丁文爱好者欣喜若狂的语文学评论：他提醒他们，却不屑多作说明，ambitus 并不意指野心，religio 并不意指宗教，homines honesti 也不意指诚实的人。你们当中有谁不会乐于记起，对于熟读西塞罗和卢克莱修的人，这些词的意思是“迂回、神圣纽带、体面人”？

坡无疑是在游戏。但一个疑问向我们袭来：这场炫耀博学的巡游，难道不是为了让我们听见这出戏剧的主导词吗？魔术师是否正在我们面前重复戏法，这一次并不以交出秘密的假象欺骗我们，而是把赌注推到这样的地步：他真正为我们照亮戏法，我们却什么也看不见。让一个由自己虚构出来的存在真正欺骗我们，岂不是幻术师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难道不正是这样的效应，使我们有理由毫无恶意地把许多想象英雄当作真实人物来谈论吗？

同样，当我们敞开耳朵，聆听马丁·海德格尔如何从 ἀληθής [alēthēs] 一词中为我们揭示真理的游戏时，我们只是在重新发现一个秘密：真理始终以此秘密启蒙自己的爱人，而他们从中领会到，真理正是在隐藏自身之际，最真实地把自身奉献给他们。所以，即便杜宾的言辞没有如此明显地警告我们不要轻信，我们也仍须抵抗相反的诱惑，作一番尝试。让我们就在他的脚步令我们迷失踪迹之处，追查他的踪迹。[注17] 首先，从他用来解释警察局长失败的批评开始。在第

一次谈话里，我们已经看见这种批评冒头，化作暗中的讥刺；局长毫不在意，只把它当成可以放声大笑的材料。

> [注17] 本维尼斯特对弗洛伊德在语文学领域引入的错误道路作出权威纠正之后，我们很愿意再次向他提出某些词——无论原始与否——具有相反意义的问题（参见 La Psychanalyse 第 1 卷，第 5—16 页）。因为在我们看来，要严密地提取能指的审级，这个问题仍完整地保留着。布洛赫和瓦尔特堡把 dépister 一词第二种意义——也就是我们句中使用的意义——的出现定在 1875 年。

的确，正如杜宾暗示的那样，一个问题可能恰恰因为太简单、甚至太显而易见，才显得晦暗；但对局长而言，这句话永远不会比用力挠几下肋骨更有作用。一切安排都在诱使我们形成一个观念：这个人物是个蠢人。叙述又用力铺陈说，他和手下永远想不出任何超越普通歹徒想象的藏匿方法；也就是那一套太过熟知的非凡藏处，故事逐一列举如下：

- 从书桌的暗屉到拆开桌面的桌子，
- 从拆开软垫的座椅到掏空的椅脚，
- 从镜面水银背后到书籍装帧的厚层。

在此之上，故事又嘲弄局长的错误：他从大臣是个诗人，推断出大臣离疯子不远。有人反驳说，这个错误只来自中项的虚假分配——不过，这可不是小问题——因为即使所有疯子都是诗人，也远远推不出大臣是疯子。

确实如此；可是，对于诗人在藏匿方面的优越性究竟由什么构成，我们自己却依旧被留在迷途之中，即使这位诗人同时还是数学家也一样。因为叙述在这里突然截断我们的冲势，把我们拖进一片针对数学

家推理的恶劣争论的灌木丛；据我所知，数学家从未对自己的公式依恋到把它们同推理的理性本身等同起来。

至少我们可以作证，事情同坡似乎经历过的相反：有时在我们的朋友雅克·里盖面前——他今天亲临此处，保证我们对组合学的涉足没有让我们迷路——我们也会放纵自己作出如此严重的越轨，例如怀疑 x^2+px 也许并不绝对等于 q；依坡看来，上帝都不应容许这种事。然而——我们在此驳斥坡——我们从来不必提防任何突如其来的暴力惩罚。

难道花费如此多的才智，只是为了把我们的心智从先前已经提示我们应当视为既定之事的东西上引开吗？那件事就是，警察搜查了一切地方。关于警方不无理由地认定信件必然身处其中的场域，我们必须把这理解为空间已被穷尽——无疑只是在理论上穷尽，但这个故事的妙处就在于逐字面地理解它。支配行动的"网格划分"据说精确到"不容五十分之一线的尺度"逃过搜查者的探查。

那么，我们难道无权追问，这封信为何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更确切地说，我们难道不该指出，故事告诉我们的所有关于更高明藏匿观念的说法，严格讲都无法解释这封信何以逃过搜查，因为搜查已经穷尽的场域实际上包含着它——杜宾最终发现它，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难道在所有对象之中，唯独这封信被赋予了无处性（nullibiété）这一属性吗？我们借用的这个词，是那部以《罗杰同义词词典》[注18]闻名的词汇集从威尔金斯主教[注19]的符号学乌托邦中收录的。很显然（a little too self-evident，有点过于不言自明），信的确同场所有着一种关系，而没有哪个法语词能完整涵盖英语形容词 odd 的意味。波德莱尔

一贯用“古怪的”来翻译它，但这只是近似。不妨说，这种关系是“独异的”，因为它们正是能指同场所维持的那种关系。

> [注18] 《罗杰英语词语同义词词典》（Roget's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1911 年出版。

> [注19]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先生在一篇同我们论述的谱系极为和谐的作品中，恰恰处理了这个乌托邦；另一些人则把它还原到恰当比例。参见 Les Temps modernes，1955 年 6—7 月，第 2135—2138 页：《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以及 1955 年 10 月，第 574—575 页：《可敬的约翰·威尔金斯、哲学语言与星际沟通》（M. Pobers）。

相关知识卡 Nullibiété：无处性、失窃的信与被排除的享乐

你们知道，我们并不打算把这些关系变成“微妙玄虚”的关系；我们的目的也不是把字母同精神混为一谈，哪怕信件由气送管传来。我们完全承认，一方会杀死，另一方则会赋予生命；因为——你们或许已经开始听懂——能指使死亡的审级物质化。不过，即使我们首先强调的是能指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仍在许多方面具有独异性，第一点便是它不容分割。把一封信撕成碎片，它依然是原来那封信；这里的意义同格式塔理论以其“整体”概念中潜伏的生命主义所能说明的意义全然不同。[注20]

> [注20] 这点确实如此：哲学用那些因反复讲述而褪色的例子，从一与多出发进行论证时，不会把一张从中间撕开的白纸、一只断开的圆环、一个破碎的花瓶乃至一条被切断的虫用于同一种用途。

语言通过把冠词用作部分冠词，向懂得倾听的人宣告自己的判词。恰恰在这里，精神——如果精神就是活生生的意义……——以同样独异的方式显得比字母更容易接受量化。

先从意义本身说起：人们可以说“这篇充满意义的话语”；同样，法语还可以说：

- 在一个行动中看出某种意图，
- 哀叹再也没有一点爱，
- 积聚一些仇恨，
- 耗费一些献身精神，
- 还有，如此多的自负竟能安然接受：永远都有大把大腿可以转卖，
- 也总有男人之间的纷争。

但是，对于 lettre——无论把它理解为印刷字母、书信，还是使人成为文人的文字学养——人们会说：

- 所说的话应当按字面［à la lettre］去听，
- 军邮员那里有一封信在等你，
- 乃至说你有文才［avoir des lettres］，……却绝不会说任何地方存在“一些 lettre”［de la lettre］，无论它以什么名目同你有关，哪怕只是指一批延误的邮件。因为，能指是独一存在的单位，它依其本性只是一种缺席的符号。因此，不能像谈论其他对象那样谈论失窃的信，说它必然在或不在某个地方；恰恰相反，无论它去到何处，它都既会在、又不会在它所在之处。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警察身上发生了什么。关于他们搜查划定为调查范围的空间时所采用的程序，故事一点也没有省略：

- 先把空间划分成一个个体积，不让任何一层厚度逃脱，
- 再用针探查柔软处，
- 若仍无所获，便以敲击回声探测坚硬处，以显微镜查出钻头在钻孔口留下的碎屑，甚至查出那些狭小深渊张开的极细缝隙。

随着他们把网收得越来越紧，以至于不满足于抖动书页，还要逐页计数，我们难道没有看见空间仿照信件的模样一层层剥落吗？然而，搜查者关于实在的观念如此不可动摇，以至于没有发现他们的搜查正在把实在转化成搜查的对象。也许，他们原本可以凭这一特征把这个对象同所有其他对象区分开来。但这无疑是对他们要求太多；不是因为他们目光不足，倒是因为我们的目光不足。

因为他们的愚蠢既不属于个人类型，也不属于行业类型，而有其主体根源。这是现实主义者的愚蠢：他们不肯停下来告诉自己，无论一只手把某物多么深地塞进世界的腹腔，它都永远不会在那里被隐藏，因为另一只手总能伸到那里；所谓隐藏之物，永远只是从自身位置上缺失的东西，就像一本书在图书馆里放错地方时，检索卡上所写的那样。事实上，即使它就在书架上或相邻的格位里，只要它不在自身位置上，不论看起来多么显眼，它也仍然隐藏在那里。

因为，严格按字面说，只有能够更换位置的东西，也就是符号之物，才能说它“从自身位置上缺失”。至于实在，无论给它带来怎样的翻覆，它总在那里［在其位置上］；无论如何，它都把自己的位置粘在

鞋底带走，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够把它放逐出去。回到我们的警察：他们把那封信拿在它的藏身之处，又怎么可能把握它？他们在指间翻弄的东西，除了某个不符合他们手中特征描述的东西之外，还能是什么？

A letter, a litter；一封信，一件垃圾。在乔伊斯的圈子里，人们曾拿这两个英语词的同音关系作双关。[注21] 警察此刻摆弄的这种废弃物，并不会因为只被撕破一半，就向他们交出它的另一重性质。另一种颜色的火漆上盖着不同的印章，收件地址又换成了另一种字迹——这些才是最牢不可破的藏身处。如果警察只停留在信的背面——众所周知，当时收件人地址就写在那里——那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封信除了这个背面之外没有另一面。

> [注21] 参见Our Exagmination Round His Factification for Incamination of Work in Progress，莎士比亚书店，巴黎奥德翁街 12 号，1929 年；另参见《文字域》（Lituraterre）。

他们究竟能从正面探测出什么？它的“讯息”吗——按照令我们周日控制论聚会喜不自胜的说法？可是，我们难道不会想到，这个讯息早已抵达它的女收件人，甚至还同那张无意义的纸片一起留在她那里成为未结之账，而这张纸片如今对讯息的代表作用丝毫不逊于原信？

如果一封信完成职能之后就算实现了自己的命运，那么归还信件的仪式，就不会如此广泛地被用作爱情庆典熄灯散场的收尾。能指并不具有功能性。况且，如果这封信满足于只有一个意义，那么我们一路追踪其嬉戏的这群体面人物被如此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也就毫无意义。因为，把秘密告诉一队警察，可不是什么妥善保密的方式。

甚至可以承认，这封信对王后而言具有某种完全不同、即使未必更加灼人的意义，有别于它呈现给大臣理解力的意义。事情的进程不会因此受到明显影响；即使信件对所有不知内情的读者而言完全不可理解，也同样如此。因为，它肯定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可理解；正如警察局长为供众人取笑而夸张地向我们保证的那样：

“这份文件，如果向第三个人物公开——

- 他不会说出此人的名字，尽管这个名字像于比老爹牙缝里的猪尾巴一样扎眼——

便会危及——他告诉我们——一位最高贵人物的荣誉，甚至使这位尊贵人物的安全陷入危险。”

因此，投入流通会造成危险的，不只是讯息的意义，还有讯息的文本；而文本看起来越无害，危险反而越大，因为保管人中任何一位都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泄密。这样一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挽救警方的立场，改善它的“文化修养”也不会改变什么。Scripta manent，即使它能从豪华版人文读物中学到那句以 verba volant 收尾的谚语教诲，也属徒劳。［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言语飞逝，文字长存。］

但愿文字真能留下来，然而实际更常留下来的倒是言说：至少，言说的不可消除之债会通过它的转移，使我们的行动丰饶起来。文字却让疯狂的票据交换把一张张空白汇票随风卷走。假如书页不是会飞的纸片，也就不会有失窃的信。

可是，就此而言究竟如何？若要有一封失窃的信——我们会问自己——一封信属于谁？刚才我们强调过，信回到某个曾经热切让它作为

信物飞走的人手中，是一件何等独异的事情。人们通常认为那种过早发表私人通信的做法有失体面；埃翁骑士就曾以这种方式令自己的一些通信者陷入相当难堪的境地。

那么，寄信人仍然保留某些权利的信，并不完全属于收信人吗？抑或收信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收件人？让我们来看这里：最初可能使情形更加晦暗的东西，将为我们带来澄明——故事几乎完全不让我们知道寄信者，也同样不让我们知道信的内容。故事只告诉我们，大臣立刻认出写给王后的地址笔迹；而在顺带讲到大臣如何伪装信件时，才提到它原来的火漆印是 S 公爵的。

至于信的效力范围，我们只知道：一旦它落入某个第三者之手，便会携来危险；大臣占有它，使他能够为了“政治目的，以极其危险的程度运用”这封信赋予他对当事人的支配。然而，这丝毫没有告诉我们信所承载的讯息。无论它是情书还是密谋信，是告密信还是训令信，是催告信还是求救信，我们只能保留一件事：王后无法让自己的领主与主人知晓它。

这里的“领主与主人”远不能承受它们在市民喜剧中受到非议的重音；它们获得了崇高意义，指称王后的君主，她以宣誓的忠诚同他相联，而且这种联结是双重的，因为她作为配偶的地位并不免除她作为臣民的义务，反而使她成为法律所规定的王权之化身——也就是合法性——的守护者。因此，无论王后选择如何处理这封信，仍有一点不变：这封信是某项盟约的符号；即使女收件人并不承担这项盟约，信的存在也把她置入一条异于构成其忠诚的符号链。

这封信同后一条符号链互不相容，证据在于：占有这封信不可能被公开主张为合法；为了使人尊重这种占有，王后只能援引自己的“私域”权利，而这项特权以信件占有本身所违背的荣誉为基础。因为，体现主权恩典形象的女人不可能接受哪怕私下的秘密往来，而不使权力牵涉其中；面对君主，她也不能以秘密自居，否则就会进入地下状态。因此，信件作者的责任在持有信件者的责任面前退居其次：因为，冒犯君威在这里又叠加上了最高叛国罪。

我们说的是“持有信件者”，而不是“占有信件者”。因为，从此可以看清：信的所有权对女收件人而言，并不比对它可能落入手中的任何人更少可争议；只要其存在所冒犯的特权拥有者尚未对它作出裁断，关于这封信存在的一切就都无法恢复秩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信的秘密既然无法辩护，揭发这一秘密就会在任何意义上成为体面的行为。Honesti homines——体面人——不可能如此轻易脱身。Religio 不止一种，神圣纽带不会从明天起就停止把我们东拉西扯。至于ambitus，即迂回，显然也不总是由野心激发。因为，如果这里有一条我们走过的迂回，我们并没有把它偷来——这么说正合适。坦白告诉你们：我们采用波德莱尔的标题，只是为了清楚标出，不是像人们不恰当地说的那样标出能指的约定性质，而是标出能指相对于所指的优先性。

尽管如此，波德莱尔仍在虔敬之中背叛了坡：他把坡的题名“The Purloined Letter”翻译为《失窃的信》。原题使用的词相当罕见，以至

于界定它的词源比界定它的用法更容易。牛津词典告诉我们，to purloin 是一个盎格鲁—法语词，也就是说，它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 前缀 pur-，也见于 purpose（目的）、purchase（置备）、purport（意旨），
- 以及古法语词 loing、loigner（使延长）。

在第一个成分中，我们会认出拉丁语 pro-；它同 ante- 的区别在于：它预设身后有某物，自己向那件东西的前方伸出，有时是为了护卫它、甚至为它作保——而 ante- 则走到迎面而来之物的前面。至于第二个成分，即古法语词 loigner，它来自动词性场所定语 au loing 或 longé；这里的意思不是“在远处”，而是“沿着一旁”，所以指的是“搁到一边”，或者借一句利用双重意义的口语说法：“放到左边 / 暗中扣下”。

因此，正是把我们带上这条迂回的对象本身，证实了我们的迂回；因为，我们关心的确实是那封被转移路径的信，它的行程被延长了——这就是那个英语词的字面意思——或者借用邮政词汇说，是一封滞留待领的信。

这样，正如第一页便向我们宣告的，“Simple and odd”——简单而独异——被还原为最简单的表达：信的独异性。正如标题所示，信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体：它既然能够遭受迂回，就表明它有一条自身固有的行程；能指对它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特征中得到肯定。因为，我们已经学会这样设想：能指只能维持在一种位移中，就像滚动的灯光字幕，或我们那些“像人一样思维的机器”[注22]里的旋转存储器；这是由于能指

在原则上以交替方式运作，要求它离开自己的位置，哪怕随后再循环返回那里。

> [注22] 参见我们的导论。

这正是重复自动症中发生的事情。弗洛伊德在我们所评论的文本中教导我们：主体沿着象征界的脉络前行；而你们在这里看到的说明更加惊人：排成队列的不只是主体，而是被纳入主体间性的多个主体——也就是我们再次回到的那几只鸵鸟。它们比绵羊还要顺从，按照能指链贯穿它们的那个时刻来塑造自身存在。

如果弗洛伊德的发现——而且他不断以愈加陡峭的方式重新发现它——具有某种意义，那就是：能指的位移在主体的行动、命运、拒绝、盲目、成功与际遇中规定主体，不论他们的天赋与社会习得，也不考虑性格或性别；一切心理给定之物都将连同全部辎重，情愿与否地跟随能指的列车。

我们确实又回到了先前离开戏剧及其轮转的十字路口，也回到主体如何在其中接替的问题。我们的寓言旨在表明，支配他们入场和角色的是信及其迂回。信若滞留待领［en souffrance］，受苦的便是他们。经过它的阴影[注23]之下，他们便成为它的反光。他们一旦落入对信的“占有”——语言的歧义何其美妙——占有他们的便是信的意义。

> [注23] 参见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1917）：“对象的阴影落在自我之上……”；载《元心理学》。德文原文：《哀悼与忧郁》。

这里叙述的戏剧主人公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他的胆量在第一次为自己的胜利结成某种情势，如今同一情势又重复了。如果他现在向它屈服，那是因为借助自己掠夺的对象，他从当初兼为窃贼的三元组第三

位移到了第二位。因为，无论现在还是先前，问题都是保护信不受目光窥见；于是，他怎能不采用自己亲手破解过的同一种方法：把信暴露在外？

我们有权怀疑他是否知道自己这样做了什么，因为他立刻被一段二元关系俘获；我们在其中重新看见模仿性诱饵或动物装死的一切特征。他被典型想象性的情势——“看见别人没看见自己”——困住，因而误认了“别人看见他没看见”这一实际情势。

而他没有看见什么？恰恰是他本人当初如此善于看见的符号情势，如今他在其中“被看见正看见自己没有被看见”。大臣的行动就像一个知道警方搜查正是自己防线的人，因为我们得知，他特意借外出来给警方留下自由搜查的余地；然而，他仍然误认了这样一点：在这场搜查之外，他不再受到防护。

这正是他亲手制造的“autruicherie”（鸵鸟把戏）——如果容许我们让这个怪词继续滋生——但他成为它的受骗者，不可能是出于某种愚蠢。原因在于，一旦扮演“隐藏者”，他就必须披上王后的角色，甚至披上女人与阴影的属性；它们如此有利于隐藏行动。

这并不是说，我们把古老的阴阳对子还原为暗与明的原始对立。因为，准确运用这一对子，既须包含光辉所具有的致盲作用，也须包含阴影为了不放开猎物而动用的闪烁反光。［参见《弗洛伊德之物》末尾的话：“阿克泰翁，追猎女神使你罪责太重；猎人啊，你变成的阴影正陷入这猎物。任猎犬奔去，不必催促脚步；狄安娜将凭它们的价值认出猎犬……”］在这里，符号与存在被奇妙地分开，并向我们展示，当二者对立时究竟哪一个占据上风。一个足够“男人”的男人，竟敢以

蔑视挑战女人令人畏惧的怒火；如今，他遭受自己从她那里夺走的符号之诅咒，直至发生变形。

因为，这个符号确实是女人的符号：她借它使自己的存在生效，把这种存在奠立于法律之外；而起源的效应始终把她容纳在法律之中，使她处在能指、乃至恋物的位置。为了配得上这个符号的力量，她只须静止不动地待在它的阴影里；她还会像王后那样，在那里找到一种以无为来掌控的模拟，只有大臣“鹰隼般锐利的眼睛”能够看穿。于是，这个符号一旦被抢走，男人便落入它的占有：

- 这种占有带来灾祸，因为它只能以它所挑战的荣誉为支撑；
- 它受到诅咒，因为它把支撑它的人召向惩罚或犯罪，而两者都会打破他对法律的臣属关系。

这个符号中必定有一种极其独异的 noli me tangere（不要碰我），以至于占有它会像苏格拉底的电鳐[注24]一样麻痹它的男人，使他落入一种在他身上被毫不含糊地揭示为不行动的状态。因为，叙述者早在第一次谈话中就指出，一旦使用这封信，它的力量便会消散；由此我们发现，这条评论恰恰只针对把信用于权力目的，而同时，这种使用对大臣而言又成了一种强制。

> [注24] 参见柏拉图：《美诺篇》，80a，七星文库版第 1 卷，第 527 页。

大臣无法摆脱信，必定是因为他不知道还能拿它做什么。因为，这种使用使他如此彻底地依赖信本身，以至于久而久之，这种使用甚至不

再涉及信。我们的意思是：要使这种使用真正涉及信，大臣毕竟可以凭自己为其主人国王服务的身份获得授权——

- 他可以恭敬地劝谏王后，哪怕需要以适当保证来确保劝谏产生反馈效果；
- 或者对信件作者采取某种行动；此人一直处在游戏之外，恰好表明这里几乎不涉及罪责与过错，而涉及信所构成的抵牾与丑闻之符号——正如《福音书》所说，它必定会到来，而不顾成为其承载者的人将遭受何等不幸；
- 乃至把已经成为卷宗证物的信提交给“第三个人物”，由后者裁定是由它给王后带来特别法庭，还是给大臣带来失宠。

我们不会知道大臣为何不以其中任何一种方式使用信，而且我们理应不知道，因为令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种不使用的效应。只须知道，大臣取得信的方式不会妨碍其中任何一种使用，这就够了。

因为很清楚，如果对信作非意指性的使用是大臣所受的强制，那么把它用于权力目的就只能是一种潜在使用；大臣无法把它付诸行动而不

使这种使用立刻消失，因为信之所以能作为权力手段存在，只凭纯粹能指所作的最终指派，即：

- 延长信的迂回，通过一次额外中转把它送给应当收到的人；也就是说，再进行一次背叛，而信的严重性使人难以预防这次背叛的反噬；

- 或者摧毁这封信；这是唯一稳妥的方式，杜宾也正因如此从一开始就提出它，

以便了结某种依其本性注定要意指其所意指之物被取消的东西。

因此，大臣从情势中取得的支配力并不系于信，而系于信为他构成的那个人物——不论他是否知道。局长的话也确实把他呈现为一个什么都敢做的人："who dares all things"，随后意味深长地补充："those unbecoming as well as those becoming a man。"这句话的意思是："既包括不配一个男人做的事，也包括配一个男人做的事"；波德莱尔把它译为"既包括有失男人身份的事，也包括与他身份相称的事"，却漏掉了其中的锋芒。因为在原来的形式中，这一评语更适合"同一个女人有关的事情"。这让那个人物的想象性范围显露出来，也就是大臣卷入的自恋关系——这一回他肯定毫不知情。英语原文第二页里，叙述者一条形式颇有滋味的评论也标示了这一点：

"他告诉我们，大臣取得的支配力，取决于掠夺者知道受害者知道自己的掠夺者。"原文是："the robber's knowledge of the loser's knowledge of the robber。"

作者在叙述信件被夺的场景之后，让杜宾立刻逐字重复这些词，从而强调它们的重要性。这里也可以说，波德莱尔的表达有所漂移：他让一人以这些话发问，让另一人以这些话确认：

- “窃贼是否知道……”继而，
- “窃贼知道”——知道什么？——“被窃者认识窃贼”。

因为，对窃贼而言，重要的不只是在说的那个人知道是谁偷了她，而是她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是怎样一个窃贼；也就是，她相信他“什么都做得出来”。对此应当这样理解：她把一个位置赋予他，而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胜任这个位置，因为它是想象的——绝对主人的位置。

事实上，这是一个绝对软弱的位置，只是被迫相信它的人看不出来。证据并不只在于王后竟敢求助于警方。因为，她只是顺应自己在起初三元组的行列中移动一格，把希望寄托在占据这一位置所必需的那种盲目之上：

“我想，再也不可能要求、甚至想象出更加睿智的办事者了。”杜宾讥讽道。

不，如果她跨出这一步，与其说是因为像故事所说那样“被逼入绝望”[driven to despair]，不如说是由于承担了一种更应归于镜像幻象的焦躁。因为，大臣为了把自己维持在此刻分配给他的不行动之中，已经颇费周章。

事实上，大臣并不完全疯狂。这又是局长的一句评论，而局长总是“一字千金”：诚然，他话语的金子只流向杜宾，而且要一直流到他按当时

金价付足五万法郎才停止，即便这笔钱应该还会给他留下一笔收益余额。所以，大臣在这种疯狂的停滞中并不完全疯狂，因而必须以神经症的方式行事：

- 就像那个退居孤岛只为忘记某事的人——忘记什么？——他忘了……

- 同样，大臣由于不使用这封信，最终把它忘记。

他行为的持久性表达了这一点。但是，这封信同神经症患者的无意识一样，并没有忘记他。它非但没有忘记他，反而越来越把他转化成那个当初意外把信交到他眼前的女人的形象；现在，他将仿照她的样子，向一次类似的意外屈服。

这种转化的特征已被记录下来，而且它们看似无缘无故的形式如此典型，完全可以同被压抑者的回返并置。首先，我们得知，他也把信翻转过来；这当然不同于王后的匆忙动作，而更加用心，就像把一件衣服翻到里层。事实上，按照当时折叠并封缄信件的方式，他必须这样做，才能露出一块空白处，写上新的地址。[注25] 这个地址成了他自己的地址。无论出自他还是别人之手，它都呈现为一种极纤细的女性笔迹；火漆从激情的红色变成镜影的黑色，而他在上面盖下自己的印章。

> [注25] 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用一封同时涉及夏多布里昂先生及其寻找秘书的同时代信件，向听众作现场演示。有趣的是，1841 年 11 月——《失窃的信》恰在这个月刊载于 Chamber's Journal——夏多布里昂先生也为不久前复原的第一版《墓外回忆录》写下句点。他献身于自己所非议的权力，而这种献身又给其人格带来荣誉（当时还没有发明"天赋"这种说法）；那么，按照我们稍后看到大臣所受的裁断，他会因此被归入有原则还是没有原则的天才？

一封“盖有收件人印章的信”，这种独异构想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是因为原文虽强烈表述了它，杜宾随后讨论如何识别信件时却甚至没有再提。无论这项遗漏有意还是无意，对于一件安排得如此精细严密的创作来说，它都令人惊讶。但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意味深长：大臣归根结底寄给自己的信，竟是一封女人的信；仿佛这是一个阶段，他必须经过能指的一种自然适配。因此……

- 那股漫不经心的气息，甚至故意装出柔弱的外观，
- 言谈中展示出来的倦怠，近乎厌恶，
- 还有《家具哲学》[注26]的作者善于用几乎难以捉摸的点染——例如桌上的乐器——唤起的那种氛围，……一切都像经过共同编排，为的是让这个在所有话语中始终被阳刚特征环绕的人物，在出场时散发出一种极其独异的 odor di femina（女人气息）。这是一种伪装，杜宾确实不忘强调这一点：他告诉我们，这层伪劣外观背后，是一头随时准备扑出的猛兽的警觉。

> [注26] 埃德加·坡确实写过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参见《家具哲学》，收入《怪诞与严肃的故事》。

然而，如果这恰恰是无意识的效应——严格按我们的教导，无意识就是人被能指居住——还能找到比坡本人为了让我们理解杜宾的壮举而塑造的意象更美的吗？他为此借用了那些地名：一张地图为了不做哑巴，会把地名叠印在图形上；人们还可以拿它们来做猜谜游戏，看谁能找到伙伴选定的那个词。于是可以发现，最能令新手迷失的，是那个用巨大而疏朗的字母横跨地图、标示整个国家的名称，因为目光往往甚至不会停在它上面。

杜宾走进大臣的书房时，失窃的信就像一个硕大的女人身体，横陈在房间的空间之中。但他早已料到会在那里找到这种形态，只须用藏在绿色眼镜后的眼睛脱去这个巨大身体的衣服。因此，他甚至无需——也确有理由无需——有机会去弗洛伊德教授门外偷听，便会径直走向这个身体生来要隐藏的东西躺卧、栖居之处：某个让目光滑入的美妙中央，乃至诱惑者所谓“圣天使堡”的地方；他们天真地幻想，从那里便可以掌握整座城。

看！就在壁炉的两条腿柱之间，对象触手可及，掠夺者只须伸手……至于他究竟是在壁炉台上抓到它——如波德莱尔所译——还是在壁炉台下抓到它——如原文所写——完全可以毫无损失地交给厨房推论去裁决。

如果符号效力到这里就停止，难道符号债务也会在此熄灭吗？假如我们可能相信这一点，两个情节会向我们发出相反的警告；它们乍看之下越同作品格格不入，就越不能被视为枝节。首先是杜宾报酬的故事。它远非结尾处的游戏，开头已经预告了它：杜宾颇为漫不经心地询问局长，许给他的赏金有多少；局长虽然不肯透露确数，却丝毫不打算掩饰它的巨大，后来甚至又谈到赏金有所增加。

杜宾先前被描写成一个躲入以太的穷困者，这一事实更会促使我们思考他交付信件时所作的交易，而他拿出的支票簿利落地保证交易执行。我们认为，他用来毫不含糊地给出暗示的那则故事不可忽略。波德莱尔说，这是一则“归于一位既著名又古怪的人物的故事”，主角是名叫阿伯内西的英国医生：一个富有的吝啬鬼想从他那里套取免费诊疗，却被告知，与其服药，不如听取医嘱——而医嘱要付费。

如果杜宾或许是在设法让自己退出信的符号回路，我们认为自己理应受到牵涉，不是吗？因为，我们使自己成为一切失窃之信的信使，而这些信至少有一段时间会在转移中滞留在我们这里。那些信的转移所包含的责任，难道不是被我们中和了吗？我们把它等同于对一切意义最具消灭作用的能指——金钱。不过，事情不止于此。杜宾如此轻快地从壮举中取得利益，若是为了让自己脱身出局，那么，他突然针对大臣发起的攻击——不妨说那记暗算——便更显悖谬、甚至骇人；毕竟，他刚刚施展的戏法似乎已经充分戳破大臣傲慢的威望。

我们已经说过那两行残酷的诗。杜宾断言，自己忍不住要把它题在仿制信里，献给大臣；当王后那些必然到来的挑战使大臣怒不可遏时，他会以为自己能够击倒她，却一头冲进深渊。杜宾判词般说道：facilis descensus Averni（下阿维尔努斯地狱很容易）[注27]；他又补充，大臣必然会认出他的笔迹。以一个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的人物为目标，如此毫无风险地留下毫不留情的羞辱，看起来正是一场不光彩的胜利［参见高乃依《熙德》第二幕第二场：“没有危险的胜利，没有光荣”］。他又援引自己在维也纳遭受的一次恶劣对待来解释怨恨（是在会议上吗？），这只给整件事再添一层阴暗。

> [注27] 维吉尔原句为：“Tros Anchisiade, facilis descensus Averno”（特洛伊人、安喀塞斯之子啊，下到地狱之门很容易），见《埃涅阿斯纪》第六卷第 125 行。

不过，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这次激情爆发，尤其考察它在一项需要极度冷静才能成功的行动中出现的时刻。它紧接在识别信件的决定性行动完成之后；可以说，杜宾此时已经握有那封信，就像已经把它拿到手一样，却还不能摆脱它。

因此，他确实参与了主体间三元组，并且处在此前由王后和大臣占据的中间位置。他若表现出优于他们，是否也会同时向我们揭示作者的意图？即使他成功地让信重回正途，仍须把它送达地址。这个地址位于国王先前占据的位置，因为信应当在那里重返法律的秩序。我们已经看到，国王以及接替他占据此位的警察，都无法阅读这封信，因为这个位置包含着盲目。Rex et augur（王与占卜者）[注28]——这些词传说般古老的回声，似乎只是为了让我们感到，召唤一个人来占据那里何其可笑。何况，历史人物久已不能给我们多少鼓舞。让一个人独自承担最高能指的重量，并不符合人的本性；他披上这个能指时所占据的位置，同样很容易成为最巨大愚蠢的符号。[注29]

[注28] 对罗马人而言，国王是 rex augur，同时拥有政治与祭司职权。

[注29] 人们还记得一副机智对句；据说，在最近一位赴威尼斯加入老实人候会、而后来又倒台的君主倒台前，它已被归于他："今日世上只剩五位国王：纸牌里的四王，以及英格兰国王。"（埃及国王法鲁克之语；他于 1952 年被纳赛尔推翻。）

不妨说，由于神圣者天然具有双义性，国王在这里被恰恰属于主体的愚蠢所授职。这将赋予后来接替他位置的人物以意义。并不是说警方在体制上可以被视为文盲；我们知道，插在 campus 上的长矛在国家诞生中发挥过何种作用。[注30] 但在这里履行职能的警方完全带有自由主义形式的印记；这些形式是主人强加给它的，因为主人不愿承担其窥私倾向。因此，故事在谈到为警方保留的职权时，并不吝于把话说得直白：

[注30] 参见埃莱娜·莱厄耶：《警察的谱系》，载 Culture et Conflits 第 48 期，2002 年冬季号。

“Sutor ne ultra crepidam（鞋匠莫管鞋楦之外），管好你们的窃贼。我们甚至会为此给你们科学手段。这样，你们就不会去思考那些最好留在阴影里的真理。”[注31]

> [注31] 一位尊贵的勋爵曾在上议院——其爵位为他规定的席位——以明确措辞承认过这番话。

众所周知，如此明智的原则所带来的宽慰，在历史上只维持了一个早晨。命运的进程已经从各处带回一种对扰乱自由统治者的兴趣——这是人们对自由统治的正当向往所造成的后果；这种兴趣甚至走到有时为他们的罪行伪造证据的地步。

甚至可以看到，这种一向广受欢迎的实践——因为它从来只“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施行——如今竟由本可提出异议的人亲自公开承认自己的伪造，从而获得认证：这是能指优先于主体的最新表现。尽管如此，警察卷宗始终受到某种保留对待；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保留竟远远超出历史学家的圈子。

杜宾打算把信交给警察局长，正会把它的效力范围缩减到这种正在消散的信用。能指已经卸下给王后的讯息；如今，它刚离开大臣之手，其文本便又失效。那么，能指还剩下什么？

它恰好只剩下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当一个能指不再有意义时，它还剩下什么？

而这也正是那个人向它提出的问题；杜宾如今在由盲目标记的位置重新遇见此人。如果大臣果真是故事所说的玩家——他的行动已经充分揭示了这一点——那么，确实是这个问题把他带到那里。因为，赌徒

的激情无非是向能指提出这个问题；偶然的 αὐτόματον［automaton，自动发生］使它取得形象。

> “你是什么？我翻动的骰子之形象；在你同我的运气相遇（τύχη［tychē，相遇］）[注32]之际，我翻转你。你什么也不是，只是死亡的这次临场；它以你的符号所牧引的意义之名，使人的生命成为日复一日取得的缓刑。
>
> 山鲁佐德在一千零一夜间如此行事；十八个月来，我也如此，以猜单双游戏中令人眩晕的一连串作弊局为代价，检验这个符号的支配力。”

[注32]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对偶然所作的概念分析中，把 τύχη［tychē，相遇］与 αὐτόματον［automaton，自动发生］作了根本对立；这里重新唤起了这两个词。若不忽略这一点，许多争论都会得到澄清。

于是，杜宾处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对这样发问的人，无法不体验到一种性质显然女性化的暴怒。那幅崇高形象原本把诗人的创造、数学家的严密、纨绔子的冷静和骗子的优雅结合起来；然而，对那个亲自让我们品味这一形象的人来说，它突然变成真正的 monstrum horrendum（可怖怪物）——这是他自己的话——“一个没有原则的天才”。

这种恐惧的起源在这里签下印记。体验恐惧的人根本不必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宣称自己“站在女士一边”，就能向我们揭示它：众所周知，女士们厌恶有人质疑原则，因为她们的魅力多半有赖于能指的神秘。

因此，杜宾最后会向我们转过这个能指具有美杜莎效力的正面；除了王后，没有人能读到的只是它的背面。引用的陈词滥调很适合这个正面以怪相承载的神谕；它取自悲剧也同样合适：

……如此致命的命运，

若配不上阿特柔斯，倒配得上梯厄斯忒斯。

这就是能指在一切意义之外的回答：

> “你以为自己在行动，其实是我依照把你的欲望打结的纽带来摇动你。
>
> 因此，这些欲望的力量不断增长，对象不断增殖，把你带回你那撕裂童年的碎裂状态。
>
> 好吧，这就是你的盛宴，直到那位石像宾客归来；既然你召唤我，我对你就将是那位石像宾客。”

为了恢复一种比较节制的语调，不妨依照一则恶作剧来说。去年，你们当中有些人随我们参加苏黎世会议；我们用这则恶作剧向当地口令致敬：能指对询问它的人所作的回答是“Mange ton Dasein”——“吃掉你的此在”。

大臣在一场命定约会中等待的就是这个吗？杜宾向我们保证如此；但我们也已经学会，不要过于轻信他的调虎离山。这个大胆之人无疑已经被还原为愚蠢的盲目状态；人在规定其命运的墙上文字面前，正处于这种状态［ופרסין ,תקל ,מנא ,מנא：Mene, Mene, Tekel u-Pharsin］。



然而，仅凭王后的挑衅，对这样一个男人能产生什么效应，把他召向这些文字？爱或恨。

- 前者是盲目的，会使他缴械。
- 后者清醒，却会唤起他的怀疑。

但如果他真是故事所说的玩家，在摊牌之前，他会最后一次询问自己的牌；从中读出牌局后，他会及时离桌，避免耻辱。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吗？我们是否应当相信，越过那些杜宾不得不用来欺骗我们的想象伎俩，我们已经破译了他的真正策略？

无疑是的。因为，如果像杜宾开头宣称的那样，“一切需要思考的要点，在黑暗中最适合接受考察”，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轻易读出答案。

答案早已包含在小说标题中，可以轻易提取出来；它也符合我们很久以来交给你们斟酌的主体间沟通公式：我们告诉你们，发送者从接收者那里以颠倒形式收到自己的讯息。

因此，“失窃的信”，乃至“滞留待领的信”所意指的是：一封信总会抵达它的目的地。

相关知识卡 坡的《失窃的信》

埃德加·爱伦·坡：《失窃的信》 [返回正文]
Nil sapientiæ odiosius acumine nimio.
没有什么比过度的机敏更令智慧厌恶。

塞涅卡

十八……年，我在巴黎。一个阴沉而暴风雨肆虐的秋夜，我同朋友杜宾一起，在他位于圣日耳曼郊区迪诺街三十三号四楼的小图书室兼书房里，享受沉思与海泡石烟斗带来的双重愉悦。整整一个小时，我们保持沉默；随便哪个旁观者都会以为，我们两人都全神贯注于房间里缭绕盘旋的烟雾。至于我，我正在心中讨论当晚早些时候谈过的几个问题；我指的是莫格街案件，以及玛丽·罗杰遇害之谜。我正想着两案之间某种类似之处，房门忽然打开，我们的老相识、巴黎警察局长G……先生走了进来。我们热情欢迎他，因为这个人既有讨人喜欢的一面，也有令人鄙夷的一面，而我们已有好几年没见过他了。我们原本坐在黑暗中，杜宾起身要点灯；但听见 G……说他是来找我们商量

——更准确地说，是想就一件令他万分困窘的案子征求我朋友的意见——杜宾又坐下，没有点灯。

“如果这个案子需要思考，”杜宾一边说，一边没有点燃灯芯，“那我们在黑暗中考察它会更合适。”

“这又是你的一种古怪想法。”局长说。他惯于把一切超出自己理解的东西叫作古怪，因此生活在一支庞大的古怪事物军团之中。

“说得确实没错！”杜宾一面递给客人一只烟斗，一面把一张上好的扶手椅推向他。

“那么，到底是什么棘手案件？”我问，“但愿别又是谋杀案一类。”

“哦，不，完全不是。事实上，案子真的非常简单；我毫不怀疑，我们自己就能把它处理得很好。不过，我想杜宾不会不愿听听细节，因为它实在古怪得过分。”

“既简单又古怪。”杜宾说。

“是的；不过这个说法也不准确。你愿意的话，可以说简单或古怪。事实是，我们那边所有人都被这个案子难住了；它虽极其简单，却让我们彻底找不到方向。”

“也许正是事情的简单使你们误入歧途。”我的朋友说。

“这叫什么胡话！”局长开怀大笑着答道。

“也许这个谜有点过于清楚。”杜宾说。

“天哪！谁听说过这种想法？”

“有点过于明显。”

“哈！哈！哈！哈！哦！哦！”客人大叫起来，乐不可支，“杜宾啊，你真要把我笑死了。”

“那么，”我问，“究竟是什么事情？”

“好吧，我告诉你们。”局长吐出一口又长、又浓、仿佛若有所思的烟，在扶手椅里安顿下来，“我用几句话就说清。不过，开始之前我要警告你们，这件案子需要最高程度的保密；要是别人知道我把它透露给任何人，我十有八九会丢掉现在的职位。”

“请开始。”我说。

“或者别开始。”杜宾说。

“好，我开始。有人亲自从极高层通知我，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从王室内室被拿走了。偷窃者是谁，大家都知道，毫无疑问；有人亲眼看见他拿走文件。我们也知道文件仍在他手里。”

“怎么知道？”杜宾问。

“这可以从文件的性质，以及某些结果尚未出现这一点清楚推断出来；一旦文件脱离窃贼之手——换言之，一旦它被用于他显然意图达到的目的——那些结果就会立刻出现。”

“请说得再清楚一点。”我说。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们，这张纸赋予持有者在某个场所中的某种权力，而这项权力在那里价值无可估量。”局长酷爱外交辞令。

“我还是一点也不明白。”杜宾说。

“真的一点也不懂？好吧！如果把这份文件公开给第三个人物——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一位最高贵人物的荣誉就会受到质疑；这正是文件持有者能够支配那位荣誉和安全由此受到威胁的显赫人物的原因。”

“可是，”我打断他说，“这种支配力取决于一点：窃贼是否知道被窃者认识自己的窃贼？谁敢……”

“窃贼，”G……说，“是　　D……大臣；他既敢做一切有失男人身份的事，也敢做一切符合男人身份的事。偷窃的方法既机敏又大胆。说穿了，那份文件是一封信。被窃者独自在王室内室时收到它。她正在读信，那个她格外想对其隐瞒此信的显赫人物突然走了进来，打断了她。她试图迅速把信扔进抽屉，却没能做到，只得让它敞开留在桌上。不过，信被翻转过来，地址朝上，内容由此隐藏，没有引起注意。正在这时，D……大臣来了。他鹰隼般锐利的眼睛立刻看见那张纸，认出地址的笔迹，注意到收件人的窘迫，并识破她的秘密。他以惯常方式雷厉风行地处理了几件事务，继而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同那封信颇为相似的信，打开来佯装阅读，再把它放到原信旁边。他又谈了约一刻钟的公共事务，终于告辞，并把手放到那封自己毫无权利取得的信上。被窃者看见了；但第三个人物就在她身边，她自然不敢让人注意这件事。大臣扬长而去，把自己的信留在桌上；那是一封无关紧要的信。”

“那么，”杜宾半转向我说，“使支配力变得完整所需的条件恰好具备了：窃贼知道被窃者认识自己的窃贼。”

“是的，”局长答道，“近几个月来，他为了政治目的广泛运用凭这一诡计取得的支配权，甚至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被窃者一天比一天更加

确信，必须拿回自己的信。但这当然不能公开进行。她终于被逼入绝望，把任务交给了我。”

“我想，”杜宾在一圈烟雾中说道，“不可能挑选、甚至想象出比你更加睿智的办事者了。”

“你过奖了，”局长答道，“不过他们很可能确实对我有这种看法。”

“正如你已经指出的，”我说，“信显然还在大臣手里；因为造成支配力的是占有信，而不是使用信。一旦使用，支配力便会消失。”

“没错，”G……说，“我正是依据这个确信采取行动。第一件事就是细致搜查大臣的宅邸；主要困难在于必须瞒着他搜查。最重要的是，我时时提防，不能让他有理由怀疑我们的意图。”

“可是，”我说，“你对这类调查驾轻就熟。巴黎警方做过不止一次。”

“哦，当然；所以我原本很有信心。何况，大臣的生活习惯给了我巨大便利。他经常整夜不在家。仆人不多，睡处离主人房间有一段距离；而且他们毕竟都是那不勒斯人，很乐意让别人把自己灌醉。你们知道，我有一套钥匙，能打开巴黎所有房间和书房。三个月来，没有一个夜晚不是由我亲自用掉大半夜去搜查　D……宅邸。我的荣誉系于此事；而且，再告诉你们一个大秘密，赏金极其丰厚。所以，直到我完全确信这个窃贼甚至比我更精明时，我才停止搜查。我相信，房子里每一个可能藏下纸张的角落和缝隙，我都已经仔细查过。”

“可是，”我试探着说，“信虽无疑在大臣掌握中，他会不会把它藏在自家以外的地方？”

“几乎不可能。”杜宾说，“宫廷事务眼下的特殊情势，尤其是众所周知D……已经卷入的阴谋性质，使文件的即时效力——随时能够拿出文件——几乎同占有文件本身一样重要。”

“能够拿出来？”我说。

“或者，你愿意的话，能够摧毁它。”杜宾说。

“没错。”我指出，“那么，这张纸显然在宅邸里。至于随身带在大臣身上的可能，我们认为完全不必考虑。”

“绝对不必。”局长说，“我曾两次安排假窃贼把他截住，并在自己眼前对他全身作了严密搜查。”

“你本可以省去这番麻烦。”杜宾说，“我想，D……并不完全疯狂；既然如此，他必定早把这些圈套当作理所当然之事料到了。”

“确实不完全疯狂，”G……说，“不过他是个诗人，我认为这同疯狂也相去不远。”

“不错，”杜宾若有所思地久久吐着海泡石烟斗的烟说，“尽管我自己也曾犯过写某种狂想诗的罪。”

“说吧，”我说，“把你们搜查的准确细节讲给我们听。”

“事实是，我们不慌不忙，搜遍了一切地方。我处理这类事情经验丰富。我们一间一间搜查整座房子，每间房都用去整整一周的夜晚。首先检查各室家具。凡是可能存在的抽屉，我们全部打开；我想你们不会不知道，对训练有素的警员来说，暗屉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在这种搜查中放过一个暗屉的人，就是畜生。这项工作太容易了！每件家具都有一定数量、可以计算的体积和表面。我们有精确的规尺；五十

分之一线的尺度也逃不过我们。检查完房间，我们转向座椅。软垫用你们见我用过的那种细长探针刺探。桌面也拆了下来。”

“为什么拆桌面？”

“有时，想藏东西的人会拆下一张桌子或类似家具的面板，把桌脚挖空，将物品放入空腔，再把面板装回去。床柱也用同样方法。”

“难道不能通过敲听发现空腔？”我问。

“一点也不能，只要放东西时小心用足量棉絮把它包住。况且，我们这次必须悄无声息地行动。”

“可是你们不可能拆开——不可能拆卸每一件可能按你所说方式藏东西的家具。一封信可以卷成极细的螺旋，形状与体积都很像一根粗毛衣针，比如可以塞进椅子的木杆里。你们把所有椅子都拆了吗？”

“当然没有，但我们做得更好。我们用高倍显微镜检查了宅邸中所有椅子的木杆，甚至所有家具部件的接缝。只要有一丝近期动过的痕迹，我们必定当场发现。例如，钻头留下的一粒灰尘，在我们眼中会像苹果一样醒目。胶水只要有最轻微的变化，接缝只要张开一条缝，就足以暴露藏处。”

“我想，你们也检查了镜面和背板之间，还搜过床铺、床帷、窗帘与地毯。”

“当然。彻底检查完此类所有物品后，我们又检查房屋本身。我们把全部表面划分成编号区域，以确保一个也不遗漏；每一平方英寸都再次用显微镜检查，还包括两栋相邻房屋。”

“两栋相邻房屋！”我叫道，“你们一定费了很大功夫。”

“确实如此！但赏金极高。”

“检查房屋也包括地面吗？”

“地面处处铺砖，相较之下没有花费太多功夫。我们检查砖缝里的苔藓，全都完好无损。”

“你们当然也查过 D……的文件和图书室里的书。”

“当然。每一包、每一件都打开。我们不只把书打开，还一页一页地翻过，不像我们有些警员那样只抖一抖。我们还极其精确地测量每册书的装帧厚度，并以显微镜猜疑般的好奇审视它。如果最近有什么塞进书脊，绝对不可能逃过我们的观察。五六册刚从装订工手里拿回的书，我们还用探针沿纵向仔细刺探。”

“地毯下面的地板查了吗？”

“当然。每张地毯都揭开，用显微镜检查木板。”

“墙纸呢？”

“也查了。”

“地窖呢？”

“地窖也查了。”

“那么，”我说，“你们走错方向了，信并不像你们设想的那样在宅邸里。”

“恐怕你说得对。”局长说。

“那么现在，杜宾，你建议我怎么办？”

“进行一次彻底搜查。”

“完全没有用！”G……答道，“就像我活着这件事一样确定，那封信不在宅邸里！”

“我没有更好的建议。”杜宾说，“你们当然有信件的准确特征描述吧？”

“哦，当然！”局长随即掏出记事本，开始高声给我们读那份遗失文件的细致描述，包括内部、尤其外部的样子。读完不久，这位好先生便告辞了；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沮丧，精神如此彻底受挫。大约一个月后，他第二次来访，发现我们仍在做着同上次差不多的事。他拿起一只烟斗和一张椅子，闲谈起各种事情。

最后，我问他：“那么，G……，你那封失窃的信怎么样了？我想，你终于不得不承认，要压倒大臣可不是一件小事吧？”

“让魔鬼把他带走！不过，我确实依照杜宾的建议重新搜查了一遍；可正如我料到的，白费力气。”

“你刚才说，赏金有多少？”杜宾问。

“这个嘛……非常高……确实是一笔了不得的赏金。我不想告诉你们准确数字；但有一件事可以说：谁能替我找到这封信，我愿意自掏腰包付他五万法郎。事实是，事情一天比一天紧迫，赏金不久前已经加倍。可是，即使再加到三倍，我也不可能比现在更加尽职。”

“但是……嗯……”杜宾在一口口烟雾间拖长声音说道，“我确实认为……G……你还没有……尽到全力……你没有把问题追究到底。我想，你还能……多做一点，是吧？”

“怎么做？从哪个方面？”

“嗯……”一口烟，“你可以……”又接连几口烟，“在这件事上……听取医嘱，是吧？”又是三口烟，“你记得阿伯内西的故事吗？”

“不记得！让你的阿伯内西见鬼去吧！”

“当然！你高兴的话，就让他见鬼。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个非常吝啬的富人想从阿伯内西那里套取一次免费诊疗。他在一群人中间同医生闲谈，话里暗暗把自己的病情说成某个虚构人物的病例。‘假设症状是这样这样，’吝啬鬼说，‘那么医生，你会建议他服用什么？’‘服用什么？’阿伯内西说，‘当然是听取医嘱。’”

“可是，”局长有些窘迫地说，“我完全愿意听取医嘱，也愿意付钱。我真的会给任何能让我摆脱困境的人五万法郎。”

“既然如此，”杜宾答道。他打开抽屉，取出一本支票簿，“你不妨按刚才说的数额给我开一张支票。你签好之后，我就把信交给你。”

我惊呆了。至于局长，他仿佛彻底遭了雷击。好几分钟里，他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张着嘴，以难以置信的神色瞪着我的朋友，两眼几乎要从眼眶里凸出来。最后，他似乎略微清醒，抓起一支笔；经过片刻犹豫，仍带着空洞而错愕的目光，填好并签下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越过桌面递给杜宾。杜宾仔细检查，把支票收进皮夹；接着打开一张书桌，从里面取出一封信，交给局长。我们的官员在一种狂喜的痛苦中一把抓过信，用颤抖的手打开，扫了一眼内容，随即冲向房门，毫不客气地奔出房间和宅子；从杜宾请他填写支票起，他连一个音节也没说过。

他走后，我的朋友作了几点说明。

“巴黎警方非常精通本行，”他说，“警员们坚持不懈、机敏、狡猾，彻底掌握了职务特别需要的一切知识。所以，当 G……向我们详述搜查D……宅邸的方法时，我完全信任他的能力，确信他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进行了充分的调查。”

“在他的专业范围内？”我问。

“是的，”杜宾说，“他们采用的措施不仅是这一类措施中最好的，而且执行得臻于绝对完善。如果信藏在调查范围内，这些家伙必定会找到；我对此连一丝怀疑也没有。”

我只是笑了笑，但杜宾说这话时似乎非常认真。

“所以，”他继续说，“这些措施就其类型而言很好，执行得也令人赞叹；缺陷在于，它们不适用于这个案件，也不适用于这个人。局长手里有整套极其机巧的方法，却把它们当作一张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强迫所有方案适应并捆缚在上面。面对具体案件，他总是要么钻得太深，要么停得太浅；不止一个小学生都比他更会推理。我认识一个八岁的孩子，他猜单双从不失手，受到所有人赞叹。这个游戏很简单，用弹珠来玩。一名玩家在手里握若干弹珠，问另一名：‘单数还是双数？’猜中就赢一颗，猜错就输一颗。我说的孩子赢走了全校所有弹珠。他当然有一种猜测方法，只不过是观察并衡量对手的精明程度。假设对手是个十足的傻瓜，举起攥紧的手问：‘单数还是双数？’我们的学生答‘单数’，结果输了。但第二局他会赢，因为他心里会说：‘这个傻瓜第一局放的是双数，他的全部计谋只够让他第二局改成单数；所以我猜单数。’他猜单数，于是赢了。

“现在，换一个没有那么傻的对手，他会这样推理：‘这个家伙发现我第一局猜单数；第二局时，他的第一个念头会是像前一个傻瓜那样，简

单地从双数改成单数。但第二个念头会告诉他，这种变化太简单，于是他最终会决定仍像第一局那样放双数。所以，我猜双数。’他猜双数，于是赢了。现在，我们这个学生的同伴把这种推理方式叫作运气；归根结底，它究竟是什么？”

“只不过是推理者的智力认同于对手的智力。”我说。

“正是。”杜宾说，“我问这个小男孩，他用什么办法完成那种构成其全部成功的完美认同，他这样答道：‘当我想知道一个人有多谨慎或多愚蠢、多善良或多邪恶，或者他此刻在想什么时，我会尽可能准确地照着他的表情来调整自己的脸，然后等待，看我的头脑或内心会产生哪些思想或感受，仿佛它们会同我的表情配对、相互对应。’这个学生的回答，远远超出了人们归于拉罗什富科、拉布吕耶尔、马基雅维利和康帕内拉的一切诡辩式深刻。”

“如果我理解得没错，”我说，“推理者的智力能否认同于对手的智力，取决于他衡量对手智力时是否准确。”

“就实用价值而言，确实取决于此。”杜宾答道，“局长和他的整帮人如此频繁地出错，首先是因为缺少这种认同，其次是因为没有准确衡量——更确切说，根本没有衡量——与他们交锋的智力。他们只看见自己那些机巧观念；寻找隐藏之物时，只想到自己会用什么方法隐藏它。在一点上他们非常正确：他们自己的机巧确实忠实代表了大众的机巧。但当某个罪犯的精明在性质上不同于他们时，这个罪犯自然会把他们耍得团团转。当罪犯的机敏高于他们时，事情必定如此；即使低于他们，也经常如此。他们从不改变调查原则；至多在某个罕见案件、某笔非凡赏金的刺激下，把老一套惯例夸大并推向极端，却丝毫不触及原则。例如，在　D……的案件中，他们做了什么来改变行动体

系？那些钻孔、挖掘、探测、显微镜检查，以及把表面划分为编号平方英寸的做法，究竟是什么？”

“这一切无非是把一种或数种调查原则的应用夸大；这些原则建立在关于人类机巧的一套观念之上，而局长在长期履职惯例中已经习惯了它们。你没看出吗？他把一件事视为已经证明：凡是想藏信的人，即使不恰好使用椅脚上的钻孔，至少也会使用某个偏僻的孔洞或角落；而这个构想同椅脚钻孔出自同一思路。你也没看出吗？这种刻意求奇的藏处只适合普通场合，也只有普通智力才会采用？因为，在所有藏匿情形中，把物品以这种刻意求奇的方式安置，从一开始就是可以预料并确实会被预料的。因此，发现它完全不取决于洞察力，只取决于搜查者的谨慎、耐心与决心。而当案件重大——或者在警方眼中与此等价：赏金丰厚——时，这些品质从来不会失效。

“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如果失窃的信藏在局长搜查所及的范围内——换言之，如果启发藏匿方法的原则包含在局长的原则之中——他必定会发现它。然而，这位官员彻底被迷惑了；他失败的首要而原初的原因，在于他因为大臣以诗人闻名，就假设大臣是个疯子。所有疯子都是诗人——局长这样认为——于是他从中推断所有诗人都是疯子，所犯的不过是中项分配不当的错误。”

“可是，他真的是那个诗人吗？”我问，“我知道他们兄弟二人，而且两人在文学界都享有声誉。我记得大臣写过一本非常出色的微积分著作。他是数学家，不是诗人。”

“你错了。我非常了解他；他既是诗人，也是数学家。作为诗人兼数学家，他必定推理正确；若只是数学家，他根本不会推理，因而早已任局长摆布。”

“这样的看法令我惊讶，”我说，“全世界的意见都反驳它。你总不至于要抹煞数百年成熟起来的观念。数学理性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首屈一指的理性。”

“可以打赌，”杜宾引用尚福尔的话答道，“一切公共观念、一切公认惯例都是蠢事，因为它们适合最大多数的人。我同意，数学家已经竭尽全力传播你所说的流行错误；但即使它被当作真理传播，仍然是一个十足的错误。例如，他们以本可用于更好事业的巧艺，让我们习惯于把‘分析’一词应用于代数运算。法国人最先犯下这种科学欺诈；不过，如果我们承认语言术语确有重要性——如果词语从应用中取得价值——那么好吧，我承认‘分析’能够表达‘代数’，差不多就像拉丁语 ambitus 表示野心、religio 表示宗教、homines honesti 表示一群体面人一样。”

“我看得出来，”我说，“你要同巴黎不少代数学家争吵了。不过，请继续。”

“我质疑一切由抽象逻辑之外的特殊训练方式培养出来的理性的有效性，进而质疑它的结果。尤其是，我质疑从数学研究中提取出来的推理。数学是形式与数量的科学；数学推理无非是应用于形式和数量的简单逻辑。最大的错误，在于假设所谓纯粹代数真理就是抽象或一般真理。这个错误如此巨大，我惊讶于人们竟如此一致地接受它。数学公理不是一般真理的公理。例如，在形式或数量关系上成立的东西，放到道德领域，往往是粗暴的谬误。在后一门学问中，部分之和等于整体经常是不成立的。化学中也是如此，这条公理会出错。评估动力时它也会出错；因为，两个各有一定力量的动因结合后，其力量并不必然等于二者分开时力量之和。还有许多其他数学真理，只在关系的界限内才是真理。”

“然而，数学家不可救药地从自己的有限真理出发论证，仿佛它们具有一般而绝对的应用范围——世人确实也赋予它们这种价值。布赖恩特在其杰出的《神话学》中提到过一种类似的错误来源。他说，虽然无人相信异教寓言，我们仍不断忘乎所以，像它们是活生生的现实那样从中推导结论。何况，我们的代数学家本身就是异教徒；他们相信某些异教寓言并由此得出结论，与其说是由于遗忘，不如说是由于一种莫名其妙的脑中混乱。简言之，我从未遇见一个在根式和方程之外仍值得信任的纯数学家，也从未认识一个不暗中把 $x^2 + px$ 绝对且无条件地等于 q 当作信条的人。你若觉得有趣，不妨试着告诉这些先生中的一位，你相信可能存在 $x^2 + px$ 并不绝对等于 q 的情形；等他听懂你的意思，就尽快跑到他够不着的地方，因为他肯定会试着把你打昏。”

“我的意思是，”杜宾继续说，我只是对他刚才的评论发笑，“如果大臣只是个数学家，局长就不必给我开这张支票。我知道他既是数学家也是诗人，因而根据他的能力，并考虑他所处的环境来安排措施。我也知道他是宫廷人物，是个大胆的阴谋家。我想，这样的人必然非常熟悉警方的惯常做法。他显然早已预见那些为他布置的伏击——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我断定，他也预见了宅邸中的秘密搜查。我们那位好局长把大臣频繁夜间外出视为未来成功的有力帮助；我却只把它们视为诡计：他有意让警方能够自由、彻底地搜查，从而更快使他们确信信不在宅邸里——G……最终果然得出这个结论。我还感觉到，我刚才颇费口舌向你详细说明的整套思路——关于警方搜查隐藏物品时一成不变的行动原则——必然也完整地经过了大臣的头脑。”

“这必然迫使他蔑视一切普通藏处。他不可能软弱到看不出：在局长的眼睛、探针、钻头和显微镜面前，宅邸里最复杂、最幽深的隐蔽处，同前厅或橱柜一样毫无秘密可言。最后，我看出，他必然会以简单为

目标——即使不是有意选择，也会被天然倾向引向它。你大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会面时，我说这个谜之所以如此难为局长，或许恰恰因为它绝对简单；局长当时笑得何等厉害。”

“记得，”我说，“我清楚记得他乐不可支。我真以为他会笑到抽搐。”

“物质世界，”杜宾继续说，“充满与非物质世界极其准确的类比；因此，修辞学那条教义才取得了几分真理色彩：隐喻或比较既能美化描述，也能加强论证。例如，惯性力的原则在物理与形而上两种性质中似乎完全相同。一个大物体比小物体更难启动，而它随后的动量同这种困难成比例；这一命题同下面的类比命题同样确实：容量巨大的心智一旦运动，虽比低级心智更有力、更持久，也更富事件，却最不容易启动，并且在开初几步中最受困于犹豫。再举一例：你有没有注意过，商店门上的哪些招牌最吸引目光？”

“我从没想过。”我说。

“有一种用地图玩的猜谜游戏，”杜宾接着说，“一名玩家请另一名从地图上找出指定词语——城市、河流、国家或帝国的名称，总之，是地图斑驳而纷乱的表面上任意一个词。新手通常会挑字迹极小的名称来为难对手；老手却会选择用大字从地图一端横贯到另一端的词。这样的词同街上字母过大的招牌和海报一样，恰恰因为过分明显而逃过观察。这里，物理上的视而不见，恰好类似心智在道德上的忽略：那些过于醒目、明显到陈腐而扰人的考虑，就这样未被察觉。不过，这一点似乎略高于或略低于局长的理解力。他从未认为，大臣为了最有效地防止世上任何人看见信，可能把它直接放在全世界的鼻子下面。”

“我越思考 D……那种大胆、鲜明而卓越的才智，越思考文件必须始终触手可及、以便在需要时立即使用这一事实，也越思考局长已经作出的决定性证明——文件不在常规而正规的搜查范围内——就越确信：大臣为了隐藏这封信，采用了世上最机敏、也最周全的方法，那就是根本不试图隐藏它。”

“带着这些想法，我戴好一副绿色眼镜，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仿佛偶然地来到大臣宅邸。我发现 D……在家，照常打呵欠、闲逛、磨蹭，声称自己被最极端的倦怠压垮。D……也许是当今真正精力最充沛的人，不过只有在确信无人看见时才如此。为了同他针锋相对，我抱怨自己视力衰弱，不得不戴眼镜；可我在镜片后仔细、全面地审视整间屋子，同时装作全心投入同主人的谈话。我特别留意他旁边那张大写字台；上面杂乱放着各类信件和其他纸张，还有一两件乐器和几本书。可是，经过长时间从容审视，我没有看见什么特别值得怀疑的东西。最后，目光绕房间一周，落到一个饰有廉价亮片的破旧名片夹上；它用一条肮脏的蓝丝带挂在壁炉台上方一个小铜钮上。名片夹有三四个格子，装着五六张名片和孤零零的一封信。这封信污损严重，皱成一团。”

“它从中间几乎撕成两半，仿佛最初有人想把它当作毫无价值的东西彻底撕碎，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信上有一枚很大的黑色火漆印，D……的花押极其醒目；收件人是大臣本人，地址用非常纤细的女性笔迹书写。它被随便、甚至看起来颇为轻蔑地塞进名片夹最上方的一个格子。”

“我刚瞥见这封信，便断定它就是自己寻找的那封。当然，外观上它同局长为我们读过细致描述的信完全不同。这一封有一枚带 D……花押

的硕大黑印；原信则是带 S……家族公爵纹章的小红印。这一封给大臣的地址字迹细小而女性化；原信写给一位王室人物的地址则笔触大胆、坚定、特征鲜明。两封信只有一点相同：尺寸。”

“但是，这些根本差异本身夸张到了极点；纸张肮脏、皱折、撕破的糟糕状态，同 D……真正有条不紊的习惯极不相称，显然意在以一份毫无价值的文件外观误导窥探者；再加上文件毫无防备地放在所有来客眼前，这恰好完全符合我先前的结论——我说，这一切对于一个抱定怀疑而来的人，都强烈证实了他的怀疑。我尽可能延长拜访时间，一边就一个我知道总能令大臣产生新鲜兴趣的问题同他热烈争论，一边始终把真实注意力钉在信上。我在观察中记住它的外观和在名片夹里的摆放方式；最后又有一项发现，消除了我可能仍有的一点疑虑。仔细审视纸张边缘时，我发现它们比正常情形磨损得更厉害。硬纸一旦折叠并用裁纸刀压过，再沿原来的折痕向反方向折回，就会呈现这种断裂外观。这项发现已经足够。我清楚知道，信像手套一样由里向外翻转过，又重新折叠、重新封缄。我向大臣道过早安，立即告辞，把一只金鼻烟盒留在他的写字台上。”

“第二天早晨，我回来取鼻烟盒，我们十分热烈地继续前一天的谈话。正在讨论时，宅邸窗下忽然传来一声巨响，仿佛手枪射击，继而是一群惊恐者的尖叫和呼喊。D……冲向窗户，推开窗向街上望。我同时径直走向名片夹，取下信，装进口袋，再用另一封信替换它。这是我在家中精心准备的一个外观仿制品；D……的花押则用面包心制成的印章［原文如此］轻易仿成。”

“街上的骚乱来自一个持枪男子的疯狂举动。他在人群密集的妇女和儿童中间开了一枪；但枪里没有弹丸，大家便把这家伙当作疯子或醉

汉，放他继续上路。他离开后，D……也从窗前退开；我确认珍贵的信已到手后，立刻跟到了窗边。”

“片刻之后，我向他告辞。那个所谓疯子是我花钱雇来的。”

“可是，”我问朋友，“你用仿制品替换原信，目的是什么？第一次拜访时直接把信拿走、不作其他安排便离开，岂不更加简单？”

“D……”杜宾答道，“什么都做得出来，而且身强力壮。宅邸里还有一群忠于他的仆人。如果我作出你说的莽撞尝试，就不可能活着离开；巴黎善良的民众也不会再听见我的消息。除了这些考虑，我还有一个特别目的。你知道我的政治同情。在这件事上，我站在那位女士一边。十八个月来，大臣一直把她掌握在手中；现在却是她掌握了他，因为他不知道信已不在自己那里，还会试图进行惯常的勒索。于是，他必定会亲手、一次就造成自己的政治毁灭。他的坠落会既迅速又可笑。人们总轻松谈论 facilis descensus Averni——下地狱容易；然而，谈到攀登，可以借用卡塔拉尼论歌唱的话：上去比下来容易。眼下，我对即将下坠的人没有任何同情，甚至没有怜悯。D……是真正的 monstrum horrendum——一个没有原则的天才。不过我承认，当局长所谓的某个人物向他提出挑战、迫使他打开我留在名片夹里的那封信时，我很愿意知道他确切会产生什么想法。”

“怎么？你在里面放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嗯！我觉得让里面一片空白不太合适——看起来像一种侮辱。有一回在维也纳，D……恶劣地摆了我一道；我当时用十分愉快的语气告诉他，我会记住。既然知道他会对究竟是谁捉弄了自己感到好奇，我便

觉得，不给他留下任何线索实在可惜。他非常熟悉我的笔迹，所以我在白纸正中央抄下了这些词：”

“……如此致命的图谋，
若配不上阿特柔斯，倒配得上梯厄斯忒斯。”

这句话见于克雷比永的《阿特柔斯》。[注33]

> [注33] 参见普罗斯佩·若利奥·德·克雷比永：《阿特柔斯与梯厄斯忒斯》。

埃德加·爱伦·坡：《失窃的信》［返回正文］

十八……年秋季一个狂风骤起的夜晚，天刚黑，我同朋友 C. 奥古斯特·杜宾一起，在他位于圣日耳曼郊区迪诺街三十三号四楼的小后图书室兼藏书间里，享受沉思与海泡石烟斗带来的双重奢侈。至少整整一个小时，我们保持着深沉的沉默；随便哪个旁观者都会以为，我们两人都全神贯注于充塞房间空气、卷曲盘旋的烟雾。至于我，我正在心中讨论当晚早些时候谈过的几个问题；我指的是莫格街案件，以及玛丽·罗杰遇害之谜。因此，当房门忽然打开、让我们的老相识巴黎警察局长 G……先生走进来时，我觉得这颇为巧合。我们热情欢迎他，因为这个人身上有趣的一面差不多是可鄙一面的一半，而我们已有好几年没见过他了。我们原本坐在黑暗中；杜宾起身要点灯，但听见 G……说他是来找我们商量——更准确地说，是想就一桩令他万分困扰的公务征求我朋友的意见——杜宾又坐下，没有点灯。

“如果这个问题需要思考，”杜宾一边说，一边没有点燃灯芯，“那我们在黑暗中考察它会更有效。”

“这又是你的一种独异想法。”局长说。他惯于把一切超出自己理解的东西叫作“独异”，因此生活在一支庞大的“独异事物”军团之中。

“确实如此。”杜宾说，一面给客人递上烟斗，一面把一张舒适的椅子推向他。

“那么，这次又有什么难题？”我问，“但愿别再是谋杀案一类。”

“哦，不，完全不是。事实上，这件事确实非常简单；我毫不怀疑，我们自己就能把它处理得很好。不过，我想杜宾会愿意听听细节，因为它实在独异得过分。”

“既简单又独异。”杜宾说。

“是的；不过也不完全如此。事实是，我们所有人都被这件事难住了，恰恰因为它如此简单，却又彻底挫败我们。”

“也许正是事情的简单使你们出错。”我的朋友说。

“你说的这是什么胡话！”局长开怀大笑着答道。

“也许这个谜有点过于清楚。”杜宾说。

“天哪！谁听说过这种想法？”

“有点过于不言自明。”

“哈！哈！哈！——哈！哈！哈！——哦！哦！哦！”客人乐不可支地大叫，“杜宾啊，你迟早要把我笑死！”

“那么，”我问，“手头究竟是什么事情？”

“好吧，我告诉你们。”局长吐出一口又长、又稳、仿佛若有所思的烟，在椅中安顿下来，“我用几句话就说清。不过，开始之前我要警告

你们，这件事需要最高程度的保密；要是别人知道我把它透露给任何人，我十有八九会丢掉现在的职位。”

“请继续。”我说。

“或者别说。”杜宾说。

“好吧。有人亲自从极高层通知我，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从王室内室被拿走了。拿走它的人是谁，大家都知道，毫无疑问；有人亲眼看见他取走文件。我们也知道文件仍在他手里。”

“怎么知道？”杜宾问。

“这可以从文件的性质，以及某些结果尚未出现这一点清楚推断出来；一旦文件脱离窃贼之手——也就是说，一旦他按照最终必定意图的方式使用它——那些结果就会立刻出现。”

“请再说清楚一点。”我说。

“好吧，我可以说到这个程度：这张纸赋予持有者在某个场所中的某种权力，而这项权力在那里价值无可估量。”局长酷爱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太明白。”杜宾说。

“还不明白？好吧！如果把这份文件公开给第三个人物——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一位地位最高贵人物的荣誉就会受到质疑；这正是文件持有者能够支配那位荣誉与安宁由此受到威胁的显赫人物的原因。”

“可是，”我打断他说，“这种支配力取决于掠夺者知道受害者知道自己的掠夺者。谁敢——”

“窃贼，”G……说，“是　D……大臣；他既敢做一切不配一个男人做的事，也敢做一切配一个男人做的事。偷窃方法既机敏又大胆。说穿

了，那份文件是一封信。被窃者独自在王室内室时收到它。她正在读信，那个她尤其想对其隐瞒此信的显赫人物忽然走了进来，打断了她。她匆忙试图把信塞进抽屉，却没能做到，只得让它敞开留在桌上。不过，地址朝上，内容没有暴露，因此信没有引起注意。正在这时，D……大臣进来了。他鹰隼般锐利的眼睛立刻看见那张纸，认出地址的笔迹，注意到收件人的慌乱，并识破她的秘密。他以惯常方式匆忙处理了几项事务，继而取出一封同原信颇为相似的信，打开来佯装阅读，再把它紧贴着原信放下。他又谈了约一刻钟公共事务，终于告辞，同时从桌上拿走那封自己无权取得的信。信的合法主人看见了，但第三个人物正站在她身旁，她自然不敢让人注意大臣的动作。大臣扬长而去，把自己的信留在桌上；那是一封无关紧要的信。”

“那么，”杜宾对我说，“使支配力变得完整所需的条件恰好具备了：掠夺者知道受害者知道自己的掠夺者。”

“是的，”局长答道，“近几个月来，他为了政治目的运用由此取得的权力，甚至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被窃者一天比一天更加确信，必须取回自己的信。但这当然不能公开进行。她终于被逼入绝望，把事情交给了我。”

“我想，”杜宾在一阵烟雾旋风中说道，“再也不可能要求、甚至想象出比你更加睿智的办事者了。”

“你过奖了，”局长答道，“不过他们很可能确实抱有这种看法。”

“正如你已经指出的，”我说，“信显然还在大臣手里；因为赋予权力的是占有信，而不是使用信。一经使用，权力便会消失。”

“没错，”G……说，“我正是依据这个确信采取行动。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搜查大臣的宅邸；主要困难在于必须瞒着他搜查。尤其有人警告过我，不能让他有理由怀疑我们的意图，否则会带来危险。”

“可是，”我说，“你对这类调查驾轻就熟。巴黎警方以前经常做这种事。”

“哦，当然；因此我并未绝望。何况，大臣的生活习惯给了我巨大便利。他经常整夜不在家。仆人不多，睡处离主人房间很远；而且他们大多是那不勒斯人，很容易被灌醉。你们知道，我有一套钥匙，能打开巴黎任何房间或书房。三个月来，没有一个夜晚不是由我亲自用掉大半夜去翻查　D……宅邸。我的荣誉系于此事；而且，再告诉你们一个大秘密，赏金极其丰厚。所以，直到完全确信窃贼比我更加机敏时，我才停止搜查。我想，房子里每一个可能藏下纸张的角落和缝隙，我都已经查过。”

“可是，”我试探着说，“信虽无疑在大臣掌握中，他会不会把它藏在自家以外的地方？”

“可能性极小。”杜宾说，“宫廷事务眼下的特殊情势，尤其是众所周知D……已经卷入的阴谋，使文件的即时可用——随时能够拿出来——几乎同占有文件一样重要。”

“能够拿出来？”我说。

“也就是说，能够摧毁它。”杜宾说。

“没错，”我指出，“那么，这张纸显然在宅邸里。至于随身带在大臣身上的可能，可以完全排除。”

“完全排除。”局长说，“我曾两次安排人像拦路强盗一样伏击他，并在自己监督下对他全身作了严密搜查。”

“你本可以省去这番麻烦。”杜宾说，“我想，D……并不完全是个傻瓜；既然如此，他自然料到了这些伏击。”

“确实不完全是傻瓜，”G……说，“不过他是个诗人，我认为这只比傻瓜高一等。”

“不错，”杜宾若有所思地久久吸了一口海泡石烟斗，“尽管我自己也犯过写几句歪诗的罪。”

“请把搜查的具体情况讲给我们听。”我说。

“事实是，我们不慌不忙，搜遍了一切地方。我处理这类事情经验丰富。我们一间一间接管整座房子，每间房都用去整整一周的夜晚。首先检查各室家具。凡是可能存在的抽屉，我们全部打开；我想你们知道，对训练有素的警员来说，暗屉这种东西不可能存在。在这种搜查中放过一个‘暗屉’的人，就是蠢货。这太明白了。每只柜子都有一定的体积——一定的空间——需要核算。我们有精确的规尺；五十分之一线的尺度也逃不过我们。检查完柜子，我们转向座椅。软垫用你们见我用过的细长探针刺探。桌面也拆了下来。”

“为什么？”

“有时，想藏东西的人会拆下一张桌子或类似家具的面板，把桌脚挖空，将物品放入空腔，再把面板装回去。床柱的顶端和底端也用同样方法。”

“难道不能通过敲听发现空腔？”我问。

“完全不能，只要放东西时小心用足量棉絮把它包住。况且，我们这次必须悄无声息地行动。”

“可是你们不可能拆开——不可能拆卸所有可能按你所说方式藏东西的家具。一封信可以压卷成极细的螺旋，形状与体积都很像一根粗毛衣针，比如可以塞进椅子的横档里。你们没有把所有椅子都拆掉吧？”

“当然没有，但我们做得更好。我们用高倍显微镜检查了宅邸中所有椅子的横档，乃至各种家具的一切接缝。只要有任何近期动过的痕迹，我们必定当场发现。例如，钻头留下的一粒灰尘，在我们眼中会像苹果一样醒目。胶合处只要有任何异常，接缝只要不寻常地张开，就足以确保被察觉。”

“我想，你们也检查了镜面和背板之间，还刺探过床铺、床上用品、窗帘与地毯。”

“当然。这样彻底处理完家具的每一部分后，我们又检查房屋本身。我们把全部表面划分成编号区域，以确保一个也不遗漏；随后像先前一样，用显微镜逐一审视宅邸每一平方英寸，还包括紧邻的两栋房屋。”

“两栋相邻房屋！”我叫道，“你们一定费了很大功夫。”

“确实如此！但赏金高得惊人。”

“也包括房屋周围的地面吗？”

“地面全都铺砖，相较之下没有花费太多功夫。我们检查砖缝里的苔藓，没有扰动痕迹。”

“你们当然也查过 D……的文件和图书室里的书。”

“当然。每一包、每一件都打开。我们不只把每本书打开，还逐册翻过每一页，不像我们有些警员那样只抖一抖。我们还极其精确地测量每册书封的厚度，并以显微镜进行最猜疑的审视。如果书籍装帧最近被人动过，绝对不可能逃过观察。五六册刚从装订工手里拿回的书，我们还用探针沿纵向仔细刺探。”

“地毯下面的地板查了吗？”

“毫无疑问。每张地毯都揭开，用显微镜检查木板。”

“墙纸呢？”

“查了。”

“地窖呢？”

“也查了。”

“那么，”我说，“你们算错了，信并不像你们设想的那样在宅邸里。”

“恐怕你说得对。”局长说。

“那么现在，杜宾，你建议我怎么办？”

“对宅邸重新进行一次彻底搜查。”

“完全没有必要！”G……答道，“我确定自己正在呼吸，也同样确定信不在宅邸里！”

“我没有更好的建议。”杜宾说，“你们当然有信件的准确特征描述吧？”

“哦，当然！”局长随即掏出记事本，高声读出那份遗失文件内部、尤其外部样子的细致说明。读完不久，他便告辞了；我从未见过这位好

先生如此彻底垂头丧气。大约一个月后，他再次来访，发现我们仍在做着同上次差不多的事。他拿起烟斗和椅子，闲谈起来。最后我说：

“那么，G……，你那封失窃的信怎么样了？我想，你终于认定没人能够胜过大臣吧？”

“该死的家伙！不错，我确实依照杜宾的建议重新搜查了一遍；但正如我料到的，全是白费力气。”

“你说赏金有多少？”杜宾问。

“这个嘛，非常多——一笔非常丰厚的赏金。我不想说准确数字；但有一件事可以说：谁能替我取得这封信，我愿意亲自给他开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事实是，事情一天比一天重要，赏金不久前已经加倍。可是，即使再加到三倍，我也不可能做得更多。”

“但是，嗯……”杜宾在一口口海泡石烟斗的烟雾间拖长声音说道，“我确实——认为，G……你还没有——尽到全力。你也许还能——多做一点，是吧？”

“怎么做？从哪个方面？”

“嗯——噗，噗——你可以——噗，噗——在这件事上聘请顾问，是吧？——噗，噗，噗。你记得人们讲的阿伯内西的故事吗？”

“不记得；让阿伯内西见鬼去吧！”

“当然！尽管让他见鬼去吧。不过，从前有一个富有的吝啬鬼，打算从阿伯内西那里套取医疗意见。为此，他在一次私人聚会中同医生闲聊，把自己的病情暗暗说成某个虚构人物的病例。

“‘假设，’吝啬鬼说，‘他的症状是这样这样；那么医生，你会让他服用什么？’

“‘服用什么？’阿伯内西说，‘当然是听取医嘱。’”

“可是，”局长有些慌乱地说，“我完全愿意听取医嘱，也愿意付钱。我真的会给任何能帮助我的人五万法郎。”

“既然如此，”杜宾答道。他打开抽屉，取出一本支票簿，“你不妨按刚才说的数额给我开一张支票。你签好之后，我就把信交给你。”

我惊呆了。局长仿佛彻底遭了雷击。好几分钟里，他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张着嘴，以难以置信的神色瞪着我的朋友，两眼几乎要从眼眶中凸出来。最后，他似乎稍稍恢复过来，抓起一支笔；经过几次停顿和空洞凝视，终于填好并签下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越过桌面递给杜宾。杜宾仔细检查，把它收进皮夹；接着打开一张写字台，从里面取出一封信，交给局长。这位官员在一种狂喜的痛苦中一把抓过信，用颤抖的手打开，迅速扫了一眼内容，继而跌跌撞撞地扑向房门，终于毫不客气地奔出房间和宅子；从杜宾请他填写支票起，他连一个音节也没说过。

他走后，我的朋友作了几点说明。

“巴黎警方，”他说，“以自己的方式而言极有能力。他们坚持不懈、机敏、狡猾，彻底掌握了职务主要需要的一切知识。因此，当 G……向我们详述搜查 D……宅邸的方法时，我完全相信他进行了一次令人满意的调查——就其工作所及而言。”

“就其工作所及而言？”我问。

“是的，”杜宾说，“他们采用的措施不仅是这一类措施中最好的，而且执行得臻于绝对完善。如果信放在搜查范围内，这些家伙毫无疑问会找到它。”

我只是笑了笑，但他说这一切时似乎非常认真。

“所以，”他继续说，“这些措施就其类型而言很好，执行得也很好；缺陷在于，它们不适用于这个案件，也不适用于这个人。局长手里有整套极其机巧的方法，却把它们当作一张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强迫自己的方案适应它。面对具体事情，他总是要么钻得太深，要么停得太浅；许多小学生都比他更会推理。我认识一个大约八岁的孩子，他在猜单双游戏中的成功受到所有人赞叹。这个游戏很简单，用弹珠来玩。一名玩家在手里握若干弹珠，问另一名数目是双数还是单数。猜中就赢一颗，猜错就输一颗。我说的孩子赢走了全校所有弹珠。他当然有一种猜测原则，只不过是观察并衡量对手的精明程度。例如，假设对手是个十足的傻瓜，举起攥紧的手问：‘双数还是单数？’我们的学生答‘单数’，结果输了。但第二局他会赢，因为他心里说：‘这个傻瓜第一局放的是双数，他的全部计谋刚好只够让他第二局改成单数；所以我猜单数。’他猜单数，于是赢了。

“换一个比前者高一等的傻瓜，他会这样推理：‘这个家伙发现我第一局猜单数；第二局时，他的第一个冲动会是像前一个傻瓜那样，简单地从双数改成单数。但第二个念头会告诉他，这种变化太简单，于是他最终会决定仍像先前一样放双数。所以，我猜双数。’他猜双数，于是赢了。现在，我们这个学生的同伴把这种推理方式叫作‘幸运’；归根结底，它究竟是什么？”

“只不过是推理者的智力认同于对手的智力。”我说。

“正是。”杜宾说，“我问这个男孩，他用什么办法完成那种构成其成功的彻底认同，他这样答道：‘当我想知道一个人有多聪明或多愚蠢、多善良或多邪恶，或者他此刻在想什么时，我会尽可能准确地照着他的表情来塑造自己的脸，然后等待，看我的头脑或内心会产生哪些思想或感受，仿佛它们会同这个表情配对、相互对应。’这个学生的回答，构成了人们归于拉罗什富科、拉布吕耶尔、马基雅维利和康帕内拉的一切虚假深刻的根基。”

“如果我理解得没错，”我说，“推理者的智力能否认同于对手的智力，取决于他衡量对手智力时是否准确。”

“就实用价值而言，确实取决于此。”杜宾答道，“局长和他的整帮人如此频繁地失败，首先是因为缺少这种认同，其次是因为错误衡量——更确切说，根本没有衡量——与他们交锋的智力。他们只考虑自己那些机巧观念；寻找隐藏之物时，只想到自己会用什么方法隐藏它。在一点上他们是对的：他们自己的机巧确实忠实代表了大众的机巧。但当某个罪犯的狡猾在性质上不同于他们时，罪犯自然会挫败他们。当罪犯高于他们时，事情必定如此；即使低于他们，也经常如此。他们从不改变调查原则；至多在某种罕见紧急情形、某笔非凡赏金的刺激下，把老一套实践扩张或夸大，却丝毫不触及原则。例如，在 D…… 的案件中，他们做了什么来改变行动原则？那些钻孔、刺探、敲听、显微镜审视，以及把建筑表面划分为登记在册的平方英寸，究竟是什么？无非是把一种或一组调查原则的应用夸大；这些原则建立在关于人类机巧的一套观念之上，而局长在长期履职惯例中已经习惯了它们。”

“你没看出吗？他想当然地认为，所有藏信的人，即使不恰好把信藏进椅脚上的钻孔，至少也会藏进某个偏僻的孔洞或角落，而这个构想同椅脚钻孔出自同一思路。你也没看出吗？这种刻意求奇的藏处只适合普通场合，也只有普通智力才会采用？因为，在所有藏匿情形中，把物品以这种刻意求奇的方式安置，从一开始就是可以预料并确实会被预料的。因此，发现它完全不取决于洞察力，只取决于搜查者的谨慎、耐心与决心。当案件重大——或者在警方眼中与此等价：赏金丰厚——时，这些品质从来不会失效。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如果失窃的信藏在局长搜查所及的范围内——换言之，如果藏匿原则包含在局长的原则之中——发现它就毫无疑问。然而，这位官员彻底被迷惑了；他失败的远端根源，在于他因为大臣以诗人闻名，就假设大臣是个傻瓜。所有傻瓜都是诗人——局长感觉如此——于是他从中推断所有诗人都是傻瓜，所犯的不过是 non distributio medii（中项未分配）的错误。”

“可是，他真的是那个诗人吗？”我问，“我知道他们兄弟二人，而且两人在文学界都享有声誉。我记得大臣写过博学的微积分论著。他是数学家，不是诗人。”

“你错了。我很了解他；他两者都是。作为诗人兼数学家，他会推理得很好；若只是数学家，他根本不会推理，因而早已任局长摆布。”

“这些意见令我惊讶，”我说，“全世界的声音都反驳它们。你总不至于要抹煞数百年反复思量过的观念。数学理性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首屈一指的理性。”

“可以打赌，”杜宾引用尚福尔的话答道，“一切公共观念、一切公认惯例都是蠢事，因为它们适合最大多数的人。”

“我承认，数学家已经竭尽全力传播你所说的流行错误；但即使它被当作真理传播，仍然是错误。例如，他们以本可用于更好事业的技巧，把‘分析’一词悄悄应用到代数上。法国人开创了这项特别的欺骗；不过，如果术语确有任何重要性——如果词语从可应用性中取得任何价值——那么‘分析’所表达的‘代数’，差不多就像拉丁语 ambitus 表达‘野心’、religio 表达‘宗教’、homines honesti 表达一群‘体面’的人。”

“我看得出来，”我说，“你要同巴黎一些代数学家争吵了。不过，请继续。”

“我质疑一切由抽象逻辑之外的特殊形式培养出来的理性的可用性，进而质疑它的价值。尤其是，我质疑从数学研究中提取出来的理性。数学是形式与数量的科学；数学推理无非是应用于形式和数量观察的逻辑。最大的错误，在于假设连所谓纯粹代数真理也是抽象或一般真理。这个错误如此骇人，我困惑于它竟被如此普遍地接受。数学公理不是一般真理的公理。例如，在形式或数量关系上成立的东西，放到道德领域往往是粗暴的谬误。在后一门学问中，部分之和等于整体经常是不成立的。在化学中，这条公理也会失效；考察动因时同样失效，因为两个各有一定价值的动因结合后，其价值并不必然等于二者分开时价值之和。还有许多其他数学真理，只在关系的界限内才是真理。然而，数学家出于习惯，从自己的有限真理出发论证，仿佛它们具有绝对一般的应用范围——世人的确也这样想象。布赖恩特在其博学的《神话学》中提到过一种类似的错误来源。他说：‘虽然人们不相信异教寓言，我们却不断忘乎所以，像它们是现实存在那样从中推导结论。’然而，我们的代数学家本身就是异教徒；他们确实相信‘异教寓言’，并从中推导结论，与其说是由于记忆疏忽，不如说是由于一种莫名其妙的脑中混乱。简言之，我从未遇见一个在等根之外仍值得信任

的纯数学家，也从未遇见一个不暗中把 x^2+px 绝对且无条件地等于 q 当作信条的人。你若愿意做个实验，不妨告诉这些先生中的一位，你相信可能存在 x^2+px 并不完全等于 q 的情形；等他听懂你的意思，就尽快跑到他够不着的地方，因为他肯定会试着把你打倒。”

“我的意思是，”杜宾继续说，我只是对他刚才的评论发笑，“如果大臣只是个数学家，局长就不必给我这张支票。不过，我知道他既是数学家也是诗人，因而根据他的能力，并参照他所处的环境来安排措施。我也知道他是宫廷人物，是个大胆的阴谋家。我想，这样的人不可能不了解警方惯常的行动方式。他必然预见了自己遭受的伏击——事实证明，他的确预见了。我还断定，他必然预见了宅邸中的秘密搜查。我们那位局长把大臣频繁夜间外出视为成功的有力帮助；我却只把它们视为诡计：他有意让警方有机会彻底搜查，从而更快向他们灌输 G……最终确实得出的确信——信不在宅邸里。我还感觉到，我刚才颇费口舌向你详细说明的整套思路——关于警方搜查隐藏物品时一成不变的行动原则——必然完整地经过大臣的头脑。这会迫使他蔑视一切普通藏处。我想，他不可能软弱到看不出：在局长的眼睛、探针、钻头和显微镜面前，宅邸里最复杂、最偏远的角落，同最普通的橱柜一样毫无遮蔽。最后我看出，他自然会被逼向简单，即使不是出于选择而有意走向它。你大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会面时，我说这个谜之所以如此难为局长，也许恰恰因为它过于不言自明；局长当时笑得何等厉害。”

“是的，”我说，“我清楚记得他乐不可支。我真以为他会笑到抽搐。”

“物质世界，”杜宾继续说，“充满与非物质世界极其严格的类比；因此，修辞学那条教义才取得了几分真理色彩：隐喻或明喻既能美化描

述，也能加强论证。例如，惯性力的原则在物理与形而上学中似乎完全相同。在物理学中，大物体比小物体更难启动，而它随后的动量同这种困难相称；这并不比下面的形而上学命题更加真实：容量巨大的心智一旦运动，虽比低级心智更有力、更持久，也更富事件，却最不容易启动，并且在开初几步中最受困扰、充满犹豫。再举一例：你有没有注意过，商店门上哪些街头招牌最吸引注意？”

“我从没想过。”我说。

“有一种用地图玩的猜谜游戏，”他接着说，“一名玩家要求另一名找出指定词语——城市、河流、州或帝国的名称，总之，是地图斑驳而纷乱的表面上任意一个词。新手通常会挑字迹极小的名称来为难对手；老手却会选择用大字从地图一端横贯到另一端的词。这样的词同街上字母过大的招牌和海报一样，恰恰因为过分明显而逃过观察。这里，物理上的视而不见，恰好类似心智在道德上的忽略：那些过于醒目、过于触目地不言自明的考虑，就这样未被察觉。不过，这一点似乎略高于或略低于局长的理解力。他从未认为，大臣为了最有效地防止世上任何人看见信，可能把它直接放在全世界的鼻子下面。

“我越思考 D……那种大胆、果决而具有辨别力的机巧，越思考文件必须始终在手边、以便有效使用这一事实，也越思考局长取得的决定性证据——文件不在这位官员的常规搜查范围内——就越确信：大臣为了隐藏这封信，采用了一个周全而睿智的方法——根本不试图隐藏它。”

“带着这些想法，我准备好一副绿色眼镜，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仿佛偶然地来到大臣宅邸。我发现 D……在家，照常打呵欠、闲坐、磨蹭，佯

装自己已经被倦怠逼到极限。他也许是当今真正精力最充沛的人——但只有在无人看见时才如此。

“为了同他针锋相对，我抱怨自己视力衰弱，哀叹不得不戴眼镜；可我在镜片的遮护下谨慎而全面地审视整间屋子，同时看似只专注于同主人的谈话。

“我特别留意他旁边那张大写字台；上面杂乱放着各类信件和其他纸张，还有一两件乐器和几本书。可是，经过长时间极为从容的审视，我没有看见什么特别值得怀疑的东西。”

“最后，目光绕房间一周，落到一个带廉价金属丝装饰的硬纸板名片夹上；它用一条肮脏的蓝丝带悬挂在壁炉台正中央下方的一个小铜钮上。名片夹有三四个格子，装着五六张名片和孤零零的一封信。那封信污损严重，皱成一团；它从中间横向几乎撕成两半，仿佛最初有人打算把它当作废物彻底撕掉，随后又改变或停止了这个打算。信上有一枚很大的黑色火漆印，D……的花押极其醒目；收件人是大臣D……本人，地址用细小的女性笔迹书写。它被随便、甚至看起来颇为轻蔑地塞进名片夹最上方的一个格子。”

“我刚瞥见这封信，便断定它就是自己寻找的那封。当然，从所有外观来看，它同局长为我们读过细致描述的信根本不同。这一封有一枚带D……花押的硕大黑印；原信则是带 S……家族公爵纹章的小红印。这一封给大臣的地址细小而女性化；原信写给某位王室人物的地址则明显大胆而坚定。只有尺寸相符。然而，这些差异夸张到了极点，根本性也夸张到了极点；纸张肮脏、污损、撕破的状态，同 D……真正有条不紊的习惯极不相称，强烈暗示有人企图使观看者以为文件毫无价值；再加上文件过分醒目地放在每个来客眼前，这又恰好完全符合我

先前的结论——我说，对于一个抱定怀疑而来的人，这一切都强烈证实了他的怀疑。”

“我尽可能延长拜访时间，一边就一个我知道总能令大臣产生兴趣和兴奋的问题同他热烈争论，一边始终把真实注意力钉在信上。我在观察中记住它的外观和在名片夹里的摆放方式；最后又有一项发现，消除了我可能仍有的一点疑虑。仔细审视纸张边缘时，我发现它们磨损得比必要程度更厉害。硬纸一旦折叠并用裁纸刀压过，再沿构成原折痕的同一折线或边缘向反方向折回，就会呈现这种断裂外观。这项发现已经足够。我清楚知道，信像手套一样由里向外翻转过，又重新填写地址、重新封缄。我向大臣道过早安，立即告辞，把一只金鼻烟盒留在桌上。”

“第二天早晨，我回来取鼻烟盒，我们十分热切地继续前一天的谈话。正在交谈时，宅邸窗下忽然传来一声巨响，仿佛手枪射击，继而是一连串骇人的尖叫和惊恐人群的呼喊。D……冲向窗户，推开窗向外望。我同时走到名片夹前，取下信，装进口袋，再用一个外观上的仿制品替换它。这是我在住所精心准备的；D……的花押则用面包制成的印章轻易仿成。”

“街上的骚乱来自一个持滑膛枪男子的疯狂举动。他在人群密集的妇女和儿童中间开了一枪；不过，后来发现枪里没有弹丸，大家便把这家伙当作疯子或醉汉，放他继续上路。他离开后，D……也从窗前退开；我取得目标物后，立刻跟到了那里。片刻之后，我向他告辞。那个所谓疯子是我花钱雇来的。”

“可是，”我问，“你用仿制品替换原信，目的是什么？第一次拜访时公开把信拿走再离开，岂不更好？”

“D……”杜宾答道，“是个铤而走险、胆气过人的人。他的宅邸里也不缺忠于其利益的仆人。如果我作出你说的疯狂尝试，也许永远无法活着离开大臣面前；巴黎善良的民众也不会再听见我的消息。但除了这些考虑，我还有一个目标。你知道我的政治倾向。在这件事上，我站在那位女士一边。十八个月来，大臣一直把她掌握在手中；现在却是她把他掌握在手中——因为他不知道信已不在自己那里，还会仿佛信仍在手中那样继续勒索。于是，他必定会立刻把自己置于政治毁灭之中。他的坠落不仅迅速，而且狼狈。谈论 facilis descensus Averni——下地狱容易——当然轻松；然而，谈到一切攀登，可以借用卡塔拉尼论歌唱的话：上去远比下来容易。眼下，我对即将下坠的人没有同情——至少没有怜悯。他正是那个 monstrum horrendum，一个没有原则的天才。不过我承认，当局长所谓的‘某个人物’向他提出挑战、迫使他打开我留在名片夹里的那封信时，我很愿意知道他确切会产生什么想法。”

“怎么？你在里面放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嗯——我觉得让里面一片空白不太合适，那会是一种侮辱。有一回在维也纳，D……恶劣地摆了我一道；我当时十分和气地告诉他，我会记住。既然知道他会对究竟是谁智胜了自己感到好奇，我便觉得，不给他留下线索实在可惜。他非常熟悉我的笔迹，所以我在白纸正中央抄下了这些词：”

> “……如此致命的图谋，
> 若配不上阿特柔斯，倒配得上梯厄斯忒斯。”

第18课 · 1955年5月11日

今天，我们就要登上这道有时略显艰难、整整一年都在攀登的坡顶了；这是我们接近一个顶峰的时刻。没有任何东西保证，从这个顶峰上我们真能对走过的路获得全景式视野。

今天，我要请你们容许我停留片刻，稍作暂停；因为我正要进入上次向你们提出的问题：一边是《超越快乐原则》，它以 Wiederholungszwang 一词得到表达——法语把它不恰当地译作“重复自动症”，而我认为，“坚持”这一概念给出了更好的对应；上次你们已经看到我围绕它作出全部阐发，即重复性的坚持与意指性的坚持——另一边则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的结。

相关知识卡 重复强迫：恢复性倾向与能指链的坚持

所以，一方面是以这个词表达的“超越快乐原则”，也就是某种意义的坚持。你们清楚看见，这里的难题、问题被提出在语言本身的根部，提出在语言功能之处。这个功能带来的，我不会说是世界的一个新维度，而是使一个世界成为可能的这个新维度；所谓世界，恰恰就是一个服从语言的宇宙。

另一方面，是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反复沉思而被引向的概念，即死亡的功能。我不会说死亡“本身”，因为这句话没有任何意

思；我说的是作为生命所抵抗之物的死亡功能。所以，问题在于人的世界中言说功能同以下东西的结合：

- 同那种超越“言说支配着人的命运”这一事实而存在的东西结合；
- 同那种我们不知道应当如何在弗洛伊德思想中确定其位置的东西结合；

不知道它处在实在界、想象界还是象征界的层面，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死亡。

那么……

- 在把这两个项打结、或尝试打结之前，我要再一次让你们把握——

而且我希望这一次把握得更深——弗洛伊德发现的意义是什么；不仅弗洛伊德思想的位置是什么，我们的经验——作为分析经验，也就是那种使我们得以协助主体在分析经验中向自己揭示自身的东西——又处在什么位置；

- 在接下来两次研讨班里当着你们的面尝试打结之前；
- 在 6 月 8 日作那场题为《精神分析与控制论》的终场讲座、然后最后见你们一次，一同讨论明年要做什么之前……今天我要停留片刻。

我要停留片刻，因为毕竟我作了一些思考；你们会看到，这些思考尽管严厉，却毫不幻灭。我想到，教学是一件很成问题的事情。总之，一旦一个人坐到——或者被带着、被推着坐到——我在这张小桌子后

面的位置，就从来没有显得无法胜任的例子。换言之，正如那位颇有才华的美国诗人……先生非常准确地指出的：从来没有一位教授因为无知而无法讲下去。

这从未发生过，而且确实千真万确。换言之，人总会知道足够多的东西，来填满把自己暴露在“知者”位置上的四十分钟、乃至双倍时间。这有点像一种经验性的职业能力。我想，他也想借此指出一个经验事实：只要一个人采取教导者的位置，人们确实从未见过他突然语塞。

这使我想到，只有一种教学才是真正的教学：它能在听者那里也唤醒这种坚持，唤醒求知欲。而求知欲只有在听者亲自取得对无知本身的丰饶维度与尺度时，才可能涌现；无知本身、作为无知本身是丰饶的，而且在教导他们的人那一边同样如此。

正因如此，今天，在我说出那几句对拘泥于事物形式装置的人而言表面上具有结论性质的话之前……

我希望，对其他人来说，它们不会是结论，而会再打开一道口子；

……我希望——毕竟何乐而不为？——今天你们每一个人都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可以这样界定、归根到底也就是我的问题的问题。

换言之，如果这里确实存在沟通与对话，就请每个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从彼此很不相同、但最终必须归结到下面一点的层面告诉我：你

认为我要走向哪里？也就是说，听完我今年讲述的一切之后，这个问题在你那里如何初步成形：

- 它如何在你那里闭合；
- 或者已经如何在你那里得出结论；
- 或者它已经如何在你那里发生阻抗、自卫，或以某种方式提出反对；
- 我所提出的问题在你那里勾勒出怎样的轮廓？

不过，我现在就向你们强调，这只是一个瞄准点。每个人都可以同这个点保持自己愿意的距离；在我看来，你们头脑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通常都应汇聚于这个点。换言之，没有任何东西强迫你们瞄准这个理想靶心；你们向我提出的任何问题，即使表面上局部、地方性、乃至没有明确界定，通常也仍会同我所谓问题的汇聚点或瞄准点存在某种关系——经过这些接连不断的话语之后，问题在你们头脑中可以形成的样子。

同样，如果有什么在你们看来被回避、被搁置、没有展开或半途停下，也可以趁此机会说出来。这仍是一种方式，唤起你们对我迄今带你们走过的道路之连续性可能形成的理解。我恳请你们这样做。首先，因为今天就是这样安排的：除了这项确切的实验，我不接受任何其他东西来填满本次研讨班的一小时。

对于一些问题，我可能立刻给出几点指示；另一些问题，我会把它们归组、保留，凸显它们的效力范围，以及它们同我打算为这个根本主

题给出的完成形态之间或远或近的关系。这个根本主题，就是突出《超越快乐原则》对于一切真正理解精神分析而言何以不可或缺。

我们来征求自愿者。愿意接受这项考验的人——把自己暴露在其他人面前，这已经是我所能要求的最低限度。作为分析家，如果连这都做不到，你们还能做什么？心里已经有话、或者话已经到了嘴边的人，请立刻表示；这样，其他人就有时间重新镇定，也可以轮流以自己认为最好的形式进入今天这场“向我提问的课”或“向我提问的研讨班”。

克莱芒丝·拉姆努

读过弗洛伊德那一章之后，我曾成功地把自我理解为一种防御功能。这种防御功能应当位于——比如说——表面，不在深处，而在表面；它在两条战线上同时运作，既抵御来自外部的创伤，也抵御来自内部的冲动。听过您的讲座之后，我再也无法完全以这种方式想象它，于是我问自己，怎样的说法最适合作为定义？我想，它会像共同话语的一个片段。是这样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曾经也理解了，弗洛伊德为何把产生重复症状的东西叫作死本能。我之所以能够理解，是因为这种重复发挥着某种惰性作用。惰性就是回到无机状态。所以，是回到最遥远的过去、无机的过去。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可以把它等同于死本能。可是，思考过您上次的讲座后，我反而看见，所有这些强迫都来自某种无限、多形、没有对象的欲望，一种对无的欲望。现在我不再十分理解的，是死亡。

拉康

毫无疑问，我教给你们的一切，确实足以重新质疑人们通常想象的局部论中自我的位置。在当前精神分析取向里，把自我重新放回视野中心的立场，只不过是每一种对人的位置的重新质疑都会遭受的一类回返；每当这发生在那种被称作人文主义的关于人的话语形式中，事情都是如此。

有过多少次修订，就有多少种人文主义。我们很难想象，每当关于人的话语发生修订时究竟出现过什么，因为每一次修订都会随时间流逝而变钝、减弱；所以今天——其实一直如此——“人文主义”一词指的是一种口袋，接连涌现的关于人的革命性观点之尸体一个压一个堆在其中，缓慢腐烂。如今，精神分析层面正在发生的正是这种事。

要找一个最贴切的比喻，我只能想到今天早晨在报纸上读到的一场展示。现在，每当某桩犯罪多少显得缺少动机、责任问题被提起时，我们都会周期性地面对这种展示：精神科医生惊恐万分、仓皇求援，又满怀恐惧地死死抓住一个想法——如果他不强调那个人物何等异常，自己就可能重新打开通向普遍屠杀的大门。这个人物显然做了一件人们不习惯看见的事，尽管它的可能性每时每刻都会涌现：就在路边把同自己以最温柔纽带相联的人直接砸烂，再乱刀刺死。

精神科医生突然面对这个开口、这个裂隙，并被要求表明立场。那一次，不大可能的事情以百万分之一的方式发生，恰好揭示：像所有其他情形一样，这一可能也曾被抽中。精神科医生面对自己的责任，必须发表意见，向人们解释这种事始终可能发生，不能仅仅说主体负有完全责任，就把事情裁定下来……

于是，我们听到一段惊人的话语：主体一边说，嘴巴一边扭曲；这段话的内容是：

- 这个主体有情感生活中所有可能的障碍；
- 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可憎人物；……但与此同时，他所做的事当然又完全属于共同话语的管辖，必须承受法律的严厉制裁。

精神分析正在发生的事情同这非常相似：回到自我，把它当作中心、视点和衡量一切可能显现之物的共同尺度；我认为，弗洛伊德的话语根本没有蕴含这种回返。恰恰相反，他的话语越向前推进，我们越进入其著作的第三阶段，他向我们展示的一切就越明显是在展示：

- 自我是一道幻象；
- 自我是认同的总和；
- 自我无疑位于一个相当贫乏的综合点上，主体在呈现自身时被还原到这一点；然而，主体还另有其物，也是位于别处的东西，

而且从别处而来。

它恰恰来自超越快乐原则的那个点。在那里，我们可以追问：在这张符号织网中，在这句超越我们对主体动机的一切把握而坚持的根本语句中，究竟捕获了什么？究竟有什么被纳入其中？

显然，那里有话语；正如你所说，是共同话语。我向你们谈《失窃的信》时，曾以一种可能显得谜一般的方式——尽管这不是最直接的进

入方式——向你们展示了这一点；我曾说，在一段时间内，这封信……

在一个时间段里，在那个小场景——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就是 Schauplatz（舞台）——的界限内，

在坡展示给我们的这出小木偶戏的界限内，

……就是无意识。

在一段时间内，那些相继成为信件持有者的不同主体的无意识，就是信本身，就是写在一张纸上并四处游走的那句话。我作过证明之后，这一点应当已经十分明显：随着信的反光从背景中掠过主体的面孔、掠过他们的身形，他们相继取得了怎样的色彩。

你们可能仍然觉得不完全满足。但是，不要忘记我昨天晚上谈到俄狄浦斯时提出的例子：俄狄浦斯的无意识，恰恰是那段共同或不共同、却根本的话语。由于这段话语，俄狄浦斯的整个故事早已、始终如我们所知地写在那里，也就是连同它的意义写在那里；而俄狄浦斯对此一无所知，尽管从一开始，他就完全被它摆布。

这要追溯到很早。我只提神谕第一次出现、令他父母恐惧这一事实。他被遗弃、被排斥；从那里开始，一切都依照神谕展开，也依照这样一个事实展开：他的实际身份同他此后能够作为自己历史而实现的东西不同。他是伊俄卡斯忒与拉伊俄斯之子，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人生。

尽管如此，正是依照共同话语，正是在这层话语的彻底遮蔽中——话语既是现实，对他而言又绝对不是现实——他整个戏剧与命运的脉动、实现和过程才从头到尾展开。

也许以后再谈死亡时，我会尝试向你们展示伟大悲剧家笔下俄狄浦斯戏剧的结尾。我可以用几个特征说明《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的意义。归根到底，诗人真正辨认并承认了人同那段自己不知道的话语之间关系的最后一词：那恰恰就是死亡。

我认为，必须一直走到诗性表达，才能显示那层被遮蔽的过去性同死亡本身之间的认同，能够以何等强度实现——死亡显出最恐怖的面貌；它的揭蔽甚至不容许存在一个其后的瞬间，并使一切言说熄灭。

我认为，你们应当在下次讲座前读一读《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这很重要，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已有多少人读过；在我看来，一个分析家很难不读它。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悲剧《俄狄浦斯王》成为典范作品，绝非偶然。分析家不能不认识它的续篇、戏剧的这种彼岸；《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实现了这个彼岸，可以同《超越快乐原则》形成平行。它的确是共同话语的一个片段。它就是这个超越快乐原则。

那么，你们怎样才能说自我参与其中？我认为，你今天的发言打开了这个问题；它提得极好，也极具启发性。归根到底，主体—个体同以下这些东西之间存在一种关系：

- 这个离心的主体；
- 这个超越主体的主体；
- 这个无意识主体——我在开头向你们提出过它的问题；……二者之间可以说有某种镜像关系。我们将最清楚地把握的不是个体，而是自我的性质，因为：
- 自我本身就是共同话语、即无意识话语中的一个意指性要素；
- 自我本身作为形象被纳入符号链；
- 自我本身是符号现实嵌入主体之现实不可或缺的要素；
- 自我同人类主体某种原初开口或裂隙相联；……就其原初意义而言，如果你们愿意，自我是主体心理生活中死亡本身的一种显现，而且无论如何，是离我们最近、最内在、最可接近的显现。

自我同死亡本身的关系极其紧密；这恰恰发生在自我成为某个交叉点、某个相交点的层面，位于以下两者之间：

- 主体被捕获其中、而且从某个观点看可说被异化于其中的共同话语；

- 以及主体的心理现实。为了标出要点，自我同某种生物学关系相联；我已经多次向你们指出这种关系，也就是人的想象关系发生偏离。主体的功能发生某种下沉、偏转；正是在那里出现一道裂隙，死亡由此作为死亡本身而向人临场。

你们会看到——下次我会更准确地说明——以下两者的交点正是在这里产生：

- 符号的世界对主体具有异化作用；更确切地说，它使主体总在别处实现自身，使主体的真理总有某一部分受到遮蔽。

- 这同另一者之间的关系，是意指性坚持、重复性坚持现象的原则与根基；符号体系与现实之间的相交点恰恰经过想象界的层面。

想象界的功能、符号体系朝向形象的弯折就在这里：它朝向某种可以说酷似世界、酷似自然的东西，从而造成一种观念，仿佛这个根本符

号体系里存在某种原型性的东西。其实无须加上“原始”［arché］，它不过确实是“典型的”；但有一点毫无疑问：

- 这里根本不涉及荣格理论以“原型”之名打开、交付给我们的那种被实体化之物；

- 这些原型本身始终是已经符号化的东西，归根到底被纳入你所谓共同话语，是它的一个片段。我同意，这是一个很美的定义。我甚至会说，我将使用这个说法；它同自我本身的定义紧密相联。

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回到最遥远之处、惰性——我想，上次我已经尝试让你们感受“符号惰性”一词与弗洛伊德描述强烈暗示的某种东西之间的差异。它不只是一种惰性。我尝试向你们展示惰性同坚持之间的差异；与惰性最贴近的术语是阻抗。只要深入考察、沉思惰性概念，就会清楚显出“阻抗”一词的歧义；要正确使用它，绝对必须消除这种歧义。

阻抗——如果它真如其所是，是惰性；在分析治疗中，它恰好就对应惰性——其特性正在于它本身没有任何一种阻抗。按照它唤起的通常意象，阻抗同一股力量对惰性的施加相平行；不是严格成比例，而是完全同一。换言之，当我们转向阻抗分析时，必须理解：就 Widerstand 一词唤起“障碍”的意义而言，它暗示、唤起的努力与努力轮廓，不应到我们自身以外去寻找。施加力量的人造成了阻抗。在惰性的层面，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任何阻抗。我们在分析中面对的阻抗，就是一种惰性。

这同例如一切附着于转移的东西完全不同；后者属于坚持的秩序，处在截然不同的层面和层域。上次我提到欲望时，你也十分准确地把握

了我的意思：弗洛伊德在无意识层面揭示的欲望，是一种对无的欲望。

昨天晚上，你们听到了弗洛伊德读者当中绝不罕见的一种幻觉：仿佛归根到底，人们总会重新找到范围相当狭窄的同一个所指；仿佛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Traumdeutung）中指给我们看的梦的欲望，最终可以被概括成一份实际上十分简短的驱力清单。

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我只请你们把《梦的解析》从头到尾完整读一遍，就会确信相反的情形。尽管弗洛伊德以千百种形式显示欲望取得的经验形态，整部《梦的解析》里没有任何一项分析最终得出对某个欲望的表述。欲望最终从未在那里被揭露。一切都发生在这个欲望被揭示的台阶、阶段与不同层级上。

而且，弗洛伊德在某处一段我会重新找到的文字里明确嘲笑过一种幻觉：在《梦的解析》出版若干年、书中的经验和方法得到传播之后，人们读过它，竟开始相信我们在梦中寻找的东西、梦的现实，就是他所谓梦的潜在思想的续列。弗洛伊德本人说，这完全是一种幻觉；因为如果只有这些，它们背后的这个现实在字面上毫无兴趣。真正有趣的是梦的阐发的全部阶段；我们在解梦中寻找的东西，恰恰在那里得到揭示和显现。

它位于这个 x、归根到底这种对无的欲望的层面，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个欲望是对什么的欲望。《梦的解析》中任何地方都一样：我请你们找出一个最终得出“主体欲望的是这个”的段落来反驳我。你们会提出儿童之梦作为异议。那恰恰是《梦的解析》中唯一根本的误解点。我还会回到这里；而且很容易向你们表明，这个混淆点在弗洛伊德那

里只同一种倾向相联——也就是他的论述和著作中最易过时的部分：始终、或相当频繁地诉诸发生学观点。

儿童之梦看起来像是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这绝不能反驳我正在凸显的核心事实。我不想停留于此，以后会向你们表明怎样反驳这项异议。只要欲望被弗洛伊德揭示，被他指认为一系列形成物在意识中的动力——他研究的这一切，从梦、经过《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一切事实，一直到机智语，全都是符号形成物——那么，每当我们谈论欲望时，所涉及的始终恰是这样一个时刻：经由符号来到存在的东西尚且不存在，因此也绝不可能被命名。

换言之，一切被命名之物背后的东西，是不可命名的。恰恰因为它不可命名——无论你们赋予这个词和这个名称怎样的回声——它才同我们将看到的那个首屈一指的不可命名者具有亲缘与呼应，也就是同死亡具有亲缘与呼应。

你们必须重读《梦的解析》，才能每一步都察觉这一点。一切可命名的揭示始终发生在梦的阐发层面，也就是转入一套符号化的层面；这套符号化有自身全部法则，严格说来就是意义本身的法则。昨晚我谈到意指性分割、多义性、凝缩，谈到弗洛伊德用来表达相关问题、他所瞄准的现象秩序与所处理事物之意义的一切术语时，所指的正是这些法则。它们始终处在过度决定的秩序，或者仍可以说，处在意指性动机的秩序。

而任何东西都没有“开始存在”，因为一旦它已经进入那里，也就是已经进入辩证法，欲望就已经从头到尾被纳入异化；欲望本身也已经从头到尾在对承认的欲望与对欲望的承认中表达自身。为什么这会是死

亡？我恰好把它留在你问题的边界上。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极好；无论如何，它证明你听见了我所说的话。

相关知识卡 获得承认的欲望与对一项欲望的承认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关于您刚才谈梦时说的东西。不过，两者毕竟都是真的。我认为，一方面，您把重音放在梦的阐发上是正确的。

拉康——弗洛伊德明确说，这是梦中唯一重要的东西。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但毕竟不只是它。他还说，梦中仍有欲望实现。我认为，您随后同样把重音放在阐发上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在阐发中才能找到梦的意义；否则就会存在解梦辞典，而弗洛伊德已经充分驳斥这种想法。不过，也不应忽略欲望实现。不仅儿童之梦提供例子，还应考虑梦的幻觉性质、梦的幻觉。

拉康

这是同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梦的幻觉以及梦本身的幻觉功能，严格说来值得……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初步来说，是的，毫无疑问。在描述层面，把它看作欲望实现，这一点在《梦的解析》中已经指出。但显然，当梦的全部阐发到达幻觉公式时，不能止步于此。不能止步于此：全部梦工作都只以……为目

的；这又把我们带回全部阐发。必须像您这样说！随后还应考虑睡眠欲望。它可以被解释，而且重新引起了兴趣。我在……那里看到过一些相关的有趣东西。如果从阐发之前来看，它既是梦的最初动机之一，也是最终动机之一；因为他并不谈“二次阐发”，阐发只存在于那个在场并经过某种叙述后被讲述的梦中。

而且从终点看也一样：入睡之后，当梦完成时，梦的一个意义、一个最终意义就是睡眠欲望。因此，一端是欲望实现，另一端是睡眠欲望。我认为，较为现代的解释——有些只在《梦的解析》中得到提示，有些见于较晚文本——把睡眠欲望解释为自恋欲望，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也就是说，它力图承认梦中的两个现实：欲望实现的现实——您刚才的话似乎略微消解了它——以及另一个现实，您把全部兴趣都放在它上面，也就是阐发。梦位于两者之间。

不过，我认为，不应忽略在两端都能找到的欲望实现：阐发之前与之后；全部过程都把我们带回梦的两个端点——最初的欲望实现、睡眠，以及最后的自恋实现，或按照我所知最现代的解释，回返或重复一种较早状态。因此，只有从这两个要素——欲望实现与能指阐发——的总体视野出发，才能给出梦心理学的全貌。

拉康

是的……不过，你刚才说的话里有两个完全对立的项。我会回到第一个，也就是“欲望实现”一词可能意指什么。悖谬的是，你似乎甚至没有把握到，“实现”多么包含“现实”，因此这里只能涉及隐喻性的实现、幻觉式的实现。换言之，同所有幻觉满足一样，我们只能以非常成问题的形式在其中看到欲望的功能。

当欲望成为幻觉的动力、幻象的动力、成为一种恰好与满足相反的满足之动力时，它究竟是什么？因为，依照定义，任何幻觉满足都不可能给欲望带来满足——只要我们赋予“欲望”一词以功能定义，即某个x，也就是任何行为实现周期所调动的张力。如果欲望铭写在一个周期、生物学周期之中，它就趋向满足。

这里还有欲望的另一个层域：它在满足以外的别处得到满足；欲望成为幻想本身的根本来源、根本引入。这是另一个秩序，不趋向任何客观性；它自行界定了想象界层域所提出的问题。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正因如此，才会使用伪装概念；正因如此，《梦的解析》提出“梦是欲望的实现”这第一条命题后，立刻使用欲望实现经过伪装这一概念。但它仍然是一种真正的实现；它经过伪装，却以伪装形式实现，是经过伪装的满足方式之一。

拉康——你把哪个词译作“伪装”？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梦的语言是一种伪装。梦的阐发的一切机制——移置、凝缩、过度决定，梦的所有这些机制。我认为，当我们面对“经过伪装的实现”这样的双重概念时，不能忽略其中一项来解释它。经过伪装的实现：它的确经过伪装，却仍然是实现。否则，我们就会看不清弗洛伊德的进路；他逐步作出限定：它确实是欲望实现——睡眠欲望的实现，随后是伪装，再随后是压抑。说明的丰富性逐渐展开。但是，如果后来把一切都还原掉了呢！

拉康

这就是全部问题，伪装的问题。你把哪个词译作伪装？我不认为它就是我们通常译作“移置”的词吧？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它在“伪装与审查”那一章里。

拉康

这不是本质概念，只是一种隐喻。“伪装”一词使问题原封不动：在符号满足中，究竟是什么得到了满足？ 整个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被重新放回那个无法离开的场域。因为，你所谓欲望实现，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归根到底，有些欲望除了得到承认——也就是得到坦白——以外，永远找不到其他满足。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这要看情况。替代满足概念可以同经过伪装的实现概念作有益的并置，就像梦可以同症状并置一样。

拉康

我想告诉你的是，这里存在两个层域；尤其是，你刚才所说的替代满足，属于同符号满足完全不同的秩序。某种现象可以为我们提供例子：在动物行为中，一段受阻的本能行为周期进行期间，会突然异位地涌现出另一个行为周期的片段。

例如，鸟在打斗中会出现这种情形。同类动物之间的争斗始终带有令人着迷的游戏性质；威仪展示的想象界在其中显然介入：张开双翼、

竖起羽毛，以及一整套恫吓动作。必须赋予这些动作以自身功能；正因为它们，一部分战斗得以隔着距离展开。在许多情形中，战斗以退却行为结束，严格说来双方甚至没有接触。从动物阶梯顶端到底端都能看到这一点；鱼尤其清楚地展现了相互攻击层域中可能出现的最精细行为。

在这个秩序里，我们并不比动物高明多少。文明化攻击所能做到的最好事情，就是重现这种行为：两条鱼可以进行一整套决斗，只凭两侧的侧线器官感知对手或多或少形成包围的动作所造成的水波振动，最终让出位置；归根到底，攻击的目的最后就归结于此。就在这样的行为过程中，鸟会突然插入一次细致的理羽动作；这是求偶展示的一次异位。若从被唤醒的张力层面看，确实可以说，行为仿佛接合到另一个回路，最后可能进入一个解决周期，呈现出替代满足的形象。问题在于，符号满足本身是否属于这个秩序；如果属于，达到什么程度、在何种尺度上——甚至它是否在任何程度上属于这个秩序？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伪装概念只是一个隐喻概念，什么也没有解释。它丝毫没有让我们把握符号满足本身可能是什么。如果你坚持使用这个词，它会使这种经过伪装的满足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原封不动。

至于你刚才提到的另一个词——睡眠欲望——它当然极其重要。弗洛伊德特别在同所谓二次阐发的联系中突出它；也就是梦工作部分的最后一章。那里有极其宝贵的内容，确实涉及 ego 本身在梦中的介入。

我认为，这里仍有两件必须区分的事情。首先是在一定时间内维持睡眠的需要。不管怎样，人们都假设这个需要位于梦与睡眠持续时间之

下，抵御着一切可能前来扰乱睡眠的外部或内部刺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需要。问题在于，这个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恰好显现在一个我们可以认作主体自我审级的审级中；换言之，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某种警觉——正是保存这种睡眠状态时自我的警觉。梦确实向我们表明，这是自我在梦中临场的一种涌现。

它远非唯一一种。如果你们清楚记得刚才援引的那一章，十分惊人的是，恰恰在那一章、也只在那一章，无意识幻想概念才第一次介入、第一次出现在弗洛伊德思想中。换言之，正是在二次阐发的层面，属于自我层域的一切才出现；这里的自我是一个保持警觉的审级。但与此同时，弗洛伊德无法把它同自我融入其中的幻想功能本身分开。这里存在一整套极其细腻的关系安排；必须严格地把它们同梦本身以及白日梦区分开来。

这种区分还使我们能够重新找到白日梦的回声——依照那种角色在某个时刻彼此交换的镜像式相互关系——重新找到白日梦本身的功能，找到它在自我层面显现的样子。白日梦恰恰是欲望的一种想象性、幻觉性满足；借用拉姆努小姐刚才的话，它的功能位于十分局部的表面。这里要标出的，是它同位于别处、恰恰位于张力中的白日梦之间的关系。

这是无意识幻想本身的概念在弗洛伊德著作中第一次出现。由此你们可以看出，让维持睡眠的欲望本身介入，在这个层面包含怎样的复杂性。也许，最大复杂性正是在这里显现；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说，同自我玩捉迷藏、追问它究竟在哪里的游戏，在此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

因为，归根到底，只有在自我层面，我们才看到白日梦本身的功能在梦的结构化中出现。也只有从自我出发，我们才能外推并设想，在某个地方存在没有自我的白日梦；说到底，也就是存在无意识幻想。无意识幻想以及幻想性活动本身的概念，只有经过自我的迂回才会出现。你们跟上了吗？看清我的意思了吗？这也将是我们在后续课程中处理我提出的结论性术语时，尝试纳入的事情。

科莱特·奥德里

我的问题同克莱芒丝·拉姆努的问题很接近，因为也围绕自我。不过，你们两人的谈话让我转向另一个方向。因为，自我是共同话语的一个片段，这是在分析之中；在分析之前，自我并不是共同话语的片段，它恰恰仍是纯粹想象的幻象。那么，这个从分析中产生、主体也在其中认出并承担自身的共同话语片段，便相当于对先前那个想象界作某种祛魅。于是，我们走到这样一点：祛魅一旦完成，人便面对死亡；剩下的只有等待和凝视死亡。我的问题听起来极其实际、甚至功利，但在我看来就是这样。

拉康

为什么不呢？在《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俄狄浦斯说：“难道正是在我什么也不是的时候，我才成为一个人？”这是俄狄浦斯精神分析的终点，因为他的精神分析只有到科洛诺斯才完成。当然，他抓破自己的脸、刺瞎双眼的那一刻——若要从俄狄浦斯的观点赋予故事全部意义，这是绝对关键的一点——是一次行动化。何况，他到了科洛诺斯时自己也说：“不过，我当时很愤怒。”

科莱特·奥德里——可是，“我什么也不是”未必就是死亡。

拉康

这正是我们将尝试打开的全部问题，也就是“我什么也不是”同死亡之间的区别。

科莱特·奥德里——那么，可以取代某种人文主义的东西，必须从“我什么也不是”与死亡之间经过？

拉康——是的，完全正确。这个东西历经时代而有所不同，正因如此，“人文主义”这个词才如此难以使用。

迪朗丹先生

我愿意提出一个问题。不过，由我来问不大正当，因为我没有经常参加您的研讨班。

拉康——那我也要请你解释昨晚所说的“去言语化”。

迪朗丹先生

我的“去言语化”并不玄奥，走得也不太远。它多少属于意识的直接材料。语言不只是某种已经认识之物的表达；它是沟通方式，也是儿童生活在社会中、思想据以成形的工具。儿童对世界的切分以语言为中介，由此产生言语实在论：哪里有一个词，人就相信那里有某种东西；如果没有词，就不相信有东西存在，也不费心寻找。没有词，便什么也没有。分析的用处似乎恰恰在于，让主体在某种形式下陷入停顿，例如：“我患的是这种神经症还是那种神经症？”

拉康

可是，就在这里：请给你刚才提出的东西一个具体形体。如果我没听错，昨晚你的问题例如是这样一类："我把这个东西送出去，是出于慷慨还是出于怯懦？"

迪朗丹先生

我的患者经常向我提出这类问题：是这个，还是别的？不可能回答他，因为他犹豫其间的两个东西都是空洞之物，不对应现实。他需要给自己感受和思考的东西贴标签；即使它们没有那么空洞，这种安放事物、给它们贴标签的需要，仍是某种凝固、半死的东西。多数情形下，它们都是现成思想。只要我们迫使主体建立接触，以含混方式回答，鼓励他继续……

拉康——你认为，只要脱掉他的成衣，他就会得到一套量身定制服装吗？

迪朗丹先生

这还不够；但首先应鼓励他赤裸地观看自己，并意识到这一点。这并不取消言说和语言的重要性，它们随后还会到来。"去言语化"这个说法也许不太恰当。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语言是我们的思想、概念以及对世界的使用得以成形的模具。

拉康

你的说法似乎假设存在两种思想：你所谓"现成的"思想，以及并非现成的思想。而非现成思想的特性，恰恰是——用你的话说——它们不完全是思想；它们是已经去言语化的思想。换言之，我要问你这一

点：你举了一个在我们的经验中极其鲜明的例子，即主体在拉罗什富科式心理学层域中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做善事，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爱，还是为了某种彼岸？

迪朗丹先生——完全是在这个层域中。

拉康

可是，你为什么认为，这里存在某种可以直接同不恰当言说、空洞言说或空话联系起来的东西？你是否认为，这不是一个完全保留、完全真实的问题？而且我要说，一旦你置身于拉罗什富科所在的层域……

拉罗什富科置身其中并非毫无理由；

自我在拉罗什富科时代成为如此重要的问题，也并非毫无理由；

……那么，无论你怎样处理它、以何种形式运用思想——请别见怪，归根到底总会是一种言说形式——这个问题都会保留全部价值。

正是因为在这个层面提出问题，它才在这里保留并将始终保留价值。实际上，只要主体置身于自我层域，一切就确实由自恋关系支配。比如，我们说任何赠予中都有一种绝对无法消除的自恋维度，说的正是这一点。你是否认为，只要不回答主体，他最终就会通过放弃问题而找到自己的路？为什么？

迪朗丹先生——通过重新表述它，并意识到它。

拉康

但是怎样重新表述？这恰恰是我要问你的。你认为他能以什么方式重新表述这个问题？

迪朗丹先生

如果他以慷慨或怯懦的术语提出问题，那大概是因为他认真对待这些概念，把它们当作事物。

拉康——他可以认真对待它们，而不把它们当作事物。

迪朗丹先生——这可不容易。

拉康——你说得没错。这里的确有一种趋向物化的斜坡。

迪朗丹先生

那么，语言练习可以成为重新表述思想的练习；但从什么出发？从经验出发，因为到了这里，我们就落入一些略显神秘、不可言说的东西。归根到底，那就是现实。我们通过切分、接合现实而意识到它；但在被命名以前，它仍然是某种东西。

拉康——它是不可命名的。

迪朗丹先生——肚腹里发生的东西不可命名，但最后还是被命名了。

拉康

但我要说，除非你感受到的一切——包括用你十分恰当的话说，在肚腹里感受到的一切——进入你已经引入这件事的一连串问题，否则就连它那套所谓迷走—交感神经反应也不会得到后续。你之所以是人，

恰恰在于：从你学会说话那一刻起，各种问题在你历史的每一时刻、在你那既已被历史化又进行历史化的历史中被引入；你那些迷走—交感神经反应的一切特点、态度、怪异、独异及全部节奏，都会从那里得到塑造。

你明白，这远远超出所谓训练形成，完全不是训练的问题。第一次——举一个弗洛伊德经常使用的例子——你在通常会尿裤子的年纪尿了裤子时，它以怎样的意指性特征呈现，可能决定此后你在早已绝不该尿裤子的年纪再次这样做。这是因为它在当时取得了历史价值。比如，如果我没有记错，弗洛伊德在《狼人》中多次向我们展示：那件事当时如何被解释为一个符号。譬如，孩子确实由此丢尽了脸；或者相反，它同强烈的色情兴奋联系在一起。

但这不只是一种可以说外在的连接，甚至不只是一种意义连接。那次失禁当时在语句中取得了一种价值、符号价值，成为符号；正因如此，它以后会继续、或不再继续拥有这种符号价值。于是，在肚腹和消化道层面可以建立一种分化；从此，效应与原因的链条永远不会再同第一次肠胃反应没有取得符号价值时一样。

如果精神分析教给我们的不是这个，它就什么也没有教给我们。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我只想提出一个问题，把迪朗丹刚才所说的放到另一个层面加以标示，并提醒他注意：他正对一种比亚历山大交给我们的分析“空气动力化”走得还远的做法说“阿门”。亚历山大走到这个概念时尚且犹豫，最终没有踏上你看起来如此轻快地走着的道路。

迪朗丹先生——你能说得更明确吗？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他在那本小书开头，从教学层面提出单一性或复多性的问题；在那里几乎已经可以看见你刚才引发的讨论萌芽。但他没有进入讨论，仍然安稳地停在我们所在之处。你对自己思想的展开远远超过亚历山大，超过他一生中任何一次阐发所曾到达的位置。

拉康

归根到底，“去言语化”一词所包含的思想如下：主体的一切言说都只建立虚假问题；那么，任何像主体向自己提出的这种问题，其解答是否可能存在于对主体言说的某种撤回之中？还是应当朝相反方向走，让他反而把这些问题——这次涉及自爱——一直承担到最终一点？也就是，让他理解：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只要这种自爱辩证法迄今一直是他话语的一部分，某一次赠予、某一种慷慨形式就确实是那种怯懦；这一点完全准确。

但还必须让他在完整历史中恢复这一点，使他察觉：正因为他的历史，他的自我确实在所有人际关系中、尤其在赠予关系中扮演这个角色。他提出这个问题完全真实。比如，强迫症者的立场恰恰在于，属于赠予秩序的一切都绝对被捕获在他无法逃出的自恋网络中。出路是否反而存在于另一个方向，也就是把这套自恋辩证法一直耗尽到最后一项？

换言之，出路是在你彻底撤退、让他从此不再说一个字中，还是在把话语一直推进到最后一点中？后一种推进会带走我不止一次指出的那

整段历史，也就是强迫症者的根本历史：他完全异化于一个自己等待其死亡、而其实早已死去的主人，以至于一步也不能迈出。只有让他察觉这一点——他真正囚禁并奴役于什么，恰恰就是死去的主人本身——你们才可能期待解答。

所以，解答不在于抛弃话语，而在于把话语一直追究到其辩证严密性的最高程度。要让他理解，自己为何总是预先、始终被剥夺一切；甚至可以说，他越准许自己拥有东西，就越是把它们准许给另一个人——恰恰给那个死者。因此，他始终、永远被剥夺了对事物的一切享用能力。如果他不理解这一步，你们就没有任何机会摆脱困局。

只说这是一种精细切分，并不能解决问题。然后呢？你们以为这种哲学本身具有宣泄价值吗？当然没有。因为，无论你们多么蔑视这个问题，它都会永远重新出现。主体没有任何理由不再拥有自我，除非处在我们刚才唤起的极端位置：生命尽头的俄狄浦斯。

从来没有人研究过强迫症者临终的时刻。其实很值得研究。也许那时会发生某种启示。如果你们必须取得一次稍早的启示，肯定不能靠放弃言说。

让-贝特朗·蓬塔利斯

我从提出的不同问题中感到某种不适。这里谈了很多象征界和想象界，却不太谈实在界了。刚才的问题表明，我们多少把实在弄丢了。科莱特·奥德里的话令人印象深刻：幸好俄狄浦斯没有太早知道自己只在最后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毕竟必须填满自己的一生。首先被看作实在的许多东西——他者的意识、绝对者、对象——后来都被看成一张多入口系统般的网络，而“我”在其中标示一个位置；即使看清这

一点很好，现实原则又在哪里？如果现实不在所有这些维度之间的运动中，它位于何处？换言之，欲望的承认必须经过一定数量的中介、变形、想象形成物，经过象征秩序的无知或误认。您最终会把这称作现实吗？

拉康——毫无疑问，这就是所有人所谓的现实。

让-贝特朗·蓬塔利斯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真实满足与幻觉满足的差异。因为在现实中——不是把现实当作事物，而是当作范畴、规范——毕竟存在某种多于其他秩序的东西。现实不是全部符号的集合。

拉康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例如，你是否注意过：一段爱情由于所爱之人的实际品质或缺陷而失败，最初是何等罕见？

让-贝特朗·蓬塔利斯——我不能确定答案是否定的。我不能确定这不是一种追溯性幻觉。

拉康

我说的是这种情况很罕见。事实上，一旦走到那里，触及这个现实的东西似乎更接近借口、也就是人们为自己提供的动机的秩序。

让-贝特朗·蓬塔利斯

可这会走得很远。因为它等于说，从来没有真正的构想，人只会从一次修正走向另一次修正，从一道幻象走向另一道幻象。

拉康

我认为，在我们全部经验所在的主体间性秩序里，实在——比如个人能力的限制这样简单的实在，正是建立一种心理学时试图触及、却当然不容易触及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在所谓个人品质的秩序中，测量领域很难找到自身参照。

只要把个人品质放到相当高的层面，只要尝试像一切心理学那样从中找到若干恒定性——所谓体质、气质，也就是人们用来限定个体差异本身的一切——那么我要告诉你们的，并不是关于自发心理学之根本无能的一条评论。

每个人只要充当心理学家，给同时代人定位、打分——经验证明，他完全能够做到——就能有所收获：询问一个集体对某个特定个人的看法，请他们按一分制或二十分制，为他某项品质或某个假定缺陷打分。我不是要宣布主体间性中接近实在的方式从根本上失效。我的问题范围在于：人类戏剧本身的生活场域，完全处在这些评价之外。

我不是说它们毫无用处。每个人的戏剧本身如何实现，也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东西——只要它产生某些效应，例如有时是病理性的，或仅仅是异化性的；也就是我们全部分析所针对的东西——完全位于对实在的这类评价以外。

所以，我既不质疑实在的存在，也不否认我们手边就有各种实际限制。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单手举起这张桌子，这完全是真的；我们不断遇到大量可以测量的东西。

让-贝特朗·蓬塔利斯——您只从逆境层面看实在：抵抗之物、造成妨碍之物。

拉康

不能举起桌子并不妨碍我。它迫使我绕路，这个事实同样明显；绕路也不妨碍我。我不认为，这是我借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之间的区分所教导你们的意义。在人的经验中，最根本、最重要的经验，严格说来就是主体的经验，就是主体据以存在的东西。

我接下来要说的几乎是一句同义反复。它位于符号涌现的层面：主体在建立这些"临场表"时负有根本责任——我借用一个在科学思想形成中具有培根式回声的层域与术语。谈到"临场表"，人们从未想到：它以一个同实在维度完全不同的维度涌现为前提。

你们标示为临场的东西，已经被放在它可能不存在的背景上。对于一个正在提出实在论问题的人，我用可感形式把这一点呈现给你们；但我在这里提出的立场毫不唯心主义。

问题绝不是说实在先前不存在；而是要知道，在主体场域中，没有什么有效之物会自行涌现。这个主体存在、维持在存在中、提出自身存在的问题、关切自身存在；他就是你们在分析中与之对话、通过言说艺术加以治疗的主体。主体的根本现实位于这个层面，位于现实同临

场表的出现相接之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临场表都是他创造的。我反复拼命告诉你们的，恰恰是它们早已制成。

你们明白：游戏早已玩过，骰子早已掷出！它们早已掷出：

- 只不过，我们可以把骰子重新拿到手里，再掷一次；
- 因为牌局早已开始；
- 因为我向你们强调的一切，早已成为一段历史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围绕它宣告一切可能想象的神谕。

正因如此，占卜者彼此对视时无法不发笑；并不是他们互相说“你是个骗子”，而是如果忒瑞西阿斯面对另一个忒瑞西阿斯，这件事本身就含有某种可笑之处。然而，恰恰因为他是盲人——而这并非毫无理由——他不可能面对另一个忒瑞西阿斯。但假设他不盲，骰子就已经这样掷出，这件事本身仍完全可笑。你们跟上了吗？

让-贝特朗·蓬塔利斯——可是，这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拉康

我们会再回到它。十分惊人的是，符号在同实在的关系中的功能给通常关系带来某种表面上的摇摆——之所以只是表面摇摆，是因为它反而让事物保持惊人的稳定，并促使我们到你们不习惯寻找稳定的地方去找——而这种摇摆仍会使你们陷入某种迷惘。

说到底，如果要描述你们——我不是指你本人，而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会说，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相信的东西之多。我为你们找到了

一条十分奇特的 1277 年法令。在那种黑暗与信仰的时代，人们不得不颁布一些法令，约束坐在索邦大学及其他地方课堂长凳上的人；其中尤其禁止他们在弥撒期间公开亵渎耶稣和玛利亚之名。

我要提醒你们，你们已经不再这样做。你们不会再想到亵渎耶稣和玛利亚的名字。我本人认识一些非常超现实主义的人；他们宁愿被绞死，也不肯发表亵渎圣母的诗，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毕竟可能因此遭遇某种事情。

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法令对那些在神圣祭献期间、于祭坛上掷骰子的人规定了最严厉的惩罚。我认为，这些事情可能曾存在于一个我们所知不多的时代，这一点似乎暗示了某个有效维度或层域的存在；而我们的时代奇异地缺少它。我向你们谈骰子、让你们玩猜单双游戏，并非毫无理由。

毫无疑问，把骰子游戏带到祭坛上会构成某种丑闻，在神圣祭献期间这样做就更是如此。不过我认为，这种事曾经可能发生，恢复了一种能力；在我们所属的环境中，这种能力远比人们以为的更加遭到抹除。它的名字很简单：一种批判的可能性。

第19课 · 1955年5月18日

今天，我们尝试在我所谓意指性坚持同弗洛伊德的死本能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一地带，再向前走一步。上次你们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方向并没有偏差；它们都触及我们在这里尝试澄清之物的敏感点。我想，你们会在途中认出，接下来的道路如何回答其中若干问题；至少我会尽量不忘沿途提醒你们注意。

你们已经清楚看见，我们正在抵达一个十字路口；它把我们带到弗洛伊德立场中一个完全根本的点。你们会看到为什么我要说，我们所在、所处的这个点本身就是十字路口。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在这里几乎可以随便说什么；但这种“随便什么”恰恰不是随便什么，因为无论说出什么，对懂得倾听的人而言都会始终严密。

我们抵达的点无非是：一种——没有合适的词——如果你们愿意称作人类学，或同样称作宇宙论的东西是什么？在我们所在之处，一切开始得到表述并以欲望为起点的东西又是什么？人们恰恰总倾向于忘记这一点。因为，弗洛伊德要求我们在精神疾病现象中理解的中心恰好就在这里；这件事本身如此具有颠覆性，以至于人们只想到远离它。

让我们清楚了解自己身处什么之中。理由很简单：当你们尝试思考这项经验时，理论概念会引导你们；你们当然会在那里重新遇见一切理论的必然性——理论必须铭写在概念化的必要框架以及展开自身的公式中。因此，一个在理论层面占据前景的概念建立起来了：力比多。力比多使我们能够以包含某种序列、也包含相对客体化的术语谈论欲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们的行动就移动在这个层面。你们必须得出对象及其存在、接合、安排的概念，得出某种已经存在之物的概念。但是，如果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妥帖、衔接得如此顺畅，我看不出你们的介入如何能够建立在它实际建立的层面——仅仅凭言说的介入。我会尝试让你们感受这一点。

让我们从力比多出发。如果你们愿意，力比多就是量的计量单位。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并不知道怎样测量这个量；但你们始终假设它在那里，而且正是借助它的变化、借助这个由量的概念统一起来的东西，才能赋予质的效应之接续以连贯性。我们必须清楚，所谓质的效应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存在状态和状态变化；为了解释它们的接续与转化，你们总会或多或少暗中诉诸一个阈值概念，同时诉诸水平与恒定性概念，用来解释：

- 效应为什么能够改变；
- 某种看似新颖的东西为什么能够建立；……因为，这个量的单位在概念本身以及你们使用、倡导它的方式中始终未分化；它无法在某个状态里完成释放、扩散，找到正常展开、平衡、经济和闭合周期，而不产生某种越过、溢出现象。

从那里开始，其他状态显现出来，并以某个假定之物为基础；它始终是这个 x——力量或能量，但无论如何，是能够进入等价关系的量。问题始终是力比多的转化、退行、固着和升华。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统一术语；我们只能以量的形式来设想它，它的名字就是力比多。

这个概念被用来以这种方式统一场域——它确实是精神分析效应场域的一种统一形式——以前，力比多概念从弗洛伊德经验最初强调的那些点中逐渐产生。

所以，它最初并不具有这种用途，也不能倒过来覆盖它在经验中的来源。要达到我刚才唤起的成熟用途——你们如今完全正当地普遍使用它——力比多这个统一术语会把性欲各阶段的不同结构场域统一起来，例如口腔期、肛门期与生殖器期；力比多理论最初正是以这种形式投入运作……

这以 1905 年的《性学三论》为基础，你们都知道它的年代；

……但不要忘记，这种力比多场域的统一理论，直到很久以后才出现。

换言之，《性学三论》中涉及这一点的部分写于 1915 年；而在大致同一时期，这套场域理论已经变得极其复杂，因为自恋投注的介入已经引入一个远为复杂的维度。

力比多概念从何而来？现在应当作几点回顾。它的概念性、认识性用途显然只能处在一切理论的传统路线中：某种被完全投射并看见的东西，一个自身趋向——这是经典物理学的终点——完全统一场域概念的世界；我们不妨把它称为爱因斯坦式物理学的理想。当然，我们尚不能把自己可怜的小场域归入普遍物理场域，但它具有同一个理想。事物就是它们所是；它们彼此以确定方式接合。

归根到底，任何时刻只要完全认识这个场域的总体，我们就能由此生成它的全部过去和未来。这严格说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理论场域；理

论［θεωρία，theōria］就是直观、乃至静观。事实上，其中没有任何位置留给严格意义上的新实现，没有留给 Wirken、严格意义上的行动。主体始终是单一且纯粹理想的主体。

显然，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弗洛伊德经验带给我们的东西。弗洛伊德经验在本质上、依定义完全从同这种理论视野恰好相反的概念出发。它首先设立一个欲望的世界；而且在一切经验之前就设立这个欲望的世界。它并不从任何预先考虑出发，认为呈现的世界下面是表象世界，表象背后还有一个更加真实的本质世界。它不是事物的世界，不是存在的世界，而是欲望本身的世界。

这就是起点。欲望在弗洛伊德世界内部、在我们经验展开的世界里得到设立；它在这个世界的核心得到设立，以便构成这个世界。在运用经验的任何一个最微小瞬间，这一点直到最后都绝不能被抹去——即使我们谈论眼下挂在嘴边的著名对象关系时也一样。

对象关系用法产生的全部歧义十分明显：它倾向于把对象关系变成一种调节模型、一种主体适应其正常对象的模式；这同经验在“对象”一词下所暗示的东西如此相反，以至于每一刻这种用法当然都只是滥用。即使在采用该术语的作者笔下，真正赋予“对象关系”以意义、使它能够用于分析经验内部的东西仍会重新出现，即：

- 这个对象的结构、成熟、充实与完成，恰恰取决于力比多；
- 如果我们谈力比多发展，谈前生殖器阶段相对于生殖器阶段，那是因为人们假定：恰恰在生殖器阶段，力比多会使一个对象在世界中涌现；这个对象代表着一种充实、可能的完成、一种对象的完整现实。而此前人们认为这一完整现实尚未达到；那时存在的是对象的

另一种结构化，从字面上说，是对象的另一种存在类型，取决于主体自身的欲望。

这同人的世界关系之传统理论毫无关系；后者位于表象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一边。这里不存在类似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在经典理论视野中，还有某种先于这一切的东西：共同适配、共同认识［co-naissance］……

这个双关依然保有全部价值；正是借助它，认识理论位于一切关于人同其世界之关系的阐发核心；

……而且始终或多或少存在一种对事物的符合：

- 某种无论如何都会接近事物的东西；
- 主体中某种必须同事物相符合的东西；
- 一种存在同存在的关系；
- 一种认识性的主体存在——但它仍是一种存在——同实在存在的关系；一种知道自身存在的存在，同一种被知道存在、也确实存在的存在的关系。人们甚至走得更远：在经典立场中，绝不可能消除这一点。

显然，弗洛伊德经验场域位于并开始建立于完全不同的关系层域。作为起点与根本点的欲望关系，无疑是一种存在同根本匮乏的关系：

- 同一种匮乏——严格说来是存在之匮乏——的关系；
- 这种匮乏不是缺少这个或那个；
- 而在本质上，是存在同一种匮乏的关系；存在恰恰凭这道匮乏而存在。

这道匮乏真正超越一切能够向主体表象它的东西；后者永远只被呈现为帷幕上的一道反光。

现在，力比多的特性不再取决于它作为量的理论用途，而取决于它为我们发现的全部根本冲突注入活力。这个冲突并不处在人类行动和经验的边缘；但我们只能在边缘看见它，因为到了中心，我们就必然相信它在那里，相信事物已经在那里。

弗洛伊德经验究竟教给我们什么？它准确地教导我们：在所谓意识场域中发生的一切——也就是辨认已经建立、稳固的对象所在的层面——没有任何一样是真正所涉及的东西。存在所寻找的，恰恰是这样一种东西：相对于它，这一切不仅可能骗人，而且确实骗人。

力比多概念本身只要被理解为创造对象不同阶段的东西，就恰恰表明：这些对象从来不是那个东西，除非在它完全就是那个东西之时。然而，这一切以生殖器力比多为中心；后者在我们的主题以及对这项经验之独一性质的感受中代表着一道彻底深渊式的结合。它处于一切可表达之物的界限，带有不可言说性质；在分析中必须这样说，因为

只要知道怎样把它表述、结构化，我们就会重新落入各种矛盾，包括自恋的僵局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

因此，欲望的功能与概念之所以位于全部人类经验的中心，其特征恰恰是：它是对任何不可命名之物的欲望。

与此同时，正是这种欲望为一切活力提供来源。因为，严格说来，存在恰恰在这道自身匮乏中并非只是来到存在——而且这一点不应令我们惊讶……

因为，如果存在只是它已经所是的东西，甚至不会有谈论它的位置；

……存在正依照这道自身匮乏而来到实存。

正是在这种欲望经验内部，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存在会到来，甚至会相对于存在达到某种“自我感”，而这恰恰依照这道匮乏而发生。

从这道匮乏的经验、从对那个什么也不是的彼岸的追逐出发，主体根据自己相对于所缺失存在形成的自我感，又回到一个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之感觉。这个存在只是他自己在事物世界中的反光，陪伴着眼前其他所有存在；而那些存在确实不知道自己。

经典理论把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对自身透明的存在——置于人类经验中心。在这个视野中，它却显得只是把欲望的存在放置于对象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个欲望的存在无法看见自己，除非在自身的匮乏中看见，也就是感受自己赖以生活的存在之匮乏。它可以在这道存在之匮乏中察觉，自己恰恰缺少这种存在；而相反，存在就在所有那些不知道自身存在的事物中。

主体把自己同它们并列，作为又一个对象，由此想象自身，因为他看不出其他差异。他说："我就是那个知道自己存在的人。"遗憾的是，十分明显：他也许知道自己存在，却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这恰恰是每个存在中所缺失的东西。

总之，这里发生了一种混淆：一边是某种从根本无助中竖立起来的能力，存在借此以临场升起，却以缺席为背景；另一边则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意识能力、意识化。后者实际上只是一切可能幻象的抽象、乃至经过抽象化的中性形式。

人们始终格外关注意识，势所必然。尽管如此，弗洛伊德经验把我们引向这样一种东西：人际存在之间真正建立相互关系世界的环境，位于意识场域之下——正因如此，它才叫作无意识——而在这个层面，问题在于作为人类世界之原初结构化的欲望。

根本概念、决定性一步，即所谓"哥白尼式革命"——你们最终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糟糕术语、粗陋隐喻——因为哥白尼固然完成了一场革命，但恰恰是在事物已经存在、已经得到规定并且完全可以规定的世界里完成的。

但我会说，这是一场朝相反方向的革命，因为哥白尼以前的世界之所以具有原来的结构，恰恰因为人早已被大量放入其中。人们从未彻底澄清这种人之成分，但哥白尼革命已经澄清得相当充分。

弗洛伊德迈出的步伐，原因绝不限于治疗这个或那个患者的短暂经验；它真正对应一场建立在全部哲学场域——我们必须直呼其名——建立在人能够如何思考自身及其经验的全部场域上的革命。这场革命让人作为创造者重新进入；与此同时，他也可能彻底被剥夺自己一度

如此轻快进行、看起来一度如此轻快进行的创造。经典理论始终把一个窍门搁在一旁，借此才得以创造："上帝不会骗人。"

这一点如此根本，以至于人们经常谈论的爱因斯坦仍然回到了这里。他说：

"上帝、全能者肯定有点狡猾，但并不无赖。"

爱因斯坦回到这里，并不只是为了取悦记者；何况，他也不只对记者说这句话，还把它写了下来。上帝不会骗人，这对他的立场及其世界安排至关重要。他仍停留在笛卡尔的同一个点上。

如果置身于某种视野，就必须从"上帝不会骗人"这个观念出发。然而，我们对此恰恰一无所知！弗洛伊德经验的决定性要点可以概括为：请记住，意识并不具有普遍性。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写得非常清楚。意识从来只在那些被假定于社会层面代表它的器官——例如报纸——上进行操作；这完全不同于那种假定的弥散能力、那种世界的超级澄清，仿佛其中还蕴含某种力量——恰恰就是"进步的力量"——把意识带到这里：这种构想把意识视为自然进化的终点，并让它在那里保留全部威力。

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违背我们的全部经验——可以说是现代经验。人从长久受"意识属性""意识德性"迷惑的状态中醒来：人的存在被重新引入自身固有结构，也就是欲望。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解释存在什么？人！当然不是作为群畜的人，而是说话的人；而这种言说把某种同全部实在一样沉重的东西引入世界。

请重新拿起并考察我们对性欲望概念的持续使用。无论在阐发与思考经验的方式中，还是在阅读任何弗洛伊德文本的方式中，你们都会看到，“欲望”这个词本身只要得到有效运用，连同它完整而通常的意义……

这里并不涉及把它限定为“情感性的”或非情感性的；你们每次使用“欲望”一词时，未必都会激动；

……才真正渗透一切推导出来的东西，赋予它们重量与效力范围。

在表述经验的方式中，我们假设这种欲望不只是某种抽象定义的东西，不只是由一个行为周期界定的某个 x——就像物理学最终以净化方式使用“力”一词：某种被假定处在一个特定周期完成之下、并在其中找到目的与终点的东西。

欲望本身并没有什么被对象化的东西。它为我们所用，而且十分方便，使我们能够描述某一生物学周期，更准确地说，描述若干多少同生物学装置相联系的周期。然而，我们对它的使用，被设想为一种完全现实而有效的使用。正因为主体真正欲望着某种东西，而不只是某种欲望多少显在的支撑者，我们才能从它的果实、它的结果中确认它。总是因为主体确实在那里欲望着，某种东西才会发生；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一点。

换言之，这里所说的欲望先于一切概念化。一切概念化都从它之中产生。而且我们也习惯以这种方式思考，因为我们假定，主体以多少连贯的方式自认所拥有的那份反思确信，其中大部分：

- 都纯粹只是一种完全表层的安排；正如我们所说，它是对其欲望所孕育之物的次生合理化与辩护，而欲望则赋予主体周围一切以根本的曲率；

- 又是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最贴近那个构成并组织其世界的点：主体自身的行动，以及他使用那些据说由他支配的自身装置的方式。

因此，我们对欲望一词的使用中存在一种根本歧义：我们一会儿把它当作被对象化的某种东西——因为这非做不可，我甚至会说，哪怕只是为了谈论它；同时，我们又承认它的在场、它的实例，是某种先于一切对象化的原初之物。

很清楚，我们必须回忆这一点，不能忘记它；尽管我们总有一种忘掉它的倾向，总以为自己又站稳了脚跟、重返了科学世界，以为只需改变现有事物的条件，就能得到不同的效果与结果。如果确实如此，那我们当然根本不再需要做精神分析；因为——除非如人们所说，进入“巫术思维”——我们完全看不出，欲望以及它被对象化的周期，为什么能在一种言说经验中受到任何影响。力比多是决定人类行为的东西，这并不是弗洛伊德的发现。

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一种关于歇斯底里的理论：子宫是“一只生活在女人体内的小动物”，要是不给它东西吃，它就会闹得异常厉害。他选这个例子，显然是不想选一个更明显得多的例子，那就是男性性器官；它凭着自己的阵阵躁动，并不需要任何理论家便能引人注意。

人们很早以前就知道，力比多显现的客观事实同人类经验有某种关系。可是亚里士多德绝没想过，对“女人肚子里的小动物”发表一番言说，事情就会好起来。换言之，用一位艳曲作者的话来说——在他的亵渎里，他有时会被一种近乎预言的神圣狂热所攫住：

> “它不吃面包，也不说话；何况它什么都听不进去，一点道理也不听。”

问题在于，我们到底在做什么：难道我们已经让它们听进道理了吗？很清楚，并没有。按定义说，它听不进道理。既然一种言说经验能在这一问题上起作用，我们就必定已经处在别处；此处所说的欲望当然并非同那一欲望毫无关系。全部问题正在这里。可如果它不真的就是那一欲望，你们便看到我们走到了哪里：我们正好来到这个问题——在弗洛伊德经验提出欲望问题的层面上，我们为何仍被要求把它体现于那一欲望中。因为归根结底，问题就在这里。

亲爱的瓦拉布雷加先生，当您说梦里存在若干“欲望满足”时，您所说的便是这种东西。我当然假定，您心里想着儿童的欲望如何在梦中得到实现；当然，也想着一切幻觉性的欲望满足。

可是，有件事情非常惹人注目。首先，就弗洛伊德自己所说的而言。他告诉我们：没问题，这里的欲望粗简得多；我们看得出这是儿童的欲望，因为那里没有加工。他在白天直截了当地表露自己想吃樱桃，到了晚上便梦见樱桃。然而，弗洛伊德先生却仍然强调：即使在这个儿童阶段，无论显现的欲望采取梦还是症状的形式，它仍将是一种性欲望。这不得不令人惊讶。

这一点绝对根本，他永远不会放弃。请看《狼人》，那一刻极富启发性：我们回到了不同于经典理论的某种东西——就是单纯的经典理论，那个θεωρία（theôria）。我们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走向了灵魂；也就是说，在荣格先生那里，力比多淹没于灵魂的种种兴趣之中，灵魂便成了伟大的做梦者、世界的中心、主体的空灵化身。

弗洛伊德绝对而根本地反对这一点；他坚持自己的独创性。我们首先只限于弗洛伊德的说法：他对自己所说的话决不让步；即使在一个对他极其险恶的时刻也不让步——当时他不免想要接受荣格式还原，因为他在那一刻发现：毕竟，主体过去的整个图景也许不过是些幻想。于是，一扇门打开了：可以从那个被海市蜃楼定向、捕获的欲望，转向普遍海市蜃楼的观念。但这也不是同一回事。

每当谈到欲望时，弗洛伊德都保留性欲望这一术语；这种坚持恰恰在那些情形中获得了全部意义——例如梦见樱桃的儿童——因为在那些情形中，表面看来明明是另一回事，是需要的幻觉性满足。这看起来非常自然：需要为什么不会以幻觉的方式呈现呢？我们很容易相信这一点，正因为这里确实存在一种二阶海市蜃楼，也就是所谓"海市蜃楼的海市蜃楼"：既然我们经验过海市蜃楼，它出现在那里似乎自然不过。

但只要开始反思，我们就必须对这个事实感到惊讶：首先要对所见之物感到惊讶，然后要追问为什么会有海市蜃楼。我们必须对海市蜃楼的存在感到惊讶，而不只对它向我们显示的东西感到惊讶。另一方面，我们先把弗洛伊德放到一边，也先不谈他为什么执意坚持：此处所说的欲望……

只要它是人类经验整个部分领域的创造者

……就是性欲望本身；而他又如何不顾一切合理外观而坚持这一点：

“要是你肯回到这个观念，承认毕竟这些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利益，事情会多好，我们会多么心意相通；把门打开吧！这个性欲望，难道你就那么舍不得吗？”

〔对让-保罗·瓦拉布雷加〕——稍等一下，瓦拉布雷加……

另一方面还有经验，而人们偏偏不在它面前停留：无论是儿童的梦中幻觉，还是饥饿者的幻觉，人们都没注意一个小小的细节：当儿童白天想吃草莓时，无论人们怎么说，他都不只梦见草莓。举小安娜·弗洛伊德为例——如果我没记错，这里说的正是她；用她那种缺少某些辅音的儿童语言说——她还梦见布丁或蛋糕，总之是一整串东西。这同饿得快死的人完全一样：他绝不会梦见能使他满足的一块干面包或一杯水，他梦见的是庞大固埃式的盛宴。

奥克塔夫·曼诺尼——樱桃之梦和蛋糕之梦并不是同一个梦。

拉康

正是如此。这里所说的欲望，即使是人们所谓尚未加工的欲望，也已采取了一种形式，显出它早已超出需要的契合；正是这一超出与欲望的显现在维度上相关，而后者处在弗洛伊德经验的中心、核心。这种欲望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极其成问题的欲望，哪怕是最简单的欲望也一样。

奥克塔夫·曼诺尼——欲望并不相同，因为她讲述了自己的梦。

拉康

我当然知道，您对我所说的东西理解得精妙绝伦。请容许我留在自己一直坚守的简单明证层面，因为当然，您很清楚，归根结底，问题只在这里。但这对每个人并非都是明证，所以我试图把明证带到它能够触及尽可能多的人之处。归根结底，在我们这里所说的层面，确实涉及那个存在论层面：如果我们想把力比多当作某种东西来谈，就只能以神话方式恰当地谈论它。归根结底，这里所说的力比多就是“埃涅阿斯子孙之母，人与神的欢悦”[注1]。

> [注1] “埃涅阿斯子孙之母，人与神的欢悦，滋养万物的维纳斯……”（卢克莱修）。

弗洛伊德所说的就是这件事。某种东西在此重新返回；人们曾在某个时刻以诸神的层次表达过同一个东西。因此，在例如把它变成一个代数符号之前，总还需要采取一些谨慎措施；两者未必等价。代数符号极其有用，但条件是必须还给它原有的各个维度。我向你们谈机器时，尝试做的正是这件事。很长时间里，人们都说 deus ex machina（机器中的神）；那么，我之所以向你们谈机器，是因为我试图把它 ex deo（从神中）抽取出来；但所说的始终是同一件事。

在弗洛伊德经验中，我们就走到这里。这使我们置身自己问题的核心。弗洛伊德是在什么时候向我们谈一个超越快乐原则呢？恰恰是在精神分析家们走上弗洛伊德所教给他们的道路、并因此自以为已经知道的时候——既然弗洛伊德告诉他们，欲望就是性欲望。他们信了。这恰恰是他们的错误。因为他们并不理解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全部问题都在这里。

归根结底，欲望为什么大多数时候都不是它表面所显现的东西？为什么它会是弗洛伊德称作性欲望的那种东西？他这样称呼并非没有理由，但这个理由实际上是被遮蔽的。它被遮蔽得一如性欲望本身对遭受它的人所作的遮蔽：他穿过一种遍及整个自然、同样从属于一切诱饵的经验，向后、向彼方寻找。倘若有某种东西……

不只在生活经验上，也在实验经验上

……使我们有机会在动物行为中显示诱饵的效力，那便是性经验。

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在那些使任意一个对象或外观成为动物趋向其伴侣时所趋向之物的各种内涵上，欺骗它。有关捕获性格式塔的置换、触发物、先天释放机制的全部观念，都登记在求偶展示与交配的范域内。同样，就在弗洛伊德坚持性欲望处在人类欲望的核心之时，我们也在知识层面遇到一个类似现象。他的所有追随者都信以为真，把它变成一门科学，并认为事情再简单不过：既然这就是性欲望，它便是一股恒定的力量。只须清除——清除什么呢？——那些障碍。

只要清除障碍，只要这不过是另一个诱饵，一切就该自行运转。只须告诉他们：“你没有察觉，但对象就在那里”——归根结底，这就是初看之下以解释面目出现的东西。

只是，我们发现这并不奏效。到了这一刻，转折就出现了：人们说主体在抵抗。为什么说他在抵抗？因为弗洛伊德也这样说过。他把这称作“抵抗”。于是：

- 弗洛伊德说这是性欲望时，人们没有理解他说的话；
- 他说“抵抗”时，人们同样没有理解。

人们以为必须推。我们就在这里进入了一种机制。我使用“坚持”一词并非毫无缘由，它有自己的根据。这只是精神分析家自己也完全屈从于诱饵的时刻：我已经向你们充分展示过，在受苦主体那一边，这种坚持意味着什么；而精神分析家现在也把自己放到了同一层面，他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着，当然要愚蠢得多，因为他的坚持是有意识的。

但一旦走上某条道路，事情势必走到这一步。我们将看到它会把我们带往哪里，带往一些非常确切的问题。

举例来说，有一种关于强迫性神经症的观念，归根结底，我们任由它在精神分析圈子和环境中逐渐浮现；这种观念涉及应当如何治疗强迫性神经症，以及精神分析家的行动在这一层面上意味着什么。只要像我们正在做的那样定准方位，就足以看见其中巨大的危险；当人走上某条道路、以某种方式理解强迫性神经症时，他实际上做的究竟是什么，也会随之显现。

目前，我只指出这一发展可以在何处回到对精神分析技术的严格批判：在强迫性神经症的层面，人们如何构想精神分析家与被分析者之间那个闻名的对象关系，以及我们正在尝试使人理解的东西。我还是想指出这一点：在我刚才为你们打开的视角中，阻抗是你们挑起的。

就你们对阻抗的理解而言——也就是说，一种会抵抗的阻抗——它之所以抵抗，是因为你们正压着它。要做的是解放症状中的那份坚持。归根结底，主体那一边并没有阻抗。

弗洛伊德本人在这种情形中所称的惰性，并不是一种阻抗。同任何一种惰性一样，惰性是一种理想点。是你们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才假定有这种惰性存在。在假设中，这是正确的。如果你们想正确理解主体出现阻抗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必须看到，这只是意味着有一个过程；而为了理解这个过程，必须想象一个零点。只有当你们实际上试图使主体从这个零点开始前进时，阻抗才开始存在。

换言之，阻抗就是主体的解释目前所处的状态；它是主体在当下的解释方式，是他此刻所在的点。这种阻抗是一个抽象的理想点。是你们把这称作阻抗；也就是说，他无法前进得更快。对此，你们没什么可说。他就在他所在的点上。问题是要知道他是否前进；当然很清楚，他没有任何前进的倾向。

但只要他开口说话，无论他说的话价值多么微小，你们都必须把这看作他当下的解释，并把他随后所说的一切看作他一系列前后相继的解释。真正意义上的阻抗，是你们放进其中的那个抽象；也就是说，你们引入了这样一种观念：那里有一个死点，如果事物要前进，就必须有一股力。如果你们的操作正确，你们称作阻抗的便是这个零点。

如果你们从这里走向所谓“清除阻抗”的观念——人们动辄就这样写——那就只会走向纯粹而简单的荒谬。这等于在创造了一个抽象之后，又说必须使这个抽象消失；换言之，就像说必须不存在惰性。

只有一种阻抗，就是精神分析家的阻抗。当精神分析家不理解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时，他就在抵抗。当他没有看到以下一点时，他就不理解自己所面对的东西：从他引入一个纯粹而简单的抽象的那一刻起——也就是说，当他引入一种解释，却相信自己所面对的是某种客观之物，相信自己只须向主体指明，他所欲望的就是某一或某二性对象；当他认为精神分析的问题在此，认为在精神分析中起作用的就是这一点时，他就错了。

他错了，因为是他自己处于惰性与阻抗的状态；他没有理解，问题并不是向主体指出某个或某些充作其当下欲望对象的对象，而是要教他命名，教他分节表达，教他使这一欲望进入存在。字面上说，这一欲望就其自身而言、就它作为欲望而言，处在存在之前。

这就是它为什么坚持不息。总而言之，这是一种不仅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欲望，而且它不敢说是有充分理由的：它还没有使这个名字涌现出来。

这发生在言说的根本关系层面，发生在一个项的引入层面。这个项是世界中的一种新在场，以下事实将相对于它得到结构与组织：

- 它在这里或不在这里；这个项引入了在场本身，并且同时挖出了不在场本身；
- 精神分析的有效行动就发生在这一层面；
- 问题不是辨认某种早已完全现成、等待着同某物契合的东西；
- 而是在创造某种东西的层面：严格地说，只要对它加以命名，就使它涌现出来；
- 只有在这一层面，解释的行动才是可以构想的。

在弗洛伊德的文本本身中，我们就有机会察觉这一点——我们回到文本，因为我们始终在文本与经验之间往返摇摆。我想先说明这一点，然后我们将转向弗洛伊德的文本，看看归根结底，问题是否正是一种超出任何可由这些条件界定的本能周期的东西，看看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所说的是否正是这一点。

但眼下，为了说明我正试图在你们面前分节表达的东西，为了赋予它具体形态，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有一个例子。我选了这个例子，因为它恰好落到我手边：俄狄浦斯之后的俄狄浦斯，也就是当俄狄浦斯已经完成之时的俄狄浦斯。

俄狄浦斯已然完成，俄狄浦斯成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同名英雄，这并非偶然。人们本可以选择另一位英雄；偏偏是这一位，并非偶然。希腊神话的所有英雄都与这个中心神话不无关系；他们从其他侧面体现

它，显出它的其他面向。我们有理由相信，弗洛伊德被引向这一位英雄，并非毫无理由。但对我们当下的考察而言，重要的是：俄狄浦斯在自己的生活中完全就是这个神话；他什么都不是，只是这个神话本身进入存在的过渡。他是否真实存在过，对我们无关紧要；因为他以一种反思程度或深或浅、被推入此或彼一重迷宫的形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之中，无处不在。所以，他的存在远甚于他当真真实存在过。

我们可以使用“真实存在过”这种表达。相反，我却惊讶地看到，我们的一位同行在论及典型治疗时，写下了心理现实这一术语，并把它同真现实相对立。我并不反对心理现实；但是对于真现实，我想自己已经使你们全部处在一种足够的暗示状态，使这个术语在你们看来已经是语词自相矛盾。

不过，我们可以说某物存在，或者说它并未真实存在。我们也立刻看到，它是否真实存在过，其实何其不重要。即使它并未真实存在，它也完全可以就这个词的充分意义而存在；因为存在的定义恰恰就在于：一切存在自身都包含某种如此不可能的东西，以至我们确实永远在追问它的现实性。

因此，俄狄浦斯存在，而且彻底实现了自己的命运。他一直把它实现到终点：他不再是任何东西，只与那种彻底的雷击、撕裂、自我撕裂相同；他绝对什么都不是了。正是在这一刻，他说出了我上次向你们提到的那句话：

“难道是在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才成为一个人？”

这句话是我从上下文中抽出来的。我必须把它放回原处，以免你们因它产生某种幻觉，例如以为“人”这个词在这里具有任何意义。它严格

说毫无意义；因为俄狄浦斯已经达到这一言说的完全实现，而这一言说从来就在那里。甚至在他尚未出生之前，它就已存在于那些指定了他的命运的神谕之中；因为正是在他出生之前，人们就向他的父母说了那些话，使他一出生就必须被猛推向自己的命运：被一只脚倒挂着遗弃。

而且，一切可能性正从这一起始行动开始；也就是说，他实现了自己的命运。因此，一切从一开始就已被完整写下。只有在一切所写之物都实现到底的限度内，俄狄浦斯才以自己的行动确保了它。这并不发生在他做出那些无意识行动的时刻；他自己说：

“这根本不关我的事。这个女人是人们给我的；底比斯人民欢欣鼓舞、激动万分，把这个女人给我，作为我把他们从最可怕的灾祸——斯芬克斯——中解救出来的奖赏。至于那个家伙，我不知道他是谁。我揍了他一顿；他年纪大了，一下就被我打垮了，这不怪我。我下手是重了点，可当时我身强力壮。”

他在自我残损的时刻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而且，他在接受王位的时刻就已接受了命运；从那一刻起，他接受成为那个承担全部重量的人——而唯一使他成为王、唯一使他确实是一个人的东西，就是言说。

正因为他是王，他才能把诅咒召到城邦之上。从此，位置就有了秩序，报偿与惩罚就有了法则。从这一刻起，一切落到俄狄浦斯身上就再自然不过，因为他是言说的中心结点。问题是他会不会接受。他接受了，因为他撕裂自己、残损自己。他一直接受到底。他认为自己毕竟是无辜的。但当他向人们说话，当问题只是让他在复仇女神们的神

圣围地里、在科洛诺斯坐下时，他就把言说实现到了底。也正在那一刻，他发现底比斯仍在议论纷纷；也就是说，有人对底比斯人说：

“等一下，当心：这回你们做得有点过火了。依据一个人类世界的法则——那个世界始终是同一个，它在根本上赤裸、绝望，毫无慈悲可言——你们正是从这一刻起犯了错。让俄狄浦斯惩罚自己，这非常好。只是从那一刻起，你们又觉得他令人作呕，把他处死了。可是，底比斯的命运与未来生命，恰恰取决于

这一肉身化的言说。它当时明明就在那里，带着它消除人、撕裂人的人类效果，你们却不知道辨认它；而后你们把他流放、驱逐了。倘若你们不把他带回来——哪怕不带回领土之内，至少也要放在旁边，免得他从你们手中逸走——底比斯就要大祸临头。因为，如果那个就是他命运的言说跑到外面游荡，它也会把你们的命运一并带走。将由雅典收取那份真正存在的总量，并借此确保它对你们的一切优势与凯旋。”

从这一刻起，人们开始到处追他。必须把俄狄浦斯带回来，必须试着明白：恰恰就他当下的形态而言，俄狄浦斯才是最要紧的人。所以，当俄狄浦斯得知自己确实将接待许多访客——各种各样的使者、智者、政治家、狂怒之人，还有他的儿子——他便说：

“难道是在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才成为一个人？”

故事的后续便从这里开始：超越快乐原则。超越快乐原则就是这么回事：当一个人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一言说，当言说已被完全实现，当俄狄浦斯的生命已经完全通入自己的命运时，那里还有什么？俄狄浦斯还剩下什么？为了承受这一切，毕竟仍然有一个俄狄浦斯。

要是不曾有俄狄浦斯，就既不会有俄狄浦斯的故事，也不会有俄狄浦斯情结。问题是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一点。我刚才在辨认到迷恋之时，已经开始触及它；又或者说，在这一根本戏剧、这一命运最赤裸的实现最终处，我开始触及那种彻底的缺席：那个全然的空，对慈悲、手足之情以及任何同所谓人类情感有关之物的绝对缺席。

《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的主题可以归结为两句话：

- 歌队说："归根结底，最好从未出生。要是已经出生，最好尽快死去。"

- 俄狄浦斯说："愿最根本、最彻底、最绝对的诅咒，降临于后世以及这座城邦——他归根结底正是为它被献为燔祭——

愿最根本、最彻底、最绝对的诅咒降临。"

要想真正理解《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究竟所言何事，就必须读他对儿子波涅伊克斯发出的诅咒；后者来找他，对他说："把我从这里救出去，情形太糟了。"

随后还有对言说的否认……它在哪里发生？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整出戏剧都发生在一片围地的边缘；那片围地恰恰是不许说话的地方，复仇女神们就在那里——她们绝不宽恕，会在人的每一个转角把他追上。围地中心有一个地点，那里必须严守沉默。每当人们想从俄狄浦斯嘴里问出三言两语，就得让他稍微离开那里；因为如果他在那里说出来，事情就会变得很糟。你们会看到，"事情会很糟"究竟意味着什么。

很明显，神圣之物总有其存在的理由；总有一个地方，言说必须在那里止步。为什么？全部问题都在这里。也许是为了让它们留存于这片围地之中。他将把那个人带到那里，对他说出一件不可向任何人泄露的事；不可向最亲近的人泄露，甚至不可向他的孩子们泄露——他们依照诸神的命令陪在身边，帮助他延续那悲惨的生命。他将把这件事复述给忒修斯。

在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俄狄浦斯死了。他的死发生在极其特殊的情形中：有一个人在远处目送两个男人走向圣地的中心；他朝那个方向走了几步之后回过头来，此时只看得见其中一个人，正以手臂遮住脸，摆出一种神圣惊恐的姿态。

在文本稍后之处，人们还会暗示，毕竟有某种东西必定停在了那里。我们觉得那大概并不好看。严格说，那位人字面上说出最后言说后，其在场便以这种方式挥发了；我不知道这对古人的想象意味着什么。因为我相信，《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在这里暗指某种我们从未弄清"秘仪"向人展示了什么的东西，而秘仪一直存在于后台。但对我们的想象而言，如果我想为自己找一幅图像，我会去一个曾经找到诸多例子、藉以使你们理解事物的地方：埃德加·爱伦·坡。

埃德加·爱伦·坡一直在触碰生与死之间的关系，而他的方式并非毫无意义。如果要找一种东西，使它同俄狄浦斯液化的故事构成类比或回声，我会说，那就是著名的瓦尔德马尔先生病例的故事。我来提醒你们其中说了什么。

这确实涉及通过当时所谓"磁力"的途径，在言说中支撑主体；"磁力"正是当时对催眠的理论化形式。人们要在某人弥留之际（in articulo

mortis）催眠他，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这不是一个正在说出临终遗言的人，而是一个已完全走到生命尽头的人。

人们选了一个已经烂得不成样子的人：人们告诉我们，他一边只剩下一小块肺，其余各处都已在死去。事先向他说明，如果他想成为人类的英雄，只须向催眠师打个手势；倘若在他吐出最后一口气前的几个小时里着手进行，人们就能看看会发生什么。

这是诗人一个美妙的想象。诗人总比我们胆怯的医学想象走得更远——尽管我们在这条路上使尽浑身解数，却没什么成功；或者说，同坡的叙述相比，至少只有微不足道的成功。果然，那个人在催眠中顺利离去了；人们清楚看见主体从生走向死，随后却数月之久维持着一种足够的聚合状态，仍然能呈现为某种尚可接受之物：一具躺在床上的尸体。更有甚者，这具尸体还不时开口，说“我已经死了”；这种情形当然多少使听众有些动容。

这种情形靠各种花招维持着，人们还会戳他的肋骨，好让自己放心；它一直持续到再也没有理由照此下去的时刻，人们便要看看唤醒他会得到什么。人们通过一系列手势进行唤醒——那些手势与使人入睡的手势相反——还能听到这可怜人发出几声喊叫：

“快一点！要么再让我睡去，要么就赶快做完。太可怕了！”

他早在六个月前就已说自己死了。但无论如何，一扇门总得要么开着，要么关上：人们唤醒了他。于是，瓦尔德马尔先生再也什么都不是，只剩下一滩令人作呕的液化物：

- 一种在任何语言中都没有名字的东西；
- 一切对人类命运的想象背后那一形象；
- 那个无法正视的形象；
- 那个只能经由遮蔽才被看见的形象；
- 某种甚至超出一切性质界定的东西，对它而言，腐尸一词根本不足以形容；
- 那个赤裸、纯然而粗暴的显现，生命这种膨胀之物的彻底塌落；

像一个气泡突然塌陷，溶解在没有生命的脓液之中。

无可争辩，俄狄浦斯的情形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整出戏剧与悲剧从一开始就向我们显示：俄狄浦斯当真只剩下大地的废弃物、废料、残渣；这个东西已被掏空一切诱人的外观，当真是一个令人惊骇而不忍观看的人物。

而当他当真被一切人类在场耗尽之后，一切使言说进入存在的行动也就随之完成。只要这涉及一种典范命运，他便注定承载这一言说；在此，命运与言说是同一件事，而存在完全就处在这一由命运分节表达、直面人类存在的言说之中。此时，剩下的只是生与死的这种交结：一种即是死的生，以及一种恰好位于生之下的死。弗洛伊德的文

本把我们带向的正是这里。在那篇长文中，弗洛伊德坚持强调这一点，对我们说：不要相信——

- 生命是一股非常美好的力量，像某种令人昂扬的女神，有一天从世界中涌现，最终走向最美丽、最令人昂扬的形式；
- 生命之中存在丝毫可以就其自身称作完成、实现或进步之形式的力量。

这就是弗洛伊德的文本。正如我刚才所说，生命是一个肿胀物，是一团霉菌；除了——正如某些人所写、所说，而且不只是弗洛伊德——它死去的能力之外，没有什么其他东西能界定它。生命就是这个：它自身不过是一种迂回，一种固执的迂回；它本身恰好终将消逝、朝不保夕、转瞬即逝，就其作为生命的意义而言，一无所有。生命就是这么回事。

要问的是：为什么在生命显现的某一点上、在那个名为“人”的点上，有某种东西在思考、在产生、穿过这一生命坚持不息，并被称作意义？这是一种我们称作人的意义。

但毕竟，我们真的那么确信吗？这种意义以如此方式呈现给我们，它当真那么属于人吗？

它以一种涌现的方式呈现；涌现出来的东西，其本质特征完全不是属于人，而是它就是一种意义：

- 也就是一种秩序；
- 也就是某种涌现的东西；
- 某种问世的东西；
- 某种一个生命执意要进入其中的东西；但它也许表达了某种完全超越这一生命的东西，因为在这一生命中，当我们直抵其根，穿过那场进入存在的戏剧之后，我们只找到这一生命本身——它在根本上同死相结合。

问题就在这里。弗洛伊德的辩证法把我们带向这里。为什么？直到某一点为止，人们原本可以相信，一切同死有关的东西毕竟都可以被包含在力比多秩序之内，只要我们把这一秩序看作由其对象关系所界定。那里只是偶尔有些错牌。如众所周知，另一个对象就在我们面前，等着我们砸碎他的脑袋——只是我们搞错了；人们说，主体同那个他者认同，于是把这种温柔的攻击性转回自己身上。这种攻击性被构想为一种力比多对象关系，构想为一种奠基于所谓自我本能、归根结底奠基于秩序与和谐之需要的攻击。

人总得吃东西。储藏室空了，就吞吃自己的同类。弗洛伊德理论在某一点之前，这套理论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此处重要的恰恰是：一切互相攻击都发生在力比多历险内部，而这一历险被构想为在生物秩序中受到对象化。生物被界定为同其他对象一样的对象，只是那里毫无疑问仍留有一个神秘的小角落：“它为什么是活的？”但毕竟，它的各种

决定及条件作用的连续系列都展现在面前，可以由这样的欲望观念来完全解释：欲望是恰当的欲望，是同一个对象相适应的欲望。

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这篇文本的意义就是：

- 这并不足够；
- 受虐狂不只是倒转的施虐狂；
- 这不只发生在想象性认同的平面上；
- 力比多同那些或在其外部、或表面上与它相反的活动——攻击性、毁灭等——之间的一切融合，都不能归到想象性认同的账上。问题涉及另一种东西，因为那里存在若干悖论；中心悖论、弗洛伊德的文本所坚持强调的悖论，就是转移本身的悖论。

这绝不可能在一种被看作封闭的力比多经济中得到解释；因为这种经济只由平衡的回归与快乐原则调节。至于原初受虐狂，它表达于这一事实：生命本身的最后一句话——一种超越一切生命的生命，一种在字面上被剥夺自己言说的生命——只能是《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终章所表达的那一最后诅咒。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正是这一点：生命凭自己——让我们换一种方式说明——并不想痊愈。负性治疗反应才是最根本的东西。痊愈是主体经由言说在存在中的实现；归根结底，这言说总是从别处来到他身上，并穿过他。

相关知识卡 **负性治疗反应**

真正的生命，我们被囚于其中的生命，是一种本质上异化的、外存的（ex-sistante）生命。它是在他者之中的生命，也是在另一个他者之中

的生命；后者超越了一切阻挡生命、使它能够受骗的帷幕。但这些诱饵也为它指路，并构成其中一个时刻。而在此岸，想要进入存在的，则是这一生命：它本质上就同死相结合，始终返回死亡；只有弗洛伊德在文中称作“外部世界的各项元素”的东西，才使它被拖入日益广大、也日益迂回的回路。

这一概念就是：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承受了生命的进步，承受了一系列激发；正是它们挑起了这一生命，而归根结底，这一生命只想着……

我是故意说“只想着”的，因为我们确实就在这里：生与死的这一关系所唤起的主体层面。瓦拉布雷加，您前几天谈到的睡眠欲望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是可以构想的：正是通过它，生命只想尽可能充分地休息。与此同时，在婴儿的生命之初，正是它以一段段的小时吞食婴儿的时间，只偶尔留给他睁开一只小眼睛的时机：我们得费好大的劲才能把他从那里拉出来，使他达到那种让我们同世界协调的节律。睡眠欲望并非无缘无故恰好出现在这一层面；无名欲望之所以能在那里出现，是因为那确实是一种中间状态。这种昏眠毕竟是最自然的生命状态。

……因此，归根结底，这一生命只想着死去。

“死去，睡去……也许还会做梦”〔《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某位先生恰好在问题涉及“活着还是不活”（to be or not to be）时，曾经这样说。只是，“活着还是不活”恰恰是一桩完全语言性的故事。一位非常精彩的喜剧演员曾试着向我们演示，莎士比亚是怎样抓着头想出这句话的：“to be or not”，然后他又重头开始：“to be or not, to be...”

可恰恰在这一刻，语言的整个维度浮现出来；它之所以好笑，正因为如此。梦的现象与笑话的现象位于同一涌现层面。要到达这一层面，根本不必费力；因为在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家那里，有一句话已在宗教仪式中浮现出来："最好未曾出生。"这句话当然并不非常好笑，但知道它曾经如此出现，毕竟十分引人注目。〔μὴ φῦναι：mè phunai，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

你们试想，要是做弥撒时说这种话！可当时在弥撒里就是这样说的！因此，它产生了某种效果。而且人们原本就期待它产生效果。要从这里回到我所谈的东西，并不困难。幽默家们立刻就接手了：

- "最好确实不要出生……
- 可惜——另一个人回答——这种事十万次里也就发生一次。"

这为什么是笑话？首先，因为它玩弄语词——这是不可或缺的技术要素，它必须涉及语词。可它恰恰也涉及某种处在两个时刻交接处的东西：一边是语词尚未存在的时刻，另一边是它们出现的时刻。当然，最好未曾出生！

毕竟，这确实意味着：在通往存在之前，那里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单一体，对它绝对无话可说；而只有在存在之中，它才当真可以坚持不息。但我们毕竟也可以构想，它不再坚持，一切都重归普遍的安息与寂静——甚至如帕斯卡尔先生所说，重归群星的寂静。

在这里，我们显然掌握了笑话之所以是笑话的理由。它之所以成为笑话，是因为某种当真紧邻我们自身存在的东西；我们把它投射到笑的这些消除性之物中。为什么？因为它确实是真的；就在说出"最好未曾

出生”的时候，它就可以成为真的。可笑之处恰恰是把它说出来。那令人发笑的可笑之物，就是——当然还要加上一切必要的限定与细微差别——十万人里也就不到一个。

我们就此进入概率计算的秩序，也就是进入那个对我们毫无帮助的东西。因为从我们谈论这件事、从我们已经出生的那一刻起，一切现象就至少必须位于这个区域：无论是梦的现象，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的现象，还是笑话的现象。

因此，你们阅读《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这本书，非常重要。凭我已经带给你们的东西，你们应当能够定准方向，并察觉弗洛伊德究竟在寻找什么。他的严谨令人惊讶，因为他毕竟并未完全说出那最后一句话：一切严格属于笑话的东西，都位于言说在场的那一摇摆不定的层面。我们会发现，全部问题不过是：它在那里；倘若它不在那里，什么都不会存在。

举一个最愚蠢的故事：某位先生在一家面包店里声称自己什么都不用付。他伸手要了一块蛋糕，然后退回蛋糕，改要一杯利口酒。他把酒喝了。

人们对他说：“请付这杯利口酒的钱。”他说：“我拿蛋糕换了它。”人们说：“可是那块蛋糕，你也没付钱啊！”——“可我也没吃它啊！”

它之所以好笑，是因为这里确实有交换。可是交换究竟怎么能够开始？必须有某种东西在某一刻进入交换的循环。因此，交换必须已经建立；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我们总是拿一块未付钱的蛋糕去付那小杯利口酒的钱，因为事情毕竟得有一个开始。

媒人的笑话也因此好笑。所有媒人的笑话都绝妙无比：

- 你介绍给我的那个姑娘，她母亲根本让人受不了。
- 听着，你要娶的又不是母亲，而是女儿。
- 可她也没有多漂亮，而且不再年轻了。
- 那她就会对你更忠贞。
- 可她也没有多少钱。
- 难道你还想让她所有优点一应俱全吗！

如此等等。这意味着什么？这又是另一回事。其中显然有这样一个观念：媒人这个人物，这个为人结合的人，他结合人的平面与现实的平面完全不同；这走得很远，因为它同现实毫无关系——同订婚、同爱中最属于人的那部分现实毫无关系。事实上，根据定义，媒人永远不会碰到荒诞的现实。与笛卡尔相反，媒人肯定是一个骗子，而且人们付钱就是让他来骗。请注意，这正是它之所以成为笑话的原因。

意识本身的现象，以及欲望作为欲望的显现，总是在这个接缝处，在言说出现、浮现、涌现的层面发生；也就是在欲望即将在一种就是欲望的言说中肉身化的时刻，在象征作用本身从欲望、并穿过欲望而涌现的时刻。不要忘记，象征作用本身并非就是经验直接给予的东西；在这里，我们仍总是被自己的经验所给予的东西捕获：经验是我们打着小灯四处走动、试图照亮事物的场所。

当然，象征作用会同若干自然符号相接，同那些使人被诱饵、尤其被若干根本对象捕获的东西相接。当然，即使在一只动物对另一只动物的本能性捕获中，也已经有了象征作用的开端。

但构成象征作用的并不是象征本身，而是人在这种具有象征作用的Merken（标记）中，使用了那些可以成为象征的东西。确切地说，它处在这样一种秩序中：经由象征使不存在之物存在；用这些象征标出一颗游戏骰子的六个面，然后让骰子滚动。从这颗滚动的骰子中，某种新东西随之涌现：当我们谈到最典型意义上的欲望时，说的就是它。我甚至不说“人的欲望”，因为归根结底，那个玩这些骰子的人，远比他所知道的更加受囚于、受捕获于这种被投入游戏的欲望。

我们对起源一无所知。他的欲望随着那颗六面都写有象征的骰子一同滚动；这就是象征秩序向世界的过渡与引入。为什么只有人会玩这些骰子？为什么行星不说话？

今天，我要把这个问题向你们敞开着。

第20课 · 1955年5月25日

今天我要向你们讲什么？上次分手时，我给你们留下了一个也许有点古怪的问题；但它无疑直接从我对你们说的话中引出，因为归根结底，我当时正是在那里画上了句号……

我在这里确实要向上次不在场的人道歉；

在一个研究精神分析的地方，这个问题会使他们感到惊讶。

……归根结底，我问你们：为什么行星不说话？

你们无法想象，自己终于走到这里时，我有多么高兴。毕竟得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好看看究竟是什么使我们同行星处于一种极其差异的关系。我们当然每时每刻都能触及这一点，却仍然每时每刻都会把它忘掉；正因为人们始终有一种小小的倾向，总想把人与人的世界当作月球来推理。仿佛归根结底，对它们的质量、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引力作出计算，便是问题的最后答案。不要以为这种幻觉为我们学者所特有：它极具诱惑力，而对政治家来说，尤其如此。

有些作品就这样被人遗忘了。有一本书并不特别难读——因为它大概并非出自署名者之手——名叫《我的奋斗》，如今已失去了很多时效性。我想你们还记得，整部《我的奋斗》是某个名叫希特勒的人写的；书中谈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在谈论月球之间的关系。而我们仍时常受到诱惑，想做一种月球的心理学、月球的精神分析。

不过，只要立即回到经验，还是足以看出差别。我很少感到满意。但那一天，我当真根本不满意，因为我无疑尝试飞得太高；我发现，自己挥动翅膀的方式，也许并没有把一切都准备周全时我原本真正想对你们说的话，完整地说出来。

几位好心人——那些下课时陪我一同离开的人——对我说，大家都很满意。我想这种说法太过夸张！但无所谓，反正人们这样对我说了！当时，这并没有说服我。但那又怎样！归根结底，我对自己说：如果别人很满意，那当然才是最重要的。我同行星的差别恰恰就在这里。不只是我会产生这种反思，而是这件事当真如此：如果你们很满意，那就至关重要。

我还要进一步说：随着你们很满意这个事实不断得到确认，我的天，我也变得满意了。可毕竟还留有一点间隔：我不是完完全全地满意。两者之间毕竟出现过一段空隙；在我察觉“重要的是他者感到满意”以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留在自己的不满意之中。换言之，我究竟在哪一刻才真正是我？是我不满意的时刻，还是因为别人满意、所以我也满意的时刻？

请你们以最根本的形式理解，主体的满足同他者的满足之间的这一关系，恰恰是人类关系中始终涉及的东西。我希望，这个场合涉及的恰好是我的同类，不会使你们受到误导。我选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发誓，在继续回答上次留给你们的问题时，要采用第一个随手抓到的例子。

但你们将会看到——我希望今天能让你们看到——如果你们以为这里涉及的他者，同我有时向你们谈到的他者是同一个，就错了。后一个

他者就是自我；更准确地说，就是自我的形象，主体同它处于镜像关系之中。换言之，我的不满足、他者被假定的满足，以及我的满足依赖他者满足这一事实之间，确实存在一种根本差异。

这里根本不涉及同一性或反射性的形象，而涉及一种根本的他异关系。但我今天并不会沿这个斜坡切入问题；正如我从来不这样做。由于我们活动之空间本身的性质——也就是精神分析领域的性质——我无法抓住某个问题，把它当作它本身——例如“他者”问题——一次性穷尽。不过，我已多次向你们指出它何等根本，它又如何成为精神分析中各种歧义的根源。你们只须知道，至少有两个“他者”必须区分：

- 一个大写 A 的大他者（Autre）；

相关知识卡 语言之墙与 L 图式

- 以及一个小写 a 的他者，它就是自我。而每当涉及言说的功能时，所涉及的确实是大他者。

相关知识卡 语言之墙与 L 图式

我正在向你们说的这一点值得得到发展、证明与支持。一如往常，我只能在我们经验的各项备注层面上向你们证明。不过，对那些想练习几套思维转身、好让自己的关节更灵活的人，无论从哪种实用目的出发，我都怎样推荐他们阅读《巴门尼德篇》也不为过。

毕竟，“一”与“他者”的问题，正是在那里以最严格、最连贯的方式受到处理。无疑也正因如此，它成为最不被理解的作品之一，并且不知为何被视为最困难的作品之一。可毕竟，一个填字谜解谜者的平均能力应当就足够了——尽管这已经并不少。不要忘记，在一篇你们应当颇

为熟悉的文章中，我曾非常正式地建议你们玩填字游戏。〔参见《文集》第 266 页〈精神分析中言说与语言的功能和领域〉〕

唯一根本的事，是在《巴门尼德篇》九项假设的展开中，始终把注意力维持到底。问题只有这个：要注意。由于人们进行阅读这项运动时的各种条件，要求一个平均读者做到这一点，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如果我的某位学生愿意投身于一项对《巴门尼德篇》的精神分析评注，他会为所有人做一件非常有用的工作，而且会使这个共同体在不少问题上重新找到方向。

说完这些，既然我们正在处理他者的问题，而它将通过我所能抓住的角度主导今天的课，那就让我们回到自己的行星。我极其严肃地向你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行星不说话？有没有人围绕这个问题稍微转了一圈，感到一点震动，试着分节表达些什么？

毕竟有很多话可说。奇怪的不是你们一句也没说，而是你们连自己已察觉这样的话一抓一大把，也没表示出来。只要你们敢于想一想，它们当真多得是，然后随便抓出一个就行；因为明显的是，究竟哪个才是最后理由，并不十分重要。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我们尝试一一列出这些理由——我当时向你们提问时，对它们可以怎样展示并没有先入之见——我们会发现一件奇特而富有教益的事。那些向我们显现的理由，其结构完全就像我们

在弗洛伊德作品中多次遇见过的著名理由：在《伊尔玛的注射之梦》中，他说到那口被退回时已经破掉的锅。这里多少是同一种秩序：

- 第一，因为它们无话可说；
- 第二，因为它们没有时间说；
- 第三，因为人们使它们沉默了。

这三件事都可以是真的，而且它们会使我们能够展开同所谓行星有关的重要关系——行星恰恰是我取来作为参照项，用以显示我们不是什么。我向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提出这个问题。他是今年曾来这里为我们做过报告的人之一，长期研究科学史的价值，尤其研究牛顿主义——谈到行星，它不可能不被提起——并对此作出了所有可能最恰当、最深刻的反思。〔亚历山大·柯瓦雷〕然而，当我们请教于看似可称为专家的人时，总会失望——不过你们将看到，实际上我并没有失望。

初看之下，他不觉得这个问题会引起多大困难。他说：因为它们没有嘴。这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完全充分的理由。总之，一开始我还是略感失望。而我一如往常地错了。对人们给予的回答，永远都不要失望；因为美妙之处正在于，它是一个回答——也就是恰好是我们不曾期待的东西。

这一点同样重要，而且仍然同他者的问题有关；因为我们太容易始终被所谓月球系统催眠，太容易依照自己谈论“刺激—反应”时的想象来塑造回答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恰好得到了预期的回答。这果真还是一个回答吗？这是我们还可以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我现在不开始这个小岔曲，我们以后再走进去。

归根结底，他匆忙给出的回答并未使我失望。因为我根本不必依照刚才说的三个理由中的任何一个，走进“行星为什么不说话”这座迷宫；尽管我们必然还会重新遇见它们，因为它们就是三个真正的理由。但任何回答都同样可以作为入口；尤其是这一个，只要知道如何聆听，它就极具启明作用。我完全忘了，自己恰好处在特别有利于听懂它的条件中，因为我是精神病医生。

“因为它们没有嘴”……我们早已听过这种话：“我没有嘴。”在精神病学职业生涯之初，我们像迷路的人一样来到最初的精神科病房，落入这个神奇的世界之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年事已高的女士、年事已高的未婚女人，而她们对我们作出的第一句声明、最初的征象就是：“我没有嘴。”

她们同时还告诉我们，自己也没有胃。不过，对一个没有嘴的人而言，这似乎只是微不足道的不便。她们还说自己永远不会死，自己是不朽的。简言之，我们可以发现，她们同也不朽的月球世界恰好具有非常深的关系。唯一的差别是：对那些遭受所谓“科塔尔综合征”或否认谵妄的老姑娘、老太太来说，从某种方式看，这毕竟是真的；出于某些理由，它是真的。也就是说，她们所认同的形象，恰恰就是那个缺少一切敞口、吸入与欲望之空的形象；而这些恰恰构成了口腔孔穴的特性。

而且，只要存在同其纯粹而简单的形象完成了认同，显然就同样不再为变化留下任何余地；也就是说，不再为死亡留下余地。她们的主题所涉及的果然恰恰是这一点：

- 她们已经死了；
- 她们再也无法死去；
- 归根结底，她们是不朽的。欲望果然拥有这种特性。这正是它同许多其他东西的区别。涉及疯狂时，不能把一切都塞进同一口袋子，统统当作想象界的结构。只要主体纯粹而简单地承担它，在象征上同想象界认同，他就实现了所谓欲望。

至于星星同样没有嘴，同样不朽——这一点当然也毫无疑问——却属于另一种秩序。我们绝对不能说它是真的。如果我们这样说，就是在说某种荒谬之物。根本不存在星星拥有嘴的问题。而“不朽”一词，至少对我们而言，已经随时间变成一个纯粹的隐喻。

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某种不同于真的东西：它是实在的。星星没有嘴，无可争辩地是实在的。可如果不是有些拥有能够吐出符号之物的装置的人——也就是人类——把这一点指出来，就不会有任何人就“想到”一词的严格意义而想到它。

我想，它们是实在的，这就是第一个理由：

- 它们彻底是实在的；
- 原则上，它们内部绝对没有任何属于对自身的他异性秩序的东西；
- 它们纯粹而简单地就是它们所是的东西；
- 而且归根结底，人们总在同一位置找到它们。这是星星不说话的最初几项根本理由之一。

因为，一切随后将得到展开的事实，恰恰就居于这个“总在同一位置”之中。换言之，归根结底，只须察觉这一点，便足以使它们是现实之物这一事实获得全部严格性。显然，人们并没有立刻察觉它。你们已经看到，我在用词上有时摇摆于行星和星星之间。这并非毫无缘故。当然，最先向我们显示“总在同一位置”的并不是行星，而是星星；这是众所周知的。

恒星日完全规则的运动，无疑第一次给了人类一个机会，在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体验稳定性，并开始建立象征界与实在之间的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中，表面看来，符号之物从实在中涌现，可以说是从实在降临。当然，这种想法并不比“所谓恒星当真围绕地球旋转”更有根据。天穹旋转那种完美的幸福不过是地球的运动；同样，也不应当相信符号果真来自实在。

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惊讶地看到，这些独特形式具有何等捕获力。严格地说，它们始终令人类震动，而它们的分组毕竟没有任何根

据。人类为什么把大熊座看作大熊座本身？为什么昂星团如此一目了然？人们为什么这样看见猎户座？

我根本没本事向你们解释。我认为，人们从未用另一种方式为这些光点分组。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你们。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颇有意义的点。在我们其实辨认不清的人类黎明时期，它不曾不发挥作用；而且以一种顽强的方式，使其迹象一直延续到我们的时代，并为符号之物如何钩住某物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子。

因为即使是我们如今大做文章的著名“形式属性”，对于解释我们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组成星座，也显得完全没有说服力。话虽如此，我们早已知道事情究竟如何，所以最终只会白费力气：人们在同一位置找到星星的这种表面稳定性，并没有任何根据。可是，“重新被找到于同一位置”，恰好就是它的定义。

相反，当我们发现有些东西当真处在这种情形时，我们显然取得了一项根本进步。人们最初以游荡行星的形式看见它们；后来我们发现，这并不只同我们自身的旋转有关，而是天空中一部分星体当真在移动，并且真真切切地总能在同一位置被重新找到。这种现实情况是我们的行星很少说话的第一个理由。不过，如果以为它们当真那么沉默，就错了。

它们一点也不那么沉默。首先，这再明显不过：因为它们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同自然象征混同在一起。是我们使它们说话，这同样再明显不过；而我们若不追问这件事如何站得住，就大错特错。很长很长时间里——请不要忘记，甚至在我们对这些星体运动的考察已取得相当进

展的很后来——某些东西仍然留存。它们是一种残余：不只是对某种现实的残余，而是对那些名叫“行星”的人物的主体性存在的残余。

甚至连哥白尼先生——这一点一定会使你们感兴趣——那位曾经在定准这些星体运动的完美规则性、定准我刚才谈到的物理学上迈出决定性一步的人，仍在这样想：

- 一块若是落在月球上的地球物体，必定会竭尽全力回家，也就是回到地球；

- 反过来，一块月球物体也会不辞辛苦、永不停歇，直到再次飞回它的母亲大地。这足以向你们说明：即使面对那些我们自以为已经彻底研究过的对象，一些观念仍然延续了多么漫长的时间；它们显示，要不把现实之物造成存在者，何其困难。

总之，牛顿毕竟来了。当时这一刻已经酝酿了好一阵子。如果你们对科学史感兴趣，就会看到，没有比科学史更好的例子，能使我们明白人类话语何其普遍。也就是说，人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最终必须拿放大镜来看，才能清楚发现，一个人终于使最精妙的精妙之处涌现？这个机敏者中的机敏者，最终给出了一个世纪以来人人都急于对问题所涉之物表达的终极公式：归根结底，就是使它们沉默。牛顿终于彻底做到了。

那个“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其逐渐逼近，或者更准确地说，其最终实现，曾使笛卡尔先生感到惊恐〔口误：帕斯卡尔〕——在牛顿之后已成为既定之事：星星显然不会说话。行星是沉默的，而它们的沉默有一个最终理由——唯一真实的理由。因为毕竟，“人永远不知道现实之物会发生什么”！我还是要提醒你们几件小事。在我话语的回路

中，我不得不提醒你们；但只能一闪而过，免得我们迷路。可人永远不知道。而我刚才向你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行星不说话？”——当真是一个问题。

“人永远不知道现实之物会发生什么”，直到我们最终把它还原为在一门语言中完成登记。只有在我们把它们的嘴彻底钉死的那一刻起，我们才完全确信行星不说话。也就是说，在牛顿理论以第一种形式向我们给出统一场论之时——它后来得到了补充，但当时已能使所有人类心智完全满意。

统一场论完整地浓缩在引力定律中；它在根本上就是：有一道公式，有一门完全有效的语言把这一切结合在一起，而且是一门极其简单的语言，可以写成一个只含三个字母的小公式。我不会把它写在黑板上，因为我不想让你们把我正在说的话同一节天体学课混淆。但重要的正是这一点。

$$F = G \cdot \frac{m_G m'_G}{d^2}$$

如果你们以为，在任何审视这件事的人眼中，人们一开始就只能信以为真，就错了。当时所有人都提出了一切可能的反对意见：

- 引力的这种形式究竟是什么？
- 这根本无法思考；人从来没见过这种事，超距作用！

根据定义，一切作用都是逐点传递的作用。这种穿越真空的超距作用……

这种在距离中、恰恰作为距离而发挥的作用

……同整个系统的其余部分存在某种异质性。

因为要使牛顿的系统具有价值，就必须存在若干现实之物。那么，那里有物质、运动。唉，我们别走进去了。如果你们知道仔细审视之下，牛顿式运动是一种多么无法把握的东西，你们会不寒而栗！我不是来使你们俯身凝视牛顿主义的深渊。你们会看到，借助相互矛盾的概念进行操作，并非精神分析的特权。牛顿式运动使用时间。从来没有人为物理学的时间操心，因为它根本不涉及任何同现实之物有关的东西。它涉及的是正确的语言；我们绝对只能把统一场看作一门编制完善的语言，看作一种句法。总而言之，在我们所知的一切中，这是唯一一个……

在我们作为科学范域所把握的一切中，也只在那些总计纳入统一场论的物理学中——也就是说，自爱因斯坦先生以来，它已经大大增加

……我们才能使用“真实现实”这个术语；而在人类经验中，它对我们来说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在这一边，我们可以安心了：行星、一切与它们有关的东西，以及一切纳入统一场的东西，再也不会说话；因为它们是已经完全被还原为语言的现实之物。我想，你们已经充分看到了此处言说与语言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对立。不要以为，我们面对一切现实之物时的处境都属于同一范域，都已经达到这个最终还原点——这个点毕竟十分令人满意。因为，倘若行星以及许多属于同一秩序的其他东西会说话，那将会是一场多么奇怪的讨论；帕斯卡尔先生的惊恐也许就会变成恐怖。

事实上，每当我们面对一个仍留有行动观念之残余的世界——真实而真正的行动，从一个主体中涌现的某种新东西；为此，那甚至不必是一个有生命的主体——每当涉及行动本身时，我们就面对某种只有自己的无意识才不会为之害怕的东西。

因为就物理学当下的进展所在之处而言，我们不应当认为尘埃已定，不应当以为我们已经把极小之物——原子、电子——的嘴钉死了。完全没有！当然很明显，我们并非来这里追随人们每时每刻都会放任自己投入的梦想——自由！问题不在这里。

但很清楚，正是在语言那一边，有某种奇怪的事情发生。海森堡原理就可以归结到这一点：当我们能够精确表述系统中某一点时，就无法表述其他各点。当我们谈论电子的位置，对它们说“站在这里，始终留在同一位置”时，我们就完全不再知道它们通常所谓的速度究竟怎样。

反过来，如果我们对它们说：“好，没问题：你们一直以同样的方式移动。”我们就完全不再知道它们在哪里。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将永远留在这种特别嘲弄人的处境中。但至少在目前，这也许使我们得到一个观念：既然我们无法统一语言的场，那么在目前，我们只能说一件事——它们并不在我们质问它们的地方回答。更准确地说，事实上正因为在某一处质问它们，我们当下就不可能在整体中把握它们。

当然，它们不回答这一事实，并没有决定整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正因为这样，那里也许能有所谓真正的回答：有一种东西——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并不安心——有一天可能会使我们惊讶。所以，为了不谈神秘主义，我不会告诉你们原子和电子会说话。

但为什么不呢？一切发生得就好像它们会说话。无论如何，有一点十分确定：从它们开始对我们说谎的那一刻起，事情就会得到完全证明。如果原子能对我们说谎，也就是说，同我们比试谁更精明，我们就会有充分理由地绝对信服。你们在这里亲手触及了所涉之物：问题涉及作为他者本身的“他者”，而不只是它们反映我们的先验范畴〔康德〕以及我们直观中一切多少具有超验性的形式。总之，谢天谢地，这些事我们还是宁可不去想。

如果有一天，它们真的在这一平面开始行动，也就是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你们想想我们会去到哪里！我们当真再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这话用在此处真是恰如其分！我上次暗指的正是这一点；爱因斯坦先生始终思考的也正是它。说实话，他对此惊叹不已。

我们不应当不给他的这句话以全部分量。他不断提醒全世界：

“全能者有点狡猾，但他绝对不会不诚实。”

而这恰恰是唯一使科学成为可能的东西——因为这里涉及的是非物理的“全能者”——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使这位“全能者”沉默。

爱因斯坦先生长期围绕这一点沉思——并没有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但持续了很久。他感到必须把它提醒给所有人。我们可以以一千种方式照亮这一点。我尝试沿最短的道路向你们展示这些最初真理；但问题是：当涉及那门首要的人文科学——精神分析——时，我们的目标与终点是否要达到统一场？是否要把人、把众人变成月球？我们是否之所以让他们说上那么多话，只是为了最终使他们沉默？

这个问题绝对根本。它并非由我发明。每个人——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都会告诉你们，这就是对黑格尔先生屡屡提到的“历史的终结”最正确的解释：那是人们只须把历史封存起来的时刻。

这相当于彻底回归动物生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就这一观点同他辩论：一个人，更准确地说，众人——因为在这个层面，并没有一个人；另一处倒是有一个人——那么，已经走到不再需要语言的众人，果真是动物吗？

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在我看来，无论朝哪个方向都尚未得到解决。对于我会向〔柯瓦雷？〕提出什么，以及他会回答我什么，我都没有把握，因为我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提给他。无论如何，我在此唤起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位于精神分析技术的核心；而当人们以某种方式处理事情时，它也极其准确地位于那些可耻错误的核心。

我第一次读到一篇非常可爱的文章，主题是“典型治疗”，人们所谓的……

不要把典型治疗同某种揭示治疗何以“典型”的方式混淆。

……“必须使自我的观察能力保持完好”。我看到这句话以粗体字母写出来〔参见“三甲胺”〕。然后——我的天——毕竟，因为我并不是第一次读这位作者，我很清楚重要的点在哪里。文中说到了一面镜子，而镜子就是精神分析家。这还不错！无论人们怎样说，谈镜子从来都不是坏事。但总之，人们希望这面镜子是“活的”。这同“真实现实”一样：一面活的镜子，我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正因为那里存在一个困难。

这个谈论活的镜子的可怜人，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他感觉到，这个镜子的故事里有些东西不对劲。我希望人们向我解释清楚！我尤其希望人们向我解释，精神分析的根本究竟在哪里？请人告诉我，精神分析难道应当在想象性实现中构成吗？

如果我们当真做到了这项大张旗鼓的操作，那是因为人们谈论了它；

- 也就是说，只要人们把自我变成一种现实之物；
- 也就是说，把自我变成那种人们所说的“整合性”之物；
- 也就是使行星聚合为一体的东西。

但这颗行星之所以不说话，不只是——

- 因为它是实在的；
- 还因为它没有时间——就这个词的字面意义而言，它没有时间。为什么？它没有时间，因为它是圆的。整合就是这么回事。圆形物体可以做它想做的一切，它仍然始终同自身完全相等。

归根结底，问题就是要把这个自我修圆。人们向我们提出的、作为这种精神分析之根本目标的东西，确实就是——通过一种把自我同主体混淆的做法——赋予这个自我以球形；在这种形式中，它将最终整合自己一切相互分离、断裂、碎片化的状态，整合那些散落的肢体——我们如今以前生殖器阶段、部分驱力、无数个 ego 之名，对它们倾注全部注意。

这是一场追逐凯旋的 ego的竞赛：有多少个 ego，就有多少个对象。我并不是说这一切都是 ego；那里存在程度差异。当然，这一切并非没有理由；对象力比多〔……〕并非毫无意义的东西；它在想象界的结构中确实是某种确定之物。但这也奠基于各种歧义，尤其是奠基于语言中的根本歧义。每个人都没有在“对象关系”一词之下放入同一个东西——昨晚我已顺便向你们指出这一点。

但可以肯定的是，精神分析理论——因为我们必须把事情圈定清楚——一旦最终在某个人那里获得形体并固定下来，就会过早地走向某种结果；这个人曾经一度看起来起步得更好……

我的意思是，他从这个偏向、这个侧面取物，从精神分析对对象关系和部分驱力的新近兴趣出发——我并不因它是新近兴趣，就认为它不那么值得我们关注。

……他看起来本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到恰当位置；但他把整项精神分析操作固定、集中在这个想象界的平面上，归根结底所达到的，正是我刚才谈到的那种反常：把一切进展都放进主体最原初层面的想象性关系中，而这一关系确实可以在经验中显出它的各种效果。

谢天谢地，在精神分析中，经验从来不会真的被推到最后终点。换言之：

- 谢天谢地，人们并没有真做自己所说在做的事；
- 谢天谢地，人们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
- 谢天谢地，人们的治疗失败了，主体才因此幸存下来。

因为，沿着我刚才所说的作者〔布韦〕所走的路线，我相信可以以最大的严格性证明：他构想强迫性神经症治疗的方式，除了使主体偏执狂化，不会有任何其他终点或结果。很容易从以下一点察觉此事：对他来说，精神分析的整个问题都围绕其指征在神经症与精神病交界处的界限旋转；而在强迫性神经症的治疗中，在他看来构成危险、人们始终行走其旁的深渊的，就是精神病的出现。

换言之，对我谈到的这位作者来说，强迫性神经症者实际上是一个疯子。我们将试着把事情向他们讲得一清二楚。这个疯子是什么？他是一个同自己的疯狂保持距离的疯子；也就是说，同最巨大的想象性扰乱保持距离：此处所说的是一个偏执狂疯子。我说“最巨大的想象性扰乱”本身；我并没有说这界定了疯狂的一切形式，我谈的是谵妄与偏执狂。

我刚才所说的那位作者，以一种必须始终维持在某条脆弱界线上的方式构想这种处置。在他看来，主体恰好待在这条界线的此岸，而且严格地说，他之所以能够待在那里，只是因为他撑住了社会语言。也就是说，他对你们说的一切都同他的亲身经验毫无关系。这就是他对强迫症者所作的解释。

也就是说，那种表面看上去相当坚固的平衡，实际上以极其不稳定的方式，支撑在一种纯粹言语性的顺从主义之中——可是，有什么比一个强迫症者更难推倒？然而，一切都在这里。

如果强迫症者果真如此抵抗、如此死死抓住，恰恰是因为——依我所说的那位作者之见——后面就是精神病，始终内在于此；也就是说，那里就是自我的想象性解体状态。那里类似于潘德莫尼宫，就是我刚

才谈到的那些以各种方式分离、碎片化、相互区分的自我。而且，这位作者拿得出的证据只有它的出现；因为他无法……我相信他会对此犹豫，但我想他根本没有可能做到；对他来说很不幸，这使他的证明不再牢固……向我们展示一个他当真逼疯了的强迫症者。

这里有些充分的理由。我们可以说，他想要使强迫症者免受那些所谓正在威胁他的疯狂；如果他成功——但正如我刚才告诉你们，谢天谢地，他并不成功——他最终会把主体变成某种同这种疯狂确实并不相距太远的东西。

分析后偏执狂的问题，远远不是一个神话性问题。根本不需要把一次治疗推到极远，精神分析就可以造成一种相当完整的偏执狂。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就曾在这个科室[注1]亲眼见过。而且在这个科室看得最清楚，因为我们逐渐把他们滑向开放病房，而他们随后最终被纳入封闭病房。这种事是会发生的！要造成它，并不需要有一位好精神分析家。只须非常坚定地信仰精神分析就足够了。

> [注1] 圣安娜医院：该科室由让·德莱领导；他自 1942 年起担任精神疾病临床学教席主任。

我曾见过可以称作分析后的偏执狂，而它们又可以被简单地称作自发性偏执狂。在一种恰当环境中——也就是对心理事实极度关切的环境——某个毕竟具有一定倾向的主体，可以走到用若干无疑自然纯属虚构的问题把自己包围起来的地步。可他会使这些问题获得如此坚固的一致性，而且使用一门早已准备完毕、随处流传的精神分析语言，从中获得所有材料。

必须明说，帮助一种谵妄临盆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慢性谵妄通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形成；主体必须狠狠下一番功夫，通常要花掉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才能变成谵妄者。但我必须说，精神分析文献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现成谵妄（ready-made）。我们常会看到主体被这样打扮起来，那件成衣紧贴皮肤。

因此我们可以说，以某种方式对待自我的分析，果然会直接导致某种麻痹。在精神分析家周围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不少这种风格：他们某种执着于“在精神分析经验不可言说的神秘面前缄默不语”。我相信，这不过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温和的形式；如果以为归根结底，它的根、根基与底座并不同我刚才所谓“偏执狂”完全同质，就错了。

今天，我想向你们提出一个我去年在谈别的事时曾提出过的东西……

但那就是同一件事；我总是在讲同一件事！

……一个小图式；我要试着藉它向你们说明，开始向你们说明我围绕这个自我、这个他者，归根结底围绕语言与言说所提出的问题。这个图式若提供了一个解答，当然就不再是图式。但毕竟，它甚至也不是一个模型。它是我们话语性精神的一种残缺，也是一种固定观念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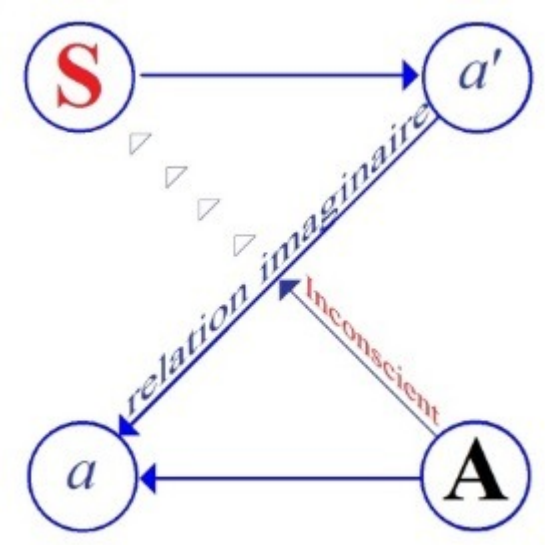
我没有重新唤起那个区分想象界与象征界的东西，因为我想你们已经对它足够熟悉。如果有必要重做，我会重做。我想，对在座所有人而言，这都被假定为已知吧？那么，问题究竟是什么？

关于自我，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

- 因为我们此刻就在这里，也因为这些话我已经向你们反复灌输了足够长的时间；
- 因为归根结底，整场争论都在这里……问题是要知道自我是否是实在的：它是一颗月球，还是一项想象性建构？

我们属于那些这样说的人——我们倒不是属于其中，但依定义说，我们正在谈论它们——如果我们不先知道自我是一项想象性建构，就根本不可能把握精神分析辩证法的任何东西。对这个可怜的自我而言，它是想象性的这一事实并没有从它那里夺走任何东西；我甚至会说，这正是它的好处。要是它不是想象性的，我们就不会是人，而会是月球。

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我们拥有这个想象性自我，就足以成为人。我们仍然可以是那种名叫“疯子”的中间之物。疯子恰恰就是那个完全黏附于这一想象界、纯粹而简单地黏附其本身的人。



在这里的上方，字母　S：它是字母　S，但也许还是别的东西。它是主体，是我们所理解的精神分析主体；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在他的整体性中取他……

人们整天用“他的整体性”这种话来烦我们！可是，他为什么应当是整体的？我们一无所知。你们自己见过整体性的存在者吗？那也许是一种理想，但我从来没见过。我不是整体的，你们也不是。如果我们是整体的，就会每个人都留在自己那一边，各自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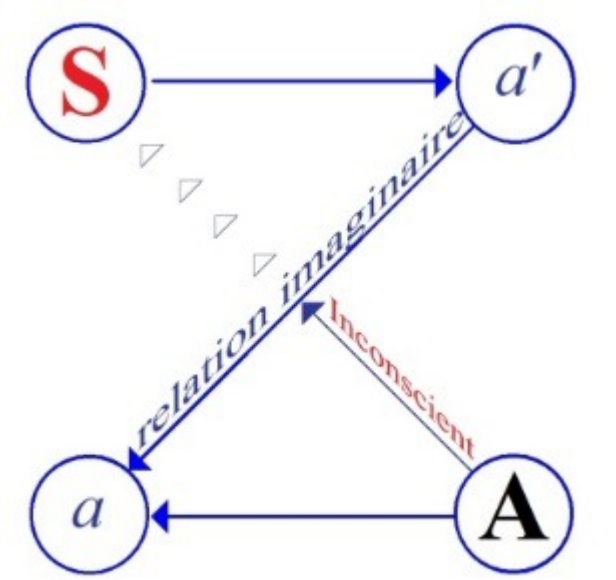
我们就不会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一同待在这里试着组织起来。

……这是主体；不是处于其整体性中的主体，而是处于其开口之中的主体，是那个向它吸入、对它心生向往的人；那就是他。

但一如往常，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不会在这里同我们说清楚。他在那里〔a′〕。当然，他并不在那里看见自己。这种事从未被看见，哪怕在精神分析结束时也不曾被看见，而且永远不会被看见。恰恰因为他在某个东西的另一边、在那里〔a〕看见自己，他才有一个自我；也就是说，他才能相信那个〔a〕就是自己。所有人都走到这里，而且没有办法从中走出！

你们当然会重新找到那个被称作镜像平面的对称性；但如果你们以为今天我要谈的就是它，便错了。我假定它已经得到确立，已经为你们所知。精神分析告诉我们：这个自我就是取得另一形式的主体。这个形式完全根本，对主体的对象的构成如此根本，以至在这个框架中，主体最初恰恰将以这个镜像他者〔a〕的形式，而且首先就以这一形式，看见那个我们有正当而结构性理由称作他的同类的人。换言之，主体将在这一层面面对他者〔a〕的某种形式；这种形式可以说在本质上与他相叠，而且同他的自我本身关系最为密切。

我刚才对你们说，不要把某种与这个世界的建立完全一致的东西，纯粹而简单地看作镜子平面。这个世界是一个由 ego 与他者构成的同质世界。那种东西确实存在，甚至我们就奠基于它；今天的问题恰恰是要看看，我们将赋予它何种方式、功能与角色。



我们将把这一条〔α′ → α〕称作语言之墙。我说“语言之墙”，因为问题是要察觉：在由语言之墙所界定的秩序中，想象界由此取得了这一虚假的现实性；但它毕竟是一种得到验证的现实性：

相关知识卡 语言之墙与 L 图式

- 它被称作自我，正如我们所使用的那样；
- 它被称作他者、同类……所有这些想象性之物都像对象一样受到处理。我们忘记、并且可以每时每刻忘记，它们并不是与月球绝对同质的对象；可它们毕竟又是对象，因为它们在一套有组织的系统——也就是语言之墙——中被如此命名。

当这个主体同自己的同类说话时，会发生什么？他在共同语言中同他们说话；这门语言把他们的想象性自我当作不只是外存的（ex-sistants）东西，而是实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即使他完全无法知道实在领域中的东西——我是指具体对话发生的地方——在此处，他毕竟要面对若干 a′ 或 a″；它们在那里是对象，而他通过在语言之墙上的反射向它们说话。

相关知识卡 语言之墙与 L 图式

这些在那里、在实在世界中的人物，主体把他们当作现实的存在者、当作同质之物；他们同语言之墙另一边的人物属于同一类型。换言之，镜子既处于人们想放置它的地方〔$a \rightarrow a'$〕，也处于这里：处于 S 与 A_1、A_2……〔所有 A〕之间，正如它处于 S 与 α、β……〔所有 a〕之间。我的意思是，只要主体把他们同自己的形象联系起来，他对之说话的人，也就是他同之认同的人。

说完这些，你们清楚看到，我们不能省略以下一点，因为它是我们的基本假设。我们可以忽略它；但如果我们在此是精神分析家，那就是因为我们相信，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他主体，存在真正属于主体间的关系。

我必须说，如果我们恰好没有那个证验、那份对主体间性特征的见证，就没有任何理由如此认为。那项特征就是：主体可以对我们说谎。这是决定性的、最高的证据。我并不是说，它是另一主体之现实性的唯一基础；我说它是这一现实性的证据。换言之，我们所指向的人就是 A_1、A_2……在图式中的这个位置找到他们，并不令人意外。他们是我们并不认识的人：真正的大他者，大写 A 的大他者；也就是说，真实的主体。

当然，由于图形的对称性，我们才把他们放在与 a' 相对于语言之墙所在之处相反的那一边；原则上，我从来无法到达他们。然而，每当我说出一句真实言说时，我从根本上指向的都是他们；我指向他们〔A_1、A_2……〕，除非采取特别防备，经由反射，我始终到达的却是 a。也就是说，我指向的始终是他们、那些真实主体，而我始终只得满足于他们的影子。而且，在这张图式上看见主体被语言之墙同大他者、真实的大他者分隔，毫不令人意外；这堵墙就是为此而在。

相关知识卡 语言之墙与 L 图式

当然，我们知道，言说恰恰在大他者的存在中、朝向大他者、并在大他者中，奠立作为大他者的真正大他者——大写 A 的大他者。我们同样知道，语言极其准确地被造成这样：它把我们送回那个被对象化的他者，送回那个我们可以对之为所欲为的他者，甚至可以把他想成一个对象；也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当我们使用语言时，我们同大他者的关系无时无刻不在这种歧义中运作。换言之，语言既被造成用以使我们在大他者中奠立自身，也被造成用以从根本上阻止我们理解大他者。精神分析经验永远涉及的正是这一点。

在我所谓的反常组织中，在精神分析技术近来采取的偏转中，发生了什么？发生的是这件事：人们关心主体的自我，想要让它增强力量、实现自身、完成整合——这个亲爱的小家伙！问题就在这里。

这个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主体有最充分的理由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可他却在另一边以你们所知的一切不完善方式看见自

己；因为自我形象、这一镜像原型（Urbild）的奠立，具有根本上未完成、部分性、不只属于想象而且属于幻象的性质。

这个主体，此处要做的恰恰是：使他把某种属于他的东西中那些多少碎片化、产生碎片化的形式，全部聚合到想象界中。那种东西：

- 就是他；
- 就是他在其中误认自己的东西；
- 也果然是精神分析实现的根本问题之一。

这完全正确：问题确实是要让主体收集自己散落的肢体、自己的部分驱力，收集前生殖器阶段真正被经验过的一切。它既属于主体，又是主体无法在其中辨认自己的东西；可它仍然是一种被生活、被感受过的经验，就是部分对象的整个连续序列。因此，当我们固定在这个主题上——幻想，想象界与前生殖器范域的形象——就会走到某种类型的精神分析，其机制总以完全同一的方式向我们得到解释。

这一点从不变化，因为作者们完全由以下一点定向到这条道路：唯一的方式……

而且不无缘故；唯一的缘故就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可他们是对的；这果然是真的！

……我刚才所谓的精神分析序列要重新并合，唯一的方式就是这一种。也就是说，它是一系列真实而彼此分离的肢体；你们必须想象它们，因为人们每天都像在卡尔帕乔的画中那样，向你们呈现它们：圣

乔治正用长枪刺穿龙，四周散落着一颗颗斩下的头、一只只手臂等等。



问题所涉及的就是这一切，人们也不断向我们谈论它。这些部分对象的摄取要发生；而它确实只能以何种方式发生？通过这个他者的形象。如果人们直接追求这一终点，那么这个自我只能通过唯一一个中介重新找到自身、并把自身重新组成；就是你们在此处与彼处所看到的同一个中介，也就是主体面前的同类——说在面前也好，说在背后也好，结果都一样。

极其准确地说，问题是要让主体重新组成自己的自我；而为了重新组成，就要使它以某个自我的形式重新集中。这个自我当然是想象性的，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就是精神分析家的自我。而且，这个自我并不会只停留为想象性之物，因为精神分析家的言说介入，被非常明确地构想为一场自我与自我的相遇，构想为精神分析家对确定对象所作的投射。

这一点以一千种方式得到表述。例如，我刚才谈到、并以之为依据的那篇文章写道：精神分析必须始终在客观性的平面上得到呈现、规划与组织。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正如人们写的那样——使主体从一

种心理现实进入一种真实现实，也就是变成一颗月球。这颗月球无疑在想象界中得到重新组成，但又极其准确地以精神分析家的自我为范型——人们对此也毫不隐瞒。这套理论还足够一致，知道问题并不是教条灌输，也不是告诉主体在世界中应当做什么。人们确实是在想象界的平面进行操作。所以，没有什么比那种不可言说的亲身经验更被珍重；它位于从根本上被当作语言幻象的东西之外——人们说的是语言的幻象，而不是语言之墙。

文中给出了一个例子；人们带来的具体临床例子十分罕见。倒不是说它们当真很罕见……其中有个小例子非常漂亮：一位女患者在场，她一想到精神分析家知道她行李箱里装着什么，就感到恐惧。她既知道，又不知道。

这无可争辩地就是此次会谈中显现的东西：她的想象性焦虑是，正如人们所说，精神分析家在想象性平面知道她肚子里有什么，知道这个行李箱的肚子里有什么。行李箱是她的延伸，就是她自己。同这一忧惧相比，她能说的一切都无足轻重，也将被忽略。

突然之间，人们抓住了：这就是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她唯一不说的东西——行李箱里究竟有什么。这就是此次会谈中唯一重要的东西：她害怕精神分析家把她肚子里的一切都拿走；也就是说，拿走她的部分对象——该行李箱的内容——所象征的一切。

经由精神分析家的形象对部分对象进行想象性承担，这一观念极其根本；你们应当知道，它一直走向某种 comulgatorio——我借用巴尔塔沙·格拉西安为一部《圣体论》所起的名称——也就是对精神分析家的

想象性摄取。归根结底，它让我们想到一种奇特的领圣餐、一座摊床、一个陈列台：一颗鼻孔里塞着芹菜的头。

人们可以选择那块从裤子里切下的肉；而且——正如阿波利奈尔先生在《蒂雷西亚的乳房》中所说——“用同一种调味汁吃你精神分析家的脚”。这就是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问题是要知道，是否存在对精神分析的另一种构想，能使我们得出结论：精神分析并不只是对主体根本想象性部分化的重新并合。这种部分化确实存在，也确实是精神分析使我们得以推进的维度之一；但这种推进是否必须依照这一范型：精神分析家的认同本身发挥作用，以自己的形象赋予主体他自己的自我？细节我就略过了。

当然，精神分析家所能做到的一切……

借助对阻抗的某种类型的解释，借助某种方向、某种意义上的引导，借助把精神分析的整体经验还原为它那些纯粹想象性的要素

……精神分析家最终能够投射到这里的，都是他自己自我的各种特征。天知道它们可以有多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最终会成为一次精神分析结果的特征！

问题是要知道，弗洛伊德教给我们的东西，是否恰恰相反，是否正在于告诉我们：精神分析——甚至正是为此，人们才要培训精神分析家——在极限处、以一种理想方式，应当极其准确地在于使这里绝对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镜子不应如某位先生所说的那样是“活的”，而只应当是一面镜子。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家的培训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就在于：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本身应当缺席。

当然，事实上它从来不会缺席。当然，精神分析家的理想——也就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主体，一个完全实现了的主体——是某种当然属于理想、虚拟的东西。但它也没有那么虚无缥缈，因为人们始终要从正在接受精神分析的主体那里获得的，正是这个东西。

换言之，如果精神分析中发生的事，应当指向一句真实言说的通过；也就是说，指向某种在语言之墙的另一边，把主体〔S〕同另一个主体、同 A_1 和 A_2 真正连接起来的东西；如果这至少是一个重要部分，是为整个过程加冕的部分……

这当然不排除对想象界进行我向你们展示过的最初定位。

……如果这就是精神分析的基础，那么很明显，精神分析的终点正是在此处、在 A 中得到界定……

在主体与作为大他者本身的大他者之间的这一最终关系中；与一个真实的大他者，

与那个确实是真实大他者的大他者，与那个给出意外回答的大他者之间。

……精神分析的终点在这里得到界定。

请看，以这种方式构想精神分析的运动，会给我们带来何种优势。我们立刻就能理解若干事情。当然，这既不会在一开始就被达到，甚至永远也不会当真被达到。问题是要知道，它是否就是精神分析的终点、结束之处。

在精神分析进行的全部时间里，只要满足一个条件：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愿意不在那里〔$a = \varnothing$〕；只要满足这一个条件：精神分析家并非人们所说的“活的镜子”，而是一面空镜；那么，所发生的事就会发生在主体的自我〔a'〕与大他者之间。我不必特意把它标出，我们也知道：表面上，开口说话的总是主体的自我；主体的自我将同大他者发生关系〔$S \rightarrow a' \rightarrow A_1$、$A_2$……〕。

相关知识卡 语言之墙与 L 图式

精神分析的全部进展，以及人们所谓转移的还原，就是这一关系的逐步移位。主体每时每刻都可以在语言之墙以外，把这一关系抓作转移：

相关知识卡 语言之墙与 L 图式

- 也就是说，某种既来自于他、他又无法在其中辨认自己的东西〔$S \leftarrow A$〕；
- 也就是说，这一关系既可以由他承担，同时又可以由他对象化；整个精神分析都在于使他意识到它；
- 也就是说，尽管自己并不知道，他真正向哪个大他者说话；
- 也就是说，问题在于他的这些关系，而不在于他同精神分析家的自我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于他同所有那些大他者的关系；他们是主体之主体中真正的回应者，而主体并未辨认出他们。

问题是要使位于这里的转移关系中的 S'，逐渐朝一个能够在自己所在、而且最初不知道自己曾在的位置上，完全承担这些关系的主体移

动。也就是说，弗洛伊德的句子“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必须被赋予两重意义。

这个 Es——请你们把它同字母 S 的词音一起理解——就在那里，始终在那里；它就是主体。他辨认或不辨认自己；这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事。他有言说，或没有言说：在精神分析结束时，应当由他发言。在 S′ ，他应当同真实的大他者进入关系。在 Es 曾在之处，Ich 应当到来。这是对精神分析的一种构想。主体正是在那里重新纳入自己一切散落的肢体，辨认自己的经验，将它重新聚合。

有某种东西作为一个对象得到构成与形成。但这个对象远非问题的真正所在，而只是一种根本上异化的形式。正是想象性自我本身赋予它以意义与聚合；这将是我们下一课的主题。它完全可以同一种根本的、具有特征性的异化形式相认同；那是一种与偏执狂本身相亲的异化。

主体最终形成对自我的某种信仰，即使就其本身而言，也是一种疯狂。谢天谢地，精神分析很少真的成功做到它。但如果把精神分析定向某一方向，就是把它推向那一方向；对此，我们有数以千计的证据。精神分析文献无时无刻不承认它。这就是我坚持强调的点，也是两种精神分析构想之间的差异所在。下次，我将为你们提供它的说明。

我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它是真的，就会赋予我们辨明明年研讨方案的能力：

- “偏执狂”意味着什么；
- “精神分裂症”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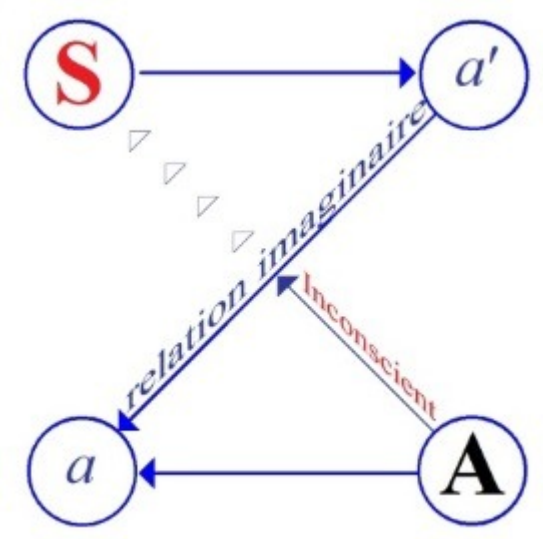
偏执狂是一种始终同自我的想象性异化相关的东西。精神分裂症则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我还要说，除了我可能向你们提供的理论解释之外，这同样是一项研究假设。我的意思是，受我将向你们说的东西引导，人们可以在临床上定准某些事物，并把它们付诸经验的检验。我只是顺便说出这一点。

我将在后续的研讨班中重新回到它。

第21课 · 1955年6月1日

我们将重新拾起上次的话题。我们将重新回到语言之墙，回到墙前以及墙两边发生的事。要把这个图式构成图式，就必须假定一件事：同光一样，言说沿直线传播。这当然足以向你们说明，它是一个隐喻性、类比性图式。而要使它能够被构成一个空间图式，只需要这一项假设。

相关知识卡 语言之墙与 L 图式



我上次试图向你们呈现的图式还蕴含着某种东西：就是那个与语言之墙相互干涉的东西。因为那同样就是镜像反应：经由这一反应，自我与他者处于镜像关系中；属于自我之物始终在根本上被感知，并始终通过另一个镜像他者被占有。对人类主体而言，这个镜像他者始终保

留着 Urbild、也就是自我根本形象的基础性支撑属性。正因为这一点，混淆、错误与根本误认才能发生；而根本误解以及奠基于这些误解的日常沟通，也由此一同建立。

相关知识卡 语言之墙与 L 图式

上次，我开始提出这个具有不止一项性质的图式。我已经向你们展示过它，教你们如何变换它，以及如何看到精神分析家的态度在其中引入了什么新东西。我也向你们指出，精神分析家的态度可以相差极大；也就是说，它会在精神分析本身中导向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后果。换言之，我们已经走到墙脚；也就是走到精神分析依据不同定向而发生的事：

- 一种构想把言说关系本身设为母型和必不可少之物；它不只是精神分析技术之意义的定向，也是其实践的定向；

- 另一种构想则以任何方式、哪怕只是极微小的程度，对精神分析情境进行对象化。它尝试——正如我很久以前就向你们指出，某种对阻抗分析的理解正在做的那样——最终重建这种对象化、这种对象化尝试。我还要说，一切对象化、一切把这一情境对象化的尝试，都会——具体形式与强度因作者、理论家和实践者而异——把精神分析变成一项对自我进行造型、重新造型的过程。到了最后分析，甚至超越在这一范域内实践它的作者本人，它必然成为依照精神分析家及其自我的模型，对主体的自我进行的造型或重新造型。

当然，要使对这个问题的批判获得全部意义，就必须像我们曾经尝试做的那样，深入研究这种自我理论。我们曾尝试支持这项研究，展示自我在根本上异化、在根本上属于镜像的性质，并展示这一点对一切

种类的自我都同样真实。一切作为自我而临现的自我，总是一种想象性功能本身的临现；哪怕是精神分析家的自我也不例外，因为自我总归是自我，无论它得到多么完善、净化或加工。

可以肯定，精神分析走上这些道路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自我在精神分析言说中具有远为准确、根本而根基性的作用。问题是要知道……

因为弗洛伊德曾在某一时刻重新纳入它；

因为弗洛伊德从不止一个面向展示了它首先在经济与动力层面的根本重要性，随后又加上某种局部论；我们不断重新谈论它，而它此刻正位于问题的核心。

……弗洛伊德在这里重新纳入自我，难道是为了赋予它这种对象价值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使整个精神分析重新集中在对象与对象关系上吗？精神分析内部随后的运动，确实走向了这条道路。

换言之，今天议程上的正是对象关系这一术语。我已经向你们说过，它何等处于一切歧义的核心，而这些歧义使我们如今既难以理解弗洛伊德作品的后期部分，也难以重新定位那些本身始终有益的技术探索。

但在精神分析本身中，人们却常常忘记，应当把这些技术探索重新放回根本的总体情境、放回意义之中。我已向你们说过，不同作者对“对象关系”这一术语的理解差异极大，他们操纵这一工具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你们会经常看到我们周围的一位作者在笔下操纵它；他同我们的圈子太近，所以上次我只通过他最近的一篇作品提到他。我没有说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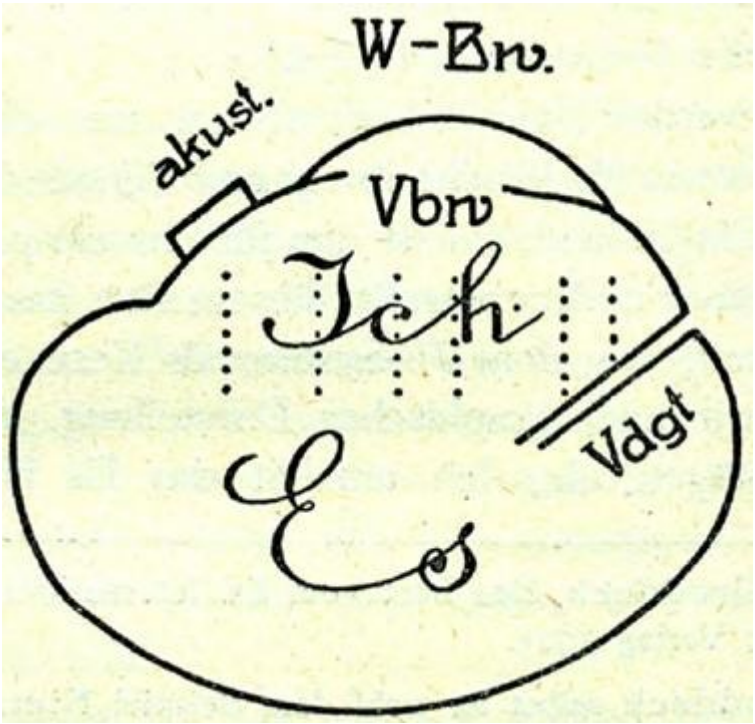
姓名，但我想几乎每个人都已经认出来：某个写过强迫性神经症、并把对象关系置于其整个强迫性神经症理论之核心的人〔布韦〕。

当然，“对象关系”在他笔下并不完全等同于它在另一位作者笔下的意思。为了定准方向，我们必须试着找到一个共同因素。可以肯定，我在这里教给你们的是一些当真根本、可以说如字母表般初等的概念——我常常这样说，也不断重申。它们与其说是对精神分析当下诸问题的一幅地图，不如说是一枚罗盘、一张定向表。这意味着，你们应当携带这张定向表，试着凭自己的力量到地图上行走。换言之，围绕这个问题，我收到过某些批评：例如，人们听见某某说，我在这里向你们提出的理论，同他从弗洛伊德某篇文本中读到的东西并不一致。

我可以轻易回答：说实话，在走向这篇或那篇孤立文本之前，必须先理解整体，因为 ego 出现在弗洛伊德作品的多个位置。一个没有看见《自恋论导言》中 ego 理论的人，无法跟上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Das Ich und das Es）中关于 ego 的说法；后一篇文本界定了知觉—意识系统。如果你们不了解弗洛伊德作品的总体经济，就很难评估即使在当时、即使只在这一篇文本中，ego 对知觉—意识系统的参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毕竟意味着，你们必须通过广泛阅读弗洛伊德的作品，检验我在这里教给你们的东西。

但无论如何，即使在弗洛伊德于《自我与本我》中所作的那种局部论阐发内部，要赋予某一定义以正确意义——例如那个使 ego 等同于知觉—意识系统的定义——也不能停留在这个唯一的等式、唯一的方程上。在这一秩序中，它甚至无法算作一个定义。如果把它孤立在这个平面，它只会是一项约定，或者随你们说，一项同义反复。所以，在那个著名图式中——它曾对整个精神分析发挥如此催眠性的作用——

弗洛伊德画出了那个著名的蛋形图式：那里可以看见 need（需要），某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镜片般的胚点，它象征 ego。Ego 是 need 这一团块中已经分化、组织起来的部分，主体通过它同现实发生关系。



如果弗洛伊德的意思只是提供一张可以获得一千种解释的图式，那么说实话，根本没有必要绕过弗洛伊德全部作品那条巨大的迂回，才走到这里。这张图式的重要之处，恰恰是 ego 的组织对某种从组织观点看来与之完全异质的东西，具有彻底依赖性。也许这才是值得凸显的东西。我还要说，一切图式都具有这种危险，尤其是一切过度倾向把事物实体化的图式：精神会立刻扑向它，从中看见最老套、最粗略的形象。

作为一个参照点……

我毕竟必须选一个；而既然上次已经选了一位近在身边的作者，

那么要谈论在地理上同我们如此接近的作者，总不是那么容易。

……我从精神分析文献中另选了一个人：一位名叫费尔贝恩的英国人，更准确地说，一位苏格兰人。他尝试以对象关系的术语重新表述整个精神分析理论；这项工作并非没有严格性，而且恰好具有我们的讲述所需的典型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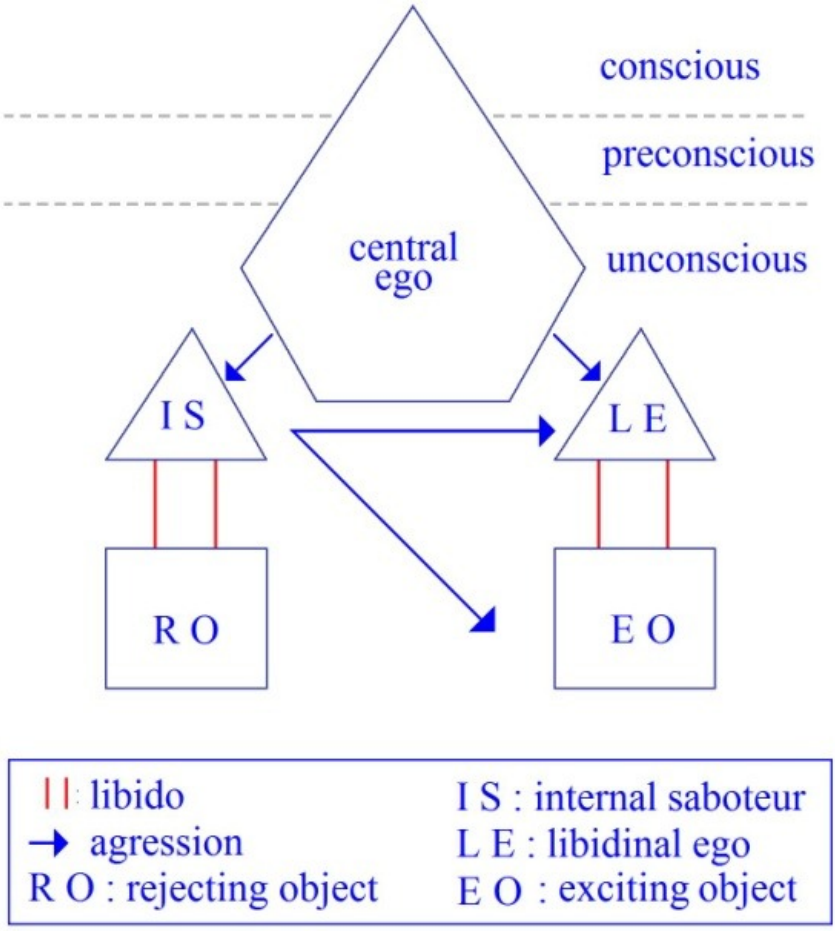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费尔贝恩的内在对象结构

你们并非无法读到这篇文章：收入 1952 年的《人格的精神分析研究》（Psychoanalytic Studies of the Personality），以及《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44 年第 25 卷、第 70—93 页〔〈以对象关系论考察内在心理结构〉，1944 年〕。因此，我们的作者写道，问题涉及以对象关系术语表述的内在心理结构。这会得出什么？它的意义超出一位作者的特殊理论。在这一简单展示中，你们会辨认出熟悉的痕迹：今天人们怎样提出问题，我们怎样汇报病例，怎样唤起心理现实的作用与力量，甚至有时怎样概括一次治疗、对它进行公开讨论。

你们将大致看到，我即将向你们复制的图式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是作者在一篇文章之后阐发出来的；那篇文章为它提供动机、加以辩护，显示它的种种回响，而且毕竟给出了一种观念、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意象图景。它同那种我们确实也必须以“想象性经济”之名加以操作的东西，并非毫无关系。你们还将同时看到它的作用、危险，至少会看到它们如何指出：如果维持在这种概念化层面，精神分析将冒巨大风险，以及究竟是哪些风险。

很奇怪，我要立即进入正题，因为我们实在应当把这篇文章全部读完，展示它的推进过程。这是你们每个人都必须私下完成的工作。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应当为你们的研究定向，促使你们对这里产生的东西进行确证——而不是断言——与检验。

作者在一个梦的临床例子之后，走到了这个图式；梦中有不同的人物与角色。那些刚刚在这里听到一些今晚将会在心理剧问题上重新出现之物的人，会立即看出其间那种十分奇特、令人好奇的亲缘性。在精神分析理论的某一部分同心理剧这类实践之间，确实正趋向建立某种退化。谈论心理剧时，不可能不表明立场：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它同精神分析实践本身具有某种共同尺度。因此，我们的作者最终得到了以下图式：



归根结底，他告诉我们：

> “必须重新做过一切。弗洛伊德理论中存在若干异质性、奇特的不对称性。
>
> 我——费尔贝恩说——已经完全搞不懂了。与其向我们谈论一种力比多，难道不如更简单地说对象吗？

我们如今已不知道应当从力比多的哪一端下手；它给我们提出太多问题，而且最终走到这一点：

为了把它同驱力认同，我们归根结底以某种方式在对象性、被对象化的形式中理解它。

我的天，那我们为什么不更简单地谈论对象呢？”

弗洛伊德曾以如此谨慎和理论严格性，从首先作为一种能量的力比多出发；也就是从一个理论概念出发。后来，这一概念造成了各种混淆，因为人们果然也把它同爱的能力相认同。而且，我们这位作者很好地走上了这条道路，我的天，他毫不克制自己！因为他的目标是让我们看到：要想理解事情，就必须走出弗洛伊德的视角；后者告诉我们：

“力比多——用他自己的语言和用词来表达——在弗洛伊德那里是 pleasure-seeking，他说；

也就是说，它寻求快乐。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一切，并发现力比多是 object-seeking，寻求对象的。

而弗洛伊德先生对此也曾有过某种观念：他难道没有写过“对象之爱”（love for object），爱正在寻找它的对象吗?

在两者之间，只是发生了这种混淆：人们用 love、也就是爱，取代了 libido。

相关知识卡 费尔贝恩的内在对象结构

这绝对令人震惊。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在最初几页就能遇见它。同许多人一样，这些话的作者没有察觉其中发生了替换。也就是说，为那

个将使力比多成为 object-seeking 的理论引入论据时，他没有察觉：弗洛伊德说的是爱，可他当时却还以为自己正在批评力比多理论——他把力比多理论当作……

你们看得出，这同我上一次课带来的东西有何关系。

……至少提出了它同对象相适应的问题的东西。

力比多寻求对象（libido object-seeking）这一概念，在整个经济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对象本身将在这里、在心理现实中发挥作用。它将导向一种很难避免的简化，而整个精神分析理论都走入了这种简化。在我看来，我在这里向你们提供的理论——对想象界本身领域的界定——恰恰特别适合帮助我们重新找到方向；也就是说，使一切概念化都恢复其根本上的操作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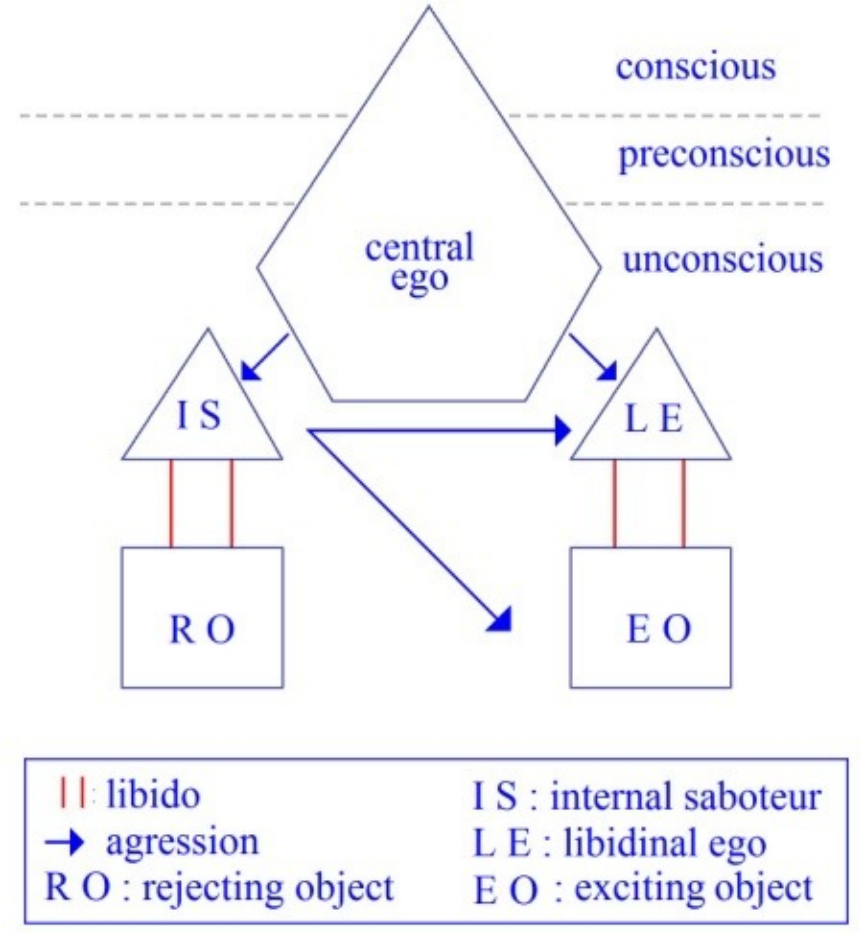
倘若有某种东西能为我在这里的尝试辩护，那就是我为你们区分实在、想象与符号的这种方式，以及使你们在其中反复练习、逐渐习惯的方式；它是一根杠杆，是我在这里展开的学说的钥匙之一。我相信，这种概念化的优点之一，这项练习、操作与概念性心智体操的一根富有成效的杠杆，就是使你们在听到精神分析发生转变、如今以对象为方向时，能够重新找到自己的方位，并看出这一对象概念之下隐藏着何种混淆。

那简直就是实在、想象与符号的纯粹混淆。在对象这一概念之下，你们再也无法找到那些使我们至少能够构想自己通过精神分析技术进行介入的根本区分。归根结底，既然有对象，那么对象总将由主体接近它们的方式得到呈现。你们恰恰把这一点当真了。

而当你们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客观地”抓住它们时——也就是说，在主体不知情的情况下——你们也会把它们表述为与最初的对象同质的对象，也就是与主体带给你们的对象世界同质。而在这一切中，你们将试着定准方向——天知道怎么定！

这位作者费尔贝恩最终得到的概念是：我们必须认为存在一个中央自我。

相关知识卡 费尔贝恩的内在对象结构



这个中央自我，就是人们自从把个体有机统一体在心理平面实体化为其统一性以来，几乎一直所想象的 ego。也就是说，把个体的心理综合当作一项既定事实，并在其中看见某种坚实且同若干装置的存在和运作相联系的东西。归根结底，这使 ego 成为一个心理对象，并因此对一切辩证法封闭。这是经典的、学院式的构想：经验性 ego 就其本身

受到理解，并作为心理学对象受到研究。这就是 central ego，中央自我。

而且，人们还会向我们指出这个中央自我的以下性质。你们看看，最初对意识与前意识的参照，如今已经被还原到何等微弱的功能价值：

- 这个中央自我的一部分涌入意识与前意识；后两者没有以任何其他方式受到构想，只是显现的领域；
- 这个自我的一部分当然是无意识的——即使最过时的心理学也从未否认或质疑这一点。

问题涉及这个 ego 同以下东西的关系：

- 并非同被压抑者的关系；
- 并非同被压抑的意义的关系；
- 并非同弗洛伊德那里一开始就把我们引入主体性维度的一切发生关系；而是同其他结构的关系，这些结构本身就被构想为受到压抑。

也就是说，那个可以被看见、为我们所及、而主体即使不是完全意识到、至少也几乎完全意识到的 ego——换言之，主体由它组成、同它相同一——放在一边；另一边还将存在某种受到压抑的东西，它是另一个 ego。因为我们一旦承认 ego 的组织，就同样可以把它承认为一种实在的组织。

总而言之，这里“对象”一词的歧义，奠基于对对象化本身缺乏一切批判。那里将会有另一个 ego，就是力比多自我。力比多自我是 ego 中那

个欲望的部分，也是作为可欲之物的部分；它因此朝向对象——那些存在于某个地方的对象。我们待会将看到——这富有教益——它们将如何被指称。

相关知识卡 费尔贝恩的内在对象结构

由于这个力比多自我同该对象的关系极其困难，它遭受了这种解离、裂分——到目前为止，人们并没有向我们解释通过何种机制。它的组织确实是一个 ego 的组织，却由中央 ego 加以排斥、推入自治运作之中；只是这种运作从此再也无法同中央 ego 的运作重新接合。

你们会在这里辨认出一种东西：每个人第一次接触精神分析学说时，它很容易在心中成形——那是向某种通俗学说的回归。只是，人们把这种构想所蕴含的各项公设凸显出来——我说“通俗”，是指“被通俗化”——这次又系统地采纳它们，而不确切地求助于任何可以使人怀疑这一图式有效性的批判。正是以这种方式，一部分精神分析家如今构想了压抑过程在根本上的意义。

我们知道，事情早已远非如此简单；因为人们还在无意识中发现了另一种远非力比多性的东西。那是什么？自攻击性理论得到引入以来，那一切引发精神分析理论大量重组的东西。从攻击性在无意识中作为一项迫切在场之物、并且其关系问题能够提出它同超我功能的关系的那一刻起，全部问题系就已在那里；弗洛伊德提出的正是它。

他并没有把内部攻击性同超我混淆。而在这里，我们将面对一个十分有趣的概念。因为作者似乎没有在英语中找到一个真能向他呈现那种扰乱性、甚至恶魔性功能的术语——归根结底，问题确实就在这里

——所以那个实例以这种形式呈现，而他称它为 internal saboteur，“内部破坏者”。我不知道它用英语发音时会变成什么样子。

相关知识卡 费尔贝恩的内在对象结构

X——几乎一样：internal saboteur。

拉康

而且它确实常常显出存在。当然，它之所以是 internal saboteur，同样是由于 ego 的装置与组织经历了另一种压抑过程。这同样联系于以下事实：它同一个相应对象发生关系；可以说，正是那个对象促成了这一分化。

换言之，因为个体生命中曾经存在两个在发展之初极其令人不适的对象实例，所以 ego 被带到同它们建立了如此奇特的关系。Ego 的特性正在于它是同对象发生关系的东西；它与这两个成问题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具有所谓压抑经济的特征。我们可以称这些关系为伪足；作者也毫不犹豫地这样称呼，而 ego 正通过它们同这两个成问题的对象交流。

这两个成问题的对象，也必须用作者赋予它们的名称来称呼。它们具有一项奇特性质：在它们真实的起源中，两者在根本上、最初是同一个对象。如果我告诉你们，在最后分析中，这一切彻头彻尾说的就是母亲，你们不会感到惊讶。在我们此刻对心理进行理论化的这个层面，问题涉及原初的挫折或非挫折，一切都归结到这里。

这种关系……

我没有强迫任何东西。我请每个人都去查阅这篇文章。它为许多看上去更中庸、更细腻、更受遮掩的立场之下所潜藏的东西提供了一个典范。但对任何生活在当代精神分析对话中的人来说，它又都是明显倾向之一。

……归根结底，所有根本结构都归结为原初对象之好与坏的两个面向之间的原始分割或裂分——也就是作为哺育者的母亲。其余一切只会是对这一原始情境的加工、歧义游戏与同名关系。这一点根本无法避开。

我所谈的这篇文章，把这一点推到了它的最终后果。文章告诉我们：俄狄浦斯情结不过是叠加到这一原始结构之上，为它提供若干母题。准确地说，这里的“母题”是在装饰意义上使用的。此后，在一个发展得更为复杂的时期，父亲和母亲才会以一种本身可能极其细腻、极其分化的方式，分配铭刻在这一原始分割中的那些根本角色：

- 一边是被称为 exciting、即“激发性的”对象，也就是就它激起欲望而言的对象；在这里，力比多同受到具体规定、被对象化的欲望本身的性质混淆了；

相关知识卡 费尔贝恩的内在对象结构

- 另一边，则是被称为 rejecting、即“拒绝性的”对象。我不想把你们带得太远。但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后果，足以使我们批判这些说法——哪怕只指出一点：激发性与拒绝性并不处于同一个层面。拒绝性已经以潜在方式包含了对象的主体化，因为仅在客观平面上，一个对象只能是造成挫折的或不造成挫折的。从我们引入“拒绝性”这

一概念的那一刻起，我们便暗中引入了主体间关系本身，也就是不承认。

相关知识卡 费尔贝恩的内在对象结构

这足以告诉你们，即使在这样的阐发中，人们也时时可能屈服于何种混淆。不过，我甚至不想展开那些可以针对这个图式自身目标所作的内部批判。我在这里不是要依照费尔贝恩本人的意图去纠正他，而是试着逐步向你们揭示他的意图，以及这一切最终走向何处。

现在，以下要素将开始运作：这种排斥的倾向——归根结底，压抑的整个概念都将被还原到它——以及力比多自我和内部破坏者。这自有充分理由，因为它们之所以作为这样的东西被创造和分化出来，恰恰是由于那两个原初对象极难处理。图中的箭头呈现了这一切。

这两个原初对象在现实中是同一个对象，只是同它好与坏两个面向的分割相联系。为了以某种方式掌控作为拒绝性对象的那个对象，主体必须——这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以某种方式把它内化；也就是说，它必须由个体主体、由 ego 当作活生生之物来构想。

相关知识卡 费尔贝恩的内在对象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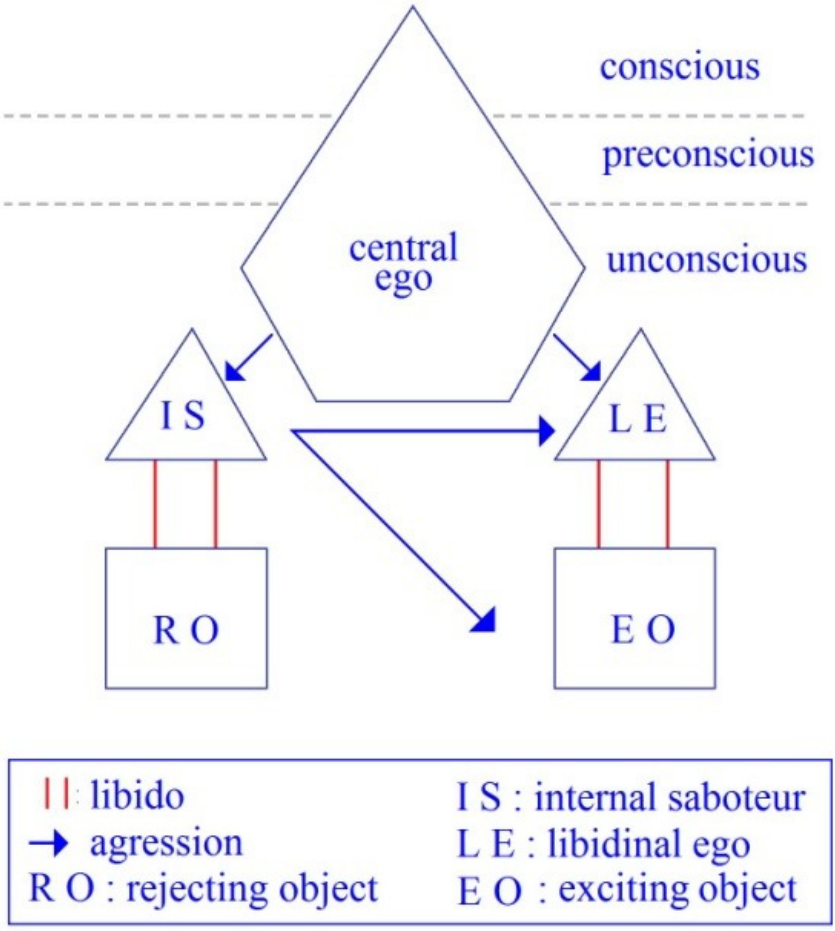
其实，在我们可以给出的一般发展经济与图式中，内化坏对象这一原则本身并非真正可以争辩之物；这一点确实无须争辩。说到底，以下见解颇有道理：若要以某种方式成为坏对象的主人，内化它乃是紧迫之事，不论这会带来何种不便。主体更应内化的正是坏对象，而不是那个更适合留在外部、在那里发挥有益影响的好对象。

然而，对象远不是单义的：使主体遭受被拒绝之痛苦的对象，同那个不断重新激起力比多、并由此重新激活这一痛苦的对象，是同一个对象。可以说，正是在坏对象、即拒绝性对象内化运动的尾流中，另一个过程也随之发生：力比多自我被视为太过危险，因为它会过于尖锐地重新激活那个曾导致原初内化的戏剧。

因此，它也会继而受到拒绝；从此，来自中央自我的排斥、裂分与压抑作用施加于它，这由我们画在这里的箭头表示。此外，不要忘记无意识内部发生的另一重作用：由那个被称为内部破坏者的项发出双重的附加排斥，这次以攻击的形式显现。这种攻击来自那个本身也受到压抑的实例——内部破坏者，也就是同原初坏对象紧密相连的某种东西。

相关知识卡 费尔贝恩的内在对象结构

这大致就是我们所到达的图式。你们也看得出，从一般结构的观点看，它确实反映了某些东西；那使我们想起不止一种我们在临床演变中、在种种显现中、在那些似乎反映主体于所谓神经症领域中之行为的现象。



例如，一个梦的意象直接说明了这种图式的重要性；梦里发生的事情确实极具表现力，也很典型。主体梦见自己受到一个人物的攻击，而这个人物碰巧是一名女演员；女演员这一功能同她的历史有着特殊关系。

在梦的后续部分，一次转化同时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确定两件事：一是攻击者同主体母亲的关系；二是梦的第一部分中受攻击人物的分裂——它分成另外两个分别为男性和女性的人物。两者彼此变换，正如彩色波纹会在某一时刻使某个给定对象的面貌变得暧昧不清。

我们看见，梦中受攻击的人物通过某种搏动，依次从女性形态转为男性形态。作者毫不费力地在这一男性形态中认出他的激发性对象；它深深压抑在另外两个形态之后，像一种惰性要素沉在无意识心灵的底部。主体围绕这个梦所作的联想，使人能够把它认作她的丈夫——她同丈夫的关系确实极为困难；而丈夫即将回家，又在此刻使这种关系临场呈现出来。

用这样的梦说明图式，意义不大；另有千百种东西都可以说明它。问题只是要知道：在由此推导出的经济中，这种图式会对精神分析家的行动与介入发挥什么作用。作者所作的一项看似理论性的修改，是他认为唯有这样来理论化主体的根本结构，才能首先抵达它最彻底的要素：也就是在每个病例中，依照其占优势的程度，探测、标定，甚至近乎量化主体行为运作中较不突出的实例——那个规定主体、赋予主体以特殊处境的实例。

这一概念本身尚不足以证明创造如此图式是正当的；除此以外，还有以下一点：作者告诉我们，这样的图式预先向主体的一切重新适应敞开，并以此为其规定。因为归根结底，问题涉及什么？涉及这种力比多，这种能量。到目前为止，理论一直是在其内部经济极端流动的关系中把握它的；也就是说，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可能改变，而不使所有其他部分同时改变。

相反，这里涉及的是一个界定完好、稳定不变的世界；活着的个体同那些为他预定的对象共处，并能在其中找到自己严格的配合。在每一个阶段，根本问题都在于使他重新找到一条道路，通向与那些已经在那里等待他的对象的正常关系。

事情当然不会自动顺利进行。困难来自那些从此被称作“内部对象”的对象之存在，而且是其隐秘、隐藏的存在。这些对象在根源上具有配合的性质；它们已经是这样的对象，可以说，从一开始便拥有某种充分自足的现实性。

如果它们转入了如今这种对主体构成障碍、重负与瘫痪的功能，那是因为主体没能面对最初遭遇的一个未能胜任其任务的对象。我没有强加任何说法——原文就是这样写的。归根结底，文章告诉我们，这是因为母亲没有履行她的自然功能。

因为那里预设：

- 在自然功能中，母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拒绝性对象；
- 在自然状态中，母亲只可能是好的；
- 正是由于我们生活方式所特有的那些特殊条件，这种原初意外才可能发生：主体被迫同自身的某一部分分离，把它从自己身上切掉。

而且，事情非常准确地发生在这里：这部分正是主体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抛下的“约瑟的彩衣”，他仿佛把它从自己身上截去。主体没有承受那种本质上含混矛盾的激发——全部戏剧正是从这种矛盾、这种歧义

中涌现；“歧义”一词的意思正在于此：同一个对象既是好对象，也是坏对象。

不过，你们已经在我随讲随评中看到，这个图式并非只有缺点。它包含各种可以得到说明的东西。特别是，任何有效且有价值的 ego 概念，确实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把 ego 同对象关联起来。

至于把这个对象称为“被内化的”，你们应该感觉得到，整个戏法归根结底就在这里。这个被内化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全部问题正在这里。我们试着通过谈论想象界来解决它，同时也借此看清对想象界秩序的参照所包含的一切意涵——只要我们知道想象界在整个生物学秩序中发挥的功能。

相关知识卡 费尔贝恩的内在对象结构

尽管我已经给过你们不少提示，我待会仍会回到这个问题。问题恰恰在于：想象界在生物学秩序中的功能远非与实在相同。

可在这里，没有任何这一层面的批判：对象就是对象，它在其全部体量中被把握。我们选择在主体生命之初将它对象化，这一位置确实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混淆，因为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母亲本身的想象性价值可能确实极大。同样再明显不过的是，她作为现实人物的价值也具有完全占优势的作用。

如果我可以这样说，戏剧正在于混淆与歧义的风险：这两个层次无论多么占优势，人们一旦被带到这里将它们混为一谈，风险便产生了。那么，问题究竟将涉及什么？

问题在于使这个力比多自我重新整合，也就是说，使它找到那些为它预定的对象；而这些为它预定的对象兼具现实对象和想象性对象的双重性质。我的意思是，正因为它们披覆着这种使之成为欲望对象的想象性光彩……

如果精神分析始终把某种东西置于首位，那恰恰就是这一点：力比多在创造对象本身方面的丰饶性；这些对象对应着它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

……而另一方面，这些对象又将是现实对象。

当然，我们无法把这些现实对象给予个体，那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问题在于使他不再以某种态度、某种行为来对待作为激发性对象——即引发想象性反应的对象；从而使他能够严格说来在其全部可以量化的广度上，显现迄今受到压抑的力比多。正是这种压抑本身构成其神经症的症结。好吧，我相信，在这一层面上很清楚：如果我们固守这样的图式，那么对精神分析家而言，确实只有一条道路。

要知道精神分析家可以走哪条路，必须先知道他在这个图式中处于何处、能够处于何处。费尔贝恩先生从一个现象——而不是从抽象构造，尤其是从梦——推导出他所谓的“多个自我”的分化时，他在其中根本看不见中央自我；他只是设想了它。因为人们从“如今我们关心的是 ego”这一观念出发，于是也就可以把它纳入运作。

他所谓的“中央”ego，在梦中只有一个功能：在他谈到的梦中，他例如把它表述为他所界定的坐标系统的原点。那是一个 ego，是他所观察的 ego，整个场景就在其中发生。如果我们从个体的对象化图式转向一种必不可少的努力、试图将精神分析情境对象化，就会看见：精神分析

家事实上只能处在唯一一个位置——恰恰是他所观察的那个 ego 的位置。

我们一旦作出第二种解释，它甚至立刻显出一种明显的长处和价值：它真正为第一种解释提供了根据。因为截至目前，在这样的理论、这样的图式化中，主体的 ego 就其进行观察而言，恰恰不具有一个 ego 的任何主动性质。反过来说，如果真有人在观察，那正是精神分析家。我们还知道，在这种图式的经济中，中央自我的功能恰恰就是：成为精神分析家在主体那里设想的某种东西——亦即中央自我。

在这里，这个进行观察的精神分析家，也是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进行介入的精神分析家。无论我们把它称为解释、阻抗分析，还是别的什么，介入者都是他。暂且不谈他将如何介入。可以确定的是：他将从这个位置、以这种姿态，以某种方式介入这个隐藏对象、这个被压抑对象之功能的揭示；该对象作为力比多自我的相关项，必须使后者的显露与发展成为可能。换句话说，问题是什么？

主体——这从此成为精神分析的功能——将显现其欲望的意象；精神分析家则在那里向他指出这些意象的正确方向，指出他能在哪里使它们得到满足，又能通过何种方式重新面对那些构成对象的意象。

因此，精神分析家的介入是一种东西……

我想你们会认出它；我猜，对你们当中的某些人而言，

它不过是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所做之事的进一步展开。

……它使主体能够重新找到合适的意象，找到那些他可以同之协调一致的意象。

从我们在这里面对一种现实——一个构成现实世界的现实——的那一刻起，这些意象便具有如下位置。正如人们告诉我们的，心理现实与真实现实之间唯一的差别，正在于心理现实服从于那种被称作认同式的模式，即同意象的这种关系。于是，对意象的正常性及其方向，就不存在任何其他尺度，只有精神分析家本人的想象性世界所提供的尺度——无论程度如何，你们最终找到的总是它。

而且，这一点并未受到否认。任何以对象关系为基础、以它为参照并围绕它组织起来的精神分析理论化，都在于说：归根结底，主体想象性世界的重新组织、重新分配与重新构成，将依照以下东西所构成的规范与世界来完成……

这件事已经被说出并得到强调；无论你们走到哪里，一旦进入这种经验组织的层次，

都会看到它再次受到肯定。

……即构成精神分析家之自我的意象秩序与意象世界。

对拒绝性对象的原初坏内摄——它以某种方式毒害了该对象的激发性功能——将由对一个正确自我、对精神分析家之自我、对精神分析家本身之想象性世界的良好内摄加以纠正。

相关知识卡 费尔贝恩的内在对象结构

我已经相当详细地陈述了这一点，几乎比我迄今向你们陈述的任何东西都更缓慢。这是有意的，为的是让你们从中认出对象关系在实践中实际被赋予的功能。既然已经从我口中听到精神分析进程的图式如何组织，你们就不能不在每天接触的大量实践与理论化中重新发现它的

隐含存在；那些实践与理论化建立在若干原则之上，而这些原则正因为始终隐而不彰，才更需要被明确说出。

问题在于：这就是精神分析吗？在向你们陈述它时，我感觉你们中许多人通过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已经被引向另一个问题。这是这一图式的彻底、基础、内在心理图式——或者按照作者的说法，是一种情境或结构。我要指出的是：在这里，全部经验将不再通过言说发生，而只是把言说当作工具；这个功能被推到极限时，它在精神分析中只剩下一种占住场面的角色，用来给席面解闷。

人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话。问题在于守候这样一个时刻：在最终逃离言说领域、逃离断言领域、逃离言说中的核验领域的东西里面，察觉究竟是什么俘获了主体，阻滞他，使他抗拒，使他受到抑制、感到恐惧；继而以某种方式将它对象化、加以矫正。我要重复一遍，这种矫正发生在想象性平面上；在缺乏任何其他参照系统时，这个平面只能是以精神分析家为模型而构成的二元关系平面。

我在这里试着借弗洛伊德最艰难的作品之一向你们呈现的问题，就是：

- 弗洛伊德从未满足于这样的图式；
- 如果他想要制作这样的图式，他早就做了；
- 如果他想以这种方式把精神分析理论概念化，他的一半作品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 如果这个图式真能如此得到概念化，
- 那么根本不需要一部《超越快乐原则》。

《超越快乐原则》——我在本年度全部教学中一直强调这一点——正在于说：这种想象性经济并不是在我们经验的极限处，作为一种不可言说的体验而被给予我们的，仿佛问题只在于寻找、清理出某种更好的幻象经济。

相反，整个想象性经济只有被纳入一种象征秩序才具有意义；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把握它，它在精神分析中才有作用。这一象征秩序本身强加了一种不止是二元、而且根本上是三元的关系。然而，它一旦成为三元关系，就向作为普遍秩序的象征秩序之全部复杂性敞开。

无论这一图式同所提到的梦贴合得多么严密，无论梦本身的意象把它说明得多么清楚、明显，也无论这样的图式多么可以被对象化，都有一件事比一切更根本，并且构成占主导地位的事实：

- 是主体向你们讲述这个梦；
- 是主体在做梦；而经验向我们证明，这个梦既不是随便在什么时候做的，也不是随便以什么方式做的，更不是没有说给任何人听的。

我们知道，即使在精神分析中，梦也具有主体直接陈述自己在这里能够讲述的全部内容所具有的一切价值和功能。正是在这种沟通中，在他能够向你报告、向你讲述这个梦，并判断自己具有某种受到抑制、困难的态度，或在另一些情况下具有较为顺畅、女性的或男性的态度这一事实中；正是在他把它传达给你的事实本身所具有的动力中，存在着精神分析的杠杆。这一点之所以能够成为杠杆，是因为他能在言说中把它说出来，并非某种多余的、上层建筑式的事情。

这是因为，一切从一开始便已经组织在一种象征秩序、一种主体几乎自起源之初就被引入的法则秩序之中。这个秩序已经依照一种话语，赋予主体的想象性关系以意义；我把这种话语称为主体的无意识话语。通过发生的这一切，主体想要说出某种东西，而且想用一种语言把它说出来；这种语言本身适合于——或至少潜在地可以——成为言说，也就是得到传达。

进展的动力就在以言说进行的澄清关系中。意象将在一个更广阔的话语、在某种整合了主体全部历史的东西中取得意义；主体本身也在其中得到整合，因为主体本来就是一个自始至终被历史化的主体。精神分析正是在象征界与想象界的边界上进行。

主体同位于他面前的对象并不具有二元关系；他同这个对象的关系，只有相对于另一个主体才获得意义，并同时取得后来所谓的价值。反过来说，如果他同这个对象发生关系，那也是因为另一个主体同样同这个对象发生关系；两者都能够命名它，以某种方式把它置于某种秩序之中。这个秩序不同于实在：只要对象能够得到命名，只要它的在场能够作为一个原初维度受到唤起——也就是作为某种有别于其现实性的东西受到唤起——就是如此。

在场本身预设着缺席、命名、对在场的唤起，以及在缺席中维持这种在场的可能性。换言之，这个把对象关系放在精神分析理论化核心的图式，始终遮蔽、回避并排除某种东西；然而全部精神分析经验都必须以它为透视中心——也就是主体向你们讲述的东西。

正是他向你讲述这一切的事实，正是就他讲述自己而言，存在着精神分析的动力杠杆。那些由此显现、使你能够越过其讲述内容的裂口，并不位于话语一旁；它们恰恰是话语文本中的裂口。正因为在话语中有某种东西显现出来，它才显得——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要让这个词在这里出现。这还是第一次；你们马上会看见我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它。

……显得是无理的。正是在这一层面，你们才能使意象以其符号价值介入。

这是我第一次向你们承认存在某种“无理”之物。不过请放心，只要严格依照算术中可以赋予这个术语的用法，这里并不存在任何矛盾。有些数被称作无理数。无论你们对这类事情多么不熟悉，我想最先浮现在脑中的，仍会是希腊人以来人们所作的那项发现。它把我们带回

《美诺篇》——本年度我们进入这一辩证法时所穿过的某种门廊：正方形的对角线同它的边之间没有公度。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一点；在很长时期内，人们执意认为终究会找到一个共同尺度。然而，无论你们选得多么小，也永远找不到。这就是所谓“无理”。

相关知识卡 《美诺篇》奴隶童与回忆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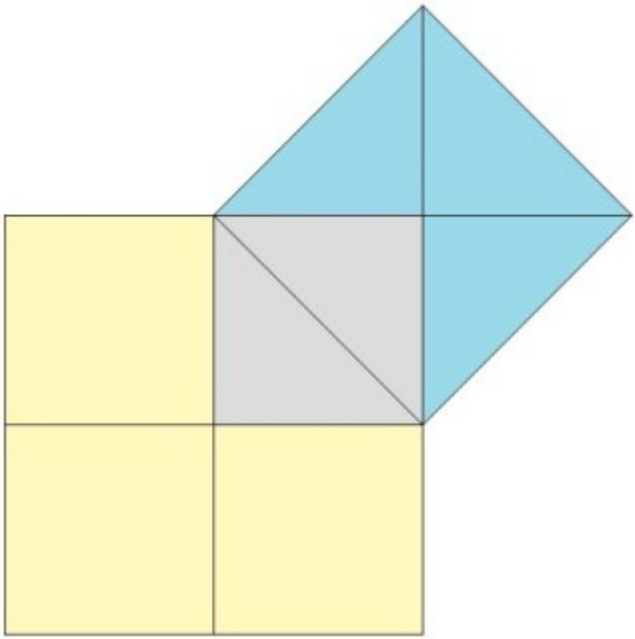
我要告诉你们，所谓欧几里得几何学恰恰奠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等价地运用两个符号现实。它们两者都是符号性的；我们可以假定其中一个是现实、另一个是符号，或者如果你们愿意，是两个符号、两个被符号化的现实。它们没有共同尺度；恰恰因为没有共同尺度，我们才可以等价地运用它们——也就是像苏格拉底在《美诺篇》中同奴隶对话时所做的那样。

他对奴隶说：你有一段长度，用它作一个正方形。现在你想作一个面积大一倍的正方形，应当怎么办？奴隶回答：我要把长度扩大一倍。问题只是要使他立刻明白自己错了：边长若扩大一倍，得到的正方形会大四倍。若只停在这里，我们就永远无法另找办法。因为无论你们怎样排列那些现实的正方形，都找不到一个窍门，使正方形的面积恰好大一倍。

然而，恰恰因为眼前的现实可以通过符号方式来处理——也就是说，人们操作的不是正方形、不是方砖，而是画出来的线，亦即被引入现实中的线——问题才得以解决。当然，苏格拉底没有把这一点告诉奴隶，因为奥秘正在这里。人们说奴隶本来什么都知道，只需重新认出它们；但条件是，人们已经替他完成了工作。

相关知识卡 《美诺篇》奴隶童与回忆说

而所谓工作，就是画出这条线，并立刻把它当作某种可以同最初被给予——也就是被假定为实在的——那条线等价处理的东西来使用。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就两者谈论某种构成正方形的东西。此时，再使奴隶认出那里同样有一个正方形，并使他发现这个正方形应当是另一个的两倍，就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因为它等于其一半的四倍。

你们已经看见这里引入了多少东西！在那些起初并未给定的东西中，我们引入了整数的整个计数体系；最初只有较大、较小和现实方砖的问题。换句话说——我采用这个例子，是为了让你们理解得更好——你们在这里看见的是受到遮掩的想象性明证；更准确地说，它们为一种本质上属于符号性的操作披上了显而易见的外观。

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找到问题的解——那个面积为第一个正方形两倍的正方形——是由于一开始就有效地摧毁了第一个正方形本身；也就是从中取出某种不再是正方形、而是三角形的东西，再用这个三角形重新构成第二个正方形。

这预设了一整个由符号性假定构成的世界；它们与其说在那种使奴隶表示赞同的虚假明证背后得到揭示，不如说受到了隐藏。换句话说，问题在于说明：一个仿佛自身包含其直观的空间，看上去多么自然、多么不言自明；然而，没有什么比“它自身真包含这些直观”更不显然。

在那些于雅典广场上如此博学地发表论说的人之前，必须先有整整一个测量员的世界、一个实践操练与三角测量的世界。唯有如此，空间才不至于对所有人都等同于它对一个以原始自然状态生活在大河岸边的人可能呈现的样子：一个由水波和沙环构成的空间，一片永远变动、从来抓不住任何标记的滩地。

仍以我的例子来说，空间也可以像伪足一样伸缩。人们必须在极长时期中学会把一些东西折叠到另一些东西上，使种种印痕与种种东西重合，才开始构想一个后来显得在三个维度上得到同质结构化的空间；可是这三个维度，正是你们随自己的符号世界一同带来的。

换句话说，在这里引入无理数不可公度的一面，正因为它不可公度，才使所有那些原本仍然僵滞的初级想象性结构活跃起来；否则它们还只会局限于我们在欧几里得著作最初几卷中仍看到的那类操作。请记得，人们如何小心翼翼地提起等腰三角形，检查它没有移动，再把它叠到自身上；你们正是由此进入几何学。

几何学在那里带着它的脐带痕迹。事实上，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整个建构来说，再没有什么比以下事情更根本：某种归根结底不过是痕迹、甚至连痕迹都不是、根本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可以被翻转到自身之上。也恰恰因为如此，人们一旦抓住它，又要让它在一个它尚未准备好面对的空间中接受操作时，才会如此害怕。说到底，正是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是象征秩序把全部现实引入问题之中。

同样，当问题涉及我们主体的意象时，发挥作用的是辩证秩序……

也就是说，这一切、意象的这种功能，已经被铭写下来，在主体历史的文本中取得了某个位置、某个点；在某些点上，这些意象被缝合固定在那里。

……它们作为“函数”被纳入某种象征秩序。人类主体从尽可能早的时候就被引入其中；无论你们把这个时刻想象得多么接近、多么同起源处的关系融为一体，它都同那种我们不得不承认为实在之某种残余的原初关系——即对实在对象的这种〔服从？〕——同时发生。

可是，一旦人身上出现某种类似对立节律的东西——这种节律已经由第一声啼哭及其停止标出——就已经有某种东西显露出来，并通过它在象征秩序中留下、仍能发挥作用的一切痕迹显露出来。凡观察过儿童的人都看见过：完全相同的一下敲击、撞击或耳光，如果是惩罚性的一巴掌，或只是一次意外碰撞，儿童的接受方式绝不相同。

在尽可能早的时刻，在某个甚至先于主体自身意象固定下来的位置——这个自身意象将成为自我的第一个结构性意象——符号关系本身便已经出现。它构成主体间关系，把主体本身这一维度引入世界；也

就是说，它能够创造出另一种现实，有别于那种作为粗粝、厚重的现实呈现出来的东西，有别于两个体量的相遇、两个球体的碰撞。

经验，特别是想象性经验，就这样在尽可能早的时候，被铭写到辩证法之中、被铭写到这一象征秩序的界域之中。正因为如此……

因为对象关系层面已经发生的一切，都依照某种曾构成主体特殊历史的东西而得到结构化；它不只是往事的残存，而是能够被回忆的。

……正因为如此，精神分析才是可能的。

正因为如此，转移现象本身才真正是一种转移。

今天，为了必须向你们摆出这个图式——它典型地代表了当下趋向形成的某种精神分析理论化——我在本次研讨班中给予批判对象的篇幅，或许远远超过原先打算。因此，已经没有足够时间从另一个面向、另一个角度、另一条路径来理解问题；也就是正面说明，在正确地以言说交换为中心的精神分析中，自我同自我的关系、自我的辩证法以及自我的功能实际上应当占据什么位置。

我下次会做这件事。如果今天的课使你们觉得太过枯燥，我将采用一个文学例子和一项文学参照；你们会看到，其中的种种含义是无法回避的。

我原本想说：在对象世界中，自我只有作为被符号化的对象之一、同其他对象并列，才能得到构想。但另一方面，它当然也像那个总在边界处的空间一样，具有自己那种显而易见性，而且自有充分理由。我们自身同所谓的自我之间无疑存在极其紧密的关系；我们同这一自我

的认同，并不在于它的实在嵌入——我们只能以一个意象的形式看见它。

正如人们所说，这是“链条的另一端”，是在另一个时间中。问题将恰恰涉及这一点。如果说有某种东西以最成问题的方式向我们显示了自我严格说来具有的幻象性质，那就是唤起替身的可能性和替身的现实；更进一步、也更重要的，则是替身幻觉的可能性。

总之，两个不同的实在对象具有同一个“想象性身份”这一说法，正好可以用来检验自我本身的功能。既然我们在这里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我打算在下一次研讨班开头围绕替身来讨论。自然，这把我引向了一些由来已久的文学思考，涉及索西这个人物究竟是什么。

鉴于我们赋予象征界域的价值，不能忽视的是：索西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安菲特律翁传说形成之后才诞生。是普劳图斯引入了他，把他写成那个无与伦比的替身、那个最显赫的受骗丈夫安菲特律翁的一种喜剧性复本。

这一传说在漫长年代中不断丰富，并在莫里哀那里结出最后一朵奇葩——其实也不是最后一朵，因为还有季洛杜：

- 十八世纪曾有一个德国版本，属于神秘主义类型，把女主人公唤起为一种圣母玛利亚般的人物；
- 还有精彩绝伦的季洛杜版本，其中悲怆的回响与主题的深化，远远超出了纯粹的文学炫技。

你们可以在下次课之前把这一切重读一遍。我会把重点放在莫里哀那部具有古典性质的《安菲特律翁》上。你们将看到：今天，为了说明我并不认为最佳的某种精神分析概念化，我们采用了一张效果颇佳的小型机械图式；那么，为了说明另一种东西——精神分析本身在象征界域中的理论化——我转而诉诸一个意象或戏剧模型，自然再合适不过。

我将试着在莫里哀的《安菲特律翁》中向你们展示——戏仿、仿拟一部新近出版著作的书名——精神分析的历险，甚至它的灾难。

第22课 · 1955年6月8日

谁读过《安菲特律翁》？

说实话，古典时期的仿作曾被推进得相当远。读过普劳图斯的版本，就会看出莫里哀的版本欠它多少；而这样非常好。况且，假如人们更下定决心去模仿，或许反而会更有原创性。

莫里哀的戏具有那些闻所未闻的妙处，大概正是拜此所赐。总而言之，学年已经向前推进，总该有些可以放松的时刻。以前临近放假、老师给我们朗读的那些课上，我们五年级时曾有老师给我们读吉卜林——他们的品味可真糟！——明明另有那么多更有意思的东西可读。管它呢，我们当时还是很高兴。

不过，我还是应当向你们标出问题的位置。《安菲特律翁》的故事——我曾由着自己提到它……

“我曾由着自己”……我的随意放纵可真有些特别！

……在回答那位戏剧性神经症者时，顺手点过那么一下。

也就是说，我曾试着借《安菲特律翁》神话引入并使人感到人物与角色之间的差别：人物是总体的外观；角色则归根结底关乎人物与命运之间那种暧昧而撕裂的关系。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例如，正如我指出过的，也许《安菲特律翁》神话中存在某种奥秘。

人们早已发现，在人类与诸神之父、那位伟大神祇如此慷慨赐予自己的全部艳遇中，这一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女人是无辜的。即使在普劳图斯那里，无辜这一主题也绝对居于中心。我要说的是，在这部戏取得的各种形式中，朱庇特都会在某一时刻为阿尔克墨涅的清白作保；这一事实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您好！您大概是来听我那场“精神分析与控制论”讲座的吧？可您将听到完全不同的东西。今天要谈的是自我。今年，我们从某个侧面进入自我问题，也就是从不同于去年那一端来把握它。去年，我们是在转移现象的问题上唤起它；今年，我们试图相对于所谓的象征秩序来理解它。象征秩序，就是人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之中的事实；在我们这里的说法中，它意味着一个语言世界，而一种名为言说的特殊现象就在其中发生。

我们对它非常感兴趣。我们认为精神分析恰恰发生在这个环境之中；如果不能恰当地标定它同另外两个同样存在的环境——实在的环境与想象性幻象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人们就会使精神分析滑向两种方向之一：要么滑向针对实在的介入——不过，这终究是一种人们很少跌入的陷阱——要么相反，给想象界加上我们认为不应有的重音。

沿着线索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使我们开始谈论莫里哀的《安菲特律翁》。你们马上会看到为什么。我们从一个非常特殊的安菲特律翁神话出发；上一次课，我已经同那位同样无辜的来访者莫雷诺提到过它。

我当时指出，这个神话至少可以向我们唤起某种东西。我用一句斩截的说法说：“我们的妻子无疑总得时不时同上帝一起欺骗我们。”这是

那种可以在一场交锋、一次过招中使用的精炼表述，不过它仍值得稍加评论。

透过我告诉过你们的关于父亲的一切，你们肯定已经隐约看见：父亲的功能之所以能在整个精神分析理论中具有如此决定性、压倒性的地位，必然是因为它同时处于多个平面。我们已经能够看见——而且在“狼人”病例中看得非常清楚——以下差别：

- 符号性父亲，也就是我所谓的父之名；
- 想象性父亲，就他是竞争对手而言；
- 还有实在父亲；这个可怜人同所有人一样，具有种种厚重的现实属性。

好吧，这一点值得重新讨论，或许尤其应当在伴侣关系的平面上重新讨论——也就是丈夫究竟是什么。

说实话，一些优秀而坚定的头脑——历史中偶尔会遇见这样的人，仿佛标点般出现——早已被我们所谓婚姻与爱情的关系稍稍触动并警醒。一般而言，人们用戏谑、辛辣或玩世不恭的方式处理这些事。若论生活中的实际用法，这也许还是触及它们的最好办法。在这方面，法国有一套源远流长的好传统。

但我们也见过最严肃的思想家；普鲁东先生有一天就停在了婚姻与爱情这些词语面前，绝没有轻率对待它们。读他时……

我非常建议你们读一读普鲁东。他头脑坚定；在他那里，

我们会在某个转折处重新听见那种可靠的“教父”腔调。

……简言之，他是一个曾略微后退一步思考人类处境的人；他试着接近究竟是什么规定了忠贞——这种东西远比人们以为的更加顽强，也更加脆弱。

他最终问道：“除了已经许下的诺言，还有什么能够为忠贞提供动机？”然而，诺言往往轻率地许下；如果它不是这样许下，大概就会少见得多。这将明显阻碍人类社会中那些善好而体面的事情继续运转。

可是，正如我们同样指出过的，诺言并不因此就没有被许下，也不因此就不结出它的一切果实。当它遭到破坏时，不仅人人惊惶、担忧和愤慨；每一次背弃诺言还都会带来后果，无论我们愿不愿意。这恰恰是精神分析以及对无意识的探索教给我们的事情之一：在无意识中，言说依照主体的行为方式，继续传播它的波纹、实现它的命运。我们如此轻率地许下忠贞，而整个自然足以表明，它不仅被轻率许下，而且严格说来根本无法维持——一切严肃的头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那么，又该如何为它辩护？

普鲁东曾就此提出一些问题。让我们试着超越所谓的浪漫主义幻觉：即认为人们应当瞄准伴侣彼此取得的理想价值；换句话说，认为完美爱情的神话能够为奠立在人类承诺基础上的一切许诺提供根据与支撑。说实话，普鲁东的全部思想都反对这类浪漫主义幻觉。他试图为婚姻忠贞的秩序确立地位和基础；他的某种表述方式乍看可能晦涩、甚至神秘，但其解答、其终点无论如何理解，都只能被认作恰恰是一项符号契约——也就是把一个主体同另一个主体约束在一种关系中的契约。

比如说，让我们采取女人的视角。女人给予丈夫的爱，所瞄准的并非个体……

即使她确实把他理想化，并能随着时间推移维持这种理想化；可我们知道，所谓共同生活的危险恰恰就在这里：理想化本身同样无法维持。

……说实话，在婚姻契约中，女人透过那个她已向之许诺的配偶，所瞄准的是超越这个存在者的一个存在——我不是说超越特殊存在，而是超越个体存在。那种严格说来神圣的、构成婚姻纽带的爱，是从“女人”指向普鲁东所谓“全体男人”的爱。

同样，普鲁东如此表述，丈夫的忠贞透过女人瞄准的是所有女人。这当然可能显得悖谬。但我们清楚看到，普鲁东的这个“全体……”既不是德语的 alle，也不是任何一种数量。它确实是一项普遍功能。这个理论所瞄准的是普遍的人，是作为符号的人；如果可以这样说，是本质性人类伴侣的化身。

纽带、言说的契约超越了个体关系及其想象性变迁；要理解这一点，无须到经验以外寻找很远。可要理解符号契约同想象性关系之间建立的冲突——在一切严格说来属于力比多的关系中，想象性关系都会大量受到激发并自发增殖；而当严格属于激情秩序、属于迷恋（Verliebtheit）秩序的东西介入时，尤其如此——就必须再向前一步。这里确有一种冲突，而且可以说，它支撑着绝大多数当代冲突；

所谓资产阶级命运的变迁——我们总得给它一个名字——就在这些冲突中延续，因为这种命运在以下方向中得到构成：

- 从自我实现的视角出发；
- 在自我所特有的异化之中；
- 在心理学中引入自我本身。

我们应当暂时看清这种冲突意味着什么，以及是什么使它在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视角中变得格外尖锐；只须观察这些现象本身，就能看见这一点。但另一方面，为了充分理解其中缘由，我相信还必须再稍微向前走一步。

我们将在人类学材料中寻找参照，这绝非偶然；这些材料尤其由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凸显出来。他向我们展示了联盟结构中的某种特殊之处，而他的全部作品都对此着重强调：女人在其中是对象。从根本上说，在联盟本身的基础和出发点上，对那些表现为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所作的全部分析，都引导我们这样思考。这是对事实进行分析后所得的事实。

当我们考察这些基本结构时……

你们知道，这些“基本结构”自然最为复杂；

反过来，那些我们称为“复杂的”结构，表面上却最为简单。

……我们生活在所谓复杂结构之中，并相信自己可以自由选择伴侣；也就是说，在婚姻选择中，任何人都能同任何人结婚。

这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一种深刻幻觉，因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东西写进法律。事实上，法律中写下的甚至恰好相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没有某种更微妙的潜在结构指导这种选择；它引入了若干偏好要素，这些要素虽然受遮蔽、被掩盖，却仍然至关重要。

所谓"基本结构"的意义在于，它们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偏好要素结构的一切复杂性。如果仔细研究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我知道，你们与其说已经认真研读这部要著，大概还停在下决心去读的阶段——就会明白：为什么并且如何，只有它真正有效地证明了女人在联盟的引入中所处的位置……

联盟如此根本，因为正是它界定了文化秩序本身，并使之与自然秩序相对立。

……在联盟被引入人类自然时，女人显现为对象、显现为交换对象；可以说，她同样恰如言说，因为言说在社会中从起源处也正是根本交换的对象。

无论经母系传递的是何种财产、资格与地位，也无论一种因而被称为母权制的秩序可以具有何种权威，象征秩序在其原初、基础、开端的运作中都是男性中心的。这是一个事实。当然，在历史进程中，这一事实不乏各种修正；然而，如果忽视它的根本性质，我们便无法理解种种事情，尤其无法理解女人在爱情纽带中——特别是在其最突出的社会化形式，即婚姻纽带中——那种完全特殊而不对称的位置。

如果能在这些事情所属的层面上，以一定严格性看待它们，那么许多因为人们未能在应有平面理解它们、转而在其他平面建立起来的幽灵，都会随之消散。在这个视角中——我是说婚姻契约——以其完

整、完成的形式来看，确实有若干极其重要的历史参照；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说的是模糊之物。

我们把婚姻看作双方同意之契约的现代观念，无疑是一种由救赎宗教视角引入的新事物；它把个体灵魂置于优先位置，实际上覆盖并遮掩了婚姻原初神圣性质所赋予的最初结构。要理解这一制度的历史，绝不可能忽略这一点。如今，它以一种可以说收拢起来的形式显现，其中某些特征依然如此坚实、如此顽强，以至于我们还看不到社会革命能够抹去其优势与意义。

必须看清，在历史过程中，这一领域始终存在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契约。例如在罗马人那里，一种是有名字者真正意义上的婚姻，也就是贵族、显贵者的婚姻——innobiles 恰恰意为“没有名字的人”。贵族婚姻具有高度符号性的性质，而特殊类型的仪式又为这种性质提供保证。

我不想深入细节，也不打算向你们描述罗马的共食婚仪（confarreatio）。它显示出两者的差别：一边是在符号意义上存在者那种完整意义上的本质性婚姻；另一边则是平民的结合。平民也有一种婚姻，但从这个视角看，它根本没有任何基础；罗马社会在技术意义上称之为“姘居”。

值得注意的是，以双方契约为基础的姘居制度，恰恰从社会发生某种松动时开始普及；我们甚至看到，在罗马历史的晚期，姘居也在社会上层确立起来。

为了什么目的？

为了使双方的社会地位，尤其是财产地位彼此保持独立。换句话说，正是从女人获得解放、女人本身取得财产权并成为社会个体的那一刻起，婚姻的功能及其意义开始磨损；婚姻原先依它所适用者的社会层次而具有的两种如此不同的功能，也开始彼此混同、汇合。

以上这一切，是为了给今天提出的问题所处的布景立下界标：根本而言，在婚姻的符号契约中，女人作为交换对象被引入以下双方之间……

我不会说“男人之间”，尽管实际上正是男人承担了这一交换。

……即世系之间；这些世系根本上是男性中心的。理解各种基本结构的透视点，就在于交换对象——女人——如何在世系之间流通。经验表明，这个透视的枢纽本身是男性中心的；因此，即使结构后来被纳入母系或母权的祖系之中，父权视角仍具有原始、原初的性质。

那么，女人本身在这一象征秩序中，只能感到自己仿佛作为对象被卷入某种超越她的东西，卷入一个她作为对象的交换秩序。这正使她的位置在根本上具有冲突性，甚至可以说没有出路，因为这一象征秩序确确实实地使她屈从于它，并且超越了她。

正是在这一点的照明下，我们才能理解普鲁东评论的意义。所说的“全体男人”，在这里就是普遍的人；他同时是最具体和最超越的人。这无非意味着女人的特殊功能在象征秩序中强加给她的这一僵局，意味着女人可以说被推入的这条死路。

对她而言，被置于这一象征秩序中的对象位置，含有某种无法克服——让我们说，无法接受——的东西。恰恰因为这一象征秩序……

另一方面，她以其全部人性同男人一样被完全整合于其中，也完全受它支配。

……恰恰因为那里存在某种东西：

- 对她来说不可企及，并且支配着她；
- 使她相对于这一象征秩序处于一种第二层关系；

……所以，神在男人中的化身，或男人在神中的化身，才会介入，而且必然介入——当然，除非发生冲突，而发生的总是冲突。只有这样，她才受到、或者说必须受到某种超越之物的支配，她的位置才可能不再具有冲突性。

换句话说，在这种根本原始的婚姻形式中，如果女人并不是被给予并把自己给予一位神或一位神的秩序，那么她就只能——这当然正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早已没有能力化身诸神——受制于这一根本关系的想象性降格之全部形式。

〔1〕也就是说，在仍然严酷的时期，她首先受制于所谓“主人”；那也是女人提出诉求的伟大时期：

- 女人不是占有物！
- 为什么通奸会以如此不对称的方式受到惩罚？
- 难道我们是奴隶吗？

〔2〕随着若干进步，我们已经抵达竞争对手的阶段。那当然是根本想象性模式的一种关系；但不要以为，我们的社会通过所谓女人的解放

而独享它。男人与女人之间这种最直接的竞争是永恒的；它以自己的根本风格在婚姻关系中确立起来，使所谓两性斗争的主题走上前台。竟然只有少数德国精神分析家才会幻想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等你们读过李维，并知道当时一桩骇人的投毒案在罗马引发何等喧嚣，就会看到：案情表明，所有贵族家庭里的女人给丈夫下毒，竟是一种常规；男人们成批倒下，因为事情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女人的反抗并不是昨天才开始的。

〔3〕接着还有第三个阶段。从主人到奴隶，再到竞争者，只隔着辩证的一步；它们其实是同一回事。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本质上可以倒转，处于主人关系中的人，很快也可能发现自己依赖于奴隶。况且，借助精神分析概念的引入，我们如今又有了一种新的细微变化：丈夫已经变成孩子；近来，人们教导女人要好好对待他。至此，圆环闭合了，我们回到了自然状态。一些人正是这样构想精神分析对所谓人际关系所作的特殊介入；这种观念戴着各种间接的面具传播，教给男人与女人应当如何行事，才能使家宅安宁。

这里的真正解答是：女人扮演母亲的角色，男人扮演孩子的角色。这样一来，我们将找到本质上和谐的关系。这是对冲突要素的一种解答。可我们也许正在这里提示：精神分析为“人际关系”宣传提供灵感，大概同样不是为了这件事。

话虽如此，我们也不必惊讶于那个如此丰富、多义而神秘的古老神话——人们可以对安菲特律翁神话作出千百种解释——已经看出：要使处境可以维持，甚至在伴侣之间，位置也必须始终是三角形的；为了使伴侣关系在人类平面上站得住，确实必须有一位神在那里。

相关知识卡 **安菲特律翁：朱庇特借丈夫之形**

我想，这就是安菲特律翁神话的深层意义。它也许会使我们略感动摇。但我要向你们保证，爱所能指向的，终究正是这个普遍的人、这个被遮蔽的人；一切理想都不过是他的偶像式替代。那个著名的“生殖器之爱”，我们总把它当作盛大节日并大肆取笑；然而，只消看看它使所有作者陷入何种僵局就够了。

请你们重读巴林特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你们会发现，只要所谓作者们稍微严格一些、稍微尊重经验一些，他们便会准确得出结论：这著名的生殖器之爱根本什么也不是。

我以巴林特先生为例——他并不是唯一显出这种辨别力的人。就精神分析中相当严格的经验给出的“最新消息”而言，生殖器之爱绝对无法被归入一种统一体；人们却把这个统一体构想为本能成熟的果实。他准确得出如下结论——我再提醒你们，这是巴林特那些文章的结论：只要它恰恰同二元位置相联系，也就是第三项、言说、神和我向你们谈到的一切都被排除，那么要构成生殖器之爱，就必须把它分成两块来展示：

- 第一，生殖器行为；众所周知，它不会持续很久——很好，但不长久，而且根本不能确立任何东西；
- 第二，另一边的温柔；而人们承认，它的起源属于前生殖器期。

这就是某些精神分析辩证法中最诚实的头脑在本能成熟的二元视角中所得出的结论；只要人们仍停留在二元关系中，并以之建立人际关系的规范，这一视角就会自行强加给他们。

好吧，整个解释就在这里。我相信自己应当稍加坚持，提醒你们几条最基本的真理：

- 即使对熟悉这些真理的人来说，重提它们也从来并非无用；
- 对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而言，它们也许会震动其对精神分析奇迹的天真信仰；但让他们知道我们对精神分析可以期望什么具有一定辨别力，并不是坏事。一个本身并不和谐、而且根本上充满冲突的处境，不会自动结出和谐的果实。

这就是人的命运；只有从这里出发，才可能超越神话而走向其他东西。好吧，在向你们提醒由安菲特律翁神话提出的这个平面、这个根本问题之后，我们来看看普劳图斯和莫里哀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事实就是如此——正如象征秩序的男性中心结构得到确立一样——是普劳图斯引入了索西。安菲特律翁神话里原本没有索西；希腊神话并不属于自我式，但自我确实存在，而且有一个地方，自我自然可以在那里发言：那就是喜剧。

所以，这项从此同安菲特律翁神话不可分割的根本创新——索西——必然由一位喜剧诗人引入；这绝不意味着一个逗笑的诗人，我想你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思考过这一点。索西就是自我。

问题在于知道：人在这个大舞台上如何行事。他以一种——我必须说——特殊方式参加诸神的宴席，而这种方式总要把他从自己的享用中略微切除。像这样的一个自我，像你我一样的小人物那种勇敢的小小自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行动？那种不可抗拒的喜剧性根本面向，自那以后不断滋养着戏剧；归根结底，问题始终在这里：我、你和另一个人。那么，这个自我如何行动？

第一次在这场根本戏剧的层面上涌现时，自我就在门口遇见了自己；它恰恰采取那个从此永远、直到永恒都被称为索西的形式——另一个自我。这真是一个典范。我来给你们读几小段；这些话总得在耳中听一听。

自我第一次出现，就遇见了自我。

而“我”是谁？是把你赶出去的我！问题正在这里。《安菲特律翁》这出喜剧因此真正具有典范意义；随手从各处摘取几句，就能看出引入这个根本人物的人多么清楚问题所在，甚至文体和语言的形式本身都把这一点显示出来。

例如普劳图斯这部戏——根本人物索西第一次在舞台上登场——采取了暗夜对话的形式。我请你们自行阅读；我不会把整篇拉丁文念给你们听。你们将体会到它何等惊人，而我们也确实该这样说：它具有——这个词必须加引号——“符号性”特征。

这些人物依照“旁白”的传统表演；演员的演出往往很难把这种传统支撑好。两个角色共同在场上，各自说着自己的话；每一句话又从另一个角色独立说出的话中取得回声或误认的性质——其实两者是同一回事。由于表演力度不足，这种做法如今在我们看来相当做作；可是，它成为古典喜剧的根本手法，绝不是偶然。在这里，它被推到最高程度。

前几天观看中国戏曲时，我不可能不想到它。在那里，这种手法通过动作所显现的一面被推到了极致。台上的人说着汉语，你们却仍会被他们展示的一切抓住。那种极其重视可观性的戏剧传统，甚至到了杂技的程度：在超过一刻钟的时间中——我们会觉得它仿佛持续了好几

个小时——两个角色可以在同一个舞台上移动，却真正使我们感到他们身处两个不同的空间；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处于完全的黑暗中。他们又以何等高超的技巧、何等丰富巧妙的手段，名副其实地彼此穿过。

因为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一点：想象性空间就在我们眼前。这些存在者随时以一个绝不可能打不中对手的动作触及对方，可动作仍然避开了他，因为对方碰巧已经到了别处。这场确实令人震撼的演示，一方面提示空间具有镜幻性（miraginaire）、亦即想象性的性质，另一方面又显示出符号平面的特征：相遇从来不是碰撞。它正足以使你们向古典戏剧、向戏剧本身的某种展示维度打开头脑。

这种事情确实始终发生；尤其在索西第一次登上古典舞台时更是如此。索西到来，遇见索西。两人之间建立的对话值得我们拾取。

- 谁在那里？
- 我。
- 哪个我？
- 我。
- 勇敢点，索西！

他这样对自己说，因为这个索西当然是真的那个，而且他心里并不踏实。

• 你的命数是什么？

• 做一个人，并且说话。

这家伙并没有来听过研讨班，却带着原厂标记。

• 你是主人还是仆人？

• 看我兴致如何。

这句话直接取自普劳图斯，是对自我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定义：

“你是主人还是仆人？——看我兴致如何。”

• 你的脚步去向何方？

• 去我打算去的地方。

接下来，对话继续：

• 啊！这令我不悦。

• 我的灵魂却为此欣喜。

……这个蠢人说道。他自然料到自己将挨一顿揍，却已经摆出神气活现的样子。

我们应当在喜剧的不同阶段重新找到这段根本对话。它从不令人失望；现在，我们试着凸显它所涉及的东西。莫里哀在法语中仿写的，正是拉丁文本里同一件事：自我面对自己的意象和倒影时所处的根本位置，以及主人与仆人位置的这种即时可逆性。

我要提醒你们，我们可以在这篇文本中找到一项确证，支持我至少向你们中的一些人赋予 fides 一词的严格意义：它等同于“已经许下的诺言”——Tuae fidei credo，我相信你的诺言。

相关知识卡 安菲特律翁：朱庇特借丈夫之形

事情正发生在墨丘利开始减轻他的棍打，而两人必须把话说清的时候。无论对方说什么，墨丘利都承诺不再扑上去打他。正是在此刻，索西说：“我相信你的诺言。”拉丁语 fides 的意思正是已经许下的诺言，没有别的。这对于我们此前在这里所说的话具有回溯价值〔原文如此〕。

刚才的 innobilis，即“没有名字的人”，也是你们会在拉丁文本中找到的一个术语。总而言之，问题是什么？你们知道，索西出场是全剧最令人捧腹的主题之一。因为在莫里哀的戏中，他完全走到了最前面；我甚至要说，问题只涉及他。紧接着那段为朱庇特之夜作准备的墨丘利对话，正是索西揭开场景。

索西提着一盏灯笼到来。让我们试着看看这场戏剧的心理学意义，并依照一种传统行事——恰恰就是我们力图批判的那种实践传统——把戏剧的各项要素看作内部人物的化身。

索西来了，这个勇敢的小索西带着主人的捷报。他要向阿尔克墨涅报告消息；在我说的那个令人捧腹的场景中，他先演练自己将如何讲

述。他放下灯笼，说："瞧，这就是阿尔克墨涅。"接着便开始向她讲述主人的赫赫战功。总之：

- 这是一个以为欲望的对象、享用的安宁取决于自己功绩的人；
- 这是超我之人；
- 这是一个永远想把自己提升到父亲、主人以及随便什么理想之尊严的人；他相信凭借这一点，自己将取得所寻求的东西——亦即欲望的对象。

如果有什么东西构成这部戏的特征，那就是索西永远无法让阿尔克墨涅听见自己。而他永远无法让她听见自己的原因，已经写在文本中：自我的本性、它同世界的根本关系，就是总在面前遇见自己的倒影；而这个倒影本身剥夺了他作为自我可能梦想亲自取得的一切。他遇见这种影子、倒影、意象；它既是竞争对手，有时又可以是主人或奴隶，但无疑是一种在根本上使他同问题真正所涉之物分离的东西——也就是同欲望本身受到承认分离。

此时，什么介入了？真正的主人介入了。对索西来说，他是其担保者，是其功绩之所系，也是索西归属这个家门的原因。拉丁文本关于这一点有一些极其惊人的表述。在那段无价的对话中，墨丘利用连续的棍棒迫使索西放弃自己的身份、舍弃自己的名字；可他像伽利略说"然而地球仍在转动！"一样，不断回到这句话：

"可我还是索西。"

而且，他说出了这句精彩的话：

“以波吕克斯起誓，tu me alionabis non quant——你永远无法把我变成另一个人——qui noster sum。”

你们看，异化甚至已经写进拉丁文本，而且 noster（“我们的”）在这里介入：“毕竟，只要我是我们的人，我就在这里。”在普劳图斯的层面，自我的支撑，或者说自我的最后支撑，便在这里。莫里哀那里几乎已经找不到这一点，虽然仍有提示：自我同整个秩序、同全部归属、同主人是一位伟大将领这一事实相连。我们清楚看见，自我如何庇护在‘我们’之下。

当主人安菲特律翁到来时，我们看见什么？他会是那个恢复秩序、使人听见自己的人吗？这部戏的精彩之处恰恰在于：安菲特律翁也将同索西本人一样模糊、受骗而迷失。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他完全无法理解：索西告诉他的全部事情——索西遇见了另一个自我。这在拉丁文本中格外惊人；在莫里哀的文本中，它的重音也值得重新听见。

安菲特律翁——怎么回事，我还得勉励自己忍耐到何种地步！可你到底有没有进屋？

索西——进屋？好得很！怎么进的？〔……〕

安菲特律翁——怎么回事？

索西——用一根让我的背……的棍子。〔……〕

安菲特律翁——是谁？

索西——我。

安菲特律翁——你，打你自己？

索西

对，是我。不是这里这个我，而是屋里那个我；他一个顶四个地打人。〔……〕我的身体已经收到了证词；那个魔鬼般的我，把我结结实实揍了一顿。〔……〕我呀，我告诉您〔……〕那个把我打得遍体鳞伤的我。

恰恰在安菲特律翁介入时——你们将看到他的舞台价值对我们而言究竟是什么——他只是在可怜的索西已经挨过的棍棒之上再添棍棒。换句话说，安菲特律翁分析了他的负性转移。他教给索西一个自我应当是什么。他也给索西喂食——用棍棒喂饱他。他向索西解释，应当如何把自我的属性重新整合进自己的自我。

这些场景既尖锐又难以复述。我可以再举出许多段落和例子，显示主体身上发生的矛盾——问题始终一样——即符号平面与实在平面之间的矛盾。

索西实际上已经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他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当墨丘利向他讲述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时：讲述他在无人看见时做过什么。墨丘利揭露索西自己的行为，使索西吃惊，于是他说：

“怎么，我当真开始怀疑了。”

他已经开始让出一块。在拉丁文本中，这一点同样很引人注目：

“我认得自己的形象，就像常在镜子里——in speculum——看见的那样。”

他说道，并像莫里哀笔下一样，列举出所有符号性、历史性的特征。当然，矛盾仍然爆发出来；它也发生在想象平面上：

“Equidem certo idem qui semper fuit——可我仍然是一直以来的同一个人。”

此时，他求助于自己对地方感到熟悉的想象性要素：

“我毕竟早就见过这所房子，它确实还是那一所……”

分析的平面在这里发生全部移位，转向同“似曾见过”、似曾感受的性质相联系的直观确信——这种性质有时也会欺骗我们。它极容易同某些东西失谐；很多时候，正是“似曾见过、似曾认出、似曾感受”同回忆及历史所产生的确信发生冲突，才开始引入那些人格解体现象；有些人必然会把它们看作整合崩解的先兆。

然而，人完全无须具有精神病倾向，也可能千百次体验到类似感受；这些感受的动力和意义，恰恰存在于象征界与想象界的关系中。

好吧，这就是安菲特律翁与索西相遇时的情形：索西宣称自己陷入迷惘、遭到剥夺，而安菲特律翁则对他进行——我要说——一种支持性心理治疗……

不过，我们仍不会把安菲特律翁置于精神分析家的位置。我们只说，他多少可以成为后者的象征：只要精神分析家采取某种姿态——就是我上次向你们展示的图式所表示的姿态——那么相对于自己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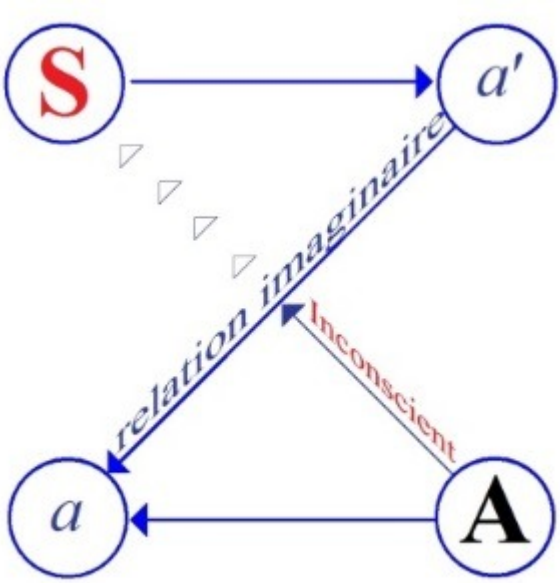
如果他所爱的对象、他那遥远的公主就是精神分析，他确实会占据一种根本上流亡的位置；客气一点说，正如安菲特律翁站在自己门前的位置。

严重的并不是精神分析家成为这种精神戴绿帽的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其实是他的患者。每个人都可能以为，只要在自己的精神分析过程中，对那个在分析家住所为他开门的人产生过某些幻想、某种坠入情网的迷恋（Verliebtheit），就已经抵达精神分析经验最深的底部——天知道我听到过多少这类见证。这样的见证并不少见，尽管我这里暗指的是几个非常特殊的病例。

主体在遭遇所谓精神分析经验时，将在根本上被剥夺、被欺骗。换句话说，重新拿起我上次暂且搁下、悬置的图式：主体相对于语言之墙、相对于这个自我，在自己以外、在所有其他对象中间看见这个自我。问题在于知道，精神分析家如何构想自己的角色。

精神分析家对自己角色的构想，根本在于以下一点：在日常对话中，在已确立的语言世界里，在普遍接受的误解世界中，言说从一个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主体出发。因为我们只要开口说话，便时时证明自己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这正是精神分析的基础。我们说出的东西，远比足以让人砍头的所需内容多出千百倍。

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却把它说给某个人。正因为我们把它说给一个“镜幻性的”（miraginaire）、具有自我的人，正因为我们把它说给这个自我本身，我们才产生了一种幻觉：由于我上次谈到的言说直线传播，我们以为言说来自这里的某个位置；我们优先把自己的自我安置在那里。这个自我有充分理由在图式中同所有其他自我分开。



季洛杜在他自己的《安菲特律翁》中某处指出了这一点：当朱庇特试图从墨丘利那里了解人类究竟是什么时，墨丘利对他说道：

“人就是那个不断追问自己是否存在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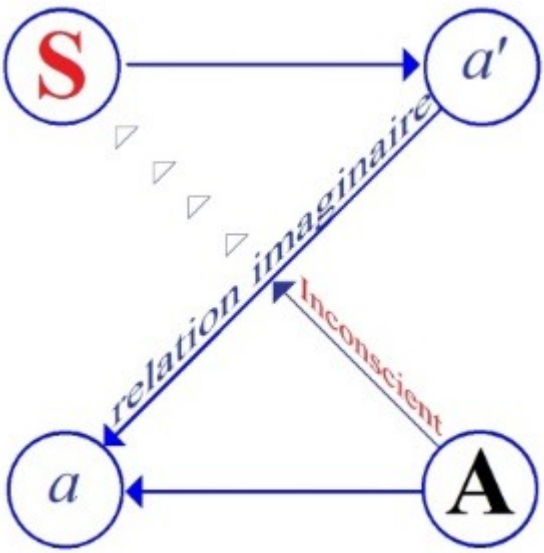
他说得很对，唯一的错误就是替自己回答“是”。至少，人对此深信不疑。自我相对于所有其他自我的优先位置，正是在这里：当人追问自己时——天知道他多么频繁地追问——它是唯一一个人真正确信存在的自我；从根本上说，它孤零零地在那里。

正因为言说是在这个层面——他人的自我层面——被接收，主体才维持着甜蜜的幻觉，以为自己的自我处于这里这个独一无二的位置。正如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和解释过的，问题全在这里：精神分析家是否认

为应当从这个位置回答？他是否应当批准自我的这种功能——恰恰通过这种功能，主体被剥夺了自己？他是否只须对主体说：回到你的自我里；或者说，把一切从中逃脱的东西重新塞回去；当你面对另一个索西时，曾逐一清点自己被肢解的部件，现在把它们重新整合、吞下去；按照如今的内摄理论，把自己重新聚拢起来，在那些被你误认和无视的驱力与本能的充实中重构自己？

换句话说，无论采取何种具体形式，通过一整套二元型介入，把精神分析家的世界范畴及其对象视角引入主体的重构。还是相反，问题在于让主体学会辨认从那里说话的是什么：S?

要知道从那里说话的是什么，主体就要察觉其中的悖论：当绝对大他者　A——每当言说试图发出时，它始终是语言中的超越者——本身受到唤起，从 S' 那里发生和说出的一切，具有根本上的想象性性质。



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病例，就是强迫症者。在强迫症者身上，自我致命的作用达到最大程度。在他背后存在的……

并不是某些理论家告诉你们的疯狂危险——也就是符号本身脱缰、类分裂主体仿佛在自己的驱力层面说话、自我的根本异化；

问题根本不在这里。

……而是携带着这种自我剥夺的自我，是想象性的死亡。

如果强迫症者使自己僵死，那是因为他比其他神经症者更加紧附自己的自我；恰恰因此，他比其他人更加异化于自身。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尽管事实本身完全明显。强迫症者在向你讲述的一切中始终是另一个人；无论他带来何种感受，那些总是某个不同于他自己的人的感受。他把自己对象化，并不是像人们所说，因为他比别人更有内省或分析的倾向与天分；而是因为他回避自己的欲望。无论他卷入何种欲望——即使只是表面上卷入——都会以典型方式把它呈现为那个作为其自我的另一个自己之欲望。

那么，若想增强他的自我，允许他的各种驱力、他的口欲性、他的肛欲性、他的晚期口欲阶段和早期肛欲阶段，教他认出自己想要什么——也就是人们从一开始当然便“知道”的大他者之毁灭——岂不是正好顺着他的方向推波助澜？而这又怎么可能不是大他者之毁灭？因为问题所涉正是他自己的毁灭；两者完全是同一回事。

在一切之前，在允许他认出那种被他分散到世界、折射到世界，并名副其实地为他构造全部对象关系的根本攻击性之前，首先必须使他理解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他同自己之间这种致命关系具有何种功能？

正是这种关系使他只要遇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感受，就预先开始取消它本身，说自己并不在乎，说这对自己算不上什么。

你们可以通过一种反向关系准确判断它的效力与怀疑重音：如果强迫症者告诉你，他不在乎某物或某人，你们大可认为那正是他放在心上的东西；反过来，如果他以最冷淡的方式表达，那里正是他的利益卷入最深之处。这意味着什么？面对强迫症者，我们首先要做的事：

- 不是使他在自己向我们呈现的那个分解意象中认出自己——这个意象以其攻击性驱力或多或少盛放、降格、松弛的形式出现；
- 治疗的钥匙并不在他同自己的这种二元关系中。

这当然很重要！但对他同自己的致命关系所作的解释，只有在你们使他理解其功能时才有作用。他并不是对自己死去，也不是真的死了。他对谁死去？对那个作为其主人的人。我们刚刚已经解释并说过这一点。但相对于什么？相对于他的享用对象。另一方面，如果他死了，或者把自己呈现成已经死去，那么他便不再在那里；也就是说，有主人的已经是另一个人，而他本人反过来又有另一个主人。

正因为如此，他总在别处；作为欲望着的人，他无限分裂为一连串人物。费尔贝恩之类的作者、这个谱系中的人物，会惊喜地发现主体心理内部远不止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本我、超我与自我这三个人物；角落里总会冒出至少另外两个。你们会在费尔贝恩那里读到这一点，我建议你们读读他。

当然，人们还可以找到更多。正如观察背面镀层的镜子，只要仔细看，就不只会看见一个意象，还会看见第二个再次分裂的意象；如果

镀层足够厚，你们会发现十个、二十个、无穷多个。这里发生的事情完全一样：只要主体在主人面前取消自己、使自己僵死，他就又成为另一个人；因为他总还在那里，是具有另一个主人、另一个奴隶等等的另一个人。

对他的欲望对象同样如此。为了同意这个对象，他把自己同他者关系中的根本危险引入其中。正如我在“鼠人”评论中引入过它，也正如我从〔……〕中提取并使之接近歌德本人的小说那样，在强迫症者的关系中，欲望对象与爱情对象的自动分裂，是绝对根本的事情。

他所依恋的东西确实必须永远是另一个，因为一旦真正把它认作自己的依恋，他就痊愈了。换句话说，同某种精神分析理论告诉我们的相反，主体必须瞄准之物、精神分析进展的根本所在……

并不是通过维持某种所谓自我观察——人们声称，它建立在精神分析情境中那个著名而根本的 ego 分裂（splitting）之上；

这只会使自我在根本上的歧义关系延续下去。

……他必须在精神分析中学到的东西，当然不会通过观察来推进，因为那永远只是“对观察的观察”，如此无穷后退。他必须学会：在这始终错过其目标 S' 的言说中，他应当通过精神分析察觉，言说发生在某个更远之处；可在那里，它只会遇见他还不知道如何辨认的绝对大他者。

他必须逐渐把这一言说重新整合到自身；也就是说，终于从自己所在的位置、从其自我应当得到实现的位置，向绝对大他者说话。他还要

把驱力的全部偏执式分解重新收归自身；面对这些驱力，只说他没有认出自己还不够——从根本上说，他作为自我误认了它们。

换句话说，索西必须学会的，并不是自己从来没有遇见过索西；他确实遇见了，这完全是真的。他必须学会自己就是安菲特律翁。恰恰因为他是安菲特律翁——那个满载荣光、却什么也不懂，以为只消当一名常胜将军就能同妻子做爱的人——而人人都知道，这对任何人都从来远远不够！

- 他必须察觉自己正是这个人；察觉恰恰因为他是安菲特律翁，因为他完全不懂人们欲望什么，因为他在根本上受到异化，所以才从未遇见自己欲望的对象。

- 他必须察觉自己为什么从根本上如此执着于这个自我，以及这个自我本身如何正是他的根本异化。

- 他必须察觉这种深刻的孪生性；它同样是《安菲特律翁》的根本视角之一，而且同时处于两个平面：一是他的替身、那些彼此映照的幻象之平面；

二是在更高一层、诸神的平面上，从阿尔克墨涅腹中同时诞生两个孩子这一事实。它在普劳图斯的戏中表现得更加鲜明——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取得了一种使自己不再深入这些事情的羞耻感。阿尔克墨涅由双重爱情生出双重果实。

总之，我今天只是想借这个神话，借《安菲特律翁》为我们提供的这场戏剧性、即便不是心理剧性的展示，使你们感到：它如何在一种界

域、一种传统思想中，铭写了我们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所提出的那些活生生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始终使我们的实践面向两个坡面：

一边是根本上的心理主义幻觉。我建议你们直接到支持它的作者著作中寻找证据。我前几天谈到的费尔贝恩就提供了一个很漂亮的例子。这不是强迫症者的病例，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而是一名具有实在生殖器异常的女人——大概如此，尽管出于一种奇特的羞怯，人们从未把事情完全弄清。她的阴道非常小，且一直未受触碰：她是处女，而且这个极小的阴道大概并不通向任何子宫。

事情几乎可以确定，却未得到完全证实。不过，至少在第二性征层面，异常是显而易见的；有些专家甚至称之为假两性畸形，并认为此人实际上是男性。

费尔贝恩把这样一个主体纳入精神分析。

我要说，整个病例后续以某种宏阔气派展开，这一点颇值得指出。他泰然自若地观察并告诉我们：这个主体总的说来是个明显有趣且颇具品质的人，在一所学校任教；在生活过程中，她了解到某种东西显然不太对劲，自己相对于两性现实的处境终究相当特殊。

她对此了解得尤其充分，因为我记得家里大约有十个孩子，其中六七个女孩同她情况一样；所以大家很熟悉这种情形，也知道女人的身体真会出现古怪的两角形态，事情不是蒙昧主义造成的。她告诉自己，这显然很特殊，却为此感到高兴：“这样一来，就有许多麻烦轮不到我了。”她勇敢地当上教师，安安静静地开始教导孩子。

她逐渐发现，自己非但没有摆脱那些束缚，自然也没有把全部享受赐给一种纯精神活动，反而发生了古怪的事情：一切都不顺利，一切都永远不够好。她感到自己受到那些顾虑的可怕暴政，总想做得更好。等她在第二学期中把自己耗尽、累垮之后，便出现一次抑郁发作，情况相当严重。

这位精神分析家会教给她什么？他有一个想法：首先要把她的驱力重新整合给她，也就是让她察觉某种所谓的阳具情结；然后——“猜中了”！对，果然如此！人们发现以下两者之间存在关系：

- 正如英语所说，她会被某些男人触动（affect），某些男人的接近会使她产生反应；
- 抑郁发作随之出现。

精神分析家由此推断并发现，她想伤害这些男人。几个月中，他教她重新整合这种攻击性驱力。在这整个时期，他都对自己说：“老天爷呀！她接受得可真好！”他等待的是她产生所谓罪疚感。好吧，信不信由你们：反复努力之后，他终于成功了！最终，在向我们报告观察的那个日期，“精神分析的进展”被记录为：她终于抵达自己的罪疚感。也就是说，事情现在非常简单——她再也无法接近任何男人，否则就会引发具有切实内容的悔恨发作。

换句话说，依照我前几天送给你们、出自这位作者本人的图式，我们发现精神分析家给了她：

- 第一，一个自我——也就是教给她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摧毁男人；
- 第二，还给了她一个超我——这一切都非常邪恶，而且她绝对不可以接近那些男人。作者把这称为“精神分析的偏执阶段”。

我很愿意相信这个说法。他既已教给她驱力在哪里，那么，我的天，他确实非常成功：她现在看见驱力到处游荡。

- 这真是完全正确的道路吗？难道没有另一条道路？
- 换句话说，主体的抑郁发作所真正涉及的东西，是否应当被安置在这种实在的二元关系中？
- 她同男人之间的，是一种实在关系吗？
- 它本质上是力比多关系吗？是否包含退行图式中附带的全部内容？

作者看来明明已经把事情握在手边。主体的实在异常应当为他指出道路：那些对主体产生抑郁作用的男人意象，同“这些男人就是她自己”这一点相联系。那是她自己的意象；正是她被剥夺、受到异化、从她那里被夺走的自身意象，对她施加着这种分解作用。严格说来，这种作用使她失去协调；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按照这个词完整而原初的意义说，它正是抑郁位置的基础。

正因为她接近的这几个男人就是她自己的意象、她的自恋意象、她的自我，这种效应才会发生。她必须从中找到道路的问题角度，恰恰在于知道：她实际上是谁？

她的处境当然比别人更困难，因为她恰恰处在一个含混位置。但即使畸形学把这个含混位置〔……〕展示出来，只要精神分析家记得任何自恋认同本身都是含混的，这件事就应当对他清楚可见。

事实远非如此。再没有什么比这个主体更能说明阴茎嫉妒（Penisneid）的功能：正因为她认同于想象性男人，阴茎才在这里取得完整的符号价值，问题才因此产生。

精神分析家非但没有这样看，反而似乎从中找到一个论据，说明若以为阴茎嫉妒对女人而言完全是自然之物，那就大错特错。当然！是谁告诉他这是自然的？它当然是符号性的。正因为女人恰恰置身于一种具有男性中心视角的象征秩序，阴茎才取得这种价值；况且，问题不是阴茎，而是阳具，也就是作为某种可以被符号使用的东西。它能够被符号使用，只因为它可以被看见、可以勃起。

另有一种东西恰恰不可能被符号使用：那就是看不见的、隐藏的东西。在这个女人身上，阴茎嫉妒的功能显然充分运作，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阴茎嫉妒运作得尤其强烈，因为她可以说完全卷入了自身符号意义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全部观察足以显示，这种同她面对实在的位置相关的特殊异常，又由另一种东西加倍：在她的家庭中——这或许同畸形现象的出现并非毫无关系——男性一侧完全被抹去，父系人物彻底缺席。她母亲的父亲

扮演了居上位者的角色；三角形正是相对于他以典型方式确立，而她是否被阳具化的问题，也相对于他得到提出。

所有这些都从治疗的理论和实施中被完全回避，因为人们首先认定：问题在于使主体认出自己的驱力；尤其当然是那些——说实话，我们唯一会遇见、并作为驱力充分遇见的——用我们优雅语言称作前生殖器期的驱力。

凭借这种对前生殖器期的扎实调查，我们抵达一个结果，或者至少抵达一个治疗者不得不称为偏执性的阶段。对此我们不必惊讶：把想象界当作实在，正是偏执狂的特征。如果误认想象界这一根本界域，我们确实会使主体在实在中认出所有这些所谓部分驱力；也就是让她同男人的全部关系——它们在此之前属于自恋性质，而那本来就已经不简单——都承担起严格说来彼此攻击的性质，使之变得格外复杂。

其间还让她经过一种人们费尽力气才催生出来的罪疚，这或许很难使我们对回到更为平和道路所需的进一步迂回抱持乐观。我只取这个例子，是要说明我试图在这里通过典型形式加以阐明的理论线索〔……〕。

你们无须寻找很远，就能看到一种〔……〕错误受到怎样的惩罚。这是一项完全典型的观察。至于强迫症者的治疗——它如此居于我们精神分析关切的中心——这一点更加鲜明，并且无疑会显得是大多数这类治疗失败的隐秘动力之一。

如果从“强迫性神经症背后存在一种潜伏的精神病”这一观念出发，那么最后得出隐性的解离，用周期性抑郁甚至疑病式心理方向来替换它，或者更进一步，巩固一种强迫性神经症结构，也就不足为奇。

可是，这或许同样不是强迫性神经症治疗所能追求和取得的最好结果。总之，无论我们在这里推进的论述显得多么遥远——甚至或许站得不够高，只作全景式俯瞰——你们都必须始终记得：它们不仅关系到病例理解，而且在技术上具有最为确切的作用。

第23课 · 1955年6月15日

今天，我希望我们稍微谈一谈，让我知道你们走到了哪里。我想，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自己已经……

暂且不算下周三上午十点半已经预告的讲座；那场讲座之后没有研讨班。

……此后，我们还会再安排一次研讨班，以防那场讲座给你们提出一些问题，而你们希望我随后加以澄清、展开。

因为，那场讲座当然必须考虑到届时研讨班听众范围会扩大；因此，我不能像在这里一样表达，因为这里的表达预设你们了解我们此前的全部工作。那么，我的天，为了至少能借你们来衡量下次谈话将以何种地面为支点，我希望今天像我们已经做过的那一次一样——老实说，那次效果相当不错——请你们尽可能多的人各自提出一个仍向自己敞开的问题。我想这种问题不会少，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追求的，与其说是关闭问题，不如说是把它们打开。

好吧，对你们来说，或许是哪一个问题被打开了？我的提问应当这样来理解：今年的研讨班作为整体，或者近期的研讨班，究竟为你打开了什么问题？

来吧，格拉诺夫，昨晚你不是想就“三只匣子的主题”作一点评论吗？有没有什么可以由你表述出来？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没有。

拉康——那么，谁愿意发言？巴尔格？

巴尔格

我不太知道该谈哪一个问题，问题很多。我还停留在昨晚的讲座上；就此而言，我觉得自己现在看待事情的方式，同热桑的看法略有不同。也许正是这次研讨班给了我不同的视角。例如，我不会再做他试着做的事情——很长时间里我很想那样做，但现在不会了——也就是在讲座开头作那种拉近：把事情放在发生论平面，从某些临床类型提供给我们的全部幻象、全部意象积累出发，再由此重新找回感觉经验，找回那种现实、好的母亲—现实〔……〕。这给人一种仿佛要把精神分析“母亲化”的感觉，如果可以这样说，要重新找到……在某种意义上，它让我稍稍想起施韦希的讲座，他在那里把重音放在挫折上。

我相信，只要坚决从想象性功能看待自我，便不再可能仅仅依照这些内容，在施皮茨或格塞尔带给我们的经验同我们自己在领域中找到的经验之间，重新建立某种拉近——无论那些内容是否为绘画……

热桑在讲座后觉得，儿童精神分析家缺少绘画的全部材料。我认为那些材料显然会带给我们一些东西，但也极其危险，因为人们很难恰当地标定事物。我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无论对儿童还是成人都是如此。我以前实践的技术，类似热桑或弗朗索瓦丝·多尔多的技术。

如今，我更强调他说话的方式，而不是他告诉我的内容；更强调话语展开的方式，而不是内容。我们确实会感觉到，真理——如果可以这样称呼——亦即恰恰与主体相关的东西，同所有这些结构没有多大关

系。在某一时刻，一句言说骤然出现。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我在一些病例中清楚地重新发现了这一点：那是自我尽可能解体的时刻。我相信，这就是研讨班带给我最多的东西——显示必须走到何种程度，必须把这个自我彻底衍射成一种彩虹。那时真正出现的，正是您展示的“给伊尔玛打针”之梦，以及在某一刻涌现的公式。我相信，正是这一点最大程度改变了我实施技术的方式。

拉康——还有谁……

X 小姐。

也许是您在年初谈过的那些东西。我感觉您在象征界与想象界之间作了区分，但我完全不能确定它们是怎样安置的？

拉康

确实，许多东西都建立在这项区分上。那么，听过一部分研讨班之后，你对它形成了什么观念？

X 小姐

我觉得，想象界或许更多显现在主体身上、显现在他接受事物的方式中；而象征秩序则是某种更加非个人性的东西。但我不确定。

拉康

对，你说的是真的……也不是真的。轮到我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如今抵达的位置上——这一次，我请那些应该已经抓住一些东西的人努

力一下——在我给你们的这个相互关系的图式中，我赋予语言和言说怎样的经济功能？它们具有什么关系？彼此如何区分？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但仍值得有人回答。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这不是容器同内容的关系。如果把您在罗马报告中给出的关于讯息及其全部冗余的图示加以扩展，就会给出一种错误的说明。而除去这些冗余的讯息，在……意义上……

奥克塔夫·曼诺尼——我觉得……

拉康——您别打断他，现在不是时候。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沿用 X 小姐给这些问题安排的位置，语言将是想象界的饰带；

而言说，亦即充实言说，则是符号性标点。

拉康——好……符号性标点，您是什么意思？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就是那个可以从中重构、或者更准确地说，解读全部讯息的小岛。

奥克塔夫·曼诺尼

简短地说，我会说语言是几何构形，言说则是透视；而透视点永远是另一个人。语言是几何构形，是一种现实。说语言是几何构形，就是

说它未被置于透视之中，不属于任何人；而言说则是在这个几何构形中切出一个透视面，它的透视中心、消失点始终是一个自我。语言中没有自我；语言本身无法被置入透视。

拉康——您确定吗?

奥克塔夫·曼诺尼

我觉得是。语言是一个宇宙；言说是在这个宇宙中的一道切面，确切地同说话主体的处境相连。语言也许有含义，但只有言说具有意指。语言也许有含义——我们能理解拉丁语的含义——但拉丁语不是一句言说。

拉康

当我们理解拉丁语时，我们理解各个词汇与语法要素所组织成的全部意指，理解各项意指彼此指涉的方式，也理解各种用法的运用。

奥克塔夫·曼诺尼——这就是语言，而一句言说……

拉康——可在其中，为什么您说“自我系统并不存在”？恰恰相反，它完全包含在其中。

奥克塔夫·曼诺尼

我想到一个关于中学会考的笑话，已经很老了。一个冒牌考生被当成真正的考生，主考官给他看一份考卷：

- “可这是您写的东西”，题目叫“致塞涅卡的信”。

那人说：

“先生，您看我像是会给塞涅卡写信的人吗？”

他把这件事理解在言说平面上。必要时，他也许能翻译那段译文题，但他说：那不是我，不是我的言说。这当然是个滑稽处境，但我觉得它正有这一意义。如果我读到一封不知道由谁寄出、也不知道寄给谁的信，我仍能理解它；此时我身处语言世界。

拉康

如果您理解它，您当然自然而然便……当有人给您看一封“致塞涅卡的信”，那当然就是您写的。证据是：确实如此！您作为例子带来的东西，恰恰完全反向支持了您的说法。

我们之所以能立刻在各种主体间性的游戏中占据位置，是因为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处在自己的位置上；语言世界之所以可能，正因为我们能从任何地方处于自己的位置。

奥克塔夫·曼诺尼——但那是在有一句言说的时候。

拉康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这样是否足以使它成为言说？显然，精神分析经验奠基于这样一点：进入语言的任意一种方式，并不具有同样的效力。不是吗？同样不正是在这个存在之躯、这个 corpse of being（存在之尸）中，精神分析才成为一种能够存在的东西，而从语言中随便借来的一个片段，才不会对主体具有同样的价值吗？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语言是从无人到无人；言说则是从某个人到另一个人。因为言说是构成性的，语言则已经被构成。

弗朗索瓦·佩里耶

您提问时用了“经济的”这个词。当前的问题确实就在这里，所以我无法回答；可这也恰恰是我现在正在提出的问题。我用以下方式来问它：我试着相对于某种精神分析形式来理解，这种分析恰恰在想象界中展开，把想象界本身表述出来，却没有揭露它作为想象界的性质。

而且，我认为在这种分析形式中，经济问题——在我们最终生活的平面上，它是最重要的问题——确实以数量术语提出。例如，穿过某种想象性处境，人们释放了这样数量的情感；如果释放得还不够多，精神分析就仍停留在表面。因此存在一种倾向：试着穿过转移关系及其想象性特征，以某种相当不可言说、属于感觉和感受的方式，抵达精神分析的经济标准——也就是尽可能多地把东西释放出来，尽可能强烈地感受它。

如果你们愿意，这就是几年前我还会参照的图式。

如今，如果我理解正确，视角已经发生移位并被重新安置：问题在于把语言的经济问题引入言说。正是在这里，我提出自己的问题，并给出如下设想——我不知道是否错了：只要主体的意指处境借助言说，在它的全部维度、尤其是它的三角维度中得到充分表述，经济问题就将不复存在。

正因为语言成为充实言说——而它恰恰是三维的——经济因素便会自然停止成为一个关于精神分析中倾倒出来之数量的问题，例如情感或本能的数量；它将重新成为——这很难，我说不太清楚……——仅仅是某种东西的基底与发动机。当一种处境已经在它的全部维度中得到理解、表述并被意识到时，这种东西就会自然而然地嵌入其中。

拉康

在请勒克莱尔发言之前，我顺便拾取您刚才说的一个词：

- 第一次是：维度；
- 第二次是：三维的；
- 还有一次又采取了“维度”的形式。

塞尔日·勒克莱尔

我想到的答案是一个公式：只要从语言具有沟通、甚至传递功能的角度看待事情，言说就具有奠基、甚至揭示的功能。

阿伦斯堡先生

那么，正是以言说为中介，语言才能发挥经济作用。您是这个意思吗？

弗朗索瓦·佩里耶

不是。我谈的是把经济重新嵌入象征秩序。最终，我会停留在这个公式：以言说为中介，把经济重新嵌入象征秩序。

拉康

有一个大词，也是控制论的关键词：讯息。相对于讯息，语言无疑处在一种复杂的位置；但它就是为此而成的。相对于讯息，我们所知道、已经构成的语言有几项引人注目的特征。首先是它的歧义：义素始终是多义素，能指始终具有多种意指，而它们有时彼此极其分离。

因此，现存的语言并不是编码，却能通过一种意指的整体性在讯息中有效运作。它凭借句子的含义来运作；这个含义是独一的，我的意思是，它不能被编入词典：

- 人们无法编写句子词典；
- 人们编写单词、单词用法或短语的词典；
- 但不会编写句子词典。

正是通过句子的发出和使用，同语用及语义要素相连的某些歧义，才会在我们于语境中所说的内容里消解。

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语言的存在无法被还原为编码。人们勾勒传播理论时，往往给出的正是编码范例，因为要勾勒这套理论，找不到比它更好的例子……

我不知道自己今天是否会谈到它，还是要到下次谈论我的讲座时，才给你们画出精确图式。

……只要传播理论：

- 试图提取传播单位；
- 试图形式化传播主题；

……它就总会倾向于参照编码，即某种原则上避免歧义的东西：一个编码符号不可能同另一个符号混淆，除非发生错误。因此，面对语言，我们首先遇见了一个范畴；它向我们表明，相对于讯息，语言的功能并不简单。

不过，这只是一段导言，它仍完全遮蔽“讯息是什么”的问题。你们认为讯息是什么？就这样自发、天真地说吧。对你们来说，讯息预设了什么？

马尔尚先生——信息的传递。

拉康——信息是什么？

马尔尚先生——某种指示。

科莱特·奥德里——某种从一个人出发、传给另一个人的东西。

马尔尚先生——那是传播，不是讯息。

科莱特·奥德里——我认为讯息的根本就在这里：它是一项被传递的通告。

马尔尚先生——讯息与传播不是同一回事。

科莱特·奥德里

“讯息”最普通的含义，就是为让某人知道而传给他的东西——人们给某人捎去讯息，无论是在军事行动还是什么场合。这是它的本义。

马尔尚先生——讯息是单向的，传播则不是单向的，它有往有返。

科莱特·奥德里——我刚才不是说，讯息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吗?

马尔尚先生

讯息从一个人发送给另一个人；传播则是讯息得到交换以后建立起来的东西。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讯息就是输入一台通用机器的程序；过了一段时间，机器会把它所能产出的东西输出。

拉康——他说得不错。

罗贝尔·勒福尔——这是符号世界的扩展。

马尔尚先生

不，这是符号世界的收窄，因为在语言的背景上，整个背景会一同得到传递。言说将作出选择。言说、讯息和语言之间存在区分。言说是以或多或少适切的方式使用的工具；在言说显现时，会显出一系列未规定之处，一系列事情将在语言背景上发生。我认为语言的功能更

广；讯息正是在它上面、并借助它得到传递。在讯息、语言和言说的层面，都存在一系列未规定之处。

拉康

现在，我们处于如下位置：科莱特·奥德里女士在讯息问题上引入了主体之必要性——讯息的根本，是某种从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的东西。

科莱特·奥德里

讯息不只可以直接传递；它可以由一个同内容毫无关系的信使携带。信使可以根本不知道讯息包含什么。

马尔尚先生——它也可以从一台机器传到另一台机器。

科莱特·奥德里——但无论如何，总有一个出发点和一个到达点。

拉康

有时，信使同讯息混为一体。某种东西被写在他的头皮上；他甚至无法在镜中读到，必须剃去头发才能取得讯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得到了自在讯息的形象？一个把讯息写在头发下面的信使，仅凭自己就是一则讯息吗？

马尔尚先生——我主张是。

科莱特·奥德里——那显然是一则讯息。

奥克塔夫·曼诺尼——它不必被接收。

马尔尚先生——讯息通常会被发送和接收；但在两者之间，它仍然是讯息。

科莱特·奥德里——海上的漂流瓶就是一则讯息：它有收件指向。它不必真正抵达，但它指向一个收件人。

马尔尚先生——它是运动中的一个意指。

拉康

它不是运动中的意指，而是运动中的符号——一则讯息。现在还要知道符号是什么。

马尔尚先生——某种被交换的东西。

塞尔日·勒克莱尔——它是客观言说；讯息就是客观言说。

拉康

完全不是！我要向你们讲一则对这个问题十分根本的寓言，试着建立几个标点，把事情弄清。有一个叫威尔斯的人；众所周知，人们认为他的头脑相当浅显。其实，他机敏得很，根本不浅薄。他非常清楚自己在思想与行为体系中拒绝什么、选择什么。

我已经不太记得这是他的哪一部作品了——肯定出自他。他设想两三个科学家抵达火星，在那里遇见如下相当引人注目的现象：他们面对一些拥有自己独特沟通方式的存在者，却惊讶地发现自己能理解对方以讯息形式发出的声音。每个人都理解了；他们惊喜万分，说：“这些火星人可真了不起！”接着，他们彼此商议。

其中一人说：“他告诉我，自己正在研究量函数，以及一切同电子物理学相关的东西。”

另一人说：“对，他告诉我，自己研究的是构成固体本质的东西。”

第三人则说：“他告诉我，自己研究诗歌格律，以及音步和韵律的功能等等。”

三个人全都理解了某种东西；而每个人所理解的，正是他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你们看见这则寓言的意义了吗？你们清楚看出这种现象的典范性质——它始终、在任何场合发生；每当我们进行私下或公开的谈话时，它都会发生。你们认为，它处在语言一边，还是言说一边？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您的问题在哪里？

拉康——这个小故事说明的是语言还是言说？

科莱特·奥德里——两者都是。一边有语言，另一边有言说。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

据我所知，通用机器并不太多。假设我们让一段程序在其中运行，就必须不仅考虑机器，还要考虑操作员。我们输入一段程序——这就是讯息。等输出时，人们要么说：“机器出岔子了”，要么说：“它没出岔子。”也就是说，从机器给出一项传播结果的那一刻起，只要它能被某人接收——如果操作员不理解，它就无法接收——只要他认为结果相符、理解它、把它接受为有效，并认为机器运作正常，那么此刻，讯息就已经成为传播。

马尔尚先生——但在这个故事里，三个人都理解了，却理解得不同。

奥克塔夫·曼诺尼

并不不同。如果一位数学家在黑板上展开方程，一个人可以说："这是磁学"，另一个人可以说是别的东西；但这些方程对两个人都成立。

拉康——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马尔尚先生——至于机器的故事，其中嵌入了机器内部发生的一切，嵌入了整个编码。

雅克·里盖——我认为这就只是语言。

塞尔日·勒克莱尔

我觉得，这场讨论终究已经沿某个方式展开。我想说清是何种方式：它取决于您对控制论的思考，也就是您下周三将要说的东西。

拉康——况且，这也给我一个机会，看看你们已经走到哪里。

塞尔日·勒克莱尔

在这个视角中，我们如果已经能相对标定语言，至少对现在的我们而言，标定言说要困难得多。可我刚才谈到言说时，是在某种意义上谈它；也就是说，当我谈到言说时，我指的始终就是言说。我希望您稍微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此刻请稍微谈谈言说这一极，让我们至少能标定讨论的平面。

马尔尚先生——可是，当言说与语言显现出来时，我们能把两者分开吗？

拉康——贝尔纳尔神父在哪里？您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贝尔纳尔神父？

贝尔纳尔先生——我和里盖一样，认为那是语言；那么看来，我什么也没懂。

雅克·里盖——为什么语言……？

拉康

你们看到，这里的每个人显然都在面对一个神话存在；后者发展出了某种讯息模式。穿过这则讯息，每个人都听见了位于自己创造性功能核心的东西。

雅克·里盖——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听见它。

科莱特·奥德里

事情还要更复杂，因为我们目前只谈到接收。应当区分发出点发生的事情；必须先看看火星人想说什么。

拉康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火星人想说什么。如果我们站到话语发出仍然模糊的那一边，就不能说言说与语言彼此混同。

马尔尚先生——好嘛，您先让语言消失，随后又拿它来卡住我们。

拉康

我承认，这则寓言值得进一步阐明。故事中存在一种语言的替代物……

那就是三个个体彼此理解的可能性；而他们已经接收到、或好或坏地理解的言说，将在这门语言上运作。

……但其中没有编码。

这则寓言的意思如下：每个人都必须在语言世界中认出一则讯息——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但我们还是不要这样称呼，以免造成混淆——也就是向他显露的一项召唤、一种使命。不是吗？

刚才有人谈到揭示或奠基，问题正是这一点。我们面对着整个语言世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时觉得这个世界本质上具有某种中和性、不确定性，并且是错误的源泉。

没有一位哲学家不曾——而且有充分理由——强调错误本身的可能性同语言的存在相联系。每个主体都必须相对于这个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

至少，他生存功能的一部分在于在那里找到自己。它并不像人们直到某个时期所认为的那样，

仅仅发生在一个思智化（noétisation）的平面上。

……他必须在那里找到自己，而不只是认识世界。

如果精神分析确有某种意义：

- 那就是他必须在自己的存在本身中找到自己；
- 那就是他已经卷入某种同语言世界相关、却绝不与之相同的东西。

我们迄今所说的，正是某种同语言相关却绝不与语言相同的东西：具体的普遍话语，因为它自时间起源以来持续展开。那是已经真正被说出的东西。我说“真正被说出”，甚至还要说：实际被说出。为了把观念固定清楚，我们可以走到这一步。主体正相对于它把自己安置为主体；而且作为主体，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规定：

- 这种规定属于完全不同于实在规定的界域；
- 也完全不同于那些物质代谢——正是借这些代谢，生命这一存在的表象才涌现出来。

它属于完全不同的秩序。主体已经被铭写和规定于其中；但只要他继续这场话语，他仍然具有一项功能：在话语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并不只是演说者，而且早已整个受到这场话语的规定。我常常强调，主体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被安置在某个位置；他不仅是话语的发出者，我几乎还要说，他是话语的一个原子，处在这场话语的舞步队列之中。

如果你们愿意，他本人就是一则讯息。刚才开始讨论讯息问题时，我们立刻看到，讯息能够独自到处游荡。问题恰恰在于知道人同这则讯息具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发现，这种关系远比偶然把一则讯息写在他头上更为深刻。

他早已整个处于一连串讯息之中。他作出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一句言说。

马尔尚先生——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个层面、言说的层面。

拉康

我请贝尔纳尔神父来援，因为毕竟还有“in principio erat verbum”（Εν αρχη ην ο Λογος）。前几天——您没有来，我为此感到遗憾——我在普劳图斯那里找到对 fides 一词用法的确证；您有一次说，在您看来，它最贴切地翻译了言说。奇怪的是，宗教译文没有说 in principio erat fides，而说 in principio erat verbum；verbum 严格说来就是语言，是同一个词。

相关知识卡 Logos、Verbum 与“道”

它并没有说“起初有言说”。当它说“起初有言词”时，确实说出了某种具有意义的东西；这大概向我们指出那里存在某种东西，因为经文说：

它处于我们无法企及的开端。说实话，这对我们极难构想，因为它无非是在强调希腊文本同样突出之物：“Εν αρχη ην ο Λογος”；Λογος 是语言，而非言说。此后，上帝开始使用言说。祂说：“要有光。”

让我们重新拾起刚才借威尔斯寓言所瞄准的东西。这个问题自有意义，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各人会以不同方式接收它。不过，如果我们赋予“言说”一词以精确意义——这个问题仍然敞开，但并非今天要处理的问题——就让我们更靠近一点，看看人如何在最严格的 inter-esse、即“置身其间”的意义上，对言说发生切身关系。

我们仍明确感觉到，必须区分讯息——在符号、一个四处游荡的符号之意义上的讯息——同人进入这场事情的方式。我说人本人被整合进普遍话语。你们甚至会发现，这终究不同于漂流瓶里或头盖骨上那些在世界各处游荡的讯息；至少对我们来说，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秩序。从天狼星的观点看，也许可以把它们混为一谈；但对我们而言，混同并不可能。无论如何，我们感兴趣的是知道其中差别。

正因为如此，瓦拉布雷加〔？〕刚才才会明确说，威尔斯的寓言所涉及的是言说。

雅克·里盖——我能不能在黑板上写两三样东西？

拉康——请吧。

雅克·里盖

我只想用两分钟，先解释数学家所谓的语言，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我们取一个字母集合 S = { a, b, c, d }，再从这些字母出发，考虑所有能够用它们组成的词之集合：ab、ac、ca、ad……、abdd、bb，等等。你们看，我把字母按照任意顺序一个接一个排列，并且允许重复；这样便无穷地形成所有这些词。

在这些词中，我们取一个子集 WF——well formed，即形式良好的词——它们由这些符号构成。一套数学理论，就是给出某个 WF 子集——称为公理——以及一组例如属于句法类型的推导规则。

比如，规则采取如下形式：如果一个词内部含有符号 ab，我就获准以 p 替换 ab。于是，从词 abcd 出发，我可以形成词 pcd；这就是所谓定

理。从这些公理出发，借助句法产生式所能形成的全部词之集合——也就是这个 WF——被称为一门语言。有一点很清楚：选择符号 abcd 完全任意。我本可以选择其他符号，以 u、v、x、y 到处替换它们，并在句法产生式中作出同样改变。这样，我便在两套理论之间界定了一个同构。

换句话说，对数学家而言，语言概念只能被界定到同构为止。还有更进一步的：它甚至只能被界定到编码为止。因为如果我们取由 0 和 1 构成的符号集合，并约定 a = 00、b = 01、c = 10、d = 11，我就可以依照 0 和 1 这些符号，翻译全部句法产生式和公理。

但当我想把新理论解码回旧理论时，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如果我把某个词编码成 00010111001，你们看，解码有时可能出现歧义。假定 e = 000，我就无法知道这个词以 a 还是以 e 开头，等等。我相信，我们应当从这里开始弄清问题。您对符号的定义似乎不同于这里的 S = { a, b, c, d }。

因为对您来说，符号同另一门语言相连。您有一种沟通的基础语言、某种普遍语言；您所说的符号始终依照这门基础语言得到编码。

拉康

如果我理解正确——我想自己理解了——您刚才所说有一点使我印象深刻：以数学符号这种形式上得到高度纯化的东西，还原并例示语言现象——这正是把控制论纳入卷宗、使我们在技术中定向的一项意义——最清楚地使我们看见：无论你把某种东西的数学记法简化到何种程度——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是被构想为符号世界的 verbum、语言——它都显然完全独立于我们而存在。

我的意思是，无论用十进制还是只含 0 与 1 的二进制记下数系，数都具有绝对存在的性质。无论我们在不在那里，它们都存在。例如，1729 永远都是两组不同立方数之和；它是能以两种方式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的最小数。问题在于：定理的意指是否独立于我们而存在。〔$1729 = 1^3 + 12^3 = 9^3 + 10^3$〕

雅克·里盖

这里有一个例子。假设这个集合是 {2, 3, 5, 4, +}，就会有如下〔定理〕：3 + 5 = 4 + 4。

拉康

因此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某处进入通用机器流转——一台比你们所能设想的一切都更为通用的机器——并以各种方式流转。我们可以想象它具有某种形式，拥有无限多层级，一切都在其中旋转并循环。符号世界运作并存在，却没有任何一种意指。

雅克·里盖——没有任何一种。机器将必须知道……

拉康

当我们使机器停止时，它才取得意指。换句话说，我们在其中作出的时间切分赋予它意指；您自己刚才就这样说。况且，如果切分有误，可能引入有时很难解决的歧义，但人们最终总会赋予它某种意指。

雅克·里盖

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这些切分可以由另一台机器完成。人们可以制造一台正确切分的机器；而且根本没有任何保证说，人能够解读这台新机器的输出。

拉康

完全正确。不过，严格说来，某种对主体具有含义之物的问题，归根结底正是通过时间介入、通过断句节奏这一要素得到嵌入。

雅克·里盖——对，但还有更多东西。

拉康——好，请说。

雅克·里盖——我觉得，还有这个全体人类共同具有的符号宇宙。

拉康——我们刚才说的，正是它绝不特殊地属于人。

雅克·里盖——恰恰如此：机器之间没有共同的符号宇宙。

拉康

事情非常微妙。因为这些机器是我们制造的；但事实上，我们完全无须真正制造它们，只需观察：以您的 0 与 1 为中介，也就是以在场—缺席这一涵义为中介，我们生成并能够表述所有呈现之物、所有由确定历史过程发展出来的东西、所有在数学中得到发展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同意。除此以外也很清楚：数的一切性质，都已经存在于以二进制符号写成的数之中。当然，问题并不是人们曾以这种方式发现它们；发现还需要各种东西，其中恰恰包括一些符号的发明。例如，仅仅是 √ 这个符号：人们第一次把它写在一小张纸上的那一天，就使我

们向前迈出一大步。人类曾经张口结舌地面对二次方程几个世纪，无法走出困境；正因为这个符号，我们才得以推进。

我们由此面对如下成问题的处境。总而言之：

- 符号具有一种现实性；在这些符号内部，存在着一个完全没有主体性的真理世界；
- 另一方面，主体性又存在一种历史进展；它显然朝向重新找到符号秩序中已经存在的真理。你们同意吗？谁完全没抓住？

马尔尚先生

我不同意。您刚才把语言界定为一个我们与之疏离的符号世界；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定义。

拉康——是这种语言。

马尔尚先生——我认为这适用于一般语言。

拉康——并非如此，因为语言满载我们的历史；它同 √ 这个符号一样偶然。而且，它还有歧义。

马尔尚先生

我认为，当语言被这样构想时，错误概念不能适用于它。您刚才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而您又把语言界定为独立于我们的符号世界……

拉康——在 0 的世界里没有错误。

马尔尚先生

可在语言世界中，这当然已经不再意味着什么。那里有真或假的事情。您说人们在进行一种探索；错误与真理在这时得到规定。但这已经是一种稍显特殊的语言，是数学符号世界。

拉康

对于一套实际存在的语言系统，事情并不完全如此。我可以指出错误，把错误本身标定出来。如果我对你们说“大象生活在水中”，就能够通过一系列三段论反驳这个错误。

马尔尚先生

可那已经是一个句子，是一则可能为假的讯息和一项传播。您发送了一则讯息。我的意思是，如果把一切语言界定为独立于我们的符号世界，错误概念就不能安置在这一层，而要安置在语言进一步分化的层面；讯息已经在那里显现。在我看来，传播和言说不处于同一个层面。我把语言放在一个更低的层面；其他一切——传播、讯息与言说——都以它为基础并借助它显现。我赋予语言一个更具包围性的〔空间〕；所有你们愿意说的存在显现之整体，都浸在其中。若干分化可以由此发生。但当您引用语言、说“起初有言词”时，那才是错误无法适用的真正语言，因为语言的第一项作用，是赋予……的可能性。

拉康——就是我们已经界定的东西。

马尔尚先生——那是另一门语言。您说“起初有言词”时，指的是派生出这门语言的那一门语言。

拉康——在能够接近的限度内，它确实接近那一门语言。

马尔尚先生——也就是能够知道何为错误、何为真理的时候。

拉康——对，您的意思是，那门语言中没有错误？

马尔尚先生

人们可以找到错误，可以确定错误存在，也可以排除错误。这门语言已经具有远比想象中更重要的法则；而它所来自的语言还没有自己的法则。这里的全部语言都建立在另一门语言上——就是您说“起初有言词”时谈到的那一门。两者不是同一门语言。

拉康——我想抓住您的思路。

马尔尚先生

正是在这里，言说与主体性的作用介入。当您谈论言说和语言时，那里存在两种不同的功能。语言是一个基础，一组构造与形式可以在它之上并借助它建立起来，一组方向也可以在那里得到标示；例如，人类思想将沿这些方向运作，讯息也将沿它们得到传递。

它是某种极端未规定的东西。随后，您又规定了另一门语言。因为里盖先生刚才谈到这门语言、指称并说明所有这些东西时，终究已经强加规则、给出定义——而且正是借助语言。只有在语言本身内部，这些规定才可能发生。在我看来，语言几乎应当被保持在一种未分化层面。因为一旦开始试图解读一门语言的含义，它就不再适用了；人们只能解读一句言说的含义。言说甚至可以有多种含义，而这恰恰就是它的作用。

拉康——我瞄准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向你们显示，含义问题随言说一同到来。

马尔尚先生——当然，但它不随语言到来。语言使含义的建立与言说在其中的显现成为可能。

拉康

这里有两样东西。一是历史性地具身、属于我们共同体的语言，例如法语；另一是刚才所说的那种语言。重要的是察觉：我们能够以一种格外清楚的方式，抵达某种处于纯粹状态的东西；正如您刚才所说，法则已经在那里显现。

马尔尚先生——可还有另一个例子马上……

拉康——但这些法则完全没有得到解读，直到我们介入其中、放入含义。放入什么含义？

马尔尚先生——啊，这可不对！这就不对了！

拉康

它总是某种我们整个卷入其中之物的含义，也就是我们嵌入其时间序列的方式。问题在于知道，这里所涉是哪一种时间。

X 先生

我认为，可以在这里引入皮亚杰从儿童逻辑到青少年逻辑的一些概念。他用可能性而非实在来界定形式思维的根本。不过，即使在可能

性概念内部，他也作出一项区分：一边是所谓可能结构，对应于思维的客观结构；另一边则是所谓实质可能，也就是必须接受主体意识之功能的东西。

拉康

可这同思维完全无关。这一切根本不需要被思考。二进制符号在机器中流转；只要我们向机器输入正确程序，它就能让我们认识并检测一个迄今从未被检测出来的质数。机器中流转的质数同思维毫无关系。

X 先生

他不是指思维，而是解决问题的客观结构，是机器在存在者中的结构；对人而言，就是大脑结构。这并不与有意识思维意义上的思维相对立。我觉得，两者恰恰对应。

拉康——它们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我不认为这里涉及的是它。

X　先生——或许可以说，言说作为揭示要素，插入普遍话语与语言之间。

让-贝特朗·勒费弗尔-蓬塔利斯

我不知道自己理解得是否很好。我感觉，语言与言说之间其实有一种非常彻底的切断；对我而言，这并不表达多少东西，因为归根结底，如果没有言说，也就不会有语言。在刚才的寓言中，我觉得语言依其定义便是含混的。不能说它是一个预设相对完备之封闭循环的符号宇宙，人们仿佛从中取出这个或那个意指。那么，接收言说和使用言说的人面对这种含混时，会显出自己的偏好。我不理解的是这种……

拉康

一旦语言存在——问题恰恰在于知道，至少要多少个符号才能构成一门语言——它就是一个宇宙，也就是说，是具体的；一切意指都必须在其中找到位置。没有一门语言会有整片无法翻译的区域。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意指，始终具身于一套作为语言宇宙的系统中。语言一旦存在，就是宇宙。

让-贝特朗·勒费弗尔-蓬塔利斯

可我们完全可以反转这个结果，说最贫乏的语言也允许人们传达一切。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意指都已经被放进一门语言。

拉康

正因为如此，我才区分了语言与意指。语言是符号系统，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系统；一旦它存在，人们便能用它做任何事情。

让-贝特朗·勒费弗尔-蓬塔利斯——条件是有说话主体。

拉康

当然。问题在于，说话主体在其中具有什么功能。我们由此逐渐走向时间在其中的功能。我相信，正是沿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区分属于想象秩序与属于象征秩序的东西；当然，这项区分并不简单，你们马上会看到。归根结底，我还要再讲一则寓言。它大概比威尔斯的寓言更清楚，因为它就是为此目的特意制作的——由我所作。

这个故事，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几个人物面对一个辨认问题，周围还有一小段情节：三名囚犯受到一项考验。其中一人将获得释放，但人们不知道该把这份恩典给谁，而恩典只有一份。三个人同样值得，于是人们以如下考验的成功来决定。他们被告知：这里有三只白圆盘、两只黑圆盘。我们会随意取一些圆盘，在你们三人每人背上系一个；接下来由你们自己想办法。

当然，你们不能沟通，现场没有镜子，而且沟通也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因为只要向另一个人揭露他背上的颜色，获益的就会是他。于是，每人背上都有一个圆盘；每个人只能通过圆盘，看见另两人都被标记为白色。

那里有三只白盘和两只黑盘；实际给每个人系上的都是白盘。问题在于知道，每个主体将如何推理。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推理范例，而是一个能够显示时间之层级和维度——正如佩里耶刚才所说——的故事。

这里有三个时间维度。值得指出的是，严格说来，人们从未真正区分并凸显它们。我们可以按照如下方式命名这三个维度；这并非不可信，更不是纯粹幻想：在这种情境中——它自身携带某种一致性，使我们不难设想三人会很快发现自己都戴着白盘——每个主体大概都会以这种模式思考。不过，如果要把它话语化，必然采取以下形式。那里首先有一项根本给定，属于那些 0 和小小的 1 的秩序：如果有人看见两只黑盘，他就不会有丝毫怀疑；因为黑盘总共只有两只，所以他可以直接离开。

这是永恒逻辑的给定，同时又完全瞬时：只需看见两只黑盘。然而，事情偏偏不这样！任何人都没看见它们，自有充分理由——根本没有一只黑盘，所以谁都不可能看见。每个人只看见两只白盘。尽管如此，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将在人物借以迈向出口的思考中发挥完全决定性的作用。

每个主体看见两只白盘时，都必须问自己：眼前另外两个人中的一个，会看见什么？

- 要么是两只白盘；
- 要么是一白一黑。你们明白，每个主体都必须思考另两人必定在想什么；而且这完全是一种相互的思考。因为对每个主体来说，有一点可以确定：另两个人既然彼此相似，无论如何都看见同一件东西；对每人来说，附加的第二项就是他本人，亦即主体自己并不知道的那个圆盘。

因此，他会告诉自己：如果自己是黑色，另两个人各自都会看见一只白盘和一只黑盘。而其中一人就可以对自己说：如果我也是黑色，那么另一个人肯定已经走向出口。既然主体没有看见他们移动，此刻便感到、并确信这些人物并不处于能够如此提问的情况：他所谈的另两个人中，每一个原本都能在“主体自己是黑色”的前提下，根据第三人静止不动，找到足以使自己离开的理由。

正因为另两人没有离开，第三个主体才能隐约看见：自己处于同另两人严格等价的位置，也就是白色。你们看，只有到了第三个时间，在对主体相互性的思索之后，他才能根据另两人已经作出的“不”、已经

“没有离开”的见证，建立自己的确信：自己处于同另两人相同的位置，即背上系着一只白盘。

不过请注意一件事：在这一层面，一个绝对根本的要素介入主体自身的思考。一旦抵达这项理解，他就必须使自己的行动骤然加速。因为从他抵达理解的那一刻起，就必须想到另外两人也可能抵达同一结果。因此，如果他让他们稍稍领先，自己就会重新跌回先前情况；也就是说，他是否落入错误，取决于他自己的急迫。换句话说，他必须告诉自己：

> “我必须赶快抵达这个结论；如果我不赶快抵达，哪怕把结论时刻稍微延后，
>
> 我就会依自己的前提自动落入不仅是歧义、而且是错误；
>
> 因为如果我让他们领先，就证明我是黑色。”

这是一道诡辩，你们完全看得出来。因为你们看到，论证在第三个时间如何倒转；一切又如何取决于某种如此难以把握的东西：主体亲手握着他所提取之真理的 articulation，而这个真理绝对无法同见证它的行动本身分开。如果这个行动只延迟一瞬间，他便同时知道自己将坠入错误。你们跟上了吗?

马尔尚先生——要么谁也不能动，要么三人一起动。

让·拉普朗什——他可能走向失败。

拉康

现在的问题，是主体把自己的行动话语化。他做的事情是一回事，他如何把它说成话语则是另一回事。如果他把它话语化，就会说：“如果另外两人比我先做出我刚刚从自身推理角度发现为必要的行动，那么他们是白色，我是黑色。”

马尔尚先生——可在这个例子中，恰恰没有“先”。

让·拉普朗什——他们离开，是因为我是白色，而……

拉康

一旦让另外两人领先，他就不再有任何办法脱身，因为他能够作出两种推理，却无法在其中选择。重要的是：在这个情境、而且特别是这个情境中，他面前有两个可以被推论为具有主体性质——也就是同他一样思考——的项，他能够从中抓住某种东西。

从那一刻起，他会抵达一个时刻：对他本人而言，他的推论所抵达之点是否为真，取决于他向门口迈步时的急迫本身。此后，他还必须把这个真理显现出来，也就是说，说明自己为什么这样想。行动中的加速与骤然急迫，在这里显出同真理的显现彼此一致。他知道，只要稍稍延迟真理的显现，就再也无法显现它。拉普朗什，您抓住了吗?

马尔尚先生——我不同意，因为您引入了延迟与赶快的概念。

拉康——这恰恰是为了显示它的逻辑价值。

马尔尚先生

可这两个概念只有相对于某种东西才能建立；这里却不存在可能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三个主体都不能移动。那里没有关系，因为三个人各自进行同样的推理，而且各自都在等待某种东西……

拉康——假设他们三人一起离开。

马尔尚先生——那三个人都会被砍头。

拉康——甚至在他们抵达门口之前，会发生什么？

马尔尚先生——这不可能，他们全在等待。这个问题的经典表述会加上一项条件。

拉康

可每个人的行动或决定取决于没有显现，而非显现。正因为另外每个人都没有显现，每个人才有机会显现。他们因此会正常抵达结论，只要三人具有相同的时间——那个被称为“理解的时间”、构成一切心理测试基础的实在要素；我们可以假定它对三人相等。

马尔尚先生

那么，人们就无法脱身。要解决问题，就得说他们的理解时间并不相同。

拉康

可这个问题只有在你们假定“理解的时间”相等时才有意思。如果理解的时间不等，问题不仅不再有趣，你们还会看到它变得多么复杂。

马尔尚先生

否则，他们无法移动。要么三人不一样聪明，要么谁都不能动。

让·拉普朗什——如果 A 没看见 B 离开，他会陷入困惑，却不是错误。

拉康——从他抵达真理的那一刻起，那就是错误。

马尔尚先生——他不可能抵达。

拉康——可一旦假设理解的时间得到固定……

马尔尚先生——对所有人都一样？

拉康

对。理解时间结束时，所有人都会确信三人全是白色。他们会一起离开，原则上各自还会说明自己为什么是白色。如果你们想重新引入一个简单要素——一个无限微小的犹豫点，每人都会问自己：另外两人是不是恰恰因为刚刚发现我是黑色，才开始离开——那么将发生什么？三人停下。

但不要以为停顿后的情境——也就是他们再次作出同样行动并继续离开时——仍然相同。第一次停顿之后重新迈步时，事实已经向前推进。这里还存在如下可能——我省去分析细节，把它留给你们自己；你们会看见它如何结构化——他们可以第二次停下，却不能第三次停下。换句话说，经过两次断句，一切都已经说完。我向你们解释这一切，是为了显示什么？在这里，言说在哪里？语言又在哪里？

我们已经在最初给定中看见语言：有两只黑盘等等。它们是语言的根本给定，完全处在现实以外。从主体能够以一种一致方式使另两人说话的那一刻起，语言开始运作。言说则在主体做出什么时介入？在他通过行动非常简单地断言“我是白色”时介入。

当然，正如人们所说，他的断言并非以逻辑方式得到奠基；但如果他依我刚才所说的方式行事，它仍然有效。也就是说，一旦我理解自己是白色，如果不立刻把它说出来，就再也无法以有效方式断言它。你们明白了吗？

马尔尚先生——关于这一点，明白了。

拉康

拉普朗什，您明白我要走向哪里了吗？我不是把这当作逻辑推理的模型，而是当作一道旨在显示如下区分的诡辩：一边是语言最终应用于想象界的时刻——对他来说，另外两个主体完全是想象性的，他想象他们；他们只是相互结构本身——另一边则是语言的符号时刻，即断言的时刻。你们由此看到，这里终究存在某种不能完全等同于您刚才所说时间切分的东西。

雅克·里盖——完全同意。

拉康

总之，如果你们愿意，它可以向你们显示：我们所发现的这种力量，其边界停在哪里。这种力量由我们拥有的可能性揭示出来——下次我

会向你们说明——我们手中机器的原创性，恰恰由某种相对于时间表达出来的东西构成。

不过，时间还有最后一个维度，无可争议地并不属于机器。我试着通过某种东西使你们形成它的意象；当然，它并不是这个第三时间维度的唯一特征。我在这里用急迫本身这一要素表达它——正如您刚才所说，那既不是迟延，也不是领先。严格说来，人类存在同时间的独特联结，正是通过这种急迫建立的；时间的战车就在背后紧追着他。言说就处在这里，而拥有全部时间的语言并不处在这里。况且，正因为语言拥有全部时间，它凭自身什么也抵达不了。

塞尔日·勒克莱尔

这一切里有件事使我困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错误，但您刚才把它译成“起初有语言”。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您就是这样理解的吗？通常是“起初有言说”或“有言词”，您却说“起初有语言”？您依据什么？这是您给出的翻译吗？

拉康——In principio erat verbum 无可争议地是语言，不是言说。

塞尔日·勒克莱尔——那么，就不存在开端。

拉康——可《约翰福音》不是我写的。

塞尔日·勒克莱尔——我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人们总是写“言说”或“言词”，从不写“语言”。

拉康

我已经两次在黑板上写过这首二行诗，却没有任何人请我解释：

Indem er alles schaft, was schaftet der hôchste? — Sich. Was schaft er aber vor er alles schaftet? — Mich.

全能者创造万物时，创造了什么？——Sich：他自身。祂创造一切以前，存在什么？——Mich：我自身。

这显然是一个大胆的断言，但它大概瞄准了某种东西。

塞尔日·勒克莱尔——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译成“在开端”，而不是“开端之前”。

拉康

我完全不是在告诉你们，圣约翰把事情写对了。我只是告诉你们，《约翰福音》的拉丁文是 in principio erat verbum。我们翻译《论意指》（De significatione）时，你们已经见过它；否则我也无须请贝尔纳尔神父告诉我，它怎么可能表示言说。他确实找到过几种办法，但没有一种令我们满意。

X 先生

Verbum 翻译自一个意为言说、而非语言的希伯来词，就是 דבר〔davar〕，意思是言说。

拉康

我们必须重新讨论这个希伯来语问题。重要的并不是知道……

当然，我们并不禁止自己进入任何神学领域；我甚至要说，

只要人们还没有在理学院给我们安上一把神学教席，无论神学还是科学都走不出困境。

……不过，此刻的问题并不是知道，我们应当把言词还是言说放在开端。

只须从我们今天进入的视角来看；我刚才故意用丹尼尔·冯·切普科〔1605—1660〕的二行诗说明这个视角。你们看到，那里仿佛有一种幻象：语言，也就是你们所有小小的 0 与 1，自永恒以来就在那里。当我告诉你们，它们完全独立于我们而在那里时，你们也许会问：在哪里？我将很难回答。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某种透视中——曼诺尼刚才用了这个词——我们只能把它们看作从来就在那里。

换句话说，这正是柏拉图理论同弗洛伊德理论在根本上相区别的方式之一。我的意思是，柏拉图的理论是一套回忆说：我们所把握、所重新认出的一切，必定从来就位于某种先行的层叠幻象中。为什么？我曾向你们显示，这同柏拉图以二元体神话为根本神话彼此一致；正因为如此，他无法以不同于无限倒影序列的方式看待理念的具身。凡发生并被认出的东西，都处于理念的意象中，也就是处于自在存在的意象中；可它既然是意象，反过来就只是另一个自在理念的意象，并且相对于另一个意象又只是意象……

那里只有回忆。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昨晚整场都在谈它：有齿阴道仍然只会是诸多意象中的一个。可当我们谈论象征秩序时，问题在于知道那里另有某种东西：存在绝对开端，恰恰存在创造。这就是 In principio erat verbum 中的歧义。它在希腊语中被称为 λόγος〔logos〕并

非偶然。在起源处，人们同样可以从这种无限同质性的视角来看它；每当进入想象界领域，我们都会重新找到这种同质性。只要我想到我自己，我便是永恒的；只要我想着自己，自我就不可能被摧毁。

相关知识卡 Logos、Verbum 与“道”

但当我说“我（je）”时，不仅存在毁灭的可能，而且每一刻都有绝对创造。当然，它并不绝对；我不是在说它绝对。它不仅不绝对，而且我们之所以可能拥有未来，正因为存在这种创造的可能性。不过，这个未来如果不也是纯粹镜幻性的，则是因为我们的“我（je）”由此前的全部话语承载。

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时所作的不是一个荒唐行动，因为恺撒的全部过去都在他身后：他的通奸，他曾作为一个纵横地中海政治的人，他反对庞培的军事行动。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做出一件根本的、只具有严格符号价值的事情——卢比孔河并不比我两腿之间的距离更宽，跨过它本身毫无难度；但他做出一件符号性之事，释放出一连串符号性后果。它使创造性未来在象征界域中取得优先地位，只要这一未来由人承担。

不过，当然，一切都取决于整个过去；我们必须随时在其中认出这一连串创造，即使实际上没有认出。这个过去就是永恒秩序，是一切层叠之物的过去；它从来就存在于那些小小的 0 与 1 之中。

我刚才并不是在告诉你们，因为 In principio erat verbum，我就相信语言位于起源。在我看来，我对起源一无所知。我只是要围绕这个歧义术语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此显然，以至于有一阵子你们全都跟了上来、全都表示同意：小小的 0 与 1 界定了一个法则绝对不

可反驳的世界；也就是说，凭借这些小小的 0 与 1，质数自永恒以来就是质数。

你们同意吗？今天就停在这里。今天这堂课有点艰涩。

第24课 · 1955年6月22日

讲座：“精神分析与控制论，或语言的本性”。

教授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在向诸位致辞时，我想特别指出你们中那些通常在星期三稍晚一些时候听我讲课的人。我要请他们同我一道，向我首先提到的让·德莱表达敬意与感谢。他欣然为这一系列讲座揭幕，今天又拨冗出席，使本次会议深感荣幸。

我还要以非常个人的方式感谢他：两年来，我一直在这里以研讨班形式进行这种交流和教学，是他为它提供了一个场所、一方屋顶。这个地方本身就说明了这种教学：不仅通过自身位置和积累于此的全部记忆来说明，还使这项教学分享他本人言说的回响。

今天，我想同你们谈论精神分析与控制论。至少，在精神分析同各种人文科学彼此拉近的领域中，这个主题在我看来值得关注；你们马上会看到为什么。

我要立刻告诉你们：我们不会在这里寻找自身技术同控制论那些或多或少轰动的形式之间的关系。我不会谈大机器或小机器，不会逐一叫出它们的名字，也不会向你们讲述它们实现的种种奇迹。这一切为什么会使我们感兴趣？不过，确有某种东西在我看来可以从中提取出来：

- 一方面，从我们所谓相对的同时代性中提取：两种技术在同一时期出现；

两种思想与科学秩序，也就是精神分析与控制论；

- 另一方面，则从两者各自涉及的某些意指中提取。

在这一切中，我必须驾驭一个角度，使你们隐约看见控制论的意指。因此，不要期待我在任何一边都声称做到穷尽。问题在于找到一个关系轴，使两者各自的意指都得到某种照明。这个轴不是别的，就是语言。正因为如此，我今天将试着向你们解释语言的本性，使你们仿佛在一道闪光中看见它的某些面向。

我们的出发问题如下。既然刚才提到研讨班，我便可以合理地谈论这个曾在其中提出的问题：沿着线索一步步走，我们最终开始追问，同机器持续进行一场机会游戏意味着什么。我们选的机会游戏是奇偶游戏。在谈论精神分析的研讨班中关心奇偶游戏，当然可能显得惊人。不过，我们也谈其他事情；今年有时还谈过牛顿。我仍然相信，这些东西并非偶然来到这里——恰好可以这样说。

恰恰因为这个研讨班谈论奇偶游戏——也许还谈牛顿——精神分析技术才有可能不走上降格、甚至有辱自身的道路；这是我们最根本的关切。在那场奇偶游戏中，问题在于向精神分析家们显示并提醒某种会使我们有所联想的东西：没有任何事情随机发生；即使在看似接近最纯粹机会的机会游戏中，仍能揭示某种东西。结果十分惊人。

在这群精神分析家听众中，我们遇见一种真正的愤慨；正如有人对我说的，他们以为我要消灭偶然。说实话，对我说这番话的人持有坚定的决定论信念，而恰恰是这一点使他害怕。他是对的：偶然的存在同决定论的基础之间具有紧密关系。不过，让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偶然。

当我们说某件事偶然发生时，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说的是两件可能非常不同的事情：

- 我们说，那里不存在意图；
- 我们又说——这是另一种意思——那里存在一条法则。

而决定论概念本身恰恰意味着法则不具有意图。正因为如此，决定论理论的全部发展总会试着说明：在实在中构成、依照法则运作的东西，如何从某种原本未分化之物中生成；后者恰恰就是作为意图之缺席的偶然。决定论告诉我们，任何事情无疑都不会没有原因地发生，但这是一种没有意图的原因。

因此，不难理解这项典型实验如何会让我的对话者产生联想——天知道心智在这些问题上多么容易滑动——仿佛人们最终抓住了某种会重新引入决定论的东西。不完全是在奇偶游戏中，因为正是这一点使我的对话者不安；而是甚至在正反面游戏中。他多少凭直觉把奇偶游戏同掷硬币混为一谈：如果正反面游戏里也有决定论，我们会走向哪里？那就再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决定论了。这个问题为我们打开另一个问题：我们精神分析家在自身技术根部所根本预设的决定论，究竟是什么？

- 我们认为，某种受到规定、并且可以规定的东西能够被凸显出来；
- 我们努力使主体无意图地把自己的话语、思想——正如我们所说——和话语内容交给我们；换言之，他有意地尽可能接近偶然。

这种在偶然意图中寻找的决定论究竟是什么？我相信，控制论能够就此带给我们一些亮光。

正如我想你们中有些人已经隐约看见或知道的，控制论是一个边界极不确定的领域。要找到它的统一性，我们必须暂时以目光扫过若干理性化领域；它们覆盖彼此分散的重要部分，又由我们恰恰需要找到的某种统一性重新聚拢——如同所有人文科学一样。

这从政治学、博弈论一直延伸到传播理论，甚至延伸到对控制论所带来之伟大原创物的某些界定——也就是信息概念。人们告诉我们，控制论恰恰诞生于工程师关于信息效能、信息通过某些导体时的经济，以及一则讯息借以通过和传递的形式如何被还原到根本要素的研究。按照这种说法，它大约只有十年历史，因为它出自这些实验，而“控制论”这个名称由此类研究中最杰出的工程师之一诺伯特·维纳先生提出。

控制论这门科学仿佛就在这里涌现。我相信，这无疑大大限制了它的范围。我们也许应当在一种可以追溯到更早年代的反思中，试着确定控制论的诞生。要理解控制论所涉之物，我认为必须围绕一个对我们如此炽热的主题——偶然的含义与意指——寻找它的起源。在我看来，控制论的过去无非就是我们为同精确科学相对立而称作猜想科学的东西，逐渐形成合理化形式的过程。

如果以此为基础，如果我们把猜想称作某种需要试着精确界定的东西——我相信，它应当成为一组科学之轴从此真正使用的名称——那么，“人文科学”这个术语倒不算指称不当，因为猜想确实涉及人的行动；但我认为它过于模糊，并且被那些含混的、仿佛伪秘传科学的回

声钻了空子，只会降低它的张力与水准。以“猜想科学”这一更加严格、更有方向的界定取而代之，应当有所裨益。

如果这样理解控制论，我们很容易在〔布尔？〕那里，也在孔多塞及其所谓“各派”的投票理论中找到它的先驱；再向上追溯，则会抵达它的父亲和真正的涌现点、起源点：帕斯卡。我们马上会看到这意味着什么。为使你们感觉到这一点，我将恰恰从另一个科学领域——准确说来，即精确科学——的根本概念出发。它们的现代繁盛也并未早出许多，而且完全可以同猜想科学的发展彼此关联；精确科学或许遮蔽、掩盖了猜想科学，但两者严格不可分离。

我们如何界定精确科学？我们会说，同猜想科学不同，精确科学关乎实在。可实在是什么？我不认为人在这方面的看法曾经发生多大变化；一种关于人类思想的心理主义谱系却试图使我们相信相反的事情：仿佛人在早期时代生活于梦中，甚至儿童通常也会因自己的欲望而产生幻觉。

这类奇特构想——我只能这样说——深刻损害了心理学领域的一切发生概念，而且同观察如此相反。人们不可能不去寻找这类神话的起源原因，但今天肯定不会尝试这件事。

如果我们试着赋予实在以含义，看看人一直赋予它的含义，那么它就是某种在同一位置重新找到的东西，无论我们是否曾在那里。它也许移动过；但如果移动，人们就会到别处寻找它，探究它为何受扰动；有时还会告诉自己，它凭自身运动发生了移动，但始终确实处在它的位置上，无论我们在不在那里。

原则上，我们自身的移动——除非出现例外——不会对它的位置改变产生实际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也并非总把实在随身带着走。精确科学无疑同实在的这一功能具有最密切的关系。

然而，如果精确科学并非始终存在，我相信〔……〕差别并不在那种所谓思想的全能中；人们又把这种全能等同于同样所谓古老的泛灵论阶段。事情绝不是从前的人生活在一个拟人化世界中，期待世界给出人的回答。

我相信，这种构想完全幼稚，并且蕴含“人类的童年”这个与任何历史事实都不相应的概念。实际情况是，人曾相信自己的行动同维持这些位置的秩序有所关系。换句话说，他同我们一样认为，实在就是在约定点重新找到的东西：

- 每夜总在同一时刻，人们会在某条子午线上重新找到某颗星；
- 它会回到那里，始终在那里，而且总是同一颗星。

我先取天界标记、后取地上标记，并非偶然；因为事实上，人类先绘制了天空地图，才绘制地球地图。很长时间里，人相信那些仪式、那些典礼实行了某种事情……

- 皇帝犁开春天的第一道田垄；
- 春日舞蹈保证整个自然的丰饶；

……他行动中的某种东西——那是一种有秩序、有意指的行动，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即一句言说——对于把事物维持在各自位置上不可或缺。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如果不以这种有秩序的方式参与，实在就会消散；他们认为实在会受到扰乱。他们没有声称自己制定法则，而是声称自身的在场对法则的持存不可或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界定，因为它确实完全维护了实在之存在的严格性。人类在某一时刻跨过了一道界限：他察觉那些仪式、舞蹈与祈求，对于〔……〕所依循的秩序确实不起任何作用。他是对是错？我们不知道。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已经不再具有那种对季节必然回归看来不可或缺的信念。从此，精确科学的视角才得以诞生。那么，我们将走向何处？人开始认为，自然的大钟自行运转，即使他不在那里，也会继续报时。科学秩序由此诞生。科学秩序恰恰意味着：人从自然的司祭变成它的勤务员。除非服从自然，他无法支配自然；如同奴隶一般，他试着通过周到侍奉，让主人反过来依赖自己。从此，他知道，自然可以精确赴他为它安排的约会。

然而，这种精确性归根结底是什么？精确性恰恰是自然中两种时间的相遇。

- 自然中存在这种秩序，存在像钟表一样运作的事物。那里有一座大钟，就是太阳系；光在 x 个时间单位内穿过它的直径；

从太阳到最远的行星。这就是一座钟，是一座必须得到解读的自然之钟。例如，这无疑是精确科学构成过程中最决定、最根本、也最可靠的步骤之一。

- 但人也必须拥有自己的钟和表。他用什么制造它？用某种东西……

我们会试着很快指出它；人从自然之钟借来了这种东西。但归根结底，这座人造钟总要依照某种东西得到校准。

究竟什么是精确的？是自然吗？我们不能确定它会赴所有约会。当然，人们可以直接规定：只有准时赴约的才是自然的。伏尔泰先生说布丰的《自然史》没有那么自然时，大概正是在表达类似意思。

这也许蕴含一个稍显简单的定义问题：我的未婚妻总会赴约，因为她若不来，我就不再称她为未婚妻。另一方面，人本身是精确的吗？精确性的动力若不在这种钟表对时中，又能在哪里？

我在这里说的并不只是一些细巧的东西。请注意，归根结底，钟表……

一只能可靠运转、以等时方式切分时间，

并且搏动精确、规律的钟表……

……严格说来，直到我刚才已经追溯到的帕斯卡时代才存在。

也就是惠更斯先生——我们用法语方式发这个名字，请讲弗拉芒语的人原谅——制造并最终造出第一只完全等时的摆钟的时代：1659 年。它开启了亚历山大·柯瓦雷先生所谓“精确性的宇宙”；没有它，真正精确的科学绝对不可能存在，而且此前确实也不存在。

精确性在哪里？精确性由某种我们使之降入摆钟和手表的东西构成，也就是从某种自然时间借来的某个因子。这个因子就是 g。你们知道，g 是重力造成的加速度，归根结底是空间与时间之比。它由某种“思想

实验”提取出来——不要忘记，这是伽利略本人的术语。它是一项假设，一项具身于仪器中的假设。

如果仪器本来就是为确证假设而制造，那么根本不必再做实验来确证它。只凭仪器能够运转，你们若稍加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假设已经得到确证。不过，这件仪器仍必须依照某种时间单位校准。时间单位恰恰始终从对实在的这种参照中借来，也就是从某物在某处回到同一位置的事实借来；我们的时间单位就是恒星日。

我必须告诉你们，如果咨询一位物理学家——例如博雷尔先生——他会断言，以当前情况来看，如果出现某种减速……

小到足以无法感觉，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肯定并非无法测知……

……如果地球自转、也就是我们的恒星日出现这种减速，我们目前将完全无法凸显它。因为那个为我们体现时间的所谓时钟是等时的，但我们终究仍依照恒星日来校准它的分度；也就是说，依照一种我们无法检验的东西来校准。

换句话说，这番话只是要使你们感到：人们用固体测量空间，却用时间测量时间。两者并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部分精确科学最终被概括为极少数瞄准能量、物质等东西的符号〔$E = m \cdot C^2$〕，就不值得惊讶。我们曾一度要求一切都用物质与运动的术语表达，而事情正走到这里。那其实意味着物质与时间，因为作为实在中某种东西的运动，恰恰就是时间。我们最终消除并还原了运动。

好吧，归根结底，这场小小的符号游戏——我可以写在黑板上的几个小字母、牛顿体系与爱因斯坦体系——同实在几乎没有多少关系。这

门把实在还原成一小捆公式的科学，从后世回望，大概会显得是一部惊人的史诗；也许随着年代拉远，它还会在透视中变薄，成为一部回路略嫌短促的史诗。

但还有别的东西。既然已经看到精确科学的这种精确性基础——即仪器——我们或许可以再问一件事："这些位置是什么？"换句话说，开始把位置作为空位来关注。两者如此相联、彼此一致而不可分；正因为如此，恰恰同精确科学的诞生彼此相关，另一种东西也开始诞生。人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了它——与其说理解得好，不如说理解得糟——那就是概率计算。但它在起源处……

如果取它以第一种真正现代、科学而严格的形式涌现的日期：1654年，帕斯卡先生关于算术三角形的论文……

……所呈现的并不是对偶然的计算——尽管"概率"一词的深处暗含了它——而是对机会本身的计算，也就是对相遇本身的计算。

帕斯卡在某种最早的机器——恰恰就是算术三角形——中阐发的东西，因以下作用而值得科学界关注：它让人能够立刻规定并找到，当构成一局游戏的连续回合在某一时刻暂停、中断时，一名玩家有权期待什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一连串回合中——这是可以赋予相遇观念的最简单、最精简形式——某种东西已经取得、已经发生；但只要约定尚未终结这串回合、尚未抵达终点，就还有某种东西可以得

到估值。它准确地就是：相遇本身——即位置——作为相遇所具有的可能性，以及：

- 某种来到或没有来到这个位置的东西；
- 某种作为这样的东西，在此处涌现或没有来到的东西；
- 某种严格等价于自身不存在的东西。

关于“在同一位置重新找到之物”的科学，被关于“位置本身之组合”的科学取代。这发生在一种有序界域中，无疑预设回合概念，也就是断句节奏的概念。某种东西由此诞生，并且立刻找到材料汇聚起来：此前属于数的科学的一切变成组合科学；此前在符号世界中那些或多或少含混、偶发——是事故意义上的偶发，而不是机会意义上的偶然——的行进，全都围绕一个确切之物组织起来：缺席〔0〕与在场〔1〕的关联。

由此，你们能够理解整个演变：对这种在场与缺席之法则，以及在场的序列、排序与组合所作的探索，通过一个我们完全可以恰当地称作数学的过程，趋向于建立二元秩序。至少就发生与符号性出现而言，这正是从中提取、最终成为我们所谓控制论之物最显著的原创性。请听清：我故意把控制论在我们世界中出现之物的原创性，维持在这个界限和边界上，并把它同作为人的期待的某种东西联系起来。

组合科学、关于有节奏相遇本身的科学之所以进入人的关注领域，是因为人深深卷入其中。它出自机会游戏的经验，绝非偶然。我们今天

所理解的“博弈论”这个术语，会以一种极其完备的方式涉及例如以下领域，也同样并非偶然：

- 我们经济生活的全部功能：联盟理论、垄断理论……
- 归根结底还有战争理论；因为关于战争的〔策略游戏？〕概念，无非是从根本上的游戏动力来把握并考察战争，把它同任何具身其中的实在东西分离。

这种东西同机会游戏由同一个词指称，绝非偶然。那么，为什么……

因为我所说的最初游戏涉及一种主体间协调关系……

……人在机会游戏中召唤并寻找某种东西——而且也在为它投入的计算中寻找——并通过“机会之游戏 / 机会之我”（jeu de hasard / je de hasard）这组语音同一，显出它必定同主体间性有所关系；可在机会游戏中，主体间性恰恰看似遭到排除，这是为什么？

这使我们非常接近我的出发点那个中心问题：我们所寻找、而人可以说置于身后的无意识偶然，究竟是什么？在机会游戏中，他确实会检验自己的运气；毫无疑问，但他也会从中读出令自己切身相关的命数，因为他认为某种属于自己的东西在那里显露出来。我要说，对面的另一个人越不在场，它就越属于他。这是一项旁侧评论；我只在当前讲述的一个确切位置、一个确切标点处顺便提出，并将在最后回到它。

一旦进入这套猜想理论，我们还需要什么，才会严格说来拥有控制论？我刚才告诉过你们，整个理论过程向布尔的论题、向二元符号主

义、向任何东西都能用 0 与 1 写成这一事实汇聚。还需要什么，才会使一种我们称为“控制论”的新事物在世界上诞生和出现？

- 必须让它在实在中独立于一切主体性而运作；
- 必须使这种关于相遇本身、关于空位本身的科学能够组合、相加并总体化；
- 必须使它可以说自行运作。

为此需要什么？终究必须从实在中取来某种能够承载它的东西。人一直试着把这个实在同符号游戏联结起来：

- 他曾在墙上书写东西；
- 他甚至想象，有时会有“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自行写在墙上；
- 他还在一天中每个时刻太阳阴影停止之处标上数字。

但归根结底，符号始终停在它们被造来安放的位置；它们黏着在实在上，人们可以认为它们只是对这个实在的标记。新事物在于，人们允许符号凭自己的翅膀飞翔——如果可以这样说。凭借什么？凭借一种简单、普通、就在你们手边的装置；只须按下把手：一扇门。

一扇门——请你们想一想——并不是某种完全实在的东西。把它当作实在之物，会造成奇怪的误解。如果观察一扇门，并从中推断它能制造穿堂风，这会使你把它夹在胳膊下带进沙漠给自己乘凉，结果将一

无所获。我在所有词典中找了很久，想知道“一扇门”意味着什么。《利特雷词典》用了两页谈门：

- 从作为开口的门，一直谈到作为或多或少严密封闭的门；
- 从“东方之门”、“最高朴特”，一直谈到雷尼亚尔所写的门：“如果您再回来，我就把门撞在您鼻子上，给您做一副面具。”[注1]

> [注1] 《利特雷词典》引让-弗朗索瓦·雷尼亚尔（1655—1709）：“可是说真的，您要是再回到我们家，我就把门撞在您鼻子上，给您做一副面具。”见《孪生兄弟》第二幕第五场。

这一切并不太令人满意。紧接着，《利特雷词典》不加评论地写道：门必须是开着或关着的。谁也不会为此吃惊，可它仍没有完全满足我，尽管会唤起一些文学回声。[注2]

> [注2] 参见 Branko Aleksic：〈马拉美与拉康的绝对诗性行动〉，《Topiques》2009 年第 4 期，总第 109 期。

我天生不太信任民间智慧。许多东西都被铭写其中，却始终采取稍显混乱的形式；精神分析甚至正因此才存在。我们待会会回到这里。不错，门必须开着或关着；但两者严格说来并不完全等价。请注意，语言在这里可以引导我们。我的天，一扇门“向田野打开”，但人们不说它“向羊栏”或“围场关闭”。我知道，这里把 porta 同 fores——围场的门——混淆了；可我们不必太拘泥，仍能继续关于门的沉思。

事实上，如果门打开了某种东西，那是什么？我既已谈到田野和羊栏，人们也许会以为问题涉及内部与外部；我相信这会大错特错。我们生活在一个足够宏伟的时代：可以按照某个美国人的想象，修建一

座恰好环绕整个地球的长城；如果你们在上面开一道门，哪里是内部，哪里又是外部？

这是一项完整的真理。门开着时，并不因此就更加慷慨。人们说一扇窗“朝向乡野”。颇为奇怪的是，当人们说一扇门“通向”某处时，通常谈的是一扇平常关着、甚至有时被封死的门；恰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说“它通向……”。

我的天，人们有时会“取道一扇门”，那总是一项颇具决定性的行动；而一扇门远比其他东西更常被拒绝向你打开。门的两边可能各有一人守候；你们不会相对于一扇窗想象这种情形。人们可以把门撞开——当然，即使它本来开着也可以——正如阿尔封斯·阿莱所说，“这既愚蠢又残忍”。相反，从窗户进去始终被视为一种满不在乎、而且无疑出于故意的行动；可人们常常不知不觉就穿过一扇门。

总之，这扇门本身在初步看来，已经远离窗户那种真正的工具功能。它当然向某种东西打开；我们不太知道那是实在还是想象界，但总是两者之一。门依其本性无疑已经属于象征秩序。它的符号性如此强烈，以至于开启与关闭的不对称之钥就在这里：开启规定了通行，也就是沿某个方向穿门而过的事情；关闭则规定了闭合。门所关闭的不是围场，而是回路。更准确地说，我起初说的是闭合。

恰恰从这一刻起，门成为真正的符号；甚至成为最卓越的符号——无论人在何处经过，总能凭它认出痕迹。那就是两条线的交叉以及它画出的十字：通行与闭合。

从我们能够把两条线折叠到彼此之上、也就是形成闭合、准确说形成回路的那一刻起——回路关闭时，东西通过〔1〕；回路打开时，东西不通过〔0〕——我们才有可能使猜想科学本身进入控制论的实现。

如果说机器能够自行计算、替你们相加、求总和，创造所有那些人此前认为是自身思想所特有的奇迹，那是因为借助所谓“电力仙子”，我们能够建立回路：它们可以打开或闭合，可以中断或重新接通；这些变化取决于门的存在，即控制论化的门——通行规定闭合的门。你们可以从这项根本定义出发展开所有操作。请注意，问题涉及通行与闭合本身的关系：门一旦打开就会关闭，一旦关闭又会打开。

门不应只是“开着或关着”！它应当“开、然后关、然后再开、再关……”。一切机器的基础都诞生于你们知道的这种可能性：借电路以及接回自身的感应回路——也就是所谓反馈，不过这里是一种很独特的反馈——只要门闭合，电磁铁就会立刻把它重新拉回开启状态；接着它再次关闭、再次开启。你们由此产生所谓振荡。

这种振荡就是断句节奏；而它构成基础，使你们可以通过一系列从此——确实可以这样说——不过是儿童游戏的装配〔参见 Fort-Da 游戏〕，无限铭写有秩序的行动。开启与关闭的一切组合都成为可能。例如，你们可以进行如下全部操作：0011。这里有四种情况：

- 前两种情况 0、0：一扇关闭的门；[注3]

> [注3] 拉康有时以如下差异为例：在电路中，1（通过）对应“闭合”；而对门来说，1（通过）对应“开启”。

- 另外两种情况则是一扇开启的门：1。

然后，另一扇门交替关闭或开启：0 1 0 1。将产生什么结果？你们可以随意规定，例如第三扇门在以下情况下开启或关闭：

0 0：0

0 1：1

1 0：1

1 1：1

也就是说，只要有一扇门开启——四种情况中的三种——就足以使第三扇门打开。另有同样多的公式：你们可以规定，必须两扇门都打开，第三扇才打开。于是得到：

0 0：0

0 1：0

1 0：0

1 1：1

我要再给你们第三种，因为它自有意义。这里，你们规定：只有当两扇门中恰好一扇开启时，第三扇门才开启。

0 0：0

0 1：1

1 0：1

1 1：0

这一切是什么？可以是任何东西。例如：

0 0：0

0 1：1

1 0：1

1 1：1

相关知识卡 析取、合取与模 2 加法

在逻辑平面上，这可以被称为并集或析取。[注] 另一种翻译是“要么……要么……”“或这个，或那个”。它也可以是某种装配回路的方式，即两扇门、两个继电器串联。在另一种情况下：

> [注] 此处法文原文在 réunion 后写作 conjonction，但随后的“或”真值表通常称为“析取”；下一段“与”真值表才称为“合取”。译文依真值表区分两者。

相关知识卡 析取、合取与模 2 加法

0 0：0

0 1：0

1 0：0

1 1：1

你们在这里得到串联装配；这也是限定一种逻辑操作的另一种方式：“与”项的合取。必须同时有“1 与 1”，才会得到 1。你们若还记得算术运算的一些初等法则，就会看到这同乘法重合；所以它有时也被称作逻辑乘法。

相关知识卡 析取、合取与模 2 加法

最后还有：

0 0：0

0 1：1

1 0：1

1 1：0

它完全别具一格，因此需要一个特殊名称：“模 2 加法”。这也并非如此陌生，因为用二进制符号进行加法时，你们就会采用这张表；也就是说，在二进制记法的世界中，1 加 1 得 0，并向前进 1。

相关知识卡 析取、合取与模 2 加法

我只是要给你们如下视角：通过某种符号还原与简化，一旦能够在实在中体现 0 与 1，把在场与缺席本身的这种记法按照一种根本节律与断句节奏具身出来，就有某种东西进入了实在。人们曾经颇为认真地问过——或许没有问太久，但一些绝不可忽视的头脑终究问得相当充分——能否把它称作一台“思维机器”。当然，我们很清楚这台机器不会思考；机器是我们制造的，而它思考的——我的天——只是我们告诉它去思考的东西。

因为，归根结底，当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时……

我们一旦亲手拿起铅笔，开始在一小张纸上写下一个符号，进行加法、乘法这类非常乏味的事情，就是在做同样的事；尽管每项操作都包含一种坚决独特的行动类型，

也就是人曾以自己的行动制作这些符号……

……可他忽然又把这些符号本身交还给行动，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集合。

这就是加法的基础。已经被制作的东西忽然仿佛重新打开、重新拆散；此后，人们又用它制作另一个东西。这就是〔机制？〕的本质。当我们实际执行这种操作——比如计算 2、4、5 之和——如果有人说我们那时没有思考，我们大概会感到受辱。然而很清楚：如果拒绝承认机器具有思维，那么我们执行任意一项特殊操作时也没有思考；我们遵循的恰恰就是机器所遵循的同样"机制"——请容我给这个词加上引号。

因此，这里的重要之处在于察觉：

- 存在某种东西，即作为相遇本身的各种组合可能性所形成的可能链条；

- 这条链可以就其本身受到研究；这样研究时，我们会看见它是一种独立于全部主体性、以自身严格性持续存在的秩序——我说"严格性"，暂且避免使用会把我们带得太远的"真理"一词。

通过控制论，符号以一种名副其实地跨主体的方式具身，并能够作为这样的东西具身于一个对象、一台装置中。当然，问题不在装置——装置只是它的承载物——而在符号游戏本身。这样的游戏包含什么？包含它自身特有的维度。

我不得不沿一些你们无疑会觉得缓慢的道路推进。但你们必须在心中保持这些道路，才能理解人们以控制论之名带给我们的全部东西之真正意义。例如讯息概念。控制论中的讯息概念同我们通常所说的讯息

毫无关系；通常的讯息总具有某种含义，这里的讯息却是一串符号，而符号串总能被还原为 0 与 1 的序列。

正因为如此，所谓“信息单位”——即用来度量任意符号之效能的东西——始终参照一个被称为键盘的原初单元；它无非就是二择一。讯息在这套符号系统内部被纳入一种基础网络：

- 组合本身的网络；
- 相遇本身的网络；它建立在统一断句节奏上，也就是以 1 为断句。

这界定了讯息的视角，也向你们确切显示：在何种限度内，可以接受或拒绝控制论中由此推导出的、对“讯息”一词或多或少掺假的用法。另一方面，关于“信息”概念，以及人们告诉你们信息同熵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关系的全部说法，其道理同我画给你们的这张小表一样容易看清；这张表显示了这套象征系统本身被引入实在的原则。

请注意这一点。例如，当我谈到两次回合组成的序列，而赌注要求我取得〔……〕某一结果时，如果我从这张表出发：

0 0：0

0 1：0

1 0：0

1 1：1

我必须两次都取得正值才能获胜、得到 1；这意味着我起初的期望值是四分之一。在所有可能组合中，只有四种情况之一会让我获胜。

假设我已经进行了一次。如果第一次已经完成：

- 一种情况〔第一次：0〕下，我已经没有任何机会；
- 另一种情况〔第一次：1〕下，我有二分之一的机会。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机会发生了一次层级分化，而且这种分化朝差异增大的方向进行。所谓能量与自然现象总朝势差抹平的方向发展；可在讯息与机会计算的秩序中，事情正好相反。

随着信息到来，势差发生分化。我不是说它总会增大——你们可以找到一种不增大的情况——但它并不必然退化，而且始终更趋向于分化。这个基础要素存在，而我们所谓“语言”的一切都能围绕它组织起来。因为，要让某种语言之物开始诞生、同我们通常所谓语言发生关系，究竟需要什么？

要使语言问世，必须引入一些可怜的小东西，人们称之为正字法、句法。但这一切从一开始就已经给定，因为这里的全部关系本身准确说来就是一种句法。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让机器执行逻辑操作。换句话说，从这个视角看，句法先于语义而存在。控制论是一门句法科学；它或许也正好使我们察觉，我们所谓精确科学同样无非是把实在联结于一套句法。

相关知识卡 析取、合取与模 2 加法

那么，语义又是什么？也就是那些由我们操作、携带全部歧义、情感内容和人类含义的具体语言，又是什么？我们是否也要说，它由人的欲望填充并布置？是我们带来含义，当然；这对很大一部分事物而言完全可以确定。

但能否说，机器中流转的一切都不具有任何一种方向或含义？若考虑 sens 一词的全部意义，当然不能。因为我还没有告诉你们一点：讯息要成为讯息，不仅必须是一串符号，还必须是一串定向的符号。它要依照一套句法运作，机器就必须朝某个方向行进。而我说“机器”时，你们应该感觉得到，目前已经根本不只是在谈那个小盒子；当我在纸上写下这一切，给出小小的 0 与 1 的变换假设时，问题同样涉及始终朝某个方向定向的某种东西。

因此——我们早已猜到——说在这种原始语言内部，是人的欲望本身独力引入了全部方向和含义，并不绝对严谨。证据在于：归根结底，这一切之所以运作，机器输出的——请你们注意——只是我们对它所期待的东西；与其说是令我们感兴趣的结果，不如说是我们规定它停止、并在该处读出某项结果的位置。整个系统的基础已经在游戏之中。它如果不以这种方式奠立，又如何可能建立？既然它奠基于机会概念、某种纯粹期待的概念之上，而那已经是一种含义。

于是，符号以最为纯化的形式出现；在这种形式内部，已经可能产生不止是句法错误的东西，因为句法错误只会造成差错。我要说，程序错误产生的则不只是事故，而是虚假。在这个层面，真与假本身已经受到牵涉。

这对我们精神分析家意味着什么？向我们说话的人类主体的话语中，我们面对什么？我们面对的是一场不纯的话语。为什么不纯？只因为有句法错误吗？当然不是。精神分析的整个基础恰恰就在这里：从本身具有含义的人类话语中提取有效之物，并不是一道逻辑问题；有效之物处在话语背后，处在透过话语、在其象征功能中显现的某种东西里。

如今我们寻找“符号”的含义，另一个意义上的符号随之涌现；它是什么？控制论向我们显出一项宝贵事实：人类话语的象征功能中存在某种无法消除的东西，那就是想象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最初的符号、自然符号，源于若干占优势的意象：人体意象，太阳、月亮以及其他一些显眼对象的意象。我们知道，正是这一点赋予大部分人类语言以重量、动力和情感振动。

这种想象界同象征界是同质的吗？不是！精神分析却趋向于强加两者的同质性，把想象界界定为主体同一个优选且占优势的对象彼此配合；这正为当下精神分析中那个时髦术语——“对象关系”——提供模型。把精神分析还原为这些想象性主题在话语边界处的出现与凸显，以及主体同这些主题的配合，是一种从根本上歪曲精神分析意义的做法。

如果控制论凸显了某种东西，那就是这种彻底的象征秩序同想象秩序的区分。最近，一位控制论专家还向我承认，不管人们怎么说，要用控制论翻译格式塔功能——也就是一个良好形式本身同另一个良好形式的配合——仍然极其困难。生命自然中的良好形式，在象征界却是坏形式。

既然刚才谈过摆钟与帕斯卡，我要作一项简单评论：真正的等时摆钟之所以使惠更斯的制造成为一个历史日期，在于摆线的发现。

人们常说，人发明了轮子。轮子并不存在于自然中，但我们知道圆是一种良好形式。真正的差别是什么？是轮子不会在自然中滚动：

- 没有滚动的轮子；
- 没有一只轮子会在每次回转时铭写轮上某一点的轨迹；
- 想象界中没有摆线。

摆线是象征界的发现。它可以在控制论机器中产生；但若要通过两台机器的对话，使一个圆回应另一个圆，除非采取最为人工的方式，否则就会遇到天大的困难。这就是可以在这里得到凸显的根本真理；我们也由此区分两个对自己至关重要的平面：一边是这种想象界的惰性。它介入主体话语，搅乱话语，使我无法察觉：

- 当我希望某人好时，其实在希望他坏；
- 当我爱他时，爱的是我自己；
- 或者，当我以为自己爱自己时，恰恰在那一刻爱着另一个人。

想象界的这种纷乱，恰恰是精神分析的根本辩证练习；它使话语含义得到恢复。精神分析的两种根本方向正围绕它彼此区分。问题在于知道：象征界是否本身存在；还是可以说，象征界只是想象性配合的二阶幻想。精神分析的两个项与两种方向在这里作出选择。

很久以来，所有含义都已经穿过历史的历险，积累在语义的压舱物里。如果问题在于沿主体已经赋予自己话语的含义来追随他——所谓“已经赋予”，指他知道自己正在做精神分析：

- 而且精神分析已经给出了规范；
- 精神分析已经告诉他，必须做一个很乖的人；
- 也就是成为一个真正抵达本能成熟、走出那些由这个或那个孔口的根本意象主导之阶段与时期的人物。

问题在于知道：这种含义在主体已经卷入的普遍话语序列中是否重要，因而必须得到还原与纠正；还是问题在于使主体同这些根本意象彼此配合。精神分析所要做的，究竟是依照想象界进行规范化与矫正，还是在话语中解放含义？

各种方向与学派在这里分道扬镳。我相信可以这样说：弗洛伊德最大限度地具有这种对含义的感受，以至于他的某些作品读起来仿佛出自一位预言家。他拾取《三只匣子的主题》，在〔波西亚？〕这个人物中认出死亡；可以说，他受到某种属于诗性灵感秩序的东西引导。问题在于知道，精神分析是否将沿这个弗洛伊德式方向继续下去。这个方向越过语言，所寻找的并不是不可言说者，不是语言黏住或停止的界限和点，而是越过语言寻找含义。可含义意味着什么？

含义意味着：人类存在不是这门原初、原始语言的主人。他被抛入其中、卷入其中，并被齿轮咬合。我们不知道起源。人们告诉我们，在语言中，基数先于序数出现；这出乎意料。

如果按照人进入这场位置游戏的正常方式来设想：

- 那是队列行进的秩序；
- 是我刚才提到的舞蹈秩序，即原始舞蹈或世俗与宗教游行的秩序；
- 是先后次序的秩序；
- 是城邦组织借以形成意象的秩序，而城邦无非就是秩序与等级；

……那么，最终本应是序数先出现。但语言学家断言，基数出现得更早。

我们必须惊叹于这个悖论。人在这里并不是自己家中的主人；他整合进某种东西，而它已经通过自身组合的法则，规定了舞蹈的法则——人凭借这种舞蹈从自然秩序过渡到文化秩序。人们将使用同样的数学组合表进行分类和解释。

列维-斯特劳斯先生把它们称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然而，人们并不认为原始人曾经是帕斯卡。好吧，人早已以整个存在卷入这支队列——数的队列，或某种原始且根本的符号作用；它同那些想象性表象相区别。根本冲突正围绕这一点建立。

因为归根结底，人还必须在这一切之中使自己得到承认。然而，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的话的意义——那个必须使自己得到承认的东西没有得到表达，而是受到压抑。

如果这发生在机器里，它只会简单地掉落；只要没有准时到来，就不会要求任何东西，也不再参与解释机器的时序。对人来说，事情并不

一样，断句节奏是活的。于是，那个没有准时进入机器的东西仍然悬置，仍然受到压抑。问题正是它。

精神分析的意义如下：某种没有得到表达、因而并不存在，却始终在那里坚持并要求进入存在的东西。人同这一象征秩序的根本关系，准确地奠立了象征秩序本身：

- 那是从非存在到存在的秩序；
- 那个坚持要求得到满足、却只能在承认中得到满足的东西，就是非存在。这正是这种关系、人与符号作用之伟大历险的终点。

无论精神分析还是控制论，我们都不能把它同这一终点分开。这个终点，就是使非存在进入存在：它因为已经说话而存在。

第25课 · 1955年6月29日

首先，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只是序言，处于研讨班边缘；它只能是一段插话，因为我们不是来做经文阐释的。不过，它仍同我们的问题相关。在倒数第二次聚会中，我向你们提问，结果有成有败；那堂课在参与者心中产生了各种不同效果。我希望你们现在已经理解它对我的意义和功能：那是使我的乐器同上一次要告诉你们的内容彼此调音。我希望它不只服务于我，也服务了你们。

不过，有一点我记了下来，当时却没有停下来讨论；因为照事情推进的势头，如果我跟着你们走入那个领域，只会使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到离题。当你们告诉我，圣约翰第一节的 verbum 就是希伯来语 דבר〔davar〕时，究竟想对我说什么？你们凭什么这样说？这不是一个圈套。我一小时前重新想过，而我并不比你们更精通这个问题，甚至肯定懂得更少！所以不要慌张，请告诉我：为什么你们说 verbum 就是希伯来语 davar？《约翰福音》明明用希腊语写成，你们凭什么这样说？

X 先生——首先，我要说，有一项先验事实使我们这样想。

拉康——今天，我们来结清几笔小账。待会我还会告诉你们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X 先生——先谈含义。我不应该解释它的含义吗？

拉康——当然应该，我正希望如此。

X 先生——那么，您问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我先要说……

拉康

先谈语文学问题。圣约翰确实用希腊语写作，却不必用希腊语思考；他的 λόγος〔logos〕也可能是例如巴比伦的 λόγος。可是，您说他想的是希伯来语 דבר〔davar〕。请告诉我为什么？因为在希伯来语中，这终究不是表达它的唯一方式。

X 先生——表达什么？

拉康——恰恰表达那个构成 דבר〔davar〕之含义的东西。

X 先生

λόγος〔logos〕，对，这当然不是唯一理由。简要概括这个问题，我会这样说：《约翰福音》中找不到任何真正柏拉图式的概念。这是一个事实，我可以向您证明。有意思的是，一般而言，λόγος……

拉康

谁在同您谈柏拉图式概念？上一次，我最后停在这个 verbum 上，告诉你们 verbum 是圣热罗尼莫选用的词——如果我记得不错，正是他作了翻译……

X 先生——此前已经有译文了。

拉康

无关紧要。Verbum 这个词，我当时使之接近拉丁语用法；例如圣奥古斯丁在我们去年评论过的《论意指》中对它的使用，已经相当清楚地

向我们指明这一点。总的说来，我只是在提示一种公理学，它甚至先于 fiat，先于《创世记》的 fiat。我是在提出问题，并没有说这解决了问题。不过，在我上一次讲座之后，你们现在应该更能感到它蕴含的全部后果。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提出：verbum 也许先于一切言说，甚至先于创世的第一句话——in principio erat verbum。而您对此提出异议，说它是希伯来语 דבר〔davar〕。

X 先生

因为您说："起初有语言"，您是这样翻译的。勒克莱尔随即说："不是语言，而是言说……"

拉康——问题正是这一点。

X 先生——而我说，对，它非常明确地是"言说"，不是"语言"。

拉康

您从哪里得出 דבר〔davar〕？这里有两个问题：

相关知识卡 Logos、Verbum 与"道"

- 第一，圣约翰的 λόγος〔logos〕之下是 דבר〔davar〕；
- 第二，דבר〔davar〕意味着"言说"而非其他东西。请分别处理这两个问题。您为什么认为那里是 davar？

X 先生——有两个理由。第一，它显然是在暗中引用《创世记》的开篇。

拉康

《创世记》开篇的第三节正是 fiat lux：“Va’omer”。那里根本不是 דבר〔davar〕，而是 va’omer；甚至恰好相反。我正想把您带到这里。

相关知识卡 Logos、Verbum 与“道”

〔καὶ εἶπεν ὁ Θεός· γενηθήτω φῶς· καὶ ἐγένετο φῶς. Dixit que Deus fiat lux et facta est lux.

וַיֹּאמֶר אֱלֹהִים, יְהִי אוֹר; וַיְהִי-אוֹר.〕

X 先生——啊，不！不完全相反！

拉康——请向我解释为什么。

X 先生

有一种拉比传统，把《创世记》第三节略微实体化成了某种实体——如果您愿意，可以说它处在创造者与受造物之间，作为中介；它就是言说，正如另有智慧。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整个圣经传统中……

我先稍微解释含义，这样更容易说明为什么我也依照这个方向解释圣约翰。

……完全缺少 ratio 概念，也缺少希腊意义上的 λὸγος。

布尔特曼通过非常深入的分析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圣经传统中不存在宇宙概念。他们没有那种对一个规定好了的世界的感觉——在这个世界中，一切事物依照某种决定论发生；他们完全没有固定、确定而

使一切彼此衔接的法则概念。说到底，这才是希腊 λόγος 概念真正的含义：世界的合理性；世界被看作一个整体，一切都以彼此衔接、合乎逻辑的方式发生。亚里士多德哲学及其四因也由此形成；四因应当说明甚至运动如何也能被还原为确定的静态秩序。例如，希伯来人总是以“万物的总和”或“天地”等说法代替宇宙，却从不具有这个理性概念。他们不在静态、实体主义的概念中思考；这种东西不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中。

拉康

听完我的讲座以后，您难道认为，当我谈到一种彻底的象征秩序、位置游戏、最初猜想以及这场先于决定论、先于一切合理化宇宙概念的原初猜想游戏——可以说，是理性尚未同实在联结以前的理性——时，我瞄准的是那个吗？难道我指的是四因、充足理由律以及所有那一大套排场？

X　先生——可如果您说“起初有语言”，那就像把当前的合理性向后投射。

拉康——不是我要这样说。那不是我，是圣约翰。

X 先生——不，他没这样说。

拉康

贝尔纳尔神父，您过来一下，因为我们正在试着拆解〔……〕的语文学构成。说闪米特人在根本上没有形成一个像“O”这样封闭的宇宙概念

——如果你们愿意，棍棒的一画为它作了准备，而亚里士多德给了我们一套完全封闭的系统——这一点我同意！

X 先生

它在根本上处于运动中，没有理性法则。例如，自然中发生的事情，是上帝的言说在自然中回响。这也许表明——如果可以这样说——它是一个泛灵论宇宙；不过无关紧要！这是一个根本上未被规定、不合理的宇宙，一个历史性宇宙；一切都在其中通过个人的主动行动发生。

拉康——对。但首先，只要它由言说调制，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合理。

X 先生——我会说：它不是实体主义的。

拉康——我想走向的是这一点……您怎么看，贝尔纳尔神父？

贝尔纳尔先生——我和所有人一样学过圣经。

拉康

前几天，X 先生向我提出圣约翰 λόγος 背后有希伯来语 דבר〔davar〕。这是你们受教的说法吗？

X 先生〔对贝尔纳尔先生〕——例如布尔特曼等人非常深入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

拉康——您知道一个叫伯内特的人做过什么吗？

X 先生——知道。

拉康

他非常仔细地研究过《约翰福音》第一节。我建议你们读一读这项研究。自从您向我提出异议，我一直没能重新找到它；但我清楚记得，至少清楚记得他的结论。他说，在圣约翰的 λόγος 背后，应当设想阿拉姆语 memra。

相关知识卡 Logos、Verbum 与“道”

X 先生——那同希伯来语 דבר〔davar〕是一回事；正如我告诉您的，那就是略微被拉比传统实体化的 davar。

拉康——您说“拉比传统的”是什么意思？问题不在那里。

X 先生

也就是说，有几样东西共同导向第一节：

- 无疑有《创世记》的创造传统；
- 接着还有拉比思想对它稍加解释的倾向……

拉康

无论如何，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Memra 同 va'omer 更接近——它们是同一个词根——它比 davar 更接近《创世记》第一节的 va'omer。听着，我告诉你们一小时前在《格泽尼乌斯词典》中查到的 davar 含义：它更接近 duxit, locutus est，即完全具身的祈使意义，甚至可以译为 insidiatus est。

X 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

拉康

《格泽尼乌斯词典》里就是这样写的，也就是诱入、勾引。总之，它恰恰蕴含这一视角中所有歪斜、损坏、偏离、转向与根本腐化的东西——任何言说降入原—时间性层面时都会如此。无论如何，דבר〔davar〕在〔……〕中得到见证；它始终既极其有限、精确，又归根结底是 insidiatus est，即其中诱骗、欺瞒的一面。

X 先生——才不是！并不总是如此！

拉康——相对于 memra，这是言说最易消逝的性质。

X 先生

不。例如，雷霆就是上帝的言说，而且不是在易消逝的意义上；这一点非常清楚。不，不！那是派生义，最初的含义并非如此。

拉康——可这向您显示了它会向哪里派生。

X 先生——它当然可以派生，可以派生……

拉康——有明确文献见证。

X　先生——也见证这种含义存在？当然！但同时存在并不能证明任何事情！

拉康

但它终究使以下问题保持悬而未决……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能够把这个 דבר〔davar〕同圣约翰希腊文本中 λὸγος 的用法相认同；让我们说，这种用法确实成问题，因为大家似乎很执着于它。

相关知识卡 Logos、Verbum 与“道”

X 先生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必须排除 λὸγος 的柏拉图式含义，因为它在其他所有地方都完全缺席。

拉康——可我瞄准的并不是它。

X 先生——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译成语言。

拉康

至于这里所涉的 λὸγος——我认为不能忽视拉丁语 verbum 所赋予的转折——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成不同于事物之理的另一种东西。恰恰是这种缺席与在场的游戏绝对原初，以至于已经为 fiat 本身提供了框架。归根结底，“fiat”发生在尚未做成、绝对先于一切 fiat 的背景上。换句话说，我相信并非无法设想：同一个 fiat 仍是一种次生之物，即使它就是言说，就是最原初的创造性言说。

X 先生

对。但我要说，我们在那里站到历史时间秩序的开端，却没有像您暗示的那样越到它以外。那是某种缺席之物。

拉康

每当人们说“在开端”、in principio 时，只要问题涉及言说，就会踏在某种完全神秘的东西上。我也曾向你们指出，这个 in principio 确实具有幻象性质；它不可能是丹尼尔·冯·切普科那首二行诗所表示的同一种想象性回溯。我当时为此引用了它：“上帝创造这一切之前，谁在那里？我！”这确实清楚显示出幻象性质。

X 先生——我不太明白您现在想说什么。

拉康

也就是说，事物一旦在某种想象性直观中得到结构化，就显得从来就在那里；人们甚至无法以其他方式感觉它们。但那当然是一种幻象！您的异议正在这里：您说这个已经构成的世界仿佛向后投射到一种构成它的模型或原型中。但那根本不必是原型；这种向一个作为凝缩之原型的回溯，在这里受到排除。

X 先生——完全受到排除。

拉康

在我教给你们的东西中，它完全受到排除。如果柏拉图式 λόγος 类似某种东西，那就是永恒理念。可我上次谈到某种语言时，说的并不是它！

X 先生——我一直把同言说相对立的语言理解成这种凝缩，理解成一切存在之物的本质。

拉康——我试着让你们听见的是“语言”一词的另一种含义。

X 先生——啊！

拉康

它恰恰是某种能够被还原为缺席与在场之序列的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缺席为背景的在场与因在场可能存在而构成的缺席之间永恒的同时性。因为归根结底，实在中并没有缺席。只有当你们提示某个地方原本可能有一种在场，而那里实际没有时，缺席才存在；它因而是完全处于实在秩序以外的东西。我当时瞄准的就是它。在“In principio”中，言词可以作为创造这项对立、这项反差的东西。任何“非”、任何矛盾同 0 与 1 的这项原初矛盾相比，都已经过于特殊化。

X 先生——那么，它同言说如何对立？

拉康

可以说，它为言说提供了某种彻底的条件。您看见我的意思了吗？

X 先生

对，但我觉得在这种条件中，您同样可以说“言说”而不是“语言”。它远远越出了这项对立！

拉康

完全正确！但这正是我想向你们指出的：在 hammer、hommer 或 memra 中……问题涉及的是这种——如果可以说——主导词，而不是 דבר〔davar〕那种界域；后者可以说具有律法主义的方向。

X 先生——哦！

拉康——您回家后再查一遍《格泽尼乌斯词典》吧。

X 先生

但我研究过所有这些文本，因为〔……〕有一篇长文汇集了一切可能的文本。它并不朝这个方向走；我觉得它比《格泽尼乌斯词典》更加细腻。后者确实显示您所说的“阴险”含义。

拉康——דבר〔davar〕能够一路转折到 insidiatus est，正指出它弯曲到了何种程度。

X 先生——它可以转折，对！就像言说可以变成闲聊一样。

贝尔纳尔先生——法语 parole 也一样；“他在说话”，意思就是他什么也没做。

拉康——不完全如此，因为 דבר〔davar〕根本不朝空洞的方向走。

X 先生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有一段话：“上帝的言说降到大地，又像受孕般重新升起。”因此，这里显然是创造性言说的含义，不是阴险言说；它对应于稍被实体化的阿拉姆语 memra，即充满生命力的言说。

拉康

您认为这就是阿拉姆语 memra 的含义？您以为这种言说同生命有一丝妥协吗？我们在这里处于死本能的层面。

X 先生

它来自这种思辨倾向：试着理解说话者同他所产生之物之间有什么中介。这个中介必定具有某种坚实性；如果您愿意，这就是希伯来思想中一种思辨倾向的开端。

拉康——什么，דבר〔davar〕吗？

X 先生——Memra……

拉康——您真这样认为？

X 先生

对。这是拉比传统对“智慧”和若干其他东西所作的同一种实体化；后来，你们在〔……〕那里重新找到它，后者试着以这种实体化为中介，同柏拉图式 λὸγος 建立联结。

贝尔纳尔先生——Memra 是在哪个时期出现的？

X 先生——大概是三世纪。

拉康

在我告诉你们的文章中，伯内特通过各种明显相互印证的材料向我们显示并凸显：圣约翰用阿拉姆语思考。

X 先生——而且……

贝尔纳尔先生——这是确定的。

X　先生——甚至非常可疑的是，他是否了解过〔……〕传统中的任何东西。

拉康

对。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在这里引入它，因为您所谓的拉比传统，是它向诺斯替主义的转折。

X 先生

对，它后来可以变成诺斯替主义，显然为诺斯替思想提供抓手，但本身还不是诺斯替主义。它在根本上是一种律法主义思想，试着固定一切、编码一切。

拉康——您不认为 דבר〔davar〕更接近这一点吗?

X 先生——不，是 memra。

拉康

今天，我将再次“犯错”，也希望你们同样再犯一次，而且比上次更成功。依照我们上次相遇的进行方式，我已经决意重申：我不是在向你们作一种教席式教学。

说实话，如果你们中仍有人怀疑这一点，我认为给你们带来某种已经做好、以绝对确证方式断言、只须记下来再塞进口袋的东西，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对象，因为我们讨论的正是语言与言说。当然，随着事情推进，我们口袋里的语言越来越多；即使它溢进脑子，也不会带来多大差别。人们随时可以拿手帕盖在上面。

相反，我相信，如果一切话语背后都有真实言说，它在根本上就由如下事实构成：它是你们的言说，是听众的言说，同属于我的言说一样多，甚至更多。精神分析中的这个问题，在整个精神分析沟通中都绝对、持久地在场；因此，理论教学若不参与这种创造性沟通，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也就是说，我确实可以合理地像上次那样向你们提出要求——说实话，我起初并没有直接这样做。我请你们向我提问；问题看来略显单薄，我就提出某个主题，问你们如何理解我试图接近的语言与言说问题。此后，确实形成了一些有效异议。它们在解释途中停下，甚至一度造成某种混乱，却从来不具有任何令人气馁的性质；那只意味着分析仍在进行。

此后，我又提出了一些看法；在我看来，它们足以使倒数第二次对话中所涉之物再向前一步。因此，今天我再次问你们，是否有问题要向我提出。

也就是说，我所作的那场讲座……

- 只要它可以被视为全年工作已经开启之一切的某种辩证尖端；

全年工作；

- 只要它仍给你们留下一些敞开的问题，某些要点要求得到澄清；

……好吧，我把发言权交给你们，请愿意的人向我提问。

今天，我再次请他们冒险，冒险进入这种未知、这片不知的区域；在精神分析经验中，我们绝不能忘记，这正是自己的原则位置。若要用

斩截的说法表达，并略微玩弄词语，我会说：如果把精神分析理论做成这样一种东西——由我建造并交给你们，你们拿着它离开——那就真的可以这样说：对于这种构想，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你们也可以赋予这句话完整的意义。

归根结底，无论它更特别地属于原型与柏拉图式秩序——你们知道，我对此保留全部意见——还是仅仅是这句完全原初的言说、这种含混语言，由它使象征界涌现；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同这句话语的关系，正是要在最完整意义上构想它。当然，要构想它——我们毕竟从未有一刻认为一切都已经写好——事情相当成问题，因为它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

正如勒费弗尔-蓬塔利斯先生前几天指出的，如果没有思维主体，就会什么也没有。正因为如此，要有新的东西，显然必须存在无知。我们就处在这个位置，并因此构想某种东西；当我们已经知道某种东西时，就再也不会孕育任何东西。

谁来发言？看起来受到神灵造访的马尔尚先生？

马尔尚先生

此刻造访我的神灵，反而使我抗议这种挤出问题的做法。因为，我们会从中取得什么益处？

拉康

我上一次讲座中，也许有某个话语转折对你们来说过于陡峭，受到回避、缩减或遗忘，使你们无法把前后衔接起来。

马尔尚先生

如果可以这样说，我是在高得多的层面提出异议。几个月来，我们在这里听一场研讨班，每个人都从中取走自己所能取得的东西。如果提出问题，我们总会倾向于把它拉回更坚实的层面——如果可以这样说——以及其中附带的全部坏处；这样就会把它拉回一些我们自以为能够使用的概念，可问题恰恰在于让自己略微悬置。

拉康

但另一方面，事情终究就是以这种方式抵达结果。也就是说，你们毕竟很注意让自己在一个已经完全概念化的世界、一种实践和技术中移动。问题在于知道这一点占有什么位置，重新找到透视。

马尔尚先生

我觉得很难围绕一场我们刚刚听过、还来不及思考的讲座，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

拉康

前几天离开时，您觉得我们最后一次聚会可以富有成果地用于提问。

马尔尚先生——提出问题的不是我。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我有一个关于您讲座的问题。比如，您谈到三角性概念，以及它能否被控制论机器认出。那么是否可以说，在您看来，这个概念在思想阐发中属于想象秩序，还是象征秩序？

既然您刚才谈到无知，我就想到库萨的尼古拉；他在《有学问的无知》第一部分，对三角性概念作了形式性的概念分析，而且在我看来把它同符号联系起来。那么，控制论在是否认出三角形这种形式、以及由此阐发三角性方面所引入的东西，是否使我们能够……

拉康

我想，您指的是我谈到的特殊困难：要在这个词的符号性意义上形式化某些格式塔、某些良好形式，格外困难。不过，我采用的例子不是三角形，而是圆。两者并不一样！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我的问题指的是：控制论机器会依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认出或认不出一种形式，朝它定向或不朝它定向。例如，如果它按照透视变形把圆感知成椭圆——我只是在打比方——它就会认出或不认出这个形式。

因此，在您的思想中，这蕴含同圆性或三角性概念本身相关的问题。于是，我和其他人都产生了混乱：我们不再知道，在您看来，这些实验中的圆性或三角性概念属于象征秩序还是想象秩序。

拉康

一切直观都远比接近象征界更接近想象界。这是一个每时每刻都确实存在的问题；而如今的数学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要尽可能彻底地消除一切直观要素。在数学符号体系的发展中，直观要素被视为一种杂质。我想里盖不会反驳我。但这并不是说，数学家已经充分成功，也不是说他们最终不再为直观保留创造性价值与源泉价值，更不是说他们认为问题已经解决。有些数学家终究仍然赋予直观一种无法消除的价值。

不过，数学中仍然存在这种把一切还原、能够把一切还原到数学公理的愿望；仅此一点就证明这是一种趋势，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始终在它面前。至于您告诉我的机器问题，我相信机器当然不能裁决它。但请观察：每当我们试着使一台机器能够认出良好形式本身、无视全部透视畸变时，会发生什么？在直观中，这是一项极其简单的行动；格式塔理论的意思正在这里——良好形式在想象中作为最简单的东西被给予，各种格式塔始终趋向于被还原到它。可在机器中，我们从不凭类似的简单性产生效应；那里总要经过最极端、并且在这个秩序中最人工的组合。也就是机器对空间逐点进行扫掠、所谓扫描（scanning），再用相应而变得极其复杂的公式，重构机器对某种特殊形式的所谓“敏感性”。换句话说，良好形式并不会为机器提供最简单的公式。你们跟上了吗？经验已经在这里相当充分地显示出想象界与实在这两个坡面的对立。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我的问题表达得不好。您提到的数学起源争论——直观主义者、非直观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无疑很有意思，也由来已久，

但它处在我所提问题的旁侧。因为我的问题关乎概念，而不是对三角形或圆的感知。我瞄准的是例如三角性这个概念本身的阐发结果。

拉康

那么，对于三角性概念，我们可以重新拿起您提到的文本。今年，我在谈论极大值与极小值时重读过其中一部分。我已经不太记得库萨的尼古拉如何处理三角形问题。我认为，对他而言，与其说问题在三角形，不如说在三元；问题更涉及某种同我通过第三项之中介所提出之物相联的东西，而不是三角形本身。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我并不特别以他为参照。看来，无论数学家采取直观主义还是非直观主义立场，三角性概念都只可能是符号性的。

拉康——毫无疑问。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这时便产生一个问题：控制论机器本应认出这种三角性，可它没有做到。因此，您似乎倾向于说，三角性实际上属于想象秩序。

拉康——绝对不是！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我当时就是这样理解的。

拉康——说机器“认出”，必须赋予这件事一个更加成问题的意义。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行为意义上的。

拉康

可这样一来，您所说的三角性可以说就是机器本身的结构。机器正是从这里涌现：如果我们有 0 和 1，还会有某种后继之物。这种 0 与 1 的独立性、符号生成以及在场—缺席涵义开始运转，只有从一个恰恰是最终项的序列出发，才能建立。

它绝对无法在〔……〕中维持。我在黑板上给你们的那些最简单的东西——指出所有可能组合，向你们展示所谓逻辑乘积、逻辑加法或模 2 加法——始终包含三列：

- 人们约定，在某一组运算中，0 和 1 得 1；
- 在另一组运算中，0 和 1 得 0；这还蕴含 0 与 0 运算的结果；
- 这个结果又可能依照不同运算〔……〕而不同，正如 0 与 1、1 与 1 将得到什么。

换句话说，三元性不仅在场，而且对机器本身的结构绝对根本、必不可少。按照我向你们解释的内容，当然很清楚，问题并不在机械仪式本身，而原则本身就是符号性的。毫无疑问，我更愿意使用“三元性”而不是您的“三角性”，后者终究很容易引出一个意象……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因为我谈的不是三元性，而是三角性。您说的是组织和构造的三元性；我说的不是它，而是三角形本身，也就是三角形的三角性概念，不是三元性。您明白吗？

拉康——您是说作为形式的三角形？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如果这个概念像人们、也像我所相信的那样属于象征秩序，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不能建造一台控制论机器——既然它属于象征秩序——在任何情况下都认出三角形的形式。

拉康——恰恰因为它属于想象秩序。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那么，它不属于象征秩序。

拉康——真正在机器中达到最低限度的是三元功能。

雅克·里盖

对。由此可以稍加概括这个问题：机器能否在另一台机器中认出某种三元关系？答案是可以。

拉康

至于机器能否在一切情况下认出三角形，在我看来也许并非不可能——尽管问题确实尚未解决。但三角形本身已经属于高度符号化的形式秩序，因为自然中没有三角形。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我们既然可以谈论概念，就可以假定这个问题也许能够解决。如果形式识别问题无解，则会使人认为有关三角性的概念并非完全属于象征秩序，而且也属于想象秩序。

拉康——对。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这时，我们不能不提到具体概念。看来，我们在数学概念的概念化上并没有前进多少；我们仍然会是直观主义者，不存在数学概念，只有经过阐发的具体概念。这同公理学研究相矛盾。公理学似乎至少消除了大部分直观的具体概念；只剩一点残余，而有些人甚至说根本没有残余。这里有一个问题。

拉康——您的意思是，其中可以留下任意大的余地。问题仍然敞开。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

对，正如您自己说，三角形并不存在于自然中。那么，这种直观是什么？它不再是具体概念。具体概念不是这种东西；它是从现存形式出发的阐发。而这里是一个概念，是符号性的。

拉康——对。

雅克·里盖

在近期的公理学研究中，三角形是某种符号性之物，因为三角形就是某种关系。

拉康——对。它可以表达这种关系，被完全还原为某种关系。

雅克·里盖——点与直线之间的一种关联关系。

拉康——因此，归根结底，机器应当能够认出它？

雅克·里盖

对。但必须极其精确地界定论域，界定我们能够考虑的一切形式之宇宙；然后请机器在其中认出某个界定良好的形式。

拉康——对。实际上，是先对形式作出一项已经完成的符号性还原——而那已经是机器的工作——随后才请具体、实在的机器进行操作。

马尔尚先生——这里涉及的是描述。

拉康——不，我不这样认为。

雅克·里盖

这是一种对关系的描述：您强加给这个关联关系若干性质，却不逐一枚举它们。这是一种非枚举式描述，因为您不列出所考察的全部直线和点，而是列出自然中的全部点与直线。

想象界正是在这里介入。

马尔尚先生——问题是：您把这个概念安置在哪里，安置在哪个领域？

雅克·里盖

如果不把自己置于一套界定良好的公理学框架中，它就没有多大用处。我刚才谈到直线上的关联，但基本几何学还有其他公理化方式。

奥克塔夫·曼诺尼

人确实可以以图式方式构成三角形，甚至可以不知道自己谈的是三角形而构成它。可我们如何察觉它是三角形？这是中心问题。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画出的三角形……

这里存在一个象征界与想象界关系的问题，非常晦暗。

拉康——对。如果可以这样说，是从反方向把握。

奥克塔夫·曼诺尼——对，反过来。

雅克·里盖

当您就纸上画出的三角形进行推理时，便积累若干性质；它们在您考察的公理模型中具有对应项。

奥克塔夫·曼诺尼——那么，您说的是两门能够彼此翻译的语言。

拉康——毫无疑问。

奥克塔夫·曼诺尼——那么，想象界已经是语言、已经是符号性的。这里有两个平面。

拉康

具身于一门人类语言中的人类语言，由一些经过选择的意象构成，这一点毋庸置疑；这些意象全都同人类存在的活生生生存、同其生物现实的一个相当狭窄区域具有某种关系。精神分析的实践发现、所积累知识中最可用的部分，就在于同类意象相对于一种严格属于人类生存

的张力，具有优选而特殊的性质；它在一种不可还原地属于想象界的经验中被给予。

它为任何具体语言压舱、赋予重量，也同时为任何言语交换加载某种使之成为人类语言的东西——这里的“人类”取最平实、最普通的意义，如果我没弄错，就是英语 human 的意义。它使任何人类语言都承载这种根本上的想象性经验。

正因为如此，它可能成为某种符号实现之进展的障碍。我们无法不看见这种符号实现的纯粹功能以千百种方式在人类生活中显现；所谓纯粹，指它在根本上只能由在场与缺席——如果你们愿意，也就是存在与非存在——来标示。正因为如此，我们总会遇见一种阻抗，阻碍这部符号交换的完整文本可以说恢复原状。

这部文本永远被这些意象所使用的术语阻挡、切碎和中断。从一种低层次的必然性来看，可以说这“必然”发生：我们是具身的存在者，始终通过某种想象性中介来思考。仅凭这一点，这些意象就牵扯、阻拦、堵塞、搅乱并混淆严格属于符号中介的东西。

奥克塔夫·曼诺尼

令我困扰的是：我觉得这层想象性衬里不只切碎、摧毁符号语言，还滋养它，是它不可或缺的养料。语言若完全失去这种养料，就会变成机器，也就是变成不再属于人的东西。

拉康

可这里不谈感受。不要告诉自己机器非常邪恶，妨碍我们的生存，或我们成了机器主义的对象。问题不在那里，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机器，归根结底只是一连串小小的 0 和 1；它是否属于人，这个问题显然早已解决——它不属于人。只是，我们还要知道，您所说的那种“人的东西”，究竟有多么属于人。

奥克塔夫·曼诺尼——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拉康

无论如何，关于这一点，人文主义这个历史概念——我不会围绕它再开一次研讨班——在我看来已经背负了足够沉重的历史，使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种现象，视为我们仍轻率地称作“人类”的某个完全可以定位的历史领域所实现的特定立场。因此，至于象征秩序，我们不必惊讶：自己面对的东西绝对不可还原为通常所谓“人类经验”本身。

你们告诉我，如果它不具身于这种想象，就无疑什么也不存在；对此我们不怀疑。问题恰恰在于：它的全部根是否都在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们这样说。单是关于整数经验推导的问题——这种推导不仅根本没有完成，而且看来甚至已经被证明不可能完成——就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最后，为试着把这一切收拢成一张小型概括图式，我只想评论我们今年所研究的一篇弗洛伊德文本：即《超越快乐原则》第三章开头〔快乐原则与情感转移〕。弗洛伊德在那里讲述已经发生之事的演变史，并由此走向《超越快乐原则》的问题。在告别以前，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请你们注意其中几个段落；它们可以说具有决定性、绝对根本，而且你们会看到，正位于我们本年度教学的核心。

他解释精神分析进展经过的各个阶段，并以典范般的清晰性加以区分，使这篇文本无比明亮。你们每个人都应该把一份抄本装进口袋，随时参照。他首先说：

“我们曾经试图通过给出症状的意义来解除症状。”

人们发现，这种方法终究带来若干结果、几道亮光、一些澄明，甚至产生一些效果。

贝尔纳尔先生——为什么？

拉康

理由绝对彻底：如果精神分析发现确有某种意义——也就是我教给你们的东西；换句话说，我的教学无非是在表达弗洛伊德最初所说之物何以可能的条件，也就是回答您的“为什么”——那是因为症状本身自始至终都是意指，也就是真理。它是真理；而作为症状，它已经是得到成形的真理。它作为真理不同于自然指标，因为它已经依照所指与能指得到结构化，并带有其中蕴含的一切——也就是一场能指游戏。

一种互补关系由此建立：如果在这个症状和这个患者那里，某物“意指”某物，那么另一个因这个意指已经取得其位置而被放弃的东西，就会意指别的东西。在症状的具体给定本身内部，已经发生了向能指材料中的一次骤然凝结。症状是一场话语的背面。

贝尔纳尔先生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此刻直接把它告诉患者会产生效果？”

拉康

把这一点告诉患者，准确地说，是在它使患者产生 Überzeugung——这是弗洛伊德在这段话中使用的术语，也就是确信——的限度内治愈他。文本的整个后续严格说来无非意味着：主体把你们此刻作为解释交给他的东西，整合进他已经接受的全部意指之中。

这可能以点状方式发生，也可能采取我们有时在野蛮分析中观察到的形式；野蛮分析并非总是毫无效果，但显然远不是普遍有效。正因为如此，我们进入第二阶段，要求并承认这种向想象界整合的必要性。仅仅理解意指还不够，严格说来，还必须涌现回忆；也就是必须进入想象界，患者必须把它重新整合进某种东西——归根结底，就是被称作自我的全部想象性内容——把它作为属于自己的东西来承担。此时，意指序列重新把他整合进自身传记。这是第二阶段。

我目前正在追随《精神分析论文集》所收《超越快乐原则》第三章开头的文本。

第三阶段，人们发现即使这也不够；已经以某种方式结构在想象界中的东西，恰恰具有其特有的惰性。文本此时继续写道：

> “在这些努力中，主要重心落在患者的阻抗上。此时的技艺在于尽快揭露这些阻抗，把它们展示给患者，并通过人的影响——这里为作为‘转移’发挥作用的暗示留下位置——推动他放弃阻抗。然而，随后越来越清楚的是，即使沿这条道路，也无法完全抵达既定目标，即使无意识成为意识。患者无法回忆自己身上全部被压抑之物，或许恰恰无法回忆最根本的部分；因此，他不能确信人们传达给他的构造是正确的。”〔参见 Payot 版，第 21 页〕

文本后续对此加以强调。必须像我一样读它，也就是读德语《超越快乐原则》；因为法文文本实在像一种……这同译者的技艺有关，它有一种灰蒙蒙、粉扑扑的样子，使人无法看见弗洛伊德在这一段带来的剧烈起伏。

弗洛伊德强调：即使阻抗已经得到还原，仍有一种残余；正如他刚才说明的，这就是人们所能取得之物的界限。而这种残余，他说，或许正是根本。

> 患者更确切地说，被迫把被压抑之物作为当前体验来重复，而不是像医生更愿意看到的那样，把它作为过去的一部分来回忆。这种以不受欢迎的忠实性出现的再现，始终以婴儿性性生活的一部分——因而以俄狄浦斯情结及其衍生物——为内容，并且照例发生在转移领域，也就是同医生的关系中。治疗一旦推进到这里，我们便可以说，从前的神经症已经被一种新的转移神经症取代。医生努力尽可能限制这种转移神经症的范围，尽可能把更多内容推入回忆，只允许尽可能少的内容进入重复。回忆与再现之间建立的比例因病例而异。一般而言，医生无法替被分析者免去治疗的这个阶段；他必须让患者重新体验一段被遗忘的生活，同时设法保持一定的优势，使这种表面现实仍能不断被认作被遗忘过去的映照。若能成功，患者的确信以及依赖这种确信的治疗效果便得以取得。

他在这里引入重复、wiederholen 的概念。这种重复意味着什么？

> 要使神经症患者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显现的“重复强迫”（Wiederholungszwang）更容易理解，首先必须摆脱一种错误：以

> 为对抗阻抗时，面对的是无意识的阻抗。无意识——也就是“被压抑者”——根本不对治疗努力施加任何阻抗；它本身所追求的无非是顶着压在自己身上的力量，突破进入意识，或通过实在行动得到释放。治疗中的阻抗来自精神生活中那些当初实行压抑的较高层次和系统。不过，正如经验显示，阻抗的动机乃至阻抗本身，在治疗开始时也是无意识的；这提醒我们纠正表达方式中的不妥。若不再把意识与无意识彼此对立，而把连贯的自我同被压抑者彼此对立，就能避开含混。自我的许多部分本身无疑是无意识的，尤其是可以称作自我核心的部分；只有一小部分被我们冠以“前意识”之名。把纯粹描述性的表达替换为系统性或动力性的表达以后，我们便可以说，被分析者的阻抗来自其自我；也随即把握到，重复强迫必须归于无意识的被压抑者。它大概只有在治疗的迎向工作松动压抑以后，才可能显现。

弗洛伊德说，重复的根本正在这里——他在文本中明确断言：在被压抑者、无意识这一边，只有重复的倾向；被压抑者这一边不存在任何阻抗。恰恰在同一篇文本中，他还会以决定性方式强调自己在新局部论中带来的新颖与原创之处：它具有双重重音。一方面，自我具有一种无意识功能；也就是说，单纯的“无意识 / 意识”性质标注并不是根本出发点。分界线准确地划在两者之间：一边是受到压抑并趋向重复之物；而趋向重复的被压抑者，恰恰就是我向你们谈到的这种符号调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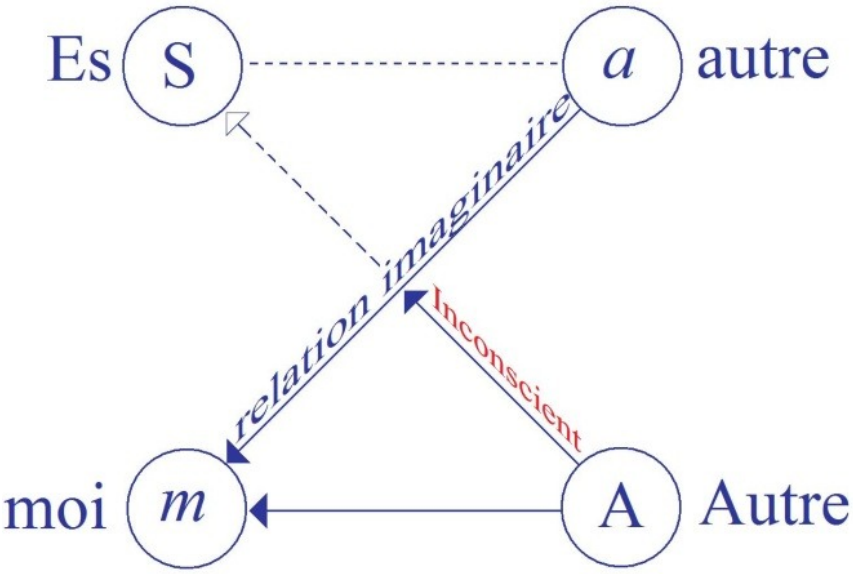
恰恰因为分割并不经过无意识与意识之间，而是经过：

- 某种只趋向重复的东西，也就是这句坚持不息的言说；
- 以及某种对它造成阻碍、可以是有意识也可以是无意识、并以另一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东西——也就是自我。如果你们带着我想自己已经使你们习惯的那些概念追随这篇文本，自我就会严格同想象界的秩序重合。

弗洛伊德强调，一切作为阻抗的东西，只来自并且就其本身来自这一秩序。因此，如果你们愿意，在告别以前，我们必须加上标点；总要在某处清楚落下句点，画出一张可以供你们定向的方位表。

我要重新拾起那四个极；我曾不止一次把它们写在黑板上并展开。

先从 A 开始，它是彻底的大他者。我讲得快一些，你们自己决定如何使用。它是大他者本身，彻底的大他者，作为他者的大他者，也就是《巴门尼德篇》第八或第九个假设中的大他者；它同样是最彻底意义上的实在，是主体关系中的实在一极；而且同样——我们最后还会回到这里——是弗洛伊德用来联结死本能关系的那个位置。所有这些都处在这张标作 A 的图式中。



- 接着这里有 m，即自我；
- 这里有 a，即他者；它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他者，而是本质上同自我配对、始终处在反射性、可互换关系中的他者；正是通过它，ego 始终是一个 alter ego；
- 这里还有 S，它既是主体，又是符号，也是 Es（本我）；只要主体的符号实现始终是符号创造与言说关系，它就是这种实现所涉及的东西。

这是一种从 A 走向 S 的关系。〔S ← a ← m ← A〕它潜藏在下方，属于无意识，并且对一切主体情境本身都至关重要；问题涉及实在的符号化。显然，这并不是从某种绝对孤立的主体出发。一切只会发生在某种〔……〕中，因此，自从世界上有人并且他们说话以来，全部事情

都同象征秩序的传递和构成相联。那个得到传递、趋向构成的东西，就是一则巨大讯息；整个实在通过它逐渐被重新运送、重新创造和重新制作，进入一种趋向于等同宇宙的符号化。人与作为这样的主体，则是其中的中继与承载者。

而我们此刻所做，是在其中一个配对的层面作出切分。如果不从以下一点出发，任何东西都无法理解；弗洛伊德的全部作品自始至终都向你们提醒并教导它。取他寄给弗利斯的那些小手稿中心理装置、心灵的图式来看，人们也许会以为他只是在一种可称为科学主义符号体系的东西中将其形式化，但它远不止于此。

你们还会在《梦的科学》结尾重新找到它。弗洛伊德所带来的根本之处、他的观念、尖锐点、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东西，也是他在第七章——或第七部分，关于心理过程的部分——主要强调、用来解释整个梦理论的东西，就是：意识功能与无意识功能之间确实存在对立。这个出发点是否正确并不重要；我们正在评论弗洛伊德。为了说明他面对的具体主体、他的患者身上发生的一切，为了理解他向其中带来新秩序的精神生活领域，这个出发点在他看来不可或缺：在纯粹意识层面发生的东西，本身会立刻被完全抹去。

必须设想：如果世界的倒影——即意识——发生在某个皮层层面，那么要使它能够运作，就不能留下痕迹；痕迹发生在别处。后来那些使用得如此糟糕的“深度”术语及其荒谬之处，便从这里出发；我想，弗洛伊德原本可以避开它们。这意味着，归根结底，活着的存在者只能

记录和接收它能够接收的东西，也就是它已经被构造来接收的东西。更准确地说，它的记忆与功能更主要地用来：

- 不接收；
- 不去看见那些对它的生物现实而言无需看见的东西；
- 对那些在生物学上无法感受的东西充耳不闻。人的问题，恰恰从这些条件开始显现。

人类存在如何越出对自己而言在生物学上自然的实在？也就是说，为什么人类存在不同于一切动物机器？动物严格铆定于外部环境条件；如果它们发生变化，也只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限度内，而且当然只是追随环境变化。大多数动物物种最特殊的性质，正是不愿知道任何扰乱自己的东西——宁可死掉！况且，它们正因此而死，我们也因此显得强大！人们还会设想一些格外原始、开放、敏感的物种；我们总在各个〔……〕科的起源处找到它们。它们仿佛是“物种之物种”，尚未规定，能够从外部环境接收一个无非就是其形态的新印记。

因为，如果活着的存在者保持某种形式……

至少弗洛伊德的灵感会这样说；他正因此不是神秘主义者，因为他不相信

生命中存在本身原初的形态生成力……

……那就要始终标示一种严格关联：类型与形式绝对同外部环境中的一项选择相联系；一边是表面，另一边就是背面，或者反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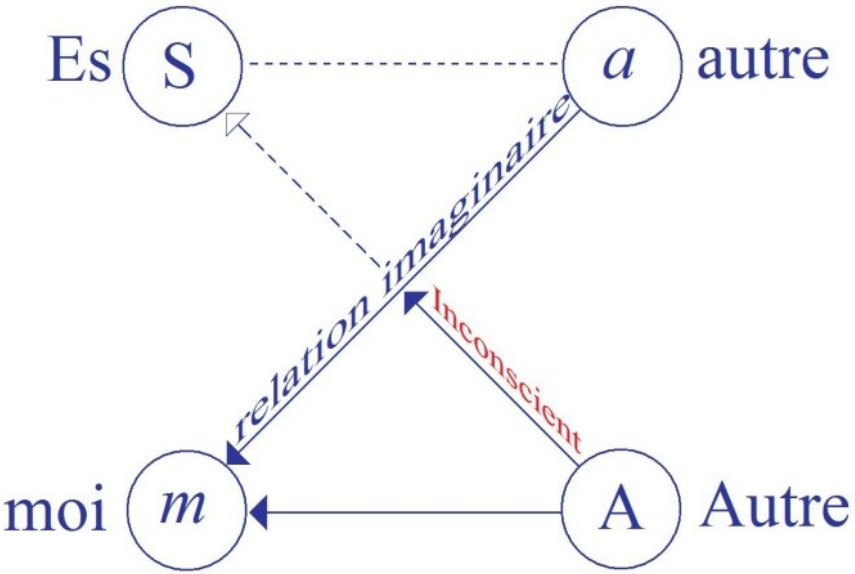
问题在于知道，为什么在人类存在中会发生另一种事情。至于现实本身的作用——现实从此作为某种使存在者学会这样行动的东西——章鱼也能做到，而且做得极好；章鱼或任何动物都可以。多年来，人们进行了令人精疲力竭的实验室实验，足以知道这种能力无处不在。即使抽象、概括，甚至三角性——依瓦拉布雷加问题的中心意义——也能在某个地方嵌入。只须相当执着地把三角形放在动物面前，它最终就会认出，也就是概括。因为归根结底，关于三角性这个问题，必须在一般性平面上作答。

人身上的新事物，恰恰在于这种想象性配合中，已经有某种东西以几乎不可察觉的方式打开、受到扰乱，从而使意象的符号性使用能够嵌入其中。我们显然必须假设动物关系中已经存在某种生物学裂口；我谈论镜像阶段那种根本而可以结构化的关系时，试图界定的正是它——也就是欲望与注意力受到总体捕获的关系。这已经预设匮乏。当我谈到人类主体相对于自己意象的欲望时，匮乏已经在那里；这就是那个极其普遍、被称为自恋的想象性关系。

也就是说，活着的动物主体对自己种类的意象具有敏感性。这是一个绝对根本的要点；正因为它，全部生命创造才不是一场巨大的乱交。对人类存在而言，他同自己的这个意象具有某种特殊关系；这显然是一种裂口与被如此构造出来的异化性张力之关系。

在场与缺席秩序——也就是象征秩序——对某种东西加以使用的可能性，正嵌入这里；也就是说，引入某种走向象征界与实在之间张力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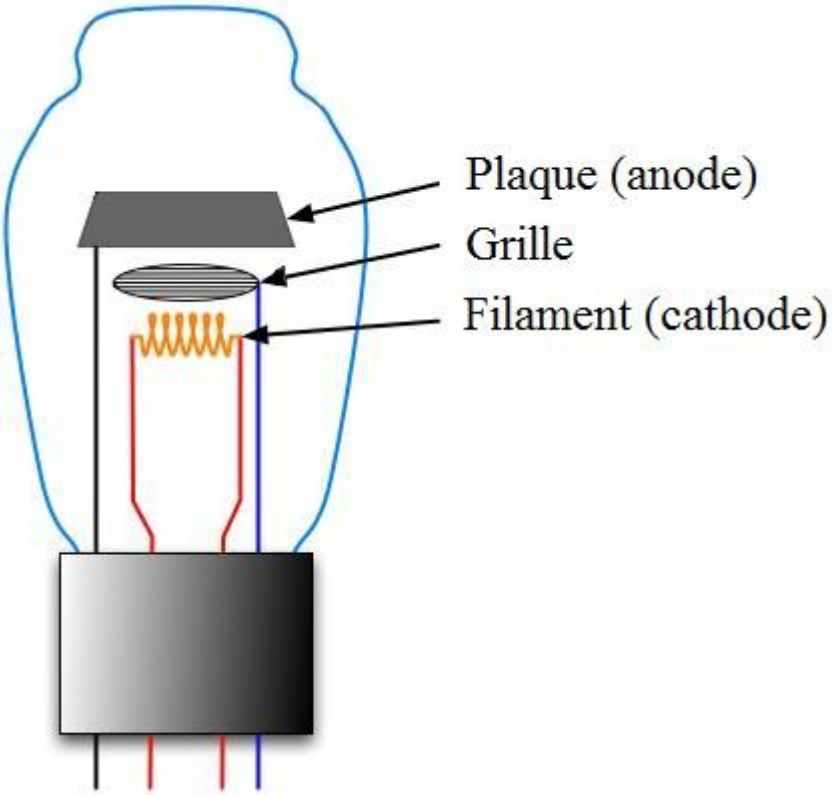
这种张力当然潜藏在下方。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它称作实体性的，只须赋予“实体”一词纯粹的词源意义：它“处在下方”。相对于人类主体的一切情境，它是一种 ὑποχείμενον〔 hypokeimenon，基底〕。那么，会发生什么？对所有存在的人类主体而言，他们都会认为 A 与 S 之间的关系始终如下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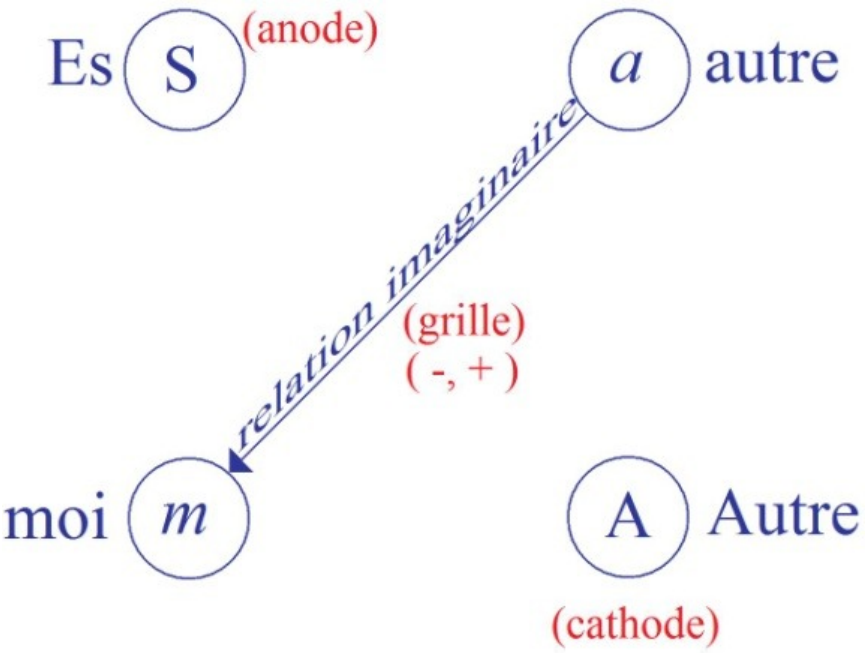


A → m → a → S；也就是说，以 m 与 a——自我与他者——这些必要的想象性基底为中介，并借它们构成对象的全部想象性基础。您〔对勒费弗尔-蓬塔利斯〕为什么发笑？您赞成还是反对？让我们稍微来一点“幻灯戏”，配合这种娱乐倾向。

让我们想象如下事情：在中间，在我们假定的符号性直通与经由想象界的通路彼此交叉之点，我们假定这里的东西——我们要跌入人的敌人、低级机械学中了——你们知道它是什么。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

们，这里可以放置任何东西，例如一只三极电子管；它很有趣，也很典型……





这意味着，当这里有一处真空时，你们可以产生所谓电子波。它由如下过程构成：电流穿过整个回路时，只要那里是真空，就会从阴极到阳极发生所谓电子轰击，电流由此通过。

除了阳极与阴极以外，还有一个第三极〔栅极〕；这第三极横置在这里，具有如下用途：依照你们使电流通过它的方式，可以做出两种不同的事情：

- 要么使这个第三极取得足够正的电位，让电子仿佛被导向它后面的东西，也就是阳极〔A → S〕；

- 要么使它取得负电位，从而立即停止过程；也就是说，从负极发出的东西将被你们插入的负电位排斥〔A → m → a → S〕。

这只是对我前几天讲的门之故事的又一次说明；考虑到听众并不同质，我们就说它是一扇“门的门”、门的二次方，仅此而已。你们可以用千百种其他方式制造一扇二次方的门，也就是门内部的门；任何构想都可以。

重要的是准确察觉：正因为这种以想象界为中介的特殊通路，想象界才能发挥如下作用：

- 以某种方式中断、切碎并标点回路层面上可能通过的东西；

- A 与 S 之间通过的东西，即使在最好情况下，也总会以某种方式妨碍、停止、切断并切碎自身；它本身具有一种自我冲突的性质。

即使在最好情况下……我说“最好”，因为普遍话语当然是符号性的，从遥远之处而来，并不是我们发明的：

- 非存在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只是掉进非存在的一个小角落。
- 至于想象界，以及被传递下来的想象界，我们也已经承受够了：父母、祖父母的种种淫乱，还有那些为精神分析增添谈资的丑闻逸事。

那么，从这里出发，许多事情终究很容易理解，尤其是语言的必然性，以及我曾多次向你们阐明的人际交流的必然性。在这一切的基础上，你们可以设想另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常常采取讯息的形式：主体以一种把他结构化、语法化的形式发出讯息，仿佛这讯息是由他从大他者那里以颠倒的形式接收到的。

当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说“你是我的主人”或“你是我的妻子”时——我已经多次向你们解释过——它的意思恰恰相反：这句话经过 A，又经过 m，即[A → m → α → S]，随后以某种方式回到主体那里；它借助人类语言，一下子把主体册立在丈夫或门徒这个危险而且根本成问题的位置上。奠基性的言说正是这样表达出来的。

那么，当我们谈到症状，换言之，谈到神经症时，问题是什么？你们或许已经注意到，在这个图式中，m，也就是自我，在回路里确实被小 α，也就是他者，同主体 S 分隔开了。但两者之间终究仍有联系：我，我就是我；你们每个人也都是你们自己；而在二者之间，显然也有某种东西。这个东西由一个具有结构作用的事实来刻画：主体是具身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符号层面上发生的事情，确实发生在生命体之中。

这里确有某种东西表达出生命体的全部生物现实；它在生命体的想象性［维度？］——自我是这种想象性的一种形式，而且已经被结构化，对此我们并没有太多可抱怨的——与生命体能够承担那种象征功能这一事实之间，建立起某种分界；正是这一功能使生命体相对于实在获得了一个卓越的位置。

神经症发生时，情况是这样的。说存在某种被压抑之物——而被压抑之物从来不会不回返——恰恰是在指出：在从 A 通向 S 的话语中[A → S]，某种东西通过了，同时又没有通过。

换言之，S 中的某种东西——也就是主体为了在言说中显露自己而拥有的某种东西[A → S]——会从别处通过[A → m → α → S]，会经由主体的身体支撑[m → α]。这一某种东西会在那里，并以另一种方式介入；至于它同已经给出的言说之间有多大比重，仍有待衡量：

- 就它得以通过而言；
- 就它——我刚才已经给过你们一个例子——结构化一部分人际关系，并使各种各样的承诺得以存在而言：归根结底，它是奠定

一切社会性结构或其他结构的一项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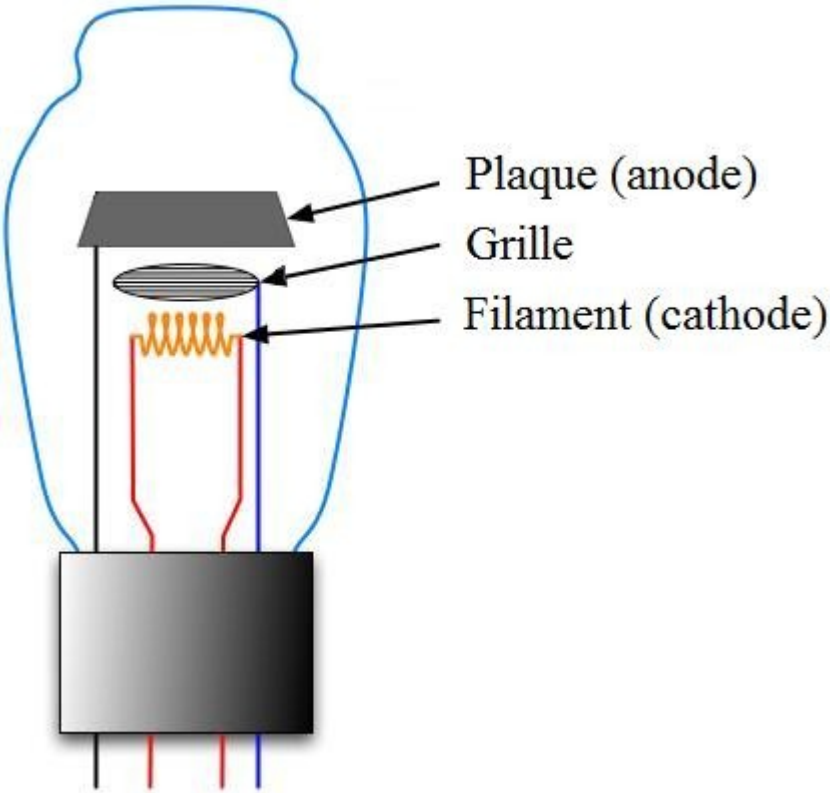
当涉及神经症时，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个，不过此时要从主体内部 m 与 S 之间的特有关系来考察它。也就是说，某种东西从这里通过[A → m → α → S]，并以一种似乎更具扰乱性的方式干扰奠基性的言说[A → S]；这种扰乱远甚于那种次级的、派生的言说中发生的事情。后者构成一种断裂，构成话语的切分：话语既是时间中的孔洞，同时又是具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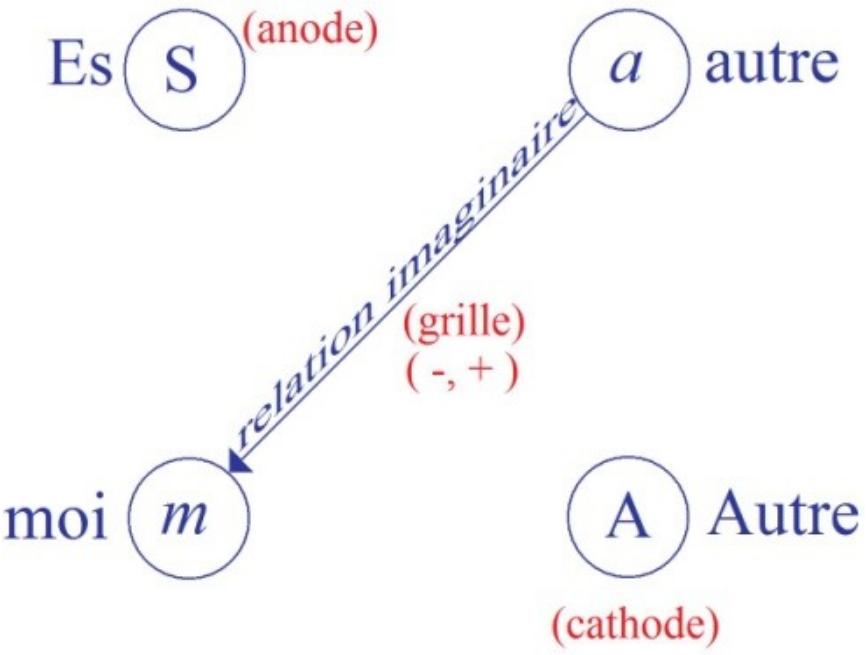
自身意指的话语，是说出某种东西的言说。正是这一点使症状成为一种颠倒而被封存的真理，分析治疗的任务就是把它解开。

分析的意义是什么？我已经多次告诉并教导过你们：如果确有某种东西配得上阻抗之名——也就是那种图式性的阻抗；所有图式都是如此——它就在于 m 不是 S，也就是说，自我并不等同于主体。

你们必须清楚，弗洛伊德所强调的并不完全是这种阻抗，因为他说，一切阻抗都来自自我的组织。其原因与其说是有这种自然条件，不如说自我的本性就是融入想象性回路，而这一回路规定着奠基性话语本身的中断。自我成为分析中那些话语中断的源头，是因为它是想象性的，而不只是因为它有血肉的存在、因为它是自我。这些中断只求通过行动、言说或 Wiederholen（重复）而实现——三者是同一回事。

当我对你们说“分析中唯一真正的阻抗，就是分析家的阻抗”时，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分析之所以可行、可设想，恰恰只在于处在分析家这一特定位置上的这个 a，以某种方式被抹除、缺席了。


Plaque (anode)
Grille
Filament (cathode)



这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在分析中已经发生了某种主体的净化……

否则，我们投身其中的这一切仪式又有什么用？

……这个 α 已经得以实现，以至于在整个分析经验期间，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把 α 这一极同 A 这一极重合起来。分析家以某种方式分有大他者的根本性质，而这恰恰是因为大他者是最难以接近的东西。由此，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在这里重新取用第一个图式——某种关系

便得以建立：从主体之自我的想象界出发的东西，可以与某物相协调——

- 不是同主体所习惯的那个他者相协调；后者只是他的伙伴，只是为进入他的游戏而存在的人；
- 而恰恰是同那个被遮蔽于他的大他者相协调。

所谓“转移”，恰恰就发生在这个层面，即 A 与 m 之间，而且是在 a——在这里由分析家所代表——缺席的范围内。你们看到，这里所涉及的——正如弗洛伊德在这篇文本中极为出色地说到的——是某种 Überlegenheit……

在这里，人们把它译为“优越性”；但我怀疑这里有一个弗洛伊德惯用的文字游戏，下文也表明了这一点。

……凭借这种 Überlegenheit，此刻在分析情境中显现的现实，始终——immer——被认作 als Spiegelung；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词：它被认作某段被遗忘的过去的映照。

也就是说，正是在自我本身的想象性功能中——这里出现了 Spiegel，即镜子这个词——同他者的关系中所产生的东西，才会取得那种多义的价值。因为从这里的阻抗不复存在之时起，A 与 m 就可以用某种方式彼此协调，充分交流；如果仍借用我们的三极管来说，就是 A 与 m 之间出现某种等时性、某种同时的正向化。这样，从 A 通向 S 的东西在此遇到的便可以说是一种谐振：某种东西非但不干扰、不阻挡奠基性言说的通过，反而在这里找到一种拥有充分意义、意义不断增长，有时甚至被放大了的东西……

因为我们可以按这种电子管的实际用途来理解它：在现实中，它经常充当放大器。

……从而使迄今受到审查的奠基性话语得以澄明——如果要使用那个最恰当的说法的话。

而就这一过程通过转移效应发生而言……

你们看到，转移本身不同于重复倾向，也发生在别处；后者才是那种坚持不退的东西，也就是那种只求通过的东西。

……发生在 A 与 S 之间的是奠基性话语，而转移发生在 m 与 A 之间。正是在这一范围内，m 可以说逐渐学会同这一话语彼此协调；它由此能够像 A 那样被对待，也就是说，逐渐同 S 联结起来。

这并不是说，“一个被假定为自主的自我以分析家的自我为支点”，然后变成一个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善于整合、越来越有知识的自我——洛文斯坦在一篇文本中就是这样写的；那篇文本我曾仔细挑选过，不过今天不会给你们读。它的意思恰恰相反：

- 自我要成为它原先并不是的东西；
- 它要来到主体根本所在的那个位置。

最终的位置由此实现：从 m 出发的东西——分析之后，无论是教学分析还是治疗分析，m 都不会因此蒸发；人并不会以脱离肉身的纯粹符号飞升天国，开口说话的当然始终是自我——其回路从自我通向作为符号活动根本源头的 S；而当它走向他者时，则借助一种对大他者和实

在本身的根本经验，并在这种经验已经得到符号化的范围内，同小 a，也就是作为想象性的小 a 会合。

因为一切分析经验都是一种意指经验。人们总向我们提出的一项最大异议是：如果我们向主体揭示他的现实、他的驱力，或不知别的什么，比如他的同性恋生活，会发生怎样的灾难……天知道，道德家们借此机会给我们讲过多少。但这项异议本身已经过时，毫无价值。即便我们承认，某种倾向原本可能经由某种努力而永远被排除在主体之外，而分析却向他揭示了它；分析中受到质询的也绝不是我们向主体揭示的那一现实。

我们关于分析的真实经验，恰恰从根本上反对某种阻抗分析观念；后者确实落在这个层面，以为分析就是让主体发现自己的现实。主体借助分析发现的是自己的真理，也就是那些确实属于他、可以称为他的命数的条件，在他独特命运中取得的意指。人类出生时带着各种极为异质、分配得或好或坏的禀赋。对此，我们自己既无从表态，也无从选择。但不论这一根本命数、这一生物学命数是什么，分析所揭示的都是它的意指；这一意指取决于主体的某种言说，而这言说不曾、也从来不完全属于他自己，因为主体只是它的通过点，他接收到它时，它已经被完整地构成了。

我不知道它是否来自原初的主导词、审判之书，或犹太拉比传统中记载的不知什么东西。我们不必看得那么远；我们的问题足够独特，涉及的范围也足够有限，因而“使命”与“召唤”这些词在这里能够充分成立。如果主体所内含并接收到的某种言说，与另一层面之间没有这种分岔和区分——这言说之所以能够承载某种东西，乃是由于某个特殊

情境本身具有符号性——如果没有这一切，它便不会同想象界发生任何冲突，每个人都只会纯粹而简单地顺从自己的倾向。

经验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弗洛伊德凸显出来，并始终作为构成主体的根本二元论而坚持、从未放弃的冲突，其根本意指无非就是这些彼此交错。我还想继续追踪这些交错。你们很容易感觉到，这张网络并不会止步于象征界与想象界这两个层面之间。

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发现，自我只要铭刻于想象界，它的性质就同力比多张力是同质的。一切属于力比多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切属于自我的东西，都像其余力比多张力一样，铭刻在想象性张力之中。力比多与自我处在同一边。自恋具有力比多性质；自我并不是一种更高的力量，不是纯粹精神，也不是人们如今试图替我们恢复的那种自主自我——有人竟敢把它写成一个没有冲突的领域，仿佛我们必须以它为支点，才能使主体取得最微小的进展。

这究竟是什么说法？这些主体究竟是什么人，以至于我们要向他们要求某种趋向真理的更高倾向？这种趋向升华的超越性倾向又是什么？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以最明确的方式拒斥了它。

在人类功能及人类历史的任何具体表现中，他都看不到……

他明确坚持这一点；由创造了我们这套方法的弗洛伊德说出，它自有其分量。

……丝毫趋向进步的倾向：

- 它绝没有铭刻在力比多秩序或生物学秩序之中；
- 并不存在趋向更高形式的倾向；
- 至于生命形式，每一种都同样神奇，就其存在而言彼此等价、同样令人惊异。

问题涉及的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我们通向了这个有别于力比多秩序的象征秩序；自我以及一切倾向和驱力也都铭刻在其中。正是它趋向快乐原则的“彼岸”，并作为一种秩序被抛到严格说来属于生命的界限、属于快乐原则的界限之外；弗洛伊德于是把它等同于死本能。事情正发生在这一点上——你们可以重读文本，看看是否认为这种说法值得赞同：正因为象征秩序本身被排除于力比多秩序之外，而后者包含想象界的全部领域，包括自我的结构，弗洛伊德才写下《超越快乐原则》，并抵达死本能这一概念。照他的说法，死本能不过是象征秩序的面具；恰恰因为——这是他写下的词——它是沉默的。

相关知识卡 拉康：死本能是象征秩序的面具

也就是说，只要它尚未实现，只要象征秩序还没有在某一点——在承认主体的某种东西这一点——建立起来，那么根据定义，它就是沉默的。

相关知识卡 拉康：死本能是象征秩序的面具

而正是这个象征秩序——它既尚不存在，又坚持要求存在——才是弗洛伊德在谈论死本能时所指向的东西：它是无意识底部最根本的东

西，归根结底也是 Es 中最根本的东西。死本能就是这种坚持：一个正在孕育、正在涌出、正在到来，并坚持要求得到实现的象征秩序。

［1954—1955 年研讨班结束］课次目录

相关知识卡 拉康：死本能是象征秩序的面具